

THE SIDE OF THE CHINESE HISTORY

马勇 著

中国历史的侧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承担者，
我们有权利知道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的侧面

马勇 著

中国历史的侧面II

近代史家笔下的另类现象

马勇 著

中国历史的侧面III

历史的缝隙与夹缝

马勇 著

一本你想看却不易看到的书！

听@旁观者马勇讲述一些不一样的中国近代史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
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晦暗而复杂的历史。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日报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 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书名：中国历史的侧面

作者：马勇

出版方：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 1月 1日

ISBN: 97875112561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目 录

[中国历史的侧面](#)

[中国历史的侧面II：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

[中国历史的侧面.3，历史的缝隙与灰烬](#)

目录

中国历史的侧面

第一章 老生杂谈

大清皇族今安在

溥仪与载沣

载沣儿子一系

载沣女儿一系

庆亲王一系

载泽及善耆一系

晚清司法改革

袁世凯“有密未告”

不速之客

围园劫后

剑拔弩张

缓兵之计

想象、误判与抓狂

文人不足以谋

后宫不是这样的

皇后——贤惠还是恶毒？

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

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

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

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

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

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

[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
[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
[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
[与历史大势相悖](#)
[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
[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
[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
[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
[袁世凯和民国法统](#)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治人与治于人](#)
[君子之德风](#)
[人生意义](#)
[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
[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
[发现东方](#)
[西方经验展示](#)
[开启现代中国](#)
[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
[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
[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
[叔嫂搭台共创新局](#)
[生命中的缺憾](#)

[另一种爱法](#)

[再度训政](#)

[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

[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

[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

[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

[杨度为什么不忏悔](#)

[底气何来](#)

[君宪救国的理由](#)

[学理离事实有多远](#)

[张謇：别了，皇上](#)

[体制内抗争](#)

[最后的善意忠告](#)

[转向共和](#)

[章太炎何以成大师](#)

[君宪先锋严复](#)

[君宪先锋](#)

[君宪主义危机](#)

[君宪成为历史](#)

[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

[民国四公子](#)

[第三章 一个王朝的隐退](#)

[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

[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

[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

[重新认识联省自治](#)

[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

[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

[假如没有《大清报律》](#)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民间资本进铁路](#)

[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

[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

[革命党人](#)

[南方新军](#)

[立宪党人](#)

[清皇室](#)

[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

[晚清新政，弄假成真](#)

[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

[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

[第四章 换个角度看问题](#)

[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

[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

[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

[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

[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

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摄政底气不足

立宪欲速不达

共和大势所趋

第五章 再给历史把个脉

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

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热点：历史相似性

焦点：革命与改良

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

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

本末与体用

维新与变法

新政、宪政与君宪

章太炎与新史学

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

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

相互不信任缘起

老师与学生

日本的小计

文化的根本在政治

中国历史的侧面

第一章 老生杂谈

大清皇族今安在

被辛亥革命直接改变了命运的首先是清廷皇族。他们本是天朝贵胄，国家统治集团，但辛亥之后，他们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或者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

溥仪与载沣

按皇室优待条例，民国政权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北京的宫中，因此进入民国之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存

在着，宣统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继续宣统纪年，仍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许多遗老也依然以受到皇上的封赏为荣誉。民国政府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对清廷给予礼遇和尊重，无奈溥仪不甘寂寞，**1917**年他在张勋挟持下宣布复辟，仅**12**天就被再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给赶下台。以此理由，冯玉祥于**1924**年**11**月将废帝溥仪赶出紫禁城，一个皇朝就这样凄惨终结。

溥仪后来还主动或被动介入一些政治运动，**1931**年被日本人扶持就任“伪满洲国”总统。**1945**年被苏联红军抓获，被定性为战犯，在苏联被监禁了五年。**1950**年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改造了**10**年，**1959**年底被特赦，恢复公民权利，被安置在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园工作。**1967**年因尿毒症病逝。溥仪一生结过四次婚，有五个女人，但由于身体原因，溥仪并没有留下任何“龙种”。大清皇族中最重

要的一支就这样无疾而终。

宣统小皇帝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继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当然是光绪帝的弟弟，即宣统帝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

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

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还是比较潮的。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他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融入社会的人。

载沣儿子一系

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俱、四子溥任；长女韞嫫、次女韞和、三女韞颖、四女韞娴、五女韞馨、六女韞娱、七女

耨欢。

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是因为皇族的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伪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是其一生最风光的时候。

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个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嫣生**1941**年出生，现居日本，其夫福永健治，他们共育有五个子女。

溥俱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

载沣第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職。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峯，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瑾。**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第二地质队工作。**1985**年回京，后因其身份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

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

金毓奎也是专业人才出身，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

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

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琨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

载沣女儿一系

载沣的大格格韞嫫，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

逝。

二格格韞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当上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

三格格韞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韞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

四格格韞嫔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

五格格韞馨由兄妹介绍，与万嘉熙结婚。

万嘉熙为清廷故臣万绳之子。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

六格格韞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她于**1982**年病逝。

七格格韞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皇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于**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

庆亲王一系

清廷皇族**1911**年之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

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等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结束了。

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

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清帝退位，大局已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

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歿。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

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商部后更名为农工商部，载振仍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的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底病逝。

载振的大弟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其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弟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

载泽及善耆一系

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

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

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

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的态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决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

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皇族还有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当历史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

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伪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

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其他的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做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的基本队伍。

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

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过着平民生活。

晚清司法改革

在晚清司法改革运动中，沈家本、伍廷芳是两位最值得注意的专家型人物，正是他们的智慧、知识、贡献，方才使中国司法体制能够在很短时间里转向现代，构建一个全新体制。

列强的建议，各位封疆大吏的敦促，使清廷很快意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因而在**1902年5月13日**任命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负责修法，责成他们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朝廷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

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

沈家本与伍廷芳，一中一西，是当时中国最有名也最有成绩的法学专家。沈家本出生于律学世家，他的父亲长时期任职刑部，是受人尊重的法律权威。沈家本早年孜孜不倦于科举考试，同时也在乃父影响下钻研法律问题，精通中国古典法律，著有《历代刑法考》等专门著作，是中国传统律学向现代法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当然，也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先驱者之一。

伍廷芳的出身与沈家本大相径庭，他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后留学英国攻读法学，获大律师资格，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法学博士，也是香港立法局第一位华人议员，后被李鸿章招揽幕中。伍廷芳对东西各国近代政治制度、司法体制高度认同，对东西各国法律条文乃至其立法背景格外娴熟。自**19世纪80年代**起，他先后追随李鸿章参与中法谈判、中日谈

判，**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伍廷芳是当时中国极为罕见的法律人才，以他对东西方法律制度的理解，协助沈家本修订法律，其价值趋向不言而喻。

对清廷而言，修订法律或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只是对列强的应付，只是使中国法律怎样更好地与西方接轨，不至于直接冲突，屡屡吃亏。然而当沈家本、伍廷芳等人对大清王朝现行法律条文进行全面清理之后，发现问题相当复杂，深切认识到所谓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在他们看来，这种改革，不可能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小修小补，而必须通过对原有法律的清理，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条文，另起炉灶，重建中国现代法律体制。

经过几年精心准备，沈家本等人主持的重要机构“修订法律馆”于**1904**年**5**月**15**日正式开张，这个普普通通的机构在袁世凯等督抚大力

支持下，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参与中国新法律条文的制定。在日本专家的帮助下，修订法律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对大清帝国现行法律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未来可能需要的法律法案进行了系统规划，尽最大可能翻译和研究东西方各国法律，酌定名词，考辨文义，以东西各国法律为参照，大规模、大幅度对中国法律中与东西各国法律相抵触的内容、不适应的内容进行删减、修改，主要参照日本的法律建构重新规范了中国的法律制度。

中国当时之所以愿意参照日本的法律体系重构自己的法律架构，一方面因为中国和日本同文同种，语言文字上比较容易沟通，另一方面毫无疑问是中国此时发自内心佩服日本这个民族先走了一步。日本通过脱亚入欧已经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西方国家，即便在法律制度这个层面上，日本人也已经将许多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条款译成日文，通过“日

化”重建了日本的法律制度。中国此时通过日本这个媒介，自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日本法律专家帮助下，沈家本等参照东西各国法律体系，大刀阔斧地删减、重建中国的法律体制，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奋斗，大致建立起来了一个现代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一些重要的、必备的法律、法规也都在那几年匆匆完成。这些新制定的法律法规为新政时期和此后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和现代社会的运转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支援，比如《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法》《破产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都是当时迫切需要的法律法规，也在后来的政治实践和现代社会运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

不过，对晚清十年乃至后来数十年中国政治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影响和启示的，可能还是沈家本等人参照东西各国现行法律制定的几部

根本大法，比如《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等，这几部根本大法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后来的法律现代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

《大清新刑律》抛弃传统诸法合体的旧制，规范为一部单纯的刑法典，废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旧名词旧概念，诸如“笞、杖、徒、流、死”等五刑终于被规范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和罚金，附加刑有剥夺公权和没收；确定了死刑的唯一原则，彻底废除了旧律中繁杂的死罪名目。此外，还有在西方各国习以为常的禁止刑讯、实行陪审和律师制度、改良监狱等，也都在那个时候逐步进入中国的法律体系。凡此，均使大清国的法律制度大踏步前进，大致能够满足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需求，像清廷最初所要求的那样，与东西各国正常交流而无滞碍。

清末新政法律体制改革，虽然还有很多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虽然许多新法典并没有得到完善，且大部分没有得到执行，但这场改革本身确实是中国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是趾高气扬的中华法系第一次低下头来吸收东西各国法律优长，重造中华法系，为此后中国法律的走向规定了大致不变的路线图。即便大清国后来成为历史陈迹，大清王朝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制度也依然被标榜为“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所继承。这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同时也表明新政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实际上已不再反映传统中国的社会状态，实际上葬送了自秦汉以来传承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固有法律体系，参照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变动和发展，全面引进了西方法律的大框架大格局，因而这样的法律体系不再反映中国的过去，而是对未来新社会新制度有很高很殷切的期待，为新社会制度的发生准备了种子。

袁世凯“有密未告”

按照过去流行的看法，**1898**年“戊戌变法”之所以演变成“戊戌政变”，光绪帝之所以泣血瀛台、幽禁十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之所以流亡海外十几年；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和杨深秀六君子之所以壮志未酬，血洒菜市口，皆源于袁世凯叛变。在指控者看来，他们的计划只有袁世凯知道。袁世凯是维新罪人，是光绪帝的仇敌，所以过了十年有摄政王载沣替乃兄报仇，将袁世凯开缺。这一系列因果报应环环相扣，不由得不可不信。只是遗憾的是，这些只是传言，不是历史。

不速之客

1898年9月18日，夜幕沉沉，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独身一人步履匆匆，前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头报房胡同的法华寺，拜访投宿在那里的袁世凯。

袁世凯是甲午战后体制内炙手可热的维新人物，三年天津小站练兵成效显著功名显赫，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兵部侍郎，相当于后来的国防部副部长。袁世凯此次北京之行就是为了这件事，是朝廷循任职惯例安排谈话。昨天（**9月17日**）上午，袁世凯已经在颐和园觐见了皇上，皇上夸他兵练得好，军事学堂办得也好，叮嘱袁世凯继续努力，甚至还说可以与顶头上司、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

皇上的格外关照让袁世凯很亢奋。**18日**，依然留在北京等待更具体安排的袁世凯见缝插针相继拜访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是袁世凯的老上司，有伯乐之恩，如果没有李鸿章早年欣赏、提携，不可能有袁世凯的今天；庆亲

王是恭亲王之后满洲贵族领袖，是朝廷此时大小事务的总管家。袁世凯与李鸿章就当时日趋紧张的军事形势交换看法，分析英国多艘军舰在大沽口外游弋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至于庆亲王，袁世凯在庆王府等到傍晚也没有见到，据说庆亲王留在颐和园参与军机，大约也是与英国军舰动向有关。

疲惫的袁世凯刚回到这个临时寓所，就收到荣禄派人送来的急件，叮嘱袁世凯留心英国军舰异动，让袁世凯尽快归队。由于袁世凯已经奉旨定于**20**日请训，不便立即离开北京回天津。袁世凯请幕僚起草了一个奏折说明缘由，请军机处变通安排在明天（**19**日）请训。

当袁世凯与幕僚正在秉烛起草奏折时，忽闻门外有人声。很快有人持名片来报，说是新任军机章京谭嗣同大人有公来见，不候传请，谭嗣同已至会客室。

对于谭嗣同，袁世凯当然相当了解。知道谭大人既是康有为的密友，也为今上近臣，而且，谭嗣同在维新阵营中是有思想有见解有担当的，坐而言，起而行，黑白通吃。袁世凯凭经验估计，谭嗣同不请自来，行色匆匆，绝对不是简单道贺，不是一般性寒暄，必有要事相商，于是停笔出迎。

围园劫后

见面之后当然少不了一番寒暄，谭嗣同对袁世凯荣升兵部侍郎表示祝贺，但不容袁世凯回话，谭嗣同立即表示有密语相告。袁世凯稍感诧异，即请入内室，屏退仆役，各自略表久仰及相见恨晚等意。谭嗣同以面相之法恭维袁世凯有大将格局，又不容袁世凯客套，转而忽

问袁公的请训时间是不是后天。

袁世凯告诉谭嗣同，原本安排请训谢恩的时间是后天，只是现在突然接到天津方面的电报，知英国兵舰数艘在大沽口海面游弋，正在准备具折明日请训，请训后即回天津。听了袁世凯的说明，谭嗣同迅即引入正题，正色道：“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者，内患耳。”

谭嗣同的说法激起了袁世凯的注意，急询其故，谭嗣同说：“袁公此次受到破格提拔，必将有以图报。皇上现在面临大难，非公莫能救。”袁世凯闻言失色，急忙辩白：“袁某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称，况己身又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皇上难在何处？”

听了袁世凯的表态，谭嗣同还算满意，于是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袁公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

禄最近向皇太后献策，将行废立之谋，皇上面临巨大危险。袁公作为荣禄亲信，难道毫无觉察？袁世凯说，在军营的时候，袁某也常与荣大人晤谈。察其词意，忠君爱国，从来没有操纵废立之类的阴谋。谭大人所说闻所未闻，恐怕道听途说，不足为训。

对于袁世凯的解释，谭嗣同将信将疑。但是为了说服袁世凯，谭嗣同还是按照先前与康有为等人商定的思路，挑拨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让袁世凯与荣禄决裂，为我所用。谭嗣同说：袁公固然是光明磊落的人物，但荣禄此人极其狡诈，他表面上对袁公信任有加，甚至让别人都觉得对你不错。其实，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荣禄在内心深处对袁公猜疑、防范甚多。一个最简单的例证，袁公辛苦这么多年，劳苦功高，成就显著，中外钦佩，但去年袁公仅仅晋升了一级，这是什么原因？说白了，就是荣禄故意抑制你。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南海康有为先生对你一直不错，曾在皇上面前保荐过你，但皇上表示曾听皇太后提及你，只是荣禄常常说袁世凯飞扬跋扈，不可重用。皇上对此也很纳闷，以为袁世凯办事甚为明白，但为什么总有人说他不可重用呢。谭嗣同以天子近臣的身份告诉袁世凯，你袁世凯这一次被破格提升，不知皇上为你费了多大劲。谭嗣同当然不是要和袁世凯侃大山，他的目的就是要袁世凯设法救皇上。问题在于，袁世凯根本不相信荣禄谋反弑君，不相信政治高层会发生这样的非常政变。袁世凯的犹疑不决逼着谭嗣同拿出真凭实据，好像谭嗣同也早已想到了这一点。谭嗣同遂从衣兜拿出一张纸片，但见上面写着：

荣禄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硃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

荣某，出硃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报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

很显然，这张纸片是谭嗣同写给皇上的报告，至于是否送上去，皇上是否有批复，谭嗣同并没有说。久经沙场的袁世凯应该说见过世面，但这张小纸条看得他大汗淋漓心惊肉跳。袁世凯心中暗想，此类据兵谋反的主意，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罪大恶极。他不禁反问谭嗣同：谭大人建议派兵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

谭嗣同说，慈禧太后是最大的祸首与罪魁，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政不能改，皇上无权，一切都无从进行。不过，这件事不需劳袁公大驾，自有谭某另外安排，袁公不必过问。

剑拔弩张

慈禧太后是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谭嗣同等人竟然准备对慈禧太后动手，这件事实在是非同小可。袁世凯深知，多年训练与影响，慈禧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内外大臣心目中至高无上，即便是一般士兵，也对皇太后怀有无限崇拜与景仰，以这种军队去捕杀皇太后，根本就不能成功。袁世凯坦率告诉谭嗣同：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袁某带兵，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不必可行。

谭嗣同对袁世凯的担忧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告诉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

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请旨办理。”

既然谭嗣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已无退路可言。但毕竟此事太过于重大，除了恐惧之外，也必须冷静面对。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袁世凯并没有被谭嗣同逼到死角，他从容告诉谭嗣同：“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谭大人今晚请旨，上亦未必允准。”谭嗣同告诉袁世凯：“袁公不必担心，谭某自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后天早上袁公请训谢恩时定有殊谕一道面交袁公。”

据袁世凯事后描述，由于当时他看到谭嗣同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谭嗣同毕竟是天子近臣，又不知有何来历，如此时明白拒绝，肯定翻脸，谭嗣同或许真敢“即死在”这儿，至于

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袁世凯想都不敢想。他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推宕，不节外生枝，不过度激怒谭嗣同。袁世凯的推宕理由是：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直隶总督，中外官民必大诤，国势即瓜分。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袁某统领的新军不过七千人，出兵至多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还没有等到袁某领兵开拔，皇上可能就将陷入危险境地。

谭嗣同似乎意识到袁世凯的推宕之意，他直截了当告诉袁世凯，这些理由都不成立，前提是袁公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对方措手不及。待袁公动手，即将殊谕分发诸军，布告天下，照会各国，看谁还敢乱动？

确实，如果真照谭嗣同设想这样做，谁敢反对？这又将袁世凯将到死角。袁世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

营内，小站存者极少，必须先将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对于袁世凯的实际困难，谭嗣同也略表同情。他说：“可请皇上先将硃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从这段话分析，谭嗣同等人虽然在预案中意识到政局可能会发生转变，但似乎并没有恶化到必须立即发动，似乎还有从容准备的时间。

谭嗣同的建议又引起袁世凯新的疑虑，他说：“我袁某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硃谕。谭大人先回，容袁某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谭大人如何办法。”

对于袁世凯有意拖延，谭嗣同当然不会同意，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先前似乎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准备，他一面告诉袁世凯：“皇

上意甚急，谭某有硃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一面从容拿出一份所谓硃谕。此份硃谕为墨笔所书，字甚工，亦很像今上口气，大意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飭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

显然，这份硃谕只是一个抄件，不是皇上手迹、亲笔。这可疑的硃谕引起了袁世凯的联想，他以为即便这份硃谕为真，其大概语意一若新任四军机章京请求皇上急变法，而皇帝设婉辞以却之者而已。于是袁世凯就此向谭嗣同提出疑问：“此非硃谕，且无诛荣禄、围颐和园之说。”谭嗣同答：“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

缓兵之计

谭嗣同的解释是真诚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他并没有亲眼看过皇帝御旨原件；第二，由于他的真诚，也使极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看到了谭嗣同及其背后那些人作伪的痕迹，从而使袁世凯可以更加从容应对此事发展，他已经没有谭嗣同刚到时的恐惧了。他告诉谭嗣同：“青天在上，我袁某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袁某无此胆量，绝不敢造次为天下罪人。”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与谭嗣同等人合谋。

对于袁世凯的态度，谭嗣同心知肚明，但既然已将所有计划向袁世凯和盘托出，谭嗣同只好继续使用挟制办法对付，他再三催促袁世凯立即召开会议，拟订详细计划，以待谭某向皇帝汇报。谭嗣同越说越愤怒，几至声色俱

厉，情绪异常。袁世凯看到谭嗣同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于是知谭嗣同不从他这里得到准确回答绝不会轻易离开。稍加考虑，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按照计划，皇上、皇太后很快将巡幸天津，等到那时，军队咸集，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袁世凯的这个说法当然有理，不过谭嗣同说，现在形势危急，恐怕等不到皇上巡幸天津，就会被废黜。对此，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既然朝廷宣布让皇上巡幸天津，必不致出尔反尔，发生意外。他劝谭嗣同不要胡思乱想操之过急。谭嗣同再问：假如朝廷届时取消了这次巡幸，那么有什么办法补救吗？

袁世凯说：巡幸天津，已经筹划很久了，花费也不少了。假如一定发生这样的事，袁某一定请荣禄出面力请皇太后和皇上，可以保证巡幸天津不会中止。此事在我，谭君尽可放心。谭嗣同说：“报君恩，救君难，立奇功，

建大业，天下事入公掌握，在于公；如贪图富贵，告变封侯，害及天子，亦在公；惟公自裁。”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指天发誓：谭大人以为我袁某何人？我袁氏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致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听了袁世凯这番话，谭嗣同方才释然，以为袁世凯是奇男子、大丈夫，作揖致敬，赞叹不已。

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交代，谭嗣同甚以为然，谈话气氛开始转变。

接下来，袁世凯问两宫不和，其因何在？谭嗣同对：“因变法罢去礼部六卿，诸内臣环泣于皇太后之前，纷进谗言危词，怀塔布、立

山、杨崇伊等曾潜往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更深。”

对于谭嗣同的说法，袁世凯未置可否，他的看法是，既然如此，谭君何不请皇上将必须变法实际情况向皇太后做个详细汇报，并遇事请示，多听皇太后的意见呢？至于礼部六卿，谭君不妨方便时建议皇上让他们官复原职，或另行安排。当此改革关头，一定要稳妥第一，易顺舆情，未可操切，有些事，一时条件不具备，宁愿缓办，也不能操切从事，亟亟如此，致激他变。袁世凯似乎很愿意与谭嗣同谈论改革大势与方略。不料，谭嗣同闻言而道：“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如此血淋淋话语给袁世凯极大心灵震动，他在内心深处实在是无法认同于谭嗣同的想法与做法，他觉得谭嗣同等人“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夜色已晚，遂托辞还要赶着写

奏折，恭请谭嗣同离去。

想象、误判与抓狂

谭嗣同离开法华寺，直接去了东华门附近金顶庙容闳寓所。按照先前约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在那里等消息。

康有为等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等来了谭嗣同，谭嗣同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与袁世凯的交涉情形。谭嗣同个人判断肯定不是那么乐观，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听从他们的建议举兵北上清君侧，不可能扑杀荣禄，不可能举兵包围颐和园，协助劫持皇太后。他们先前错误估计了袁世凯的觉悟，错估了袁世凯对皇上的忠诚，高看了袁世凯的决断、胆识和判断力。

对于谭嗣同的归纳和判断，康有为、容闳和梁启超等人似乎都能认同，问题在于，现在既然已经发动，既然已将秘密告诉了袁世凯，那么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康有为可以按照原先计划，接受朝廷安排前往上海，以钦差大臣身份接管《时务报》，那么北京方面怎么办？皇上怎么办？难道就听任那些守旧势力发动政变囚禁皇上，推翻新政吗？

一百年之后，我们可能会嘲弄康有为等人迂腐和疑神疑鬼，但是放在当年我们又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赤胆忠诚、无私无畏。他们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真实关系，他们不知道**1898**年政治变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因为有皇太后撑腰、掌舵，他们错误地以为改革如此艰难是因为皇太后支持一批守旧大臣专门捣乱。总之，康有为等人用想象代替真实，然后再用想象进行推动。

在容闳寓所谈话时，康有为、梁启超、谭

嗣同等人深深的失望感动了容闳。容闳建议由他出面请求美国驻华公使进行外交干预，以避免慈禧太后真的如康有为所预测的那样将皇帝废黜。然而康有为等人认为，美国并没有在中国或周边驻有军队，没有军事上的压力，仅仅凭借外交手段根本无济于事，反而白白浪费时间，于是他们谢绝容闳的好意。

容闳的好意无法执行，但这一思路无疑启发了康有为，使康有为觉得既然美国公使手中无兵，干预无力，那么手中拥有相当军事力量的英国、日本或许有办法干预此事。于是康有为在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于**9月19日上午9时**拜访李提摩太，希望通过李提摩太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

对于康有为所描述的光绪皇帝可能的处境以及中国的黯淡未来，李提摩太深表同情，然而他不过是一个传教士，他虽然与英国公使有相当多交往，但毕竟英国公使窦纳乐此时正在

北戴河避暑。远水解不了近渴，康有为只好放弃向英国公使的求救，转而寻求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

下午三时，康有为来到伊藤博文寓所，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但康有为担心清政府可能会指责他“假权外人”，故而改变谈话策略，不再像与李提摩太的谈话那样请求伊藤博文“救援”皇上，而是转为“请其说太后而已”，即请伊藤博文在觐见慈禧太后时，尽最大可能为光绪帝及康有为等人说情，尽量以客观公正的姿态向慈禧太后说明光绪帝和他康有为及那些维新志士并没有其他用心，他们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大清王朝的根本利益，为了中国未来。

按照这个策略，康有为确实说服了伊藤博文，伊藤几乎全部答应了康的请求，答应如果能够见到慈禧太后，他一定尽其所能劝说慈禧太后，尽力化解两宫之间的误会。可惜的是，

伊藤博文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太后，他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

几个小时紧张谈话结束后，暮色已晚，待康有为出城回到南海会馆时，他突然发现南海会馆“屋室墙倾覆”。这不同寻常的变化自然增加了康的疑虑，也更坚定了他离京出走的决心。

康有为悄然出走是**1898**年政治转折的关键，他如果继续坦然待在北京，估计事情不会发生；他如果光明磊落以钦差大臣身份堂堂正正前往上海，历史也必将改写，他在深更半夜悄然离京，仓皇出逃，既说明了自己的心虚，也暴露了问题。

文人不足以谋

根据康有为的解释，他之所以仓皇出逃，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经过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全盘托出了借助武力打破僵局的计划，是巨大失算。他们先前的密谋，基本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现在多出了一个袁世凯，不但袁世凯不同意，而且袁世凯还是体制内刚刚提拔的高官。他们开始心神不定疑神疑鬼，都因为袁世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所以认定袁世凯一定会告密。

其实，康有为等人估计完全错了。正因为袁世凯不是康有为圈子里的人，袁世凯对这个政变计划依然所知有限，他只知道谭嗣同让他捕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这两件事，也只是谭嗣同随口说说，没有文字，没有录音。即便袁世凯要告密，他怎么能空口无凭胡说八道？更何况，袁世凯并不是长舌妇，不是大嘴巴，谭嗣同看得起自己来说说想法，自己就去汇报，就去告密，这在官场如何相处呢？

实事求是说，谭嗣同走后，袁世凯并没有将这件事当作什么事，他虽然在第二天请训时表达过自己对时局的忧虑，甚至建议皇上不妨请老成持重的大臣如张之洞主持改革。但这些建议并非因谭嗣同来访而想到，这实际上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看法。

请训结束，袁世凯直奔火车站。抵达天津，太阳已经落山。袁世凯没有急着赶回小站，他前往直隶总督府找荣禄销假，顺便谈谈英国军舰动向，谈谈北京见闻。袁世凯在汇报中夸奖皇上圣孝，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所以必须设法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尚未将全部情况讲完，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拖至很迟仍找不到机会继续谈此事，于是只好先行告辞，约明日再说。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打断别人的谈话而继续已经说到的话题，显然是因为他认为谭嗣同夜访及其所谈情况虽然重要，但谭嗣同、康有为

等人毕竟只是一群书生，如果不能获得他袁世凯或其他军方人士的支持，他们在北京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大的政治行动，更不要说是杀荣禄、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了。所以，袁世凯并不认为局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不认为谭嗣同所讲的事情即将发动。

第二天（9月21日）一大早，已经知道一些大概但并不清楚详细情况的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袁世凯处详谈一切。出于自己职责方面的责任和作为大清王朝命官的道义感，袁世凯似乎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由于谭嗣同夜访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过程中不时向荣禄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打着皇帝招牌招摇撞骗，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等并不代表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把握地说，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

晓。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他们之所以执意要杀荣禄，是因为荣禄参与了废立阴谋。对于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

如果说荣禄此前没有丝毫犯上之心的话，但当他听了这么多内幕新闻，尤其是康有为、谭嗣同等把他作为犯上作乱罪魁祸首时，袁世凯相信，也不能不开始怨恨今上。为宽慰荣禄，也为保护皇上，袁世凯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袁某唯有仰药而死。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但是怎样处理这件事情，却也使荣禄、袁世凯费脑筋。他们筹思良久，亦无善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以及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

弟的电报。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经发动，控制了局势。这就意味着，尽管袁世凯不赞成谭嗣同的极端举动，尽管袁世凯出于道义上、君臣名分上曾向皇上有所暗示，并毫无保留地向荣禄汇报，但这些暗示与汇报在实际的政治运转中并没有发生作用，那么所谓由袁世凯告密而引发戊戌政变的指控就很难成立。至于政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11月7日**）

后宫不是这样的

置人于死地的谋略，瞬间取人性命的毒药，数不清的陷害，道不明的争斗，这不是某场著名战役的内容，而是如今火热荧屏和网络的宫斗剧和宫斗小说为人们描述的后宫生活。从《金枝欲孽》到《美人天下》，再到现在火热的网络作家流潋紫的《甄嬛传》《后宫如懿传》，一场场后宫争斗似乎永远难以完结。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后宫之中也是如此血雨腥风、充满斗争和算计吗？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清史学家马勇，为大家介绍符合历史真实的后宫生活。

皇后——贤惠还是恶毒？

小说场景：《甄嬛传》中，看似善良贤惠的皇后，却是皇宫中最恶毒的人，为了排除异己，她设计重重阴谋，陷害和自己对立的妃子，为了地位就连自己的亲姐姐和亲侄子都不放过，都要设计害死。

记者提问：皇后向来被称为是要母仪天下的人，历代皇帝在选择皇后的时候，都要选择贤惠淑良的女子，而在很多宫斗小说中，皇后往往才是所有策划的幕后指使者，真实历史中的皇后会这样吗？

马勇解疑：这要从中国文明和中国伦理讲起，历朝历代的皇后都是一国的国母，她们的职责就是母仪天下，做天下女子的榜样，比如历史上的朱元璋的马皇后，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等都是不得了的。其实皇宫和现在的家庭是一样的，男的是家庭之主，处理外面的事情，女

的在家里处理家庭事务，如果皇后整天把后宫搞得乌烟瘴气，那就是失职。就拿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慈禧来说，我们从很多作品中看到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从李鸿章和曾国藩笔下的慈禧太后看慈禧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不管是她会掩饰还是真的，只要在后宫之主这样的位置上，她们就会这样近乎严苛地要求自己。小说中想象的成分太多。

毒计——后宫常用毒计害别人？

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后妃们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受宠的妃子经常会被其他人用毒计陷害，在后宫中不会一些计谋，不会使几条毒计似乎就没办法活下去。

记者提问：在后宫中，妃子们真的是争斗

不断，整天互相陷害吗？

马勇解疑：我刚才谈到了，在后宫中皇后的职责是母仪天下的，而妃子们的作用则是生儿育女。他们会有冲突和矛盾，但这绝对不是生活的常态，虽然历史上有狸猫换太子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仅仅是历史上的特例，它之所以被史书记录就是因为太稀奇古怪了，才会被记下来。所以这种用毒计陷害的局面绝对不是后宫的常态。后宫其实和一妻多妾制的家庭是一样的，我就曾经研究过袁世凯的大家庭，他号称一妻九妾，但是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第一位夫人就像个大姐，带着底下的小妾们过日子，虽然她来自乡下没有文化，但是仍然很有威严。

皇帝——可以装成太监到处跑？

电视剧场景：《宫2》皇帝化装成小太监，满皇宫跑，于是结识了一个善良的小宫女，两人慢慢产生感情，终于皇帝显露身份，小宫女被册封为妃子。

记者提问：这个桥段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古代，皇帝可能会这样做吗？

马勇解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皇帝是需要**24**小时被保护的，他的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侍卫大臣保护，就算皇帝睡觉也要有人在视线看得到的地方看着。而且在古代皇帝是有《起居注》的，史官是**24**小时跟随着皇帝，随时记录其活动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更没可能发生。

子嗣——毒害他人子嗣很常见？

小说场景：《后宫如懿传》中，妃子一旦怀孕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不断有人下毒使其流产，而且皇后为了保障自己孩子的继承权，会想方设法不让别的妃子生下孩子。

记者提问：在后宫毒害怀孕的妃子这种事情可能会轻易并且经常性地发生吗？

马勇解疑：这是现代人的想象，皇帝之所以要那么多妃子就是要多生孩子保证继承，而皇权体制下，继承就是对大位的争夺，而在封建社会这是有一个体制的，中国文明就确定了长子继承制，就是皇位首先由长子继承，长子不在了，就由次子，次子不在了就由三子继承，是有一定的继承顺序的。因此，这种顺位继承就让这种毒害别人孩子的事情变得没有意义。而对于皇后来说，不管是哪个妃子生的孩子，都必须都要管她叫母亲，其他妃子只是生

母，只有皇后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毒害别的妃子不让她生孩子对皇后来说更加没有意义。

美貌——皇帝最爱是美女？

小说场景：《甄嬛传》，参加选秀的秀女因为出身低微而被其他秀女羞辱，进宫之后也备受歧视。而为了获得宠爱，让自己保持美貌又是妃子们毕生的事业？

记者提问：皇帝选妃美貌和出身哪个更重要些？

马勇解疑：最看重的是政治出身和政治忠诚，其次要贤惠，要有文化，最后是要年轻漂亮。我们现在看光绪的隆裕，都会觉得隆裕长

得实在不怎么样，怎么会成为皇后、太后。其实这就体现了政治忠诚，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小时候就被慈禧接到身边培养，有意识培养各种能力，后来和光绪结婚后，就一直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身边陪伴着。而要一天到晚陪伴在这些人身边，就一定要有政治上的忠诚和敏感。因此在古代选妃，最重要的是政治的忠诚，至于美貌要求不会太高，当然也不能看了让人厌恶。

毒药——后宫下毒很容易？

小说场景：《甄嬛传》，后宫戏中最常用的手段就是下毒，各种下毒的手段层出不穷。

记者提问：在皇宫中毒药真的这么容易弄到，而且这么容易给别人下毒吗？

马勇解疑：下毒在后宫哪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在安保严格的后宫，毒药本身就是不能轻易取得的，而且为了保护皇帝的安全，怎么可能很容易让人弄到毒药，还这么随意地就让人下毒害人呢。

雍正——他是什么样的人？

电视剧场景：《宫》《步步惊心》《甄嬛传》都描写的是雍正的爱情故事，观众们在看完这些宫斗戏后都笑称，雍正太忙了，同一时间和那么多女孩谈恋爱。

记者提问：雍正是什么样的人？好色吗？多疑吗？

马勇解疑：历史上雍正的形象还是不错

的，他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哪会有时间整天忙着和姑娘们谈恋爱，那是瞎扯呢。清朝的皇帝只有最后一个宣统皇帝教养比较差，那是因为很快清朝就灭亡了，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其他皇帝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至少在公众面前形象还是可以的。

史学家的担心——害怕小说成为历史

记者提问：现在很多人看完这些宫斗剧，觉得这就是历史，对此你怎么看？

马勇：这些作品把中国的历史扭曲了，电视剧里很多都是假的，但是观众们看得时间长了，就慢慢习惯了，慢慢地习以为常，就觉得是真的了，反而有时候史学家说的一些真的情况他们觉得是假的，这让我很担心。

（原载于《扬子晚报》**2012年4月7日**）

义和团是怎样运动起来的

秘密结社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其功能是在政治高压社会网络中为孤立无援的个人提供咨询和帮助。据研究，晚清北方中国活跃的所谓义和拳只是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一个分支，大多属于白莲教系统，其政治起因多是不满意于满洲“异族”统治，故而在清朝前期从事“反清复明”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以民间力量为清朝政治统治制造麻烦。

到了清朝中期，民族意识在长时期消磨中逐渐丧失，由白莲教系统演化出来的所谓义和拳实际上已演变成以强体健身、自卫身家为宗旨的民间武术或娱乐团体，他们的政治诉求一般说来比较简单具体，因为他们已失去以满洲

人为斗争对象的可能和机会。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随着列强的战舰大规模东来，涌入内地，他们在向中国社会传递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毫无疑问也因为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而支持或者说利用了一些无良中国人。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有许多虔诚的中国人真心向教，但同样不可否认早期教民中也有一些无良之士甚至地痞无赖。这些无良之士利用传教士作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激化了中国民间社会中西文化矛盾，西方来华传教士无端替那些无良教民承担了责任。民间社会与“新异族”传教士的矛盾不断加剧，他们逐渐将传教士作为主要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于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

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而已。

甲午战后则不然。随着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兴起，民间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以及他们所豢养的那些所谓教民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和土教民。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他们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一般说来，在甲午战前，除个别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

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后，由于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本职，开始直接或间接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上帝传播“福音”的原初宗旨。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因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应该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出其不意占据胶州湾，并将此变为德国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言行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

有普遍意义，但也为数不少。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时，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宗教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其故国竭力鼓吹过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

像樊国梁、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国情和内部事务。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与行动或许不会那么严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后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反对

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就战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蹂躏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似乎更严重。山东人民不仅在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列强瓜分之害。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后，便开始把山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墓，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与痛苦。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在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强烈不满，引发一系列突发事件。

按照中德双方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

止，并没有德国派兵听其围剿平息的明文。然而由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太过低下，当这些突发事件爆发后，地方政府往往反应迟钝，制止不力，甚至有纵容民间社会向德国殖民当局闹事之嫌。于是久而久之，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忌中德双方先前达成的谅解，一旦某地发生骚乱，殖民当局往往绕开中国地方政府，迅速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

为了平息民怨，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山东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维持原条约中的约定，但凡租借地界外发生纠纷，仍归中国地方当局处理，以免各方争论不休而起纷争。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

部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武装反抗。

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甲午战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城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

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等国殖民地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等在高效率低成本运输工具运输手段冲击下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人祸之外是天灾。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达五十州县。**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处在

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积极响应，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群体骚动。

骚动的主体就是那些民间秘密结社，他们在下层社会盘根错节世代相沿，拥有巨大势力和复杂网络。他们的活动隐现起伏，直接反映政治统治秩序治乱兴衰。一般来说，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时，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

综合各种文献记载，**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的秘密结社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

会、哥老会等。如果从人员构成进行分析，这些教门结社的主体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民间艺人（如耍猴的、架鹰的、耍武把式的）等。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荡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角色。

至于这里说到的义和拳，其来源复杂，演变曲折。**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等相关资料，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认定义和拳乃十九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劳氏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不过，后来有些研究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看法，或以为义和拳源于一种由官方提倡和主导以勤王

为目的的民团组织，即担负着村庄防卫功能的民团；或以为大刀会和神拳在整个华北的骚乱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直鲁边界地区的义和拳是这次民众运动的主要来源；或以为义和拳的兴起和传播主要是因为鲁西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标志性仪式，即民间艺人中那些耍武把式的人所表现出的“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这种仪式易于接受，又与其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

综合各家研究可以看出，后来的义和团成分比较复杂，其组织构成并不仅仅以白莲教为主，而是以金钟罩（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等为核心。这些拳会在十八世纪末即已成为秘密教门羽翼。至**1899**年华北骚乱初起，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或称金钟罩及红拳会，已与坎卦教、离卦教相融混；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后又改称

为“神助义和拳”，也与教门相结合；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亦以离卦教为依托，显然也具有教门特征。他们不是一般的拳会，实系分属或结合于以八卦教为主体而区分为文武场的“拳教”组织。

这些拳教组织往往通过揭帖、坛谕、传言等方式，宣扬民间宗教的所谓“劫变”观念，宣称义和拳是顺应天意，拯救劫难，有神佛保护的团体，以此作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影响的工具和手段。他们在习拳练武外，兼习法术，举行各种具有明显荒诞特征的宗教仪式，渲染各种所谓刀枪不入的超凡超自然本领。尽管这些手段在吸引群众、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自然比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知识分子质疑，因而他们除了能够愚弄农村广大农民外，很少能够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同。

作为广大农村中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义

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不可能产生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理想。他们之所以坚决反对外国教会，除洋教士、土教民的不法行为、为非作歹激怒了他们外，就信仰层面而言，显然是西方基督教观念与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之间的冲突，是本土文化面对外来强势文化的压迫而采取的一种非理性政治动员和政治斗争。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民间自发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而已，他们要想形成一股真正意义上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就必须与官方意志相结合，否则根本不足以影响大局。

而官方的反西方思潮与势力在戊戌新政结束后也确实在萌动。戊戌年的政治变动特别是慈禧太后重新出园训政，大清王朝在政治上确实走上了一个“变法维新的反动时期”，凡新政中所提出或实行的举措，几乎一概废除。而新政的基本价值趋向是学西方，所以这一政治上的反动便在价值取向上无疑鼓励、纵容了各种

各样的反西方思潮和势力，启发了国内莫名其妙的民族主义情绪。

强烈的排外意识是戊戌后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那时朝野似乎一致厌恶西方反对西方，最上者如慈禧太后，她虽然是近代中国比较早认识西方近代发展实质意义的领导人，但在戊戌后出于最实际利益的考量也使她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她不明白她那样执着地劝说中国人学习西方，西方为什么还那样与她过不去？大清王朝已明白宣示戊戌年间的政治变动主要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犯上作乱，而西方诸国根本不相信大清王朝的郑重宣示，反而听信康、梁的妖言，鼓励、支持康、梁等人肆意攻击诋毁我天朝上国。慈禧太后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民意，这是她在戊戌后一下变成了西方文明反对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慈禧太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朝中大臣和一

般士绅，曾经参与过新政的那些大臣已在政变后受到相应处分，而现任大臣或原本就不满意于戊戌年间的政治改革，或因太后态度转而对西方文明比较反感。他们过去或许一度仰慕赞美过西方文明，但他们实在弄不明白西方何以总是欺负这个中国学生，总是跟中国过不去。他们感到西方人和西方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政治变革，可能与他们的总体阴谋有关，那就是防止中国真的强大，阻止中国发展，乃至彻底搞垮中国，进而将中国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很复杂的心理，所以当一些朝中大臣发现义和拳也具有反西方的倾向时，自然显得很亲近，一改大清王朝对民间秘密结社素来镇压的严厉姿态，采取容忍或视而不见，听任这些秘密结社做大。

对于官方反西方的思想动向，这些秘密结社从自身处境中很容易感受出来。知恩图报是中国人的传统，于是在清政府的容忍默许下，

逐渐做大的秘密结社投桃报李，适时提出“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庚子前中国的两股反西方思潮和势力终于走到一起了，义和拳、大刀会以及其他一些神拳组织很快便被“运动”到那个后来叫做“义和团”的组织中去了。

重新估价太平天国的意义

在近代中国早期历史上，太平天国肯定是一个怎样估价都不算过分的重大事件。这场与清廷对峙十几年的“异样政权”，即便最终失败了，终结了，但确确实实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我们不难设想，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清廷不会向西方学习，中国必然会在旧有轨道上徐徐而行；假如没有这场革命，汉人士大夫还会继续沉沦，不会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政治大变局。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要从世界背景进行关照，不能从狭隘的阶级分析、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考量。过去一百年，对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有各种各样的估价，推崇的简直自认就是洪秀全遗产继承人，不遑多让；贬低的，恨不得就认太平天国为“邪教”，洪秀全为“魔

头”。其实，这两种极端评估都失之偏颇，历史主义分析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场“未完成的革命”既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与历史大势相悖

在帝制时代，从正统史观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谋反，就是叛逆，就是破坏社会稳定、社会和谐，因而不会有什么人去肯定这场革命，甚至到了新史学发生，也很少有学者敢于正面肯定太平天国的意义。

其实，在两千年帝制时代，类似太平天国这样的政治运动所在多有，几百年、几十年一次的改朝换代，大致上都遵循着太平天国这样的路径。只是许多朝代成功了，改成了，如汉朝，如明朝，更多的则失败了，沦为流寇。成

是王侯败是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历史从来不会、不敢嘲弄成功者。假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清廷南北分治一百年、两百年，假如洪秀全灭了清朝统一了中国，历史都会改写，评估就会不一样。这不是历史学家势利眼，而是历史本来如此。

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过去的解说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看法，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洪秀全太腐败。这个看法几乎成为共识，但凡知道太平天国的，无不有这样的认识。仔细想想，这个说法并不合乎历史事实，腐败只是表象，并不是太平天国失败的真正原因。历史上比洪秀全腐败的政权多得是，并没有像太平天国失败得这样迅速、这样惨。

究其原因，太平天国的失败，还应从历史大势去寻找。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看法，是太平天国可能与历史大势相悖。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叶，发生地点在广西。时间、地点，以及主要参加者的身份，都非常耐人寻味。从这里，或许能够读出与大历史的关联处。

19世纪中期，**1850**年，是中国经历了那场鸦片战争之后被迫打开国门，与世界不得不正面交往的时候。中国在那之前，对世界并非茫然不知，只是统治者出于一己之私利，不愿接受西方，不愿让西方资本进入中国，培育市场，进行投资。一个未被开发的农村、农业无法容纳西方工业化之后的过剩产能，于是中西之间的贸易失衡在**19**世纪**40**年代到了让西方无法容忍的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源。

鸦片战争的结果——五口通商，中西之间的贸易规模就整体而言大幅度扩大，但对广东，对与广东比邻的广西而言，由于长时期坚持排外，坚持不让外国人入城，坚持原先一口通商的垄断利润，所以五口通商之后，两广的

经济状况并没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而好转，反而走了一个向下的通道。这是过去的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太平天国发生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的原因。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兴起，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来意义的农民起义，这场运动的大背景是中国已经局部踏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轨道。但是，也必须看到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并不具备那个时代的国际视野，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因而过去的研究者如冯友兰注意到洪秀全政治思想中愚昧落后的一面，庆幸太平天国被剿灭，否则中国将被拉回西方意义的中世纪。

冯友兰的研究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的主流，洪秀全那些太平天国领袖确实没有与世界同步的意识，他们的举措与世界大势相悖，由此就能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必然性。

一个自我封闭的政权

太平天国在**1850**年金田起事后，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很快拿下了半个中国，定都南京，掌控了中国最富庶的东南半壁。两百年的大清王朝面临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如果适时调整方略，即便不能北伐成功，也有机会南北分治，形成以长江为界的政治格局。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势必改写。那么，是什么因素让太平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呢？是眼界，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

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不到一个月，**1853**年**4**月，在中国拥有相当战略利益的英国公使就冒着危险访问了南京。年

底，法国公使也沿着这条路径与太平天国取得了联系。英法两国当然不是同情中国的农民起义，也不是刻意挑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的对立。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就是希望太平天国领导人不要因为战争而影响两国在长江流域的贸易和利益。

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是各国当时利益所在，因而当太平天国在这些地区貌似稳固控制局面后，列强无法淡然无法漠视，他们尽管与清朝定有外交条约，但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准备并且必然会脚踏两只船，打算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两边下注。

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来说，两边下注充分反映了贸易自由原则中的现实主义外交，没有办法从道德、义气、立场、原则等层面去解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是真金白银，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为各自的“衣食父母”资本家服务，必须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外

交保护。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各国公使一方面与清朝外交官周旋，要求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安排会晤，就即将到期的条约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他们不能不对气势如虹的太平天国给予适度关注，甚至试图与这个新政权建立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以防万一。

然而，太平天国说到底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国际视野还是非常欠缺。当美国公使麦莲冲破重重关隘尝试着与太平天国建立某种联系时，竟然被太平天国不明就里地拒绝。**1854年5月30日**，行抵南京城外的美国公使麦莲收到太平天国领导人罗苾芬、刘承芳复信，指责美国人写给太平天国领导人的信不合礼仪，不够礼貌，并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宽容美国“年年进贡，岁岁来朝”。美国人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儿好感就被这样的无知吹得一干二净。

稍后，麦莲给太平天国方面发去一封复

信，强调来文皆尽非友谊之意，美国不得不暂时中止与贵国的联系。以后如有必要，将按照中华与美国所定条约进行处理，凡属美国商民在中国所应得之利益、公益等事款，美国使领馆将按照协约进行处理。很显然，美国视太平天国为长江流域一个政治实体，愿意打交道，愿意与太平天国进行合作以保护美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只是，太平天国对外部世界知道得太少了，所以麦莲不得不放弃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的尝试。

6月14日，麦莲给美国国务卿发去一份报告，以为太平天国差不多完全由一群无知的和不文明的内地人组成。这些人配不上文明世界的尊敬，与他们进行任何令人满意的外交性质的交往差不多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麦莲建议，美国应该利用中国现在的危机扩大美中之间的商业交往，发展文明的荣光和福祉。但是，这个扩大应该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利用

太平天国给清政府带来的危机，扩大与清政府的交往。美国通过对太平天国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弃，至少是暂时放弃了与太平天国构建外交关系的企图。

与美国的外交动向非常相似，英国公使包令也在这个时候委派专使前往南京，一方面观察长江流域动态，另一方面试图打开与太平天国联系的通道。**6月18日**傍晚，英国专使麦华佗携带英国公使包令的儿子卢因·包令乘军舰抵达镇江，遭太平军炮击而被迫停航。第二天，麦华佗一行登岸拜会太平军官员要求道歉。太平军官员非常有礼貌地接见了他们，并表达了歉意。麦华佗一行在这种情形下继续西行，**20日**抵达南京，要求会见太平天国高级官员，面谈要事。

麦华佗会见高级官员的要求被太平天国以上国姿态坦然拒绝。第二天（**21日**），麦华佗的舰长麦勒西登岸在秦淮河口会见了一位太平

军下层军官。麦勒西请这位军官帮忙给东王送一封信。这封信列出三十个问题，并请杨秀清给予接见。

温文尔雅的英国人依然没有获得太平军将领的好感，这些将领并没有从共同的基督信仰上善待英国人。两天后，太平军将领明白拒绝了英国人的请求。英国人不再温文尔雅，而是愤怒复信太平军将领，抗议这些荒唐的不友好的限制，并要求太平军对于他们的三十个问题给予明确答复。太平军对于这些要求依然不予理睬。

英美外交在太平天国那里吃了一个闭门羹，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似乎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和世界沟通，进行贸易。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剧和历史局限，由此也注定了太平天国的结局。

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

洪秀全、太平天国失败原因肯定很多，不一而足，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领导人在十几年漫长岁月中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常态社会应有的统治方式，长时期实行战争状态下的特殊措施，久而久之，人民生厌，无法支持。

太平天国金田发难后，按照军事方式编练军队，男女隔离分编男营、女营，有助于军队管理，有助于发挥战斗力，这都是对的。这一制度即便实行到定都南京后，也是应该的，没有大问题。但是，当定都后与清政府的战争进入僵持阶段，洪秀全等领导人继续用战争状态非常手段管制人民，继续实行男女隔离制度，肯定影响士气，影响民众的向心力。

在经济制度方面，太平天国长时期实行圣

库制度，自金田起义到革命失败，这一制度都没有调整。圣库制度在战争状态下有利于保障军队供应，吸引穷苦民众参加革命，对保障军队纪律等，都有积极作用，但当定都后，当统治成为常态后，太平天国领导人还用各种理由坚持圣库制度，坚持什么特色，这就严重违背了人性，不合时宜，是将理想当作现实了。

特别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占领南京后，将圣库制度肆意扩大，将城市居民纳入圣库制度管理范畴，强制性要求“人无私财”，大公无私，毫不利己，这就不是一般的违反人性，而是将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架构强加给人民，强加给社会。

圣库制度、男女隔离制度，在特殊的战争状态下或许是有用的，但其适用范围必须限定在非常态阶段，一旦社会进入常态，统治方式必须尽快转换，必须从一个革命政权转换为一个建设政权。假如，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领导人

在南北分立大致成型时注意到了这一点，相信即便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被曾国藩湘军铁桶式围困，太平天国治下的人民即便为了一个安宁的生活，也会与太平天国一起奋斗到底，保卫家园，安居乐业。

特殊的管制社会方式并不是创造，真正的创造必须尊重人类在社会管制方面的智慧积累。太平天国领导人之所以别出心裁弄出那么多新花样，还与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胡来有关联。

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纯粹的西方意识，更不是西方工业化之后的民主、科学与宪政。洪秀全当然没有这种觉悟，但是洪秀全无论如何不应该让意识形态长时期畸形化。假如当其革命之初为了反抗清廷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意识形态，需要一个被加工过、由自己随意解说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当定都南京、社会渐趋常态后，洪秀全就应该有

意识淡化革命时期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意识形态，重新认同中国传统，重建中国社会，那么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应该会有不一样的后果。

然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太想与别人不一样了，太想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他们长时期坚守那种不中不西的意识形态，终于被曾国藩找到了痛下黑手的着力点。太平天国的失败不是败在武力上、战场上，而是其独特的、非常态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其与人民、与士大夫的关系。

聪明的人总想着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与世界。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最理想的社会，就是与别人一致而又别致。一致是前提，别致是特色。没有一致，独出心裁，也就没有别致，没有未来。这或许就是太平天国这场“未完成的革命”一个最值得吸取的教训。

我理想中的辛亥大片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2**年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一百周年。最近有些机构加紧筹备或制作这方面的选题，有图书有电影有电视剧，可以期待届时会有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涌现。

因为职业关系，我最近应邀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稿，或应邀参加一些相关选题的研讨会，深受启发，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觉得有提出来讨论的必要。

我当然赞成历史题材影视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创作者在充分把握历史脉络的前提下，应该拥有比较充分的施展余地，比如最近播放的《苍穹之昴》，其实就是在大的历史框架下表达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理

解，以具体的日常生活去解读那个时代，重新塑造一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重新建构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想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辛亥革命的大片，当然也不必拘泥于历史事实本身，不应该束缚创作者的手脚，作者在不违背大的历史框架前提下，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不仅必要，而且必需。

从我现在已经看到的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看，创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与背景还不是很清楚，有的作品从戊戌六君子写起，有的作品从保路运动开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实，辛亥革命的发生必须从甲午战争说起，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没有办法证明先前三十年洋务运动是一场跛足的现代化运动，也就没有孙中山的觉醒，没有中国革命。我理想中的辛亥革命大片，就应该写出孙中山等民主主义先行者不畏艰难前赴后继的精神，写出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气势和愈挫愈奋的勇

气。

当然，辛亥革命从革命党人发动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最后演化为全民族的觉醒全民族的抗争，因此还必须描写和兼顾其他方面的人群，比如与孙中山差不多同时兴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中坚无疑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稍后有各地的立宪党人和他们发起的立宪运动，有各地的新军，特别是袁世凯、张之洞两人一南一北所统帅的新式军队，这些军队原本是大清王朝统治的基石，最后却成为大清王朝的掘墓人。至于各地民众自发或不自发的抗争，也是清朝统治根基瓦解的一个原因，也很值得描写歌颂。

至于辛亥革命的下限，有的创作者将之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这当然不能有什么问题，但总显得有点不是那么完整。如果不说南北和谈，不说孙中山南方革命党人向北方的袁世凯移交权力，辛亥革命就会不那么完整。南

北和谈并达成一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正是通过这次和谈，不仅终结了中国五千年的帝制，而且中国人的相互容忍相互妥协，使中国避免了一次法国大革命式的战争，避免了一次大规模的血腥屠杀。这是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愿说的，其实这可是当年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最大期待，也是最合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举措。不论是清廷宣布退位，还是孙中山宣布让权，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三代禅让相媲美的伟大事件。

影视作品当然离不开人物刻画和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一个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肯定会在人物形象重塑上有亮点有色彩。就辛亥革命这段历史说，由于在过去一百年间，附加在这段历史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太过浓厚，因此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可能并不是历史真实，这就给创作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比如摄政王载沣。许多文学作品的描写者都将这个人物写得非常不堪，这其实太单调太平面。载沣固然不是雄才大略的摄政王监国，没有办法与清初摄政王多尔袞相比，但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载沣，绝不是选择他的无能、粗鲁和传统描写中所说的短视与自私。只要仔细研究载沣的相关资料，我们就会发现载沣在过去一些文学故事中的形象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是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一个王朝的消逝不能没有原因，因此找到了这个倒霉的摄政王载沣。真实的载沣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向世界见过世面的人，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对于晚清的政治民主化即立宪运动并不敌视，如果不是他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

至于与摄政王载沣一起担负起监国重任的还有隆裕皇太后，许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对这

个形象的理解上，也有着很深的误会和平面化的理解。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丰沛的政治资源和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之所以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自然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只要看一看她在**1913**年不幸去世后全世界特别是国内各界的普遍反响，就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对中国作了怎样的贡献。简单地说，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大概是一种概率比较高的可能。

在清末民初历史舞台上，最有声有色的无疑首推袁世凯。只是由于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中的一念之差，使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发生根本逆转，他的一生差不多都被否定，似乎毫无可取之处。其实，袁世凯如果真的像传说中那样阴谋、狡诈，是曹操式的奸雄，那么我们就

很难理解清末民初国际国内“非袁莫属”的共识和普遍呼声，无法理解孙中山何以心悦诚服地推戴袁世凯，并欣然移交权力。过去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以现在真的应该重新考虑怎样重塑袁世凯的形象，既要看到袁世凯思想手腕中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具有相当的新思想，他既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之一，他是北洋的灵魂，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和希望。如果我们固守旧有观点看待袁世凯，清末民初的许多事情都不好理解，不要说他不可能被清廷被慈禧太后瞧得上，就是南方革命党人，国际社会也不会对他有什么好感，更不要说指望他再度出山收拾旧河山了。

至于辛亥革命时期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也应该在形象塑造上好好琢磨，写出个性，写出光彩，写出人性

的光辉，也要写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而不是高大全。不要脸谱，而要生活，要真性情。要像看待自己的同事那样看待这些人物，不要为尊者讳，更不要亏待先人，延续他们之间的仇恨和对立。

当然，要想重新诠释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重构辛亥革命叙事模式，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比较中立比较科学的历史观价值观，尽量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尽量对辛亥以来几十年中对历史人物的妖魔化有一个“去魔化”的功夫，以日常情理的平常心去观察去描写那些历史人物，就会得出不一样甚至很不一样的观感。一部历史剧，如果没有不一样，或形态稍新的历史观，要想成功，估计会非常困难。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真诚期待能够有一部或几部接近于历史真实而又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剧出现，以反映和记录辛亥那个伟大的时代。

其实我们不了解民国

清帝退位一百年了，中华民国创建一百零一年了。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许多人、许多事似乎还没有走远，我们望着那些背影，不仅感到亲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鸣，毕竟我们就是从那里一步一步走来。只是从学术史意义上说，对于民国，我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民国，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真实的传说。

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

如果从**1912**年中华民国开国算起，至**1949**年中华民国主体部分在大陆结束，中华民国的

历史不过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放到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沧海一粟，弹指一挥间。然而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三十八年历史的中华民国相当复杂，我们不仅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还没有办法与台湾学者取得共识，即便在我们的意识中，这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也如云如雾，因为我们不仅反对蒋介石，而且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我们唯一能认同的是孙中山和他的南京临时政府，而这个临时政府恰恰在民国法统中又存在许多争议。不将这些仔细梳理，我们或许真的相信有一个“民国范儿”，如果将这些都说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确哪段错误了。

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至少应该分为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样三个大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不仅有着重大差别，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

事，大家都说是民国，但此民国非彼民国，因而各自的法统也就很不一样，所信奉所执行的政策也就有着很大区别。

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一直弄不清孙中山为什么在中华民国开国后一再声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真实意思，一直以为这是孙中山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号。其实，如果将这句口号落到实处，孙中山表达了民国法统中的大问题。

在**1912**年之前十七年，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组织革命呼唤救亡的同时，也在为中国未来设计政治路线图。按照孙中山的理论，满洲人是中国周边一个族群，满洲人不是中国人，满洲过去两百多年对中国的统治是殖民统治，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这个殖民统治的政府，“驱除鞑虏”；然后重建一个汉人的天下，“恢复中华”。只是孙中山毕竟不再是过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强调改

朝换代，而是期待在这场种族革命的同时，一举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以孙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论表达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目睹清廷政治腐败而导致甲午之耻的重要觉醒，也是此后十几年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凭借着这样的政治信念，孙中山“一个人的战争”终于唤醒了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追随其革命的人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至**1905**年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中国革命至此出现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高潮。为了将中国革命向深度广度推进，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人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制定了革命方略，制订了军政府计划，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国家等一系列方针谋略。

根据这些方针谋略，推翻清廷后的新政府应该以“五权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这

个“五权宪法”就是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宪法的改良，增加了检察权与考试权。在国家根本指导思想上，孙中山和同盟会明确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概念，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必须实现的三个基本目标。在革命步骤上，孙中山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构建“军政府”，显然蕴含着三阶段的意思。

在对国内民主现状的估计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都是相当悲观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受到康有为尤其是梁启超的深刻影响，以为中国长时期处在君主专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识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孙中山的意识中依然是传统中国“为民做主”的意思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做主。

孙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径的设计当然

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只是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十七年与国内政治几乎彻底隔绝，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预备立宪开始政治环境略微宽松后，孙中山也没有办法踏进国门，实地考察国内政治实践，所以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也就必然具有相当误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国内政治进步，不知道君主立宪的进展，除了消息隔绝，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革命党的领袖，始终站在清廷对立面，始终用一种有色眼镜看待清廷的政治改革。

不过，孙中山确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人物，当**1911**年政治改革机会来临时，孙中山并没有教条主义地坚守先前的规范。为了实现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没有顽强地坚持“驱除鞑虏”的原则，反而同意对退位的皇上和皇室给予优待和礼遇。这里面当然有许多不得不如此的压力，但孙中山走到这一步也确实不容易。

南京临时政府因机缘巧合成立了，从这个政府实际运作情形看，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先前的那些理论设计似乎都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后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没有体现五权宪法的权力制衡精神，更不要说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了。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的革命色彩确实强烈，比如对旧制度的改革，但在现实政治层面，临时政府其实还是比较现实主义的，大致反映了时代思潮主流。

袁世凯和民国法统

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不足以解决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孙中山拥有新思想，革命党人拥有新精神，但这些都

不足以将一个混乱的中国带上常态发展轨道。在当时国内外一切关心时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旧河山一统江湖的，还是政治强人袁世凯。这就是所谓“非袁莫属”的意思。

袁世凯是晚清政治强人，他从甲午战后的维新走到戊戌年间的变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预备立宪，袁世凯都是这一系列政治变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内部旧官僚难得的新见解新思想，而且在过去十几年官场历练中，养成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凡高超的办事能力。他是光宣朝无人企及的能臣，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袁世凯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被开缺回籍，静养三年。

把袁世凯开缺回籍的故事非常复杂，但袁世凯并没有因为这个挫折而改变对清廷的忠诚。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迅速启用袁世凯，袁世凯也最大限度争取南北和解重回君宪主义

政治轨道。这在现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明。然而到了最后，依然因为满洲贵族在根本问题即国会构成上不愿让步，君主立宪在最后时刻还是毁于一旦。这确实非常可惜。

君主立宪无法实现，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协达成后，清帝退位，颁诏宣布委托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南方革命党人商量共建一个新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遵守诺言将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的权杖转移给袁世凯，是为中华民国正式开国。

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接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民国思路往下走，更没有接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这是因为袁世凯毕竟是晚清君主立宪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与君主立宪并没有根本区别，除了一个君主必须废除外，共和体制下其实也应该是一种东西洋通用的代议制形式，而不是孙中

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国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议局的成熟度一点都不亚于东西洋各国，全部议员都是经过竞选产生的职业政治家，他们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议制政治的一般训练，熟悉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运行规则。这是一个现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就没有必要绕开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训练和成就，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而是接续晚清君主立宪往下走，将各省咨议局改造成各省议会，将各省巡抚和后来的都督改为省长；将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至于那个责任政府，不论是在君主立宪体制下，还是在民主共和体制下，其实只是一个有限责任政府。政府首脑过去对皇上负责，现在对议会负责，仅此而已。

实事求是地说，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这样的变通是合乎历史需求的，在当时在后世都没有引起多大问题。即便是**1913年**

因“宋教仁案”引发“二次革命”，中华民国面临深刻政治危机，也没有人从体制上思考有什么不合适。问题在于，袁世凯没有始终如一坚持在民国政治架构中解决问题，没有将民主共和原则贯彻到底。随着内外危机相继爆发，国内的政治动荡和日本的“二十一条”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凯骨子里的旧思想不断发酵，身边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凯踏上了“帝制自为”的不归路，不仅毁了自己，也坑害了国家，由此引发激烈的民国法统之争。

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也予以恢复。然而为时不久，总统府与国务院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向德国宣战问题发生冲突，不可调解。段祺瑞力主参战，而黎元洪和国会对此有保留不愿参战。府院冲突最后演化为黎元洪利用大总统的权力罢免段祺瑞，并援引张勋督军团进京调解。结果辫子大

帅张勋乘机复辟，拥立废帝溥仪，中华民国到了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

张勋复辟为段祺瑞东山再起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段祺瑞马厂誓师，出兵讨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国。但旧国会已解散，中华民国原有法统至此不复存在了，南北各方开始对这个民国法统进行激烈争夺。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机会，召集国民党领袖及部分军政要员讨论重建共和，出师讨逆，号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于是连续数年的南北战争由此拉开帷幕。这也为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找到了最合适的理由。

孙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的分裂组织，并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认。但是南方革命政府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毕竟在那几年中，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办法一统江湖，吃

掉这个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侥幸胜利需要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南北之间的和谈终于提上日程。

在这个时间段，中华民国的主导者，确实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北洋军阀”，不论是接替袁世凯的黎元洪、段祺瑞，还是稍后的冯国璋、徐世昌，直至吴佩孚、曹锟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军人。对于这批人，我们过去真的不太理解，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不是来自史料和直接认知，而是来自他们的反对派，即南方革命党人的描述。所谓“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概念，可是我们直至现在还在使用这个表述。

北洋系军人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变革中都有相当成绩，基本上都是政治变革的急先锋，像段祺瑞几次拯救共和，成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理念

和政治作为并不像南方反对者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他们在整个统治时期都努力遵循着民主共和的框架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对此还有什么疑惑的话，看看《建党伟业》就能够明白。

不过，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锟等人，虽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坚守，比如他宁愿背负贿选恶名也不愿用武力夺取政权。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的民主素养确实没有办法与北洋第一代比，因而这就给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个重要契机。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北洋第二代领袖的退步和堕落实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机，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其

实还有另外几层因素。一是孙中山坚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渐成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国革命重新高涨还与当时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人此时思想转轨具有无可估量的作用。苏维埃社会主义激活了俄国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事实，我们不能因为后来的苏联垮台而否定当时对中国的影响。第三，由于苏联当年的成就和气势，辛亥革命时期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旧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鲁迅那时所说，已有的中华民国不合乎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因为这个民国除了换个招牌，其他一切都没有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很可能昔日的奴隶成了主子，只是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

基于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到**20世纪20年**

代，由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其实面临南北夹攻，孙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断北伐，而来自北方的俄国不仅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人传递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帮助中国筹建共产党，而且还源源不断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质的和思想上的帮助。北洋系的中华民国政府到了**20**年代中期实际上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至**1927**年蒋介石利用国共合作领导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国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北洋系主导的中华民国迅即成为过去。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中华民国的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其代价主要是国共由此彻底决裂，进入此后国共纷争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管控地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又是中国民族资本急速发展的“黄金十年”。

此后的历史我们大致都知道，国共十年分

裂冲突因日本侵华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战，接着就是四年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在大陆的后半程由于我们是胜利者，因而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我们并不太清楚这段历史真相，我们对民国这一段历史其实真的很陌生。我们以为国民党是消极抗战积极摩擦，我们以为国民党腐败不堪，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我们虽然已经胜利了六十多年，但我们依然没有走出“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史观，没有能够从一个中立者的立场去看待这段刚刚消逝的历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写的历史并不一定是真历史。所以当“民国热”不期然兴起时，真诚期待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对这段历史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重构一个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民国史。我们不仅应该重估孙中山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贡献，也要重估袁世凯、蒋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军政要员，他们构成了民国历史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有血有肉的身影，书写的历史总是觉得有点苍白，有点不那么自

然。

大变革时代官范、官德与官箴

就历史背景而言，我们今天依然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我们今天的成就是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恩赐，我们今天还存在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大变革时代还没有走完。在这样一个被称为“历史三峡”的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中坚——士大夫——干部阶层应该拥有怎样的官范，信奉怎样的官德，崇尚什么样的官箴，确实值得我们重新思索。

治人与治于人

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无以伦比的文化遗产，中国文明的奥秘我们至今

或许都没有完全解读，但中国文明确实保障了
这个国家从黄河流域向四面扩散，构建了一个
庞大的文明共同体。

在中国与西方正面接触之前，中国文明遇到
过来自周边文明的挑战，甚至包括来自印度
佛教文明的挑战，但中国文明都成功化险为
夷、化危为机，开创新局。佛教文明的引入，
导致中国文明华丽转型，成功构建中国文明新
形态，所谓宋明理学，其实已不是中国文明原
初形态，不是孔子那时老模样。但宋明理学确
实让中国文明达到一个全新境界，是中国文明
的逻辑结果。

印度佛教文明能被中国文明比较没有障碍
地接受，当然与佛家文明的农业社会基础密切
相关。中印两大文明说到底都是农业文明的产
物，所以印度佛教的进入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结
构，没有导致中国社会转型。

但随后而来的西方文明就不一样了。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化、商业化色彩的文明形态。工业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原本并不存在冲突，中国接纳西方文明，不过就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增加一个工业的、商业的文明因子而已。然而中国并没有很快用加法完成这个转变，中国的忧虑是工业文明会用减法替换掉农业文明。几百年过去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忧虑太过了，所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大度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进入，并不会替换掉中国的农业文明，但一定会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一定会对中国的官僚阶层提出不一样的要求。

在农业文明状态下，中国的官僚队伍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牧羊。所谓州牧，说的就是

这个意思。

用通俗的话说，放羊就要让羊吃饱、吃好。牧民，就是让老百姓过得好，安心、满意，不造反。所以，传统中国职业官僚阶层，就是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孔子、孟子的说法都不错，传统社会的官僚阶层皓首穷经期待的就是鲤鱼跳龙门，就是金榜题名，这就是仕途的开始。那个时代的官范没有别的，就是替皇上办事，就是放羊。所以那时最重要的思想家董仲舒解释什么是民的时候，就明白地说，民就是眠，就是睡着不醒。老百姓不需要参政权、建言权，老百姓只需要吃饱吃好，需要风调雨顺。

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就不一样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基本上依靠纳税人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转，老百姓不再满足于吃饱吃好，老百

姓成为纳税人，官僚阶层的地位相应地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要治人——履行管理的职能，而且还要治于人，受到纳税人的监督和监控。今天中国官僚队伍依然热衷于治人，而不适应、不乐意治于人，就是因为没有弄明白时代转型，没有弄清现代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官范。

君子之德风

所谓大变革时代，就是说这个时代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社会，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时期，因而在这个时代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有旧。

在传统社会，官僚士大夫阶层是社会

心，是社会中坚，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引领者。那个时代的政治，按照孔子的设想非常简单，就是凭借这些社会中坚道德垂范。

通读《论语·为政》二十四章，孔子以为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率先垂范，为政以德。所谓“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谓“思无邪”；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等，其实都在说中国古典背景下的从政要诀，这个要诀非常简单，就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是孔子的真诚告诫，也是传统社会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官僚阶层时刻谨记的圣贤教诲。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说，官僚士大夫阶层作为社会中坚，既是牧羊人，也是道德示范、道德楷模，老百姓以官僚士大夫阶层言行为标的，为诉求。这是传统社会牧羊人的基本要求。

传统社会要求君子政治，要求官僚士大夫阶层谨言慎行，率先垂范，这不仅因为那时传播手段落后，没有独立的、专业的狗仔队，而且还因为那时只是一个又一个家天下，官僚士大夫都在给皇上打工，吃皇粮，他们公共生活之外的私生活当然也就没有多少必要曝光。回望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圣君，就是贤相，好像两千年历史就被圣君贤相包办似的。两千年被揭露出来的不堪人物，无论如何没有办法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这显然是不真实的。

现代社会，官僚阶层貌似不再为皇上打工了，改为替纳税人尽责了，貌似这些被称为干部的新阶层可以“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了。这显然是对现代社会的错解。现代社会确实释放了民众对政治干预的权力，公权力也确实已经或正在被关进笼子里。但是，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古典，还是现代，政治家，即便不是

政治家的公众人物，都有一个如何示范社会、引领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不会继续要求干部、公众人物无私奉献，但任何干部、公众人物，都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借助于权势捷足先登。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不论是干部，还是实业家，都必须走正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财富一定要经得起媒体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

大变革时代的官德还是传统社会的那些原则，率先垂范，成为引领社会的楷模，道德的楷模。

人生意义

我们这些年官场秩序失范，许多被揭露出

来的官僚，用丑态百出、丑态毕露，已经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丑陋，他们一再测试人类的底线，触及人类一些最基本的道德规范。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在一个经济腾飞的中国会遇到这样的尴尬呢？为什么一个号称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党会如此藏污纳垢呢？

这当然与抽象意义上的政党无关，因为任何个人只要违背了政党的宗旨，他就没有资格代表这个政党。党内出现如此污浊的事情，是历史的不幸，是没有向这些党政领导者说清楚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没有讲明白，或者这些党政领导者没有弄明白人生的意义。

古典中国人生智慧讲究知足常乐，讲究适可而止。古典中国的士大夫官僚阶层讲究立德、立言、立功，讲究三不朽。

在传统的中国，物质是匮乏的，享受大致是适度的，那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历史，以历史为宗教，对历史具有一种敬畏心。相信现实世界的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居留过程，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他的全部生命，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不朽，就是进入历史。而进入历史，能够不朽，肯定不是在现实世界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财富，而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多少阴德，留下多少善念。

由于我们这些年近乎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宣讲，我们几乎将人生完全还原为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过程，官僚们不知道历史，不知道荣辱，更没有想过为子孙后代留下大量不义之财，不是为子孙后代积累了有用的财富，而是留下了无数永久洗刷不尽的罪恶、罪孽、耻辱。多少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子孙后代不会感谢他们这些祖先牺牲“小我”，保全贪腐，保全财富，而是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耻，为不屑。

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圣君贤相的子孙后代固然有值得炫耀的题目，即便那些从来没有得到过物质好处，仅仅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点立德、立言、立功空名的士大夫，也永远被他们的后人感念、追怀，而那些以贪腐，以为子孙后代留财富为诉求的人们今安在？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不敢、不愿追怀他们呢，为什么不敢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呢？这都很值得当今中国的干部们思考。

有时候，我会为当今中国因贪腐而潜逃海外的那些人悲哀，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悲伤，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要重建道德规范，一定要弄清人生的意义。否则，再过若干年，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先人都是被自己的国家通缉而未能归案的贪官。这个特殊的阶级会有什么样特殊的心理呢，他们会怎样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自己的先人呢？

任何人的自然生命都只有一次，人的永生

只在历史中。历史中的永生，才是真永生，现世的繁华、奢侈，不过是一片浮云。

大变革时代需要新的官箴，新官箴并不必完全弃旧图新，“三不朽”才是真不朽，告诉我们的党政领导者向此努力，用自己的细微努力建造一个理想社会。

李鸿章马关讲和的一些细节

李鸿章遇刺后，中日之间的谈判并没有中断，反而因李鸿章受伤而加快。双方就日本原案和李鸿章的修正案进行多次书面争议，李鸿章也向朝廷多次请示，商量对策。

朝廷在这些天对日本议和草案进行了详细讨论，吵得一塌糊涂，皇太后坚持辽东半岛和台湾皆不可弃，即便谈判决裂再战，也在所不惜。根据这个精神，朝廷于4月8日电报指示李鸿章，强调奉天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辙弃资敌？至于赔款，万万以上，中国肯定付不出来，日本如果不肯多减，中国也没有办法。至于通商一条，朝廷已与赫德密商，寻求解决办法。增加通商口岸七处，

重庆、沙市、梧州可以答应，京师、湘潭不太方便，苏州、杭州均系内河，亦多不便。

稍后，朝廷又指示，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不到万不得已，都应竭尽全力驳斥对方。万一实在顶不住，那么谈判底线就是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款应以万万为断。这就是朝廷的底牌。

此前，由于李鸿章意外负伤，中方亦担心因此而耽搁正常会谈，经秘密协商，由中国政府补充任命李经方为钦差全权大臣，随同李鸿章与日本派出全权大臣商议和约，并于4月6日照会日本政府。于是，比较正规的谈判，也就没有因李鸿章无法赴会而中断。

4月8日，伊藤博文派人邀请李经方至寓所，提出质问，强调日方的媾和条件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已经提交，而中国使臣何以到现在都不给予明确答复呢？现在休战时间只剩下十一

天了，如果因此浪费时日，以致再动干戈，恐非中日双方所愿见到。伊藤要求中方明天即9日为期，对日方条件给予明确答复。

李经方回到行馆，向李鸿章报告了谈判详情，他们筹思良久，苦无对策，因为朝廷先前的指示要他们顶住，要他们坚持不让步，现在日本方面如此态度，他们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但是，李鸿章心中也非常清楚，朝廷不让他们让步，而他如果坚持让步，这个政治责任将来只有他个人承担了，这不是他能否承担得起的事情，而是事关重大，必须由朝廷来做主。

当天（4月8日），李鸿章给朝廷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报告这些谈判要点和细节，以为时迫事紧，如果不能适当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谈判势必破裂，战火必将重燃。他建议朝廷适度让步，可以考虑将奉天之凤凰厅、安东、宽甸、岫岩四处边境割让，海城等地等到将来再说，这样较之日本所划经纬线界已减少大半。

至于澎湖列岛，既然已被日军占领，只能暂时同意允让，因为即便我们不同意，日军也不会退出。关于赔款，李鸿章答应按照朝廷先前指示，以一万万这个标准进行谈判。他只是请示，假如日方实在不答应，始终坚持，那么他李鸿章是否能够答应适度增加点呢？李鸿章最后还不忘提醒朝廷，谈判前景不容乐观，还是及早命令前敌各将帅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吧。

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是备案性质，因为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容许他在马关静候朝廷进一步指示，更不要说朝廷是否能够给他一个明确无误的指示了。**4月9日**，李鸿章在日方不断催促下，担心如果继续拖延，可能会导致谈判破裂，为弥缝一时之计，向日方提交了一个修正案。

如果说日本人的媾和条件是漫天要价，那么李鸿章的这个修正案，就是就地还钱。这个修正案的要点，就是李鸿章告诉朝廷的那两

点，一是同意割让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和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是同意赔款一万万两。

日本方面对这个修正案极不满意。日本方面认为，他们最初的提案，本来是作为会谈基础而提出来的，并不是毫无修改余地。但中国的修正案内容与日方的要求相距太大。

鉴于如此分歧，日方蛮横地以为中国没有讲和的诚意，遂向中国提出一个反修正案，对李鸿章的修正案予以驳斥，重申日本的要求，并严厉声称，中方对这个和约修正案只有允或不允两个选择，其他也就不必啰嗦了。

日方的这个和约修正案的提出在4月10日下午，地点就是春帆楼。这是中日双方第四次正式会谈，李鸿章深知事关重大，因而立即赴会。

下午四时，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稍事寒暄，直接进入正题。伊藤表示，现在已经停战多日，留给我们谈判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和约必须从速定夺，否则难免战火重燃。日方现在准备了一个改定条款节略，以免彼此辩论，空耗时光。

日本此次提出的和约草案仍为十一款，内容上更加集中在割地、赔款和通商条约修改三个方面。

关于割地，日本方面在这个新的和约草案中坚持台湾及澎湖列岛仍依原案；关于奉天南部之地，减为从鸭绿江口起，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起，通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各城邑，皆包括在界线内。此外，凡在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奉天的岛屿亦在割让之列。

关于赔款，减为二万万两。

关于通商条约修改，日本不容变更其原案，但是，其一，新开商港可减为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其二，日本国轮船的航线可修正为：（1）由长江上游湖北宜昌至四川重庆；（2）由上海入吴淞及运河，以至苏州、杭州。

在提交这个和约草案的时候，伊藤博文强调：这个方案实为日方最后让步，希望中国使臣对此只要给予接受或不接受的答复，其他的就不必啰嗦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李鸿章将日方要求向朝廷作了汇报。**4月15**日一大早，李鸿章收到朝廷的最后指示：先前指示，原本希望能够挣得一分是一分，不料日本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不通人情不给面子，那么就这样吧，你李鸿章可以参照先前的指示与日本人定约吧。

有了朝廷明确指示，李鸿章于**4月15**日下午

两点半至春帆楼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五次会谈。这个时间较伊藤的约定早了一个半小时。

尽管有朝廷充分授权，李鸿章在这次谈判中仍做了最后奋斗与努力。他表示：李某现在确实拿到了朝廷的御旨，有权酌量办理。只是这个事情实在棘手，我也不知道怎样酌量，还请贵大臣替我酌量。

伊藤对李鸿章的请求不为所动，他强调：李大人的处境不妙，我伊藤的处境也与中堂相似，各为其主，大家都很难。中堂在中国位高望重，无人可以动摇；而本国议院权重，我伊藤做事一有错失，即可被议。

李鸿章说：我去年在国内被满朝言官弹劾，大家都说我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交好。想想也是，他们的说法也是对的，今天我有幸与伊藤首相议和立约，这不就是交好的明证吗？李鸿章想尽办法希望伊藤再作让步。

伊藤说：你就任他们骂吧。这么大的事情，相信他们也没有人担当得起，堂堂中国，大约也只有中堂一人能够担此重任。说便宜话的人到处都有，我伊藤在日本的处境与中堂相似。

李鸿章至此回归主题，坦言：我并不是怕舆论批评，只是皇上让我来议和，授权我酌定，如能将原约酌改数处，方可担此重任，也算是我酌改了，请贵大臣替我想想，何处可以酌让？比如赔款、割地两端，总要少许让些，让我有个面子，即可定议。

对于李鸿章的请求，伊藤博文毫不退让，他劝李鸿章别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讨价还价，日方如有可让之处，早就让了，何必等到现在？

对于伊藤的坚持，李鸿章也不为所动。他说：前此会议结束时，我曾请你再让我五千

万。当时贵大臣似有同意的意思。现在，如果贵大臣兑现这个承诺，那么我们二人立马定约。

伊藤说：如能少让，我肯定让了，何必等到这个时候？

李鸿章再说：五千万不能，那就让两千万吧。现有贵国一份报纸说日本此次战争的总兵费只用了八千万。这个说法或许不足为凭，然非无因。李鸿章说着将这份报纸递给了伊藤博文。

伊藤细看报纸之后表示，这种报纸全是道听途说，专与政府作对，万不可信。

李鸿章说：我也没有说就依这个报纸的说法为依据，我只是希望贵大臣再减去若干。

伊藤博文说：我日本此次用兵费用远多于八千万这个数字。

李鸿章说：究竟是多少数字我不管，我只希望你能够再让少许，即可定议。现在只等你一句话。李鸿章甚至以古稀之人向伊藤哀求，以此少许让步，作赠他回国的旅费。此种举动，如果从李鸿章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挣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意思，也算是他尽心尽责的表示。

他们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战，毫不相让，说了用兵费用，又说割让的土地将给日本增加多少财政收入，又说台湾矿产资源，但说来说去，李鸿章就是要让伊藤再让步，而伊藤则坚守不让。

眼见赔款数额不让，李鸿章又说到利息，希望伊藤能够免除利息。他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讨论。此外，他们还讨论了辽东割让的边界、割让境内居民的安排、换约手续、日本继续驻军的费用等非常琐碎的细节。此次会谈时间最长，结束时已到上灯时分，而其后果并无

任何改变，李鸿章完全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要求。双方定于后天（4月17日）上午十点钟签字。这个条约因在日本马关签署，史称《马关条约》，或称《中日讲和条约》。

这个条约承认朝鲜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承认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庸；日本获得中国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中国赔偿日本库平银二万万两；两国间此前所定所有约章均自作废，俟《马关条约》批准互换后，重新谈判新的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可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需交纳所定进口税；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可派领事官于各口。

澳门，现代中国的原点

澳门现在的地位是远不如昔了，不过澳门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扮演过重要角色，中国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最初接触主要是通过澳门完成的；远东第一个民主共和政体也是在澳门建立的；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也是从澳门这块土地开始的。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观察，澳门实在是现代中国的原点，是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最早的示范地。

发现东方

大约在**15**世纪下半期，欧洲的生产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迅速提升的生产能力迫使西方寻

求更为庞大的海外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也就是大明王朝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达·迦马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第二年，达·迦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由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既定目标：这里才是真正的印度，而不是被哥伦布误会的印第安。

1511年，葡萄牙航海家沿着达·迦马开辟的新航线继续前行，顺利进占马六甲。又经过三年也就是**1514**年，大明王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终于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用阿拉伯商人对葡萄牙的称谓，称这些葡萄牙人为“佛朗机”，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误以为他们就是位于马来半岛上的一个部族。**[1]**而这些东来的葡萄牙商人将错就错，于**1518**年冒充大明王朝在马来半岛上的属国满刺加朝贡使节，企图获得明朝官方颁发的贸易凭证。

此后半个世纪里，这些葡萄牙商人不断扩

大对华贸易，只是这些贸易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并不合法，所以葡萄牙商人与中国地方官府不仅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甚至时常发生武装冲突暴力事件，中国地方当局不胜其烦，葡萄牙商人也深受其苦，大家都在寻找根本解决的方案。

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磨合，中国地方政府和葡萄牙商人逐渐从陌生人变成老相识，他们终于通过各种合法乃至不合法的理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1554**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东沿海，他们向中国地方当局谎称船上装载有送往北京的贡品，只是这些贡品在航行途中触礁下沉，不幸潮湿，他们请求广东地方当局能够破例让他们登岸晾晒。

葡萄牙商人的理由光明正大，最主要的还在于这些商人已经非常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知道怎样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他们投其所好为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准备了丰盛的礼品，这些礼

品或许不过是中国人尚不知道究竟的新奇小玩意而已。可是这些小玩意打动了汪柏，汪柏还真的破例让这些葡萄牙商人登上浪白澳晾晒物品，并允许他们在那里搭建房屋短暂居住。

浪白澳位于澳门西南数十里，孤岛悬海，水土恶劣，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那里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居民，所以葡萄牙商船虽然在浪白澳登陆，但他们实在很难使用这个港口。得寸进尺，葡萄牙商人觉得中国地方当局既然已经准许他们在浪白澳登陆居住，为什么不可以将条件稍好的澳门划拨给他们使用呢？费尽周章几经波折，他们终于获得在澳门建筑房屋居住的许诺，同意他们在那里从事和平贸易，但条件是必须向中国地方政府课以百分之二十的贸易税。这个临时性的制度安排不仅开启了中国与葡萄牙之间关系的新时代，两国之间从此大致结束了连年不断的沿海武装冲突，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葡萄牙人和

后来源源不断东来的西方人不断蚕食、扩大居住范围，澳门从此成为西方世界进入远东抵达中国的桥头堡和一个重要基地。

葡萄牙人东来，并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与西方接触。中国与西方国家曾经有过很久远的交往史。早在宋元、汉唐，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人已和西方世界有过直接往来和交流。物质的贸易、文化的互换，乃至宗教的传播都曾在东西方留下不少印痕。然而由于文化屏障，中西双方在此之前虽有交往，但实际上相互敌视相互猜疑，并没有多少心灵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认同。中国人恪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祖训，严夷夏之大防；西人则以猎奇的心态看待这个东方古老大国和不一样的文明。

自从葡萄牙人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来到澳门的西方人开始用力经营澳门，建立进入中国的前沿基地，竭尽全力向中国内地渗透。**1562**年，新即位的葡萄

牙国王指令印度总督派员出使中国，加强联系。明朝政府实在不太明白葡萄牙的用意，这个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然而在这一年，也正因为葡萄牙国王的这个指令，耶稣会传教士培莱思（**Francoisperez**）抵达澳门，开始筹划向中国内地传教。不久，澳门已有分属耶稣会、奥斯定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等修会的传教士。在此后多年里服务于明清两代宫廷中的传教士，差不多都是由澳门登陆然后长途跋涉进入北京，像供职内廷，专事绘画的西洋“画工”郎世宁等，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入中国内地。[2]甚至到了大清王朝宣布禁教，宣布将那些传教士驱逐出境时，也是要求这些传教士必须经澳门而返国。[3]澳门成为西方来华人士的必经之地，也是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前接受中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方面训练的重要基地。

澳门能够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重要基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培莱思踏上

澳门土地后，他就梦想着早些进入中国本土传教。**1565**年，培莱思通过各种办法终于到了广州，他在那里用葡萄牙语和中文上书广东布政司，请求中国政府允许他上岸居住传教。上书大意谓：

“本人自幼年读书，深知各种科学。职在周游世界，宣传上主教律。闻知中国地大国强，又系圣贤之邦，敢请允许与彼等相处，借以沟通本人所携来之教义。此外并请求赐予一安身之所，俾能常常为朝廷效力。年老体衰，实已不堪海上风浪之苦，并特借此地举行在海上所不能举行之祭祀典礼，祈全能上主加佑朝廷及其国家与官吏。”[4]

负责接待的明朝官员态度友善，接过上书，并询问培莱思所读何书，所奉何教，如何教人得救等道理。

对于中国官员的询问，培莱思以《圣

经》“十诫”作答，中国官员甚感满意，遂嘱随从将一块粉红丝巾系在培莱思的脖子上，表示培莱思是一位信奉上帝的读书人。紧接着，布政司官员又问道：“你会说中国话吗？”培莱思答称不会。于是中国官员说：“那么最好你先去做学生，学习我们的中国话，以后再做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义。”明朝政府用最简单的理由否决了培莱思的请求。

这个并非重要的理由给传教士特别是后来的范礼安一个重要启迪，使他们很快意识到要想进入中国，除了等待中国政府政策变化外，他们主观上能够做的事情无疑是要尽快学习且学好汉语。所以，在拒绝入境后，培莱思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返回澳门，修建长久性寓所。这所寓所很快又被改建为学校，在那里创建了澳门第一所耶稣会会院，开始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培训人才，等待适当的机会进入中国内地。这所学校

就是后来在澳门非常有名的圣保禄学院，这个学院先后培养出一大批知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成为明清两代来华传教士的一个重要摇篮。

为了开辟、拓展远东新教区，罗马教廷于**1567**年任命葡萄牙人加奈罗

（**MgrMelchiorCarneiro**）为中国、日本教区第一任主教，并从印度移驻澳门，直接管理中国、日本教区。加奈罗就任后，在澳门创建医院和收容所，不断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力，并将进入中国本土创建教区作为奋斗目标，注意健全和发展组织机构，注意汉语人才的培养，寻找进入中国内地的机会。

当时，明王朝并不是绝对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广州，规定外国人在每年春秋两季可以两次进入广州，但不允许他们在广州过夜，更不能在那里长期定居。这个政策直到范礼安出任掌管远东传教事务视察员时才逐步改变。

范礼安初到澳门在**1578**年。在澳门，范礼安开始从文化层面深入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感到中国是一个秩序井然、高贵而伟大的帝国。面对一个具有如此深厚文化、学术修养的民族，唯有那些在学识上和品德上同样具有较高素养的外国人，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获取在中国居留并传播西方文明的机会。同样，范礼安也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勤劳的民族绝不会将懂得其语言和文化的有教养的耶稣会士拒之于门外。于是他牢记耶稣会总会长临行前的嘱托，设法“再度点燃沉睡之中的远征中国的热情”，“希望开始皈依庞大中国的计划”[5]，决定指派若干神父潜心学习中文，希望能尽快打开迄今为止还对传教士关闭着的中国大门，让一些神父不仅能够进去，而且能够居住下来，生存下去，进而能够向中国人传布基督福音。以范礼安为代表的传教士通过澳门与中国人实际接触，逐步建立了对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新看法，重新发现一个和他们前辈

认识并不一样的新东方。[6]

西方经验展示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与民间也通过澳门这个地方，在与西人的直接交往中逐步体会西人的善意与执意东来的宗教情怀，逐步改变对西方的看法。东西方在实实在在的交往中不经意地发现对方的优长之处，所以在晚明很长一个时间段里，尽管中国政治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西之间的交流却在一种坦然的正常气氛中进行。如果不是发生后来明清易代的政治变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维持着晚明时代的气氛，相信不仅中国文化能够启蒙西方，影响西方后来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也必将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中国文化

的形态，影响着中国文化乃至政治的进程。而在这个“东西方相互发现”的过程中，澳门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自西人入住澳门后的四百年间，至少在英国人占领香港之前，澳门不仅是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东西方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平台，而且西人与中国人在澳门杂处，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社会形态。澳门在西人的直接管理下，一直充当着西方经验在东方的试验基地和示范场所的功能，这对中国后来接受西方文化很有用处。中国后来之所以愿意踏上近代化或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在西人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走上变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在自家土地上久已看到西方化并非想象中那样恐怖与可怕，在适度压力下，中国人完全能够走上与西方人同样的道路。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在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在各大中心城市出现大批租界之前，澳门就是中国了解西方的

一个重要窗口，对于促动中国后来的变化起到非常重要的功能。西方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教育体制等在澳门的试验与示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启发了中国人的觉悟。

在葡萄牙人踏上澳门土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澳门的主权仍在中国政府手里。只是由于定居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越来越多，华人也在逐步增加，社会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问题总会出现。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根据自己的西方经验，于**1560**年自行选举产生一个自治组织，由一名驻地首领（**Capitllode Terra**）、法官和四位较具威望的商人构成，行使社区内部事务的管理权力。这个自治组织其理论根据或原初模型似乎是地中海的城市共和国组织形态，由这些葡萄牙商人将之移植到远东，所以很像是一个“商人共和国”，也是后来澳门议事会的雏形。

澳门早期的这个自治组织在西方的历史上

或许意义不大，但从东方、从中国的历史上说则意味无穷。不管怎么说，这是在远东、在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形态，不管这个民主共和国中是西方人居多还是中国人居多，但毕竟是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示范意义不应该低估，它毕竟告诉了中国人，尽管那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很优良，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争相赞美的对象，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外，还是有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这对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过积极的正面的示范，一大批近代读书人从澳门的发展、政治、市政中获取过重要启示。

从历史的角度看，澳门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确实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葡萄牙人占领澳门之后很长时间，葡萄牙并没有将澳门视为自己的领地，甚至没有将之纳入葡萄牙在海外在远东的殖民体系中，而完全是因为在澳门毕竟有许多葡萄牙人生活在那里，完全是出于

对这些葡萄牙人的关心，由一年一度赴日本的舰队司令或曰巡航首领于途中巡视澳门，就便处理相关事务，比如防务，以及与战争、防务有关的司法管辖权。

而对明清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或许太小了，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管理，所以葡萄牙人占领澳门，居住澳门，中国政府始终比较大度，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和葡萄牙政府的不管，为澳门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个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还是那么的不一樣，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人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

1568年，罗马教廷任命卡内罗

(D.BelchiorCarneiro) 出任澳门第一任主教。

1575年，澳门教区作为远东第一个主教区开始运转，澳门逐步成为罗马教廷在东方的指挥中心，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这个中介开始向内地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于澳门自身，则不断接受西方人的改造，具有越来越多的西方色彩。鉴于此，中国政府于**1574**年开始在澳门与内地连接的地方设立关闸，管理澳门与内地的往来。然而到了**158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那一年（**1580**年，明万历八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主选举首席法官，建立自己的市政管理系统，而不是先前简单的自治组织，并决定在澳门实行葡萄牙的法律，第一次将西方的法律体系延伸到澳门。葡萄牙人的做法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或许情有可原，但显然超出了中国政府当时所能接受的底线。**1581**年，年过七旬的福建长乐人陈瑞（字文峰）以兵部尚

书兼右都御使銜总督两广事务，受命彻查此事。

上任伊始，陈瑞谕令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地方长官，即中日贸易船队司令米兰达(Aires Gonsalves de Miranda)和耶稣会萨(D. Leonard de Sa)主教[7]，前往两广总督驻地肇庆见他，商谈此事的处罚及善后。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接到这个谕令后颇感吃惊，因为葡萄牙人居住澳门已获得中国政府的默许，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相对自治。至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选举首席法官，实施葡萄牙法律，这都是相对自治中的应有之事，中国政府似乎不应该过分干涉。不过陈瑞是中国政府的地方代表，他的命令即便不代表中国政府，但也不易过于蔑视，以免引起更多误会。于是，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试图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使陈瑞及中国政府感到没有面子，也不过于损害葡萄牙的尊严，

因此，代表葡萄牙利益的澳门政教当局断然不能前往肇庆接受陈瑞的训斥，只能用折中的办法另行解决。

经范礼安动议，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行政当局决定委派传教士罗明坚代表澳门教区主教，另派与中国官员关系密切的检察官本涅拉(Mattia Pene11a)代表市政当局同行。范礼安的意思是，不仅要维护葡萄牙人的尊严，维护西方人在澳门的管理体制，而且应该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中国政府能够同意在大陆上划定一个永久居留地给传教士，争取中国地方当局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尽量减少干涉。为了达成这些目的，葡萄牙人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根据先前与中国官员交往的经验，特别为陈瑞准备了丰盛的礼品，包括他们所知道哪些是中国人特别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天鹅绒、水晶镜等，价值超过一千金币。

准备齐全后，罗明坚、本涅拉一行在中国

使者陪同下，于**1582年5月**前往总督衙门所在地肇庆。陈瑞第一次接见罗明坚等人时，因葡萄牙人无大明皇帝的准许就在澳门定居而勃然大怒，以为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获得明朝政府的许可，更没有授予任何管辖权，现在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竟然擅自选举什么自治组织，那么这种自治组织究竟是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管束呢？陈瑞要求葡萄牙人进行解释。当时，陈瑞端坐在衙门大堂上，两旁站立三百名手执宝剑的武士。

陈瑞故作威严的姿态并没有吓倒葡萄牙使者，罗明坚等人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告诉陈瑞葡萄牙人虽然在澳门定居，但他们对中国人以兄弟相待，安分守己，不曾作奸犯科。并不忘恭维陈瑞说：居澳葡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中国皇帝的顺民，并承认总督殿下是他们的保护者，恳请总督对他们加以扶助及慈爱。随即，罗明坚等人适时递上他们准备好的礼物。

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这是中国古人的期待，可是这种期待每每落空。根据利玛窦的记载，当陈瑞看到这些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他笑着通知罗明坚等葡萄牙使者，澳门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以现行方式进行自治管理，但要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和命令。然而正如利玛窦所嘲弄的那样，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早期圣贤期待的“以夏变夷”终于在基督教文明面前变成了“以夷变夏”。此后，葡萄牙政府逐步改变了对澳门的管理，正式向中国政府承租了这块土地，按年交租，正式委派总督，正式采纳西方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体制，澳门的面貌从此发生根本变化，一个早于香港数百年的西方“飞地”终于在远东形成，其体制、面貌均与中国内地判然有别。

在葡萄牙人的经营管理下，澳门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进入清代之后，随着东西方贸易及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澳门在西方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在清政府不愿更多开放沿海港口的情况下，西方许多国家也开始利用澳门这个登陆中国最方便的前沿。荷兰人、英国人等多次试图分享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权力，但终因各方面原因而没有得逞。只是到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人的殖民地，随着香港地位的上升，澳门的地位逐步下降，在东方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让位于香港。

西方经验在澳门获得了充分施展，这一点肯定通过澳门及其周边地区向中国内地扩散，逐步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现代中国的起源，中国人一定会从西方人在澳门的行政管理经验、地方自治经验，乃至人的自由、权力、尊严等方面获得有益启示。我们现在虽然还不能有效证明晚明中国思想界思想异端与澳

门的直接关联，但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正是那些年通过澳门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的传教士传来的西方思想，构成了晚明思想异端的学术资源，晚明思想文化的变迁绝不仅仅是传统中国学术文化的必然逻辑，而是带有浓郁的外来智慧和外来特点，这个外来因素的唯一通道，就是以澳门为基地，通过澳门周边地区向内地渗透。

开启现代中国

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年，西方文化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和中国政治中心北京不断施加影响，这种影响的细节、过程我们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根据我们对乾嘉汉学本质的理解，中国学人在那两百年间并没有中断对西方学术

的研究和探索，他们依然延续晚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西学情怀，使用西学方法从事中国学术研究。这个学术特征是否与在澳门或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学术证明，但乾嘉汉学中蕴含着西学因素确是不易的事实。[8]

由于澳门的存在，西学在晚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并没有完全中断，这从清王朝不断地发布越来越严格的禁海令，也能反证、反衬东南沿海特别是以澳门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中外交流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很热闹、很频繁，只是不合法。

至于清政府不断发布驱逐传教士的命令，也证明传教士在清朝中前期即鸦片战争之前两百年并没有完全消解影响。即便是来华传教士都被驱逐归国了，那些中国本土的传教士实际上也在成长，他们可能在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返回自己国家之后，承担了继续传播西方基督教

文化的功能，因为民间信仰不会因政治上的打击而消失殆尽，先前和此后的历史都为文化不会因政治的政府的打压打击而中断而消失提供了丰富的例证，最严厉的政治打压莫过于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可是几十年之后，儒学传人悄然复出，儒家典籍照样重现。文化发展的逻辑总是在证明政治的硬性打压不足以消灭文化，文化的韧性总是顽强地存在着发展着。

传教士、西学在清代中前期通过澳门持续发生影响，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中国人提供了免疫功能，使中国人觉得西方化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更何况，那时的中国还很强大，对于这些域外文明并不觉得会威胁到中国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化、西学在那漫长的两百年间以澳门为中心向内地不断扩散、渗透，在思想上、人才上都为后来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准备了条件。**19世纪40年代**之后珠海、中山，也就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之所

以新式人才济济，引领时代潮流，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如果没有先前两百年的文化积淀，不可能使容闳、孙中山、康有为、郑观应等一系列新式人物都出现在这个地区。这就是澳门文化在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

澳门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拥有重要地位，还与西人在那里尝试着积累着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有关。西人在澳门几百年的试验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中西全面交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范例和理性原则。除了世俗的经验外，西人在澳门的几百年里，总是有人在那里潜心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品格、心理特征，研究中国人的人性优点和缺点，研究与中国官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研究怎样才能迎合中国官僚的喜怒哀乐，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不仅为后来的中西交

往提供了范例，而且由此铸就了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固定影响。西人至今对中国人的某些固定看法，或许都能在西人在澳门的经验中找到影子或萌芽形态。

中国人从澳门的经历中获取了许多重要启示，这对中国后来的现代化进程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是中国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开始，确实是有充分理由的。

[1]《清史稿·邦交志一》。

[2]明清两代通过澳门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情况，详见刘小萌：《康熙年间的西洋传教士与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40、41期合刊，2000年，第41—42页。

[3]《清实录·雍正朝》卷27。

[4]〔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

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页。

[5]〔意〕利玛窦、〔比〕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6]〔法〕裴化行著，萧浚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页。

[7]《利玛窦中国札记》等文献中翻译为澳门市长和主教。

[8]《乾嘉汉学与西学的内在关联》，《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

真实的慈禧太后：贡献、幸运与悲凉

在近代中国，慈禧太后是被多重妖魔化的政治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因为**1898**年政治变革失败，归罪于皇太后，将其描写为一个弄权的老太太，一个只知道欺负那个可怜养子的恶妇；革命党人孙中山、章炳麟等出于革命大义，倡导排满革命，也将慈禧太后视为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到了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论证“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判断，接受孙中山、康有为等人的看法，对晚清几十年政治发展持批判态度，对于慈禧太后基本否定；至于民间野史，大都根据这几种史观编排慈禧太后的故事，甚者以男权主义立场予以恶意攻击；最近者则由出版社借着英国青年的梦话编造什么跨国姐弟恋，更有莫名其妙的专家鼓掌叫好。显然，这些认知只是彰显一种或几

种历史观，并不是真实历史。真实的慈禧太后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她只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凡的女人而已。

一个女人的幸与不幸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852**年十七岁时以秀女入宫，稍后晋升为兰贵人，再后被册封为懿贵妃。**1856**年，懿贵妃为咸丰帝生下唯一的皇子载淳，也就是后来的同治帝。母以子贵。这个年轻的女人自然在宫中渐渐得宠，地位渐渐高升渐渐巩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谁也没有办法的“羡慕忌妒恨”。

从秀女一步一步走来，是机遇，是命运。然而在后来许多好事者看来，这个女人太不寻常了，好像她从一开始就会耍手腕弄权谋。这

显然是一种臆测，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试想，贵为一国之尊的咸丰帝风流倜傥，足智多谋，阅女无数，一个凭借智慧巧妙登上皇帝宝座的年轻人，怎么可能喜欢一个满腹心事忧虑重重的女人呢？

年轻的兰贵人或许说不上貌若天仙，但一定是一个讨人喜爱的小姑娘。这是她成功的前提，是咸丰帝宠幸的关键。至于兰贵人后来一步一步走上权力巅峰，那是时代使然，是历史留给她的机遇；而她又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

兰贵人是幸运的，因为风流的咸丰帝毕竟让她怀上了龙种，而且是唯一的。当这个小皇子出生的时候，兰贵人刚刚二十一岁，她的夫君也不过二十五岁。这段时光应该是她一生中最为快乐最为得意最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苦命的”咸丰帝太缺少世界视野了，他在内患太平天国闹事尚未根除的

时候，竟然又偏听偏信，因为驻京公使及扩大开放、增加通商口岸等问题与列强闹起了别扭，引发第二次以鸦片为名的战争。**1860年8月**，英法联军长驱直入，陷大沽，占天津，试图攻进北京，以城下之盟迫使清廷答应各项条件。

中国虽然对西方部分开放已经二十年了，世界上的事情也知道了不少，但要让中国成为西方那样的国家，融为一体，似乎还有很大困难。英法联军向清廷提交了一份照会，要求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要求各带五千精兵进京换约。

对于还没有充分经验与洋人打交道的咸丰帝和诸位重臣来说，英法两国的要求委实有点欺人过甚。年轻的咸丰爷似乎也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御驾亲征，决一胜负。英法两国的要求是想向中国皇帝亲递国书，中国皇帝的玺书也将由这些来使自己带回。英法两国的这些

要求今天看来太小儿科了，但在当年不得了，清廷君臣一致认为这些要求违背了大清礼仪，有冒犯之意。咸丰帝指示：如果这些使臣必欲亲递国书，那么必须按照大清礼节，拜跪如仪。否则，唯有决一雌雄。

咸丰帝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部属。**9月18日**，双方谈判决裂，中方竟顺手扣押了对方谈判代表巴夏礼及其随员数十人，引发灾难性后果。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法原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规矩。英法联军与清军全面冲突，清方渐渐不支。为挽救败局，**9月21日**，咸丰帝阵前换帅，将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等人撤职，任命能干的“鬼子六”恭亲王为钦差大臣，便宜行事，督办和局。在作了这些安排后，咸丰帝于第二天自圆明园逃亡热河，当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去那儿“狩猎”。

咸丰帝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有恭亲王留

守京城与洋人交涉，中国在作出一些让步后很快达成了妥协，同意将天津扩大为通商口岸，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等。

中外妥协达成后，京城已经恢复往昔平静，只是咸丰帝先前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毁坏惨重。这或许是咸丰帝不愿回銮的原因之一。咸丰帝是清代皇帝中最好色的帝王，也是至此唯一被赶出京城的帝王。流亡中咸丰帝依然不忘美女美酒，心力交瘁与体能大量消耗，终于使这个“苦命天子”在**1861年8月22日**一命呜呼，撒手人寰，年仅三十。

叔嫂搭台共创新局

咸丰帝在生命垂危之际作了两项政治安

排：一是立六岁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是加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所谓顾命八大臣。至于那个小皇帝载淳，就是当年的兰贵人，现在的懿贵妃那拉氏的亲生子，也是咸丰帝的唯一儿子。

此时，懿贵妃年仅二十六，漫长的守寡生活从此开始。她在皇叔恭亲王协助下，与东太后一起领着六岁皇儿同治帝共同治理着这个庞大帝国，表面上的辉煌与体面无论如何掩饰不住一个青春少妇的正常欲望。年轻寡妇守的不是大清王朝的江山，而是孤独与寂寞。

咸丰帝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懿贵妃很快被小皇儿尊为皇太后。年轻的皇太后变成了西太后，和另一位年轻的东太后一起掌管着这个国家，她们的全部希望也就是这个小皇儿，那是她们生命的全部希望。

然而，在传统政治架构下，咸丰帝死前留下了政治安排，八个顾命大臣不仅要辅佐着这个小皇帝，而且好像还要约束着这两个皇太后。按照那时的制度，皇上的母亲当然无权干政，但那个小皇帝毕竟是她们的儿子啊！再者说，当年顺治爷、康熙爷也是幼年即位，如果没有孝庄皇太后帮助，顺治时期怎能那样顺利治理，康熙年间怎能走向辉煌？咸丰帝的临终安排对于自己来说，或许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对大清，对未来，特别是对那个小皇帝，则不尽然。尤其是，咸丰帝将权力授给了八大臣，而对那个最能干的六王爷恭亲王则排除在外。

顾命八大臣对清廷是忠诚的，对小皇帝也是尽心的，只是他们似乎受传统影响太深，不太瞧得起这两个年轻寡妇。特别是肃顺，自以为是咸丰帝的宠臣，飞扬跋扈，据说为了取得控制朝廷的全部权力，在咸丰帝在世时就建议

除掉懿贵妃；在咸丰帝去世后，甚至计划雇用武士图谋兵变，诛杀懿贵妃。懿贵妃与八大臣特别是肃顺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态势，势不两立，必有一死。

按理说，肃顺可以轻而易举制服懿贵妃，但他可能太轻敌了，太不把这个年轻寡妇当回事了。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年轻寡妇联络上不被咸丰帝信任的六皇叔恭亲王，他们联手之后几乎没有怎样费劲就将八大臣一网打尽，将肃顺处死。从此，大清国的政治权力就落入这对叔嫂手中。懿贵妃——此时已被尊称为皇太后拥有最终权力，六皇叔以议政王身份兼管军机处，掌握着大清国日常事务的实际权力。

六皇叔恭亲王确实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时候改变了对西方的看法，相信中国如果要改变先前的被动局面，一定要走向世界，要改革，要学习西方。从此开始，朝廷在恭亲王的建议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

门，开始了洋务新政，大清国的面貌很快焕然一新，一片生机。

大清国的新气象是恭亲王主持的结果。不过如是说来，重用恭亲王，那可是慈禧太后的眼力和大度。慈禧太后不仅重用恭亲王，而且大胆起用汉大臣，使大清政治气象为之一新。从**1860**年开始，中国确实步入一个恢复重振的轨道，正史中的所谓“同光中兴”固然有御用史学的夸张和修饰，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过三十年和平发展，确实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海军组建成军，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中国似乎又要在东方崛起了。

中国的恢复当然不能说都是慈禧太后的功劳，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那三十多年毕竟只有她是始终如一的最高领导者，她可能没有主动提出过什么变革方案，但她调动起来了内外臣工的积极性，而且她能有效把握住中国这艘巨轮应该走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

太后既是一个成功女人，又确实是一个非凡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智女主。

生命中的缺憾

慈禧太后政治上的成功是巨大的，只是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来说，寡居的生活确实令人窒息。好在年轻的慈禧太后有自己的儿子，她看着同治帝渐渐长大，心中的寂寞、孤独也就不那么严重，何况政治本身又有那样的诱惑力。

十多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872**年，同治帝十七岁了，长大成人了，也应该亲政了。慈禧太后在经过这些年的辛劳，也准备撤帘归政，颐养天年，歇歇肩了。然而遗憾的是，仅仅三年时间，慈禧太后的这个独生子，咸丰帝的唯

一龙种同治帝竟然于**1875**年一命呜呼，英年早逝，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周岁。这一年，慈禧太后年四十，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女人的最大不幸是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两件不幸都被慈禧太后遇到了。这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最大的缺憾，是无论多少荣华富贵也无法抵偿的。

慈禧太后是个不幸的女人，也是个不幸的母亲，而且如果往更深层说，她还是一个不合格的母亲。大约是因为咸丰帝死得太早，年幼的皇子失去了父爱，显得可怜，这都是慈禧皇太后纵容娇惯同治帝的理由。在同治帝从幼年到青年的全部历史中，慈禧太后更多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年轻寡妇对独子的溺爱、纵容和听之任之，使小皇帝在很小年龄就结识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坏孩子比如宫中的太监，小皇帝在这些佞臣宵小诱惑下不走正道，整日里嬉戏游宴，耽溺男宠，甚至常常在几个小太监悄悄陪伴下

溜出皇宫，微服冶游，整夜整夜在南城琉璃厂、八大胡同等一些茶园酒肆、青楼妓院、花街柳巷盘桓，狎邪淫乐，流连忘返，渐渐走上堕落之路，往往直至第二天早朝时方才鬼不知神不觉潜回宫中，以致有时召见军机大臣时还处在醉酒状态，言语失次，且偶尔不知不觉杂以南城猥贱之事，不堪入耳。

小皇帝微服冶游是个人爱好，不过他似乎也清楚贵为皇上这样做并不好，所以他在南城狎邪淫乐时总是担心遇到熟人，尤其是担心遇到他的那些“众爱卿”。作为皇上当然有权冶游有权私访，但毕竟同治帝年龄太小，太不适当。同治帝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刻意回避那些具有同好的大臣，因为那样不是一般的丢失体面而是太过难堪，或者他也担心这些“众爱卿”中的哪个强臣一高兴到皇太后那里告他一状。

同治帝这些担心从日常情理层面都容易理

解，因此他冶游时为了避开众爱卿，总是在那些佞臣宵小带领下，尽量躲开那些比较高级比较讲究的著名妓院，而是尽量去那些“路边小店”或者那些躲在胡同深处的下等私娼妓馆。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天长日久，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同治帝终于感染上那种不洁之病。死前数日，下部溃烂，臭不可闻，洞见腰肾而死。或曰梅毒，或曰疥疮，当然官方文书说是天花。天花，是清代皇帝多次遇到过的事情，比较好听。

同治帝之死当然是慈禧太后溺爱的后果，由此可以证明慈禧太后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这样不合格的母亲在中国传统社会屡见不鲜。年轻寡妇总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这样的独苗被人欺负被人轻视，总是尽最大限度给这样的独苗以自由，不愿用严格的常人规矩去约束，这样的母亲内心深处总觉得没有父亲的孩子已经够可怜了，为什么还要过分约束他呢？

如果我们将慈禧太后放在一个常人立场去理解，就应该明白她的这一系列遭遇、选择和普通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不幸成为妃子又成为皇后，她的儿子不幸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已。

另一种爱法

慈禧太后的独子同治帝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龙种，无人继承香火，而且同治帝本人又是独根独苗，无兄无弟，因此皇位继承既不能按照父死子继的原则自动继承，也无法采纳兄终弟及的特例由亲兄弟中推出一个继承人。大清国突然面对一个权力继承的难题。

面对这样的难题，各种各样的方案提出来了，但在权衡利弊后，清廷还是下决心从与皇

室血缘最近的血亲中选择皇位继承人，于是找到了醇亲王奕不到五岁的儿子载湉。

找到载湉继承皇位当然与慈禧太后有关，是皇太后意志的体现。只是过去很长时间过于从阴谋论立场看待慈禧太后对权力的贪婪，可能并不合乎历史真相，并不合乎皇太后的想法。

载湉生于**1871**年，他的父亲醇亲王是道光帝第七子，是咸丰帝的亲弟弟，也就是慈禧太后婆家弟弟；载湉就是皇太后的亲侄子。从与皇室血缘关系而论，已经没有自己孩子的慈禧太后只能找到这样的近亲了，不可能还有比这更亲近的人。

而且，从慈禧太后娘家关系说，载湉的母亲为慈禧太后的亲妹妹，载湉也就是她的亲外甥。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什么理

由。

1875年2月25日，年幼的载湫正式过继到宫中，接替刚刚过世的同治帝，年号光绪，是为清朝第十一位皇帝。

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过继过来的小皇帝应该说是真情实意的，她们母子之间的感情绝非那些政治上的反对者，特别是戊戌后政治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势不两立视若仇讎。果真如此，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凭借慈禧太后的权势和决断，她都可以坦然找到理由撤换这个小皇帝。

当然，也正如许多领养孩子的中年妇女一样，慈禧太后和小皇帝在很多年的相处中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看法一致，正常的意见分歧即便是亲生母子也在所难免，这并不以亲生非亲生为依据。不过，如果从日常情理层面去理解他们的母子关系，由于皇上清楚知道自己是领

养的，也知道自己的家、国两个方面将要担负的责任，更知道他的这一切都是皇太后给的，因而他对皇太后尊敬、敬畏、敬仰、佩服乃至感恩戴德，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皇太后的交代乃至每一句话，皇上都会照单全收，认真执行，因而其性格或者说其生活习惯中慢慢养成了对皇太后的高度依赖，凡事总会以皇太后的意志为意志，并没有养成怎样的反叛精神。在这一点上，领养的光绪帝和亲生子同治帝，对于慈禧太后来说并没有本质差别，所谓视同己出，不过如此。

作为一国最尊贵的皇太后，慈禧太后即便没有任何人提醒，她也知道在同治帝教育问题上的教训，所以当她领养了这个小皇帝之后，皇太后不可能在同一个问题上犯两次错误。为了培养这个孩子，慈禧太后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对这个小皇帝进行最严格的道德品质教育、文化熏陶，慈禧太后内心深处绝对不能容

忍小皇帝成为同治帝那样的纨绔，立志要将这个小皇帝培养成一代明君，守住大清万年基业。

光绪帝是慈禧太后的养子，是大清的未来主子，也是老太太下半生的全部希望和寄托，慈禧太后不愿继续娇惯这个孩子，从人之常情很容易理解，这是任何母亲的一种本能。而且，慈禧太后也没有非常自私地处理与这位未来国家主子的关系，她在小皇帝进宫不久，就开始刻意提拔这个小皇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到了**1884**年，因中法战争等一系列问题，用醇亲王取代恭亲王，成为军机处首席军机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领班大臣，全权掌控大清国日常政务。直至**1891**年去世，醇亲王一直位于权力中枢，而此时光绪帝已亲政，权力过渡没有什么波折，所以我们不必听信康有为等人在**1898**年后传播的故事，不要相信两宫之间不共戴天视若仇讎。

再度训政

光绪帝的童年教育应该说是清朝历代皇帝中最好的，他的知识素养也是这些皇帝中最棒的。到了**1886**年，十年苦读使小皇帝有了很大提升，一个优秀君主已经露出了迹象。这一年，五十一岁的慈禧太后找到光绪帝生身父亲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商量，争取让光绪帝早点亲政，当家做主。皇太后理由很简单，一是皇儿长大了，二是自己也想歇歇了，不想为大清王朝继续操劳了。五十一岁，在那个人过七十古来稀的年代确实不算小了，过了权力瘾的人，且又有把握在未来掌控权力的人，不会对权力格外眷恋。皇太后的心情应该是真诚的。

慈禧太后的建议起初并没有获得相关各方认同，然而各种各样的劝说并没有改变皇太后的想法。几经周折，年轻的光绪帝终于在**1887**年开始亲政，慈禧太后在各方殷切要求下答应以后继续为小皇帝拿拿主意，不过帝国的日常事务处置权还是逐步向小皇帝转移。慈禧太后在这个事情上做得光明磊落，清廷的各种官方文件对此有着详尽记载，然而到了**1898**年秋天，或许因为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慈禧太后再度出院训政，各种传言开始出现，甚至怀疑皇太后先前撤帘归政并不真诚。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假如皇太后不想让出权力，她可以有无数理由。

执掌大清国朝政已经三十年之久，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青年丧夫的寡妇，慈禧太后先是辅助亲生儿子同治帝治理这个庞大帝国。亲生儿子不在了，又抱养了这个小皇帝，现在小皇帝终于可以亲政了，可以自己当家做主治理国

家了，作为母亲，有什么可以去怀疑的呢？无论怎样眷恋权力的人都无法抵制岁月流逝，无法抵御生活诱惑。慈禧太后确实准备结束一个时代，确实准备颐养天年，过上几年轻松日子。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大清国的政治现实并没有满足慈禧太后的期待。光绪帝亲政不几年，甲午战争爆发了，维新运动开始了，为了大清整体利益，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出山，帮助儿皇帝料理国家大事。

如果仅仅从权力构成说，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强调皇权至上、不可分割，皇权中心的一元化几乎是历代王朝不得不遵守的原则。晚清政局之所以出现帝后两宫共同专制的局面，完全是特殊条件所致。不过，如果我们以客观立场去观察慈禧太后在**1894**年后的作为，也应该承认，她对权力的使用相当克制，她并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干预朝政，并没有越过皇上处理国

家大事，她只是对皇上的决策保持最后否决权。这只是在替年轻皇帝把把关。所以，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波折，大风大浪，我们从清代正史中从来没有读到皇上对皇太后的抱怨，皇上至死都是感激皇太后养育之恩和多年来的精心照料、耐心辅助。

一个原本温馨的感人故事

光绪帝身体不好是一个谁都知道的事实，他不仅自幼体弱多病，更重要的是作为皇上他没有完成而且永远无法完成大位传承，甚至无法对皇后对嫔妃履行一个丈夫应尽的义务。这是男人无法说出口的尴尬，也是光绪帝后来性格稍有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肾病由来已久，奇怪的是，他不仅肾功能有问题，而且在

大婚前后开始长时期遗精，据他自己说到了**1907**年就有二十年历史。一个长期遗精的人当然不利于夫妇生活；一个没有夫妇生活的人，当然会对性格形成某种程度的扭曲。这是现代心理学所证明的。长时期遗精和长时期肾病对皇上确实构成一个很大困扰，是他后来稍微有点抬不起头的重要原因。对于这样一个后辈，慈禧太后能够做的事情，除了安慰，除了劝勉，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慈禧太后只能从内心深处哀叹自己命太苦，为什么上帝或者说老天爷要把一切危难一切坏事都留给她呢？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也就罢了。为什么用几十年辛辛苦苦领养的这个儿子，这么听话，这么有出息，却又这样让他身体不好，让他无后，让他英年早逝呢？

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

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

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

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很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

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

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

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

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

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

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訢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

恭亲王奕訢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訢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訢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

任，负责与联军议和。

奕訢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

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訢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

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

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訢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

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訢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訢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

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訢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訢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

奕訢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訢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訢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

1898年1月11日，奕訢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訢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

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

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訢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

奕訢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訢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訢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

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訢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訢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訢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訢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訢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

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

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訢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入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

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

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訢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

对于翁同龢，奕訢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贯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

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訢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

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

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

作。

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

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

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

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

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

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

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訢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

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

项城袁公世凯先生：

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

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

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

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

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

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

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

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这些钦定议员有军功贵族，有纳税大户，有博学鸿儒，这一部分也没有问题。据说问题主要出在那为数并不太多的各部院大臣或皇室、或亲贵这部分名额，他们担心将这一部分指标也放到各省竞

选，这不仅有碍于他们的尊严，最主要的是他们有个基本判断，他们很可能无人当选，选民们仅仅出于对贵族政治的天然敌视，就不会赞成这批贵族继续当政，就会用选票将他们拉下来。所以满洲贵族就此进行殊死抗争，不再妥协，终于使原本极有希望的君主立宪功亏一篑。这当然非常可惜，许多人认为这是后来民国政治长期困扰动荡的一个根源。

研究者的困惑当然不在这里。研究者的困惑在于，你和你的同僚那么聪明，既然能够软硬兼施让南方独立各省大致同意重回君宪，为什么没有为满洲贵族设置一个退出机制呢？在家天下的政治背景下，大清王朝毕竟只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这些满洲贵族的祖先们毕竟是跟随爱新觉罗打天下坐江山几百年了，几百年已经习惯于政治的经济的特殊权利，你们想用君宪去换取他们的权利，为什么没有替他们设计一个替换程序，为什么没有想过一个

政治上、经济上的赎买政策呢？

满洲贵族没有接受正式国会召集方式，这就逼着中国政治转向，特别是在南北胶着的大半年时间里，满洲贵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这应该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愤怒的根源，也是放弃君宪转向共和的关键。现在研究者大致能够认同这种转变的合理性，大家不太明白的只是，段祺瑞等人带有威胁性质的共和呼吁，特别是段祺瑞等新军将领带有“黄袍加身”性质地拥戴你为新政府大首领，这在多大程度上带有你的暗示？假如没有你的暗示，段祺瑞们敢这样猖狂地向朝廷叫板吗？

从现在已有文献推测，当然无法得出段祺瑞们是由你指使的结论，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十几年前就对谭嗣同说过，你带兵的基本原则是训练这些官兵对朝廷的忠诚，政治上的训练大于或者说不小于军事上的训练。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在你一手调教的新军中出现这样

的事情，这是否意味着你在三年赋闲后，已在事实上失去了对新军系统的绝对控制呢？还是你个人也认为继续指望满洲贵族退让已经不再可能，你们那一代中国人追求和奋斗了十几年的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毁于一旦呢？

当然，我也注意到段祺瑞们在将中国政治带到另外一条轨道去的同时，也为清廷、为小皇上、为皇太后作了充分考虑，因此方才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鼓吹十几年的“驱除鞑虏”在这次政治转折中了无声息趋于消逝，“鞑虏们”没有像几百年前的“蒙古鞑子”被赶往东三省，这不仅历史主义地解决了一个王朝如何退出的重大难题，而且在不经意间达成“满汉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政治共识。这一点确实为后来的现代民族国家贡献巨大，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假如不是你和新军将领们如此智慧地解决问题，假如真的将鞑虏们驱逐出去，那么后来固然不会有满洲国，只是

东三省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恐怕真的很难说了。大政治家一念之间确实深刻影响历史进程，南北和谈中究竟怎样从驱除鞑虏转向五族共和，现在的研究者确实不太容易弄清了。这也是对辛亥革命研究和对你的研究中一个比较困惑也是比较吸引人的地方。

南北和谈在各方妥协下终于比较完满地解决了纷争，除了大清帝国退守紫禁城略有损失外，辛亥参与各方其实大致上说各得其所，只是我们今天稍有不明白的是，你和你的新政府同僚既然如此恭维孙中山，那么为什么不在民国之后的政治架构中容纳孙中山和他的那些同志呢？从后世的眼光看，宋教仁被杀当然是一个悲剧，这件事情不管是谁干的，其实都将刚刚建构的民主共和架构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孙中山之所以借着这件事起兵大闹，除了宋教仁血案这个直接理由外，难道没有因为你们太过

于无视孙中山等人对民国的贡献？你们为什么不能将孙中山纳入体制，为什么不能劝说孙中山像宋教仁一样参与到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成为有意义的建设者呢？

而且，还有一点很值得讨论，那就是当中华民国创建后，你和你的同僚们为什么在民国法统中没有为南京临时政府保留一点儿法统地位呢？孙中山十几年来自以为独创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论为什么根本不入你的法眼，从来不被提及呢？

许多研究者在讨论**1912—1916**年的中国历史时，真的感慨万千，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这样多灾多难，刚刚成立就走向解体，你对共和的誓言言犹在耳，为什么急不可耐地选择帝制走向独裁呢？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可以实行事实上的独裁，但你不能戴上那顶哪怕只是名义的皇冠。聪明一世的袁大总统已经做到终身总统了，而且一再重申无意于帝制，为什么

到了后来还是把持不住自己呢？

历史无法遗憾无法后悔。我在阅读洪宪帝制史料时，深切感觉到自从你住进紫禁城之后，直觉开始变得很迟钝，你不太知道外部世界的真相，你开始用想象代替真实，再加上权力独大和宵小恭维，使你逐渐错误地以为自己就是神，就是救世主，你先前一再宣称要做中国的华盛顿，要为中国开新局，你要是真的做到这一点，不仅你个人在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要改写，中国的历史面貌也肯定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聪明一世，到了关键时刻就糊涂一时了呢？看来，制度，只有制度才能保证一个人不出错或者少出错。一个人无论有多大能耐，个人智慧、个人承诺都是靠不住的。这应该是洪宪帝制带给中国的最大教训，不知袁大总统以为然否？

专此，敬颂

在另一个世界安宁

马勇

一个专职研究你生平业绩的人

2011年12月11日清晨于安阳旅次

（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02**期）

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

今年（**2013**年）是宋教仁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适值早春，又近清明，抚今追昔，愈加真切感到宋教仁的伟大，更加佩服宋教仁那代人追求民主宪政的真诚、韧性。

在过去，大多数研究者比较倾向于认为宋教仁是近代中国最坚定的宪政追求者，不惜为宪政献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甚至在“后阶级斗争”年代，研究者中依然有相当多的人觉得宋教仁对宪政的追求近乎迂腐，是与虎谋皮。宋教仁为宪政而死，在许多人看来，有点不值，革命党只能用实力说话，没有实力，没有枪杆子，清廷不会自动立宪；袁世凯更不会乖乖地接受宪法约束。这种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不能说不_对，但显然还有重新研究

的空间，至少还应从宋教仁本身进行分析，不要替他惋惜值还是不值。

宋教仁在清末民初政治分类中，确实属于革命党人，但宋教仁又与绝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略有不同。孙中山最早看出清廷政治体制不具备改革基础，不具有改革价值，因而孙中山自**1894**年萌发反清意识后，始终如一坚持到底。当然，孙中山即便中途有挫折，有犹豫，历史也没有给他反悔的机会，自从**1895**年策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孙中山就与清廷势不两立，清廷即便宣布预备立宪了，也不愿将孙中山等人赦免。这就将孙中山逼上了革命到底的道路。

与孙中山的情形稍有不同。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

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遇到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是为了反制

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复苏了，政治热情被再度激活。然而正因为这样，当人们的视野已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人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

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人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仅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

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同盟会成立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那些热血青年对清廷不改革、假改革的回应。

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

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一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

预备立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闹革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如刘师培夫妇、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走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

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和他们做了好朋友，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儿都不让人奇怪。

1908年，宋教仁机缘巧合与袁世凯等体制内大员建立了联系，袁世凯对宋教仁的才华非常欣赏，希望宋教仁回归体制，参与立宪。然因种种原因，宋教仁并没有如袁世凯所愿，回归体制。

武昌起义发生后，宋教仁受湖北军政府邀请，第一时间来到武昌受命主持起草《鄂州约

法》。《鄂州约法》所体现的只是近代政治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原则，约法规定新政府以都督为行政中心，都督与议会、司法三权共同构成最高权力中心，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的政务员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司法权归属于法司。这套立宪架构的法律体制，与清廷正在进行的君主立宪一脉相承。如果说区别的话，《鄂州约法》只是剔除了君主，权力来源属于人民，不再是君主立宪，而是人民立宪。很显然，这套思想并不是同盟会，甚至不是华兴会的政治主张，反而与袁世凯十多年来提倡、推动的君主立宪改革具有许多契合处，由此也就可预示宋教仁与袁世凯在未来具有合作的可能性。

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很快就被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政府所取代，在政治的基本面，中华民国实际上延续了过去十年的宪政改革，只是君主不再。

宋教仁热心政治，是因为他的宪政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民主政治其实就是宪法政治，就是宪政。宪政原则在竞争，政治上的合法竞争、和平竞争是民国政治的必由之路，暴力革命必须永远完全放弃，否则不足以沿宪政。

根据这样的政治理念，宋教仁进入民国更加活跃，他的理想不是阁僚，而是阁揆，所以他按照政党政治的原则努力打造议会第一大党，争取通过和平的议会竞争实现政党轮替，夺取组阁权。

宋教仁的想法正大光明，他对民主宪政的忠诚与期待令人佩服。在很长一段时间，宋教仁就像我们今天能够在西方民主国家、在台湾大选中看到的那样，风尘仆仆东奔西走，纵横捭阖上下其手，既以合法手段争取议会多数，其实也像一切“民主初步”时的政治家一样，宋教仁也曾操控选举，比如在湖南选区；也曾与反对者发生肢体冲突，而且不止一次。这些其

实都是民主初潮时的正常现象，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步到位，成为成熟民主。宋教仁不论有多少不足或问题，都必须承认他仍然是中国民主初潮时代的弄潮人，是中国民主政治先驱者之一。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让宋教仁的理想变成现实。当他对议会多数信心满满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宋教仁倒下了，刚刚开启的民主政治遇到巨大挫折。

“宋案”的后续故事令人唏嘘，可作多种解读。但我们看到宋教仁弥留之际依然认为中国不应放弃宪政之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远离暴力，相信只有宪政，才是中国应该追求的千秋大梦；只有议会，才是政治家应该去的地方。

革命者惋惜宋教仁之死，有足够理由。百年后重新思索宋教仁思想，我们必须承认，中

国不仅需要宪政，而且需要更多宋教仁这样的“议会迷”。中国的政治家只有被圈进议会的笼子里，他们才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辩论说理，才能不得动辄动用武力，惊扰百姓。

一个宪政的中国，是宋教仁的期待。纪念宋教仁的最佳方式，就是促进宪政中国从梦想到现实，应该激励更多政治家放弃斗争理念，乐于成为宋教仁那样的“议会迷”。

杨度为什么不忏悔

杨度（**1875—1931**）原名承瓚，字哲子，后改名度，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奇特的政治家，先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底气何来

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

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

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

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

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

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

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

君宪救国的理由

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

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

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

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

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

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

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

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

学理离事实有多远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

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

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

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

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

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

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

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议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

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

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

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

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

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

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

张謇：别了，皇上

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

体制内抗争

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

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

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

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

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

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

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

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

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

最后的善意忠告

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

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

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

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

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

中美人民联合。

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

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转向共和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

阳丸”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了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

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

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

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

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

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

和平光复势不可当，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

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

章太炎何以成大师

近代中国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年代，大动荡大分化重新组合，因而使近代中国历史画卷多姿多彩，壮丽灿烂，人才辈出，恍若两千年前百家争鸣情景再现。一大批学术大师前所未有集中呈现，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时代。在这些大师中，最耀眼的大师无疑属于章太炎。

如果从当今中国学术回溯，现在文史哲各重要领域中最活跃成绩最大的人，很可能就是章太炎的第三代、第四代或第五代传人。这就是章太炎的魅力，是章太炎的伟大。

章太炎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当然与其学术成就有关。章太炎的学问涉及众多学科，他不仅对传统中国旧学

经史子集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下过苦功，而且处在特殊的转型期，章太炎也对传入中国的西方学问下过工夫，西方人的文史哲学即便不是章太炎的长项，也是他并不陌生的领域。因此，章太炎的学问融合了中西学问之长，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换的一个关键点。

从现代中国学术发生学看，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比如对《文心雕龙》等历代文论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章太炎或其门下弟子；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不论是人类起源、中国人种来历，还是从先秦到近代，许多重大问题的探究，都可以追到章太炎所提出的问题，或其弟子如吴承仕、朱希祖等人所做的工作；至于现代哲学，没有人会否认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对中西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笔丰厚的遗产。还有巨大学术贡献是现代中国学者所不具备的，即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其

实就是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黄侃、钱玄同等人一起开创的。显而易见，章太炎不仅是传统中国旧学问的殿军和终结者，而且是现代中国新学问的开创者。这是同时代其他伟大思想家、学者所不具备的。

为什么章太炎能够做到这些？首先在于章太炎自幼年时代就因机缘巧合放弃了科举道路，使他得以自由阅读。而他又是一个愿意阅读的人，恰恰又不断遇到合适的指导者。传统说法总是强调“十年寒窗”，其实从章太炎的经历看，他毫无功利心的静心阅读长达二十几年，甚至接近三十年。这和同时代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相比当然就不一样了。康有为也曾有过认真读书的时代，但他还是很早就为了科举考试而无法静心读书；严复更不要说了，特殊的家庭境遇使他少年时代就没有读过多少书；至于梁启超，少年成名，聪颖早慧，这是他的优势，但实在说来也是一种缺憾。章太炎

的成功告诉我们：读完所要读的书，然后就可以随意说出你想说的话。读书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才有意义。

章太炎早期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有可能穷尽对古代文献的阅读，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师也使他有机会有可能接触西方学问，这是同时代人物很难同时具备的。但是要想成为横空出世的一代大师，要想给悠久的中国学术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如果仅仅局限于书斋，比如像同时代的章太炎的师辈俞樾、孙诒让等人那样，章太炎恐怕也难成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成功还有一个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鲁迅所归纳的，因为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为章太炎的关键点。

“有学问的革命家”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积聚了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名声，而且所谓“有学问的革命家”就必须要求章太炎对现实世界

有个“普世关怀”。我们今天可以对章太炎所从事的排满革命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如果将章太炎的“革命”放到当时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我们就必须承认章太炎是在用书斋中的学问引导社会，引导大众。这就不仅为章太炎积聚了人气，而且使其学问从书斋高端向世俗层面转化提供了契机与可能。

君宪先锋严复

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

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

君宪先锋

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只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既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江山。严复当年设想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

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

（**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

君宪主义危机

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

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

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

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反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

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严复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

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率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率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

君宪成为历史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

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百倍困难。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

在军队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的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她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了，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

对于清廷空前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

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

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

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形势比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康有为统筹全局顶层设计

常言道，太阳底下没有多少新鲜事。假如我们暂时放开“线性进化论”的影响，暂时回避一下革命、改良、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时尚话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所谓历史，并不是今人一定比古人聪明、幸福。很可能的情形是，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过去的故事。

1898年1月29日为旧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总理衙门及各部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这一天，康有为将利用春节长假写出来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局革旧图新以存国祚折》，通过总理衙门报送给朝廷。这份文件，后来又定名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或《应诏统筹全局折》。

《应诏统筹全局折》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留下的重要文件，是康有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顶层设计。

在这份文件中，康有为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引证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墨守成规，不思变革，最终导致亡国或被瓜分的惨痛教训，以为国际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组合分化过程中，中国应该把握这一机遇，尽快将中国改造成一个近代国家，成为国际主流社会中的一员。康有为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国只有彻底弃旧图新，才能摆脱被动的外交局面；中国只有从内部发生真正的变化，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与平等。总之，中国只要在国内政治上有办法，外交上就有办法；而国内政治的唯一办法，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仿行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造中国自古以来几百年乃至数千年不变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转变成与

现代西方国家比较一致的正常国家，这样在国际社会就可享有平等的待遇。

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没有过多地论述中国应该进行变法改革的理由，因为中国不变则亡的道理在当时似乎已是朝野各界共识。所以康有为在这份奏折中的思考重点是中国应该怎样去变，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开始和进行。

根据康有为的看法，中国的政治改革只能仿行日本与俄国，因为中国国情与日本、俄国进行改革前的情况比较相似，日俄两国通过政治改革极大地动员了国内各方面力量，从而促使两国经济、社会乃至军事力量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成功为中国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应该仿照日俄两国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走过的道路、所采取的措施。而日本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举措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在政府高层

内部形成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基本共识；二是广开言路和征求人才的通道，愿天下所有英才为我所用；三是开制度局而定宪法，以宪法去约束人的活动，从而使日本一跃成为近代民族国家。

基于日本的经验，康有为向清政府最高决策层郑重建议做好三件事，便可保证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获得成功：

第一，建议皇上在天坛或太庙或乾清门举行一次郑重其事的干部大会，大誓群臣，诏定国是，宣布变法维新正式开始，坚定群臣革旧维新的信心与信念，宣布广采天下舆论，广取万国良法，重建中国全新的政治体制。

第二，建议朝廷在午门设立待诏所，委派两名御史专司此事，允许上下臣工、草民百姓尽自己所知上书言事，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及所有方面提出建议。所有上书不得如

旧体制由堂官代递，以免阻挠。换用今天的话说，不得截访，不得扣押人民来信，要容忍最严厉最尖锐的批评。凡上书中有可取之处者，可由皇帝或其他相关部门的主管予以召见，量才录用，人尽其能。

第三，康有为建议朝廷开制度局于宫中，归皇上直接领导，不从属于任何既有权力部门，征天下通才二十人参与其事，统筹全局，下设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以及武备等十二个分支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改革乃至重建中央行政体制，重建新的政治体制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制度章程。

至于中央以下各级行政机构的改革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康有为也在这份奏折中提出一些设想，大致不外乎本着政情上通下达、弃旧图新的原则。

统观康有为《统筹全局折》，其核心是设立专责制度建设的制度局，换算成今天的语言，大约可定名为“国家改革设计委员会”。康有为或许是因为当时对政治变革反对的势力太大，或许是接受了某些人的善意忠告，康有为在这份《上清帝第六书》中暂时放弃了先前《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等比较激进的政治主张，不让反对者觉得有颠覆既成体制的嫌疑，改为设立制度局这一具有明显渐进色彩的主张，而且在权力归属上，康有为刻意强调皇上的绝对领导，这样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便于新政推行。

设立统筹全局的制度局是康有为**1898**年维新变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康有为政治思想最积极的遗产。康有为认为制度局是变法维新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没有统筹全局的规划机构，继续让权力部门自己改革自己，缩小权力，无疑是与虎谋皮。康有为暂时放弃

开国会、定宪法等貌似极端的政治主张，但依然倾向于建立独立的改革设计、规划的专责机构。这是康有为**1898**年政治活动的轴心，也是他后来失败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他的政治反对者依然从这些建议中读出了康有为的用心。

康有为提出统筹全局建议后一个月，又于**2月28**日代宋伯鲁御史拟定《请设议政处折》中，再次强调设立专门议政机构的重要性，为制度局的创立提供舆论支持。此后，康有为还多次上书催促清廷尽快开设制度局，特别强调皇上不欲变法自强则已，若欲变法，而下手之端，非开制度局不可。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犹如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轮船导航仪，有了它可以克服惊涛骇浪、千难万险，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反之，则结果可知。

民国四公子

我们现在许多人对官二代颇有怨言，以为这些人沦为纨绔子弟，不仅危害社会，而且殃及江山社稷。只是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官二代都没有出息，都是纨绔子弟，更多的达官贵人非常注意家庭教育，这方面的成功例子很多，仅近代以来的成功范例就举不胜举，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他们的后代成才者多，败家者少。即便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虽以名士风流的形象相传至今，有“民国四公子”之一的称谓，好像也是一个纨绔子弟。

其实，这个判断是不对的，不仅袁克文不是，四公子中的其他几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理解此公子非彼公子。

所谓“四公子”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

“战国四公子”的说法已隐约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到了东汉，随着清议逐渐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特别是到了魏晋，随着门阀士族的出现，随着九品中正的运用，人物品鉴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类似于“四公子”这样的人物归类已越来越普遍，构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以致后世中国还有什么明末四公子、清初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等说法。

公子或其他撮堆比较的说法显然隐含着一种褒贬，更多的时候似乎是褒奖多于贬低，是一种赞美。只是后人不察，特别是1949年之后旧的世家大族被消失殆尽，新的世家大族又无法诞生，类似于四公子这样风流倜傥的人物再也见不到了，触目所及，不外乎“京城四少”这样的轻浮之徒或纨绔子弟，拿他们与四公子的

风流韵事进行比较，真的是玷污了历代四公子的美名。

历代四公子的事迹我们不在这儿多说了，这里专说民国四公子。民国四公子的说法分歧很大，根据一些朋友的归纳至少有四种不同说法：

一指陈锦堂、袁克让、张伯钧、宋传兴组合；

二指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组合；

三指袁克文、卢小嘉、张伯驹、张学良组合；

四指孙科、张学良、段宏业、卢小嘉组合。

至于“后民国时代”的台湾，还有蒋孝武、

陈履安、周一熹、连战组合；或钱复、陈履安、宋楚瑜、连战组合；或沈君山、钱复、陈履安、连战组合。由此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民国四公子的说法众说纷纭相当正常，因为各人立场不同、视野不同，必然会在各人眼里有不同的选择与不同评判。

不过要说民国时代，或民国初年的四公子，恐怕还是应该以张伯驹在《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中的归纳更接近事实，大致有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卢小嘉、张孝若、溥侗等六人备选。如果继续筛选，比较公认的民国四公子可能就是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和溥侗四个人了，因为只有他们四人具有司马迁对战国四公子志向行事大节的点评：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有担当有肩膀，有艺术文学创造力或鉴赏力，风流倜傥，雅而不俗，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乐善好施，风流而不下流，对民族对国家有贡献有热诚。

既然是公子，当然都必须出身于豪门士族，袁克文的老爸袁世凯、张学良的老爸张作霖不必说了，他们都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强人或军事强人。至于张伯驹的老爸张镇芳，溥侗的老爸爱新觉罗·载治，也都是清末民初政界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只是随着历史尘埃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太清楚这些而已。

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兄弟，光绪三十年进士，官至河南都督，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重要帮办。爱新觉罗·载治为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理曾孙，过继给道光帝的长子隐志郡王为嗣，世袭镇国将军、辅国公，兼理民政部尚书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四公子的家庭背景不管是来自皇室还是军事政治强人，也不管他们的祖上识字多少文化几何，但他们四人在少年时代都受到了良好教育，如溥侗自幼在上书房陪小皇帝读书，经史子集、琴棋书画、金石碑刻，乃至京昆艺术，

文物鉴赏等，都是别人无法企及的。至于张伯驹，其艺术成就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无法企及的高峰，在书画鉴定收藏、诗词、戏剧和书法这四个领域，张伯驹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是不世出的人物。

腹有诗书人自华。拥有如此的文化品位的公子哥，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下三滥，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自然舒适的超尘脱俗的感觉，是真贵族。

与“红豆馆主”“侗五爷”大致相近的还有“袁二爷”袁克文，江湖上尊称袁寒云或寒云先生。袁二爷的老爸袁世凯算不上文化名人，但其优越的政治位置使袁二爷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精通书法绘事，喜好诗词歌赋，收藏古玩字画，雅人雅事使袁二爷真的是风流倜傥不落俗套，其文其字其画其艺，都是一时之选，无出其右。

才艺比拼当然不是四公子成名的必要条件，四公子之所以受人恭维，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有肩膀有担当，或多或少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做过对国家对民族有益的事情。袁二爷一句“绝岭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他没有从家族利益去支持老爸袁世凯称帝，反而从民族大义立场上给老爸提出忠告提出劝阻。至于最具公子哥形象的张学良，在涉及民族大义国家前途问题上或许也有糊涂的时候，比如抵抗或不抵抗，但在他那有效而短暂的政治生命中，东北易帜、西安兵谏，其功过是非或还可以再讨论再批评，但这种事情对国家政治发展无疑极端重要，其中任何一个都具有历史转折意义。

在重大问题上肩膀是四公子的特征，急公好义乐善好施更是他们的本分，张学良办大学兴文化富地方的事情不必细说了；张伯驹将毕生收藏义无反顾陆续捐献给国家，也不必说

了。即便是袁二爷到了后来穷困潦倒，闻知各地灾情，总是将自己珍藏的字画碑帖拍卖赈灾。至于袁克文加入青帮当老大，小小年龄被尊为“老头子”，俗人不解，这其实就是对袁克文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的表彰，否则袁二爷英年早逝，也不会有那么多三教九流，乃至和尚、道士、尼姑、喇嘛，甚至还有妓女都赶来送葬痛哭。

至于四公子的风流韵事，当然传闻更多更广。但我们应该注意，四公子博爱众生，爱美女，随处播散爱的种子，但他们又确实属于有情有义的人，并不是那些只愿苟且而不愿负责的轻浮之徒。张学良长命百岁，阅女无数，但从其爱情生活看，不论对原配，还是赵四小姐，还是那些春风一度的偶然艳遇，张学良大约都敢负责愿负责，敢爱会爱，因而我们能听到张公子的风流故事，却听不到被爱女子的哀怨、愤怒，向隅而泣。还有袁二爷，除了原配

外，还有五房姨太太，这仍然无法阻止他在外面播散爱的种子，博爱天下美女，知情人说袁二爷毕生爱过的美女不下七八十，至于一夜春风的艳遇，更是不计其数，只是后来从没有哪个女子要死要活控诉袁二爷无情无义或负心。这是那时大户人家的生活常态，不似今天官二代、富二代敢爱而不负责任，宁愿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

四公子的名士风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是明日黄花，现在的中国恐怕再也难以重现这种令人想望的雅人雅事了。我们已经彻底俗化，我们只能在物欲中挣扎。

第三章 一个王朝的隐退

乾隆大帝的“上国心态”

乾隆晚年，中国经济不仅是历史上的巅峰状态，而且在世界经济构成中至关重要，举足轻重。但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还是农业经济，能够将全世界白银引入中国，一个是中国传统“老三样”：茶叶、丝绸和瓷器；二是中国人简朴的生活方式，大部分人没有温饱之外的消费。换言之，康乾盛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老百姓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

传统的中国农业经济没有办法接纳西方更多的工业品，中英贸易在中国市场无法扩大的情况下问题越来越大，开放市场，自由通商，成为英国商人的普遍要求，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直接原因。

其实，从后世立场看，中国如果在那个时

候顺势接受英国人的建议开放市场，自由通商，凭借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应该会比较轻松地完成产业升级，消费转型，比较容易地与西方新发生的经济形态同步。

然而，这种期待都被当年的经济繁荣蒙蔽了，经济繁荣没有成为社会转型的助力，反而衍生了、强化了乾隆皇帝的“上国心态”。中国由此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转型良机。

根据英国政府指示，马戛尔尼此行肩负着如下使命：第一，向中国政府表达贸易关切，要求中国进一步提供贸易方便，扩大英国工业品市场份额。

第二，为中英贸易稳步推进，请求中国政府在靠近优质茶叶产区提供一个或两个“居留地”，由英国负责建立警察、司法制度，直接管理到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人；假如中国政府不能满足此项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切实改

革“十三行”制度，消除弊端，增加透明度。

第三，要求中国政府同意互派外交使节，驻扎彼此首都。

当然，马戛尔尼使团也为中国皇帝准备了丰厚的礼物。

经过九个月的海上旅行，**1793年6月20日**清晨六点，马戛尔尼使团四艘轮船浩浩荡荡抵达澳门外海停泊，随行副使斯当东勋爵迅即奉命登岸与东印度公司专员接洽。

两天后，斯当东回到船上，向马戛尔尼报告在澳门所获情报，知道中国政府得知马戛尔尼使团将来消息后，文武官员均表满意，乾隆帝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英吉利者，使臣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乾隆帝通令各海口留心探

听，凡有英使船只经过处，给予必要方便、帮助和礼遇。

斯当东打探来的情报是不准确的。清政府确实早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派员前来中国，但他们对英国政府的用意几乎作了顽强相反的猜测。这也是马戛尔尼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政府确实在几个月之前就通过洋商知道英使将来，但中国人没有弄明白英使来华使命。根据过往经验，中国人以为英使来华，就像诸番邦朝贡一样，因而乾隆帝指示沿海各口给予必要协助，“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委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乾隆帝关怀所在还是朝贡及贡物，这注定马戛尔尼使命无法达成。

另一方面，清政府对想象中“新附”番邦心怀戒惧。乾隆帝历次指示不断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当英使贡船进口时，先期派委大

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务必旗帜鲜明，甲杖精粹，同时要不动声色，密加查察防范，以肃观瞻而昭体制”。这显然是“天朝上国”心态的自然流露，无形中为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任务设置了障碍。

中国的期待与马戛尔尼的使命相差太远，但是这个时候，中英双方并不真切知道对方底牌，尤其是中方根本不知道英国人此行主要任务在通商，在建交。这两件大事，对于中方，对乾隆大帝来说，闻所未闻。

马戛尔尼使团在澳门逗留了几天之后起程驰往浙江舟山，稍事休整继续北上，7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外抛锚停泊。中国方面负责接待的长芦盐政徵瑞迅即派遣天津道乔人杰等前往迎接，并送去大量牛羊、米面、果蔬、茶酒，传旨颁赏。乾隆帝根据徵瑞的报告，再次指示在接待中要做到“不卑不亢，以符体制而示怀柔”。至此，清廷上下依然将英国使团视

为了一支专程前往北京朝贡的队伍，毫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交往想法。因此，中国方面关怀所在不是询问、了解英国人为何而来，而是见面伊始查看“表文”，以及贡品礼单。

使团提交的礼品清单有天体仪、地球仪、座钟、气象仪、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及军舰模型等。这些礼品，为英国最近百年创造，尤其是作为欧洲第一海军强国，礼品中的枪炮、军舰，以及天文地理仪器等，应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

然而，作为“天朝上国”，乾隆帝看到清单似乎有点失望，他在随后的指示中强调，英国人的礼品清单俱不免张大其词，由此可知英国人境界不高，“自为独得之秘，以夸耀其制造至精奇”，其实不过尔尔，“天朝原亦有之”。

乾隆皇帝未见其人而先失望，马戛尔尼使团完成使命的机会越来越小。

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缘起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君主个人独裁的政治模式虽然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和执行，但以君主为权力象征和“主权体现者”这种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则至迟从西汉中叶之后一直得以实行。这种模式将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由中央统一决策和推行，各级地方政权实际上沦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只能是垂直的隶属关系。现在看来，这种模式具有许多弊病，既扼杀了地方积极性，也造成了中央政权极其沉重而又不易消解的财政乃至政治负担。但是历史主义的观察，这种权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影响，它一方面维护了中国多族群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比较容易地造成一种稳定的、宁静的社会政治环境。

不过，到了明清之际，由于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生产力因素萌生、发展，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无可回避地产生许多裂痕。中国的权力模式如果依然固守旧有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则势必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于是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便很自然地考虑如何重建中国权力模式问题。

黄宗羲说：“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乎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明夷待访录·原臣》）很显然，黄宗羲不仅反对权力集中在君主个人之手，主张实行分权，而且意味着反对中央权力过分膨胀，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模式。只是这种模式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子，黄宗羲似乎尚没有更为清晰的方案。

和黄宗羲不清晰的感觉明显不同，顾炎武不仅清楚地看到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之间的弊端，而且明白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他在《日知录·乡亭之职》指出，“《周礼·地官》自州长一下，有党正、族正、族师、闾胥、比长，自县正以下，有鄙师、酇长、里宰、邻长，则三代明之制，亦不越乎此也。夫惟于一乡之中，官之备而法之详，然后天下之治，若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至于今日，一切荡然，无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设之监司；监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积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无与分其职者。虽得公廉勤干之吏，犹不能以为治，而况托之非人者乎，……唐柳宗元之言，曰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由此论之，则天下之治，始于里胥，终于天子，其灼然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兴亡之涂，罔不由

此！”因此，顾炎武在《郡县论》中明确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省辟属之法”。要求任职县令“必用千里以内习其风土之人”，经过若干年试用后，称职者“任之终身”，并且要求“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使其个人利益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从而加强地方权力，完全由中央派出机构而变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实体，以防“不虞之变”，以各地的共同发展来维系全国的统一和稳定。

顾炎武反对官员异地任职，主张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利益一定要与当地百姓的利益、关切相一致，必用千里之内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人。显而易见，顾炎武权力模式类型设计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是企图以古代理想的政治理念去纠正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一点既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意义，它实际上和欧洲近代观念的萌生走着同样的道路，都是“以复古

求革新”。如果中国的政治不再发生剧烈性变动，伴随着中国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壮大与成长，顾炎武的权力模式类型迟早将变为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体制必将从旧有中央集权模式中分解出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伴随着明清易代政权交替，中国政治变革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生机勃勃的满洲贵族在清朝早中期实际上却以自身的力量阻止了明中叶之后开始的政治体制变革进程，而完成了更姓易代、重建权力系统的工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在旧有模式中又继续运转了二百余年，而且在清朝早中期似乎还有所加强。只是到了晚清，一方面因为晚清政府实际上又陷入更姓易代的前夜，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内部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因中国社会逐步“殖民地化”而变得更加强大，故而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再一次被提上中国政治日程，顾炎武的政治理念终于在近

代中国寻觅到了知音。

顾炎武政治理念的最早知音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有感于中国危在旦夕的残酷现实，最早敏锐地感觉到中国有进行权力模式改革的必要性。早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年，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差不多都集中在湖南，试图在开明官僚陈宝箴庇护下，以局部改革为试点，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模型的重新建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的中坚人物为黄遵宪。黄遵宪在这次新政中所提出的“地方自治”的理论明显地受到顾炎武的影响，只是黄遵宪毕竟生长在近代中国，毕竟有周游列国的亲身经历和更为丰富的世界观念，故而他的地方自治论思想渊源虽然可以追溯到顾炎武，但顾的政治理念并不是黄遵宪政治主张的唯一智慧资源。据黄遵宪致梁启超信中自述：“吾自随使东西，略窥各国政学之要，以为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

程度。苟欲张国力，伸民权，非民族之强，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何以自立？苟欲保民生，厚民气，非地方自治，则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沫不相关，民何由而强？早夜以思府县会议，其先务之亟矣。既而又思今之地方官受之于大吏，大吏又受之于政府，其心思耳目，惟高爵权要者之言是听。即开府县会，即会员皆贤，昌言正论，至于舌敌唇焦，而彼辈充耳如不闻又如何？则又爽然自失，以为府县会亦空言无益。既而念警察一局，为万政万事根本。诚使官民合力，听民之筹费，许民之襄办，则地方自治之规模，隐寓于其中，而民智从此而开，民权亦从此而伸。”（《中国哲学》第八辑）

由此可见，黄遵宪地方自治思想资源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近代观念，其根本目的也与顾炎武明显不同，而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将中国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他的具体方案

是：“政体当法英美，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取学校武备交通（自注：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议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自注：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将二十一行省分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尔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梁启超年谱长编》，290页）显然，这已远不是顾炎武地方分权方案的简单摹本，而是一套全新的近代意识。

然而，随着湖南新政，尤其是全国范围维新运动的失败，黄遵宪的理想并没有变成现实，而仅仅具有思想史的意义。不过由此却开

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地方自治信念的先河。**1899**年，章太炎提出加强地方权力的“藩镇论”和“分镇论”，期望以地方自治为手段完成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章太炎在《藩镇论》写道：“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且今之斥拟藩镇以为跋扈者，其志果在宪政乎？抑他有所为乎？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之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私之至者，不行媚白人，使脍磔中国以至于尽不已。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

在章太炎看来，在目前条件下，“与不得已，官制不及改，则莫若封建方镇为一，置燕、齐、晋、汴及东三省为王畿，注错无所变，其余置五道：……道各以督抚才者制之，冠各以地，无以虚辞美称，行政置吏，惟其所令；岁入贡于泉府者数十万，毋有缺乏；扶寸地失，惟斯人是问。一受其爵，非丧土缺贡，

终其身无所易，死则代以其属吏，荐于故帅而锡令于朝。其布于邻国，则曰斯吾封建之国也。交会约言在是，天室弗与知。若是，则外人不得挟政府以制九域，冀少假岁月以修内政，人人亲其大吏，争为效命，而天下少安矣。”（《分镇》）章太炎认为，这虽然是等而下之的对策，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未尝不可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变通方案。

地方自治的理想或许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在中国被迫踏入现代化门槛时却又不得不成为一种趋势和一种选择。诚如欧渠甲在**1902**年所写的《新广东》中所说的那样：“且夫自立者，天地之大义，生人之本分，不可不担当不力行者也。我人之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宜早树独立旗，击自由钟，以奋我国民之精神，以复我天赋之权力，虽满清政府未到如斯之地位，尚需早图自立，以除阻我文明之进步

矣，何况其衰颓至于今日者乎？”如果说“东南互保”还带有以地方实力解决政治危机暂时性、临时性考量的话，那么，宋教仁等人在辛亥后关于中国权力模型设计，特别是中央与地方间关系重构则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思潮的逻辑发展和理性审视。宋教仁《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说：“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中，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这实际上是对近代以来的地方自治思想作了理性概括和总结。中国如果照此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另一方面决不会出现地方势力坐大和分裂局面。

清末联邦制何以不可能

当过分的中央集权体制弊病日益明显时，人们的关注点当然是如何克服这一政治体制的弊病，重建新的权力模式。这一点在清末民初表现得尤为明显。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既是对前此思想探讨的理性总结和折中，也是对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和规划。宋教仁的理想一方面是想克服旧有中央集权体制弊病，调动和利用地方积极性，另一方面他实际上是依然期望在“统一中国”框架内解决问题，期望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富有理性的中央政府，以此作为社会整合和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不难看到，宋教仁分权模式的核心，不是要导致中国分裂、地方主义坐大，而是重建中央与地方新关系。这种新关系不同于旧的中央与地方垂直式行政统制模式，也不同

于欧美盛行的地方自治权甚大的联邦制，而是中央与地方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协作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应该说，这种设想大抵符合中国国情，是一种未尝不可一试的选择。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情况，宋教仁在提出这些设想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就惨遭杀害，他的理想便被束之高阁，中央与地方分权的新模式只能另辟他途。不过，由于这一问题委实重要、迫切，即使不照宋教仁的方案加以解决，也必须采用其他方案加以回应。事实上，在宋教仁提出这些方案的当时或前后，国内思想界并未放弃对这些问题的探索

和研究，提出一系列的方案和设想，其中影响最巨的当数“联邦制”。

从现有资料看，联邦制在近代中国的最早明确提出，要推近代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梁启超。他在1901年所著的《卢梭学案》中写道：“卢氏以为瑞士联邦诚太弱小，或不免为邻邦所侵轶。虽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为数小邦，据联邦之制以实行民主之政，则其国势之强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烁今而永为后世万国法者。卢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而“我中国……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果尔则吾中国之政体行将为万国师矣。”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意思不仅中国应该走上联邦制道路以解决中央集权危机，而且中

国的实际情况也最适宜联邦制，最具有实行联邦制的内在要求和外部条件。

传统研究以为梁启超这些意见代表了立宪党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种似是而非的判断相当值得怀疑。据梁启超**1902年4月**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解释他之所以提出联邦制设想思想背景时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偿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

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渠甲）在《文兴》所发之议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耄栗，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来署名为“太平洋客”之《新广东》）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扞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也就是说，联邦政治理论的提出，在梁启超一方面是基于戊戌后对清廷的失望，另一方面表明以康有为为领袖的保皇党人在政治理念上已严重分化，激进如徐、欧者，虽不愿背弃师说，但迫于形势，不得不提出新的救国方略。由此看来，保皇党人并不存在着全体一致同意的联邦制设想。

更有甚者，对于梁启超、徐勤、欧渠甲等弟子联邦政治、革命自立的理想，康有为自始至终予以反对。他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指出：“夫考之欧洲之事，则各国皆行立宪而国势安固，民权自由之乐如彼；法国独为革命，印度分省自立，而国势陵夷丧乱灭裂之害如此。”

在《与诸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中，康有为还指出，“且夫欧洲十余国，皆立国千年，日相竞争，少不自振，立即败亡，故国土虽小，皆尚武事，其精神意气，日提振不敢懈，武备既已竟修，彼此互知而不敢妄发，乃于其文学工艺，日竞美而不敢劣，既各皆小国，难于吞并，故能自立。甚至小者，又有诸大之相牵相忌，立均势之法以维持之，故能久而不灭，积此千年，国界久定，国势久立，人心久坚，故能历久相持。近乃有商战学战而无兵战，凡此皆惟欧洲千年之

老国能之。若中国各省真能自立，则基址浅薄，国界不定，国势未立，人心未坚，争乱而已，尚未能比印度各省藩臣之自立，而乃妄比欧洲千年之老国，岂不谬哉？况其必不能成而徒取乱乎？且人民才智未开，北地西边，闭塞尤甚，无其人才而妄立国，而欲以欧洲诸国自比，何其僨也。且荷、比、瑞、璉诸小之于欧洲，惟白种均势能之，若在亚洲黄种未定之国，而欲妄为引例，则为吕宋、波国而已，为印度、安南、缅甸而已，无论如何妄例，无论如何结援，终亦必亡而已。……而不知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犹以团沙而比之坚金，以新生之婴而比之壮佼之夫也，夫谬或甚矣！”一句话，中国不能采取欧洲式的革命，不能建立欧洲式的联邦国家，依然是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国情是一个最不易捉摸的字眼，它的内涵可以说从来都是由谈论者个人立场所决定。我

们看到，提倡中国应当采纳联邦制的是基于中国国情特殊考虑，而反对者的根本理由也莫不由此而立论。基于如此对立的分析、论证，中国政治发展当然无法遵循任何一方，而其必然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折中调和，或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了。

就中国政治实际发展来说，中央集权严重危机在晚清最高统治者那里也早有预感，尤其是在戊戌后不太长的时间里因义和拳而引发的“东南互保”，对清王朝的统治实在是沉重一击。因此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晚清当局实际也在思考和探索。**1906**年由清政府策划的筹备立宪运动，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问题。出使各国考察政治的诸大臣在参观考察了英国情形后曾向清朝最高统治者报告说：“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全国之制，府分为乡，

乡分为区，区有长，乡有正，府有官司，率有各地方自行举充，于风土民情，靡不周知熟记。凡地方民居，沟渠道路，劝工兴学，救灾恤贫诸事，责其兴办，委曲详尽，纤细靡遗。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累曲折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礼》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惟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需抉择。”（《清末立宪档案史料》，11页）如果循此思路而发展，中央与地方分权新模式一定能够重新确立，中央集权危机也势必能得到有效控制与克服。

不论后来的中国政治发展实际效果如何，载泽等人提出的改革思路应该说是基本可行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大趋

势、总方向，是当时中国可以一试的政治性选择。因此，清廷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基本上认可了载泽等人的改革思路，中国政治发展极有可能以此为契机而转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上谕说：“现载泽等回国陈奏，深以为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政体，以及筹备财政，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由来久矣。时处今日，唯有详细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众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且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光绪朝东华录》，**5564**页）期望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解决清政

府所面临的内外困境。

应该承认，仿行立宪运动突破口选择大体上并不错，如果照此发展，将官制改革进行下去，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重加规范，虽然尚不能说完全解决中央集权严重危机，但这势必有助于此一问题进一步解决。然而，由于清廷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它出于“家天下”的利益考量，势必在根本性问题上不愿主动作出实质性让步。

重新认识联省自治

辛亥革命后，中华帝国解体，两千年来的“超稳定”政治格局被打破，没有皇帝的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往下走，确实面临很多困惑。

所谓帝制时代，对于中国来说，就是适合农业文明的一种政治统治方式。之所以经过**1911**年一场大革命而被摧毁，实际上也是因为进入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进入中国，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在改变，换一种统治方式，寻找一种更好的治理模式，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世纪已经悄然发生。**19**世纪**70**年代主流话语不断重申坚持“中体西用”不动摇，如果用历史主义观察，就意味着早已有人怀疑有人动摇。

民国十年左右，章太炎等一批深度介入辛

辛亥革命的老人都有一个反省，普遍认为**1911**年底和**1912**年初的政治选择可能过于草率了。他们觉得十四省独立对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在那个时候通过制宪会议制定一个全新的宪法，重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边际，然后重建统一，中国后来的许多问题或许就大不一样了。

人生没有涂改液，历史无法遗憾。走过的就是历史，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就是检讨历史发展的偶然与必然，寻找多种可能性是怎样错过的。

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历史三峡”的第一站，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家。但是这个共和国家的基础确实不太牢靠。袁世凯的“第一共和”确实没有构建一个有力的统治秩序，新轨未立，旧辙已破。皇帝的威权不存在了，共和国总统的威权又没有建立起来。中国政治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

状态。

革命无法完成秩序的重建，人们便自然试图恢复到旧有轨辙，政治强人袁世凯以为凭借国内外支持，可以通过重建“汉人的帝国”恢复秩序，不料共和的理想久已深入人心，人们宁愿做徒有虚名且混乱不堪共和国的公民，也不愿再做宁静有序专制帝国的臣民，于是袁世凯的帝制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袁世凯之后，中国的政权把持者更没有袁世凯的威权和能力，但他们的民主共和信念在袁世凯正反经验启示下愈加坚定，除了鲁莽的张勋，没有哪一个真正的政治强人还敢轻易变更国体，直至孙中山在苏联经验启发下找到了一条党治路线，用党治替换帝制，用党治构建新帝制，方才使中国重回威权统治，重构一个全新的政治架构。这是后话。

在袁世凯之后，北洋系军人拥有国家的权

力，但他们没有一个人具有袁世凯的力量和手腕。他们只能像走马灯一样轮流登场，既无力弥合派系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无力统一全国。

在南方，虽有非北洋系军人和孙中山革命力量继续活动，但孙中山的力量和策略不能统一中国至为明显，而南方军人与北洋军人如难兄难弟，除了纷争，就是抱团取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和重建中国政治秩序、社会秩序，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无疑成为国人重大关切。尤其是统一帝国旧秩序既然已根本不可能恢复，那么智者阶层必然要在传统解决方案之外寻求突破口，于是乎，联省自治、邦联政治一时间成为知识界、思想界热门话题，并很快由理论探讨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似乎只在于此。

历史主义地说，联省自治在理论上并无大错。如果基于正常情况下的理智选择，这种方案未尝不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选择方

案。然而由于背景复杂，由于各方面利益冲突，作为实际运动的联省自治、邦联政治最终流产了，结果与人们的期待近乎完全相反，而且加剧了威权统治。这确实是中国宿命，是帝制两千年“超稳定”的报应。

理论上不错的联省自治没有成功，历史虚无主义或许会说本该如此。其实，历史主义地检讨这套理论，检讨联省自治何以败，可能对未来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边际的重建不无裨益。

清政府为什么启动司法改革

1901年开始的新政，一个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司法改革。一百多年之后回望这次改革，应该承认晚清新政为中国司法体系的重建贡献巨大。这场改革大致确立了现代法律体系，彻底改变了两千年中国传统社会得以存在的法律依据，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新生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援和制度上的保障。

清王朝和历代王朝一样，其政治基础和制度凭借的就是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也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政治架构并不缺少三权分立的意识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自有其地位和意义，三权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牵制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

架构中的三权分立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绝对化，不是一种至上的和不可动摇的，而是在皇权主导下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的权力来源和法律凭借，最终都落实到皇帝一人。

三权合一的君主专制当然不利于私人资本的发展，不利于自由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点在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数十年一直有争议，也一直有许多很清醒很明智的认识，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许多冷静的思想家如马建忠等人就意识到中国传统法律体制和政治架构虽然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和保障，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曾明确指出旧有的法律已经不能治理变化中的中国社会。过去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天变了，在强大的西方

社会文化影响下，中国之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天，所以中国的治道也就是法律体制必须随之变化。

在康有为等维新思想家看来，法律制度、司法体制的变动不是先前数十年小修小改的枝节改良，而是从根本上从整体上参照西方，学习西方。即便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如张之洞虽然反对全盘承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他也在那时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和空间，强调中国应该吸收和引进西方各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改善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只是由于大的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的政治架构没有形成，所以新的法律制度建设也就无从着手。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面临巨额战争赔款的压力，西方国家其实也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款项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焦虑，在《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和随后的商约

修订谈判中，西方各国刻意诱导中国改善、改变自己的法律制度和政治架构，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鼓励中国尽早采纳在东西各国行之有效的自由经济制度。这样，就能够吸引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就能够改善中国的经济构成和税收状况。

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资本的本质从来就是趋利性的，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自由竞争要求司法独立，要求跨越国界，要求国际一致，否则，资本的趋利性不会接受政治、法律的强制束缚，不会像国有资本、官办企业那样进行什么不计成本、不期待赢利的政治性投资和政治性贷款。所以东西各国在与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认为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国际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如果不能尽快改善投资环境，修订相应的法律条款，重建与东西各国大体一致的法律制度，中国在经济

上可能会受到很大损失。反之，列强不止一次向中国政府暗示，如果中国政府的法律制度能够作出重大调整，如果能够尽快与国际社会与各国法律相一致，那么各国可以考虑放弃在华享有的领事裁判权。

中国人奉行的所谓“中华法系”或许在过去两千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与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法律相比较，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西方外交官熟知的西方法律体制相比较，似乎确实存在许多弊端。在中华法系中，法就是刑，民刑不分，诸法合体，实体法和程序法不是一般的分不开，而是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凌迟、斩首、刺字、戮尸、缘坐等非人道的酷刑依然想当然地被大清国执行着，实践着，被西方人视为野蛮，却被中国人视为严惩。这大概就是当时中西法律之间最大的区别。

列强对中国的暗示和表态，自然深深地吸引了清政府的改革兴趣，而中华法系似乎也确

实到了不能不改地步，旧有的法律体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外交涉、中外贸易和中外之间的政治往来，而且严重束缚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三折中就提醒清政府应该高度注意现行法律与东西方各国法律不太兼容的问题，这些法律大致包括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及刑律等。

稍后，袁世凯也在**1902**年初建议清政府注意司法体制、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注意向日本学习，借鉴日本**1899**年成功修订条约并全面重建法律体制的经验，甚至可以考虑借助于日本法律专家的帮助，修订或改造中国法律中与现实不太吻合的内容。

封疆大吏的建议、列强的暗示，逐渐吸引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遂于**1902**年**5月13**日责成刑部右侍郎沈家本、四品京堂候补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

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朝廷的这个判断本身就已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有与国际规则脱轨的内容，已不能适合于国际规则。所谓参酌各国法律，其实就是要将中国现行法律根本改造，使之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通行中外。

清政府怎么管理媒体

由《南方周末》改稿事件引发的“中国之春”遐想究竟会怎样继续发酵，引来怎样的故事，还有待于观察。但从这件事情上，明显感觉到大陆媒体传统管制手段面临着非改不行的处境。

怎样管理媒体，怎样看待媒体的意义，对通过革命获得政权的执政当局来说，可能还有学习提升的空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还值得重新研读。

对于中国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只有几年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其实也不过百年，与西方相比为时甚短。

最早的中文报纸都是外国人创办的，至少

在甲午战争之前，真正属于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基本不存在。在那之前三十年洋务，是凭借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获得高速发展，社会空间被挤压到最低限度，自由办报对于洋务时期中国人来说根本不可想象，是一种权力奢侈。

甲午战败，中国人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进入“维新时代”，全面释放社会。报刊杂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中国，原来不知报纸杂志为何物的中国人，很快便熟练利用报纸来了解朝政，了解社会，了解国际大势，甚至精明的商人知道利用报纸来了解各地物价、市场行情，报纸很快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寻常物品，不足为奇。

最初引领潮流的报纸，是政治类别的，最有名的是康有为主持的《强学报》。这个报纸最初借用传教士主持的《万国公报》大名，是一个典型山寨或克隆版。经教会抗议，康有为等人将这个冒牌的《万国公报》更名为《强学

报》。

《强学报》热衷于议论政治，开启了维新运动言论新声，贡献极大。但由于以议论政治为主要内容，也衍生许多问题。一些守旧官僚相当恼火，只是因为报纸是个新生事物，朝廷支持，反对者只能用传统政治手段指控康有为等人结党营私，涉嫌经济犯罪或贪占，促使朝廷查禁。由此反推，清政府此时还没有出台管理报纸的律例或办法，处于一种无法治的自然状态。

《强学报》北京版在反对声中关门大吉，康有为很快又在张之洞等维新大员支持下办了一个上海版。

清政府还没有弄明白怎样管理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就在那几年获得空前发展，除了《时务报》、《国闻报》等几家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大刊，还有很多地区性的报纸杂志，大家分

别用内容分割市场。不经意间，新媒体为新知识人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活动舞台，从未有过的新职业——报人，成为那时许多年轻读书人的首选，他们普遍羡慕梁启超、严复这样的知识人，以自己的笔锋搅动天下。

维新时代的报纸杂志是中国新媒体的初期，清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制定管理规则。从总体上说，政府认为报纸杂志的正面功能大于负面影响，因而对传媒业的发展乐观其成。直至**1898**年政治变革加速，清政府开始考虑创办纯粹为政府发声的官报，准备设立管理全国报刊的官报局，甚至准备为报刊立法树规。根据管学大臣孙家鼐建议，朝廷责成康有为参照东西各国律例和中国情形，为大清制定一部“报律”。

遗憾的是，康有为的《大清报律》还没有踪影，中国政治在那年秋天大逆转。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国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被

杀。

又经几年蹉跎，**1901**年，清政府在各国外压下开始新政。中国开始全方位学习东西方各国，报纸杂志在这个时代获得新机遇，各个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报纸杂志的重要性。

报纸杂志大发展又使立法树规成为迫切任务。郑观应当此时第三次修订《盛世危言》，不失时机加上《日报》一篇，集中讨论制定报律的原则和目标。

根据郑观应的看法，报纸杂志的大发展使报馆主笔良莠不齐，如果没有报律，没有规矩，执政当局或许会因噎废食，因小事查禁报纸，阻断朝廷耳目；外国报纸一定会借着这些事件大肆炒作，任意诽谤中国政府打压舆论，剥夺自由。中国人无从争辩，这显然是不利的。为此，郑观应建议朝廷参照英、日法律，尽快制定报律，准许人民自由开设报馆，报馆

言论准则一律遵从报律。**1898**年中断的新闻出版立法再次被提上日程。

此时制定报律的目的，根据汪康年的说法，不是去限制报纸杂志的发展，而是为报纸杂志大发展提供法律支持，报律的根本目标是准许人民自由办报，报馆言论行为一律以报律为依归。汪康年说，报律颁布还有一个好处，那些担心朝廷随意查处而挂上洋人招牌，寻求外国人保护的假合资报纸，必将随着报律颁布而回归，忠于国家的言论必将越来越多。

新政到了**1906**年转化为预备立宪。所有主张立宪的人都知道集会、言论、出版是宪政基本标志和要求。没有言论、出版自由，不可能实行宪政。宪政必须保证人民享有这些权利。

根据这些原则，清政府在随后几年相继颁布几个相关联的法规。主要有**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

1907年颁布的《报馆暂行条规》；**1908**年的《大清报律》和**1911**年的《钦定报律》；这些律条大致构成了大清新闻出版法律体系。

实事求是说，这些法规在沈家本、伍廷芳等法律专家主持下，全面吸收了西方近代新闻法规的基本精神，全面移植了西方各国对报馆的管理经验，而不是从头开始，渐渐摸索。

此时制定的新闻出版法规，在政策目标上希望适度放开言论空间，落实人民基本权利，有助于宪政改革进行，有助于政治透明化。但是，正如所有社会都信奉的，自由不是无限度，更不能侵害别人权利，所以此时颁布的几部法律，都明确给报馆划出自由言论的边界：一是不能轻易、轻浮议论宫廷。这毕竟牵涉国家安全、元首尊严。这也是一般宪政国家的共同准则。二是不得立论怪异，不得妖言惑众，歪理邪说。三是不得有意攻讦，制造事端。四是不得有偿新闻，妄受贿赂。

《大清报律》的颁布为混乱的文化市场、意识形态找到了管理凭借，人民自愿自由创办报纸的权利得到了落实。新报新刊立案注册非常方便，想办报的只要按照规定向民政部提交资料，在一个规定时间就能得到同意的最终批复。如果在审核中发现问题，民政部相关部门会提前协助申请者准备。报律的功能是让想办报的人能如愿以偿，不是借着法律遏制办报。

对于违禁报纸的处罚，一般由民政部奉谕或自行通过各省督抚、警察机关进行查禁。查禁内容主要为违背事实，泄露机密，危害国家安全，蔑视王章，违背报律，或担心引起外交纠纷等。但凡出现这类问题，民政部探访局、阅报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都有负责检查的责任。

根据《大清报律》，负责检查的这几个机关并不享有处罚的权力，对于违反报律的案件，依照规定应由民政部向京师或各地审判厅

提出，由审判厅独立行使审判权。如此，清政府将过去检查权、纠察权、审判权、处罚权混乱不堪的关系真正理顺，向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迈出了一大步。

假如没有《大清报律》

1908年，中国宪政改革进入攻坚克难最后阶段。按照规划，这一年必须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在公布宪法大纲前，清政府于**3**月公布与宪法大纲相配套的《大清报律》。这是清末政治改革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怎样看待这一步，由于后来历史发展急剧转型，加上意识形态困扰，我们今天已很难明白其前因后果了。

按照孙中山一系革命党人，以及当时报界比较激进的看法，《大清报律》就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法律，因为这个法律规定了非常严格的新闻管理和审查制度，没有让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然而到了后来，当人们总结清亡教训时，一个更重要的看法是：大清王朝之所以亡，就亡在其政治改革，亡在其开

放舆论，亡在其颁布这个《大清报律》，让言论自由无度泛滥，因而导致了大清王朝的灭亡。

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是不对的。任何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都有一定的自由边界，《大清报律》确实规定了比较严格的报纸注册手续、文稿预审、违规处罚，尤其是规定了什么样的内容不能发表。实事求是说，这些规定在任何一个常态国家，均属于正常，有制度的检查总比有检查无制度要好许多。

根据《大清报律》，报纸不得刊载的内容见于第十条至第十五条：

第十条 诉讼事件，经审判衙门禁止旁听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一条 预审事件，于未经公判以前，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二条 外交、海陆军事事件，凡经该管衙门传谕禁止登载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三条 凡谕旨章奏，未经阁钞、官报公布者，报纸不得揭载。

第十四条 下列各款，报纸不得揭载：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败坏风俗之语。

第十五条 发行人或编辑人，不得受人贿赂，颠倒是非。发行人或编辑人，亦不得挟嫌诬蔑，损人名誉。

假如我们不带成见去分析，应该说这六条规定对于社会稳定非常重要。

《大清报律》最值得诟病的是文稿预审规定。其第七条规定：

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

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

这种提前预审制度确实不是一个成熟的宪政国家所当有，但考虑到当时中国正处在政治转型特殊期，政治改革刚刚启动，几千年君主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报律》这些今天看来稍感严苛的制度可能还是必要的。

其实，在实际执行中，由于有了透明公开的预审文稿制度，因而除了鼓吹暴力，鼓吹革命，鼓吹造反推翻政府的言论受到控制外，相当激烈的政治言辞，大都能发表出来。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总结清亡教训时觉得清政府不应该放开言论，不应该公布《大清报律》，而应继续无规则严格控制舆论的理由。这种说法在政治上的有害性不必说了，即便从清亡具体原因看，这种说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假如没有

言论自由，没有《大清报律》，大清王朝照样要结束，但中国那时必将大乱，决不会南北妥协，平稳过渡。中国之所以在辛亥年避免了一场法国大革命式的灾难，主要得益于《大清报律》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公开。

武昌起义发生后，负责管理报纸的民政部于**1911年10月12日**确曾下令北京各报不要刊登来自武昌的军事消息，这个禁令的法律依据就是《大清报律》第十二条规定，但凡海陆军事事件，没有经过主管衙门同意，报纸不得登载。武昌起义，本质上就是新军哗变，没有军事主管衙门发布，报纸自然无权刊登。但是，武昌发生的事情毕竟太大了，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国内比较机灵的报纸，特别是倾向于革命的报纸也隐约报道了，尤其是在北京发行的《国风日报》以开天窗的方法发布：“本报得到武昌方面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假如这种掩耳盗

铃式的禁止继续下去，谣言必然满天飞，人心惶惶，社会动荡。

禁止刊登的命令依据是《大清报律》，各个报纸同样根据这个法律要求刊登。他们的理由是，《大清报律》相关法律解读规定很明确，所有关涉军事行动的消息在没有确切消息时不能刊登，但经同业调查，所有确切消息，似乎还是一律照登为便。所以息浮言而维持大局稳定者，就在信息公开透明。

报业的要求与理由是成立的，也是有利的，于是留在北京主持陆军部日常事务的副大臣寿勋**14**日接受新闻界访谈时，就明白表示新闻界可以按照《大清报律》约束，自主如实报道武昌前线的消息。

陆军部稍后进一步解释说，此次武昌动荡事起仓促，不免谣言纷起，为镇定人心起见，陆军部认为应该让各报馆如实刊登一些确实消

息，以真实消息抵消谣言的传布。

民政部、陆军部相关衙门按照《大清报律》允准各报登载前线消息，这对于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先前听闻小道消息惊慌失措的人渐渐镇定下来，因为他们从各方面都掌握了比较准确的信息，作出了正确判断。在北京，在全国，并没有因为武昌战局出现大规模持续混乱。南北妥协，清帝退位，这样超乎想象的重大事件竟然波澜不惊，仔细想来，都得益于《大清报律》。

假如没有《大清报律》，必然是一场混乱，混乱一场；必然是中原板荡，生灵涂炭。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

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

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

对于甲午战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

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

多年的王朝送进历史。

民间资本进铁路

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

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

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

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让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

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

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

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

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

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

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

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

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

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

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

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

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

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

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行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

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

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

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以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

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

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

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

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

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

（原载于《新世纪》**2011**年第**30**期）

辛亥革命中的三种力量

革命党人

历史不管怎样具有必然性，推动历史进步的还是人。这个“人”既有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也有不知姓甚名谁的平头百姓。

辛亥革命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职业化的革命，主要参加者其实都可以算作职业政治家。

在这些职业政治家中，首推无疑是近代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甲午战后，确实是孙中山最先发现中国问题的症结，认为中国步趋西方，甚至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全盘西化，是一个正确方向，但是中国走上现代化

的主要障碍是清廷的阻挠。所以，中国的未来首要在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紧接着，或者说需要同时进行的的就是“创建民国，创建合众政府”。

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我们直至今天的研究都很难说清楚。不过，我们不仅知道革命党的领袖人物黄兴、章炳麟、宋教仁、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邹容等，还有那十几年间流血奋斗牺牲的先烈，像黄花岗烈士等，他们都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仰和怀念的。

创建民国走向共和，是革命党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当武昌起义发生后，当民主共和成为中国一个重要选项时，革命党人坚守原则不让步，甚至表示出不惜一战为理想。但是革命党人也并非一味好战嗜杀，而是适可而止，知道退让知道妥协。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推翻帝制，实行民权，一旦清廷

答应了这个条件，革命党人以大局为重，以人民福祉为最重要的考量，南北言和，息兵止战，五族共和，优待皇室，原本剧烈冲突的满汉矛盾涣然冰释，这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一种机会和可能。由此，我们不能不由衷敬佩他们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

南方新军

不过首举义旗搅动全局的并不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在那年春天的黄花岗起义有着示范意义，但真正开启一个新时代的还是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

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比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

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

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

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

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廷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

立宪党人

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廷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

为南北和谈的主轴。

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做自己的事去做。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立宪党人对清廷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从历史层面说，如果没有各省立宪党人

的积极介入，仅仅凭借革命党人的力量，大约真的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拿下南方各省，更不可能形成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力量。

清皇室

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大革命中，唯一受到损害的无疑是清皇朝。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结果是清皇朝咎由自取。历史给清皇朝留下许多机会，都被它白白错过。甚至到了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的滦州兵谏爆发，清廷依然不觉悟，依然用讨价还价的办法去回应革命党人和新军将领的政治要求，于是清廷只能被历史所抛弃，两百多年的皇朝顷刻沉没。

不过，对清皇朝的最后表现也有可称道的

地方，就是清廷在最后时刻并没有像历史上的其他极权主义者鱼死网破、玉石俱焚、焦土抵抗、殊死搏斗，而是知进退。当他们发现抵抗无益时，索性放弃了抵抗，以哀兵的办法为这个皇朝赢得了尊严和保全。于是进入民国之后，人们对清廷最高决策者隆裕皇太后的决断钦佩不已，或以为她是“女中尧舜”，对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贡献殊巨。

清廷最后决断和结局，还得益于这个皇朝的主要雇员即那些具有新思想的清军将领特别是北洋将领，在南北和谈胶着战火有可能重燃的关键时刻，是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联名为朝廷指出一条明白的路：必须接受民主共和，必须在辛亥年结束之前作出肯定答复。

北洋将领阵前倒戈使清皇朝丧失了任何抵抗的可能性，但这些将领并没有忘记这个皇朝的过去，并没有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所以当南方革命党人提供的退位条件使清廷觉

得尴尬觉得无法接受时，又是这批将领大义凛然要求南方革命党人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即将消逝的王朝，民族应该和解，仇恨应该忘却。于是南方革命党人在稍后修订的退位条例就充分体现了一种友善的和解精神。一场以法国大革命为取向为榜样的大革命，最终得出一个中国式的结局，以和解代替了法国大革命及稍后的俄国革命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大屠杀。辛亥革命的这层意义在人类文明史上应该得到充分展示和张扬。

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过去的评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看法，就是没有唤醒民众，没有进行一场彻底的社会动员，辛亥革命的结果好像并不彻底，用鲁迅的话说，好像就是旗帜换了，人还是那些人，主子差不多还是主子，奴隶还是奴隶，甚至成为奴隶的奴隶。对于鲁迅的抱怨和革命话语的指责，我们过去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读。

其实，从现代政治的立场看，一切大的政治变动与一般民众并没有直接关联，但政治变动却可以也必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只是这些变动并不一定要唤醒民众的参与，并不一定要将整个社会整个民众都卷入其中。当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民间社会已有数十年发展，民间自治能力已有相当提升，政治变革被政治家限定在一定范围，不去骚扰民众绑架民众，应该说是一种社会进步，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政治选择。

（本篇文章来源于网易访谈**2011年6月10**

日）

辛亥革命**100**年系列访谈之一：一个王朝的隐退

编者按：

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各种方式的回溯、反思、纪念，令读者目不暇接，甚至审美疲劳。

其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先生撰写的《**1911**年中国大革命》，虽不是最为瞩目者，却促人深思。他怀着一份对先人的温情与理解，重新讲述**100**年前的历史。这本书的腰封上没有常见的文化名流联袂推荐之类，而是有一行大字：“读懂中国革命，读懂中国民主，读懂中国未来”，下面还有两行小字：“**1911**年中国大革命体现了中国独有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个拥有深厚历史智慧的民

族，总会用温情和敬意看待一个王朝的潇洒隐退。”

马勇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兴趣点却落在晚清**70**年。他一方面对此前的主流研究充满疑惑，觉得有些环节用现有解释怎么也说不通，一方面觉出现实与百年前的诸种关联，认为有必要从来路中寻出答案。

“检讨近代历史，我觉得现代走了**100**年，就是一个大轮回。”马勇说，之所以选择辛亥的题目研究，之所以用现在的解读方式，都不是毫无缘由的，“当然是有一份对现实的观照在”。

微博上他起名“旁观者马勇”，给了自己一个最佳界定。在他看来，历史研究者便该永远居于第三只眼的位置，尽一切可能逼近历史真相。

晚清新政，弄假成真

《南风窗》：《1911年中国大革命》读完后，感觉清廷还是有立宪诚意的。他们已经逐步向自己的利益集团开刀，限制君权，只是每每时机都比民意晚半拍，导致局势越来越向革命的一端发展。这与此前对清廷腐朽保守的普遍印象很不同。

马勇：我不认为一开始他们多有诚意，这是慢慢弄假成真。晚清几次重要的改革都是外力推动的。首先是1901年，《辛丑条约》明确要求中国必须改革。于是清政府实行新政，3年时间发展起来，这时面临的新问题是，接下来往哪儿走？是像日本一样走向君主立宪国家，还是像俄国一样走向有力量的集权政府？

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主要是约束君主权力，清政府自然倾向俄国体制。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清政府当权者希望俄国人胜——就像总是有人希望美国被打败，好像这样我们才有更好发展的合理性——但俄国惨败，中国的政治改革因此获得了外部动力。这时出现的最重要的契机是东三省问题。清廷要解决，但主持善后谈判的美国不理，说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这时清政府才有所触动，派大臣们去考察。

大臣们从海外回来说服朝廷改制立宪，说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僚，有利于消弭革命党。唯一受损害的是官僚阶层，因为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这种理由听起来很可以接受。之后清廷宣布逐步立宪，要用**15—20**年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

的轨道。我们作为后人，应该抱着一种尊重的心态看到，他们走出这一步是不容易的。很可惜到了最后时刻，皇族没有做到真洒脱，选出偏重满人的皇族内阁。

1911年11月，当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终于出台了《十九信条》，限制皇权，扩大内阁总理大臣与议会的权力。实际上立宪党人的要求就是这么多，但是这时候推出来已经晚了。这个没办法，统治者的决心总是比人民、社会的要求来得晚。

《南风窗》：确实，好像几次立宪到了成功的关口，可惜又转向低谷。

马勇：这就是政治的惰性，让他们变为主动很难。**1911年5月8日**第一届责任内阁出台，应该说是当时最好的格局，会走向良性的君主

立宪体制。可惜责任内阁偏重皇族，引起立宪党人的不满。如果第一届责任内阁总理大臣是几个月后接任这个职务的袁世凯，可能历史也不是后来的样子了。

其实我对皇族内阁还是很理解的，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最优秀的教育，见识和眼界完全不同。但怎么来约束他们的权力，怎么使其有“上位”的合法性，是政治要考虑的。包括引起保路运动的“铁路国有”政策，事实上，这在当时是正确的药方。因为一开始民间资本涌进，存在各种利益纠纷和资金不足的问题，把铁路网搞乱了。这时铁路干线国有的正当性完全不必怀疑，可是他们时机和方法不对，问题就大了。

《南风窗》：革命党似乎就是在清廷改革的一步步失误中成长起来的，一开始显得希望

渺茫。

马勇：对。原来我读历史总感觉有几个隔膜，比如弄不清楚革命的几次高潮到底是什么时候。我们把每次起义都当作革命的高潮，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准备不足，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在书里写了几个故事，比如革命党人吴樾，在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之际搞恐怖袭击。他其实引起一片反对，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只有革命党说吴樾是为国家献身。结果他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所以我讲他的临门一脚就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

《南风窗》：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高，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

体现。这怎么理解？

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120**年前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就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江苏省会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打碎呢？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

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

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

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不能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

《南风窗》：既然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为什么这和谈的成果不能持久？

马勇：你说“二次革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过去认为辛亥革命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动荡状态，这说法也不对。**1912—1927**

年，中国并没有处于长时期混战。**1918**年一战结束，有一次谈判机会，但是到后来又谈崩了。

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

《南风窗》：在您笔下，“清政府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严重忽略了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无限扩大，没有注意下层民众在政治发展经济增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相应好处，反而失去了许多，于是各地民变、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马勇：我做晚清政治研究，越来越感觉到，我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轮回时期。

我马上会出一本写晚清**20**年的书，从**1891**

年写起。这一年洋务运动基本结束，北洋海军从海外买了很多战舰，近代工业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等也发展很快。中国又觉得牛得不得了，经济排世界第二，觉得自己可以说，可以不高兴。

有个很清晰的例子，**1884**年法国人要越南和**1894**年日本人要朝鲜，情况一模一样。**1894**年，日本要朝鲜独立，清政府就不干。一是因为距离京城太近，朝鲜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威胁很大；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虚骄，自以为很强大。军方鹰派认为我的附属国绝不能让别人拿走，于是与日本海战，结果一败涂地。三十年搞下来什么都没有。

《南风窗》：这里面究竟原因在哪里？

马勇：**100**年后回看，我们也得承认那时候

清政府里也有一流人才，如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中国文明也有最伟大的一面，但是在你学习别人的时候，就要诚心诚意。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诚心诚意，好的东西学过来了，自己的传统也保留了；我们却总在强调情况特殊，民主没学来，只学了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够只学人家的科学技术，而不要人家的体制。

《南风窗》：我们都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

马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具有阶段性意义。在19世纪70年代，这是很进步的口号，告诉保守派们不要怕，我们是学习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不会变。但是张之洞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候，就已经很反动了。

《南风窗》：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体制，您在书里也讲“中国目前的危机主要是在国是不定，定国是的关键就在立宪法，实现宪政”。

马勇：这一点我是坚定不移的。有网友批评说马老师动不动就说是体制问题，不是体制是什么呢？**100**多年来，没有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是很可惜的。第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把一个好的体制摧毁了，后来又把民国体制废弃了。这些都很值得我们去检讨，去想中华民族应该怎么走未来的路。

《南风窗》：辛亥革命与世界政治气候有关吗？

马勇：我认为近代史研究一定要从世界的

角度去考虑，我们每一次变化都与世界有关。辛亥革命就是对**100**年前世界变动的回应，如果西方国家都处于帝制时代，中国就不可能有革命。

现在的情形福山几年前在《历史的终结》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历史发展到美国这种体制就不要再想别的了。桥就在那儿，你还老要摸石头。按着桥走不就行了吗？有些事情不必再从头开始探索，不然我们学科学，都从证明**1+1=2**开始学起吗？而且如果有人类本位的感觉，把人类文明看成自家的文明，拿来就用，就不会觉得尴尬。文明怎么能分东、西呢？

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

《南风窗》：反思辛亥要着重哪些方面，

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

马勇：学术界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过，由于大家对前辈学者建构的基本框架无法突破，不敢突破，因而这个领域的研究稍显落后。**30**年了，我们基本上还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论说，除了部分肯定民族资产阶级即立宪党人的转变意义外，还一直抱怨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遗憾孙中山等南方革命党人当年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直捣龙庭，革命到底。我在这本书中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直接批评，但我的探讨就是要正面肯定辛亥参与各方政治势力是怎样出于民族大义、人民至上的原则，有坚持有妥协，避免战争减少战争。

如果我们时至今日还是将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些人物妖魔化，那么我们的近代史就有许多地方说不通。对于这些曾经为这个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我一直主张以温情与敬意去回望。

《南风窗》：这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是受了钱穆的影响吗？

马勇：“温情和敬意”也并不只是钱穆说过。中国古人像孟子就强调“知人论世”，强调站在古人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设想去体会，不苛求古人，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历史学的这个传统并没有丢失，我们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其实还是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只是在过去一些年代，由于过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泛化乃至扩大化，好像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带有阶级的立场、痕迹或企图，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我是接续这个史学传统往下走的，当然受到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以及当代余英时、朱维铮等这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的影响，至于在表达方式上，我也希望用更加平和的方式去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南风窗》：对于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纠偏”，可能在学界并非完全创新，但是在大众阅读里，这些还停留在传统的判断上，这方面这本书应该会给人不少启发。学界的历史研究如果能影响非专业读者，扩大传播力，再好不过。

马勇：我写这类书，就是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所以为了好读，没有像其他书一样大量引用材料，而是把材料都化进叙述里面。读者要相信我是专业的，即便不加注，也都是有据可考的。因为只要引用了原话，文气就不顺了。我最近出的这几本书，都是这个风格写的，我觉得也是给历史学著作一个创新，不要原来板着面孔，很专家的样子。

我这些年刻意尝试以一个比较严肃的历史学家的身份进行大众化写作，向公众传递一些

比较真实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应尽的责任。

《南风窗》：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晚清史的研究？

马勇：我这些年看这么多资料，晚清被完全妖魔化了。革命党当年在海外就是不管清政府做什么都说坏。我们今天对于清史的研究就沿着它走。今天看当然觉得很荒唐，觉得不是历史真相。

我写过一篇文章《重写晚清史》，就提出这个问题。晚清史两次被妖魔化，第一次是康有为、梁启超，第二次就是孙中山的革命党。

（《南风窗》专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

所研究员马勇)

第四章 换个角度看问题

再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外条约

在鸦片战争之后**20**年，中国没有善待五口通商带来的机遇，没有下功夫引导中国利用这个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农业文明转轨到工业文明；也没有利用五口通商机会去耐心引导消费，培育市场，培育中国人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理念。中国在经历了战争短暂的痛苦后，很快重回宁静与安逸，重新享受农业文明的好处。

根据《江宁条约》、《虎门条约》，所谓“治外法权”，就是在五口或中国内地外国人一旦犯罪，不使用中国法律进行约束和制裁，而是交给英国法庭，运用英国法律量刑治罪。这个规定后来被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教科书视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以为严重破坏了中

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司法主权的丧失。

这些愤怒从后世观点看当然可以理解，但实在说来，这种愤怒只是后来者的愤怒，并不代表当时人的心情。

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中国人虽然见过不少外国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沿海、沿江，甚至在偏远乡村，外国人，且是真正的西洋人并不少见，西洋人与中国人也并不总是处在冲突状态。但是，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西洋人，中国政府似乎并没有想好，他们不是愿意让渡自己的司法权，而是不知道怎样运用这项权力。他们能想到的简单办法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让洋人自己管理自己，总比让中国人去管理更省心。

至于那个一直被后世中国人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实与“治外法权”同等性质，同一个原因。都是因为要省心，所以就主动放

弃了这些权力。

参与《江宁条约》、《虎门条约》谈判的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并非等闲之辈，他们不仅有着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丰富经历，而且深知中国体制之弊与体制之优。他们还深知鸦片战争之前广东地方政府与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发这场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他们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从根本上解决的办法。他们真诚希望英国人同意用一个具有包干性质的固定税率去反制地方政府、强势官员的胡作非为。

他们想到了协议关税，因为这种方式最方便最省心，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条约里，中外双方因此减少了冲突和争执，地方政府和官吏，不论怎样强势，也没有办法额外加税。这既是一个关税包干、财政包干的笨办法，但在这些制度设计者看来，一举数得，清廷的财政收入不会因此减少，新税则的“值百抽五”在事实上比先前的税率略有提

高。又因为有了这个数额、比例的制度约束，地方政府、强势官员无计可施，不能税上加税。

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屈辱或吃亏，但在当年，不论谈判者，还是朝廷，都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他们不愿彻底打开国门，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但他们也不愿意英国人在与中国人做生意时占尽便宜。当然，按照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理论，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所取得的外交成绩是虚假的，是不足信的，牺牲了国家主权，贻害不少。他们争来了不当争不必争的东西，恰恰又放弃、牺牲了不应该放弃的权力和利益。如果历史主义地看待**1840**年代的中国外交，那时的中国毕竟刚刚开始被动地与近代国家打交道，而且是被打败之后不得已而打交道。经验、智慧、眼光，当然没有办法与一个成熟的国家去比较，甚至没有办法与几十年之后的中国相比。直至**1882**年，

当中国帮助朝鲜与美国进行修好通商条约谈判时，方才有机会仔细检讨**40**年前有关“协议关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

1882年2月14日，主持中国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在与朝鲜“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谈判代表金允植交换意见时，劝说朝鲜在与美国谈判时一定要注意通商条约的公平合理原则，既不能像《朝日江华条约》那样不定税则，丧失利益，且为各国所窃笑，也不能像中国几十年前那样用一个固定税则一劳永逸。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议立公平章程，如有未尽，就参照他国式样，约定修约时间。**5**年一改，或**10**年一改，总不至于将关税主权永久丧失。这就是关税自主原则。中国在经历了差不多半个世纪方才弄明白，后人当然不应该因此去指责伊里布等人的失误或不察。这是时代的原因。

《江宁条约》、《虎门条约》签字后，中国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只是中国没有利用这

个时间去发展自己，中国依然在浑浑噩噩中度过。而且，还有一个不太好的趋向是，由于中英战争是以条约谈判的方式结束的，因而战争结束不久，美国、法国等相继要求与清政府签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

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

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

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

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

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

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

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

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

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

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

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

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

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

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

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

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

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

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

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

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

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

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

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

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

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

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

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骅、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

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

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

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

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

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

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

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

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

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

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

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

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

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

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

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

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

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

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

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

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

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

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

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

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

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

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

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

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我没有向汉城、仁川派遣一兵一卒，日本人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夺踞汉城？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最好的结果。中国在此后一段时间，一方面竭力驳斥日本政

府“共改韩政”说，指责日本无权干涉朝鲜内政，要求日本与中国同时撤回在朝鲜的军队，尊重朝鲜主权。另一方面，李鸿章利用国际关系，请求利害攸关的俄国等友邦出面协调，劝说日本。

不过，日本“共改韩政”的动议毕竟是在道义上略高一筹。因此，日本政府根本不担心国际社会压力，更不担心中国政府。**6月22日**，陆奥宗光总汪凤藻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中国政府拒绝“共改韩政”深表遗憾，表示日本断不会撤退驻扎在朝鲜的军队。这份外交照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对华绝交书”。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各行其是，冲突的几率越来越高。

既然对华绝交了，日本政府当然不再顾及中国的态度，日本开始向朝鲜大规模用兵，并着手单方面制定“朝鲜内政改革方案”。朝鲜事务的主导权似乎逐步到了日本方面。

日本的挑衅激起中国内部相当不满。一些力主向日本强硬的人不断向朝廷施加压力，请求强硬以对。**6月25日**，朝廷告诉李鸿章，根据现在的情形，口舌之争已无济于事。日本政府大规模向朝鲜用兵，使半岛形势日趋危机。究竟应该如何处置，还望尽早拿出办法。

根据朝廷指示，李鸿章有一详细禀报，他仔细分析中日军事实力，以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陆上亦非大举不办。即便大举用兵可以扭转局面，但李鸿章依然认为不应轻启衅端。李鸿章详细列举了北洋海军装备，强调堪备海战的战舰只有八艘，其余的船舰只能供运输、练习而已。最近数年，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北洋绝对处于劣势，很难胜算。

至于陆路，李鸿章说，沿海各军将领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然合计不过两万人，分布直隶、山东、奉天三省海口扼守炮

台，兵力本不为厚。如果让他们出境援韩抗倭，事非大举不办。一经抽调，则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有妨大局。

李鸿章建议从两个方面准备，一是如果一定要在朝鲜问题上惩处日本，那么就应该认真准备，假以时日，筹集足够的经费，添置必备的装备，大规模扩充军力，战则必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是建议朝廷还是谨慎考虑，不要轻启边衅，否则后患无穷。

李鸿章避免冲突的想法应该说是理性的，只是不管是朝廷内部，还是前线的军人，似乎都还死守传统宗藩理论，依然将朝鲜想象为中国的藩邦，以为日本对朝鲜的干预就是对大清的蔑视，他们不知道时移势易，大清不再是过去的大清，日本不再是过去的倭寇，朝鲜也不再是过去的藩国。然而他们保护藩国的呼吁非常诱人。7月12日，御史张仲忻等联名上疏，从检讨中法战争失误开始，归结为必须与日本

在朝鲜一决胜负，因为朝鲜与东三省壤地相接，为我国必争之地，日本窥伺，俄国垂涎，英国虎视。今日我大清不粉碎日本野心，东北亚乱局势必给我大清带来无穷后患。

爱国主义、国家利益是最好的说辞，日本大规模用兵也给中国留下了这样的机会，其实日本本来就期待中国同样向朝鲜用兵，只有这样才能为日本找到军事行动的正当理由。

日本大规模军事行动严重刺激了中国，7月14日，朝廷指示李鸿章改变原来的思路，积极筹备，向朝鲜发兵。李鸿章根据这些指示，调整布局，开始抽调精兵开赴朝鲜。

7月21日下午，满载清军和武器弹药的“爱仁”号从天津大沽开行。第二天傍晚，“飞琼”号离港。第三天，也就是7月23日晚，“高升”号从大沽起程。北洋海军副将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

25日，日本不宣而战，袭击济远、广乙，悍然击沉高升号运兵船，一千多名清军官兵命丧大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发布宣战诏书，相互指责，影响远东格局特别是近代中国历史走势的甲午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缺陷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林则徐、魏源，还有徐继畲，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通过与西方人直接交往，认识了西方，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这是中国对西方认识的根本转折。在他们之前，中国人面对周边族群始终有一种文明上的自大，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其实都是中原文明优越感不自觉的外露。

面对西方，中国文明在明末徐光启时代有过一个短暂的理性平和时期。那时的明朝尽管面临天崩地裂的政治危机，但文明的自信在徐光启那一代中国人那里没有多大问题。中国文明原本就是从黄河中下游一隅不断吸收周边族群文明而不断重构和发育而成的，所以徐光启那代中国人面对全然不同的西洋文明，面对满

腹经纶的利玛窦等“西儒”，既不感到自卑，更不会狂妄自大。那一代中国知识人遵照圣人“一事不知以为耻”的教诲，面对不知道的西方知识，采取“拿来主义”立场，如饥似渴地吸收。按照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规划，他们准备用**20**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几千部西方典籍全部译成中文。假如这个计划得以实现，中国在那个时代实际上就会与世界处于一种同步状态，中国文明也一定会像过去几千年一样，不断吸纳外来文明重构自己的文明体制。

然而，徐光启那代人的理想因为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没有持续下去，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西方化，而是汉化。所以尽管在清朝早期很长时间并没有禁止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但中国主流文化实际上已不把西方化当回事，不再像徐光启时代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洋文明。乾嘉汉学畸形繁荣，其实就是一个最好例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

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对于统治者来说确实是一种耻辱，但对整个中国社会而言，这场战争让中国国门再度打开，睁眼看世界，看出了中国与世界的真实差距。

看到了差距，就要弥补这个差距。这个逻辑一点儿都不意外。魏源在鸦片战争后明确提出中国要想避免这样的战争结局重演，第一必须放下老大的架子，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和他人；第二，必须确立向西方学习的大原则，不能因为“非我族类”而拒绝人家好的东西；第三，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国还准备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话，那么也必须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用魏源的历史名句表述，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有“师夷长技”，方能“制夷”。换言之，要想“制夷”，必须“师夷长技”。

魏源那个时代，中国刚刚从自以为辉煌的盛世中惊醒，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先前文化自大理念深入士大夫骨髓，士大夫阶层用自己

的双手蒙住了自己的双眼，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我们今天这样体会向西方学习的道理。为了说服这些士大夫，魏源和那时许多聪明人一方面用“西学中源说”自我安慰，强调西方那点家底虽说比中国要富有些，但追根溯源，西方这些东西都能从古典中国找到依据。直截了当地说，这些西学都是对古典中国智慧的再发明再创造。

另一方面，魏源等人借用孔子“礼失求诸野”原理，倡导“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以为中国学习西方，就像古典中国向周边族群学习某些东西一样很正常，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那些“胡化”的东西，不是慢慢都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了吗？

根据这样的认识，魏源建议在虎门创设造船厂、火器局；建议像晚明那样邀请外国技师来华主持新式工厂的创设、新式机器的建造；

建议聘请外国人培训中国人，进而慢慢发展中国自己的基础工业。应该说，魏源的这些规划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可行的。

魏源那代人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改变自己，才能让中国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不至于再犯鸦片战争这样的错误。这些认识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中国此时不是在一种常态情形下学习西方，而是鸦片战争失败后的不得已。因而这次向西方学习，不仅始终笼罩在失败后的阴影中，有一种报仇雪耻的急切冲动，而且呈现出中国文明很少有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特征。那时中国人不愿从基础科学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体系，而是急功近利从最实用最易见效的领域开始。中国学西方的目的越说越直白，就是为了“制夷”，就是为了雪耻。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中国还将像过去一样沉睡、昏睡，根本不会去学什么西方。

极端功利主义立场不仅使魏源和那一代中国人无法从容地学西方，而且使那代中国人始终无法忘怀中国中心主义，始终认为中国落后和鸦片战争失败都是一个偶然事件，根本没有从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这种层面去思考。由于中国失败只是偶然，所以不存在整体落后；由于不清楚时代差异，所以中国古典文明成就依然被士大夫阶层津津乐道。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将正常的文明交流弄扭曲了，目的变成了手段，手段弄成了目的。功利主义使中国在此后数十年无视最基础功夫，忽视从文明最细小的因子上嫁接中西文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始终带有一种莫名的情绪，不是心悦诚服，不是发自内在需要，所以在经历上百年所谓向西方学习历程后，中国依然无法弄清西方何以富、何以强，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方一样跻身于“列强”，何以

总在“世界之外”徘徊。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

在过往几十年，我们已经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历史书和领袖们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般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

级逐步从社会的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并为社会指明发展方向，方才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减少了震动。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我们熟悉中国的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的《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小生意，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所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就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

投资一个国家，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强大了，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真正威胁中国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纵横捭阖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自己经商，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看到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政治体制之后，在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者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最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势力。这一点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值得注意。

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发现东方”，其实就是要

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的商人终于从“士农工商”传统社会构成中脱颖而出，并渐渐地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判断力，拥有知识。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

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可能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

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中国尽管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新政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不要这样，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我们过去称之为“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就是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拥护“中体西用”、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值得重新认识的东

西。

郑观应的名著是《盛世危言》，这部书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一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但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知识所没有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极端后悔，人们都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注意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

至于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还可以举出张謇的例子。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他是坚守改革不到

绝望时候绝不轻言放弃改革，但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也绝不螳臂当车为旧制度殉葬。

张謇是晚清君主立宪运动的先驱，早在甲午战争结束不久，张謇就注意到日本的君宪体制，就期待将这个体制引进中国。当日俄战争开打之后，张謇更意识到中国的唯一出路就在君主立宪，重构中国政治架构。为此，张謇付出巨大努力，策动晚清的政治变动，促使清廷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变。直至武昌起义，张謇依然相信君主立宪是中国的正确道路，依然运动各方尽量达成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只是到了后来，满洲贵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不愿妥协，共和不得不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架构时，张謇毅然放弃先前的理想，毅然劝说清廷接受妥协，放弃权力，达成共和。从张謇身上，我们看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妥协性最完美的结合，正是这样的结合促使近代中国不断

向上，逐步拉近与世界的差距，逐步重回世界主流，在自觉不自觉的过程中，中国终于在二战结束后重回世界中心，成为世界主流社会的重要力量。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就是要为未来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历史启示、思想资源。

重新认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一直借用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被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

三十年前，近代史学者在进行这些探讨时，无论如何想不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被指责为“中国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至少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

说话的能力。

中国在非洲或其他较中国更落后国家的资本输出，按照我们一般理解，当然有利润的冲动，有资本本身的运行规律，但中国资本绝对没有去控制该国政治，或者垄断该国经济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

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今天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的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

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那

样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那些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是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这些国家非常注意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等层面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然而那时的中国并没有对外国资本开放，中国虽说在那个时代引进了一些外国技术、人才，但外国资本对中国并不构成巨大压力，也不是中国增长的动力。过去很

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经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的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

《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

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无法梦想的增长迅即实现，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如果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之后获得迅速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在那个时刻发生。

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只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

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方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

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在**1898**年秋天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动时，在**1900**年京津地区政治动荡时，各国海军陆战队能够迅速向北京调兵遣将，拯救外交官和侨民，其实都是这些军事存在发挥的作用。

用军事手段保护资本安全，是各国“商战”一个重要经验。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的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

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九十九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尽管当年有不少反对声音，但清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却步。

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检讨近代中国发展史，公平看待各国资本在中国发展史上的贡献和问题。

重看巴黎和会上签字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巴黎开会，讨论善后问题。作为战胜国，中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以平等身份昂首阔步踏上世界舞台。

然而，由于东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后抢先对德宣战，毫不犹豫登陆中国山东，将德国人在那里经营多年的铁路、矿山等全部权益一律纳入荷包。

更厉害的是，为了“确权”，日本政府于**1915**年初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山东权益已在日本人手里。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当然应该回归中国，只是日本毕竟是通过战争而获得，中国对此也没有太多办法。中国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损失减至最低，

但凡与山东权益无关的，都被中国政府拒绝。

“二十一条”发生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如果此时光明磊落宣布对德绝交，宣布加入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对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作战，中国应该还有机会在协约国内部通过协商或通过中日之间对决解决山东问题。然而，由于中国内部此时陷入非常严重的政治纷争，不仅有南北政治冲突，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有“府院之争”。“府院之争”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要不要参战。

持久内耗使中国错过了最佳参战时机，也使中国错过了收回山东权益的最好机会。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趋向已定，将要结束，中国内部也没有达成参战共识，还是政治强人段祺瑞竭力推动，促成参众两院分别于**1917年3月10日、11日**通过对德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扫清了外交障碍。**15日**，湖北

督军王占元根据中国政府训令派军警接管了汉口德国租界；**16日**，天津警方接管了德国在天津的租界。除了山东权益被日本人抢占外，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均被中国政府依法收复。

对德绝交只是第一步，在参战问题上，中国内部依然斗争激烈。政府外的南方势力继续反对中国参战，力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无关，中国应该袖手旁观，静以待变，奉行孤立主义。而在政府内部，尽管通过了对德绝交案，但反对中国参战的力量依然庞大。直至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三造共和”的英雄段祺瑞以国务总理身份独掌朝政，方才有机会于**1917年8月4日**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宣战案。此时，距第一次大战开战已经三年整，距战争结束一年多一点。

中国在关键时刻走对了路，最后时刻宣布参战为中国赢得了机会。中国成为战胜国一员，与日本平起平坐，同一战壕。那么山东本

来就是中国的，日本理所当然应该将山东权益交还给中国。对此，中国人民有权期待，中国也应该获得这样的回报。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这样认为。日本宣称山东问题在“二十一条”中已经解决，**1915年5月25日**中日达成的《民四条约》已确认了日本全面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因此，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寸步不让，而和会也大致接纳了日本的建议，尽管一些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要求表示关切与同情，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并没有立即见效。

中国没有在巴黎和会索要回来山东权益，消息传到国内，立即引发了五四大游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山东”，成为那时最激励人心的口号。全国各界在这种爱国情绪激荡下，近乎一致要求中国政府代表团不要在巴黎和会最后文件上签字，一定要坚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

山东权益。**6月27日**，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数万人举行声势浩大抗议活动，要求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宣称“谁签字，打死谁”。数十名青年以“敢死队”自诩，誓死捍卫中国尊严，誓死争夺中国权益。

民众的心声深刻影响了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最终放弃了在和约上签字。中国第一次昂首阔步踏上国际舞台，却以这样灰溜溜的形态结束。

中国政府不签字的消息传入国内，激起阵阵涟漪。国人大致上都能认同这个决定，只有严复等少数人不以为然。**7月10日**，严复给他的铁杆“粉丝”熊纯如发了一封“私信”，以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蔡元培等知识界领袖煽动民粹反对签字是不对的。严复说，蔡元培人格甚高，然对世界大势和国内政治，往往像庄子所说的那样，“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

据严复分析，中国政府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拒签后，中国在山东问题上除了排斥日货，并没有其他办法。签约，可以使中国重回国际大家庭，可以将山东问题放在国际框架内解决。现在中国拒签，好像义正词严，其实是自我放逐，是孤立主义。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严复说得更沉痛。他以为这件事来龙去脉和利害得失，专使陆徵祥及中央政府莫不知之，然他们终不肯牺牲一己之清誉，担心被骂为汉奸、卖国贼，不肯为国家做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这其实就是不负责任，是南宋以来中国士大夫鉴于秦桧教训，宁愿将国家打碎砸烂，也不愿言和，不愿妥协。他们个人避免了汉奸、卖国贼的恶名，但国家却因此付出昂贵代价。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2012年9月4日**）

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辛亥革命，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祛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摄政底气不足

晚清最后走到那个份上，君主立宪走不下去，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对辛亥那段历史的很多看法都比较特别，比如你对载沣等人是抱着一种同情，甚至是欣赏的眼光看的。

马勇：陈寅恪先生在谈到历史人物研究时，反复强调“同情的理解”，认为对历史人物应该从历史背景和其政治地位上去考量其贡献和作为。我们过去把摄政王描写成优柔寡断，隆裕皇太后则是软弱无知的家庭妇女。其实，真实的历史不是这样的。就摄政王来说，他是晚清王爷中比较具有国际视野的，在家天下历史背景下，小皇上就是他的亲生子，大约没有谁比他更关心这个国与家的未来前途了，所以他接手之后一直兢兢业业处理国务。至于眼见着成功的君主立宪竟然走不下去了，竟然让位

于革命了，说实在的，那不是摄政王和皇族核心层的问题，是皇族之外的高干子弟的问题。

南都：高干子弟？

马勇：就是所谓的“皇族内阁”那些人。君主立宪的要义是约束君主的权力，君主不再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第一线，不再当权力要冲。这一点君宪体制下的君主一般都能接受，并没有多大障碍。问题在于当时中国的特殊性，也就是自恭亲王奕訢出任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之后，为清廷皇族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一大批皇族出身的人先后介入实际政治。他们在那之前享受着朝廷俸禄，但交换过来的条件是不得从政；恭亲王之后就不一样了，皇族子弟纷纷走出家门去从政，这就使君主立宪的实现无形中增加了极大难度。所以，要想实现君主立宪，就必须重申皇族成员不得从政不得经商两条铁的纪律。这对于已经从权力中尝到无限好处的皇族来说，显然是很难的。

南都：就是说在弈訢之前皇族是不能从政的？

马勇：因为皇族当官，一定有弊政，会导致不公平。鸦片战争之后，恭亲王弈訢从**1860**年起以总理衙门大臣的身份管理中国几十年，导致一个最坏的后果，就是皇族子弟个个争着当官。所以晚清的君主立宪没有走下去，不是君主的原因，也不是摄政王的原因，就是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中许多人不愿意中国就这样走上君主立宪，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特殊权力。这个利益集团中的许多顽固分子后来就演化为宗社党。

南都：宗社党主要有哪些人？

马勇：他们这拨人都是很强硬的，包括当时民政部的尚书善耆(他的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善耆在改革初期是很积极的，但到了最后关键时刻，他发现不让皇族继续从政，

他就不干了。还有一个载洵，镇国公。他是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在立宪运动中，就是载洵最早给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上密折。他在密折中说，中国唯一的机会就是要改革，只要能够让爱新觉罗万世一系就行了，其他的都可以改。但到了君主立宪最后关头，他发现自己的权力将被削弱，就不干了。

南都：所以总体而言，你认为载洵在辛亥前后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马勇：过去对载洵的描写都是无能、短视与自私。但只要仔细研究载洵的相关资料，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妖魔化的结果。这种妖魔化是辛亥后的必然，因为要为历史找出责任的承担者。如果不是载洵对立宪呼声给予善意回应和良性互动，那么后来的事情还真的很难说。载洵在最重要时刻还是有担当的，包括他的辞职。武昌起义后南方要求共和，君主立宪已经不被接受了。袁世凯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他

找载沣谈共和。载沣说不能接受，就辞掉了监国摄政王的位置，以藩王的身份退位了。他当时才二十八九岁，而且他很有契约精神。

南都：契约精神？

马勇：辛亥之后，清廷和民国政府达成协议，就是在中国废除帝制，但对清廷并不再像过去所说的那样要驱逐鞑虏，而是保留了皇室的存在，以及它的完整性和尊严，紫禁城归他们。这对清朝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协议。**1914**年出现帝制复辟的思潮，载沣就表示反对，他跟宗社党的人也闹翻了。**1917**年张勋推着他儿子溥仪来搞复辟，载沣是非常恼火的。载沣说你不能这么搞，你这样就把民国达成的协议给毁了。历史证明，载沣的判断是对的。因为后来冯玉祥把溥仪赶出宫，理由就是你搞过几次复辟。

南都：一种观点是载沣太年轻了，怎么会

找这么年轻的一个人来摄政呢？

马勇：慈禧皇太后临死前安排这个接班架构是有她的道理的。载沣接班时**26**岁，跟慈禧太后当年接班时一样大。而且慈禧安排了隆裕皇太后和载沣搭班，相当于**1860**年慈禧太后和恭亲王搭的班子。隆裕比慈禧太后当年接班的时候还大了十几岁。这个叔嫂结构是一个良性的结构。隆裕皇太后的作用，在《清实录》里讲得很明白，就是在重大问题上拥有否决权。摄政王载沣如果遇到了重大的事，还是要找嫂子商量。如果说弱，可能载沣的班底比较弱。慈禧接班时特别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朝廷的大臣都是位高权重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1860**年的时候，都处在上升的状态。**1908**年是另外一种格局，摄政王上台的时候，张之洞死了，袁世凯退下来了，端方、岑春煊等朝廷几个权臣都下来了，朝廷上来一拨年轻的大臣。如果载沣接班后，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养

病，不把岑春煊和端方开了，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失误。不是摄政王弱，而是他的班底弱。你看皇族内阁出台之后，强一点的就只一个庆亲王奕劻，其次就是徐世昌，只是幕僚出身，和一个理想的内阁班底差距太远。这就和载沣底气不足有关了。

南都：载沣开掉这些能臣是因为他底气不足？

马勇：对。因为载沣没有打过仗，没有丰功伟绩。只是因为血缘的关系和自己儿子的关系做了摄政王，底气太不足了。如果这些有本事有实权的大臣不配合，他是完全没办法。开掉端方时他找了一个借口，端方在慈禧的丧礼上拿着照相机到处去照相(那个时候照相机刚刚传到中国不久)。开他的理由就是他在丧礼上不庄重、不严肃。端方那个时候已经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就以这种理由把他开了。上来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皇族，怎么

能和端方比呢？开岑春煊的理由是怀疑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其实是一个造假的照片。革命党合成了一个他和康梁合影的照片，结果朝廷就信了。

南都：开袁世凯又是以什么理由？

马勇：**1908**年清廷为什么把袁世凯以脚疾的名义开除了？我们过去的解读都是说摄政王要报仇，因为袁世凯**1898**年秋天向慈禧告密，使得变法失败光绪被软禁。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所以上台之后要向袁世凯报复。那都是康有为的瞎扯。载沣就是没有底气。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开御前会议，一个权柄在握的重臣在旁边，摄政王怎么施展呢？袁世凯确实有脚病，在慈禧和光绪活着的时候，袁世凯就因为脚疾请过好几次病假，这个材料我是从许宝衡日记里面看出来的。另外一个理由，当时袁世凯在外交上有一个失败，这个后来很少被披露出来。

南都：是什么样的失败？

马勇：**1908**年，在中国东北开仗的日本和俄国谈妥了，又把英国和法国拉进来，利益均沾，共同开发东北。这样一来，中国国土上的权力都归人家了。德国找到中国，建议和美国搞一个三国联盟，对抗四国。这时袁世凯是外务部尚书，他请示了慈禧和光绪，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牵制日本。所以**1908**年**10**月，就派了吉林巡抚、袁世凯的老搭档唐绍仪出使美国。当时走海路，去美国必须经日本。到了日本，日本人拉着唐绍仪不让走，拖了一个多月才走掉。结果等他到美国，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被拉到东北利益团体中了。唐绍仪只好灰溜溜地回来。这次外交失败袁世凯吃了一个哑巴亏，只能以外务部尚书的身份承担这个责任，有点引咎辞职的味道。

南都：你认为隆裕也不是没有见识之辈？

马勇：隆裕皇太后或许没有慈禧太后那样老辣的政治手腕，但是慈禧太后将大清王朝交给她，也有其道理和依据。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隆裕皇太后的全部资料，就不难看出她并不是传统理解中的妇道人家。辛亥革命能够从一个武装暴动转化为一场和平的权力交接，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应归于暴动发生后各方的妥协和让步。隆裕并没有在最后时刻鱼死网破摧毁国家，而是接受现实坦然让步。我认为这表现了中国人一个很重要的智慧。

南都：所以隆裕在最后关头的让步是一种明智的表现？

马勇：如果不是她的态度与决断，南北之间不可能走上谈判桌。鱼死网破孤注一掷，是概率比较高的可能。根据袁世凯的建议，隆裕皇太后召开了三天御前会议，像铁良、良弼这些强硬派都是掌握军队的，他们说我们有枪，不接受南方的条件。隆裕问担任过军咨大臣的

载涛，那你能打下来吗？载涛说，我没打过仗，不知道。这个时候隆裕皇太后的姿态就非常重要了，她觉得庆亲王、袁世凯是真诚地护着王室。当历史潮流往这儿走的时候，你要顺势发力，保全皇室。所以你看《清帝退位诏》，大意是说，人民都要求共和，我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我接受这个结果了。这就是明智。

立宪欲速不达

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97**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用了三十年才建成一个立宪的体制。

南都：清廷一直被质疑是假立宪，没有诚意，但你认为它是有诚意的。

马勇：说假立宪，基本上是在海外的革命党人说的。我有本书的开篇就叫《革命与改良赛跑》，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主张从**1901**年开始有很多跟随者，因为清廷那几年确实不给力，有很多问题。但是当**1905**年五大臣考察宪政回来，清廷踏上了立宪之路后，一大批原来支持革命的人就回归了。朝廷已经说了通过和平的改良走上立宪道路，干吗一定要砸碎，一定要制造恐怖和流血呢？皇族内阁出台，清廷到最后时刻确实没有处理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不能因为最后他没有处理好，就回过头来说它不真诚。立宪党人都是什么人呢？汤化龙、汤寿潜、张謇、赵凤昌，这都是当时中国最厉害的人，他们的地位和智商远远高出革命党。当然也不能低估革命党的功能，如果没有革命党在外部的压力，清政府也不一定就真的

改革，任何政治改革都是有惰性的。

南都：你提到，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宪政，最初目的并不是真的想立宪。

马勇：晚清的改革基本上都有外力的推动。**1904**年日俄双方在中国东北打仗，**1904**年底**1905**年时，美国人召集日俄等国开会，处理东三省善后问题，却没有让中国参加。美国人的理由是，这是立宪国家之间的事，而中国还不是。况且虽然日俄两国在你的土地上打仗，但你是保持中立的，与此无关。

早在**1904**年**3**月，盛宣怀等官员就曾建议清廷，为了防止日本战后霸占东三省，应该马上派遣大臣，以考察新政的名义出访欧美国家，真实目的是与各国进行外交斡旋，争取各国在东三省问题上的支持和同情。当时清廷没接受。但到了战后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外，从各省督抚到各部大员开始纷纷请求变法立宪。清廷

才回头采纳盛宣怀的意见。因为考察宪政是西洋各国普遍欢迎的事情。名义上说是去考察立宪，实际上是去主谈外交问题。当然在五大臣出发之前，在日俄战争刺激下，关于立宪的呼声在清廷高层内部也已经成为主流了。

南都：外交方面有效果吗？

马勇：外交没谈出什么名堂来，但是这几个出洋的大臣都被洗脑了，回来之后就认为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之路。深受慈禧太后欣赏的大臣戴鸿慈讲了立宪的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皇权巩固，有利于消弭革命党，有利于百姓监督官员。最不利的只是中下层官员，因为把权力释放之后，人民有监督他们的权利。这就说服了慈禧，开始真的准备立宪。

南都：五大臣出洋时，还遇到革命党的袭击？

马勇：**1905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吴樾在五大臣的专列上搞爆炸，载泽等人只是受轻伤。后来吴樾被誉为革命英雄，其实在当时他是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普遍谴责，被认为是置国家前途于不顾，用恐怖手段遏制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革命党之所以要阻止立宪，是因为清廷发起立宪运动之后，获得上下的一致支持，使得革命被严重边缘化。所以当时革命党人一方面批评清廷是假立宪，是欺骗人民，另一方面就是阻止立宪，打击那些骨干和领袖人物。但吴樾的做法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改革迫在眉睫，坚定了政府的决心。正如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的一份电报中所说，这个炸弹表明，从速实行宪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所以我讲吴樾是临门一脚，把清政府立宪的球踢进去了。随后，进展很快，到**1908年**就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南都：既然清政府真的想立宪，那为什么

定预备立宪期是九年那么长？

马勇：当时都有分析，就是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来渐进式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十几年、二十年。梁启超讲过，应该用三十年的时间准备。因为日本从**1867**年开始改革，到了**1889**年的时候才宣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始实施，仅制定宪法就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至于建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立宪体制，可能时间还要长。后来清廷公布的时间是九年，有形势逼迫、立宪派人强烈要求的因素。

1908年**8**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稍后又提出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清单》，根据这份清单的规划，九年当中会逐步举办各省咨议局，进行咨议局选举，办地方自治，办教育提高识字率，设置律法等等。如果我们不带政治偏见的话，应该承认这个立宪日程表是可行的，它规划了详细方案、责任目标、每年应该办的事项。比如当时格外重视提

高识字率的要求，规定到第九年识字人口要达到二十分之一。但后来有立宪派三次国会请愿事件，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将年限缩短了。

南都：立宪派为什么要求提前开国会？

马勇：与外交危机有关。九年立宪是一个有计划、有步骤推进的过程。到**1909**年各省都完成了咨议局选举，咨议局的成员基本都是当时的精英，或者海外留学回来，或者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他们确实做了许多参政议政的实事，在地方政治经济改革方面提出很多好的议案。但**1909**年**9**月，中日两国达成《中韩界务条款》，相当于日本扩张了在东北的势力。这一危机导致当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立宪党人联合江苏、浙江巡抚，要求清政府改变九年规划，提前召开国会，以救国难。各省咨议局组织请愿代表，三次到北京请愿。

1910年**7**月，日俄两国又签订第二次《日俄

协定》，背着中国瓜分东三省。之后日本又正式吞并了朝鲜。这些来自外界的危机很大地刺激了国内的国民情绪，要求尽快立宪的声音更加强烈。**8月**，各省咨议局在北京成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化龙任主席，要求清政府在两年内召开国会。东三省总督锡良也向中央发电报，表达请愿民众的诉求。他还联合了十几个省的督抚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立即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

南都：清政府对此态度如何？

马勇：前两次请愿的要求，清政府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摄政王的立场看，九年预备立宪是各方认定的日程计划，不能说改就改。他反复强调，朝廷从来都希望宪政早日达成，只是考虑到国家至重，宪政至繁，必须慎思而后动，不能贸然行动。但这些解释没能说服请愿代表，反而被认为是缺乏诚意，敷衍拖延的表现。到第三次请愿的时候，摄政王终于让步

了。各省督抚的联名电报应该给了他比较大的压力，他召集政府要员王公大臣讨论，最后宣布将九年缩短为五年，也就是**1913**年正式立宪。但这一让步，反而不可收拾了。

南都：请愿仍没有结束吗？

马勇：有很多人认为既然可以让步，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即召开国会呢？代表们接着发动了第四次请愿，要求第二年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采用强力压制的手段把第四次请愿压下了。所以这一个让步就如同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人民的要求如潮水般地一个接一个。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皇族内阁出来之后，摄政王不愿意退让，就和这次国会请愿运动有关。国会请愿运动之后，你让了，并不能平息下去。

共和大势所趋

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

南都：我们都知道，最后终结清王朝的，袁世凯是关键人物。他早期是倾向立宪的，后来的态度是怎么转到民主共和的呢？

马勇：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一再向南方声明，民主共和并不是中国最需要的，应该君主立宪——保留皇上有什么不可以呢？皇上可以是国民的向心力。袁世凯身边的那些幕僚，都不是简单人物。晚清政治家的幕僚群体当中，都是研究多轨策略的。武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袁世凯还在河南老家，他的幕僚班子各种意见都有，就拿出了三套方案。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推翻清廷，这几套都有。都不

会单边下注，都是多边下注。

南都：他会有好多个方案？

马勇：袁世凯派去谈判的人当中，就有主张共和的，主打的就是谈判总代表唐绍仪。他一定是多元选择，顺势发力的。武昌起义不久，南方有人就出主意说，我们要把袁世凯从清廷当中拉出来，怎么拉呢？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诱饵，我们请你做河南、河北大都督。不行的话成立新政府，让你当总统，这是第二个诱饵。另外他们就散布谣言，说你看朝廷对你不信任。这一点确实让清廷和皇族中的一些人上当了。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对朝廷没有二心。但武昌打下来之后，袁世凯在那儿按兵不动。后人多以为袁世凯是想利用南方的形势压清廷，又用清廷的变革压南方，目的是自己坐大。但这不能代表袁世凯当时的想法。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保持军事高压，但最终还是要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皇族的强硬派

就不干了。

南都：他们认为袁世凯有异心吗？

马勇：强硬派认为，袁世凯已经打下了一个有利的地形，为什么不继续往前打呢？袁世凯讲，我可以踏平武汉三镇，我可以踏平两湖，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干掉张謇、赵凤昌、汤寿潜，因为他们在人民中间。袁世凯讲的道理很明白了，就是最终一定是要政治解决，因为哗变的新军不是要求加饷，他们的要求是政治改革，你打死几个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明显可以从这个争论当中看出来，南方瓦解的战术在袁世凯那里也有一点影响。

南都：包括杨度这些坚决的立宪派，到了清帝退位前夕为什么也转向支持共和了呢？

马勇：**1912**年杨度在北京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他与袁世凯

关系密切，所以他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袁世凯态度的转变。杨度当时强调，之前大家主张君主立宪是以救国为前提，而不是以保存君主为唯一目的。现在中国已经错过了君主立宪的良机，武昌起义之后，就意味着君主立宪走到了绝境。现在面临南北分裂，国将不国。要保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南方的条件，走向共和。

南都：早年清廷要各省成立咨议局，其实也是为自己埋下了强劲的对手。

马勇：那是培养了一大批职业政治家。各省的咨议局都是光绪时代培养出来的。这拨人都是经济上的中产阶级。按照宪法大纲规定，咨议局的议员要选举。竞争非常厉害，贿选、拉选票、造假都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政治情绪确实被调动起来了，对政治介入的热情提升了。大概到了**1908**年清廷宪法颁布前后，各省的咨议局已经成为行政首长很头疼的

一件事。总督和巡抚动不动就被咨议局叫来问询，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和那个问题。

南都：这些人都是什么背景的人？

马勇：一个是有家底的人——你整天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文化，肯定是不行的。咨议局议员选举的时候，就有一项财产申报。比如你要想竞选上海选区咨议局的议员，你需要在上海居住十年以上，有十年的纳税证明，才有资格参加选举。而且你的财产也要登记出来。这种状况下，他就成为一个职业政治家。其中很多人是**1901**年新政之后到日本留学的。比如李大钊、杨度这些人到日本去都是学的法政，回来只有当官一条路。最初的起步必须从议会起步，所以这一拨留学生都在各省的咨议局里面混事。这拨职业政客一直到民国时代，民国时代的民主思潮，都和这些人有关。

南都：所以当时的民主试验其实是有一定

效果的了？

马勇：孙中山多次讲到，要提高人民的素质，要教人民怎么开会，怎么投票，怎么选举。这是因为孙中山**1894**年跑出去之后，清廷不让他回国，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晚清十几年的发展。**1894**年的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怎么开会，但是到了**1912**年的时候，中国人太知道怎么开会了，因为有了十几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但是这个孙中山都不知道，一是他在国外没有回来，另外他戴了一个有色眼镜，清政府的任何改革，他都认为是假的、骗人的。

南都：但立宪派也是少数人？

马勇：晚清十几年的立宪运动发展走的是精英政治路线，只是给人民一张选票，给这些政治精英合法的权力，并不是让人民都介入政治。而孙中山和后来的革命者都是动员人民。政治不能这么玩，政治永远都应该是职业政治

家手里面的东西，但是职业政治家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投票。晚清走的是一种很合乎中国国情的一个立宪道路，后来孙中山走的另外一条路，怎么训政，怎么民主。

南都：就是说要相信民众的判断力。

马勇：应该相信人民的判断。就是选上了一个坏人，人民仍然有办法把他选下来。而且中国当时走的精英政治路线，人民选的就是咨议局议员，并不需要人民去一人一票选大总统。我们当时走的代议制，和美国的制度有很多的相似性。只要是真诚的代议制，真正的代议制，在基层放开权力就行了。

南都：所以你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

马勇：因为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我认为这

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

（原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日**）

第五章 再给历史把个脉

中国仍在突围中：回望百年

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

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儿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

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槃，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教育制、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太激进，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

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

“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利，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或许就是清之所以亡而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

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之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

英国工业革命的反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节点。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

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

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真正走出帝制时代，或许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这不是危言耸听故作高深。在一个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社会转型，即便有形的皇帝不存在了，谁能保证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不再期待一个无形的皇帝，谁能保证那些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心中没有想过当皇帝，即便不能名正言顺当有形的皇帝，为什么不能享皇帝之实而去皇帝之名呢？

事实上，在我们今天无处不在的官僚体制中，那些大大小小的头目，哪一个不把自己视为主宰单位的小皇帝呢？我们要想完全走出帝制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漫长的路。

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

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在摆脱了帝制束缚，也失去皇恩庇护的同时，其实并没有真正获得民主的权利。皇恩不再浩荡，民主又没有实现，这就有点不进则退了。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出了帝制时代，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决不会以特色向世人炫耀，而是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的两千年。

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

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予以终结。此后六十年，台湾在继续发展，延续了孙中山当年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实现宪政，为中国政治发展走出一条很不一样的新路。

台湾的成就和经验对近代中国许多既成观念都是根本性颠覆，自康有为、孙中山以来的所谓特殊国情论在台湾政治实践中逐步被证明有误。这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值得自豪的成就。

在大陆，过去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沉重打击。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执政者的信赖。然而，可悲的是，随后便人为发动了史无

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文革的中止，一系列错误的纠正，伴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

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

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名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直至**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

一百年前的问题好像至今没有变。未来中

国不变革则已，一旦走上变革之路，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权利。

中国近代史的热点、焦点和难点

2012年就要结束了，《深圳特区报》理论版主编周国和先生约我对过去一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简略回顾。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像任何一家公司一样，总要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做个盘点，弄清盈利还是亏损。当然，我并不是这个题目最合适作者，因为现在一年近代史专业知识产量汗牛充栋，断非浅学如我者所能

把握。我只能像国和兄所说，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热点问题谈点看法，更细致的综述，还应求助于那些专门者。好在我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有几十人常年关注学术进展，每年都分门别类撰写“学术前沿报告”。读者如对相关话题有兴趣，不妨翻看每年《近代史研究》第五期，那里有上一年度学术分析，全面涵盖上一年度近代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学术、思想等诸多门类研究新进展。

热点：历史相似性

历史哲学早就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重大历史情形在历史上都不会出现一次就结束，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尽管每

一次重复并不那样全然相同。

近代中国的主题就是中国走上世界，世界进入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缩写，就是世界重新进入中国，中国走上世界的过程。

类似的历史主题，总会衍生类似的历史问题，因而近代史在过去若干年活跃，如果一定要寻找其动力，毫无疑问是时代对理论的需求，是人们期待从既往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

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从坚船利炮开始，是从物质建设开始，中国人在最初几十年埋头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识形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1860—1894**年这三十四年，使中国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裂变，一个全新的现代工业基础正在形成，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都在变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类历

史的瞬间，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确是几百年、几千年所罕见。

洋务三十年高增长主要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资源、市场、价格等诸多方面垄断，实现了超常规跨越。这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中国人的创造，值得总结，值得珍惜。

跨越式发展，超常规增长，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功，也遗留无穷问题。如果我们不抱成见观察**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思想界关于发展，关于中体西用等问题的一系列讨论，尤其是郑观应等一批来自实业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们就应该相信那时的中国人并没有躺在三十年跨越发展成就上不思进取，而是谋划着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可惜，历史没有给那代人留下足够时间，**1894年**一场局部的中日冲突，将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扫而光。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进入维新时代，过去三十年管控过于严厉的社会得以释放，新的社会阶层得以发生，社会空间得以打开，维新、变法，成为中国人最乐于谈论的问题。短短几年，中国社会在变化，即便仅仅从经济增长方面说，**1895**年之后的速度、质量，远远超过先前，过去几十年无法建设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山，都因中国有了新思路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再往后，经过**1900**年的义和团、**1901**年《辛丑条约》的强烈刺激，中国开始在政治改革上迈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国终于步趋东西洋各国，走上立宪道路，试图以君主立宪重构中国社会。应该说，这是中国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现代化道路之后最重要的觉醒。

焦点：革命与改良

历史学界对近代史的重新表达，是生活的恩赐，是时代的必然。西方历史学者在谈到历史学的性质时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曾经引起巨大争议，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历史学家之所以对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历史问题感兴趣，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识中意识到这个问题远比那个问题更重要。这就是近代史学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寻找近代中国发展主线的深层思想根源。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历史视角进行观察，虽然与洋务三十年有根本性质不同，但凭借国家主义优势，学习西方，埋头发展等，还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处。这不是说改革开放刻意模仿了洋务新政，而是说这两个历史阶段具

有高度相似性。

相似的道路总在提醒人们注意历史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灵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务不仅没有让清朝顺畅发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务终结时，萌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革命思潮、运动，这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无疑具有正当性；但对于清朝来说，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毕竟是一种不该发生的悲剧。**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这两个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近代史学界也在过去几年投入相当精力，组织一批很有意义的活动。

人们在讨论清亡教训时都注意到了革命与改良赛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

甲午战后，中国并没有在改革上犹豫、蹉跎，中国几乎在没有经过任何争论的情形下轻松转轨，放弃了先前畸形发展方略，以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为主轴，引领中国步入一个全新的维新时代。从**1895**年起，短短三年时间，中国面貌大变，如果仔细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这个判断。

从**189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政治上是焦虑迫使领导层走上了激进主义轨道。欲速则不达。中国经过几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确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宪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实事求是说，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对的，所以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经过一个短暂高潮，立马陷入困境。此后几年，革命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成功的几率越来越大。到了**1911**年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黄花岗孤注一掷，革命基本上到了尾声，清廷主

导的政治改革已经可以远远看到胜利的曙光，一个古老的中国即将实现华丽转身，在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

难点：怎样剥离既得利益者

在过去几年，近代史学界谈论最多的是改良最终没有跑赢革命，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到了最关键时候，还是不期然验证了孙中山、革命党的预言：清廷主导的改革缺乏真诚，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迟了革命的爆发，但最终还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历史，革命则在等待中迎来了机会。

研究者对于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不无惋惜，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场充满希望的改革归于失败？

几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宪政进入落实阶段的第一个举措，清廷发布的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让社会各界，特别是让立宪党人跌破了眼镜，失去了信心。宪政本来就是在宪法框架下的权力分享，皇族、贵族在这个体制下如果还有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模范的国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范者，此外，还可以是时尚引领者，唯独不能做的，就是从事政治的优先权、违法的豁免权。这是宪政国家皇族、贵族必须遵守的规则。

然而，或许是因为中国立宪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许因为新政治家的养成还有一段时间。总而言之，一个充满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内阁名单弄得灰蒙蒙。

十三个内阁成员竟有九个来自皇族或贵族，这是无论如何无法解释的失误。知错改错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见纷呈之际大胆纠正，像严复后来所说的那样，将袁世凯的责

任内阁提前几个月，那么，皇族内阁引发的政治风波不过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遗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军，连同六个省的新军揭竿而起进行抗议，清廷主政者依然不为所动，不愿废黜皇族内阁，改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直到中央军——北洋六镇——滦州发难，清廷方然醒悟，下诏罪己，宣布罢黜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筹组新内阁。迟来的机会还是机会，这一个回合虽说让朝廷在信誉上损失巨大，但总算在关键时刻侥幸过关。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凯内阁建立，中国的宪政改革起死回生，机会重现。宪政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怎样将不完全选举的资政院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会。

按照预备立宪规划，资政院两百名议员有一半来自各省咨议局，他们是经过严格选举进入的。另有一半为钦定议员，他们由朝廷指定，分别来自实业、学界、皇族、贵族，以及

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实业、学界及各部院行政长官共五十二名交给各地重新选举问题不大，出问题的还是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四十多人。这些人当然都属于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们的祖上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天下，在过去两百多年属于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时代天经地义无可怀疑，但到了宪政时代，哪怕这个宪政是君主立宪，皇族和贵族都不便继续享有家天下时代的老办法。南北议和从10月到12月，所争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皇族、贵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何以自处，他们究竟应该对政治承担怎样的角色？

在立宪党人看来，所谓立宪政治，就是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权力放到笼子里。在立宪框架里，根本就不再有皇权之外的特权。然而在皇族、贵族看来，他们之所以斤斤于权力，并不在于权力，他们是要通过对权力的垄断保证大

清王朝不变色。

我们无法断定皇族、贵族的真诚或虚伪，但我们知道，皇族、贵族的坚持，终于使君主立宪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不得已，立宪党人、革命党人、新军将领达成妥协，终结帝制，转向共和，以国体的变更消解君宪的压力，既得利益者最终还是向隅而泣，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却由此前进了一大步。

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为未来中国留下丰厚的思想遗产，随着实践演变，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解读一定越来越接近真相，一定越来越精彩。

大变革时代——缘起、动力及方向

1860年，中国在经历了两百年闭目塞听、二十年两次鸦片战争打击后，痛定思痛，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中国就大致重建辉煌，恢复了中华帝国惯有威风。所谓“同光中兴”，绝不是浪得虚名，而有实实在在业绩作支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军事力量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这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国人实实在在的研究。然而，让中国人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是，一个偶然的局部冲突，竟然将三十年增长真相大起底，中国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

本末与体用

中国三十年增长不敌同时期的东邻小国日本，这让长时期以老大多居的中国很没有面子。中国人在此之前最为自信的是道路选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奉为那个时代不可更易的圭臬。现在，日本人用事实证明“中体西用”可爱不可用，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加分析将甲午战败责任归结为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中体西用”。于是乎，中国在**1895**年不期然改变先前几十年发展方略，转身向东，追随日本，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不一而足。至**1915**年短短二十年，中国走完日本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说清中国**1895**年转身向东是好还是坏。假如我们不是采纳“线性进化论”去看待历史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在**1895**年放弃“中体西用”发展路径非常可惜，因为回望过去三十年，中国并不是真的只变其末

不变其本，并没有完全拒绝外来好东西，更没有坚守传统坏东西，中国在政治架构、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西方不少，短短三十年，中国在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中国不因甲午战争中断发展路径，中国沿着“中体西用”既定方针继续往前走，再过二十年，到**1915**年，中国也应该能够一步一个台阶走上类似日本的路，在政治上有改进有所进步，而且可以减少甲午、戊戌、庚子那样的大动荡。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局部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不再认同三十年举国共识了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上说，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说明洋务新政“中体西用”道路选择的历史依据和所要达成的目标。

三十年洋务新政确实是闷头发财“追求富强”，就是要缩短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这是对

的。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其实就是农业文明的中国怎样添加一个工业文明。这是传统中国不曾有的，无论怎样快速增长都不过分。

问题在于，就像严复后来所意识到的那样，不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国文明，都有本有末，有体有用，不存在只要其末其用，而不要其体其本的情形。中国在末与用增长的同时应该清楚，本与体是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在获得经济快速增长后，一定能够发生全方位的渐变，一定能够建设一个与世界一致而又别致的新国家。假如中国在**1895**年前弄清这些道理，中国理所当然可以自信已有的道路选择。

维新与变法

中国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民族。甲午战败让中国人迅速觉醒，先前争论十多年的问题因战败而不再争论，清政府迅即释放社会，新式报刊杂志、社会组织仿佛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各地官绅主导的地方自治试验，也在**1895**年之后迅速展开，做得比较好的如湖南，短短几年时间就取得了相当成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根据《马关条约》约束，“日本臣民”有权到中国自由办厂，享有进出口优惠。根据列强与中国政府多年前达成的条约体制，中日之间双边约定转化为多边受益，各国资本参照日本臣民的例子，大规模投资中国。中国真正向外国资本打开了大门，迎来了经济建设一轮新高潮。

外国资本自由进入中国，当然有利润考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资本输出。不过对于当时中国而言，积极意义不应低估，先前无法修

建的铁路，无法开采的矿产资源，都在**1895**年后很短时间内启动，这里面主要的就是外国资本的驱动。

对于外国资本，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持积极欢迎的态度，对于外国资本在中国所遇到的困难，中国政府也积极给予解决。但是，由于旧的行政体制、观念约束，中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也有难处。比如，各国对华投资贸易急剧扩大，他们急需在中国沿海建立自己的基地。但是，中国碍于各方面原因，有心无力，理性觉得可以接受这样的要求，但实际上又不敢将土地以租借方式划给外国资本使用。

正像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具有疯狂的本能，只要有值得它疯狂的冲动。马克思的母国德国政府自恃在“三国干涉还辽”中有恩于中国，因而希望中国政府为德国资本找到一个“煤栈”，以方便德国远洋货轮。但是，德国人性子太急了，无法容忍中国的行政官僚主

义。**1897**年底，德国人借着巨野教案一举武力占领胶州湾，引爆了中国社会内部深厚的民族主义情绪。

胶州湾外交危机阻断了中国正在进行的渐进维新，使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不变法，不进行系统的政治体制变革，中国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就不可能获得尊严。于是转过年，尤其是稳健政治家恭亲王奕訢不幸去世，中国的政治变革迅即展开。这就是**1898**年“百日维新”。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一直以为百日维新太激进了，是失败的根源。其实，按照现在的研究，百日维新与稍后相比一点都不激进，百日维新失败另有原因在，那就是康有为等人凭借超人想象以为朝廷中有个冥顽不化的守旧派。为了改革，他们不惜以暴力去化解非暴力政治的变革阻力。不幸，消息走漏，出师未捷身先死，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仓皇出

逃。

以后来的观点回望**1898**年政治变革，我们相信那时各派都期望中国更好，而不是更坏。康有为怀疑朝廷有个守旧派，其实，在很多时候，适度守旧并非一件坏事。

新政、宪政与君宪

从维新到变法，改革的动力就是为了中国更好，只是机缘巧合，中国不是做得更好，而是更糟。

1898年秋天政治逆转改变了中国发展方向，先前几年对外部世界的坦然被种种忧虑所替代。而且，**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规模、无限度进入也确实衍生许多问题，大开发，大开

挖，确实让相当一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战争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不会发生了，政府也就大胆遣散了军队。这些离开土地的军人虽说本质上就是农民，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土地，他们在城乡之间流浪、游走。到了**1900**年春天，终于在华北爆发了大规模冲突，导致八国联军进中国。

义和团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政府在列强要求下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在观念上与世界一致，所以《辛丑条约》签订前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政治变革，以地方自治、司法独立、新教育发展为主要内容。应该说，**1901**年开始的新政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其在中国政治上的积极意义不应低估。

1901年新政触及到了政治改革，但是这场改革依然局限于政治的末节，并非制度根本，因此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中国官绅眼见着日

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打败欧亚大陆两个庞大帝国，真的是不寒而栗，惊慌失措。

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1905**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看来，清政府已毫无希望，中国人应该像俄国人那样觉醒，那样革命，推翻清廷，重建中国。

日本在日俄战争的胜利，俄国紧接着发生的变革，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流亡在全世界的中国革命党人在那一年汇聚东京，朝圣般地学习日本，发誓改变中国，不惜代价。

革命高潮，日本的胜利，俄国的变革，也在影响清政府。在家天下体制下，也不能说清廷统治者对未来前途不考虑。形势比人强。清廷派出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秋，以宪政为主导的政治变革迅速推进。

应该承认，中国人自从甲午战后开始探索，直至终于承认君主立宪是适合中国的政治选择。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就是将君主的权力用宪法去约束。**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确了这些原则，按照规划，经过九年时间逐年筹备，一个与东西洋各立宪国大致一致的政治架构就会从蓝图变成现实。

遗憾的是，《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当年，强势领导人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之中相继去世，接替他们的是摄政王和隆裕太后。如果仅从年龄上说，摄政王、隆裕太后组合比慈禧太后当年与恭亲王搭档的叔嫂组合还年长，但在任何人看来，摄政王、隆裕太后这个组合都是一个弱势班底。

弱势班底没有办法掌控政治变革的大局，很快摄政王被迫同意立宪党人缩短立宪年限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计划政治”的约定与规则，为后来的变数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使复杂

的政治变革变成了儿戏，既然九年立宪的约定可以缩短，那么为什么不能立即立宪呢？

弱势的摄政王叔嫂组合没有办法回应立宪党人的要求，也没有办法掌控皇族和满洲贵族。**1911**年，当政治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原本值得庆贺的第一届责任内阁，竟然被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摄政王并不认为皇族内阁以及稍后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错了，所以全国混乱僵持了大半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流血，直至湖北新军发难，方才有机会打破僵持。

按理说，南北和谈仍给清廷留有机会，但是僵持到最后，满洲贵族依然在权力分享上不愿继续妥协。国体变更，走向共和，成为**1911**年底中国唯一的政治选择，清帝退位，创建民国，两千年的帝制竟然如此轻松成为过去。

然而，两千年的帝制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结束，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度也不是那样容易确立。但在经历了共和之后重回帝制，更是死路一条。所以等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短短一百天，就将自己送上了绝路。

袁世凯帝制复辟引起了中国知识人沉痛反省。**1915**年，陈独秀等人发现，如果不能建构一个新的思想文化基础，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于是，陈独秀等人创办《新青年》，一个全新时代就此开始。

1895—1915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三峡”的一段。二十年大变革浓缩了中国历史几千年，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细细思索，认真总结。

章太炎与新史学

中国士大夫向来有立言传世的传统，但千百年来却没有几部精心建构体系的精致之作，更没有制造思想体系学术范式的野心和尝试，即便学术成就如郑玄，如韩愈，如二程，如朱熹，他们留给后世的大都是感想是随笔，稍有建构体系野心的如刘勰、如刘知几、如章学诚，也不过比郑玄、韩愈等略强些，留有《文心雕龙》、《史通》和《文史通义》等。直到近代，到章炳麟出，方才出现构建体系营造范式的野心，其代表作就是那部影响深远的《诂书》。

章炳麟生于**1869**年，卒于**1936**年，浙江余杭人，初名学乘，字枚叔，后因仰慕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为人，改名绛，号太炎。章氏家

族有着几百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家业，所以章炳麟的童年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初有他的外祖父引领他阅读传统典籍，后因其患有癫痫而与科举考试绝缘，得以自由阅读，较之同时代同龄人整天忙于科举考试无疑学到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巨大。

稍后，学有所成的章炳麟遵从乃父遗命拜大学问家俞樾为师，入诂经精舍，在那里他又潜心攻读了七八年之久，等到**1897**年离开诂经精舍步入社会，章炳麟**28**岁，已经实打实地下过二十多年苦功夫，而且不带任何功利目的，这是同时代甚至易代学者都很难具备的条件和机遇。

由于在诂经精舍的日子里就与东南半壁学术界多有交往，结识一批学术界大佬或新秀，章炳麟的学问和识见也在业内早有传闻，所以他步入江湖的第一站就是到梁启超主持的《时

务报》做编辑，这是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比较向往比较羡慕的。

在《时务报》，章炳麟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一大批维新志士，他的才华也受到许多维新志士的欣赏与推崇，只是章炳麟性格太孤僻，他实在看不惯康有为摆谱以圣人自居，看不惯康门弟子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为此他与康门弟子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不惜接着酒劲发生肢体冲突。

《时务报》的编辑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此后几年，章炳麟辗转武昌、杭州和上海，先后在一些新式团体或新式报刊中任职，大要都是传递新思想新学术，俨然成为维新时代思想家和新派学者。

孤僻的个性和学问上的自负使章炳麟无法与同侪普遍友好相处，除了几个能够高度容忍他的独特个性给予宽容的朋友外，章炳麟在很

多时候其实很孤独，当然由于他的个性和自负的学问，特别是他毕竟得过癫痫病，因而许多人对他的怪异言行见怪不怪，不过冷嘲为“章疯子”而已，大多时候相安无事。

疯疯癫癫的章炳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疯癫，在思想上在学问上，章炳麟确实不让人。在那几年，章炳麟在与各方激烈争辩争斗的同时也潜心写作，一大批有洞见有学问根基的论文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译书公会报》等发表，这就是稍后结集为《诂书》的基础。

《诂书》的结构就是一部论文集，只是这部论文集比较别致，从结集之初就考虑到结构，考虑到了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如果从**1897**年章炳麟踏进《时务报》报馆算起，至**1916**年前从《诂书》改编成《检论》，这个过程前后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有**1900**年时的木刻初刊本，稍后又有手校本；**1904**年在日本出

版铅字排版的重印本，至《检论》全面写定，中间所收篇目，各个篇目的具体内容甚至文字，都有大幅调整或改动。这个过程过去被研究者视为“从《馗书》到《检论》”一个复杂的结集过程，强调其间隐含着非常复杂的思想演变轨迹。

如果从思想史脉络说，《馗书》初刊本问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局面急剧动荡的一个非常时期，从**1895**年开始的维新时代到了**1898**年的政治变革达到顶峰，但是稍后就遇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谋划用武力挟持慈禧皇太后向光绪帝让权的事情。这个计划不慎败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这个故事的真相在当时其实是很清楚的，但由于康梁等人是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而清廷因为甲午战败而陷入一个道德困境，现在又因权力冲突杀死六君子，因而维新志士自然占据了道德高地。

对于清廷内幕新闻，章炳麟究竟知道了多少是很值得怀疑的。但经过**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章炳麟暂时放弃了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分歧，以同情的态度批判清廷，尤其是批判慈禧皇太后，接受康有为的想象，以为那位可怜的小皇帝可能还是不错的，值得利用，建议将光绪帝视为中国的“客帝”，不要太折腾中国的政治架构，让中国平稳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形态上。

章炳麟的“客帝”说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他那时还没有走上革命走上排满的象征，只是他所期待的“客帝”即那个小皇帝在经过**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一惊一乍之后真的病倒了，此后一年，中国政治进入一个非常麻烦的动荡期。就在这个动荡期，章炳麟整理出版的他的第一部作品《馗书》。所谓“馗”，就是不得不说的意思。可见章炳麟对这本小册子是怎样自负。

《馗书》初版本是由梁启超题写书名的，由此可知章炳麟先前虽然与康门弟子有冲突，但可能与梁启超还没有闹翻，或者因**1898**年中国故事而再度成为朋友。这个初版本列目**50**，最早的《明独》写于**1894**年，最迟的写在出版前。**50**篇作品中的《儒墨》、《儒道》、《儒法》、《儒侠》、《民数》、《平等难》、《喻侈靡》、《东方盛衰》、《蒙古盛衰》、《客帝》等**11**篇曾经在《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经世报》、《昌言报》、《清议报》上发表，只是在辑入《馗书》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大致为文字润饰、译名改写，增补新资料等。

初版本的印数不会太多，但出版不久却又出了一个增补本。这个增补本对于原有**50**篇并没有删改，只是在书末以《馗书补佚》的形式增加了《辨士》和《学隐》两篇文章。这两篇不见于目录，其页码也与全书不连贯。

从思想脉络看，《馗书》初版本表明章炳麟的思想还处在与“尊清者游”的状态，尽管发生了**1898**年政治逆转，章炳麟的思想好像还停留在那个维新时代，他在初版本中保留《客帝》等作品，表明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发排满革命的思想。

思想家的思想有时走在时代前列，更多时候其实就是时代的反映，几个被反映的事件真相并不一定准确并一定对，但思想的变化在很多时候都在政治变动社会变化的后面。章炳麟在**1898**年及其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绝对相信康有为、梁启超对政治逆转的一般判断，以为这场逆转的根本原因就是清廷内部慈禧太后不满意于光绪帝的独断专行，于是在**1898**年之后，皇太后总想着废黜光绪帝，重立新帝。**1899**年的大阿哥事件，其实就是慈禧太后这个想法转为政治实践。

其实，这些想象是不对。一百年后重新翻

检当年的记录，小皇帝在那一年确实病了，在此后一年间清廷高层鉴于光绪帝的病情，鉴于光绪帝已经不能生育的事实，开始为他寻找继承人，至少可以在光绪帝病重的时候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这就是“己亥立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阿哥事件”。

从善意去理解，为光绪帝寻找一个继承人慢慢培养，即便这个大阿哥将来接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不仅因为光绪帝总会生病总会老去，而且即便从光绪帝不能生育，必须培养接班人的立场说，也是一种正常行动。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朝野之间缺乏起码信任，外国人也不明底里，再加上皇族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比如主管外交事务的皇族庆亲王奕劻似乎对于皇族会议选择了端王的后人心有不满。于是乎，内部纷争闹成了外部冲突，原本只是民间活动的义和拳、大刀会等被利用，中国政府与外国之间的僵持也在升级在恶化，

终于演化成**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

在这场因内政而引发的外部冲突中，章炳麟并没有闲着。他先是与孙中山等人一样，想到策动两广总督、汉人高官李鸿章反正，重建汉族人的国家。当这个希望近乎破灭之后，章炳麟又和容闳、严复、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继而剪取象征着清朝顺民的辫子，由与“尊清者游”走上排满革命，正式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建立联系。至此，章炳麟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动，并很快在《馗书》修订本上有所反映。

《馗书》修订本的整理出版时间还有争论，但在与邹容结为兄弟之后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新版本不仅在篇目上有很大调整，而且其封面题字也由梁启超而换成了邹容。

这个新版本有“前录”两篇，一篇是《客帝匡谬》，另一篇为《分镇匡谬》，表明章炳麟

已经正式放弃“客帝”思想，不再认清廷为合法政府，也同时放弃了对汉族高官特别是地方督抚大员走上地方自治的期待，不再对清廷抱有任何幻想。

除两篇《匡谬》外，修订本收录作品**63**篇，初版本的篇目有保留有调整，也有增补。大致上说，《廋书》修订本更多地强调了学术性和经典性，呈现出作品构建独特学术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这对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史学转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着重要启示。

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清楚章炳麟的外语能力，尽管他在那个时代也曾与他人合作翻译过一些东西学作品，比如《社会学》。但他的外语工具肯定没有办法与留学西洋的严复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炳麟对东西学的理解似乎不在严复之下，他和严复、梁启超等人在这方面大约不相上下。但是如果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传统转型这个学术脉络中进行考察，我们不

难发现章炳麟的贡献远在康有为、严复及梁启超之上。

章炳麟将他所理解的东西学具体运用到了中国学术的整理上，并由此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体系，他既是传统中国学术的终结者，又是现代中国学术成立的开启者，他不是像严复那样将西方思想文化一般性地传入中国进行鼓吹，而是将这些西方的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学术的具体分析重新解读上。《馗书》中的许多篇章比如《原变》、《原人》、《族制》、《公言》、《颜学》、《王学》、《订实知》等虽然讨论的问题还是传统中国学术的旧问题，但由于章炳麟将达尔文的进化论、生存竞争等理论不动声色地运用到了里面，因而他在这些篇章中得出了与传统解读很不一样的结论，对新史学的发生具有重要启导意义。

按照章炳麟的解读，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都是由微生物进化而来的，进化的动力就

是生存竞争，这种竞争既有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与物种之间的竞争。人与其他物种的差别在于人能群，即能够组成社会，因而人类能够在各种生物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章炳麟的这些解读除了达尔文的影响外，很明显也具有荀子、韩非等中国古典思想的印痕，所以比较容易被新知识分子所接受。这对于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至关重要。

章炳麟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与人物树立了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既不是中国史学的正统与异端，也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现代价值理念，而是一种更加实在的情理分析的层面。这是《馗书》对后来新史学的深刻影响之一。比如在对儒家以及孔子等人思想价值的分析方面，章炳麟在《订孔》、《原学》、《学变》等篇中，将孔子视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大历史学家，以为孔子对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不是什么先圣什么至

圣，而是整理了《春秋》，启发了诸子，既保存传播了古代文化，也为后世思想的开启准备了一定的条件。由此，章炳麟又对儒家之外的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游侠等进行系统研究和阐释，重新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思想史脉络，胡适后来的《中国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以及等而下之的各种思想史、哲学史，其实都带有很明显的章炳麟思想印痕，都或多或少与《馥书》中的诸多篇章有着直接间接的关联。所以如果说胡适等人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具有现代史学典范意义的话，那么这个典范的起点其实应该从《馥书》中去寻找。

在现代中国新史学构建方面，《馥书》还有一个重要示范，就是将西方刚刚兴起不久的文化人类学理念运用到中国史学研究上，从体制、方法等方面彻底改变了传统史学叙事、资政的简单功能。在《馥书》中的许多篇中，比

如《序种姓》、《族制》、《方言》、《订文》等，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详尽考察了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及其各自的历史脉络，明确提出了“历史民族”的范畴，这不仅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影响，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历史不再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和英雄事迹，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逐渐成长的过程，从那里可以看到民风民俗社会教化的演化，可以体会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民族智慧甚至是体能、体制方面的变化。章炳麟在《馗书》中的这些研究或许还非常幼稚或浅薄，但无疑为后来的中国史学开启了新通途。

《馗书》在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新史学建立方面贡献巨大，其及门弟子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以及三代弟子范文澜、周予同等，其实都是参照章炳麟的《馗书》构建各自的学术体系，只是由于《馗书》文字太过古

奥，晦涩难懂，除了章门弟子口耳相传深得要旨外，别人很难弄清《煊书》的价值和意义，更没有办法像胡适等新派学者那样聪明地利用这笔学术资源。

蒋廷黻论近代中国外交

进入近代，东北亚一直成为中国外交的难点，始终困扰，甚至牵制着中国。东北亚问题的症结在如何看待朝鲜，中国只有弄明白这一点，才能找到解决东北亚外交困境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外交史专家蒋廷黻的一些论述最具启发意义。

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朝鲜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的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朝鲜放弃闭关自守政策，想方设法诱导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

友好条约。

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朝鲜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的大国均势似乎形成。然而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朝鲜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的分析主要有两个：

第一，朝鲜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的时候，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主国对藩属的观念。朝鲜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朝鲜，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朝鲜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的侵略。朝鲜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

光绪十年，德国驻朝鲜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朝鲜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朝鲜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朝鲜的现状。而朝鲜内部的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的局势日趋复杂。

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朝鲜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的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

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和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朝鲜，以免朝鲜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朝鲜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的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将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

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的阴谋得逞独占朝鲜，将损害俄国的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的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了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朝鲜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却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

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的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

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朝鲜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失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的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的夹攻和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一是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来承担；二是中国此时的军政太过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至于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像战和这样的军国大事，无论如

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的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的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的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的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在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

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的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

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能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的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所以，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的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

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向日本赎回的。

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混乱派兵侵

占东北。在北京交涉的时候，它又假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的一切权力。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李鸿章末年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

李鸿章去世之后，中国的外交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的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

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之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

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的时候，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大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的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

题，对社会唱高调。因此，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

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的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

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和结论确实有相当的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

近代中日交涉：时机、教训及弥补

中日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合作，亚洲团结、稳定，世界就安宁；中日冲突，亚洲动荡，世界也不得安宁。这是过去近两百年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

相互不信任缘起

如果从历史渊源说，中日是东亚最重要的邻居，有着上千年的交往史。在漫长的岁月中，日本是中国文明的学生，而且是最好的学生。中国古典文明许多重要内容得以保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像日本这样的好学生。礼失

求诸野。古老的中国应该庆幸。

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市场逐步一体化，中日两国都面临着西方的挑战。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犹豫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从剿夷到抚夷，再到学习西方。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耽搁了两百年，中国原本应该坦然面对西方，回应西方，追上西方，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或者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增加工业文明的成分，从传统走向现代。然而，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没有及时回应西方的挑战，或许与自己古老的传统有关，丰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国很难在短时间认同西方。但是，与中国的情形很不一样，日本在过去千年毕竟只是中国文明的学生，他们从中国文明中学的确实不少了，但他们毕竟不是中国，不是老师，还是学生。所以，面对西方的挑战，日本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应，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发誓在远东建设一

个“西方式”国家。应该承认，经过几十年努力，日本做到了，从**1867**年算起，至**1900**年义和团战争，日本就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一个重要成员；而此时的中国，却沦为被大国俱乐部处分的对象。

日本之所以在短短几十年发生跨越式的发展，除了日本转身向西，与世界一流大国同舟共济、坦诚交往、认同世界主流价值“通大道”外，还应该承认日本最好地继承了中国文明中的智慧。在过往岁月中，日本对中国文明进行认真研究，对中国也进行了周密考察，尤其是对中国人并不屑的智慧比如《孙子兵法》，比如三国智慧，比如权谋，比如诈术等，中国人只是一般性地说说，并不信以为真，中国遵循孔子的教导，君子坦荡荡，不屑于阴谋，不屑于诡计，更不屑于诈术。日本则不然，或许是因为岛国生存的特殊忧患意识，日本对这些东西吃得很透，深入骨髓。

中国在过往很长历史阶段中是以王道主义立场看待世界，看待周边。中国信奉儒家文明“以夏化夷”，用王道主义主流价值观影响周边，用文明软实力使四方来朝，文明的疆域和政治的疆域都在这个过程中扩充，因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国人不再屑于玩弄雕虫小技，不屑于阴谋，不屑于权谋。这是中国在两千年不断扩充不断强大的原因，也是中国在近代面对西方很难转型，面对外敌屡屡显得笨拙，显得有点像宋襄公。

应该坦然承认，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世界就是严复所认识的那样，是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要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活下去，就要寻求富强，就要既通人类文明的大道，知道人类文明的方向和未来，也要知道丛林法则，知道小计，知道中国文明儒家精神向来不屑的法术势，知道阴谋、诈术，知道借势发力。

对于这些，应该承认，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做得比老师好。

老师与学生

既通大道，又精小计。这是日本在近代成功的关键。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日本总是在拿中国做试验，用中国智慧对付中国，尤其是在每次重大交涉时间点的选择上，日本绝对不是听之任之随波逐流，总是牢牢把握主动权，甚至不惜以小计刁难、发难。

中日近代交涉第一次出故障，应该是**1876**年的《江华条约》。

朝鲜是中国的番邦，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已

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自从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之后，资本一直有撬开朝鲜大门，打入东北亚的冲动。怎样引领番邦打开国门，走上世界，对于中国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当美国资本准备进入时，中国确实不愿帮忙，也是事实。但是，相信中国一旦完成自己内部整合，一定会对包括朝鲜在内的诸多番邦有一统一规划。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利用清政府洋务新政无暇他顾，在外交上选择孤立主义的时候，曲解清政府宣布的“番国自主”原则，像美国对付日本那样，利用一次简单的事件，软硬兼施签订《江华条约》，与朝鲜构建了另外一种关系，挑战中国在东亚的盟主地位。必须承认，日本在这一次交涉中干得很棒，中朝宗藩关系因日本搅局面临转型。

中国拥有第一流人才和智慧，日本的挑战使中国人看到先前宗藩关系不可持续。中国的

进步与发展不能单兵突破，中国必须考虑周边那么多番邦的利益，这些番邦数百年来追随中国，寻求保护，但西方挑战东方，传统向近代转型时，中国一定要尽最大力量与这些番邦携手共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东北亚抵御日本，以及俄国利用地缘优势对中国的蚕食，对东北亚的觊觎。

此后，李鸿章那一代中国外交家为建构一个稳固的东北亚环境，下力气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引进朝鲜，用“大国均势”抵消日本因《江华条约》发展起来的日朝特殊关系，防止日本对朝鲜的独占，这一方面维护了中国作为宗主国的尊严、面子，对周边其他番邦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也比较有效遏制了日本的野心，维持东北亚和平。如果说晚清几十年对朝政策存在巨大失误的话，必须承认这个时间段的“大国均势”构想及其实践，是最合理的一个阶段。

1882年5月22日，在中国帮助下，《美朝通商修好条约》签字。引美入朝是一个共赢的方案，如果说有谁受到一点损失的话，只是日本再也无法利用地缘优势独占朝鲜。

此后不到两个月，朝鲜分别与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签订相同条约，一个全新的“大国均势”基本成型，日本对朝鲜的独占完全破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主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丁忧回籍守孝。日本人在朝鲜策划了一场兵变，杀害主导构建大国均势的朝鲜实际领导人闵妃，使刚刚成型的东北亚大国均势破局。而恰恰在李鸿章不在的时候，李鸿章的继任者张树声、老部下马建忠无法充分理解“大国均势”的意义，不知怎样在朝鲜半岛与日本人斗智斗勇。马建忠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看到了日本人的目的，但马建忠作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断，竟然以上国身份绑架了大院

君。大院君确实罪大恶极，但他毕竟是朝鲜国王的生父。马建忠的做法挽回了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但从此后，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国均势不复存在，群雄逐鹿东北亚变成了中日对峙。

一千年的师生关系至此移位，由此注定**12**年后的甲午战争。

日本的小计

日本在李鸿章丁忧这个准确时间点达到了一个准确目标。日本这个中国文明的学生确实经此一变改变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从此对日既没有信任感，也没有什么需要谦卑的东西。无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获得怎样的进步，在中国人的眼里都算不上什么成绩。中日关系从

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中日迟早回发生问题，是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看法。

两年后，**1884**年，中国因越南问题陷入南部边陲不得脱身，在战场上赢得了法国，但却不得不放弃越南。中国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北京更近的朝鲜又出了问题。

这年**12**月，日本策划发动政变，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正在南部陷入战争而脱离中国，走上独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是这次政变的幌子，其真实目的让朝鲜投向日本，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为了化解这场冲突，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1884**年在天津进行了一次会谈。这次会谈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发展方向。作为中国的番邦一变而成为中日共管。这为十年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种子。

1888年，慈禧太后让小皇帝光绪即位，经过几年传帮带，慈禧太后定于六十岁时彻底退休，颐养天年，让光绪帝亲政。

慈禧太后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她的退休关乎国家荣誉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慈禧太后或许并不想大事张扬，但从国家、朝廷立场上，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就是大清王朝政治生活中最大的事情，因此进入**1894**年，就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年”，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必将围绕在这件事情转。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间点，日本利用朝鲜内部出现的小问题大事发难，清政府为了荣誉为了内部稳定，情报、决策、兵力布局调度、后勤保障，甚至国际沟通等，一律跟不上。中国既不能为了对付日本宣布中止、暂停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那样的话，中国必内乱。中国就在那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左右应对，日本却利用了这个机会猛攻狠打。战争的结局从开

始就已注定。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的根本转折。这个转折从根本上打乱了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原本可能在洋务新政基础上往前走，在解决了物质的、器械的完美之后一步一步踏上一条君宪主义道路，中国不可能不改变，但中国最不应该的是因外部刺激而改变。中国从此踏上一条激进主义道路。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经历了“二次革命”之后，国内严重分裂，在参战还是不参战问题上争论不休。就在这个混乱时期，日本义无反顾宣布参战。但它并没有立即出兵欧洲，而是发兵中国，抢占山东，从德国人手里夺取全部权益。这件事是现代中国的巨大转折，此后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均与此关联。当然，日本发兵山东值得我们今天检讨的方面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不应该总是让内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可能是中国在建构现代

国家时最值得注意的。

第二年（**1915**年），日本为了让中国政府确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利用袁世凯萌发的帝制野心，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中日撕破脸皮的开始。“二十一条”的关键不在山东，而是日本对满洲、蒙古权益的诉求。此时的中国，内政分裂，根本无法寻求共识，无法凝聚共同抵抗的力量。

经过十几年的混乱、重组，蒋介石在**1928**年大致统一了关内。然而就在这个时间点，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其目的众说纷纭。但从大历史观察，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清晰，此后几十年中日之间的恩怨情仇，都可以在这个重大事变中找到影子，中日交恶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结束。

回望百年中日交涉史，日本总是能巧妙利用时间点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时间点或是中

国发展关键期，或是中国困难时，或是中国格外重视的节点。从国家立场上说，日本的这些做法对中国有极大伤害，也非君子所当为。但是从历史教训说，中国也应矫正自己的政治日程，不能以内政压外交，内政、外交应该建立一种良性联动，而不是恶性互动。不能将自己的软肋总是暴露在外，不能给对手留下可攻击的目标，更不能用党派的纷争、政见分歧为重，甚至利用外交危机实现党争的目的。

在外交上，中国在坦荡荡的同时，也应该适度注意“小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或许应该引起中国人的警惕，不要再以“倭人”视日本，更不能以阿Q心态蔑称“小日本”。日本是“大和民族”，是亚洲的伟大国家，是中国无法搬走的邻居，中日必须友好。中日之间只有重建正常国家关系，亚洲和平与稳定方才可期，中国重建辉煌方才可能。

文化的根本在政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前此中国政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是**20**世纪初中国人精神探索的继续。

辛亥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上的剧烈变动，造成国人信仰的空前危机与混乱，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成为中国人的难题。鲁迅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辛亥革命以后的一系列复辟事件导致新知识分子对政治失望，进而颓唐，他们觉得中国问题的根本可能不在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而在于改造传统文化。旧的文化传统是帝制复辟的

社会土壤，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新的政治体制，就必须彻底打碎旧的文化传统。

然而问题在于，旧的文化传统从何而来？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帝王意识为什么不能随着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而自然消亡？

辛亥革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的帝王专制体制，但并没有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即提出，民主、民族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中国必须尽快转入和平的建设阶段，着手解决民生问题。

孙中山的想法具有普遍意义，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国确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建设热潮，孙中山本人曾期望致力于铁路的建设与开发，黄兴也有解甲归田从事实业的考虑，就连著名思想家章太炎，也在民国初年放弃书斋生涯，致力于东三省的实业建设和边

疆开发。如果不发生重大意外的话，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民国年间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期，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民主共和政体的框架内将得到迅速恢复，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将很快得到改变。到那时，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必将随之而改变，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就自然会随着人们生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

良好的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袁世凯在其执政的第一年，受《临时约法》内阁制的束缚，基本上是在民主共和的框架内处理问题。然而宋教仁血案爆发之后，不仅袁世凯开始“溢出”民主共和的正轨，就连南方的共和党人也不愿继续遵循民主共和的原则去解决问题，他们寄希望于武力。从此，中国政治离民主宪政体制越来越远，武人专制、军阀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他们动辄进行武力较量，中国政治沦为军阀操纵的工具。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把原因归结到文化实在过于天真，并没有找到根治此种痼疾的良药。

事实上，不必用文化为政治家们脱离民主的轨道寻找借口，而应该从政治本身寻找答案。就政治本身而言，辛亥革命之后建立的民主共和体制实质上是和平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各政党都可以在议会进行合法的游说、辩论，以争取议会多数和社会层面的多数。

议会政治的关键在于绝对排斥武力，只要参加了和平的议会政治，任何政党都应交出手中的军队，使军队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政治家手中的筹码。孙中山等革命党的领袖们为民国制定了民主宪法，但他们在宋教仁案发生之后的本能反应不是借助法律的武器解决问题，而是诉诸武力，进行所谓的“反袁”斗争，由此开启**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武力革命之先河。而袁世凯作为合法的总统，事实

上也没有遵守民主宪法所赋予的义务和权力，他期望从肉体上消灭政治上的对手，并利用合法总统的身份命令属于国家的军队为其个人政治利益服务。民初的政治家们都没有遵守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这既是民国初年政治黑暗的根本原因，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之所以会从文化上解决中国问题的直接背景。

政治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只有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其他一切问题才会有转机。如果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即便在文化上来一次革命，彻底否定传统，实行全盘西化，也无法解决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附丽于政治，反过来说，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能促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与壮大，反过来就会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期望二十年不谈政治，期望以二十年的时

间为政治的良性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可能是找错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思想家热衷于组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期望用政治的手段去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可能和他们已经认识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选择并不正确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

目录

中国历史的侧面II：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

自序

第一章 回望历史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清朝倒台的隐动力

晚清立宪

冲动是魔鬼

鉴湖女侠秋瑾

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第二章 直视真相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辫子真相

再谈“东亚病夫”

“支那！支那！”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第三章 深挖内幕

府院之争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是谁赶跑了末代皇帝](#)

[孙中山为什么不准孙眉从政](#)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第四章识破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祺瑞吃素为哪般](#)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附录《孙文越飞宣言》](#)

[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蒋介石的“梅毒脱发”之说](#)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第五章再探谜案](#)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光绪帝死亡之谜](#)

[宋教仁血案从严再探](#)

[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吴佩孚暴毙内幕](#)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

[后记](#)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历史的侧面Ⅱ：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

作者：冯学荣

出版方：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 1月 1日

ISBN: 97875472250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历史的侧面 II：近代史疑案的另类观察

自序

“历史”是一门学问。“历史”这门学问，不但需要举证，而且需要论证，甚至还需要咬文嚼字。正是因为如此，历史需要认真的人来做。问题是“历史”本身，同时又是一个公众话题，而每当“历史”走进公众的时候，则往往会遇到以下的问题：

1.三人成虎。一个历史事件，经过人们一传十、十传百之后，往往其原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

2.猜测臆断。研究历史需要举证，可是当公众谈论历史的时候，人们往往没有严谨考证的习惯，喜欢主观推断，这就难免会使历史“节外生枝”。

3.刻意改编。有不少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图书的作者，为突出一些历史人物的形象更加高大或者更加丑恶，而对历史情节进行了“合理改编”，而一般的民众对于改编之后的历史，往往并不具备鉴别真假的能力。

这样一来，历史就难免以讹传讹，进而失真走样了。

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大量的历史爱好者，开始在网上写史、论史。这本来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许多作者为了使文字顺畅、易读，为了更有利于传播，甚至为了成就自己所谓“自成一家”的影响力，而忽视了原始史料的搜集，而将历史通俗地小说化。因此，在写史的时候，为了迎合读者口味，很多人并没有做到忠于历史的原貌。于是，有一些历史，就更是越发远离事实的本真了。这本书是我多年以

来对一些历史疑案进行思考和查证的结果，算不上什么成果，也谈不上什么结晶，但扪心自问是做到了不预设立场，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努力做到客观、中立，力求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希望本书能给您带来一丝的参考价值，也请您批评指正。

冯学荣**2014年9月21日**

第一章 回望历史

中国近代史是复杂和精彩的，有时又是颠覆的，这里的讲述，与我们记忆里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绝非一般历史书上的忠奸两列、黑白分明。作者让那些我们曾经熟悉的故事再次拥有震撼人心的温度与力量，激发思考，助力当今，彰显历史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力。

邓世昌和他的“太阳犬”

在甲午海战当中，邓世昌抱着他的爱犬一起沉入大海，这件事情到底是否真实？时过境迁，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已经很难还原事件原貌。当然，这也丝毫不影响邓世昌的英雄形

象.....

1894年9月17日，甲午战争中的中日“**黄海海战**”爆发，在战斗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英勇杀敌，无奈“致远舰”中弹爆炸，**邓世昌**落水殉国。

在不少的历史读物中，关于**邓世昌**在 **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殉国的一幕，是这样描述的：

“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被日本海军发炮击中，正在下沉，**邓世昌**愤而跳入海水，当**邓世昌**浮在海面上的时候，他的‘**太阳犬**’游了过来衔住他，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把他的狗按了下去，双双一同沉入水中，壮烈殉国。”

也就是说落水之后，**邓世昌**的爱犬游了过来，要救他，可是**邓世昌**决心殉国，于是他按

住了自己的爱犬，双双沉入水中溺亡……可是，邓世昌这个“按狗共沉”之说，是否真实？我想，还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料吧。首先，我们看看，书上所说的“按狗共沉”之说，出处是哪里？有一个出处是邓世昌殉国之后出版的《点石斋画报》，读者注意，这是一本画报，不是一本严肃的史学著作。

这本《点石斋画报》，报道了邓世昌落水之后拒绝战友抛来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并按住自己的狗一同沉入海水中，壮烈殉国。这份画报还配上了一幅想象的插图。

《点石斋画报》所描述的这一幕，有一点似乎是违反物理定律的：邓世昌落水后，如果没有救生物，如果他执意求死，则必然是迅速沉入水中，似乎并不可能凭空漂浮于水面良久，并完成了以下一系列的动作——摆手拒绝战友的救生圈，喊救国口号，按住自己的狗。

那么，《点石斋画报》的报道，又是来源于什么资料呢？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点石斋画报》只是一份画报，并非严肃的史料，不足以成为信史，更不能成为写史的依据。

于是，我们再来看看，李鸿章当年给朝廷的关于邓世昌殉国的报告：《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

李鸿章的这份报告，是这样写的：

“.....其力战阵亡之管带、大副等，自应先行奏请抚恤，以慰忠魂，致远管带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中军中营副将噶尔萨巴图鲁邓世昌.....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拟请旨将邓世昌.....交部从优议恤，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沉，忠勇性成，一时称叹.....”

李鸿章在奏折里对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描述，翻译成现代汉语总结后是如下的意思：

“邓世昌落水之后，被战友救了上来，但是，邓世昌说：‘整只舰艇都沉没了，我没有独自求生的道理。’说完，邓世昌重新跳入海中自沉身亡。”

读者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李鸿章不是现场见证人，他的奏折所述，要么出自部下的报告，要么出自自己的猜想。

2.李鸿章这份奏折是要建议光绪皇帝从优抚恤邓世昌，为了这个目的，当然是将邓世昌之死，写得越壮烈越好。

3.邓世昌是李鸿章的部下，邓世昌殉国越壮烈，李鸿章的脸面越有光，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已经没有脸面对朝廷，唯有奋力描

述自己部下将士的忠勇，以向皇帝表明：我已经尽力了，我的部下们也已经尽力了，这次打败仗，实在不是我的责任。

从这样的动机和背景看来，李鸿章奏折里面所描述的邓世昌殉国过程，是不能完全置信的，至少不能独自成为信史，而必须有待佐证。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当年北洋舰队老兵的说法。

知名历史学者戚其章，在其所著《北洋舰队》中，收录了两份描述邓世昌殉国过程的水手证言，其中一份是“来远舰”老水手谷玉霖，他是这样说的：

“邓管带（邓世昌）见致远（舰）行将沉没，不肯独生，愤然投入海中，他平时所养的爱犬鸣叫，急跳入海中救主人，转瞬间衔住邓

管带的发辫将他拖出水面，这时，搭救落水官兵的鱼雷艇也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管带用手示意，不肯苟生，跟狗一起没入水中。”

可见，依据这位老水手谷玉霖的说法——是狗将邓世昌“托出水面”的。

可是，一只狗可以用它自己的力量游泳救出一个大男人，这只狗需要有多大？它需要有多大的力量？如果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它又何必至于被邓世昌抱住沉入水中而挣脱不了邓世昌？这二者恐怕是矛盾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谷玉霖是“来远舰”上的水手，而邓世昌是“致远舰”上的管带，换言之，谷玉霖并不在“致远舰”的事发现场，可见，这篇证言所讲的，只是谷玉霖听来的，而不是自己亲眼看到的。

我们再来看看北洋水师“来远舰”的另一位老水手——陈学海的证言：

“邓船主（邓世昌）是自己投海的，他养的一条狗叫太阳犬，想救主人，跳进水里咬住了邓船主的发辫，邓船主看船都沉了，就按住太阳犬一起沉到水里了。”

可是，陈学海也是“来远舰”上的水手，也不是“致远舰”沉没现场的见证人，他的说法和谷玉霖一样，应该也是听来的。

我们再看《清史稿》。

《清史稿·列传二百四十七·邓世昌》对邓世昌的殉国过程，描述如下：

“……锅船裂沉。世昌身环气圈不没，汝昌及他将见之，令驰救。拒弗上，缩臂出圈，死之……”

《清史稿》这篇邓世昌殉国记，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

“.....致远舰的锅炉爆炸，舰艇下沉，邓世昌抱着一个救生圈，没有沉没，丁汝昌命令其他战友去救他，邓世昌拒绝上船，将身体缩出救生圈，沉海殉国.....”

可见，《清史稿》的这篇记录，则大不一样：这里的邓世昌，首先是抱着救生圈，暂时还没想着要死，见到战友来救自己，才突然想起自己要殉国，于是，邓世昌猛然挣开救生圈自沉殉国。

而至于他的那爱犬——太阳犬，在《清史稿》里面并没有出现。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份证言：

当年在“镇远舰”上当大副的美籍清军水兵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事后写了一篇

回忆录，名为《**The Battle of the Yalu**》，中文可译为：《鸭绿江边的海战》。

马吉芬在其文中，是这样讲述邓世昌的殉国过程的：

“Captain Tang had a large dog of a most vicious temper, unruly attimes even with his master.After the ship sank Captain Tang, who could not swim, managed to get to an oar or some small piece of wood-enough to have supported him had not his dog swum to him, and, climbing upon him, forced him to release his grasp and thus miserably drown, the brute sharing his fate-perhaps the only case on record of a man drowned by his dog.”

马吉芬的这段描述文字，我将它翻译成中文如下：

“.....邓（世昌）管带养了一条最凶的那种狗，有时就算是邓在场，它也很凶。邓不熟水性，舰艇沉没之后，他抓住了一根不知是橹还是一根什么别的木头，刚好能使他漂浮在水面，后来，正是他养的这条狗，向他游过去并扑到了他的身上（狗也想求生），使他抓不住木头了，因此悲催地沉了下去，那狗也是同样的命运（沉没），这也许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狗害死主人的记录了吧.....”

可见，如果依照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则根本就不想死，他当时紧紧抱住了一块木头——这本身就是不想死的典型表现。

不料在此时，邓世昌的狗游了过来，扑到他身上，木头不堪负重，人和狗才一同沉入水中，不幸溺亡。

当然，马吉芬是“镇远舰”上的人，而邓世昌人在“致远舰”上，可见，马吉芬也不是事发

现场的目击证人，马吉芬的证言，一样也是听来的，甚至是他自己想象的，总之，马吉芬的这篇文章，也不能独立成为信史。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邓世昌殉国一幕的“罗生门”如下：

1.《点石斋画报》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拒绝救生圈，按狗共沉。

2.李鸿章的说法：邓世昌是被动落水，被战友救上来，再度跳水自杀殉国，没有狗。

3.谷玉霖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不知有否按狗）和狗一起沉入水中。

4.陈学海的说法：邓世昌是自己跳的水，按下自己的狗，一起沉入水中。

5.《清史稿》的说法：邓世昌本来抱着救生圈，见到战友来救他，突然挣脱救生圈，沉

入水中殉国（全程没有狗）。

6.马吉芬的说法：邓世昌被动落水，抓住了木头求生，狗爬过来，木头不堪负荷，人和狗一起沉入水中。

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邓世昌殉国的具体过程上，《点石斋画报》、李鸿章、谷玉霖、陈学海、《清史稿》、马吉芬六方的说法，都是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那么写到这里，是不是吃饱了撑的？不是。

邓世昌殉国的故事，其实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教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点石斋画报》、李鸿章、《清史稿》等这些记录历史的责任人，没有认真对待历史，他们记录历史，不是从查实的证据入手，而是从道听途说、第

二手资料，甚至第三手资料入手，所以出现了“三人成虎”的现象。

致远舰当年被救的水手不少，只要政府、史学家、学者当时对历史认真负责，则邓世昌殉国的真实过程，不难理清，而当时显然没有人认真去做这个事，结果到了现在，出现了至少六方证言不一致的现状，恐怕回头再要理清邓世昌殉国的真相，似乎已经不太可能了。

这就是邓世昌“按狗共沉”罗生门历史叙述给我们的教训，我想我们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在治史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原始资料、可靠证据出发，不道听途说，不造谣，不传谣，一定要实事求是，只有当我们做到这样，我们才能留给子孙们一部准确的、真实的历史，而不会再发生邓世昌这样的罗生门。

邓世昌“抱狗共沉说”未必真实，但时过境迁，史料不足，而且史料不可靠，目前已经很

难还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吸取“治史要认真”的教训，那么，前事至少可以成为后事之师。

鲁迅和他的日本医生

整个民国时期是西医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里，由于中国西医医生的高度稀缺，也由于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保驾护航，导致了大量的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也客观地导致了一些医疗事故的发生。由于这些医疗事故的主治医生是日本人，所以，日本医生，就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1936年 10月 19日，鲁迅因肺病病死，当时，鲁迅的家属并未对鲁迅的死因提出异议和疑问。但是，多年之后，鲁迅的亲生儿子——

周海婴却开始怀疑鲁迅是被日本医生以“故意拖延治疗”的方式暗杀的。

我们听听，周海婴是怎样指控的：

“.....自（**1936年**）**6月**以后，父亲（鲁迅）的疾病更令人担忧了，六月末的这一天，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五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可见他的病是相当严重了.....**10月 19日**清晨.....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你爸爸没了.....’我急促地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1949年 7月**，叔叔周建人写信给我的母亲，说：‘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是（日本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须藤）的治疗经过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点之一，今您既然在上海，是否可以探查一下，须藤医生是否仍在上海？’.....**1949年 10月**，叔叔周建人在

《人民日报》登报公开质疑须藤医生的治疗……叔叔周建人告诉我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医生邓肯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鲁迅）的胸膜里有积水，要马上抽掉……至少可以活十年，否则活不过半年……’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美国医生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开始抽积水……叔叔（周建人）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和冯雪峰谈过，但是他（鲁迅）仍然赞成须藤医生继续看下去，而搁置了美国医生的建议，结果半年之后，（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后，须藤医生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使用了何种药物等，你母亲（许广平）说这份报告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须藤医生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当时叔叔对冯雪峰讲，现在中日关系紧张，最好不要找须藤医生看病了吧，冯雪峰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须藤）看，大概不要紧吧……’我怀疑须藤是故意拖延

父亲的治疗……”

（周海婴的指控，出自于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54～64**页。）

很显然，周海婴指控是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治死了鲁迅。

读者要注意一点：鲁迅逝世时，周海婴年仅七岁。他当时并不懂事，一切都是事后听来的。

这份并非是唯一的指控书，周海婴在多年之后，又写了一篇名叫《鲁迅之死疑案》的文章，广泛发表在中国各媒体。在该文中，周海婴说：

“……**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

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 **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 **3月 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穿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咳痰为结核菌阴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 23日**查出‘咳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 **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 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两年，达到百多次.....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给鲁迅治病的这个日本医生“须藤”，其全名叫“须藤五百三”。

总结上述的两份指控文，周海婴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1. 鲁迅病重（肺结核）。

2. 周海婴当年七岁，不懂事，对诊疗过程不清楚。

3. 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事后多年才开始怀疑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

4. 须藤五百三是鲁迅聘用了长达两年的家庭医生。

5. 鲁迅相信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的疗法，而怀疑美国医生邓肯的疗法。

6. 鲁迅被须藤五百三治疗了几个月之后，不治身亡。那么，鲁迅原本是怎样得的肺结核呢？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的妻子许广平是怎么说的：

“……我第一次到他（鲁迅）北京寓所访问

之后，深刻的印象是他（鲁迅）抽烟时刻不停，一支完了又一支……满地狼藉着烟灰、烟尾巴……鲁迅的节俭有时让人看不过去，例如抽烟，直至烧手或者甚至烧口，真正没法拿了，才丢掉……我实在太简单……尽买些廉价的香烟供给他……日积月累地做慢性杀害他的事……他生病时，须藤医生忠告他：如果吸烟，吃药是没用的……后来病总算好点，我却又亲自给他用劣等香烟毒害他，这真是我无可饶恕的罪行……”

（许广平的这段证言，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137页。）

从许广平的回忆里，我们看得出来：

1.鲁迅长期大量抽烟，是个“重量级”烟民。

2.而且，鲁迅所抽的是价廉、质劣的香烟。

3.鲁迅抽烟由于舍不得浪费，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有过吸烟经验的读者，读到这里，应该能明白，这种抽烟法，不但抽烟量大，而且抽的还是劣等烟，还常常将整根香烟吸完……长此以往，不得肺病才怪。

我们再来听听许广平女士对鲁迅生命中最后一天的回忆：

“……须藤（五百三）医生来了，给他（鲁迅）注射，那时他双脚冰冷，医生命我们给他敷热水袋，包裹起来……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看见他已头稍微朝内，呼吸轻微了……连打几针，都不见好转……须藤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就没有危险了……我千呼万唤，也不见他（鲁迅）应一声……”

（许广平的这段回忆文字，出自于许广平所著《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我仔细读了这一章，没有发现许广平指控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故意误诊、毒害鲁迅一类的文字。

我们来看看本案的“头号犯罪嫌疑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自己是怎样说的：

“.....鲁迅先生生来就不是健康的体质.....四十岁左右就患了胃扩张病.....四十四岁的时候已经有了肺结核病的初期感觉.....他说吸烟一事要减也减不了，自己无论如何离不开香烟.....到后来，减少至每天抽 **15**根.....我要是知道他去世得这么快的话，我真不该强制限制他最爱的香烟了.....想起来我还觉得很抱歉.....（鲁迅）先生的死，为什么会这样快呢？说起来，是从 **10月 18**日午前 **3**点钟开始，

旧病支气管哮喘发作，呼吸困难，引起心脏性喘息……终于成为不归之客人……”

（须藤五百三这篇自白文，最早发表在**1936年11月15日**版的《作家》第**2**卷第**2**期，而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中，**2000年 12月**第一版，第 **60～65**页。）

可见，须藤五百三认为：

- 1.** 鲁迅是病死，须藤五百三自己已经尽力医治了，没有责任。
- 2.** 须藤五百三曾经强制鲁迅减少吸烟量，鲁迅勉强减少至 **15根 / 天**。

鲁迅在肺结核病重期间，经过须藤五百三的强制性要求，仍然每天至少抽 **15根**香烟，可

见鲁迅在得病之前，其抽烟量该有多大。

须藤五百三在这篇自白文的尾部，还附上了一份《鲁迅先生病状经过》，详细地记录了**1936年 3月 2日至 10月 18日**鲁迅的病情和治疗的过程，收录在上述文献《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的第**63~65**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它。我于此，部分摘录如下：

“.....本年 **3月 2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当时验得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缺乏，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喘息发作之日症状及医治经过如下：循左肩胛上部、右锁骨上下窝及第三四肋间部、胸骨缘深处有似水泡之声响。时作咳嗽，咯痰黏稠，或少或多，发热最高在 **37.6℃**左右，毫无知觉，泄尿无甚异常。右胸背面第 **7**胸椎以下，呼吸之音细微，诊察上肩胛骨下边以下，询问胸膜炎的已往情形，答称并不知道。胃扩

张至胸部之上，不时充满动摇之水声，并无饥饿之感，时常失眠.....午前 3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 6点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脉细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诊听有喘鸣，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其不稳状态亦似稍缓。午后 2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乃 46~ 52之间，脉软弱，110~ 114次 /分钟。体温下降，为 35℃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早晨以来仅进牛乳百公分。右肺喘鸣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声，肋间亦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 19日 5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

侧，延至 5 时 20 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

那么，鲁迅是怎样结识须藤五百三这位日本医生的呢？原来是鲁迅的日本朋友，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介绍的。我们来听听鲁迅先生生前这位好友——内山完造，是怎样说的：

“……当时我立即打电话给须藤医生，须藤医生是鲁迅先生非常信任的医生，也是我十二分信任的具有高尚人格的医生，他答应马上去诊视，我也立即赶去鲁迅家，先生坐在藤椅上非常痛苦地喘息着，尽管这样，先生右手手指间仍然夹着品海牌香烟……我告诉他须藤医生马上就来，他说谢谢，我感觉他说这句话非常的吃力，脸色非常不好……须藤医生握住先生手腕诊视脉搏……须藤劝（鲁迅）先生：‘丢掉香烟吧……’他这才把香烟丢掉，于是，医生给先生注射……第二天早晨，鲁迅先生与世长辞……”

（内山完造的证词，收录在河北教育出版社《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19～122页。）

可见，内山完造在证词里指证：

1. 鲁迅信任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

2. 须藤五百三其人品德并不坏。

3. 鲁迅直至死前，仍然在抽烟。

4. 须藤劝鲁迅丢掉香烟，这是内山亲眼所见的。

5. 鲁迅之死，纯属病死。

读者需要注意，与日本许多侵华者不同，内山完造的确是一个亲华人士，其在战后于东京组建“日中友好协会”，1959年应邀参加“解放

十周年庆典”，受到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而且死在中国并葬在中国。

前些年，具有内科医生背景的浙江鲁迅研究会学者周正章写了一篇《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误治真相》，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背景，分析研究了鲁迅 1936年 5月所拍的 X光胸片、诊疗病历、用药过程，做出了他旗帜鲜明的结论：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对鲁迅肺病的治疗，具有不可推卸的“误诊误治”的医疗事故责任。

这篇文章早已公开，读者不难寻到，其文冗长，而且医学术语众多，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哪怕我读起来，仍然十分吃力，于此暂不摘录。但是，周正章的论文，仍然未能合理解释以下的问题：

1.没有人逼迫鲁迅找日本医生治病，是鲁迅自己信任日本医生。

2. 用现代先进医疗技术的标准，去研判六七十年前的旧时代医生诊病的处方单子，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似乎有待商榷。

3. “误诊误判”并不等于“蓄意谋杀”。而且，须藤医生劝鲁迅“戒烟”，该行为似乎又与“蓄意谋杀”相悖。

4. 须藤五百三认识鲁迅并非一朝一夕。须藤自1934年开始给鲁迅一家当家庭医生。鲁迅自从1936年6月份起，病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须藤五百三“误诊误治”了长达4个月之后，才最终把鲁迅“治死”。如果从1934年初当周家家庭医生算起，须藤的“杀鲁”计划（如有），实施了两年多之久，可谓旷日持久，真有耐心。

5. 在民国时期，肺结核俗称“癆病”。“十癆九死”，当时的肺结核，就是绝症，鲁迅患上肺结核之后，死期指日可待。如果说须藤五百

三明知鲁迅行将就木，日子不长了，还要“迫不及待”故意“误诊误治”，故意把鲁迅“治死”，其必要性和逻辑合理性，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鲁迅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人，也是主张抗战的。**1936**年是中日关系紧张年。鲁迅不应该对日本人丧失警惕。如果信不过日本医生，就不要找日本医生治病。而一旦找了日本医生治病，并因而被治死，那么，家属要么到租界当局报案处理，要么只好怨鲁迅太过相信日本人，还能怪谁呢？

行文到此，我想，如果我们必须要从鲁迅之死一案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的话，依我看来，似乎以下的经验教训，是比较稳妥的：珍爱生命，拒绝抽烟。

清朝倒台的隐动力

清朝的倒台，起于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对清王朝的覆灭，显然是主要的推动力量，但是，人们忽视了：在清朝倒台的过程中，其实“金钱”这玩意儿，也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发展的一股隐动力。

今天，我来谈谈袁世凯和奕劻、那桐、小德张的金钱游戏。

大家都知道，在辛亥革命的战火中，在朝中卖力劝说隆裕太后退位的有许多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是这么几位：奕劻、那桐、小德张。而这三个人，事实上，都是袁世凯养肥的代理人。

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呢？各位看官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民国时代，奕劻的三个儿子分家，在分家的时候，由于财产分配不均，三兄弟吵架说气话，无意中将自己的父亲奕劻在辛亥革命前后收受袁世凯巨额钱财的历史，暴露了出来。对于这一点，我们来听听清廷贵族溥佳的证言。

溥佳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在民国初年，庆亲王奕劻死后，他的三个儿子载振、载搏、载抡请我父亲给他们分家，载搏因嫌分给他的现款太少，就对我父亲说：‘辛亥前各方面所送的金银珠宝就不用提了，光是辛亥革命时，因为隆裕太后迟迟不发表《逊位诏书》，袁世凯为了恫吓她迅速发布，就向祖父（奕劻）和总管张兰德（小德张）每人报效了 **300**万两银子，怎么才分配这么一点呢？’由此可见，接受贿赂，确实是那些权监的生财之道.....”

（资料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溥佳《清宫回忆》。）

载搏上述这段气话，无意中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

1.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给奕劻送了 300万两银子的贿赂；

2.同期，袁世凯也给大太监小德张送了 300万两银子的贿赂；

3.袁世凯送钱的动机，是委托奕劻、小德张帮忙劝说隆裕太后退位。怎么样？这段历史，是不是很有趣？可别以为溥佳记录下来的载搏的话是孤证，同一件事的证人证言，还多着呢。

末代皇帝溥仪，在其所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我的童年》第四节《毓庆宫读书》里面，记录了奕劻收受袁世凯的钱财、劝说隆裕

太后退位并由此断送了大清江山的事情。溥仪的证言，原话是这样的：

“……我（溥仪）理直气壮地说：‘奕劻受袁世凯的钱，劝太后让国，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怎么可以给个美谥，只能是这个：丑！谬！’”

溥仪的这段话，说的是溥仪的父亲载沣主张给已经去世的奕劻一个追封的谥号，也就是所谓的“光荣称号”，溥仪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因为溥仪认为：正是这个奕劻，收受袁世凯的贿赂，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因此这个奕劻，不配拥有一个正面评价的谥号。

不仅如此，溥仪在同一章节里面，还引用了晚清遗臣梁鼎芬在侍讲日记里的这样一段文字：

“……宣统九年正月初七，庆亲王奕劻死。

初八日遗折上，内务府大臣拟旨谥曰‘哲’，上不可……初十日，召见世续、绍英、耆龄，谕曰：奕劻贪赃误国，得罪列祖列宗，我大清国二百余年之天下，一手坏之，不能予谥！已而谥之曰‘密’。谥法考追补前过曰密。奕劻本有大罪，天下恨之。传闻上谕如此，凡为忠臣义士，靡不感泣曰：真英主也……”

我们从转引的上述文字，可以读到作为晚清遗臣的梁鼎芬，有如下的看法：

1.奕劻贪财，断送了大清江山；

2.溥仪拒绝封给奕劻谥号，是英明的。我们继续来读更多的证人证言。接下来的这个证人，名叫恽宝惠，是晚清时期的陆军部主事。恽宝惠认为：

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使隆裕

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恽宝惠的原话，是这样的：

“.....奕劻的灵魂，早为袁世凯所收买.....奕、那之贪污受贿，早已有名，外闻流传，叫他们是‘庆那公司’.....一直到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禅让，亦是以巨数金钱买通内监张兰德（小德张）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而告成功.....”

恽宝惠的这篇证言，名叫《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参见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 65—67页。

再看一个证人：晚清贵族载润。载润对于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这样认为的：是袁世凯买通了奕劻、那桐、小德张，通过这三个人对隆裕太后做了思想工作，最终使隆裕太后作出了退位的决定。我们来读一下载润的原文：

“.....隆裕闻革命军起，唯恐失去太后之地位与享受，初意亦在主战；后因张兰德受了袁世凯之贿，乃劝隆裕共和，谓共和仅是去掉摄政王之职权，太后之尊严与享受依然如故。隆裕信之，遂有逊位之举.....隆裕与载沣皆无治国之才，而奕劻、那桐等人，又只知贪污受贿；袁世凯有见于此，乃极力拉拢奕劻、那桐与张兰德三人，对彼等大行贿赂，以满足其贪财之欲。他一方面利用张兰德哄骗隆裕；另一方面又利用奕、那，挟制载沣.....”

载润的这篇证言，名叫《隆裕与载沣之矛盾》，出自于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7—78页。

还有一个证人：载涛。载涛是谁？载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亲叔叔。载涛对于此事的说法，和上述的证人证言也是相互印证的。

载涛证言的原文如下：

“.....他（载沣）摄政以后，眼前摆着一个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地；而奕劻又是叫袁（世凯）拿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袁又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得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奕劻之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据闻袁前在直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中大小生日所需以及嫁娶妆奁等项，无一不悉予供给。当革命事起，十月十七日北京报纸曾登载，奕劻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详单估计所值在现金万万两以上.....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袁世凯摸清这条路线，专派人密向张（小德张）联络，许以巨额金钱，叫他向隆裕施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省纷纷独立，前敌军队撤不下来，外债无望，饷项难筹，若不答应民党的要求，则革命军队杀到北京，您的生命难保；倘能依从让位，则优待条件如何如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尊荣富贵，袁世凯一切可以

担保云云。奕劻、那桐本来只认得钱，至于清朝封建统治的垮台，并不在他们的心上。他们二人与张兰德里应外合，不由得隆裕不入他们的圈套……这种‘禅让’之局得以成功，可说是全由奕、那、张三人之手……”

载涛的这篇证言，出自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79-83**页，载涛的文章《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我们来听听最后一个证人：溥铨。溥铨是谁？溥铨就是大贪官奕劻的孙子。溥铨作为奕劻的孙子，对其祖父贪污卖国（指出卖“大清国”祖业）的行为，毫不讳言。溥铨的说法是这样的：

“……盖自庚子以来，奕劻即与袁世凯沆瀣一气。他与袁接近，虽意在相互利用，然因其昏庸无能，唯利禄是视，实时时为袁所乘……”

溥铨的说法，可参考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275—276页，溥铨的文章《我的家庭“庆亲王府”片断》。

行文至此，笔者已经搜集了关于此事的八个证人如下：溥佳、载搏、溥仪、梁鼎芬、恽宝惠、载润、载涛、溥铨。综合这八个人的说法，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

1.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袁世凯给奕劻、那桐、小德张送了贿赂；

2.奕劻、那桐、小德张收受贿赂之后，劝说隆裕太后退位，得逞。

也就是说：在清朝倒台的这个过程当中，“金钱”起了润滑剂的作用，是推动这段历史的一股隐动力。

晚清立宪

从鸦片战争开始，接连的战败使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场立宪运动，这场立宪运动到底是欺骗人民的一场虚伪大戏，还是清朝统治者的真正觉醒呢？

笔者的观点倾向后者，具体原因分析如下。首先，清政府立宪运动是自觉行为。也许有不少人认为，清政府立宪是被孙文的革命党逼迫的。事实上，**1905—1906**年前后的时间，孙文在海外流亡，反清革命正处于低潮，并未对清政府构成有效的威胁，朝廷当时也没把孙文一伙真正放在眼内。

清政府之所以立宪，是因为在**1905**年，日本打败了俄国，这件事给予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震撼。清政府认为：日本的胜利，实际上是日

本政治体制的胜利。于是，清政府决定学习日本立宪，动机是稳固皇位、消除外患、弭平内乱。

换言之，清政府的立宪行动，是清政府自觉、自愿、主动的行为，既然是自愿、主动的行为，那么就没有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第二，清政府的立宪运动，有实际行动，并非敷衍。**1905**年，清政府拨出巨额经费，自行决定选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众所周知，在第一次出使过程中，发生了五大臣被吴越（樾）谋刺的事件，出国考察被迫中止。

五大臣并没有因此被吓到，他们仍坚持出国考察，并在回国后，给清政府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应该立宪。于是，清政府在**1906**年下诏预备立宪，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份《大纲》都说了些什么。《大纲》第十条：“皇帝总揽司法权，委任审判衙门，遵

钦定法律行之，不以诏令随时更改。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为准，免涉分歧”。这一条是相当重要的，它将司法权，从皇帝的手上夺走，还给了人民。再看《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一章：

“第二条：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这一条规定了人民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官员的舆论监督，使之不敢肆意妄为。

“第六条：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

这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私产入宪”。

它推翻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旧例，而保护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这一条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十分关键。

“第八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

这一条是说：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不能再肆意加税。税收由法律规定。这一条也相当重要，它使人民对自己生产活动的盈利预期更加精准、更有把握。这将大大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清政府公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换言之，最迟于**1917**年制订宪法。

但是，到了**1910**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并提出了“不开国会，不承认新捐”（类似于美国“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换言之

之：人民要求参政议政。

在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将立宪的期限缩短为 **5年**。也就是说最迟于**1913**年，制订宪法，还政于民。

与此同时，清政府成立了地方咨议局以及中央咨议院。咨议院和各地咨议局，初步完成了选举，并初步发挥了参政议政的职能。其中，在**1910**年冬咨议院第一次常会中，议员提出“剪辫子”的议案，并且获得通过。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也说明了人民参政议政的能量。

应该说作为一个开始，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第三，“皇族内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假立宪”。**1911**年，清政府第一届内阁成立，这次内阁的阁员当中，“清廷皇族占了大多数”，所以这是一个“皇族内阁”，是清政府“立宪没有诚意的表现”。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不是。这一届内阁，先后任职的阁员，一共有

17位，其身份构成如下：

1.清廷皇族：7位。

2.汉族：6位。

3.满族：4位。换言之，清廷皇族人员所占的比例，仅为**41%**，不到一半。我们不能把其他**4位**满族（非皇族）出身的阁员，也算进“清廷皇族”之中。

那么，为什么第一届内阁，不是以汉族官员为主呢？我想各位只要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领会当中的合理性：

1.民主宪政是逐步放开的一件大事，有序渐进，是成熟稳重的；

2.各地革命党和群体事件仍然频发不止，满族统治者没有信心完全放开统治权。

这些分析很难入耳，但是，只要读者将心

比心、设身处地、仔细想想，换了是你，恐怕你也会这样做。凡事都有两面。内阁中虽然满族人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开始有六位汉族大员进入了权力核心。无论你承认与否，这就是清朝的一个让步，也是汉族的一个胜利（尽管是一个小胜利）。第四，人们没有给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完成，就判定立宪是假立宪，有待商榷。退一步而言，就算当时的“皇族内阁”先后任职的十七位阁员全部都是清廷皇族，也不能导出“清廷政府立宪是假立宪”的说法。为什么？因为内阁是内阁，立宪是立宪。清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立宪的时间（先是 **1917**年，后来改成 **1913**年）。换言之，清政府公布的立宪年份是 **1913**年，便产生了以下的逻辑推理：

1.如果到**1913**年，果真立宪并执行，那么，就是有诚意，是真立宪；

2.如果到**1913**年，拒绝立宪或拒绝执行，那么才是没有诚意，是假立宪；

3.如果在**1913**年之前清政府明文宣布反悔，那么也可证明是假立宪；

4.**1913**年，清政府倒台了，所以这个问题变成没有答案了。

这个问题可以打个浅显的比方：我欠你一笔钱，说好后年还你，但是你还没等到后年，你就起诉我，说我没有还债的诚意，法官会怎么判？法官会判你输。道理很简单：后年还没到，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诚意还你钱呢？

同理，**1913**年还没到呢，你怎么知道清朝没有立宪的诚意呢？万一到**1913**年，清朝果真立宪了呢？第五，日本帝国的立宪才是“假立宪”。下面我们看看日本当年是怎么做的。日本天皇在**1876**年发布决定起草宪法的《敕文》，到**1889**年公布《日本帝国宪法》，用了**13**年时间。换言之，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夜之间把宪法搬出来的，而是也

经过了一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大清国当年是效仿日本的经验，设立**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后改为**5**年），也应属于合理范围。

我们再来看看 **1889**年日本制订的《日本帝国宪法》，看看日本的立宪是

不是“假立宪”：

“第一条：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

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的权力是属于天皇的，不是人民的。

“第七条：天皇召集帝国议会，命其开会，闭会，停会，及众议院之解散。”

这一条的意思是：天皇有权解散众议院。

“第十一条：天皇统率海陆军。”

这一条的意思是：日本这个国家的军队，不是人民的，而是天皇的。

“第三十一条：本章（臣民权利义务）所列条规，在战时或国家事变之际，并不妨碍天皇大权之施行。”

这一条更毒：一旦国家不稳定，日本人民所有的民主权利，天皇随时可以全部收回。

“第三十四条：贵族院，依贵族院令所定，以皇族、贵族及简任议员组织之。”

这一条说明：日本的皇族也参政议政。

读者跟我通观日本当年的这部宪法，你会发现《日本帝国宪法》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的统治权、军权，而且还保留了随时收回人民民主权利的权力，而且也保留了日本皇族干涉政治的权力。

总之一句话，如果清政府的立宪是假立宪，《日本帝国宪法》也应是一本虚伪的宪法，日本的立宪也是假立宪。

那对于这样的假立宪，日本人民为什么接受呢？我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懂得妥协：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天皇既然已经大步让出了政权，人民就应该懂得妥协，先接受下来。宪法如有不足的，以后自然有机会逐步修正之。

日本人懂得：当时对于日本来说，国内团结起来大力发展工商，集中国力建设军队，才是最紧迫的事情。而内斗、内战的结果，则只会两败俱伤。推倒重来，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效果不一定更好。

可是，当时的中国人，也许不懂得这些。命运的差别，也许就从这里开始。第六，民族情绪对清政府和国民党，采取了双重标准。有些中国的历史爱好者，对于清政府给出的“九

年预备立宪期限”咬牙切齿，却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建国步骤表示支持。

事实上，国民党的“训政”，就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只不过换一个说法而已。同样的一件事，清政府做了是错的，而换了国民党做，却变成是对的。这似乎也可以称为“偏见”。

还有“皇族内阁”一事，某些历史爱好者不但扭曲了“皇族内阁”人数的真相，而且对蒋家王朝垄断中华民国政权长达 **60年（1928-1988）** 的做法却欣然接受。这叫什么？这也叫“偏见”。

中国有不少历史爱好者看问题的最大毛病就是“情绪化”：只要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错的；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

冲动是魔鬼

1870年 6月 21日，在天津，有一伙人一把火烧了一座名叫“望海楼”的法国教堂，并杀死了 **20名**外国传教士以及侨民，其中主要是法国人，事后，以法国为首的列强大兵压境，清政府急忙派出曾国藩去调查本案，本案最后以清政府处死**16名**中国人犯而结案告终——这起事件，就是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天津教案的前因后果及其发展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人要围攻法国教堂？他们为什么要杀法国神父，并最终发展成对所有白人的无差别杀害？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十分值得人们细

细品味。

要说这件事，首先要从一个条约讲起。

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大清国和法国签署了《中法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约定了和“传教”有关的两个条款：

1.法国人有权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2.法国人在中国犯罪，由法国领事逮捕和审判。

关于这两点，《中法天津条约》两个相关条款的原文如下：

“第十三款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

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向来所有或写、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无论何处，概行宽免。”

“第三十八款凡有大法国人与中国人争闹事件，或遇有争斗中，或一、二人及多人不等，被火器及别器殴伤致毙者，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馆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例治罪，其应如何治罪之处，将来大法国议定例款。如有别样情形在本款未经分晰者，俱照此办理，因所定之例，大法国人在各口地方如有犯大小等罪，均照大法国办理。”

《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法国传教士如过江之鲫纷纷进入中国传教。其中有一批法国神父和修女，在位于今天天津市河北区狮子林街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从事传教事业，这栋教堂，叫作“望海楼”。

那么，法国神父和修女们在这座“望海楼”里面，平时都做些什么呢——做礼拜、发展教徒、讲经唱诗……这些日常的事务就不必说了，与本案有关的，是以下这么一件事：开办“育婴堂”。

在清末那个时代的天津，有不少穷人生下孩子养不起，便将婴儿丢弃，尤其是女婴——在清末的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女婴被丢弃于闹市、抛置于荒野，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当时天津的法国神父和修女目睹了这个现象，他们办起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这些弃婴。

“育婴堂”办起来之后，紧跟着发生了什么呢？紧跟着，开始有一些好心的天津老百姓，他们从城市里、从荒野中捡到弃婴，将弃婴送到“育婴堂”这里来，交给法国神父和修女，进行抢救和抚养。

在这个时候，“育婴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给这些送弃婴来的好心人予以了金钱奖励——“育婴堂”的本意应该是良好的：奖励这些好心人，鼓励更多的好心人将弃婴送来。

收了奖励金的好心人当然是高兴的，他们回家后，往往逢人便说，说自己今天救了一个弃婴，送到育婴堂，法国修女还给了我钱。不料，“送婴儿到教堂有钱收”的事情，立马就传了出去，传得飞快，并传到了一些市井流氓的耳中——这些市井流氓觉得自己“发现了商机”：啊，原来弄一些小孩送到“育婴堂”，就有钱收——你说这钱，是不是很好挣？

当初法国修女给好心人支付金钱奖励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这样做，无意中向社会释放了一个错误的信号：育婴堂“收购”婴儿！

为什么修女没有想到这个呢？因为她们是粗线条的思维——她们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

想这么远。

于是，在天津的民间，开始有一些市井流氓，到处搜集或四处拐骗小孩，将他们送到育婴堂，并欺骗修女们，说：“这个是弃婴，你看，我是好心人，该给我奖励吧？”

修女往往也没多想，循例办理，付钱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法国修女没有鉴别市井流氓的眼力，似乎也没有能力鉴定弃婴的健康程度。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换一个角度去观察，往往能产生不同的理解——法国修女和这些市井流氓“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行为，从第三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怎么看有些像“拐卖小孩”——啊，多么邪恶！流氓和教堂勾结起来拐卖婴儿——人们开始这样想，并开始口口相传。

事情慢慢往更坏的方向发展。

6月来了，天气逐渐转向炎热，病毒开始逐渐活跃，一些不知名的瘟疫，也开始流行。

“育婴堂”里的法国神父和修女，虽然干的是一种自认为是收养弃婴的伟大事业，但是当时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条件毕竟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很多弃婴本身被抛弃就是因为身上有先天性的疾病，所以，接下来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一些婴儿夭折死亡，要么是死于瘟疫，要么是死于先天性疾病。

数十名婴儿死亡了。

这部分婴儿死亡之后，神父和修女花钱聘请了丧葬工人，将夭折的婴儿埋葬。不料，丧葬工人收了钱之后，为了节省成本，将掩埋死婴的事情，做得十分马虎——往往是几个婴儿挤压到一副棺材中，直接挖一浅浅的小坑儿，

埋下了事。说到这里，笔者不得不指出：法国神父和修女，犯下了第二个错误：没有严格监督丧葬工人安葬死婴的工作。死婴被草草掩埋之后，由于坑儿实在挖得太浅，野狗在半夜里嗅到气味，纷纷跑过来，并将死婴们刨出来吃掉。

到了天亮的时候，野狗没吃完的死婴残肢，暴露在天津老百姓的眼珠子底下，这些老百姓并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于是他们开始猜想：教堂杀了小孩。

“教堂杀小孩”的说法传开去之后，其中有人跑到教堂的窗户边上偷看：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看到了什么呢？结果看到了一大瓶的“眼珠子”，圆滚滚的——实际上事后查明：那些不过只是神父和修女腌制的一大罐洋葱头。

这下就不得了了。“教堂拐卖小孩”、“教堂

杀小孩”、“教堂里有一大罐眼珠子”。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在天津的部分群众眼中，东拼西凑，组合成了以

下一项严重的指控——“教堂的洋鬼子杀中国小孩、采眼挖心，用来制药”！“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个谣言很快就插上了翅膀，在天津卫飞快地传播开来，一传十，十传百……谣言一起，激起了巨大的民愤。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在查处一起拐卖婴儿的案件中，有嫌疑犯供述是教堂指使——这本是嫌疑犯的自我脱罪之词，但是，官府没有对此严加查证，便张贴告示，给群众传达了误导性的信息。

教堂里的法国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咋办？随他们吗？不能！那怎么办？到教堂去找洋鬼子讨个说法！于是，**1870年 6月 21日**，数以千计的人民群众将天津“望海楼”围个水泄不

通，群情汹涌，大家伙要求神父出来，给个说法——为什么要杀害咱中国的小孩来制药？

误会，加上语言不通，围困教堂的人民群众开始和教堂里面的神父、修女以及信徒发生了口角，并开始投掷石头。

在这个紧急关头，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了——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

在丰大业看来，这是中国人无缘无故围攻法国教堂，这是中国人“赤裸裸地欺负”法国人，此时的丰大业眼中只有《中法天津条约》，他一根筋地认为：依据《中法天津条约》，法国人有权在天津传教，不容侵犯，而且依据《中法天津条约》，就算是法国神父犯了罪，也应该由我丰大业来逮捕和审判，轮不到你们中国人去围攻教堂。

抱着这样“一根筋”的信念，丰大业带上了

自己的手枪，闯进了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

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丰大业上气不接下气，而且语气毫不客气地对中国的官员说：“现在你们的老百姓围攻我们法国人的教堂，请你立即派人前去镇压！”

丰大业在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丰大业于是返回教堂，但是在途中遇见了天津知县刘杰。

于是丰大业和刘杰论理，一来二往，性格骄横而且鲁莽的丰大业，在这个时候突然失去耐心，热血冲上脑盖，他拔出手枪，朝着刘杰“砰、砰、砰”大放一通，刘杰躲得快，但是刘杰的一个幕僚被当场打伤。

丰大业开枪伤人了。这下不得了，此时，部分围观的人一哄而上，将丰大业以及他的秘

书二人，当场活活打死。

丰大业开枪逞强，导致他和他的秘书被打死之后，这个事件就失控了，聚集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法国教堂“望海楼”一把火烧了，并且对天津的洋人，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

一共杀了多少呢？一共杀了 **20**名外国人，其中含法国人 **13**名、俄国人 **3** 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各**1**名。这些人当中，有传教士、修女、商人、领事官员等。不但如此，愤怒的群众在当天还杀死了 **30**多名中国籍天主教徒。民众杀红了眼之后，将方圆附近的外国教堂，不分法国、英国、美国，也放火焚烧，造成各处教堂都有不同程度的焚毁。

事发后不久，法国军舰立即开足马力驶到天津，进行示威，英、美、德、意等六个国家

的军舰也结集在天津，声援法国——你大清国必须快速处理本案，否则我们就打你。

清政府刚刚在十年前被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火烧了圆明园，伤痕犹在，不敢怠慢，于是派了曾国藩到天津调查处理本案。曾国藩在天津经过仔细调查之后，终于将本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查清楚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

1.大清国认定：本案责任在于大清国一方；

2.大清国派出大臣崇厚赴法国谢罪；

3.大清国逮捕并处死 16名中国籍的主要凶手；

4.大清国向法国及受害人支付赔偿金及抚恤金约合**50**万两白银。曾国藩对本案的处理，在朝野上下遭到了巨大的非议，人们都指责他“软骨头”、“吃里爬外”，其中北京的湖南同

乡会宣布开除曾国藩的湖南省籍。

那么，这起“天津教案”，留给我们后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以及启示呢？魔鬼在于细节当中，我们不妨从本案涉案人员的各种作为来分析，总结一下，这些人都犯了哪些错误：

1.教堂开办育婴堂，收养弃婴，本身并无不妥，但是对送来弃婴的好心人给予钱财奖励，这个缺乏深思熟虑的行为，却在客观上引诱了坏人去拐卖孩子，这个出人意料的魔鬼细节提醒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在事前多想一想：我们做这件事，会向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信号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信号？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做的一件事，会不会因为手段不恰当而使它最终成为一件坏事？

2.部分群众看到修女付钱收小孩，看到小孩的残骸出现在郊野、看到教堂里有一罐腌洋

葱，将上述三个现象十分不严谨地总结为“洋鬼子杀中国小孩制药”，这是不是造谣？我们在观察一个现象的时候，在做出任何结论之前，是不是要收集尽可能多的证据材料？我们是不是尤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时候，发言应该更为严谨，以免不慎陷入造谣、传谣的陷阱之中？

3.法国领事丰大业这个人，在和天津知县论理的过程中，情绪失去自控，竟然拔枪行凶，因而导致自己被活活打死，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任何问题，在“和平救济手段”尚未穷尽的时候，千万不要轻言动武——冲动是魔鬼。其实如果单单从本案而言，丰大业也许并非是一个心肠恶毒的人，但是他的死并不太值得同情——他并不是死于心肠恶毒，而是死于脾气暴躁。

4.法国领事丰大业拔枪伤人的这个情节，使部分天津民众的情绪滑向了失控，人们对白

色人种开展了无差别的杀害，只要你是洋鬼子，无论你是否与本案有关无关，无论你是否是法国人还是俄国人，无论你是否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总之只要你是洋鬼子，我们就打死你——愤怒的民众将这件事升级到了这个地步，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所有的白人都该死？

“天津教案”留给后人太多的启示。我想，其中造谣、传谣，是一种严重的恶行，我认为这个教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中国至今似乎仍然是一片造谣、传谣的乐土，谣言在这里很有市场，人们要么信口雌黄，要么偏听偏信，你要冷静，他说你冷血；你要证据，他说你书呆——有时人们往往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相信证据确凿的东西——感情往往胜于理智。

当然，我在这里，也只是抛个砖，引个玉。我相信明眼的读者，能从这里吸取更多的营养，悟到更多的东西。

鉴湖女侠秋瑾

史书上说：当年，清兵赶到革命党人秋瑾所在的“大通学堂”门前的时候，秋瑾从容就捕，而且拒写供词，只挥毫写下了以下七个冷艳的大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1907年7月14日，革命组织“光复会”成员秋瑾，在浙江绍兴被捕，次日，秋瑾在绍兴的闹市区——“古轩亭口”被清政府杀害。

秋瑾当然是一个女英雄。可是，英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传闻的基础上的。秋瑾为革命而死，仅仅算这个事情本身，秋瑾就已经堪称英雄，而如果再杜撰一些

英雄的情节，刻意为她“锦上添花”，在我看来，却等同于画蛇添足，不但没有必要，而且反而适得其反。

这不，秋瑾死后，中国社会上，就流传开了关于秋瑾的以下三则传说：

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

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

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

坦白说，我很愿意相信这些传说。可是很遗憾，事实上，以上这些，全部都不准确。

我首先谈秋瑾被捕的过程。

依据秋瑾的亲生弟弟秋宗章的回忆文章《大通学堂党案》，当天清兵到“大通学堂”里来逮捕秋瑾的时候，秋瑾并没有像影视作品里

面那样英勇抵抗或者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抵抗。恰恰相反，秋瑾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逃跑。

这不是刻意要丑化女英雄。事实上，革命人物在遭到官府逮捕的时候，逃跑不单是十分正常的表现，而且还是最为明智的选择。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试问：如果人人都见死不逃，恐怕革命人物都死光了，那么，谁来干革命事业呢？所以被捕的时候，尽量逃跑，保留自己的力量，这是十分符合逻辑的。

“大通学堂”是秋瑾参与经营管理的一所学堂。《大通学堂党案》这篇回忆文章，收录了秋瑾在狱中给清政府的一份《供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当年秋瑾给清政府的这篇供词，都说了些什么：

“秋瑾即王秋氏供：山阴县人，年二十九岁。父母都故。丈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与丈夫离别出洋，往日本游历，与徐锡麟、赵洪富会遇熟识。后我回国，在上海开设女报馆。上年十二月间，始回绍兴。由蔡姓邀我入大通学堂，充当大通附设体育会教员。与竺绍康、王金发均属要好，时常到堂，已有月余，也系熟识。今日闻有营兵前来拿捕，当即携取手枪、皮包，就想逃走。不料堂内开枪，兵勇等亦开枪，并将我连枪拿获。又论说稿数纸、日记手摺一个。此稿是我所做，手枪亦是我物。我已认了稿底。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了。皮包是临拿时丢弃在堂。至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逃何处，不知道是实。（下有指模，注明：‘右手二指’。）”

秋瑾的这篇文言文供词，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

“我叫秋瑾，我的丈夫姓王，我是山阴县

（浙江绍兴）人，今年**29**岁，我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我丈夫的全名叫王廷钧，我于光绪二十九年告别了我的丈夫去日本游学，并与徐锡麟、赵洪富结识和交往，我回国之后，在上海开办了一份女性报纸，直到去年**12**月，我才回的绍兴，一个姓蔡的人邀请我加盟‘大通学堂’，并充当‘大通学堂’附设的‘体育协会’的教师。我和竺绍康、王金发关系都不错，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经常来‘大通学堂’了，彼此很熟，今天我听说政府派兵来抓我，我当时就拿了手枪和皮包，准备逃跑，不料‘大通学堂’里面的学生开枪了，于是清兵也开枪了，然后呢，清兵将我连人带枪给抓了，还搜走了我的一些文稿、日记等文件，这些稿子是我写的，手枪也是我自己的，稿子我都看过了，革命党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再问了，我的皮包是在拿的时候丢掉在学堂里面了，而至于赵洪富、竺绍康、王金发他们逃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

于是，我们从秋瑾的这份供词里面，读出来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1.当天，清兵来抓秋瑾时，秋瑾的第一反应，既不是奋勇抵抗，也不是从容就擒，而是逃跑。

2.秋瑾并非如民间传闻中所说只写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供词，

而是写下了以上这份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

那么，秋瑾在受审的时候，又有没有“视死如归”的情形呢？

史料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秋瑾在受审时，一开始坚决不承认自己“造反”的事实，而且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想方设法地去求生。依据是**1907年7月21日**版的《时报》，报道了秋瑾受审的细节。在庭审的时候，清政府

官员贵福和秋瑾有如下的对话：

贵福：“你一个女孩子，为何要造反？”

秋瑾说：“你误会了，我是造男权的反，没有要造大清的反。”

可见，秋瑾出于求生本能，为自己辩解，根本不愿意承认自己“造大清的反”的事实，因此，我们大家说她“视死如归”，似乎的确是言过其实了。

可是，这也并非是故意丑化秋瑾。事实上，作为一个弱女子，在明晃晃的大刀跟前，不喊“大老爷”，不喊“饶命”，不喊“我错了”，不喊“冤枉”，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毕竟，秋瑾只是一个女子。

读到这里，我们回到分析本文三个传闻的事情上来，我们不妨一一纠正如下，以正视听：

传说一，秋瑾被捕时，英勇抵抗——不真实。秋瑾在被捕的时候，既没有英勇抵抗，也没有从容就擒，而是带上枪支、皮包，准备逃跑。

传说二，秋瑾受审时，视死如归——不真实。秋瑾在受审的时候，虽然没有低声下气地求饶，但是，秋瑾一开始并不承认自己反清，也就是说，秋瑾仍然想侥幸求生。

传说三，秋瑾的口供只有七个字：“秋风秋雨愁煞人”——不真实。秋瑾在狱中，为清政府写下了长达二百六十三个字的文言文供词。

读到这里，请问诸位：您觉得，秋瑾的英雄形象，有没有被抹黑呢？有没有被丑化呢？

我的答案是——没有。

相反，秋瑾显得更真实了。

事实上，作为革命党人，在面临被捕的时候，逃跑是正确的，在近代史上，在面临被捕危险的时候，撒腿就跑的英雄人物，不知有多少。

此外，人在身陷囹圄的时候，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幻想通过“证据不足”来使自己脱身，以求“留得青山在”，出狱之后继续革命，这种事情，也是相当的普遍，不要说一个小女子秋瑾，就算是我们历史上先后登场的众多英雄好汉，做过这种事情的，简直是数不胜数。

再者，是写了七个字的供词也好，是写了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也好，字数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秋瑾在她的供词里面，没有出卖同志，没有屈膝求饶，没有背叛革命理想……仅仅这些就已经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掩盖这份二百六十三个字的供词，来为秋瑾“锦上添花”，否则一不小心，搞成画蛇添足，完全不必。

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鸿昌之死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读物，突出地讲述吉鸿昌在胸前挂一个“我是中国人”的胸章访美的故事，努力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英雄……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里，落下了“吉鸿昌死于抗日”的一种模糊印象，可是，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提起“吉鸿昌”这个人，相信许多的读者心里都会蹦出一个词儿“英雄”。实事求是地讲，吉鸿昌的确是一个英雄人物。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吉鸿昌大义灭亲的一起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记录了吉鸿昌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有一回，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一家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案发当地的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可是，有人报告给了吉鸿昌。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

这件事，也许就能说明吉鸿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等闲之辈。再讲一个故事。

“**20世纪 30年代初**，吉鸿昌访美。在美国期间，有一回，吉鸿昌到一个小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回国内。当他用不标准的英文，对美国邮局女服务员说出‘中国’这个国家名字时，邮局服务员竟然抛出来这么一句：‘中国是哪里？我没有听说过。’吉鸿昌义愤填膺，当即叫人定做了一块写着‘我是中国人’的方形胸章，挂在自己的胸前。”

这个故事，有些读者从小就读过，不再多费笔墨。

出于对吉鸿昌的敬仰之情，长期以来，我们有很多的民间通俗历史读物，想方设法地突出吉鸿昌“我是中国人”的访美故事，刻意将他塑造成一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为了抗日而死的民族英雄。

但是，事实上，吉鸿昌当年被国民政府枪毙，并不是因为他的抗日事迹，而是因为吉鸿昌发动了反蒋武装暴动。当然，反蒋对不对，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话题，在此不多说。

本文所要澄清的是——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反蒋。其实，此事的端倪，并不陌生。吉鸿昌在死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这首诗里有“恨不抗

日死”五个字。很显然，吉鸿昌已经用他自己的话，亲笔告诉各位：他被捕乃至被杀，并不是因为他抗日，而是另有原因，所以才有他笔下“恨不抗日死”的遗恨自白。那么，吉鸿昌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丢掉性命的呢？依据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的回忆，当年国民党特工潜入天津租界，刺伤并抓捕了吉鸿昌，理由是吉鸿昌组织反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暴动。部分读者也许会质疑，国民党军统特务人员陈恭澍的回忆，有什么可信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偏见，难道军统特务的证言，就一定是谎言吗？其实，关于吉鸿昌被捕、被杀的真实原因，传世的第一手史料，多如牛毛。

例如，吉鸿昌生前的战友傅二虞，在其回忆文章《吉鸿昌所走过的曲折道路》里面，透露了以下的惊人事实——吉鸿昌曾经派代表远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并被蒋介石的

人查获。蒋介石对此，怀恨在心。出于防范，蒋介石于是命令吉鸿昌去“剿共”，可是，吉鸿昌不但不听指挥，而且冒充红军，倒戈攻击国民党军队。

我们来读一读，傅二虞这篇证言的原文：

“.....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 1931年 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

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记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俱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

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

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

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

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

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

1. 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

2. 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

3. 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

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

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47 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

1.1932年 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

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 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

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

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

5.1934年 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

6.1934年 11月 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

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

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

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

“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

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

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

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

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

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鼎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 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

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

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

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

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

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

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

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

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

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

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

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

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

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石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石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石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吧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

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

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

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

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

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

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

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

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

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

1.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

2. 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

3. 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

4. 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

5. 汪精卫的侄子汪杞，当上了广州市市长；

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

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

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

“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

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

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

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

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

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

《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

“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

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

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

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

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第二章 直视真相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

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

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

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

“.....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

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

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

“……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

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

“……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

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

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

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

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

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

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

的：

“……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

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嗣准文部省所拟章程十五条抄稿送来，寻读全文，有为整顿学校者，亦有间接管理学生者，实无苛待之意，旋即公布……”

杨枢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日本文部省考虑到中国到日本的留学生越来越多，这些人良莠不齐，而日本有坏人，开办了不少野鸡学校，引诱中国留学生去

读，真是败坏学风，因此，日本政府打算立一个法，整一整这个歪风，日本政府的用意良好，当然，至于日本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就知道了，于是，我亲口告诉日本文部省：整顿学风，当然是好事，但是因为对我中国的学生有直接关系，所以我希望贵国能在这个法律公布之前，先给我看一看。于是，他们果真就送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那条文确实是整顿学校、监管学生的，没有虐待中国留学生的意思，于是，我就同意日本颁布了……”

将法案草稿交给清国公使杨枢审阅并且征得杨枢的同意之后，**1905年 11月2日**，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以下简称《规程》）。

这个《规程》的条文很长，读者不必一一研读，它里面有相当多的条文是约束日本人开办的“野鸡学校”的。在这个规定当中，关于监

管清国留学生的，主要有如下四条的规定：

第一条，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

第四条，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

第九条，清国学生到校外租房子的，所在的学校需要加强监管。

第十条，因品行不端被学校开除过的清国学生，其他学校不准录取。

颁布了这个《规程》之后，**1905年12月15**日，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在《读卖新闻》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清国）留学生之中，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重大打击.....”

木场的这个评论，进一步旁证了日本出台这个《规程》，是为了讨好清政府，帮助清政府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他们被革命党策反。

《规程》出台之后，日本的中文报纸《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旅日华人撰写的名为《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的社论，其对《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作了以下七点的评论：

1.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损辱我国权故，日本人留学于欧美各国者，宁乏人？何以不闻某国有取缔日本学生之规则？即我国人留学他国者，宁止一日本？何以不闻某国开日本之先例？别为规则以取缔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视我国权也。

2.此规则之名，原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

也，不过恐我国不认，姑为朝三暮四之计，去韩留清之尔，夫其使我与受被保护之韩国为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3.规则第一、第四条言入学、转学需要经公使之介绍、承认，明侵害我入学自由。

4.规则中有侵害我书信秘密自由之件。

5.规则中有学生卒业后将姓名通告于我国政府，清其登用之语，使日本人欲结好我政府，愚弄我学生，以握我教育权，且渐干预我用人行政之权。

6.规则第九条剥夺我居住自由权，查日本唯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于指定场所之制，是娼妓我也。

7.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万一我辈有持革命主义为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

授意日本污指为性行不良，绝我入学之略，其设计之狠毒不可思议。

《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其中第一点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此规则之名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也，故无论内容奈何，吾辈义不可忍受。”

这句评论翻译成现代中文，是这样的意思：

“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个规定，叫作《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无论它的内容是什么，我们都不能接受！”

评论的意思是：因为它起名叫“取缔规则”，“取缔”二字十分刺眼，十分侮辱人，而至于这个规定的内容，就不再重要了，总之，一部连名称都叫作“取缔中国人”的法律，无论它的实质内容是什么，我们都是要反对的。

《新民丛报》这七点评论中的最后一点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依照这个规定，日本学校可以根据清政府的要求，以“品行不端”的名义将和革命党有瓜葛的清国留学生开除，而且不准这些有革命倾向的学生再入读任何日本学校。这无疑是断绝了众多革命派留学生的前途。

但是，从文字上而言，这部法律本来名叫《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为何下发到了旅日华人那里，却改了名字变成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呢？

原来，这是日本报纸“标题党”惹的祸。日本报纸在报道这个新闻拟定标题的时候，或许为了吸引读者，或许出于排版原因，总之，日本报纸采用了一个简化了的新闻标题，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简称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以下简称《取缔规则》）。

其中，“取缔”二字十分刺眼。报纸一出，留学生和旅日华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电台，日本政府出台一个新法规，许多清国留学生其实是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法规的原文的。许多时候，除了读报，甚至要靠口口相传，三人成虎因而在所难免。

这里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陷阱：在日语里面，“取缔规则”的意思是“管理规定”。日语里面的“取缔”两个汉字，并非是“取缔”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业里面的“取缔役”是“董事长”的意思。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误解。

可是，当时在日本的许多清国留学生，吊儿郎当，日语学得并不精，他们直接把日语的“取缔”理解成了汉语的“取缔”，换言之，他们是把“管理”错误地理解成“开除”和“禁绝”。

这个新规定一出台，顿时在东京的清国留

学生之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清国留学生纷纷扔下课本，蜂拥般冲上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课、游行、示威、抗议活动，风风火火，沸沸扬扬。

其中，依据张篁溪在《**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的记录，以秋瑾为代表的部分清国留学生，鼓动全体清国留学生罢课回国，一些清国留学生更是组成了“纠察队”，带上棍棒武器，满东京跑，看到清国留学生就威胁他们：“你回不回国？”说“不回国”的，立即被群起围殴之。

但是，终归还是有明白人。黄尊三《三十年日记》记录了有一个清国留学生站出来：“我们连那个所谓《取缔规则》的原文都还没有读过，发什么怒呢？我们是否应该先调查、研究，搞清楚之后，再反对也不迟呀！”

愤怒的留学生们当即这样回应他：“不用

查了，还有什么好查的？！我们认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而依据亲历者吴玉章的《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是：在这场留日学生的抗议回国潮中，汪精卫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学生代表，立场是对立的。

汪精卫是不主张留日学生回国的。因为，汪精卫的上司——孙中山——担心这批革命派的留日学生回国之后，会被清政府一网打尽。于是，孙中山让汪精卫在东京办了一个叫作“维持会”的组织，规劝留学生不要跟风回国，尽快回归课堂，恢复学业。

与此同时，清国留学生胡瑛则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公开和“维持会”叫板。“联合会”私设法庭，对反对回国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一些革命党人判处了死刑。当然，他们没敢实际执行死刑，当时的日本已经是法治国家，

随便杀人可不行。

在这次罢课回国的风潮当中，先后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国留学生离日返国，日本《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 12月 14日**发表了这样的社论：

“.....要回去的，随便他们回去，别让他们在这里无理取闹，这种学生，就算我们有心培养他们，也是白费心机.....”

在中国湖北这边，湖广总督张之洞对闹事的学生进行了这样的批评和指责：

“.....盖此次中国学生八千余人先后全行退学，实为革命党所煽惑威逼，其中胁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过十之一，特以乱党凶顽过甚，良善不能与抗，钦使监督避祸不遑，无从理论，近日本学生种种逆谋真情毕露实堪发指.....”

这篇文字可参《张文襄公全集》。

清国留日学生陈天华在细细耕读了日本政府这个《规程》之后，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收录在杨源浚《陈天华殉国记》）：

“.....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

这时，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也认真地研读了日本政府的这个所谓《取缔规则》。读完之后，梁启超认为：“此规则利大于弊，与中国国家主权没有关系，也并没有侵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相关文字收录在《饮冰室合集·集外集》。

同在日本的章士钊读完这个所谓《取缔规则》之后，也评价道：“与我国国体毫无关

系”、“留学生是误解、胡闹”。

不久，日本报纸又有评论员发表社论，认为清国留学生根本没有认真理解，甚至根本没有读过日本政府这次出台的新《规程》，就蜂拥罢课闹事，真是——“放纵卑劣”。

这里，“放纵卑劣”四个字，对陈天华的刺激很大。

隔了没几天，陈天华跳海自杀了。

陈天华是不是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自杀？不是。因为陈天华的遗书，把自己的自杀动机写得十分清楚。陈天华留下来的《遗书》（又名《绝命辞》），白纸黑字，是这样写的：

“……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

谓鄙人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唯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

陈天华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意思：

“……（我死之后）大家如果想起我，就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但是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我陈天华跳海自杀，并非为了抗议这次《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进而做一些意外的事情，要知道：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己争气，而不要怨天尤人，我死了之后，《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这个问题，能了结就了结它，不要太过偏执，只是要做好善后工作，要使大家中国人振作起来，不要再让日本人在报纸上侮辱中国人，大家要尽力救

国，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尽管是死了，也虽死犹生啊……”

可见，陈天华跳海自杀，根本就不是为了抗议《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

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清国留学生更加悲愤，发动了规模更大的罢课闹事活动，并且放出狠话：“（留学生）谁敢不跟从（罢课），给我狠狠地打！”

这就是那场“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陈天华自杀事件”的基本经过。

梳理上述的史料，我们可以大概还原本案的发展逻辑如下：

1.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帮助监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防止清国留学生被革命党策反。

2.日本政府在征得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的

首肯之后，出台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3.这个规程在入学、转学、退学、在校外租房等方面对清国留学生进行了监管，限制了革命党活动的自由，而且规定一旦清国留学生因涉嫌革命党被开除，则再也不能入读日本的任何学校。

4.《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先后被日本报纸和中文报纸《新民丛报》错误地报道成《取缔规则》。“取缔”二字的中文、日文字义的区别使误会进一步深化。

5.《取缔规则》的出台使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哗然。清国留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罢课、回国运动。

6. 一向忧国忧民的清国留学生陈天华，目睹日本媒体对中国人“放纵卑劣”的评论，同时

也目睹留学生中“维持会”和“联合会”之间的内讧等诸多原因，悲愤交加，跳海自杀身亡，但是，他在遗书中自述：他并非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规则》而自杀。

我认为，这就是“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基本事实，供读者鉴。

辫子真相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部分国民对近代史上“辫子问题”的一些错误认识。

部分国民典型的错误认识有如下三点：

1. 国民开始剪辫子，是清政府灭亡之后的事；

2. 晚清政府对剪辫子的人严厉处罚；

3. 晚清政府不考虑剪辫子。事实上，如果从第一手史料去管窥，这部分国民的以上三点认识，全部有待商榷。

剪辫子的真相如下。

真相一：在晚清最后十几年，国民剪辫子的风气已经渐开。

事实上，在晚清的最后那十几年间，已经有不少人剪掉了辫子。例如，依据张群先生的回忆：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尚处于晚清时代，那时，他和好友蒋介石，都剪掉了辫子。（参见《张群先生话往事》）

再举个例子：黎元洪所在的清军武昌新军部队，有的士兵就剪掉了辫子，对此，作为部

队小首长的黎元洪，不但不反对，而且还称赞那些士兵：“剪得好！早就该剪掉了！”

还有，依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的记载，早在 **1900**年，革命党人秦力山就剪掉了辫子，而且他还在中国走南闯北，肆无忌惮，以至于由于缺少辫子，惹来义和团对他的偏见。

又举一个例子，在 **1898**年开办的天津“北洋硝皮公司”里面，为了方便生产，工人一律剪掉了辫子。（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96**页。）

有心的读者，只要你有时间广泛阅读近代史的第一手史料和浩如烟海的历史老照片，你就会发现：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其实有不少国人，早就剪掉了辫子。

真相二：晚清政府已经开始逐渐容忍国民剪辫子。

那么，晚清政府对于剪掉辫子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是什么态度呢？也许有一些地方政府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各种各样的处罚，但是，我从近代史第一手资料中读出来的，却是相当多的官员对国民剪辫子的行为，竟然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例如，**1906**年的时候，前国军将领周斓在湖南高等学堂预科念书，他和几十个同学都剪掉了辫子。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罚他们。在一所公立的、为清政府培养人才的高等学堂里，多达“几十个”同学剪掉了辫子，校方对此的处置竟然是：不处罚。周斓的这个案例，出自《湖南文史》第**46**辑第**133**页。

再如，**1909**年，广西陆军小学（注：这是一所清政府的公立军事学校）的全体学生突然全部剪掉了辫子！广西巡抚张鸣岐（相当于省级“一把手”）获悉之后，仅仅装模作样地训斥了学生一下：“务必重新留回辫子。”可是，学

生们竟然没把张鸣岐这个省级“一把手”的话当一回事，没有一个人重新留回辫子！由此可见，在晚清时期的广西，剪辫子的处罚仅仅是“训斥”。广西陆军小学的这则史料，出自《李品仙回忆录》第7页。

近代史中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有心的读者可以再去找找。

真相三：晚清政府已经在认真考虑废除辫子。

这是关于晚清辫子问题最鲜为人知、最令人震惊的真相：晚清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在很认真地考虑：废掉辫子。

比较早期的，是在 **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废掉辫子。这个议案虽然暂时未能获得通过，但是，康有为也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罚。

过了不久之后，竟然演变成一群清廷贵族提议：废掉辫子！这些清廷贵族例如：荫昌、善耆、载泽、载涛。其中，载涛在 **1909**年的时候，对剪辫子这个议案，是这样评论的：“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

1910年冬天的时候，大清国资政院召开第一届常会。在大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勇敢地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剪掉辫子”。更惊人的是这个破天荒的、“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议案，竟然经资政院表决并获得多数票通过！资政院的这个资料，出自《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

到了次年（**1911**年），大清国陆军部作出了一个这样的决议：“陆军部决于明年（**1912**年）正朔，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参见香港《华字日报》**1911**年 1月 3日版。）

这就是辫子的真相。虽然历史不能假设，

但笔者是否可以依据这些第一手史料，大胆地推测一下：就算清王朝不倒台，全民剪掉辫子，也是大势所趋，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

结语：在晚清的最后十几年，大清国从上到下，相当多的人已经明白到辫子这个东西，与刚刚引进的西方生产方式和军事生活，已经严重脱节，已经到了非废不可的地步了。资政院和陆军部的决议，事实上已经几乎相当于宣布了辫子的死缓。

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东西，几乎都是不得长久的。

再谈“东亚病夫”

在近代史上，外国人歧视中国人是不争的

事实。但是，同时也不能否认当时的中国人的确也有一颗十分敏感的玻璃心，于是，当我们的自尊心脆弱到极点的时候，别人有意无意地往地上吐一口唾沫，我们就会觉得是在骂自己。唾沫也许本身就有一点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人心也出了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

谈到中国近代史，中国人的心中，有无数的淤血团，其中，所谓“东亚病夫”这起辱华事件，就是这样的淤血团之一。可是，如果用放大镜去审视近代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件事，与我们一向理解的似乎还不太是一回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令你大跌眼镜的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称呼中国为“病夫”的，其实还并不是什么“帝国主义者”，而是一个中国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严复。严复于 **1895年 3月**发表于《直报》的文章《原强》，文中有以下两处称呼中国为“病

夫”：

“.....今夫人之身，惰则羸，劳则强，固常理也。而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则有速其死而已。中国者，固病夫也.....”“.....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国知西法之当师，不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始也.....”

严复的这两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人的身体，懒惰则败坏，活动则强健，这是常理。但是如果叫一个病夫超速飞奔，跑得太快，则只有使他走上死路。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病夫.....”

“.....国家大事和人的健身，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的中国，难道不就是一个病夫吗？更何况中国早就知道应该学习西方，并不是从

甲午战败开始的……”

我挖掘出严复在当年所写的这两段文字，是要告诉大家以下几点鲜为人知的事实。

1.在近代中国，最早称中国为“病夫”的，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严复。

2.严复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没有侮辱国人的意思。

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是一个“病夫”，严复所说的，其实是真话,他并没有错。

那么，外国人最早嘲笑中国为“病夫”的出处，又是哪里呢？

原来出自清末年代英国人在上海所办的一份英文报纸，名叫《字林西报》，英文名字是《**NorthChinaDailyNews**》。

1896年 10月 17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

报》，登载了某位英国记者所撰写的一篇批评大清国国政颓废、不思进取的文章，原文中含有如下的英语词句：

**“.....There are four sick people of the world
——Turkey, Persia, China, Morocco.....
China.....Sick Man of the East.....”**

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世界上有四大病夫：土耳其、波斯（伊朗）、中国（大清国）、摩洛哥.....（其中）中国，是东方的病夫.....”

我们把原文挖掘出来并弄清楚了事实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以下几个基本要点：

1.英国记者并不仅仅称中国为“病夫”，而是在原文中，同时还批评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

2.英国记者所说的是“中国是病夫”，而没有说“中国人是病夫”，因此，这位英国记者似乎也并没有要侮辱中国人的意思。

3.当时的大清国，的确可以比喻为一个“病夫”。这位英国记者所说的不过是一句真话而已，他并没有错。类似于医生告知病人“你有病”，实事求是。这似乎并不带有太浓重的感情色彩。

4.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既谈不上“友好”，也算不上“恶意”，只是一篇典型的混稿费的文字。中国人太拿它当一回事，其实是过分在意它了。

5.退一步而言，就算这位英国记者的言论确实是在蓄意侮辱中国人，那也只能代表这位记者他自己一个人，而并不能代表全世界。难道不是吗？读到这里，读者要注意了，这份《字林西报》是一份英文报纸，它要面对的读

者群，是当时旅居在中国的外国侨民，上述的这篇文章，原文是用英语发表的，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而是给西方人看的。如果没有人翻译它，那么中国人根本就读不到。既然读不到，似乎也就很难谈得上是什么蓄意侮辱。

可是，有人翻译它并传播了。这个人是谁呢？正是当年的“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梁启超读了这份《字林西报》之后，翻译了这篇社论，并于不久之后，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评论。梁启超是这样翻译的：

“.....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

鲜为人知的是，和当时很多的国民不同，梁启超对英国记者用“病夫”一词批评中国一说，却是深表赞同的。梁启超于第二年（1897年），也特地撰文评论道：

“.....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不务治病，而务壮士之所行，故吾曰，亡天下者，必此言也.....”

梁启超的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这个意思：

“.....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病夫，不好好治病，而偏要学强壮人士飞奔快跑，所以说，这种（步子迈得太大）的言论，会亡国的啊.....”

不久之后，梁启超更是写道：

“.....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缚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耆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

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跣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以此而出与狰狞枭鸷之异族遇，是犹驱侏儒以斗巨无霸，彼虽不持一械，一挥手而我已倾跌矣。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我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惫以坐废也……”

梁启超上述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中文，概括地说，是以下的意思：

“……中国人不讲卫生，结婚生育太早，不利于优生，而且中国许多人终日闭门读书，根本不做运动，身体所以不强健，而且不少人还房事过度，而且还抽鸦片，身体当然不可能强壮。所以啊，中国人的体格根本就是病夫，由病夫组成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病国呢？希望我的同胞们，要锻炼身体啊……”

可见，梁启超从外国人称“中国”为“病夫”的社论当中，引申出了中国人的体格问题，并批评中国人不爱运动，因此，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是“病夫”，而由一群“病夫”所组成的国家（中国），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病夫”。

读到这里，有几点重要事实，需要注意。

1.梁启超是当年洛阳纸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文字对当时国民舆论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在当时，绝大多数的国民没有能力阅读英文社论的原文，因而只能以梁启超的评论为参考。

2.清朝末期的中国人的确没有做体育运动的习惯，我们所熟知的“发展 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口号是**1949**年之后才提出来的。到了 **1904**年，梁启超更是在他的《新大陆游记》一文里写道：

“.....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

很清楚了，身为当年中国人意见领袖的梁启超认为“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只是实话实说，谈不上污蔑”。这是梁启超的原话，读者要不服，可以找梁启超去理论，因为这是他的原话，并不是我的杜撰。

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细节，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用英文评论“中国是病夫”，而到了梁启超翻译、传播、评论该事件的时候，却逐步演变成了“中国人是病夫”。

“中国”和“中国人”的概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东亚病夫”这条信息，从梁启超这里，就开始被扭曲了。随后，“东亚病夫”这个名词，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为什么呢？

因为在**1904**年，中国出版了一本畅销小说《孽海花》，作者名叫“曾朴”，而笔名为“东亚病夫”。这本小说在当年，热销得不得了，多次重印，作者笔名“东亚病夫”也就随着这本小说的走红，而名声大噪。

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史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在日本留学，看到幻灯片里日本军队砍杀一个给沙俄军队当间谍的中国人，同时看到许多围观的中国人表情很麻木，因此，鲁迅认为“中国人有病”，所以他“弃医从文”，走上了当作家的道路。

鲁迅说“中国人有病”，这恐怕是各位在小学年代就耳熟能详的片段了吧？

鲁迅说“中国人有病”，因而成了伟人。而英国记者说“中国有病”，却被中国人记恨了一百多年。

其实，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做得更自信一些。难道不是吗？

前文提到了英国记者最早嘲笑中国是“病夫”的同时，也嘲笑了土耳其、伊朗、摩洛哥。事实上，西洋鬼子的品性，远远不止如此，他们在西方世界的内部，也是互相嘲笑“病夫”。在此，我特列举几个例子。

早年西方人在 19世纪中期，嘲笑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病夫”（**The Sick Man of Europe**）。

2009年 4月 3日，美国知名杂志《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登出评论文章，嘲笑日本是“亚洲病夫”(**Sick Man of Asia**)。

2009年10月29日，英国BBC电台，英国评论员笑骂本国（英国）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2007年，《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讥笑葡萄牙为“新欧洲病夫”(A **New Sick Man of Europe**)。

在更早前的 2005年，同一本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还曾经讥笑意大利为“真正的欧洲病夫”(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

除此之外，法国、德国、希腊……都有被西方媒体笑称为“病夫”的历史。这些事例，根本列举不完。

可见，在英语媒体里，“病夫”(Sick **Man**) 这个词语，原来是一个常用的比喻词，在英语世界里，记者、编辑们频繁使用这个词语，用来评论那些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出了问题，或者遇上了麻烦的国家，而被西方记者扣过“病夫”(Sick **Man**) 帽子的，其实远远不只中国，而还有俄国、日本、英国、葡萄牙、意

大利、法国、德国、希腊.....

可见，在西方被称为“病夫”根本就不是一个事，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不但如此，在近代史上，还有一个被我们严重忽略的事实。早在近代（清朝中叶）之前，有一些清朝统治者就看不起外国人，发明了相当多的贬义词来称呼外国人，例如：“红毛鬼”、“番鬼”、“鬼佬”、

“洋鬼子”、“蛮夷”、“夷人”、“倭奴”.....读者只要换个位置思考一下，立马就能知道，这些名词，就其字义而言，只有比“病夫”更难听，而绝不比“病夫”更高雅。

总之，最早是某些清朝统治者蔑称外国人，后来才轮到外国人蔑称大清国的官民，这似乎也是一个铁的事实，但又是最容易被国人

忽视的事实之一，也是国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之一。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清朝的统治者用双重标准看待自己和他
人，因此，判断问题当然不可能做到客观实际。凡事贵在换位思考。难道不是吗？

我挖掘了这么多事实，自信已经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得很清楚了。在此，请容我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如下：

1.最早将“中国”比喻为“病夫”的是中国人严复。

2.英国记者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评论：“土耳其、波斯（伊朗）、摩洛哥、中国，这四个国家，是当今世界上的四大病夫”。

3. 这条信息，经过梁启超翻译、传播、评

论之后，变成了“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使信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4.“东亚病夫”一词，被畅销书作家曾朴采用为笔名，随着其小说《孽海花》的畅销，“东亚病夫”一词成为了近代史上的“热词”，继而家喻户晓。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亚病夫”一词，从产生——传播——扭曲，再到发扬光大的基本过程。

“支那！支那！”

比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更早的，是一个唐代的中国人，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僧”——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在其口述的著作

《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拘摩罗王和玄奘法师的一番对话如下：

拘摩罗王：“自何国来，将何所欲？”玄奘法师：“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拘摩罗王：“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日，去斯远近？”玄奘法师：“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支那国是也。”

这段文献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拘摩罗王：“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玄奘法师：“我从大唐国来，是来求佛经的。”拘摩罗王：“大唐国在哪里？要走多少天？有多远的路程？”玄奘法师：“往东北方向走几万里路，印度叫支那的，就是指的大唐。”

玄奘法师所说的，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古

印度将大唐国称呼为“至那”、“支那”、“脂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唐朝。当时的唐朝是日本崇拜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从唐朝开始，一些日本僧人就开始在文献中，称呼大唐国为“支那”——注意：那时的日本，不但对大唐丝毫没有恶意，而且还相当地仰慕大唐。唐朝时代的日本僧人，为什么称呼大唐为“支那”呢？因为当时的日本僧人和唐僧（玄奘）所读的，是同一批的梵文佛经——古印度人将中国称为“支那”，唐僧也跟着学，于是，日本僧人也跟着学。

可见，“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

“支那”一词在日本的影响进一步的扩大，是从江户时代（17世纪初）起，当时的中国处于明朝时期。

那么在明朝的时候，日本为什么不称中国为“中国”，而是沿袭旧称，继续称呼中国为“支那”呢？

因为——日本要避免混淆。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在明朝以前，“中国”这个名词，并不常用。当时大明国的周边小国，都知道“大明国”、“大明”，而不知道“中国”——反而是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名叫“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道”、“山阴道”两个地区，在日语中，合称“中国地方”，也简称“中国”。

因此，如果把大明国硬称为“中国”，则在日本国内必然会造成混淆。

两个地方叫同一个地名，很显然会造成误会。所以，日本从明朝开始，举国上下就习惯了称呼大明国为“支那”，而不叫“中国”——为

的是与日本国内的“中国地方”区别开来。

直到后来抗战胜利，日本迫于战胜国——中国的压力，才普及了“中国”的称呼，并开始迁就中国，将日本的“中国地方”改称“山阳地方、山阴地方”。

事实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远远不止日本一国，至少还有以下国家的语言，都称呼中国为“支那”：泰语、法语、马来语、德语……更有甚者，俄语更是将中国称呼为“契丹”，至今仍是如此。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中国称呼为“支那”的，也不仅仅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量的汉民族英雄和成功人士，都曾经将中国称呼为“支那”。下面举一些例子：

我们知名的中国皇帝唐玄宗，写过一篇名叫《题梵书》的诗，行文如下：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可见，咱们这大唐朝的堂堂皇帝，也把自己的国家叫作“支那”——这简直是反了，反了，成何体统。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戊戌政变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

“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看到了吗？我们近代史上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不但把自己的祖国叫作“支那”，而且还往上加了个“我”字——“我支那”。还有更疯的。章太炎写过一篇《正疆论》，他说：“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

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章太炎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拿支那和日本来选择，我亲近支那；但是如果拿日本和清廷来选择，那么我宁愿亲近日本！”可见，“章疯子”不但称自己的祖国为“支那”，而且还高声唱道——“日本比清廷还要亲”。肉麻死了。还有，中国近代知名学者严复，曾经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翻译成《原富》，他是这样翻的：

“埃及、印度、支那三古国皆有海禁，以内地市场已广，不愿有外交致窥伺。然而三国，皆古盛而今衰。”

很清楚，严复也将自己的伟大祖国——中国称呼为“支那”。孙中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事实上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孙中山远远不止一次称呼中国为“支那”。知名的革命女英雄秋瑾，写过一篇叫作《支那逐魔歌》的诗歌，也把中国叫

作“支那”——该诗的行文如下：

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吁嗟乎！我国精华渐枯竭，奈何尚不振衣起？无心无肝无脑筋，支那大魔首推此。

还有，康有为流亡印度期间，他的女儿康同璧，从中国步行到印度去找她老爸。西游成功之后，她写诗自夸，夸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支那人”：

舍卫山河历劫尘，

布金坏殿数三巡。

若论女士西游者，

我是支那第一人。

再举一个例子，近代知名文学家、诗人闻一多写过一首名为《我是中国人》的诗，在这

首诗中，闻一多曾多次高呼“我是支那人”。该诗歌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我是黄帝的神明血胤；我是地球上最高处来的，帕米尔便是我的原籍。我的种族是一条大河，我们流下了昆仑山坡，我们流过了亚洲大陆，我们流出了优美的风俗。

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们是四万万不灭的明星；我们的位置永远注定。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我是东方文化的鼻祖；我的生命是世界的生命。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

这还不算呢，许寿裳在其回忆录性质著作《我所认识的鲁迅》里面，记录了鲁迅的一段往事如下：

“鲁迅在日本住旅馆，要登记姓名、籍

贯。鲁迅写下：周树人。但是籍贯却不能写中国。因为日本的山阳地区也叫中国，如果鲁迅写中国，会造成混淆，结果鲁迅写下‘支那’两个字。不料，日本旅馆店主见是清国人，认为是贵客，免费给鲁迅升级了房间。”

许寿裳作为日本留学生和鲁迅的知心好友，他的这一段回忆，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 在近代史上的日本，说“中国”二字，的确会造成混淆。

2. 鲁迅称呼自己的祖国为“支那”，毫不以此为耻辱。

3. 鲁迅自称是“支那人”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反而还因此被日本人视为贵客，免费给升级房间。

那么，为什么“支那”一词在近代史上，会

被视为一个侮辱性质的词语呢？其实是因为自从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在中国民间催生了一股强大的反日、仇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中日两国之间任何的事情，都变得十分敏感——“支那”一词，也就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了。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客观的事实，在近代史上，部分日本人的确歧视中国人，这种歧视是客观存在的，在史料里也是有迹可寻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支那”这个原本是中性的词语，也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侮辱”的色彩了。这个逻辑用一个加法算式来演示，是这样的：

日本人歧视中国人 + 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 = “支那”是侮辱词

我们从这个等式里可以看出来，“支那”称呼本身并不是问题，“歧视”才是问题的所在。

因此，我们这个算式再简化一点，是这样的：

叫你“支那” \neq “支那”是侮辱词

歧视你+叫你“支那”=“支那”是侮辱词

也就是说：在民国时期中日关系恶化之前，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当时的中国人不但不在意这个，而且还跟着这样叫。但是中日关系恶化之后，“支那”这个称呼就成为一个事了。当时民族自尊心较强的国民意识到，日本人歧视我们中国人，因而，“支那”这个词就成为了一个带有侮辱性质的词语了。

这就是“支那”一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它的含义演变的过程。

“扶清灭洋”里的经济诉求

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不敢说全部，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不外是经济问题，或隐，或现。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但是，从史料上来看，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不难看出：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在内心深处，有着他们强烈的“经济诉求”。

举个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 **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

1899年冬，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当时的洋神父，中文名字叫作“任德芬”。义和团对任德芬，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

第一个条件：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第二

个条件：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第三个条件：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可见，义和团的第一、第二个诉求，都是经济诉求：要吃饭，要看戏。我们再来看看，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首领一：曹福田，清兵出身，退伍之后，找不到工作，待业青年。首领二：张德成，船夫出身，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他因而失业。这也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一个原因。

可见，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都是“失业青年”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其中的张德成，最终是怎么死的，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

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张德成逃到“王家口”这个地方，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纠集了村民，大家一起动手，抓捕了张德成，并将张德成杀死了。

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不是死于洋人之手，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

下面，我再举一个例子，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是用来干什么的。

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河北省霸州县，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圣若瑟会”的洋修女，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逃亡到固安县地界，被义和团发现并抓住了。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称：“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哪家儿子缺媳妇的，过来赏个香油钱，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

答案很清楚：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是将她们用来出售、牟利的。

也许有人会说义和团抓到洋人，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而不是抢劫钱财。但是事实

上，部分义和团杀洋人的最初动机，是想得到清政府的奖励。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之后，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

“杀一洋鬼，赏银 **50**两。杀一洋妇，赏银 **40**两。杀一洋童，赏银 **30**两。”

值得一提的是，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而是清政府的官方文字。其中，在“庚子国变”中对慈禧太后“护驾”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在其所著的《庚子西狩丛谈》里，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下了这样的定义：

“拳匪多属市井无赖，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

而史料《西巡回銮始末》，则以多处笔墨，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笔者摘录

两则如下：

“初五日，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杀害西士数人，教民数百，抢劫洋货店十余家，挥刀切齿，举国若狂。”

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接下来所做的事情，就是抢劫“洋货店”，而当时的“洋货店”是谁开的？是中国人开的。

以下是第二则，《西巡回銮始末：东抚袁慰帅剿匪记》记载：

“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和某村有仇，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及朱西公，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令梅汝

鼎率勇役等追捕，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肆行抢掠。”

这一则史料，也很清楚地记载了：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抢了“许庄”，又抢“师提庄”。总之，四处劫掠。

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国子监的官员罗惇𢱗，在其所著的《庚子国变记》里面，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

“董军、武卫军与拳匪混合，恣意劫掠。贝子溥伦，大学士孙家鼐、徐桐，尚书陈学棻，阁学貽谷，副都御史曾广鍈，太常陈邦瑞，皆被掠，仅以身免。徐桐、貽谷，皆附和拳匪，亦不免也。溥伦翟基告荣禄，荣禄不能制。民居市廛，数里焚掠一空。”

可见，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齋，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政府高官的事情，在罗惇齋的笔下，有以下的清政府高官，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

1.贝子溥伦；

2.大学士孙家鼐；

3.大学士徐桐；

4.尚书陈学棻；

5、阁学貽谷；

6、副都御史曾广銓；

7.太常陈邦瑞。这还不算，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洗劫一空，而且还放火烧屋，夷为平地。

其中，甘军（清军的一支部队）士兵伙同义和团，闯进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实施抢劫，将孙家鼐的儿子，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全部剥光。兵匪们还用步枪，顶着孙家鼐的腰部，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孙家鼐为了活命，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全都交了出来。

当年在刑部，还有一位官员名叫“李希圣”的，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庚子国变记》，在这册资料中，李希圣还记录了清政府高官那桐、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

“是日，遣那桐、许景澄往杨村，说敌兵，令无入。遇拳匪劫之，景澄几死。”

这一类的历史资料，实在是列举不尽。总之，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有些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不但抢劫洋人，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而更荒唐的是，义和

团连清政府的高官也是照抢不误。

这些，都是在“扶清”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

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当年，义和团的团员，大多来自于农村，见识不广，他们之中许多人，没有见过“金”和“铜”。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有一家与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名叫“联茂号”。义和团以“勾结洋人”为罪名，将“联茂号”洗劫一空。当时，“联茂号”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铜光闪闪，义和团没有见过铜，以为那是金子，于是，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据为己有。

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火中取栗，抢劫发财，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他们也眼红了，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于是，京津一带，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许多

假冒的义和团，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张德成的查处。

根据史料《天津一月记》的记载，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津假团太多，我特来查拿。”例如，在当时的河北易州，有一个名叫“张玉山”的人，假冒义和团，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平民百姓，化装成义和团“公”报私仇，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甚至，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假冒义和团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中国有句老话：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有些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

“善后大借款”与镇压革命党

1913年，袁世凯找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借了二千五百万英镑，这笔借款，史称“善后大借款”，不少人认为：这是袁世凯镇压革命党的“专款”，因此，这笔借款，是蓄谋已久的，这也是袁世凯反革命的铁证之一……然而，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的近代史读物对袁世凯的诸多指责，其中之一是袁世凯向五国银行团借了**2500**万英镑，用以镇压**1913**年**6**月～**7**月间爆发的、由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

我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是事实。但是，这笔借款，恐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这笔钱与镇压“二次革命”之间，似乎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袁世凯为什么要找外国银行团借钱？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央政府没有钱。其实，早在清廷倒台之前的**1911**年，清政府也没有钱。而在

中国的南方，当年的革命党也没有钱。

总之一句话：清政府、北洋军阀、革命党都没有钱，大家都穷得叮当响。事实上，孙中山早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暴动枪响之后，就拍发电报，找了各国政府去借款，可是，各国都不予理会。清政府没有钱打仗，革命党也没有钱打仗。于是，大家就只好坐下来谈。结果谈出了这样的结果：清廷倒台，由袁世凯组建“中华民国”，南北和平达成。

“中华民国”政府（北洋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向外国银行团寻求借款。

依照民国第一位“财政总长”熊希龄在其《熊希龄遗稿》中的记录，民国政府（北洋政府）在组建初期，其北京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

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是要借款的——

换了任何人上台，都是要筹备借款的。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尤其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百废待兴。没有钱，能干什么？

说到这里，就有一则相当重要的而又长期被人忽略的史实，必须要指出来了：孙中山早在**1912年 8月**，曾经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

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收录的《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这篇历史资料，透露了这么一个重大事实：

1912年8月，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

“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

孙中山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是这样的意思：

“现在中央政府（北洋政府）穷得叮当响，必须向外国借钱，以解决燃眉之急，只是最好不要借得太多，以防止政府滋生奢侈浪费的风气。”

由此可见，早在 **1912年 8月**，孙中山不但赞成“善后大借款”，而且还严肃地指出，借款是“燃眉之急”。不料，短短一年之后，爆发了“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于是突然反口，说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蓄谋镇压革命党之用的。

所以说——“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如此。

这笔 **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分 **47年**还清，利息是每年 **5%**，有理财经验的读者都

知道这个利率是正常的，从 47 年的期限看来，甚至可以说是优惠的。

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是不是如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用呢？

不是的。“善后大借款”，是有多种用途的：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在本文的尾部，我特摘录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的三个附件，分别是：《丁号附件：裁遣军队》、《戊号附件：行政费》、《己号附件：整顿盐务》。

从这些附件，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笔“善后大借款”，其初衷，不但不是为了扩军，而且是为了裁军，而且更重要的是，“善后大借款”的用途，包含了“政府行政费用”以及“整顿盐务”等各种正当用途，其中“行政费”则包含了例如“在外使馆经费”、“附属学堂经费”、“内外警察厅经费”、“清室优待

费”、“保护清陵经费”、“监狱经费”等诸多是正当的、合理的用途。

尽管这笔“善后大借款”，实际上有一部分用于镇压了“二次革命”，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借款。我们必须要从**1912**年初的历史说起，从这笔借款的初衷、原始动机等各方面的资料出发，去对它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很难写出客观、公正、真实的历史。

那么，至于许多革命党人指责袁世凯找帝国主义国家借这笔钱，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因此，它是一笔“非法借款”——这种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呢？

我认为这也恐怕很难符合事实。

事实上，这笔借款的“非法”之说，是源自于以下的一个基本事实。

袁世凯的财政人员找外国银行团谈妥了这笔借款，年利息**5%**并征得了国会的批准，可是，正要签约的时候，外国银行团却反悔了，说要求增加利息，增加到年息**5.5%**。

北洋政府不死心，及时将这个变卦通知了国会，同时也缠着外国银行团不放，继续进行谈判，说：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啊？

经过复杂的谈判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妥协了，又回到了原先的年息**5%**。

这样，袁世凯为了防止“夜长梦多”，遂命令财政部马上和外国银行团签约了。不料，此时在国会，却冒出了一片反对的声音。国会说我们之前是批准你签 **5%**的约，可是后来鬼子反悔了，他们抛出一个 **5.5%**的新利率，也就是说，此前的那个议案已经“过期”了。

国会还说，不错，你政府和鬼子继续谈，

最终又谈回了**5%**——可是，这个“新谈成”的**5%**，在法律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合同，是一个新的议案，既然是一个新的议案，那么，你袁世凯就必须重新回到我们国会，由我们国会再次投票表决“新议案”，你袁世凯才能和外国签约——否则，你就是违法！

这就是当年国会的指责之词。值得注意的是，当年国会议员，国民党员占了多数。这就是所谓“借款手续不合法”说法的来由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中方代表和外国银行团重新谈回到**5%**，这到底算是一个“新议案”，还是原先的那个“旧议案”？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了。本节最后，我附上当时的各种合同清单。

《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丁号附件：裁遣军队》

热河六十万圆广东一百零五万两

浙江五十六万圆江西六万两

《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戊号附件：行政费》

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预算约数

外交部所管 共一百七十七万六千二百一十二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三十八万一千五百三十二圆第二款 在外使馆经费 一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五十六圆第三款 附属学堂经费 十六万九千九百二十四圆内务部所管 共二百十九万二千六百二十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圆第二款 内外警厅经费 一百二十二万三千八百三十六圆第三款 附属医院学堂局所经费 八万零十一圆第四款 步军统领衙门经费 六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三圆财政部所管 共一千三百零二万一千八百零八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二十五万圆第二款 附属局厂经费 十九万六千七百七十圆第三款 大

总统府经费 三十万圆第四款 国务院经费包括法制、铨叙、印铸、蒙藏事务、临时稽勋各局

及审计处 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十四圆第五款 议院经费 一百万圆第六款 清室优待费 二百七十七万七千七百七十七圆第七款 税务处及学堂经费 十万零三千四百五十六圆第八款 各税务衙门经费 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圆第九款 各旗俸饷俸米折 六百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圆第十款 外旗俸饷热河、察哈尔、密云等处 六十二万五千圆第十一款 保护清陵俸饷 四十万零四千五百二十五圆陆军部所管 共一千五百八十二万六千三百二十一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五十四万余圆第二款 直辖各镇局所等饷项 八百四十余万圆第三款 参谋本部及所辖各校局经费 一百七十六万一千六百七十五圆第四款 禁卫军饷 一百二十四万三千一百九十六圆第五款 拱卫军

饷 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八百四十四圆第六款
武卫左军饷 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五十二圆
第七款 武卫前军饷 九十七万四千二百七十四圆第八款 京畿军政执法处经费及军饷 八万七千九百八十圆海军部所管 共一百三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十八万二千三百四十八圆第二款 各司令处军舰学堂经费 一百二十万圆司法部所管 共六十二万六千零三十四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三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圆第二款 院厅监狱经费 二十七万九千三百九十四圆教育部所管 共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四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五十三万七千九百八十四圆第二款 学校局馆经费 七十九万九千六百二十圆农林部所管 共三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八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三十万九千二百四十二圆第二款 场所经费 四万二千一百五十六圆工商部所管 共二十六万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一款 本部经费 二十万零八千六百五十六圆第二款 各所经

费 六万圆

交通部所管 共五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七圆交通部路航邮电各费，应归

特别预算，应可相抵。至新添路线不在内。第一款 本部经费 三十万二千八百零六圆第二款 育才费 二十三万六千六百九十一圆以上共计三千七百三十二万二千四百九十八圆。

附：特别用款

印刷局 工程机器约七十五万圆造纸厂 工程机器约一百四十万圆造币厂 工程机器约五十万圆大学堂 建筑费约五十万圆崇陵 工程费约四百六十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七圆议院 工程费约一百五十万圆元年积欠各部 行政费约三百八十四万五千圆皇室经费元年欠发商号

挪垫 三百零一万七千三百三十三圆八旗米
价 一百八十万七千七百五十圆共计一千七百
九十三万一千六百二十圆。统计五千五百二十
五万四千一百一十八圆。约合五百五十万磅。
以上各节，每月之详细预算用度，应交银行所
指定之代表人一份。

《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之《己号附
件：整顿盐务》

整顿盐务用款概算

一收盐运盐基本金 七百万圆一设机器制
盐厂 三百万圆

一整理场产 五百万圆一为按照将来与银
行商允之银行办法备垫资本与盐商 五百万圆
共计二千万圆，约二百万磅。

民国侠女施剑翘传奇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位挺身为父报仇的侠女，她的名字叫施剑翘。此人的故事相当具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

故事首先得从施剑翘的父亲——北洋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猛将施从滨讲起。

1926年，正值军阀混战的年头，施从滨和孙传芳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开战，施军兵败、被孙军追赶。施从滨开着铁甲车狂奔，要夺路过桥，但是，桥上挤满了自己手下的兵，逃命要紧，施从滨把心一横，开着铁甲车，径直从自己的战士身上辗了过去，当场撞死、撞飞许多人。有的士兵被铁甲车压断一条腿，大声哭喊，场面十分凄惨。

尽管开着铁甲车狂奔，施从滨最终还是没

能逃脱，在孙传芳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下，施从滨放下武器，投降了。被俘之后，施从滨的态度相当配合。尽管如此，孙传芳还是将俘虏施从滨杀死，并且割下了他的头颅悬挂示众。施从滨有一个女儿，名叫施剑翘。父亲施从滨的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悲痛。施剑翘立志：杀死孙传芳，为父亲报仇。施剑翘原想依靠男人为父亲报仇。不久，有个男子跟她说：“我同情你！我为你的父亲报仇！”施剑翘很感动，立即嫁给了他，并生下儿女。然后，施剑翘不断催促丈夫为父亲报仇，可是，这位丈夫却在婚后食言了，再三推搪，就是不去。施剑翘也要求过自己的弟弟（施从滨的儿子）动手为父亲报仇，可是，弟弟也不愿意。无奈之下，施剑翘不得不决定：亲自动手。当时，施剑翘和杀父仇人孙传芳，同时都住在天津。冤家路窄。孙传芳居然有个女儿名叫孙家敏，和施剑翘的大儿子在天津法租界“培才幼儿园”是同班同学！施剑翘准备好手枪之后，找借口和孙家

敏小朋友套近乎，初步摸清了孙传芳的部分生活规律。可是，尽管如此，还是很难找到靠近孙传芳的机会。

有一次，施剑翘到天津“居士林”，给死去的父亲烧香倾诉，边烧边哭。一位老和尚看她可怜和她谈话。无意中，老和尚透露了惊人的情报：孙传芳下野之后，皈依佛门，竟然是本寺的常客，常来“居士林”烧香念佛！

施剑翘终于找到了下手的机会。

机不可失，施剑翘到“居士林”守候多日，终于在 **1935年 11月 13日**，等到了孙传芳的出现。施剑翘不动声色，趁孙传芳念佛的时候，朝他的后脑连开三枪。孙传芳当场身亡。

枪声响起之际，“居士林”的信众们吓得满堂乱跑。施剑翘不慌不忙，当场散发印制好的传单。施剑翘在传单里坦言：“.....小女子我

是为父亲报仇……”随后，施剑翘抱着必死的决心，镇定自若地拨打警察局的电话，报案自首。

很快，警察来了，将她带走。笔录之后，还见了记者。施剑翘属于自首，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施剑翘为父亲报仇，开枪打死孙传芳并入狱之后，冯玉祥、李烈钧、张继等国民政府大员都同情她，并为她到南京说情。全国舆论也为施剑翘说情。

（注意：孙传芳下野之前，是国民党北伐的主要军事敌人之一，故国民党人一般不同情孙传芳。）南京国民政府在考虑之后，动用了极少动用的特赦权，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就是民国侠女施剑翘的真实传奇。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

张作霖的身世和起家问题，在近代史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确是很多普通读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笔者收集了一些张作霖身边人的证言，于此整理一下，对于对张作霖有兴趣的读者朋友，也许有一点参考的价值。

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有财以开赌场为生。有一天，张家的狗用嘴巴拉扯着张有财的老婆（张作霖的母亲）往外跑，一直跑到了树林里，找到了张有财的尸体。村子里传说张有财是被一姓王的赌徒给杀的。原因是那赌徒在张有财的赌场里输了钱，张有财说要人家的老婆抵债。人家当真了，急了，就动了杀心。

关于张作霖父亲的这段资料，出自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张作霖青年时代纪

略》中赵兴德（赵兴德是张学良的表兄）的回忆。

张作霖小的时候，本来是个读书郎，如果能将书读下去，也许人生的路会不一样，可是，他天生并非读书的料。

张作霖 12岁时，家里没钱供他念书，经过托人说情，和私塾先生谈成了这个方案：张作霖给私塾先生做饭，作为报酬，张作霖就可免费上学。

有一次，私塾先生批评小张作霖，不料老先生因此被张作霖给暴打了一顿。动手打了先生之后，张作霖知道这书再也念不成了，他对别人说：“人，干点儿啥都能混一口饭吃！这书，我不念了！”

打了人还不算，次日，张作霖回到私塾，拦住各位同学，不准他们上学，肆意扰乱私塾

的教学秩序。

小小年纪的张作霖，就霸气外露，这人注定是当枭雄的料。

关于张作霖求学、退学的这段史料，也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 4辑赵兴德的《张作霖青年时代纪略》。

张作霖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在辽宁海城一家名叫“杜家店”的旅馆里面打工，干的是伺候住客，帮住客牵饮牲口的工作。如同今天酒店里帮住客搬运行李的服务生，英文职称**为“Bellboy”**。

有一次，张作霖欠下赌债，生了邪念，他偷了一个住客的一头驴，卖掉了，不久，张作霖被人告发，“杜家店”的老板立即找来打手，将张作霖暴打至晕厥，然后将张作霖扔到苇塘当中。

张作霖侥幸不死，醒来之后，决定落草、投匪，于是，他投奔了当时的著名胡匪（土匪）杜立山。

张作霖投奔土匪杜立山之后，不久就在清政府的一次剿匪行动中，被官府抓到了。那时的张作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小，又没有人来指认他有血案啥的，结果当官的仅仅把张作霖打了一顿板子，就放他走了。

张作霖被放走之后，不思悔改，继续拉帮结匪，后来又和张景惠匪帮结合，逐渐壮大。

关于张作霖从社会底层青年落草为匪的这段史料，出自《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 4辑，赵庸声的《张作霖的起家》一文。

再后来，**1900**年，北方闹义和团，沙俄以此为理由，侵占了东北全境，给张作霖提供了真正成气候的机遇。那时，东北全境被俄军侵

占之后，清政府的各个地方政府都关门打烊了。东北大地出现了无政府的“治安真空”状态。张作霖作为土匪，这时找到了一笔更大的，而且是比较“正当”的业务，那就是：收取各个村子的保护费，保护各个村子免受土匪侵扰。换言之，张作霖瞅准了机遇，从“土匪”摇身一变，成为了地方“保安”，而且还是一家“大型保安公司”的“老总”。

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作霖这股武装力量被清政府招安，他本人就此成为了清军的一个地方将领。关于张作霖从土匪改行当保安，再被清政府招安的这段历史，诸位可参考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出自张学良的口述回忆。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我不再赘述。

第三章 深挖内幕

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国务院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

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

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

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

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

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

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

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

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

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国务院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

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

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

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

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

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国务院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

呢？

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

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

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

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

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

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

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

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

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

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

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

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
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

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

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

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

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

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

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

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

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

民团”。

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

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

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

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

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

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

《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

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

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

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

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

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

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

道的——“护法运动”。

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

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

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

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

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

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

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

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

时间要回到 **1897**年底。

那段时间，沙皇俄国急需在远东寻找一个“不冻军港”，作为俄罗斯帝国舰队在冬天的停泊地点——他们瞅上了旅顺和大连这两个地方。**1898**年初，沙俄政府派出璞科第等办事人员，找到大清重臣李鸿章，开展关于此事的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对李鸿章说：“只要你说服你们的朝廷和我们签约，将大连、旅顺租借给我们俄国，我们会给你 **50**万两银子的报酬。”

李鸿章得到这一笔“业务”，很高兴，立马上奏折，四处奔走，并说服了朝廷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给李鸿章送去了 **50万两**银子的重金贿赂——李鸿章笑纳了这笔巨款。**50万两**银子，等于现在的多少钱？如果以一两银子约等于今天人民币 **200元**的购买力推算，**50万两**银子，则约等于今天人民币一亿元的购买力。一个亿。李鸿章办一件外交事务，可以收一个亿！？这件事，在中方的史料里面，当然找不到记录——李鸿章打死也不会在任何文字里留下自己收受黑钱的记录。所以，有关这件事的史料，只能到外方的文字记录里面去找。天网恢恢，沙俄当年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在他所著的《维特伯爵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件事：李鸿章接受了沙俄政府 **50万两**银子的贿赂。

维特伯爵是当时沙俄政府的财政部长，这笔钱是经过他批准的，所以，他很清楚这件

事。再者，假设这件事不存在，维特伯爵完全没有必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捏造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捏造这样的谎言，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当然，从做学问的角度来看，《维特伯爵回忆录》的记录尽管合情合理，但毕竟是一份孤证，恐怕还不能作为结论的依据。于是，我们需要别的史料来进行佐证。

所幸近代史史料浩如烟海，只要耐心找，还是能找到的。

让我们来读一读另一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197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二分册。在这册史料的第 **103**～**104**页，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确凿的证据。

这册史料收录了俄国当年驻北京外交人员的一系列电报，其中包含了亲手交钱给李鸿章

的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拍回莫斯科的一份关键电报，在他的这份关键电报里，璞科第清清楚楚地写明了：李鸿章收受了自己**50**万两白银。

这一系列电报有四份，我们先来看第一份：

（一）**1898**年 **3**月（俄历）**9**日（公历 **21**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码急件。

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如旅顺口及大连湾问题在我们指定期间办妥，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两位大臣均申诉自己的地位非常艰难并述及官吏阶级激愤心情。向皇帝上了无数申请书，勿对我国要求让步。明天两位大臣都将向皇帝做报告。中国驻伦敦公使电总理衙门称，英国外交部对其声明，英国对我国的要求甚不表同情。

璞科第 无误 文书 巴兹特涅耶夫

这份电报写得很明白：俄方允诺给李鸿章贿赂并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李鸿章答应向光绪皇帝疏通一下。

我们再来看第二、第三份电报：

（二）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 **1898年 3月**
（俄历）**9日**（公历**21日**）

与璞科第一起非常秘密地允许李鸿章及张荫桓，如协议不迟于 **3月 15日**（公历 **27日**）签字，而我方也不必采取紧急措施时，则各酬银五十万两。

（三）内廷郎巴夫洛夫密电 **1898年 3月**
（俄历）**12日**（公历 **24日**）

允许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李鸿章与张荫桓显然已使其他大臣及亲王等对此发生兴

趣。

希望在 3月 15日签订条约以后即迅速支付所允款项，请将此事命令璞科第。

这两份电报表明：李鸿章在得到俄方送钱的允诺之后，办事很积极，开始着手说服清廷的中央大臣以及一些亲王，同意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

我们来读最后一份电报：

（四）**1898年 3月（俄历）16日（公历 28日）**七等文官璞科第由北京致财政大臣密电

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市平银重量），计值四十八万六千两（按银行所用公砵两重量折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同时我当电告罗启泰。我没有机会将款交给张荫桓，因为他非常小心。

璞科第 无误 文书 巴兹特涅耶夫

这份电报最为关键。在这份关键电报里面，沙俄办事人员璞科第，亲手交给了李鸿章**50万两**的白银。李鸿章收钱之后，十分高兴，当场向俄方表示感谢。

请大家注意璞科第给李鸿章送钱的时间：**1898年 3月 28日**。我们后世人知道，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于**1898年 3月 27日**。也就是说在签约的第二天，俄国人就给钱了——十分“守信用”。

说到这里，请允许笔者对此事的过程，来一个梳理，如下：

1.1897年底，俄国瞅上了旅顺和大连。

2.1898年 3月 21日，俄国人璞科第要求李鸿章说服清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事成之后，俄国允诺向李鸿章支付**50万两**白银作为

报酬。

3.1898年 3月 24日，李鸿章说服朝廷，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

4.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和俄国签署《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大连租借给俄国，租期为 **25年**。

5.3月 28日，俄国办事人员璞科第，如约支付给李鸿章 **50万两**白银的报酬，李鸿章十分高兴，连连道谢。

这就是李鸿章在办理外交事务的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俄国人巨额钱财的历史事实——当然了，是否存在这种可能：璞科第在电报中撒谎了，他自己私吞了 **50万两**白银，而没有真正付给李鸿章——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呢？平心而论，从理论上来讲，是可能的，但是我

们搞历史研究，一切猜想都需要证据——如果将来历史学界挖掘出来璞科第私吞 **50万两白银**的证据，也许本文所讲的论点会被推翻——但是，李鸿章死后，留下租界洋楼好几幢以及金银一大批，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些钱难道都是合法工资所得么？

当然，假如李鸿章能起死回生，他也许会这样为自己辩护：“当年中国受到日本和德国的觊觎，我引俄国海军到旅顺、大连来，是为了抗衡日本和德国，是为了请俄军来保护我们大清——也就是说，你别看我收了人家俄国人**50万两白银**，可是就《旅大租地条约》这份条约而言，它不但有利于俄国，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利于我们大清国！”

李鸿章倘若要这样为自己辩护，也许有他的道理，也许没有道理——但是，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话题，因此，笔者在此无意深入探讨。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条约是否有利于大清国，但身为大清国重臣，办理外交事务，收受外国巨额贿赂，都是不对的——这一点，恐怕是李鸿章所无法否认的。

换句话说来讲：李鸿章也许是个忠臣，但是，他同时应该也是一个贪官。他收钱的时候，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人家俄国人——而且不止一个俄国人，在他们内部的电报中，将这件事，用白纸黑字给记录了下来。

天网恢恢——该暴露的，迟早还是会暴露——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人；你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

行文到最后，就让我们来看看，李鸿章和俄国人当年所签署的这份“佣金”为一个亿的

《旅大租地条约》都是些什么内容。

《旅大租地条约》

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俄历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五日，北京。

大清国大皇帝、大俄国大皇帝欲更敦两国盟谊，互筹相助之法，为此，大清国大皇帝派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为全权大臣；大俄国大皇帝派驻华署理全权大臣内廷郎巴夫洛夫为全权大臣。该大臣等各以所奉全权之据视为妥协，商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 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国。唯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

第二款 因以上缘由所租地段之界，经大连湾迤北，酌视旱地合宜保守该段所需应相离若干里，即准相离若干里，其确切界限以及此约各项详细，俟此约画押后，在圣彼得堡会同许大臣即刻商订，另立专条。此界线商定后，所有划入租界线内之地及附近水面专归俄国租用。

第三款 租地限期，自画此约之日始，定二十五年为限，然限满后，由两国相商展限亦可。

第四款 所定限内，在俄国所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迫。若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约第八款办理。

第五款 所租地界以北，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唯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

第六款 两国政府相允，旅顺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

第七款 俄国认在所租之地，而旅顺大连湾两口岸为尤要，备资自行盖造水、陆各军所需处所，建筑炮台，安置防兵，总设所需各法，借以着实御侮；并认以己资修养灯塔以及保航海无虞之所需各项标志。

第八款 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所准中国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

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支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其造路方向及经过处所，应由许大臣与东方铁路公司议商一切。唯此项让造支路之事，永远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

第九款 此约自两国全权大臣彼此互换之日起举行。此约御笔批准之本，自画押后，即刻在圣彼得堡互换。兹两国全权大臣将此约备中、俄二国文字各二份，画押盖印为凭。两国文字校对无讹，唯辩解之时，以俄文为本。此约在北京缮就二本。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六日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三月十五日

“张勋复辟”背后的阴谋

近代史上的事情，黑幕重重，“张勋复辟”这件事，也不例外。张勋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坏人”的角色，可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我们却能读出来一个不一样的张勋，原来，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的张勋是被利用了，而且还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黑锅……

1917年，民国六年，也是清廷倒台的第六年。

这一年的**7月1日**，北京城中，突然几乎家家户户都挂出了消失了六年之久的大清国国旗——龙旗。清朝，在灭亡整整六年之后，在“忠臣”张勋的武装扶持之下，复辟了！

可能有一些读者受此前历史读物的影响，

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可是，事实的真相却是令人大跌眼镜。北京人民不但不郁闷，而且许多人似乎还挺高兴的，有的人甚至是逢人便报喜：皇上回来啦！皇上归位啦！

年仅**11**岁的废帝溥仪，在张勋的扶持之下，又坐上了龙椅，并在一群前清遗臣的辅助之下，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了。一时间，许官，封爵，张罗朝政，闹得不亦乐乎。

这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勋复辟”事件。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北洋军阀巨头段祺瑞就从天津发兵讨伐张勋。张勋力抗不支。这一场复辟，在仅仅持续了**12**天之后，闹剧般地画上了句号。

对于这段历史，不少的史书说：张勋“冒

天下之大不韪”，发动了复辟清朝的军事政变。可是，在我看来，本案其实大有内幕，恐怕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鲜为人知的是：事实上，张勋在这一年搞复辟，是有一定的人脉支持的，当年中国大部分的重量级军阀，似乎至少从表面上都支持张勋搞复辟。也就是说，所谓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恐怕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来看看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对于这件事，都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当年曾经当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对张勋复辟一事，是怎么说的。叶恭绰的说法，原文如下：

“.....1917年 5月下旬，黎元洪下令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安徽省长通电独立，继而冀、鲁、豫、陕、奉、浙、闽七省相继响应

独立。相当多的政客聚集到徐州，当时有相当多的军政人物支持张勋之主张：复辟清朝。张勋以为功业有成的机会到了，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显然是出人意料，叶恭绰这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的证言表明：张勋复辟，竟然是经过相当多的北洋军阀巨头首肯的。

依据叶恭绰的证词，当时全国重量级的军政人物，持支持复辟立场的似乎并不在少数。当然，这些军阀是真心拥护，还是虚假附和，人心隔肚皮，那就知道了。

值得注意的是叶恭绰上述证词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八个字，它道出了张勋复辟一案深层次的内幕：张勋其实是被捧杀的。

张勋是个人，不是神，他没有一眼看穿别

人真心的本事，也就是说这么多的人都同意他，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是真的同意。

这样吧，让我们通过更多的史料重新审视本案的来龙去脉。

事件爆发之前，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闹翻，此事史称“府院之争”。闹翻之后，黎元洪、段祺瑞两个人，分别都想争取重量级军头张勋的支持。

张勋的部下苏锡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这册史料里面，对张勋复辟一案的简要来龙去脉，有这样的证言和回顾：

“.....段祺瑞通过冯国璋劝说张勋派兵入京驱赶黎元洪。各省督军来了许多人，包括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冯国璋的代表胡嗣瑗、段祺瑞的代表曾毓隽、曹锟的代表、张作霖的代表

等，会上一致推举张勋出兵推翻黎元洪，拥戴冯国璋当大总统，并恢复段祺瑞总理之职。

会上，张勋的秘书长万绳栻提出条件：保皇上（溥仪）复位。大家没有答应。后来，徐树铮、胡嗣瑗等人密谋：先佯装答应张勋提出的拥戴溥仪复位的条件，利用张勋入京，推翻了黎元洪之后，再想别的办法善后（被张文生偷听到）。结果大家在一张黄缎子上签名同意了，张勋上当了。

到了天津的时候，张勋和段祺瑞见面，段祺瑞对张勋说：‘要推翻黎元洪，但是清帝复辟一事，就算北方同意，南方也不会同意，因此我建议缓办。’张勋只是默默点头，没有明说答应。

到了北京，我（苏锡麟）建议张勋：他们签名同意，是骗局，复辟一事，不能干。张勋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他们是骗我，

我也坚决要干的，这事儿干成，我死了也甘心。’

不久，惊闻段祺瑞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张勋说：‘他们推我出来复辟，原来真的在耍我，我们不能孬了，拼了命也要跟他们干到底，怕什么？到时候我们就把内情抖搂出来，难道是我张勋一个人要搞复辟的吗？’

情势越来越紧张，张勋叫万绳栻马上把当时大家签了名的那张黄缎子拿出来公之于世。万绳栻说：‘缎子留在天津，我现在就去取。’不料，万绳栻一去不回。原来，签名的黄缎子早就被冯国璋的心腹胡嗣瑗用二十万元的价格买走了。

在紧急关头，王士珍派人找了我（苏锡麟），要求停火，希望牺牲张勋，避免内战。我（苏锡麟）说：‘搞复辟，是各省督军一致签名同意的，现在他们反悔，玩弄张勋，是他们

不讲信用，现在张勋很危险，张勋是我的长官，我不能见死不救！你回去告诉王士珍，只要（段祺瑞）讨逆军不开枪，我也决不开枪。而如果张勋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我就更不会开枪！’

不料，最终还是开打了。很快，荷兰使馆派了轿车来接张勋，张勋不肯走，荷兰人强架着他上车走，张勋还咬了那荷兰人一口。

后来，（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陪同我（苏锡麟）去荷兰大使馆看望张勋，张勋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皇上怎么样了？’吴炳湘说：‘这跟皇上有什么关系？’我则问张勋：‘部队怎么办？’张勋说：‘你看着办吧。’于是，我安排部队的官兵们剪辫子、换服装，发放遣散费，遣返回乡罢了……”

张勋的部下苏锡麟的上述这些回忆，透露了以下三点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

1. 在“徐州会议”上，有相当多的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拥护张勋搞复辟。

2.张勋见大家都签名拥护，有恃无恐，果断发动复辟。与此同时，那张签了名的“黄缎子”，则被段祺瑞、冯国璋势力收买并销毁。

3.张勋在发动复辟之前，去天津见了段祺瑞，段祺瑞对张勋说：“请不要复辟，否则后果自负。”张勋则所恃各大军头在“黄缎子”上的签名“支持”，因而根本不把段祺瑞放在眼内。

换言之，张勋是被耍了。被谁耍了？被当年的北洋军头们集体耍了。

那么，事前各省军政要人在一张“黄缎子”上面签名，佯装拥护张勋复辟，这事儿，有没有更多的证人证言呢？

当然有。

关于“黄缎子签名”的这个历史细节，当时的北洋军阀王占元的幕僚杨文恺，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面，留下了证言。作为历史旁观者，杨文恺在他的证言中，是这样说的：

“……（徐州）开会时，张勋对大家说：‘中国的国情不适合搞共和，我们想请宣统皇帝复位，北京内外的各同人都已经同意了，各国也都乐于支持，

现在我与各位商量，同意的请签名……’事后听说，王占元他们是在一张黄缎子上签的名……”

杨文恺的证言说得很明白：的确存在“黄缎子签名”这么一回事。

同样关于军政要人签名同意张勋复辟一

事，北洋历史见证人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法：

“.....张勋在徐州开会，各省督军应邀列席，段祺瑞派了徐树铮参加，不料，张勋讨论的却是复辟问题，到会督军首领和代表竟然也签字画押，宣誓赞成，徐树铮则没有签字.....”

可见，曹汝霖在他的回忆录里，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黄缎子”这个载体，但是，“签字画押、宣誓赞成”，也是比较清晰的，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

在同一点上，当年的前清遗少派、北洋旁观者张达骧，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雄》这册资料里，也是这样回顾的：“是以徐树铮为首的北洋军头们耍了张勋。先是唆使你去干，你干了之后，我们再反对你。”

张达骧的证词，关键文字是这样的：

“.....徐树铮急于驱黎（元洪），恐夜长梦多，就不择手段策划行动起来，他知道张勋对复辟蓄意已久，而张的秘书万绳栻素为张所推重，遂极力唆使万在张左右鼓动复辟，这是徐树铮怂恿人上梯子之后再抽梯之计，张并未悟及.....”

这不是“耍”，是什么？

还有一个证人：曾毓隽。

在段祺瑞、徐树铮利用张勋复辟这一点上，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也在《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

“.....段祺瑞曾经说过：‘张勋带兵入京打倒黎元洪，是上了我们的当。’徐树铮也说：‘张勋是个复辟脑袋，先让他复辟，我们才有机会（倒黎执政）.....’”

以上诸多的证人证言，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家伙签名假装拥护张勋复辟，事后又出兵反对他——张勋，这个憨哥哥，显然是被玩弄了。

于是，在各方表面上的“大力支持”之下，张勋果断带领数千名辫子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京。

7月 1日，北京城全城商民的户门口，挂上了龙旗。

清朝复辟了。

就在此时，果然，段祺瑞在天津起兵讨伐张勋。7月8日，段祺瑞向张勋开出了以下的和谈条件：

1. 取消帝制。

2. 解除辫子军武装。

3. 保全张勋性命。

4. 维持《清室优待条件》。

对于段祺瑞开出的这个和谈条件，张勋是如何反应的呢？对此，《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收录了段祺瑞的心腹曾毓隽的一份回顾：

“……张勋则提出：必须允许其辫子军安全退出北京回徐州老巢。于是，谈判破裂，双方继续开打。7月 12日拂晓，讨逆军兵分三路会攻，天坛辫子军率先投降，其余的也陆续缴械了。

当时，一些军阀采取了骑墙观望的态度。例如，山东张怀芝，迟迟不发讨张电，等到得知辫子军在北京节节败退，各省纷纷发出讨张电的时候，张怀芝才仓促决定发布讨张电。

7月14日，段祺瑞返京再任总理，并亲自去

日本领事馆请黎元洪复职总统。黎元洪觉得自己引张勋入京造成此变，愧对国人，遂自己决定下野。于是，段祺瑞电促冯国璋入京，就职总统……”

为什么张勋仅仅带了几千名辫子兵，就胆敢入京搞复辟？事件亲历者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里面，是这样认为的：

“……张勋以为：在徐州军事会议上，各省军事巨头都赞成复辟了，所以只带了三千（原文如此，准确数字待考）辫子兵入京搞复辟，因为张勋深深相信各方会响应，所以不需要带太多的兵，不料，各省军事巨头临时变卦，背信弃义，食言毁约，他也没有料到段祺瑞出师竟然如此迅速……”

可见，张勋是真的相信诸多将领对自己的“拥护”，才有恃无恐，仅仅带了几千号兵进了北京城，当时的张勋，还满怀信心天真地认

为大家伙都会从四面八方带兵来拥护他呢。

而冯玉祥，则在其《我的生活》里，摘录了张勋在失败之后，写给段祺瑞的一封信，张勋在信中，是这样对段祺瑞说的：

“.....勋（张勋）知国情，只宜君主，即公等卓见，亦早诋共和，兹方拥戴冲入，辄即反对复辟.....逐鹿中原，不为大局绸缪，纯为权利起见，徒说伸张大义，岂为好汉英雄.....恨当世无直道.....”

冯玉祥进一步评论道：

“隐约之间，可以看出：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之后，是非常的愤慨。”

张勋给段祺瑞的这封信，翻译成现代国语，是这样的意思：

“.....我张勋为什么要搞复辟？因为我深深

知道：中国的国情，只适合搞君主体制。即便是号称远见卓识的你（段祺瑞），也对共和心怀不满好久了，你们刚刚拥戴我带兵入京，立即就翻脸了……你们只知道争夺政权，没有一个是为了中国大局考虑的，你们嘴巴上说的是正义，实际上都是孬种……这世界是多么的黑暗啊……”

平定张勋复辟事件之后，冯国璋以副总统身份继任大总统。

依照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知道的北洋三杰》之中的回忆，冯国璋上任大总统之后，派了恽宝惠到荷兰公使馆去慰问在使馆内避难的张勋。当时，张勋对恽宝惠狠狠地抱怨，并说了这样的话：

“我这次搞复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北洋各个实力派背信弃义。就算是你们总统（冯国璋）也有信给我（主张复辟）！”

张勋的言下之意是，冯国璋也背信弃义了。

经过梳理以上正反两方人员基本上互相吻合的证人证言，我们似乎可以基本上理清了“张勋复辟”事件的关键事实和发展经过。令人震惊！原来竟

然是这个样子的：

1.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2.段祺瑞联合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主要军事力量，劝说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

3.张勋开出条件：推翻黎元洪可以，但是希望你们支持清帝复辟。

4.上述各主要军事力量假装同意，签名赞

成了张勋的复辟建议，引诱张勋出兵。

张勋见此，有恃无恐，出兵推翻黎元洪搞了复辟。

与此同时，大家同意复辟的签名表（黄缎子）被收买、销毁。

利用完张勋之后，段祺瑞突然发兵“讨逆”，打败了张勋。张勋有苦难言，身败名裂。

就这样，张罗了短短 **12**天的“张勋复辟”事件，落下了帷幕。

张勋为什么有苦难言？因为那块写满了北洋军头的签名的黄布——“黄缎子”——被北洋集团收买了而且还销毁了。

也就是说张勋唯一能证明自己搞复辟是“经过大家同意”的那份证据被销毁了。

当然有苦难言，哑巴吃黄连。

读到这里，我想大家应该都明白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在段祺瑞和黎元洪的政治斗争当中，由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牵头，利用了忠勇有余、权谋不足的张勋，假装同意张勋搞复辟，引诱张勋出兵入京推翻黎元洪，事后，又销毁了各省同意复辟的签名录，翻脸发兵打倒了张勋，并让张勋这个憨汉子，背了将近一百年的骂名。

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有疑问：总统黎元洪罢免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为何不直接发兵打倒黎元洪，而非要让张勋去打黎元洪，自己再来打倒张勋，偏偏要绕这么一个大弯呢？

我认为“中华民国”号称“共和”，段祺瑞作为一国总理，如果自己直接起兵推翻总统，于共和精神不符，因而很容易遭到舆论的抨击，

也会失去民心。所以，段祺瑞利用张勋入京，推翻黎元洪，自己再来推翻张勋，这样绕一个弯，自己做的事情就可以名正言顺了。

也就是说，丑角让张勋去当，英雄让段祺瑞自己来做。“张勋复辟”事件的这个版本，我想应该是更加接近事实真相的。

是谁赶跑了末代皇帝

1924年 11月 5日上午，冯玉祥派出“国民军”包围紫禁城。此时，**18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尚在宫中玩乐，对即将发生的这一切，毫无知晓……被赶出紫禁城之后，一切荣华富贵，顿时都成了镜花水月、过往烟云。

鲜为人知的是：在冯玉祥的背后，让溥仪

彻底失去“宝座”的幕后“黑手”，原来却另有其人……中国的近代史爱好者，大概都知道 1924 年 11 月 5 日，冯玉祥派兵将溥仪从紫禁城里驱逐出去的这件事。依据在辛亥革命中所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是可以居住在紫禁城里面的。但是，清廷倒台十二年之后，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走了。对于这件事，一般人都知道冲到前台的冯玉祥。但是，人们似乎并不知道，站在冯玉祥后面的更高级拍板人，却是另有其人。

首先，让我们回到当时事发的现场，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

1924 年 11 月 5 日的清晨，天蒙蒙亮，鹿钟麟、李石曾等“国民军”将领，奉冯玉祥之命，带着一份《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拥兵策马，浩浩荡荡地来到紫禁城，要驱赶溥仪出宫。

当时，出来接待鹿钟麟、李石曾一行的是

清朝的老臣子绍英。绍英从鹿钟麟手中接过《修改清室优待条件》，一读，就知道来者不善。当时，绍英的心怦怦地跳。糟了，这回皇上要被赶出皇城了。十万火急。

但是，绍英毕竟是饱经风霜，他假装镇定自若的样子，彬彬有礼又绵里藏针地质问李石曾：“李将军，您不就是我大清重臣李鸿藻的公子吗？你们李家，深受我大清恩德，今日何以忍心，要如此相逼？”李石曾冷笑着答道：“对，我是李鸿藻的儿子，我从小是吃清朝的饭长大的，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这一层关系，我早就放炮赶人了，哪里还会对你们这么客客气气地说话？”绍英见李石曾的口气毫不通融，遂快步往回跑向溥仪汇报：“不好啦！鹿钟麟带兵来，要赶万岁爷出宫啦！”溥仪大惊失色。这件事情，也来得太突然了！溥仪一家人，顿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事到如今，溥仪还是希望能有个商量。于是，

他命令绍英继续往返斡旋，幻想能有所转机。绍英频繁出入，汗流浹背地跑了好几趟。宫里的后妃、太监、宫女们乱成一团，真如世界末日一般。很快，鹿钟麟就失去耐心了，他决定吓唬人。于是，鹿钟麟当着绍英的面故意转了个身，对手下的兵说：“你叫外边，先别开炮，再等二十分钟！”绍英一听这个，面色立即发黑，他立即扭头，往回就跑，火速告诉溥仪：“万岁爷，万岁爷，要开炮啦，要……要……要开炮啦！”溥仪一听大炮都架好了！顿时吓得两腿发软，立即答应鹿钟麟同意搬走。于是，溥仪一家子的全体人员，用了最快的速度，收拾行李，准备逃命。大清最后一位皇帝十分狼狈，颜面荡然无存。

这就是在近代史上有名的“驱赶溥仪出宫事件”。鹿钟麟是冯玉祥的部属。因此，对于这个事件，历史爱好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冯玉祥干的事情。

对此，有人赞扬，也有人批判。可是，无论赞扬还是批判，人们似乎都忽略了站在冯玉祥身后的更高一层的决策者，其实是一股更大的政治势力。那么，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支持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这股政治力量，他们又是谁呢？原来，站在冯玉祥的身后拍板批准了驱赶溥仪出宫行动的政治势力，不是别人——正是一群国民党人。对此，史料给我们留下了相当多的证据。例如，冯玉祥事后，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透露：他是向当时由国民党人士所掌控的“摄政内阁”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并由“摄政内阁”

讨论通过后才付诸实施的。也就是说，是国民党势力批准冯玉祥将溥仪逐出紫禁城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里面，对于这件事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我率领国民军发动北京政变，在北京站

稳脚跟之后，我开始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之内，竟然还有一个前清的小朝廷，这真是民国的耻辱，留着这个小皇帝，等于给中外野心家留了一个可供利用的把柄，实在不妙。于是，我在征得摄政内阁的同意之后，下令鹿钟麟去执行了把溥仪驱逐出宫的任务。”

可见，冯玉祥在原话中说得很明白：他在派兵驱逐溥仪出宫之前，征得了“摄政内阁”的首肯——是“摄政内阁”批准他驱逐溥仪出宫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说“摄政内阁”是一股“国民党势力”呢？这就要求我们弄清楚这个“摄政内阁”的来历了。原来，在此前不久，刚刚打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在这次内战中，国民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段祺瑞三方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抗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在这场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吴佩孚的部下冯玉祥，在国民党、奉系等势力的策反之下，突然倒戈，投向“三角同

盟”阵营，并直接导致了曹锟、吴佩孚的战败。一不做二不休。冯玉祥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的“效忠”，悍然将自己原本属于直系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即国民党部队的意思。杀入北京之后，冯玉祥立即拥护了一群国民党人士，成立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这个临时中央政府，当时称作“摄政内阁”。这就是所谓“摄政内阁”的由来。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当年这个所谓“摄政内阁”的组成人员，都有些什么人：

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交通总长：黄郛（国民党的人）内务总长：王永江（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海军总长：杜锡珪（和国民党渊源较深）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农商总长：王迺斌（和国民党渊源较浅）教育总长：易培基（和国民党渊

源较浅）参谋总长：李烈钧（国民党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摄政内阁”里面，十个人之中，有六个是国民党势力的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职位国务总理黄郛就是国民党的人，而黄郛也是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很明显，所谓“摄政内阁”，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国民党势力把持和操控的临时中央政府。如前述，冯玉祥在《我的生活》的自白中，也写得很明白，他提出驱逐溥仪出宫的建议之后，征求了摄政内阁的同意，才派人去执行驱逐。

换言之，驱逐溥仪一案真正拍板的决策人，并不是冯玉祥自己，而是站在冯玉祥背后，以黄郛、王正廷、李烈钧等人为首的这一群国民党势力分子。

“摄政内阁”作出驱逐溥仪的决策之后，向溥仪签发了一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签署人，一共有四

名：黄郛、王正廷、李书城、张耀曾，这四个人，全部是国民党的人。

换言之，无论是从冯玉祥的证言来看，还是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这份历史文件来看，驱逐溥仪的，都是把持了“摄政内阁”的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而冯玉祥，则仅仅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

行文至此，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当年这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它的全文是什么样的：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六日政府公报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兹与前清皇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特公布之此令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左：第一条 大清宣统帝从即

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第二条 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第三条 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第四条 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落款：国务总理：黄郛（国民党的人）外交总长：王正廷（国民党的人）陆军总长：李书城（国民党的人）司法总长：张耀曾（国民党的人）

什么叫作《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所谓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就是一份由“摄政内阁”单方面强行废除1912年《清室优待条件》的“毁约书”。说到这里，请容我在此给各位作一个梳理和总结，各位看了下面这个梳理和总结之后，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更是一目了然了。

1.1924年秋，爆发了第二次直（曹锟、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冯玉祥属于直系。

2.孙中山、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策反了冯玉祥，冯玉祥于是倒戈，直接导致直系战败。

3.冯玉祥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国民军”，寓意“拥护国民党的军队”，挥师杀入北京将总统曹锟赶下了台。

4.接着，冯玉祥拥戴一群国民党势力的人士，组建了一个“摄政内阁”，把持了中央政

权。同时，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来京主持国事。换言之，冯玉祥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了国民党的人了。

5. 随后，冯玉祥冒出一个想法——驱逐溥仪，但由于他深知事关重大，而他自己只是一个军人，不敢擅自决定，于是，他将这个提案，提交给由国民党势力所把持的“摄政内阁”来讨论。

6.由国民党势力掌控的“摄政内阁”经过讨论之后，拍板、决策了驱逐溥仪的议案。

7.冯玉祥得到“摄政内阁”的批准之后，立即派出鹿钟麟、李石曾带兵将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

可见，在驱逐溥仪事件的前前后后，冯玉祥所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建议者”和“执行者”的角色，而站在他的背后真正拍板、决策

的，是垄断了“摄政内阁”的一股国民党势力。

可是，当时的废帝溥仪及其幕僚，并不知道此中的内幕，以为驱赶自己出宫的，仅仅是这位“莽夫”冯玉祥的作为。

依据《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的记载，短短两个月之后，这群清廷贵族，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指责冯玉祥践踏《清室优待条件》，并向孙中山诉苦，进而请求孙中山为他们“伸张正义”，不料，孙中山却复函，对这群清廷皇室进行了坚决地拒绝和驳斥。

孙中山在当时，是这样驳斥清廷皇室的：

“你们清廷皇室，在**1917**年的时候搞（张勋）复辟，就已经是违反《清室优待条件》在先了，你们现在有什么资格指责冯玉祥撕毁《清室优待条件》？”

可见，身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孙中山，

对冯玉祥驱赶溥仪出宫的这个举动也是大力支持的。这也能很好地解释黄郛、王正廷、张耀曾、李烈钧这一群国民党人，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底气，做出了“驱赶溥仪出宫”这个在当时震惊中外的决定。

孙中山为什么不准孙眉从政

我们的历史爱好者们似乎都知道，孙中山大公无私，不准其哥哥孙眉从政。

可是，孙中山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从政？是只有大公无私这个原因吗？还是除此之外，同时也有别的隐情？通过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其实，仅仅是冰山一角……

人世间的的事情，就怕“认真”二字。我们探讨历史，尤其需要认真。解读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光看它的表面现象，而更应该探寻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

人们似乎都知道，**1912**年，在辛亥革命“胜利”的热潮中，孙眉从广州北上南京，找到自己的弟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弟弟索要官职。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对自己亲哥哥的这个要求，坚决予以了拒绝。

历史爱好者读到这一层，显然可以得出孙中山“大公无私”的结论。

应该讲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没有错的，毕竟，孙中山是拒绝了其兄长的非分之请。要知道，孙眉对孙中山，不但有着兄弟之情，而且还有着养育之恩。这个事情，如果换了你、我来做，还真未必能做得更好。

但是，孙眉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商人，平生经营生意，对政治一无所知，所以，孙中山不给孙眉封官，显然是正确的，只是，这件事除了“大公无私”这个因素以外，恐怕同时也还有着更深一层的隐情。

那么，孙中山到底为什么不准他的哥哥孙眉担任政治职位呢？

当年的同盟会成员也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以及革命同志冯自由，对于此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透露了更深一层的隐情。

原来，在辛亥革命当中，由于清帝宣告退位了，南北达成了和平，那么，顺理成章，革命军就必然要裁军、解散。毋庸讳言，裁军往往意味着断饷，或者说得更明白一些：裁军了，就有许多革命军人失业。

当时身为革命军一分子的某些广东民军，

为了逃脱“被裁撤”的命运，他们利用个人关系，说服了孙眉，要求孙眉担任广东都督，并借以照顾广东民军，而使广东民军得以继续存在下去，并借机发展壮大。

也就是说，孙眉不懂得政治的厚黑，甘受广东民军的怂恿，他要当民军的傀儡，把持广东的政权。这直接与孙中山的广东裁军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当然是孙中山所不能容忍的。

这应该是孙眉讨不到官职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请诸位跟我来，读一读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同盟会成员的证言——我们首先来听听胡汉民的证言。

胡汉民在《胡汉民自传》里面，对于此事，是这样回忆的：

“余离粤后，民军石锦泉等愈跋扈，陈竞

存使魏邦平执石杀之，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益自危，其党羽四出谋去陈，先生之兄孙眉为所动，则携黄仕龙等至南京，余察其言，不外为反动派游说，而先生亦前知王和顺等之为人，戒兄眉勿受其欺，已而民军拥戴孙眉之电报纷至，先生则自为电斥之，谓：素知兄不能当此军民大任，勿误粤局。眉怏怏而去。而王和顺、关仁甫遂反竞存，以兵击之。”

胡汉民的这段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我离开广东之后，民军石锦泉等人越来越不听指挥，陈炯明派魏邦平去把他给杀了，这样一来，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民军人士唇亡齿寒，感到害怕，他们于是说服了孙眉，孙眉于是带上黄仕龙等一帮人来了南京，我看他说话的语气，无非就是为那些不听指挥的民军人士（如王和顺等）说话，孙中山先生一向知道王和顺这些人的为人，于是他当场对

他的兄长孙眉说：不要被王和顺这种人利用。当时民军拥戴孙眉的电报纷纷发到南京，孙中山先生回复各界：我的哥哥不能担当广东都督的大任，不要让他误了广东的大局。孙眉怏怏不乐地走了。果然，事后，王和顺、关仁甫就和陈炯明打了起来。”

可见，孙眉是被广东民军利用了——广东民军不想被裁撤，于是他们想利用自己和孙眉的个人私交，在广东得以苟延残喘。

再说得更明白一些：孙中山要裁军，而孙眉反对裁军。兄弟二人在这一点政见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证言。

冯自由在其所著的《革命逸史》里面，是这样回忆同一件事的：

“辛亥广州光复，胡汉民、陈炯明先后任都督，一部同盟会员及华侨之不悦于胡陈者，乃有恢复旧兴中会之议，群拥戴德彰为首领，以与军政当局相抗衡，德彰忠厚性成，颇为所用，实则辛亥以前旧兴中会员之参与其事者，殆无一人，德彰特供其傀儡品而已，民元南京政府成立，陈炯明屡言辞都督职，于是粤省党人军人及各社团各自选举都督，电请孙大总统委任，中以举德彰者为最多，南京总统府收受此项电文，前后凡百数十通，孙大总统乃电复各界，解释不能委任乃兄之理由，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辞极剴切，众乃无言，未几，德彰自粤赴宁，拟向孙大总统面陈粤政得失，从者有失意军人黄士龙等数十人，及抵南京，乃痛言让位袁世凯之失策，并指谪粤省胡陈二督施政之谬误，对于胡汉民尤责难有加，孙大总统唯力劝其从此勿预政事，息影林泉……”

冯自由的这篇证言，如果翻译成现代中

文，则大概是如下的意思：

“辛亥革命之后，胡汉民、陈炯明先后出任广东都督，一部分同盟会员和华侨讨厌这两个人，于是他们推举孙眉为广东都督，以此来和广东的军政当局抗衡，孙眉为人老实，易被人利用，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孙眉于是带上黄士龙等几十个失意（民军）军人去了南京，批评胡汉民、陈炯明，找孙中山要广东都督的官职，孙中山叫他不要干涉政治……”

可见，冯自由的证言，和前面胡汉民的证言，在大体上是可以相互吻合、

相互印证的。我们梳理胡汉民、冯自由这两个历史见证人的证言，就可以得出关于本案的以下基本事实：

1.清帝在辛亥革命中退位之后，广东的一些起义军面临被孙中山、胡汉民、陈炯明裁撤

的危险。

2.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饭碗，这些民军人士利用私交，说服、利用了孙眉。

3.民军人士的如意算盘是推举傀儡孙眉当上“广东都督”，取代陈炯明，这样就可以保住民军的地位。

4.孙眉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他果断去南京找了弟弟孙中山，明言索要官职，并在言辞上攻击陈炯明。

5.陈炯明在当时，恰恰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是孙中山麾下难得的一员猛将。

6.孙眉被人利用，要把陈炯明搞下台，就是要砍掉孙中山的一只手。不但如此，孙眉要庇护即将被裁撤的广东民军，这也与孙中山的裁军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7.孙中山认为孙眉只是个商人，不是干政治的料，更不能当民军的傀儡。于是，孙中山显然不能同意孙眉的政治要求。

8.于是，孙中山对外界公布拒绝兄长孙眉任职，真是大公无私，理直气壮。再简化一点，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主要是以下的两点：

9.面临被裁撤命运的广东民军，利用孙眉去削弱孙中山在广东的力量，以求自保。

10.孙中山看透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他拒绝孙眉出任广东都督。因为孙眉的政治要求与孙中山的裁军规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以上两点才是这起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幕。

陈炯明与孙中山翻脸始末

1922年 6月 16日，在广州爆发了“六一六”兵变，孙中山的部下——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击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孙中山和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功过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而其中的内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922年 6月 16日凌晨，广州，天还没亮。在晓色之中，陈炯明的粤军一部，由叶举带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攻并炮击了孙中山位于观音山（今越秀山）的总统府。所幸，孙中山事前已经得到通知并及时撤离了。此事之后，孙中山与陈炯明，这对昔日的同志和战友，从此反目成仇，成为死敌。这件事在我国相当多的历史读物里，被定义为“陈炯明叛变”，读者们似乎也都有一个印象：陈炯明要杀死孙中山。可是，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

吗？陈炯明又是为什么走上了一条“叛变”的道路？对于这些，追问的人却显得很少。深究之下，史料告诉了我们：原来，在和北洋政府对抗的过程中，陈炯明主和，孙中山主战，二人在政见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而反目，进而演变成军事对抗。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陈炯明的部队在进攻孙中山总统府的行动中，其目标只是“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也就是说，陈炯明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本意。这才算是这座“冰山”比较齐全的一个真面目。

北洋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点乱，如果长篇大论地细说，不但篇幅不允许，而且还可能会使各位读懵。在本文里，请允许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用最简练的语言，将本案的背景信息、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首先，我要向各位交代这个案件事发前后的中国政情背景，分为“南”、“北”两部分。

先看北方。

1922年初，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打赢了“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进而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并逼迫他辞职。

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的根据是：徐世昌这个总统，不是由第一届国会（合法国会，又称“民元国会”）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御用团伙“安福国会”所炮制出来的。这并不符合法律程序，因此，曹锟、吴佩孚指责徐世昌是“非法总统”。

同年 4月，曹锟进一步宣布：恢复 **1912**年由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曹锟当时提出这个政治口号，一时很得民心，此事史称“法统重光”。（《临时约法》此前多次被北洋军阀废止）

换言之，国家似乎可以重新回到“共和、民主、宪政”的正常轨道上去了。

好了，我们再看南方。

此时的广州，有着另外一个“中华民国政府”，时称“护法军政府”，它是由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陈炯明等人所控制的。

孙中山当时号称“非常大总统”，为什么要称为“非常大总统”呢？这个“非常”，是不是“非常厉害”的意思呢？不是，这个“非常”，是“不太正常”的意思。

因为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的广州国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因此，这个“总统”选举，在法律程序上，也有着一定的瑕疵。但是，当时的南方革命阵营认为：这是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非常举措”，选出来孙中山这么个总统，遂称为“非常大总统”。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在广州另搞一个“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公然与北京那个世界公认的“北洋政府”搞军事对抗呢？

因为，孙中山一直宣称要“护法”，护哪个法？孙中山要护的，正是**1912**年他自己所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换言之，北洋军阀早年废除了似乎代表“中华民国”正统法理的 **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孙中山认为，北洋军阀那样做，是践踏共和，是践踏宪政，所以，孙中山要在广州闹革命，要打倒北洋军阀，推翻北洋政府。

这就是当时南、北两个政权武力对峙的特定历史背景。

在不久以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各界，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只要北京的非法总统徐世

昌辞职下野，我孙文也立即辞职下野。”

孙中山是想给全体人民做出一个这样的姿态和形象：我孙文闹革命，是为大家争民主，是为了反对独裁者。因此，只要独裁者下台，我的革命目的就达成了，那么，我孙文也可以立即下台。

可是，令孙中山始料不及的是：**1922年6月2日**，徐世昌果真辞职下野了，黎元洪复职。

这时，孙中山的头疼事儿立马就来了：由于徐世昌的下野以及孙中山之前对大众公开发表的声明，社会各界于是开始冒出了不小的声音——孙中山也应该兑现诺言，立即辞职下野。

这些民间呼吁者，有胡适，有蔡元培，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会知名人士。

为什么那么多知名人士要呼吁孙中山下

野？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法统重光了，国家开始尊重约法了，恢复民主宪政了，既然如此，谁还愿意打内战呢？谁不希望国家恢复和平、休养生息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如果还要闹革命，那就是无理取闹了，因此，他必然要失去社会舆论的支持。当然，当年某些知识分子这样想，也不一定对。这个，不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在此，暂且一笔带过。可是，也是相当地出人意料：孙中山没有理会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呼吁而拒绝辞职下野。顿时，一些媒体哗声大起。孙中山在当年为了闹革命，为了反对北洋军阀集团，各种招数都使过了，

这次，是话语稍微说得欠妥当了一点。其实不应该把话说死，而应该给自己留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这样，也许还不至于陷入这样被动的境地。曹汝霖在其《一生之回忆》里面回忆道——有一次，段祺瑞对曹汝霖说：

“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

当然，段祺瑞的话，也仅供参考。孙中山拒绝下野之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逐渐对自己的领袖产生了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异议，他说：

“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同时，陈炯明主张：应该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的“州自治”制度，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

坚持认为：必须要武力北伐，坚决打倒北洋政府，夺取革命政权。两人在这一点的政见上产生了分歧，于是，二人的矛盾越闹越深，闹到了**1922年6月12日**，终于，失去耐性的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他说：

“你的部队（粤军）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三十里地之外，否则，我不跟你客气！”

1922年6月14日，不服气的陈炯明，也针锋相对地示意他的部下们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辞职下野。

在这篇名为《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通电中，陈炯明大概是这个意思：现在，北洋政府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已经下野了，国会可以恢复了，我们的“护法”运动，目的已经达到了，没有必要再打内战了，既然你孙中山先生坚持要打内战，那么请你兑现你此前对大家的诺言，果断下野。

这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的全文如下：

“广州总统府各部总次长、非常国会、海军温总司令、伍省长、魏卫戍总司令、省议会、总商会、全省商会联合会、教育会、报界公会、学生联合会、惠州陈总司令，南雄转送李部长、许军长、梁师长、朱总司令、彭总司令、李梯团长、赖梯团长、黄司令，暨前敌各旅团长、各区善后处、各县长、各县会、北京总统府、参众两院、国务院、各巡阅使、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特别区都统、海军杜总司令、各护军使、镇守使、各军师旅长、云南唐总司令、四川刘总司令、湖南赵总司令、贵州袁总指挥、梧州马省长、廉州探送刘督办、钦州黄司令、北京蔡子民先生、上海章太炎先生、香山唐少川先生、各省各法团、各报馆均鉴：

民国十稔，祸乱侵寻，袁氏称帝而有靖国

之役，张勋复辟逼散国会而有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率海舰南来，以护法相号召，西南六省相继宣布自主，以护法相感应，六年以来，兵士亡于锋镝，人民转于沟壑，屡蹶屡起，百死不悔，唯护法故也。八年海上和会，以北廷不克恢复法统之故，和议垂成而不成，当时唐代表即有和议唯一条件为恢复国会之宣言。九年岑氏取消自主，护法几濒于危殆，粤军回粤，重组护法政府，宣布对徐，孙中山先生又有徐氏退位，当同时下野之宣言。今幸天心厌乱，旧国会已自行召集，徐氏复引咎退位，南北用兵累年，所志无非护法，今目的已达，自无用兵之必要，况粤自桂莫入据，民主已慨凋残，自主已还，以一省当西南之重，财力更形竭蹶，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举等同属国民，同隶粤军，为国为粤，不忍因一人以祸天下，为此合吁请孙中山先生实践与徐同退之宣言，敝履尊荣，翩然下野，我海内明达，救国同具热心，望治当无二致，应恳一致敦劝，同抒国

难，我海陆军前敌同胞，爱护国家，尊重法治，亦恳即日罢战，共表同情，销兵气为日月之光，尊国本于苞桑之固，民国前途，实嘉赖之。

粤军总指挥叶举，第二师师长洪兆麟、第四师师长关国雄，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二独立旅旅长熊略、第三独立旅旅长邓本殷、第五独立旅旅长陈德春、第六独立旅旅长翁式亮、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七旅旅长谢文炳、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第二路司令陈炯光、第五路司令锺景堂，第六路司令胡汉卿、第七路司令黄强，指挥官何国梁、李荫轩，司令杨坤如、陈小岳、丘耀西、陆兰清、黄志桓、黄凤纶、冯铭楷、苏世安，副司令黄任寰、黄业兴，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醅村，副官长陈演雄，炮兵团长王惺庵，团长贺瑞廷、纪泽波、王昌期、邓桂生、杨锦猷、吕春荣、饶寿平、许廷杰、陈己、林烈、苏廷

有、陈凤起、林捷之、陈家威、王定季、黎生、张化如、陈绍鹏，统领李汉隆、林子超、严胜、谭启秀、李子青、吴庆恩、袁带、余六吉、罗石平、余宏锦、邓乃忠、钟子廷、杨廷芳、陈汉洲、丘可荣、钟作新、陈国华，独立旅长翟铭祺等全体官兵同叩。”

孙中山当然不会理会这份电报。

于是，**1922年 6月16日凌晨 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可是，在此前的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就已经得到消息，并及时撤离了。

所以，叶举等人炮轰的总统府，其实只是一个空巢，只有孙中山的一小股卫士在内坚守。

孙中山则化装为一个医生，成功转移到停

泊在珠江上的中山舰（当时旧称“永丰舰”）。
炮轰广州之后，离粤赴沪。

旋即，叶举在广州的街头，贴出了如下“安民告示”：

“国会恢复，护法告终，请孙下野，表示大公，粤军将领，一致赞同，诸色人等，安业勿恐。”

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简单地讲，就是这样。梳理了这个事件的前前后后，我们理清了这件事发展的基本逻辑如下：

1.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不再革命。

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不但如此，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竟然被曹锟恢复，换言之，国家似乎有恢复宪政的迹象。

3.孙中山不理睬一些社会人士的呼吁，拒绝辞职，并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以建立革命执政。

4.孙中山出人意料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

5.孙中山对背叛自己的部下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这才是“陈炯明炮击孙中山”事件比较接近事实的版本。那么，讲到这里，又一个问题来了：当时的广州，在粤军的控制之中，如果粤军真的有心杀死孙中山，能那么容易就让他给跑了？粤军部署这次行动的机密军事会议，有谁会知道？又是谁，会将这个军事机密泄露出去的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合理的怀疑，在这次的“六一六事变”当中，陈炯明真的要杀死孙中山吗？

对于这一点，恐怕不少的朋友会被一些历史读物误导，认为“是”。我却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在**1922年6月16日**发动兵变，志在“逮捕”或者“驱逐”孙中山，而并没有要杀死孙中山的意思。

那么，我这样说，有什么依据呢？下面，请您跟从我，去听听这个事件亲历者的一些证人证言，事情自然就有分晓。大家先跟我来看看林廷华的证言。林廷华的证言，收录在《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这册史料当中。

林廷华是谁？林廷华是粤军总部参谋处的一员参谋，是陈炯明的心腹之一，他参与了此次（“六一六”）军事行动的决策会议。

林廷华的证言表明：粤军仅仅是想要“活捉”或者“赶跑”孙中山，而并不是要杀死他。

林廷华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

“.....陈炯明当时人在惠州百花洲.....我于1922年 6月 15日晚上七点钟，参加了在广州（粤军）叶举总指挥部旅长以上的军事会议，到会人员有翁式亮、军长熊略、师长陈炯光（陈炯明的弟弟）等一系列粤军要人，我和其他从惠州百花洲赶来的陈炯明的参谋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是由叶举主持的，叶举说：‘必须除掉孙中山这个民贼，否则国无宁日。’在会上，主张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声音最大的，是洪兆麟、钟秀南、陈炯光三位。而军长熊略的意见则是：‘不一定要杀死孙中山，只要把孙中山赶跑，让他去北伐，对我们粤军也有好处。经过讨论，后来作出了决议如下：推举熊略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炮击孙中山总统府，活捉孙中山.....但是，熊略被推举为总指挥之后，他一面作军事部署，一面却派他的亲信连长去通知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请立即转报总统（孙中山），6月 16日凌晨三点钟，我们粤军即将炮击总统府，请孙总统迅速出

走.....”

此外，林廷华还回忆说：

“.....事后，（孙中山的亲信）陈策告诉我：熊略 6月 15日晚上给孙中山的密报，孙中山的确收到了，但是孙中山当时不相信，他以为仅仅是陈炯明的恐吓手段而已.....”

我们梳理林廷华的这份证言，可以得知，这次军事行动的内幕，其实是这样的：

1.陈炯明当时人不在广州，因而，陈炯明并没有参加广州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现场实际指挥工作。

2.是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开会具体策划指挥的“倒孙”军事行动。其中，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以及陈炯明的一批亲信参谋等人参加了会议。

3.这次会议的决议，并不是要杀死孙中山，而是要活捉孙中山，或者驱逐他也行。

4.会后，这次行动的具体执行指挥官熊略，故意将这个情报通报了孙中山，并故意放孙中山一马。总之是一句话：作为事件亲历者和参与人的林廷华认为，陈炯明的粤军，并不想杀死孙中山。

当然，我们探讨历史，不能仅仅听林廷华的一面之词。

好，让我们来看看孙中山这边人员的证言。

首先，我们来看看马湘的证词。

马湘是谁？马湘是跟随了孙中山十几年的
一名贴身卫士。马湘在其所著《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中，对这件事，给出了与敌方的资料相互吻合的证言：粤军的确有不

少的人，将这个机密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条生路。

马湘的证词，原文是这样的：

“.....（6月 14日下午）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来报告孙中山先生：陈炯明的确要叛乱了，请先生好好准备对付.....（6月 15日）陈策又向孙先生报告陈炯明谋反的事情.....接着，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总统府秘书长谢持先后到来，报告陈炯明准备叛变的事情.....夜里十一点，陈策、魏邦平再次连续用电话报告：陈炯明谋叛，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又有各方面的电话来，告知了同一情报，这些电话都是我亲自接听并转告给孙先生的.....到了夜里十二点，林直勉、林树巍和陆志云三人，十万火急地赶来向孙先生报告，陆志云说：他有个在（粤军）熊略部下当连长的同乡，告知了陈炯明军队即将在凌晨一点钟开始攻击总统府的消息.....”

以上可见，马湘的证言和林廷华的证言，恰好是十分吻合的：正是粤军高级将领熊略，派他的亲信连长，把即将攻击总统府的消息，提前告知了孙中山的侍卫长陆志云。在孙中山的阵营中，除了马湘之外，蒋介石也有相关的证词。我们也来看看孙中山的心腹蒋介石，对于此事，又是怎么说的。蒋介石在他所写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文中，也有相同的说法：

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走的。蒋介石的证词，关键文字摘录如下：

“.....（6月 15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晚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各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

蒋介石的证言，白纸黑字，也很清楚地记载了粤军有人向孙中山提前通报炮击行动计划。蒋介石的这个证言，和林廷华、马湘上述的证言，也是能够互相吻合的。

而且，马湘、蒋介石的证言还显示：粤军内部其实并不止一派通知了孙中山，而是有好几派人先后各自通过各种渠道，通知了孙中山同一个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放孙中山一马，请他出走。

我们再来看看陈定炎是怎么说的。陈定炎是谁？陈定炎是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对于此事的说法，与前述几个证人的说法，也是一致的：是粤军的高层，提前将情报通知了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不想杀他的。陈定炎在他的著作《陈炯明研究》里，有这样的记录：

“……《华字日报》1922年 6月 29日版，9

月20日版均披露，报道了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受叶举秘密指使，提前把粤军即将捉拿孙中山的消息泄漏给了孙中山……”

这个在陈定炎的笔下出现的告密者“魏邦平”，在当时是一个立场较为中立的人员。那么，陈定炎所说的“叶举”又是谁？前文已经交代过了：叶举是陈炯明的核心心腹人员之一，是部署这次“倒孙”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人员。

还有一个证人，名叫李洁之，他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的一个连长。

这个李洁之，在《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里，写下了名为《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的经过》的一篇证词。在这篇证词里，李洁之写下了同一件事：粤军有人提前通报了孙中山，叫他出走，不想杀他。

李洁之的这篇回忆，摘录如下：

“我回到总统府第五连不久，大约是傍晚七时左右，有一个驻在后楼坊陈家军罗献祥统领部的士兵——我的朋友叫作何云生的，急急忙忙地来找我说：‘排长，你们警卫团第二营是不是明天早上开往西村，乘粤汉铁路火车出发韶关？’我说：‘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好了。’他说：‘事情不好了！听说我们统领部已经接到粤军总指挥叶举的命令，明早要派部队往西村去围缴你们的军械，请你好好注意！’”

史料的举证，暂且就举到这里吧，其实已经够了。

我们大家一起梳理以上林廷华、马湘、蒋介石、陈定炎、李洁之等人互相基本吻合的证言，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事实：

1. “六一六”炮击观音山（越秀山）总统府一案前后，陈炯明人不在广州，他没有参与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和策划。

2. 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是要“活捉”或者“驱逐”孙中山，并非是要杀死孙中山。

3.事前，粤军高层人员已通过多种渠道，通知孙中山，故意放孙中山一马，使孙中山及时得以脱身。

读到这里，也许有的读者会纳闷了：粤军一边下令部下进攻孙中山总统府，一边却暗中派人通知孙中山逃走，然后又真枪实弹地攻击总统府，这一连串自我矛盾的行为，难道不会觉得怪诞吗？其实，一点也不怪诞。请看我的分析如下：

1.粤军必须下达正式的作战令，演一场戏，而且必须要演得真，否则，无法对孙中山形成心理上的压力。

2.在形成军事压力的同时，以假装泄密的方式通知孙中山，不杀他，不把事情做绝，放

他一马，为今后留有余地。

3.无论孙中山有没有跑，炮击总统府的实际战斗都必须要进行，如果孙中山跑了，可以清除他的余部；而如果孙中山没跑，则可以活捉他。所以，粤军在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一连串怪诞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其实是前后相通的，也是成立的。综合以上所有的证人证言和梳理分析，我认为“陈炯明粤军集团图谋杀死孙中山”一说，恐怕是很难成立的。关于陈炯明和孙中山的恩恩怨怨，暂时就谈到这里吧，有机会再谈。

“九一八事变”，是谁下令不抵抗

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期的“不抵抗政策”，长期以来，在学界，曾经普遍认为：“九

“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蒋介石向东北军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张学良只是“忍痛”执行命令，而当了“替罪羔羊”……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1931年 9月 18日晚 22点3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道”在沈阳柳条湖的一小段铁轨，嫁祸中国人并突然攻击中国东北军的军营——“北大营”。

当时在北平（**1928年**之后，“北京”改称“北平”）养病的东北军将领 张学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突发事件之后，命令部下不准抵抗。于是，日本关东军火速占领了东北三省的广阔大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都说：是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可是，近些年，开始有不少人在互联网上为蒋介石喊冤，说“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下的，与蒋介石无关。

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蒋介石和张学良，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呢？事实上，我认为将上述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事实的真相，也就差不多了。

请大家跟我来，通过第一手史料来看看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依据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这册史料，原来，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一两个月内，中日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记载：**1931年7月 12日**当天，蒋介石拍发了这样的一份电报给当时统治东北的张学良：

“.....现非对日作战之时.....”

请大家注意时间：这份电报发出来的时间，是 **1931年 7月 12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两个多月之前。蒋介石给张学良发的这个电报，用现代中文来说，是这个意

思：“现在还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可见，关于对日本“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老早就给张学良定过调子了，那就是，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接到“最高领袖”的指示，张学良经过考虑之后，开始着手在东北基层，统一布置思想——上情下达。依据史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记载，**1931年 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拍发了一份电报回东北，给部下臧式毅和荣臻。张学良在这份电报里面，是这样指示他们的：

“.....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妥.....”

张学良的这份电报说明：张学良在假设日本挑事的时候，我们“抵抗不抵抗”这个问题，也老早就想好了，那就是和蒋介石的意见是一

致的——不打，至少现在不能打。

在那段时间里，东北发生了诸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外交纠纷，日本军队摩拳擦掌，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东北的局势，是一天比一天紧张。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有这样的记录：

“受张作相（此人系张学良的部下）的指派，东北军将领李济川于 **1931年 9月 15日**，来到北平协和医院当面请示正在住院养病的张学良。

李济川问：

‘……日本人也许要动手了，怎么办？抵抗？还是？’

张学良当时是这样指示他的：

‘蒋委员长告诉过我，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你叫张作相见机行事，灵活处理吧！’”

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的几天，全东北的军警机关，曾经群发过多份电报到东北大地的各个分局和派出机构，电文的内容是这样说的：

“.....日人一旦挑衅，应尽量忍让.....”

关于这个对设想中的日本军人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忍让的电报，还有许多的旁证。例如，依据 **1949年 9月 23日和 29日**伪满洲国战犯于芷山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里面的口供，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那段时间里，他作为东北军的将领之一，曾经先后一共收到过八封至九封的电报，都是东北军副司令发过来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对于日军的挑衅，不许抵抗。”

果然，1931年 9月 18日晚上，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军遵命未予抵抗，全线退让。东北大地，迅速沦陷。

9月 23日，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被收录在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这册资料里：

蒋介石说：

“.....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等待国联公理之判决.....”

蒋介石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五天之后所发表的这个演说表明：蒋介石无论在事前、事后，对日本的态度始终未变——暂时不抵抗。

史料列举了这么多，想必读者至此应该很

明白了“九一八事变”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客观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

1. 蒋介石不想和日本打仗，“九一八事变”事前是如此，事后也是如此，并且，蒋介石给张学良发过“妥协忍让”的总指导方针。

2. 张学良依据蒋介石的“指导方针”以及自己个人的利害判断，事前、事后的态度也都是明确一致的：不抵抗，至少暂时不能抵抗。总而言之，“不抵抗”，是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两个人共同的想法、共同的方针、共同的做法。

也就是说：即便是换了蒋介石坐镇东北，遇到“九一八事变”这种发生在家门口的事情，蒋介石采取暂时忍让的政策，应该也是大概率事件。事实上，早在三年前（1928年）的“济南惨案”当中，蒋介石的表现，就已经证明了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军事准备之前，蒋介石暂时

是会对日本进行抵抗的。

所以说，我们争论在“九一八事变”当中“到底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下令不抵抗”这个问题，其意义其实是不大的。

第四章 识破讹传

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信息的不公开和不对称；而讹传才是让谣言四起的最大助力。我们只有带着钻研史料的态度和刨根问底的耐性，让历史亲历者站出来说话，用他们的日记、信件、电报、自传等史料去多方印证，还原历史，才能戳穿一直误导我们的讹传。

是谁烧毁了圆明园

在中国，曾经有不少的作家、编剧，犯过“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滑稽笔误。所幸我国毕竟是有历史学者，力挽狂澜，以正视听，捍卫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历史事实。

可是，在笔者看来，即便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这种说法，仍然是有欠精准的……

是谁放火烧毁了圆明园？

一百多年以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中国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这个说法，在原则上，似乎没有什么大错。只是，如果深入到史料当中并从细节入手，则会发现，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有过于笼统的嫌疑。

我从各方史料里面读出来的事实却是——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在那把持续了两天的熊熊烈火当中，侵华法军，似乎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并未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

首先，我要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杀入北京的时候，联军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事实上咸丰皇帝那时正在热河承德避难）。这是英法联军杀向圆明园的最初动机——想活捉大清国的皇帝。

在向圆明园进军的过程中，侵华法军率先抵达了圆明园并开始抢劫园内的财物，而侵华英军的部队则在此期间迷了路并因而晚到了一天。

在晚清长期当官的美国人马士认为，是侵华法军带头劫掠了圆明园，而此后，是侵华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而侵华法军实际上并未参与放火。

马士在其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的说法，是这样的：

“.....最后，（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希望破坏圆明园宫殿的建筑，把它视为有些俘虏曾被虐待的地方，并作为计划损伤（大清国）皇帝个人尊严的一种办法.....而（法军方面的）葛历劳士男爵则以为：这不过是对没有抵抗的乡村地点和别墅的一种破坏而已，他宁愿破坏北京城内的皇宫，因为那是最高权威的所在.....（法军）孟德邦将军亲眼看到圆明园被他自己的军队所劫掠过，认为破坏圆明园是一种破坏文化的暴行，并不能产生所期望的结果，他拒绝协同去执行这种破坏，（英军）格兰特将军则反对去破坏皇宫，认为那是一种背信行为.....因而，他（格兰特）着手去执行（英国全权公使）额尔金伯爵的命令来破坏这个避暑行宫（指圆明园）。这个命令发布了，在10月 18日.....二百多所建筑物，被（英军）格兰特将军指挥的军队，付之一炬.....法国人劫掠了这个宫殿，而英国人又毁坏了它.....”

马士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的几点意思：

1. 法军洗劫了圆明园的财物，而英军则提议烧毁圆明园。

2. 法军不同意烧圆明园，法军说：要烧就烧紫禁城。

3. 英军坚持要烧毁圆明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

4. 英军一意孤行，下令自己的部队，独自烧毁了圆明园。我们再来听听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 Ringmar**）的说法：“.....**Finally, on 18th October, the British commander, James Bruce,**

the eighth earl of Elgin—the son of the seventh earl, the notorious collector of Greek marbles—ordered the Yuan ming yuan to be burnt to the

ground. During the subsequent two days, groups of soldiers were dispatched around the grounds to set fire to the various

palaces and the other buildings.....”

林瑞谷（**Erik Ringmar**）的这段叙述，翻译成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终于，在（**1860**年）**10月18日**，英军统帅额尔金（勋号略去）下令烧毁圆明园，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成群结队的士兵们，被分派到园中的各处，放火烧毁了各种各样的宫殿、塔、亭以及其他的建筑物.....”

这位瑞士学者 **Erik Ringmar**的说法，出自他所著《**Liberal Barbarism and the Oriental Sublime: The European Destruction of the Emperor's Summer Palace**》，可译作《自由派的野蛮和东方人的庄重：欧洲人捣毁圆明园始

末》。

可见，瑞士学者林瑞谷（**Erik Ringmar**）的说法，也是很清楚的：是英军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其中。

此外，我们民国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也认为是侵华英军烧毁了圆明园。

蒋廷黻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附录里面，有一篇名叫《评清史稿：邦交志》的章节，该章节当中，有如下的文字：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后巴夏礼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日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

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

蒋廷黻这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中文，是以下的意思：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被捕、咸丰皇帝暂避热河承德、英国人火烧圆明园，这些事情在《清史稿》里面，竟然只占西藏交涉案的四分之一篇幅……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奋力协助法国翻译官和（怡亲王）载垣辩论的时候，出言不逊。载垣于是表面上答应巴夏礼，暗地里却盘算谋害他们。第二天早晨，英、法两国翻译在归营报告的途中，被（清军）僧格林沁的马队抓走，英国谈判代表被抓了二十六人，法国谈判代表则被抓了十三人。这些人被僧格林沁拘禁了二十天，并遭到了虐待。其中，英国谈判代表只有一半的人生还，而法国谈判代表则只有五人生

还。后来，英国人放火烧毁圆明园，就是对这件事的报复。写《清史稿·邦交志》的人，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一段呢？……”

可见，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的说法，也是一样的：是英国人（或说英军）烧毁了圆明园，根本没有法国人（或说法军）的事。我们再来看看法国大诗人雨果（**Victor-Marie Hugo**）在他《给巴特勒上尉的复信》中的说法：

“……有一天，两个来自欧洲的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雨果的这封信，转引自贝尔纳·布里泽《**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383**页。）显然雨果的说法，也是这样的：法军洗劫、英军放火。分得

很清楚，毫不含糊。是英军烧毁了圆明园，而法军只是洗劫财物，并没有参与放火。无独有偶，“火烧圆明园”事件的亲历者——法军方面的人员阿尔芒·吕西也认为是侵华英军放火烧的圆明园，法军并没有参与放火。我们来读一读阿尔芒·吕西证言：

“.....世界第八奇迹（指圆明园），我们（指法军）刚刚将其洗劫一空，英国人又刚刚将其付之一炬，圆明园，这历经了数朝数代的杰作，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东西，今生今世，再也无缘一见了.....”

（法军方面这个人员“阿尔芒·吕西”的证言，转引自 **Bernard Brizay** 《1860：圆明园大劫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285～286页。）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法军的随军翻译埃利松在《翻译官手记》中的说法——埃利松也认为

是侵华英军不顾法军的反对，独自放火烧毁了圆明园的。

“.....（英、法两军）各派出三个人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根据物品（赃物）本身的价值或艺术价值.....以便可以平均分配.....海淀的中国（大清国）百姓已经越过围墙进入公园（圆明园）.....贪婪突然萌发了他们（海淀村民）身上那颗爱国主义（指怀念明朝）的种子，他们奔走相告说报仇的时刻已经来临，说这是老天爷要让清朝灭亡.....周边的农民、海淀的无产者们，偷偷和帮助侵略军的中国（大清国）苦力勾结，进入园林中的宫殿.....时不时有人高喊‘救火啊’。他们慌张赶过去，任凭东西散落一地，他们用丝绸.....床单.....来扑灭已经烧到珍木壁板的火焰.....英国人不顾他们盟军（指法军）的克制行为，独自派出了一支纵队，有条不紊地烧毁了圆明园里剩下的一切.....宫殿被烧了，寺庙、珍宝

馆、藏书阁被烧了.....都化为了黑色的灰烬.....（法军蒙托邦司令）说：“这些人（指英军）简直是太狂妄了，简直是虚伪透顶.....”

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 Brizay**）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也查阅并引用了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证言如下：

“.....附近海淀村的（大清国）村民，和法军招募的一些（大清国）苦力，已经架上了云梯，攀上墙头进去了，开始自顾自地抢了起来，他们在好几个殿堂放了火，因此开始引起恐慌.....就这样，英国人、法国人.....大批地冲进了圆明园，不仅仅是他们，那些中国（大清国）苦力，还有中国（大清国）的盗贼，都鼓足劲儿大捞意外之财.....”

可见，侵华法军随军翻译埃利松的说法，要点如下：

1. 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军一起对圆明园开展了洗劫。

2. 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在圆明园内放火，法军则开展救火。

3. 法军反对放火烧毁圆明园，英军一意孤行独自放了火。

4. 法军司令蒙托邦对英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一事，十分不满。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

“.....（英军）此次抢劫延续了整整一天.....在撤走以前，英国人把他们到过的宫殿和他们四周的花园都放把大火烧了，他们还说，今天傍晚的夜景，一定是非常漂亮的.....一到傍晚，果真就像英国人事先讲的那样.....一片红光就照亮了鞑靼山的支脉.....一片火光不时腾空而起，火花四溅，在空中飞舞，然后

又很快消失，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建筑物倒塌的轰隆声清晰传来，直刺我们的耳鼓……”

（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此处证言，请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67~368**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6月第 1**版。）

这个侵华法军士兵德凯鲁勒的说法是：真正大规模的火烧圆明园行动，是英军干的，而法军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

法国学者贝尔纳·布里泽（**Bernard Brizay**）对放火烧园的英军主要部队，作了非常仔细的考证，也收录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册资料中。他是这样说的：

“……**10月 18日**……英军到处张贴布告，宣布：（英军）格兰特将军下令捣毁圆明园，以

报复英国俘虏所受的虐待。这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约翰·米契尔将军率领英军第一师的第六十来复枪团和第十五旁遮普团，连同骑兵旅共约三千五百人，向圆明园进发……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向圆明园各处放火，圆明园内的建筑大多以雪松建成，极易点燃……工兵上尉查尔斯·戈登几天前参与了对圆明园的洗劫，现在又回来纵火……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法国人拒绝和他们（英国人）一道焚烧圆明园……”

可见，放火烧毁圆明园的洋兵，其番号、人数、将帅名字……是十分清晰的——都是侵华英军的人。

那么，法军到底是不是一丁点儿火也没放过呢？恐怕也不是。我们来听听英军方面的人员、亲历者斯温霍的证言：

“.....当法国人对圆明园内部毁坏工作完成后，他们焚烧了皇帝的寝宫，退出庭院，搬到安定门外的一个村子驻扎.....”

（斯温霍的此处证言，请参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35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第1版。**）

斯温霍的证言指证了法军在此前的劫掠当中，放火烧毁了咸丰皇帝的寝宫，但是，这只是一起小规模放火行为。

法军在几天之前小规模放火行为，在英军方面，还有一个证人，他是英军的吴士礼中校。

吴士礼中校在同一册资料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的盟军（指法军）抢完了，也烧

了多处宫殿，却反过来抗议我们……他们认为将圆明园完全捣毁，简直是哥特人的野蛮行径，令人诧异的是，当我们的高卢盟友（指法军）将那里的奇珍异宝洗劫一空时……这种评价居然没有闪现在他们向来堪称敏锐的头脑中……”

今天的资料，就列举至此，事实上，相关资料还有很多。

综合上述的各种史料以及各家的说法，请容我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一个以下的总结：

1.1860年 10月 5日，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误以为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遂向圆明园进军。

2.1860年 10月 6日，法军率先抵达并占领了位于北京郊外的圆明园。

3.此时，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翻墙进入圆

明园开始抢劫，法军几乎同时也发起了抢劫。期间，海淀村的大清国居民和法国人，都对圆明园实施了小规模放火行为。但是，这些小规模放火得到了控制，对圆明园全园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大毁坏。

4.1860年 10月 7日，英军抵达圆明园，加入了抢劫财物的行列。

5.1860年 10月 8日，英军和谈代表巴夏礼等人获释。英军随后获悉，有部分英国谈判代表于此前被清军杀死。

6.英军遂决定报复，提议烧毁圆明园全园。法军反对并拒绝参与放火。

7.1860年 10月 18日，英军一意孤行，私自决定烧毁圆明园全园，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放火行动。

8.1860年10月 19日，圆明园全园被侵华英

军烧毁。也就是说不是“英法联军”，而是“侵华英军”最终放火烧毁了圆明园。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更能接近当时的历史事实。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人们常说：卖国贼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与日本人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可是，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十分符合历史的事实……

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一直以来流行一种这样的说法：卖国贼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属实的。而说袁世凯这样做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那就更是对历史的扭曲。

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出兵中国山东青岛，打跑了青岛德国租界的德军。之后，日本向袁世凯开出了撤兵的条件，一共有二十一个条件，史称“二十一条”。（这个“二十一条”的全文，见文后附录。）

袁世凯接到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派了北洋政府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游说山县有朋等日本政坛元老。在有贺长雄的游说之下，部分政坛元老，例如松方正义，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质问并施加了压力。

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密令北洋政府外交人员顾维钧，秘密地将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政治要求的事情告知了英、美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进行了刁难。

在内外政治压力之下，日本自行删除了其中的七款要求，余下的要求，只有十四条。

读到这里要注意了：上述这些事情，仅仅发生在洽谈期间，袁世凯至此，仍然尚未签约。

后来在实际签约的时候，是分拆开两个条约来签的，它们分别叫作《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山东之条约》，由于是在中华民国四年（**1915**年）签署的，取年号为名，把两个条约统称为《民四条约》。

由上述两个条约合并统称的《民四条约》，全文合计实际签署的，只有十三条，而且刨去诸如“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的两条格式条款以及“现行条约一概照旧实行”这条可签可不签的条款之外，实际上只有十条。

总而言之，在著名的“二十一条”历史事件

当中，袁世凯与日本签署的实质性条约，只有十条。

不但如此，到了 **1922**年，北洋政府又和日本签约，废止了《关于山东之条约》，只剩下《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共九条，其中无实际意义条款有两条，实质性的条款，仅有七条。

换言之，近代史上著名的这个“二十一条”事件，事实及其发展逻辑如下：

1.1915年，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政治要求，作为日军从青岛撤兵的条件。

2.在洽谈过程中，北洋政府利用外部政治力量对日本施压，日本自行删除了七条。

实际签署时，名义条款合计，一共仅有十三条（实质条款只有十条）。

1922年，日本和中国废除了四条，只剩九条。

剩下的九条当中，无实际意义条款占了两条，实质性条款仅有七条。这才是所谓“二十一条”事件的历史事实。

附：《二十一条》全文

第一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 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

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第二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 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

下列两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准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 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订立专条如下：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购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

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第五款中国允准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定。第七款中国允准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附：《民四条约》全文

《民四条约》之一：《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

第一条.两缔约国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之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条.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为盖造商、工

业应用之房厂或为经营农业，得商租其需用地亩。

第三条.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一切生意。

第四条.如有日本国臣民及中国人民愿在东部内蒙古合办农业及附随工业时，中国政府可允准之。

第五条.前三条所载之日本国臣民，除须将照例所领之护照向地方官注册外，应服从中国警察法令及课税。民、刑诉讼，日本国臣民为被告时，归日本国领事馆，又中国人民为被告时，归中国官吏审判；彼此均得派员到堂旁听。但关于土地之日本国臣民与中国人民之民事诉讼，按照中国法律及地方习惯，由两国派员共同审判。将来该地方之司法制度完全改良时，所有关于日本国臣民之民、刑一切诉讼即完全由中国法庭审判。

第六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东部内蒙古合宜地方为商埠。

第七条.中国政府允诺，以向来中国与各外国资本家所订之铁路借款合同规定事项为标准，速行从根本上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将来中国政府关于铁路借款事项，将较现在各铁路借款合同为有利之条件给予外国资本家时，依日本国之希望再行改订前项合同。

第八条.关于东三省中、日现行各条约，除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一概仍照旧实行。

第九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民四条约》之二：《关于山东之条约》

第一条.中国政府允诺，今后日本国政府向

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条.中国政府允诺，自行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于胶济路线之铁路。如德国抛弃烟潍铁路借款权之时，可向日本国资本家商议借款。

第三条.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合宜地方为商埠。

第四条.本条约由盖印之日起即生效力。

段祺瑞吃素为哪般

“三一八惨案”发生在段祺瑞吃素整整 6年后，他吃素是为自己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

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屠杀刘和珍之后，段祺瑞开始终生吃素，为学生赎罪”——这是中国互联网流行最广的近代史谣言之一。

段祺瑞吃素，到底是不是为“三一八惨案”而忏悔？我认为不是。我手上的证人证言很多。请听我一一道来。

首先，段祺瑞的毕生老友曹汝霖，在他的《一生之回忆》里面说：段祺瑞信佛吃素。曹汝霖并没有提到段祺瑞吃素是为“三一八惨案”赎罪，而只是说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

或许读者觉得曹汝霖的证言很单薄。没错，但是别急，再往下看。

曾经在段祺瑞公馆长期当仆人的王楚卿，写下了如下的回忆：

“.....**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争失败.....老段在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全家第二次搬到天津.....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素菜.....他吃素，可是吃鸡蛋，他专养了几只母鸡，没有公鸡，这样下的蛋，据说是素的，可以吃，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

王楚卿作为段祺瑞的身边人，这段证言表明了早在**1920**年直皖战争结束，段祺瑞移居天津之时，段祺瑞就已经开始吃素，而“三一八惨案”则发生在**1926**年。换言之，段祺瑞在开始吃素整整**6**年时间之后，才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也就是说，段祺瑞吃素，与“三一八惨案”，并没有因果关系。

王楚卿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以下两本史料里面：

1. 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75页。

2. 《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段祺瑞公馆见闻》。也许，挑剔的读者还会说——王楚卿说了算吗？不用着急，再往下看。我再搬出来一个证人：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写下了如下的回忆：

“……我父亲信佛吃素，平时一口长斋，早饭常备一碟咸雪……但并不要求全家都吃素，只是在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才全是素菜……”段式巽的这段话，也证明了这个事实：段祺瑞吃素，是因为信佛。段式巽在回忆中，也没有提到过什么“三一八惨案”。

段式巽的这段证言，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21页。

段式巽的证言，也旁证了上述王楚卿证言

的可信度，因为有几个细节是可以相互印证的，例如，段祺瑞吃饭备小菜，段祺瑞家人吃荤等。

我们再看一个证言。此人是临时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名叫楚溪春，他是“三一八惨案”的亲历者。

楚溪春写下了以下的回忆：

“（三一八惨案）事件发生之后，我赶往吉兆胡同段祺瑞的住宅去报告，段祺瑞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

可见，依照楚溪春的证言，段祺瑞别说为“三一八惨案”忏悔，段祺瑞简直就是觉得卫队开枪杀学生是对的，段祺瑞根本毫无忏悔之意，更别说为死难学生而吃素赎罪了。

楚溪春的这篇证言，名叫《三一八惨案亲

历记》，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不但没有忏悔，而且还发布《临时执政令》，通缉闹事的学生，这件事在鲁迅、李葆华、曹汝霖等人的多种著述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我们再看一篇文献，这篇文献名叫《三造共和、六番执政》，是合肥文史工作者戴健于1990年采访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之后，所整理的文字，在本文当中，戴健记录下了段祺瑞生前说过这样的话：

“作为武人，难免打仗死人，应该忏悔罪过。”

换言之，段祺瑞吃素，是为自己以往的军旅生涯中杀人的罪孽而赎罪，并非为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并不属于“打仗”，

再说，该惨案也不是段祺瑞下令开的枪，根本就轮不到他忏悔。

这篇文献，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 109 页。

曹汝霖、段式巽、王楚卿、楚溪春四个人，分别是段祺瑞的下属、女儿、仆人、卫兵，都和段祺瑞有密切的交往。戴健虽然和段祺瑞没有交往，但是他采访过段祺瑞的女儿。整理他们五个人的文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基本事实：

1.段祺瑞认为军人杀业太重，并于 **1920** 年开始信佛、吃素。

2.3月 18日，“三一八惨案”爆发，执政府卫队枪杀学生。

3.事后，段祺瑞认为：学生是暴徒，被枪杀是活该。

4.段祺瑞对于被杀的学生，根本就没有忏悔之意。

5.所谓“段祺瑞吃素为学生赎罪”，与史料相悖，不能成立。

我认为分析到这里，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段祺瑞吃素和“三一八惨案”根本无关。大家可以停止传谣了。

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

这几年，中国的网络上，兴起了一股“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的大讨论，并且笑谈“中华民国是由一位美国友人缔造的”。孙中山的确曾经“订做”了一份夏威夷出生地证明，并且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但是，如果说中华民国是

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恐怕也未必十分符合事实……

“孙中山是美国人”？

别的先不说，单是这七个大字，就足够吓死一头牛。如果它属实，那么意味着：“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友人”缔造的，这显然将令我们中国人啼笑皆非。

“孙中山是美国人”这个论点，是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历史论坛上堪称“重磅炸弹”的轰动性信息。在前一段时间里，网上冒出来不少哭笑不得的评论，说“中华民国是由一个美国人建立的”、“国际友好人士帮助中国人民推翻清朝”等，凡此种种，确实吸足了眼球，大大地哗众了一把。

那么，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到底是不是美国人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以下三个分支问题：

1. 孙中山在革命低潮流亡美国时期，有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2. 孙中山如果有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国籍有没有被吊销？

3. 孙中山本身的大清国国籍，又有没有曾经被注销过？这三件事，还得仔细研究研究，而且要有根有据，方能使人心悦诚服。

所幸，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早就将孙中山在美国居留时期的相关文件解密并且公之于世了。一整套的文书，包含孙中山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孙中山上诉状”、“美国政府裁定书”等一系列的文件，早就公之于众了。我研读过这一套文件，全英文的泛黄的老文书，所以，我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经过，原

来是这样的：**1866年 11月 12日**，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属广东省香山县户籍。当然，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户口簿管理制度的。但是，事实也是相当清楚的，孙中山生在中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总之，孙中山是中国人。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关键在于后来，事情是怎样演变的。**1878年 5月**，十三岁的孙中山赴夏威夷，投靠自己的亲哥哥孙眉，当时，孙眉在夏威夷经商。抵达夏威夷之后，孙中山在夏威夷上学念书。**1883年**，孙中山回到中国。**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起义失败，逃亡日本。**1896年 6月**，孙中山首次踏进旧金山——美国本土。说到这里，有必要交代一条信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有相当多的中国人伪造“夏威夷出生证明”，以骗取美国居留权。在**1904年3月14日**，孙中山也托人“办理”了一张这样的“夏威夷出生证明”。

1904年 4月 6日，孙中山手持这份“订做”的“夏威夷出生证明”，再次从美国旧金山登陆，并向旧金山移民局提交了这份“夏威夷出生证明”，以证明自己有资格取得美国的入境权和居留权。

旧金山移民局在审查了孙中山的文件之后，对孙中山产生了怀疑，于是，移民局将孙中山拘留到了木屋子里面候审。

1904年 4月 16日，旧金山移民局做出了“拒绝孙中山入境”的决定。移民局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孙中山曾经在 **1896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入境美国旧金山，这个举动，视为孙中山放弃了原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的资格。

在孙中山被关在旧金山移民局的木屋期间，孙中山收买了一个报童，报童帮他送信出去，向美国的华人社团求救。接到孙中山的求救信件之后，美国华裔报人伍盘照和华人社

团“致公堂”，对孙中山组织了营救。

当然，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里所说的“营救”，当时不是指“劫狱”的意思，而是请律师，请大律师帮助孙中山。

1904年 4月 26日，华盛顿的一家律师事务所（**Ralston&Siddons**）代表孙中山，向美国移民管理部门提起了上诉。

1904年 4月 28日，令人十分意外的是，美国“商务及劳工部”作出了这样的一个复议决定：准许孙中山入境美国。

美国“商务及劳工部”做出这个复议决定的理由是：因为早在 **1896年**的时候，旧金山当局没有对孙中山“我出生在夏威夷”的声明提出过异议，所以，**1900年4月30日**生效的《美国移民新法案》，自动赋予了孙中山“美国公民”的入境权。

就这样，孙中山打赢了这场移民官司，并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并从木屋子里被释放了出来，顺利入境美国。

从此，孙中山取得了一份美国护照。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此时所取得的美国护照，是一份“美国夏威夷护照”，或者说——“美国殖民地护照”，又称“疆省护照”，它和美国本土公民所持有的“正规美国护照”是有所区别的。

当然，“美国夏威夷护照”毕竟也是美国护照。因此，至少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说“孙中山是美国人”，其实并不过分，可以说基本符合事实。

总之，孙中山从**1904年 4月 28日**开始，变成了美国人。

众所周知的是，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在美国华侨圈子中，开展了革命宣传和筹款

的活动。

那么，孙中山又是在何时，怎样失去美国公民身份的呢？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908年 11月，孙中山在泰国期间，访问美国驻泰国公使馆，并面见了美国公使汉密尔顿·金（**Minister Hamilton King**）。

在会面期间，孙中山要求美国政府给他颁发一本“美国本土护照”，这不同于“美国夏威夷护照”。

汉密尔顿·金公使立即向美国国务院拍发了报告并请示。

1909年3月11日，美国国务院向汉密尔顿·金公使下发了这样的决定：孙中山没有资格登记为美国公民或申请美国护照，理由如下：

“美国公民享有权利，但也有责任和义务，他（指孙中山）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

基于这些理由，从**1909年3月11日**开始，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资格，但是也没有收回孙中山手中的“夏威夷殖民地护照”。

也就是说，孙中山仅仅在 **1904年 4月 28日** 至 **1909年 3月 11日** 期间，是美国人。从那以后，孙中山就不再是一个美国人了——至少人家美国政府，不承认孙中山是美国人。

但是，上述讲了这么多，都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大清国户籍，到底有没有被注销？换句话说：孙中山是不是美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孙中山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种身份叫作“双重国籍”！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孙中山有没有被吊销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的户籍？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 **1909**年清政府所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

1909年的《大清国籍条例》有如下的关键性条文：

第十一条：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第十二条：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籍：

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

二.兵役之义务

三.应纳未缴之租税

四.官阶及出身

其中，依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孙中山如果

要加入美国国籍，则必须先回香山县官衙、办理出籍（放弃大清国国籍）的手续。如果不经这个手续，那么就算孙中山在美国拿到了护照，孙中山的美国护照在大清国也是得不到官方承认的，大清国政府仍然将孙中山当作大清国人看待，理由是：孙中山尚未办理出籍手续。

那么，孙中山回香山县办理了出籍手续没有？显然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自从**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就长期流亡海外。他根本不敢回香山县办理出籍手续，否则，他会立即被捕。

而《大清国籍条例》第十二条，说的又是什么呢？这条说的是：如果一个大清国国民想申请出籍，那么他必须在县衙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否则不准出籍。所以，香山县衙无论如何也不会批准孙中山出籍，因为孙中山是当时大清国重要的通缉犯。

也许，懂行的法律界朋友会质疑，这份《大清国籍条例》颁布的年份是**1909**年，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法理，从**1895**年至**1909**年这段时间怎么算？

我的理解是在那段时间里，孙中山仍然一直是大清国国民，道理十分简单，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一直没有撤销，换言之，清政府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民身份不放，否则清政府就会受“领事裁判权”所限，根本无法法办孙中山。

这里还有一份旁证：依据史料《孙逸仙伦敦被难记》，**1896**年 **9**月，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进了大清国驻英国的公使馆，绑架之后，大清国公使馆是这样对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媒体进行辩解的：

“.....孙文是我大清国的国民，是一个重量级的通缉犯.....”

可见，清政府不但一直保留，而且一直紧咬着孙中山的大清国国籍不放。综上所述，孙中山本人一直是大清国公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讲到这里，请允许我对这件事的始末，作一个简洁明要的梳理如下：

1.11月 12日，孙中山出生在大清国广东省香山县，自动获得大清国国籍。

2.4月 28日，孙中山在美国打赢移民官司，取得了美国国籍并获取了“美国夏威夷护照”。

3.3月11日，美国国务院重新审查孙中山的移民个案，做出一个决定：拒绝承认孙中山为美国公民，拒绝向孙中山颁发美国公民护照。

4.1912年 1月 1日，“中华民国”成立，正宗大清国国民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综上所述，“中华民国由一个美国人缔造”的历史谣言，从此，不再成立。

附件：《大清国籍条例》（1909年）

大清国籍条例

第一条 凡下列人等不论是否生于中国地方均属中国国籍：一)生而父为中国人者二)生于父死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三)母为中国人而父无可考或无国籍者

第二条 若父母均无可考或均无国籍而生于中国地方者亦属中国国籍。其生地并无可考而在中国地方发现之弃童同。

第三条 凡外国人具备下列各款愿入中国国籍者准其呈请入籍：

一)寄居中国连续至十年以上者

二)年满二十岁以上照该国法律为有能力者

三)品行端正者

四)有相当之资产或艺能足以自立者

五)照该国法律于入籍后即应销本国国籍者

其本无国籍人愿入中国国籍者以年满二十岁以上并具备前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者为合格。

第四条 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殊勋于中国者虽不备前条第一至第四款得由外务部民政部会奏请旨特准入籍。

第五条 凡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入籍：

一)妇女嫁与中国人者

二)以中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

三)私生子父为中国人经其父认领者

四)私生子母为中国人父不愿认领而经其母认领者

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入籍暂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入籍者以照该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

第六条 凡男子入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应随同入籍人一并作为入籍其照该国法律并不随同消除本国国籍者不在此限；若其妻自愿入籍或入籍人愿使其未成年之子入籍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第四各款准其呈请入籍；其入籍人成年之子现住中国者虽不备第三条第一至四各款并准呈请入籍。

第七条 凡妇人有夫者不得独自呈请入籍。

第八条 凡入籍人不得就下列各款官职：一)军机处内务府各官及京外四品以上文官二)各

项武官及军人三)上下议院及各省咨议局议员前项所定限制特准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十年以后其余入籍人自入籍之日起二十年以后得由民政部具奏请旨豁免。

第九条 凡呈请入籍者应声明入籍后永远遵守中国法律及弃其本国权利出具甘结并由寄居地方公正绅士二人联名出具保结。

第十条 凡呈请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给予执照为凭。自给予执照之日起始作为入籍之证。其照第五条作为入籍者应具呈所在地方官详请该管长官咨明民政部存案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存案。

第十一条 凡中国人愿入外国国籍者应先呈请出籍。

第十二条 凡中国人无下列各款者始准出

籍：一)未结之刑民诉讼案件二)兵役之义务三)应纳未缴之租税四)官阶及出身

第十三条 凡中国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均作为出籍：

一)妇女嫁与外国人者

二)以外国人为继父而同居者

三)私生子父为外国人其父认领者

四)私生子母为外国人其父不愿认领经其母认领者

照本条第一款作为出籍者以正式结婚呈报有案者为限若照该国法律不因婚配认其入籍者仍属中国国籍照第二第三第四款作为出籍者以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未为人妻者为限。

第十四条 凡男子出籍者其妻及未成年之子一并作为出籍。若其妻自愿留籍或出籍人愿使

其未成年之子留籍者准其呈明仍属中国国籍。

第十五条 凡妇人有夫不得独自呈请出籍。其照中国法律尚未成年及其余无能力者亦不准自行呈请出籍。

第十六条 凡中国人出籍者所有中国人在内地特有之利益一律得享受。

第十七条 凡呈请出籍者应自行出具甘结声明并无第十二条所列各款及犯罪未经发觉情事。

第十八条 凡呈请出籍者应具呈本籍地方官详请该长官咨请民政部批准牌示其在外国者应具呈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大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出籍之证其未经呈请批准者不问情形如何仍属中国国籍其照第十三条作为出籍者照第十条第三项办理。

第十九条 凡因出嫁外国人而出籍者若离婚

或夫死后准其呈请复籍。

第二十条 凡出籍者之妻于离婚或夫死后未成年之子已达成年后均准呈请复籍。

第二十一条 凡呈请出籍后如仍寄居中国接续至三年以上并合第三条第三、四款者准其呈复籍其外国人入籍又出籍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条 凡呈请复籍者应由原籍同省公正绅商二人出具保结并照第十条第一项办理其在外国者应由同在该之本国商民二人出具保结呈请领事申由出使大臣或迳呈出使臣咨部办理。自批准牌示之日起始作为复籍之证。

第二十三条 凡复籍者非经过五年以后不得就第八条所列各款官职。如奉特旨允准不在此限。

第二十四条 本条例自奏准奉旨后即时施行。

孙中山博士的由来

我们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一个尊号叫作“孙逸仙博士”，可是，孙中山真的拥有博士文凭吗……

我们近代中国的知名革命家孙中山，至少有以下这么多的尊称：

1. 孙逸仙博士。

2. 孙博士。

3.**Dr.Sun**（英文“孙博士”）。众所周知的是，**1923年 8月**，孙中山派出一个访问苏联的代表团，代表孙中山赴苏联开展访问，这个代表团的名称就叫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

还有，在此前的 1923年 1月 26日，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AdolfAbramovich Joffe**）签署了一份《孙文越飞宣言》，在这个宣言里面，在提到孙中山的时候，有多达十一处“博士”的字眼出现。

这个《孙文越飞宣言》的全文，详见于本文附录。

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中，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个人的学识，平心而论，很可能并不在一个博士毕业生之下，但是，我们对于历史，也许更应该实事求是。孙中山到底是否真的拥有一个“博士文凭”？抑或这个“博士”，仅仅是社会各界人士对孙中山出于敬佩而给予的尊称？

这个，我们恐怕就要从孙中山本人的求学经历讲起了。为了方便阅读，我们不妨用表格的方式，总结一下孙中山人生中的求学经历：

我们从上述的这个表中得知：孙中山在一生中所就读的最高学府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其一生中接受的最高学校教育大约是相当于现在“大专”的教育。

孙中山所读过的最高学府——“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一家“书院”，并非一所大学，它并没有博士课程，当然也没有颁发过博士学位。

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创立于**1887**年。**1907**年，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更名为“香港西医书院”，最后并入香港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在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求学期间的成绩，实事求是地说是优秀的。但是，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是没颁发博士学位证书资格的。

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从香港华人西医书

院毕业之后，去了澳门开诊所当医生，但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澳葡当局承认的医生执照，孙中山被迫终止了在澳门的医生职业。

历史的误会，出处就在于这里——医生这个职业，英文叫作“**doctor**”，而“**doctor**”这个英文单词，是一个多义词，它除了“医生”这个意思之外，又有“博士”的意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对外写信，常用“**Doctor Sun**”（孙医生）自称，但是，有人看了“**Doctor Sun**”这个词，以为是“孙博士”的意思。因为，“孙博士”的英文写法，同样也是“**Doctor Sun**”。久而久之，就有人开始称呼孙中山为“孙博士”了。

这是一场阴差阳错——一个英文多义词所闹出来的误会。

为了说得更明白一点，作者再将这个误会

发展的逻辑，简要梳理如下：

1.孙中山是医生，“孙医生”的英文是“**Doctor Sun**”。

2.“**Sun**”这个词在英语里有歧义，也可以是“孙博士”的意思。

3.于是，开始有人误会孙中山是博士，并称呼孙中山为“博士”。

4.孙中山“盛情难却”，索性“恭敬不如从命”，照单全收。这就是孙中山这个“优秀大专生”，在社会上被尊称为“博士”的缘故了。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孙中山这种英雄人物去刻意追加一些高级文凭，孙中山本人的作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博士毕业生的作为，因而，就算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大专生，也丝毫不能使他头上的光环褪色。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博士生有许许多多，而孙中山，则只有

一个。这就够了。

附录《孙文越飞宣言》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会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急之问题仍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炽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

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行确认此等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制政府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索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款中，包括关于中东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条，曾特别叙述之。）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适可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办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与特殊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于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

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害与必要计，现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逸仙博士以最亲挚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南方，然后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孙逸仙、
越飞签字

蒋介石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台湾当局“阳士林口字第 0001号”《中华

民国国民身份证》上面，蒋介石的“教育程度”一栏，赫然写着“日本士官学校”六个大字。

所谓“日本士官学校”，指的是在近代时期赫赫有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校，当时可谓是威震远东。

可是，蒋介石真的念过这所在当年威震远东的军事院校吗？

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赴日本留学，他就读的是一所名为“日本振武学校”的军事预科学校。

这所“振武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依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留学生在“振武学校”学习完预科课程之后，需要先到日本陆军里面实习一段时间，实习考核及格之后，才有机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继续深造。

蒋介石理想中报考的这所名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军事院校，在当时的远东，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军事院校，有大量的中国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里面留学。

例如，以下这些近代中国的名人，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阎锡山、何应钦、吴禄贞、张绍曾、蒋方震（蒋百里）、蔡锷、陈仪、孙传芳、徐树铮.....

当然，以上这个名单，远远是不完整的。

当年，蒋介石念完了“振武学校”之后，在日本陆军部队实习，实习期 间的**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革命，从此，终生不再回日本求学。

因此，蒋介石事实上，从未踏进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游客身份除外），也

从来没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过一天的书。

也就是说，蒋介石根本就不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更不是它的毕业生。

蒋介石在日本的同学也是其终身密友、国府高官张群，在《张群先生话往事》这本资料里面，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在双脚尚未踏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大门之前，就已经当逃兵，辍学回国了。

张群的这份证言，原文照录如下：

“……（我）宣统年间在日本振武学校肄业，和蒋先生同学，毕业后，升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为士官候补生，又和蒋先生同一连队。辛亥武昌起义后，我们都回国参加革命……”

另外，日本史料《高田市史》，也收录了

日本报纸《高田新闻》明治四十三年(公元1910年)12月6日版的新闻报道《清国学生入队》。这篇报道，也旁证了张群的证言。其中的时间、地点、事件.....各种信息，都是吻合的。

我们梳理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岁月，可知道以下的事实：

1. 蒋介石在日本的求学岁月里，入读的并非“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日本“振武学校”。

2. 蒋介石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期间，被分配到日本陆军实习，实习之后，理论上有机会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3.但是，在实习期间，蒋介石偷偷回国参加辛亥革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去日本深造了。换言之，蒋介石终其一生，从未就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所军事院校。关于蒋

介石未曾入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单。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面，根本就没有“蒋介石”、“蒋中正”、“蒋志清”、“蒋瑞元”这些名字其中的任何一个。

关于这个留学生名单，读者可以参考学者雷博宁所整理的《中国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名单及学生简历》一文。

后来，蒋介石飞黄腾达，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督校期间，黄埔军校有不少的学生，误以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对此，证人有黄埔一期生蒋超雄。

依据蒋超雄在《我在黄埔军校的回忆》一文里面的说法，蒋超雄直到年老之时，仍然误认为校长蒋介石，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我们不妨摘录蒋超雄回忆文的一段看看：

“.....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北方军阀相互攻伐，全国一片混乱，革命形势很好。十分迫切地需要外立革命武装部队。可是黄埔军校的成立较预定期推迟了半年，原因是中山先生在选定校长问题上，遇到了麻烦。

当时蒋介石从俄国考察回来，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已有初步认识。同时，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另外，蒋对孙较为忠实，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中山先生避难永丰舰，原来在孙左右的人，大都逃往上海；而本来在上海的蒋介石却南来广州，助孙策划一切。故孙先生后来亲书‘患难与共’四字赠蒋。最后中山先生以拖延时日有误革命时机，认为非计，毅然告众说，非蒋介石任校长，宁可军校不办。校长一职，遂成定局.....”

很显然，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到“蒋是毕业于保定军校和日本士官生的正式军人”这一句。疑问是，是蒋介石刻意对他的学生说谎，还是学生们自己造谣传谣？这一点，也许有待于进一步的考据。

在蒋介石的学历问题上，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这册资料里面，也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蒋介石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的总负责人刘宗纪送过五万元，并婉转地要求刘宗纪承认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籍。李宗仁在这一点上的证言，是这样的：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曾经派人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总负责人刘宗纪送去五万元，潜台词是要求刘宗纪配合自己的学历谎言。一些真正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友如蒋作宾等，对刘宗纪发表异议：‘学长！我们什么时候多出了蒋介石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校友？我们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念书的时候，

怎么就没听说过蒋介石这么一个人呢？’刘宗纪当时对蒋作宾这样说：‘我们有钱收，还不好吗？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

当然，李宗仁的说法，也许可以算作孤证。但是，至今比较明确的是：蒋介石从来没有念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么，为什么蒋介石要在自己的身份证上填写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历？为什么黄埔军校的学生会误认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同学会”送钱讨好？

我想，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指向以下的同一个事实：

我们有些国人对学历的崇拜以及因此所萌发的虚荣心，使得某些成功人士伪造学历的作

为，屡见不鲜。问题是，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永世。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蒋介石的“梅毒脱发”之说

关于蒋介石的秃头，在中国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年轻时得过梅毒，他的秃头，是梅毒的后遗症。可是，这种说法，真的经得起推敲吗……

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妇孺皆知的绰号——“蒋光头”，蒋介石自从步入中年之后，基本上都是以秃头的形象见诸于世。在抗战时期来华助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更是戏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因为蒋介石的光头，远看着，就像一颗圆不溜秋的花生米。

那么，蒋介石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首脑人物，为什么会是一个光头的形象呢？在这一点上，民间传说纷纭，其中，流行最广的说法是蒋介石因为染上梅毒，掉光了头发，从此，终生秃头。

可是，真相是这样的吗？首先，我们先来探究一下蒋介石是否曾经患过梅毒？让我们先来读读《蒋介石日记》。《蒋介石日记》**1919年7月26日**这一天，有这样的记录：

“近日甚受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

从此，我们可以得知：蒋介石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得过淋病。蒋介石在年轻时，的确生活“不检点”，这一点，似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是，“淋病”毕竟不是“梅毒”。

我们再来看看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所

著的《陈洁如回忆录》。

陈洁如在这本回忆录里面，记载了蒋介石染上性病，并且将性病传染给陈洁如的事情。但是，陈洁如的文字，一会儿说是“梅毒”，一会儿说是“淋病”，自相矛盾，恐怕并不足以为信。

陈洁如在这一件事上，是这样说的：

“作为蜜月旅行的第二部分，我们游览了苏州，回上海之后，我发现身上出了疹子。我试用各种油膏擦抹，不但无效，而且越来越糟。后来，突然发现腿上也出现疹块，手腕按脉处也出现两块红疤。它们虽不痒，但看起来很不好，我很发愁，我一生从未得过这种病。

介石带我去看他的朋友李大夫。他是德国留学生，专精细菌学和性病。李大夫取了介石和我的血做瓦塞尔曼氏反应检查（梅毒血清诊

断法)。等了令人心烦的日子，这位血清专家宣布我们的血有阳性反应。

我一听到这个坏消息，发了疯似的，立刻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出诊所，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到我母亲家。‘噢，妈妈。’我哭诉着，‘我得了花柳病。是大夫告诉我的。看看我这些毛病。’不到半小时，介石来了，解释说这病是轻度的，用六零六针药可以痊愈，这是他自己的旧毛病，传给我了。

母亲痛骂了介石半小时。他承认了他的‘罪恶’。‘我再也不同你在一起了。’我哭喊着，‘你是个坏东西，我要跟你离婚。’‘我怎样才能使你相信我要真的悔罪呢？’他哀求着，低头站在那里，表情非常严肃阴沉，接着说，‘只原谅我这一次，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向你发誓，为了悔过，永远不再沾一点酒。’

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要同他去大夫那

里，赶紧去治，不可耽搁，最要紧的是把那个病从你的血中清洗干净。’于是，那天黄昏，介石再带我去李大夫诊所治疗。在打针前，李大夫对介石说：‘这是个不大好谈的话题，所以请让我和你的夫人单独谈谈，你可不可以在候诊室等一下？’介石出去以后，李大夫向我做了六零六注射，并说：‘你打十次针，就可痊愈。我现在要坦白告诉你，淋病细菌已进入你的身体，说确切点，就是你的输卵管，这可能使你不能怀孕。但是你的病是轻度的，只要继续坚持治疗，就不必担心。’事毕，我走进候诊室轮到介石进入诊疗室了。他打过针后，李大夫告诉他：

‘你在结婚前，本应先完成以前的治疗，但你没有等待充分的时间以完全治愈，因而传染了你的夫人。从现在起，你必须继续坚持治疗以便康复。你原已患有附睾炎，这使你不能生育。今后你恐怕不可能再生育孩子了。’

为了表示悔悟，介石对我起誓，如我答应不离开他，从今以后，他不再喝所有烈性酒，普通酒以至茶和咖啡。‘我愿终生只喝白开水。这是一种自我惩罚，你现在可以相信我了吗？’”

以上，就是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在《陈洁如回忆录》中的叙说。我们从陈洁如的这篇叙述看出来文中开始说“梅毒血清测试阳性”，后来又说那是“淋病”，到底是“梅毒”还是“淋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难怪学界有人怀疑陈洁如的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甚至有人直接断定这本《陈洁如回忆录》是一本“伪书”。也就是说单凭这本所谓的《陈洁如回忆录》，我们也不能断定蒋介石是否患过梅毒这种病。除此之外，目前似乎也还找不到有关于蒋介石患上梅毒的确切证据和相关史料。我们退一步来说就算蒋介石患过梅毒，而即便如此，梅毒和脱发的关系，

仍然是值得考察的一个关键点。梅毒是否能导致秃头？医学告诉我们：因为染上梅毒而得的脱发症，在医学上叫作——梅毒性脱发。据查，梅毒性脱发，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特征：特征一，不容易患上。每**100**个梅毒患者当中，大约只有**4**个患者会患上“梅毒性脱发”。特征二，梅毒性脱发并非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

这里的特征二是相当关键的，梅毒性脱发并非是一种永久性的脱发。治愈梅毒之后，头发会迅速长回来。

据此，我们不妨作以下的逻辑推理：

推理一：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不能治愈，那么，蒋介石在青壮年时期，早就死了。因为梅毒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推理二：假设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假设他的梅毒已经治愈，那么，蒋介石的头发会迅速再次长回来——也就是说，蒋介石有头发，蒋介石的光头，是自己故意剃光的——并不是“梅毒”所导致的。

上述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清晰的——只有一种可能，蒋介石有头发，光头是自己剃的，与“梅毒”这种病并没有关系。

事实上，蒋介石的身边人所留下来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个推理——蒋介石并不秃头——蒋介石是有头发的。

依据蒋介石的卫士翁元在其所著《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这本回忆录的记载，蒋介石的确是有头发的，但是蒋介石的头发很稀疏，而且也很柔软。

而更为关键的是，蒋介石有剃光头的习

惯，一旦长了头发，蒋介石就立即叫人剃掉，所以，蒋介石其实是“故意剃光头”的，并非是生理性的秃头。

翁元在这本《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中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么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

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全民‘拥护领袖’的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以上，就是给蒋家当了四十三年卫士的翁元的证言。这个人长期与蒋介石朝夕相处，他的证言，有着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其实，各位读者只要肯花那么几分钟的时

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随便搜寻一下蒋介石晚年在台湾留下的照片，仔细察看，就不难发现：蒋介石貌似光秃的脑瓜之上，其实，的确是有着稀疏的头发的。

由于照片版权所限，本书未能在此附上一两张蒋介石的“带发”照片，甚为遗憾。

那么，问题来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秃头”这个流传了将近百年的传说，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中，严庆澍所著，**1950**年出版发行的一部畅销小说《金陵春梦》，在此起了关键的信息传播作用。

在这本小说《金陵春梦》当中，作者严庆澍，对蒋介石进行了多方面的演义描写，其中，对蒋介石“感染梅毒”的这个情节，该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好好。’蒋介石心中计算一会，老是觉得不合算，玩一个女人，要花这么多钱，要花这么多时间，干脆不如打野鸡算了，于是放弃了上翠芳老七那里去的念头。半月之后，戴季陶他们老是不见他请客，而且连交易所也不来了，原来蒋介石迫不及待，去玩野鸡，这回可害上了杨梅大疮，正躺在家里养病。那时候既没有特效药，又没有高明的花柳医生，直把他急得没办法。脓血淋漓，举步维艰，少赚了‘帽子’钱不算，还给黄绿医生敲走了一大笔竹杠。而且余毒未净，深入骨髓，这且不提，更难堪的是翠芳老七向外扬言，说姓蒋的专门揩堂子的油，吃得几回甜头，便舍不得破钞，再也不来了，把蒋介石气得牙痒痒的，一定要设法报复。”

上文中的杨梅大疮，就是指的梅毒。值得注意的是，《金陵春梦》这部小说，在当时的中国，是一部影响很广的畅销小说。不难想

象，中国的广大文人和读者，在接受“蒋介石患梅毒”这条有欠考证的信息之后，进而推理并得出了“蒋介石因为梅毒而掉光头发”的结论。可见，这个传说的演化公式，是这样的：传说患梅毒+看起来秃头=因为患梅毒而导致秃头。稍有逻辑思维的人，只要稍加想一想，就应该知道，上述的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既然蒋介石是有头发故意剃光头的，蒋介石为什么又要剃光头呢？难道，他是要节省洗发水的钱吗？

其实，剃光头是早期德国和日本军人的作风。首先是出于活动方便考虑，军训流汗，行动利索，这些都是常识，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战场上头部负伤，则可以省下剪头发的宝贵时间，直接开刀进行手术，这样就能增加战士被救活的几率——这也是军人剃光头的合理性所在。

蒋介石是日本军校的学生，蒋介石以军人

自居，他剃光头，应该也是为了以身作则，给国民党军队带头，培养尚武之风。事实上，蒋介石并非民国时代中国唯一的光头军人。在国民党军队里面，剃光头的军人，比比皆是。我在此，简单列举如下：汤恩伯、张治中、李弥、谷正伦、张自忠、白崇禧、李宗仁、邓宝珊.....

这些军人，都是光头，至少是曾经剃过光头。

这个名单，根本列举不完。有兴趣的网友，可以搜寻这些人的老照片，看看他们是否有光头的时期。不但在国民党阵营里，其实即便是在八路军的阵营中，也有剃光头的习惯，我在此，也简单开列一个名单：彭德怀、许世友、朱德、林彪.....这些共产党的军人，在战争的年代，也都剃过光头。这个名单，恐怕同样也是列举不完的。即便是今天中国内地的解放军，战士也是剃光头的，或者是只留一公分

短发的，这也是基于同一个道理——便利军事活动所需。综上所述，本文所厘清的几点重要事实，总结如下：

1.蒋介石的确得过淋病。但是，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蒋介石曾经患过梅毒。

2. “梅毒性脱发”随着梅毒的治愈而治愈，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蒋介石光头与梅毒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3. 蒋介石晚年的诸多照片明白无误地证明：蒋介石确实有头发，并非秃头，谣言的基础根本就站不住脚。

4. 关于蒋介石“梅毒导致脱发”的传说与《金陵春梦》一类畅销小说的传说布谣，不无关系。

5.蒋介石并非在民国年代唯一留光头的军事人物，事实上，剃光头在近

现代军人当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蒋介石光头和梅毒的传说，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已经相当明白了。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

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据说有五百名国民党将士在山西太原宁死不降、集体自杀。他们就是著名的“太原五百完人”。

可是很遗憾，史料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只是国民党溃逃台湾以后，为了稳定军心，激励困兽犹斗的斗志，而刻意臆造的一个谣言，这个造神故事，其实不过只是美化历史的一场误会罢了……

曾几何时，在台湾《国语》课本第八册

中，有一篇叫作《太原五百完人》的课文，行文如下：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那时候，×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着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匪

侮辱他们的遗体。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于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

这篇课文所歌颂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当中，山西太原的国民党军队有五百名壮士，宁死不屈，集体壮烈自杀。

这篇课文读起来，显然是荡气回肠。只是可惜了——这只是一个传说，并非真实的历史。

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其实只有四十六人参与了这场“集体自杀”，而远远没有台湾官方所

宣传的“五百完人”。

请读者们跟随我，来听听本案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首先，我们听听这场国民党将领集体自杀殉国事件的现场目击者——（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的秘书——柏光元的证言。

柏光元事后写了一篇《梁化之死的经过》，其证言摘录如下：

“.....梁化之（敦厚）的办公室在省府三楼上.....自（**1949年**）**4月 19日**起，解放军开始向城内发炮，均在鼓楼一带，至 **20日**清早五六点钟，又开始向省府内发炮弹。这时梁化之尚未起床，省府落了第三个炮弹，电灯被炸息了。梁化之急忙起床，身上衣服尚未穿整齐，就拿着手电灯，下楼向阎锡山的公馆东花园跑，跑进钟楼下的房子。这房子是窑洞式的，

里面并不大，房顶上又用洋灰盖了一层，所以能避炮弹。这里住的是五姑娘阎慧卿（阎锡山的堂妹）……这时我知道他是要自杀，我就很怕。梁化之的第一句话对我说：‘光元，孙副主任、赵世铃他们决定投降，我是不投降，希望你听我的话。’我就说是。梁化之又说：‘你可得好好听我的话，绝对听我的话。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有手枪，到必要时我的手枪可……’梁化之开始和我说话，态度和平时一样，说话很坚强。我听到梁化之说必要时手枪半句话，我随梁化之说：‘主任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听主任的话。’梁化之说好，随之说他自杀，五姑娘也自杀。并且左手斜身指了一下阎慧卿，跟着说：‘你可得听我的话。’我说是。梁化之又说：‘我死了以后，你去告孙副主任，就说我喝药死了。’并且回身向里面桌上拿了个暖水壶给我。口里说：‘你拿上这暖壶到东面汽车房内给我灌一暖壶汽油……’梁化之手指被子对我说：‘我死后，你

把汽油倒在被子上，你掷在被子上一个烟头，你就走你的，可是你得看着我死好以后。’他在说话的同时，给我取了一圆筒纸烟和一盒洋火。这时，阎慧卿在床上坐着说：‘还有些钱，叫他们拿去。’梁化之问在哪里，阎慧卿右手向南墙台内一指。当时梁化之就拿出些白银洋用白包皮包好，给了我。当时，我因在惊慌中顾不得想一切，只得听从他，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即接过放在暖壶一旁的地上。梁化之又对我说，他死了以后，我要能见上二先生，就说他死了（二先生是梁化之的二弟）。我说是。梁化之又说：‘好吧，你站在门边。’当时我就站在门子里面，这时梁化之也上了床，阎慧卿在床里墙边，梁化之在床外面，二人面向南，一同拿茶杯在手中。这时我又走到床边问梁化之：‘主任，家里还有什么事？’当时梁化之对我说：‘没有什么，就是我母亲，我女人，我的小孩，也没有什么，能见上就说我死了，见上二先生就说我死了。’说完二人一同喝

药。床边有一个小桌，小桌上放着一支才点着的洋蜡，一支快照完的蜡头。两个蜡灯照着梁化之、阎慧卿二人同时喝下药。梁化之用左手连把两个茶杯放在小桌上，二人一同拉被同睡。梁化之左手拉被斜身面向阎慧卿，睡下后脸稍向底面，连咳嗽几声，最后一大声，有 2 分钟气断，死了。阎慧卿右手拉被，面向梁化之睡，口里还说了个难受得不行，睡倒面急转朝天，两手乱舞过头长停，口里鬼叫很长一声，2 分钟以后气断，死了……这时解放军已经包围了三楼的北面……洞外又传进话来说，先叫战士出去，第二叫办公人员出。我三人就和办公人员一同出洞，到了洞口，经解放军一个个检查了，我们就被解放了……”

可见，柏光元所目击的自杀“殉国”人员只有两名：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以及阎锡山的亲信梁敦厚。

当然，事实上也不只两名。

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的部下缪玉青（行政督察专员）、张克寒（县长）、李干之（行政督察专员）、薛国俊（省府视察员）等人事后所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一文，他们都是怎样说的：

“.....主任阎钧鉴：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截至十五日止，突围干部抵西安者共职等四人，均系五月一日离开者，谨将太原作战惨烈情形，与服毒自杀之成仁干部，就所知者综合报告于下：敌人对太原第七次攻势，系于四月九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巷战终结。计敌兵力，集东北、华北、西北野战军各一部，合徐向前原所部者，在四十万人以上，其炮火之多，出人意料.....廿四日城中心区巷战激烈时，梁委员化之见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乃实践钧座‘不作俘虏，尸体不见共党’之昭示，从容自杀，并事先嘱人于其死后纵火焚化尸体。警宪指挥处由徐

端、嵐风等领导集体自杀，钧座家属，由阎慧卿领导自杀于钧座公馆凉亭之下，亦使人举火将全院焚毁……此外文武机关服务干部参加巷战后，除伤亡被俘者外，尚有省会警察局长师则程等十余人，自杀于柳巷派出所；吴队长春臺自杀于歌剧第三院；尹专员兼县长遵党及县府干队若干人自杀于八旗会馆，至其他参加巷战之干部自杀，而姓名一时尚无法查明者，更不计其数……”

可见，这份战场报告显示：梁敦厚、阎慧卿自杀之后，在太原城里的别处，也开始陆陆续续发生了“集体自杀”事件，但是，“殉国”人数不详。

那么，“太原五百完人”中的“五百”这个数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们来读读阎慧卿在自杀之前，发给其堂兄阎锡山的一份《阎慧卿至阎锡山绝命电》。

在这份电报里面，阎慧卿是这样说的：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

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可见，“五百”这个数字，似乎最初出自于阎慧卿这份电报中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的诗句。

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陷阱，阎慧卿电报中的这个“五百”数字，显然只是抒情押韵的文字，而不是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中国人写文章的通病——宁要押韵，不求精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阎慧卿自杀在前，部下们自杀在后。阎慧卿断气在先，她根本不可能知道在她死后会有多少人跟随她自杀。

于是，我们再来听听阎锡山本人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里面，对于此事，又是怎样说的：

“.....其最足动天地而泣鬼神者，厥为山西省政府梁代主席敦厚等文武人员之集体自杀，纵火焚尸，实践公‘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匪相见’之昭示，为国家存正气，为民族争光荣，世人莫不感动敬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191次会议决议褒扬。监察院 6月 25日代电致公唁慰，立法院 10月 30日第四

会期第二次会议临时动议，以太原沦陷时，梁敦厚等集体自杀慷慨成仁，其壮烈实有过田横五百人，议决：择地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以发扬民族精神……”

于是，我们可以从阎锡山的自述里，可以读得出来：太原自杀“殉国”的国民党将士的人数，不是经过严密调查而敲定的，而是靠拍脑袋决定的，受谁的启发呢？受的是秦朝末年“田横五百士”历史典故的启发，阎锡山临时拍了拍脑袋，敲定“五百”这个数字。

这是不是很儿戏呢？

有的时候，历史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贵在有心人。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有一个名叫“刘存善”的人，对这一起太原国民党将士集体自杀“殉国”事件，作了一个专门的调

查，并于周密调查之后，写下了一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收录在《山西文史资料》第六十辑。

这份《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披露了以下惊人的调查结果：

1 有名可查的自杀“殉国”国民党将领，只有**46**名，而不是**500**名。

2 500名“完人”名单里面，有着以下大量的造假情节。

（1）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至**1987**年，仍然健在。

（2）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

是在太原失守之前战死的，并非自杀。

（3）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是事后被解放军逮捕处决的，并非自杀。

（4）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是被阎锡山处死的“间谍”。

（5）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是事后老死或者病死的。

（6）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等，其实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名字，被重复使用。

（7）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下落不明。

（8）以下则“查无此人”：永和县（4人）、吉县（10人）、乡宁县（5人）、大宁县（5人）、石楼县（2人）。……

可见，国民党在内战中，为了塑造战斗英雄，为了鼓舞部队士气，选择性地收集材料，并且捏造了事实，刻意夸大了自杀的人数——从 46人，夸大到了 500人。

其实，太原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并非人人勇敢，实际情况是投降者大有人在。

我们来读一读阎锡山的另一员部下——娄福生在史料《我所知道的阎锡山》中的相关证言：

“……1949年 4月 23日半夜，解放军东北路指挥部最后给予反动派的和平机会被拒绝后，解放军的攻城战斗于拂晓即行开始，枪炮声响成一片，缴枪不杀的喊话声时起时伏，炮弹飞

来，到处火起，据说护城碉中大都竖起白旗，缴械投降，**24**日黎明，小北门即被突破，未几东城失陷，南城电话不通，由西城及北城进来的解放军，已在绥署之煤山附近与阎军的伺卫队发生战斗，这时王靖国、孙楚两个顽固头子，在地下室缩成一团，深怕解放军攻破绥署，人梦俱焚，混乱之下性命难保，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即向他们二人说，城防已破，绥署被围，光棍不吃眼前亏，应速命伺卫队停止抵抗，在绥署门外插起白旗，表示投降，除此再无办法，否则子弹头上没眼睛，你不表明态度，人家当然要防你当场反抗，这时他们二人均已认可，在绥署二楼插起了白旗，解放军战士已经到地下室门口，命室内之人一一出来，有武器者，丢在门口，所有高级阎均将领全数在绥署二楼被俘，我看到解放军的态度既严肃又和平，并且认真执行了宽大政策，大家非常感激，而且信服了共产党的伟大主张，治病救人，改造世界，所说优待俘虏的政策当场兑

现，太原即日获得解放……”

娄福生的证言写得很清楚：在阎锡山的军中，投降者大有人在。

我们再来读一读解放军一方的人员——乔希章的证言。

《太原文史资料》第十二辑，收录了乔希章所写的一份战斗总结，名叫《解放太原综述》。其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太原战役，自 **1948年 10月 5日**发起……其中俘敌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第十兵团司令官兼太原守备司令王靖国，太

原绥署参谋长赵世铃，兵团副司令官孙福磷、温怀光，兵团参谋长侯远村，山西保安司令许鸿林，十九军军长曹国忠，政治主任彭登旺，副军长兼四十师师长许森，三十三军军长

韩洲，三十四军军长高倬之，四十三军军长刘效曾，副军长兼炮兵师师长贾毓芝，六十一军副军长姜福生，四十六师师长阎俊贤，四十九师师长王永寿，副师长李荣富，六十九师师长郭弘仁，副师长韩佑虞，七十一师师长张忠，七十三师师长祁国朝，副师长王振纲，新闻室主任景春利，八十三师副师长马海龙，铁血师师长赵显珠，副师长张汉兴，工兵司令程继忠，副司令王同海，机枪总队队长宫子清，宪兵司令樊明渊，机械化兵团司令韩文彬，炮兵顾问岗田（日人）、黄家坟（卧虎山）要塞司令程景堂，以下官兵七万七千三百九十四名；击毙六十一军军长赵恭，三十九师师长刘鹏翔等以下官兵七千余人……” 依照乔希章的这份总结，在太原战役当中，阎锡山的将士，一共有 **77394**人投降，而战死的，仅有 **7000**多人，也就是说，粗略统计，阎锡山部队的投降率高达**92%**！

写到这里，我的心中有一股滑稽的感觉油然而生，这就是所谓“国军”的“太原五百完人”。

第五章 再探谜案

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于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已经从最初的义愤填膺，慢慢开始尝试理性对待，并且已经能够正视历史，学习辩证分析，这无疑是可喜的和值得继续下去的。本章的解读，会让你对那些谜案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解读不一定最准确，但一定更客观。

霍元甲与日本医生

精武英雄霍元甲，到底是练气功致病而死的？还是被日本人用“仁丹”毒死的？如果真的是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那么，日本人为什么

要毒杀霍元甲.....

在中国，大凡提起“武侠”二字，有不少国民会条件反射般地想起这么一个人：霍元甲。

霍元甲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有两个：

第一，打擂台，击败俄国大力士。

第二，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

第一个（打擂台）目前已经被证实是谣传的。实际上，俄国大力士，并没有如约来华比武，也就是说，霍元甲根本就没有和俄国大力士比武，更谈不上打败了人家。

而至于第二个故事——“霍元甲被日本医生毒死”——也是流行很广的一种说法。

可是，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今天，请诸位跟我来，一起重新审视一

下，有关此事的一些相关的史料和说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毒杀说”最早风行的出处——**1912**年出版的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作者笔名为“平江不肖生”。

这本书在**1984**年**11**月，被（湖南）岳麓书社重版，改名为《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在岳麓书社版的第**525**～**534**页，作者“平江不肖生”对霍元甲之死，表达了这样的看法：霍元甲之死，怀疑是日本医生下的毒。

以下，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本小说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霍元甲自精武体育会开办后，身体不免劳顿，因家事又受了忧虑，以致胸内疼痛的病又发了.....胸内已痛了一次，当把秋野送的白药片服下时停止的，这次再发，不知如何服下那药全无效验，加倍服下也是枉然，痛得不

能忍受，只得帶了刘震声到秋野医院去诊视，秋野（日本人）诊查了之后，说：‘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此病已深入不易治疗的时期了，上次来诊查的时候，还可以不住医院，只要一面服药，一面静养，即可望在一两个月内痊愈，现在的病势……’霍元甲问秋野需住院多少日，才能完全治好？秋野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要完全治好，大约需两个月以上……’霍元甲只好答应住院……秋野先生诊得十分细心……霍元甲在院中，倒不觉得身体上如何痛苦了……秋野高兴地对刘震声说：‘这下子你可以放心了，贵老师（霍元甲）……这一星期的经过非常良好，我如今敢担保没有生命危险了……预料五个星期之后就可以出院……’次日早餐后，秋野陪同霍元甲帶了刘震声，乘车到（日本）讲道馆（比武）……仍陪同霍元甲回医院……秋野照例给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霍元甲大喊了一声，（刘震声）连忙拉上秋野跑去看，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

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刘震声急得哭了起来，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把农劲荪找来……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到第二日夜深……大英雄霍元甲脱离了尘世……”

这本小说的作者“平江不肖生”的真实姓名是向恺然，其人虽然与霍元甲同一时代，但是他与霍元甲并没有交往，这本《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也只是一本小说，并非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尽管如此，向恺然在这本小说中，对“日本人毒杀说”，也仅仅是采取了“怀疑说”，并非一个清晰的指控，况且，日本医生秋野在该书中的表现，是先将霍元甲治好，然后再将其毒死，前后的表现，是相互矛盾的。

显然，这本小说不足为凭——事实上，小说从来都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凭据。

我们再来听听另一个人的说法：陈铁生。

陈铁生在其 1920年出版的《精武本纪》中，认为是日本医生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将霍元甲毒死的。

陈铁生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力士（指霍元甲）歿之翌晨，秋医（即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

这段证言，翻译成现代中文，是如下的意思：

“.....霍元甲死后的第二天，那个姓‘秋野’的日本医生就逃跑了，霍元甲的徒弟们严重

怀疑是秋野的药有问题，于是，徒弟们拿了霍元甲生前吃的药到公立医院去化验，医生说：这是慢性烂肺药……”

陈铁生的说法，关键在于“烂肺药”这种药物，在医疗界是否存在？

化学常识告诉我们，带有强腐蚀性的药剂，是强硫酸，俗称“镪水”，可是，强硫酸喝下去，腐蚀的并不是肺部，而是口腔、食道和胃部。

也就是说，服用之后会使肺部腐烂的这种药——所谓“烂肺药”，在医学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一种药可以腐蚀肺部，那么，它在吃下去的时候，首先就腐蚀了口腔、食道和胃——在药物被吸收，药力进入肺部之前，这个人就已经死了。

分析是很清楚的，“烂肺药”，既不符合逻

辑，而且在医药界众所周知，这种药并不存在。

提到这本《精武本纪》，不得不引出另一个人：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

霍自正在近些年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均声称其曾祖父霍元甲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但是，每当被问及依据，霍自正则宣称有以下两个依据：

依据一，陈铁生所著的《精武本纪》。

依据二，家人发掘霍元甲的遗骨，发现遗骨呈黑色，因此，坚信是日本人下的毒。

医学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中毒，都不会改变人类骨骼的颜色。因此，霍元甲遗骨呈黑色，更可能是遗骨遭到氧化的缘故，而与中毒不中毒，毫无关系。

更值得疑问的是，霍自正作为霍元甲的曾孙，当被问及其曾祖父的死因时，竟然引用一个外人的著作——陈铁生的《精武本纪》——来做依据，其中的不靠谱，可想而知。

所以，霍自正尽管是霍元甲的曾孙，可是他对霍元甲之死，并不知道内情，因此，他的说法，可信度也并不高，说不上是权威说法。

我们再来看一个证人：陈公哲。

陈公哲是霍元甲生前的朋友和同事，共同开办、经营“精武体育会”的伙伴——因此，他的证言，相对而言，是最为可信的。

陈公哲在其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一书中，对霍元甲死亡一事，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接受日本医生的治疗。但是，陈公哲并未在此书中表示过对日本医生的怀疑。

陈公哲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霍（元甲）先生原患有咯血病.....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膈，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公哲（我）尝问以气功之道，即诚不可学.....今日以生理学研究，吸气入肺，收吸氧气，助长气力.....反伤肺部.....肺部微细血管可使爆裂，便成咯血病症.....自迁入黄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

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

（陈公哲的证言，出自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精武会五十年》第6～8页。）

陈公哲的上述证言，梳理总结如下：

1. 霍元甲患了严重的咯血病（应为肺结

核）。

2. 霍元甲吃了日本人的“仁丹”，病情恶化。

3. 霍元甲迁入黄家宅，病情持续恶化。

4. 霍元甲进入“中国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治疗。

5. 霍元甲住院治疗两周之后，不治辞世。

可见，霍元甲既吃过日本人的药（仁丹），也吃过“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陈公哲不确定是日本人的药有问题，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的药有问题，所以，陈公哲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不得不说陈公哲是谨慎的。

我们再听一个人的说法，他叫萧汝霖。

萧汝霖在其所写《大力士霍元甲传》一文

里面，对霍元甲的死亡，是这样认为的：霍元甲在病死之前，的确曾经在日本人的医院里治疗过。但是，萧汝霖在该文中，也并未直接主张日本医生的杀人嫌疑。

萧汝霖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的原文，是这样说的：

“……元甲患之，遂疾，至是愈剧。或送之至秋野医院。秋野日人也，知元甲善技击。邀之往观柔道会。元甲以疾辞，固请。乃与刘正声偕。日人欲与角，元甲不可。强之，命正声。日人进扑正声，欲颠之，不得，阳卧，伸足出正声跨下。正声侧而蹴之，伤股。继进者，怒而前，势甚疾。正声迎挤之，仰跌寻丈外。其三人，乃舍正声扑元甲。元甲执其手，肤裂，投之落地，折其胁。日人皆盱愕，与秋野语良久。元甲归，秋野敬之异于他日。明日，元甲疾忽剧，强舌望阳，未几遂卒。年四十有三……宣城农劲荪君，为余道霍公平

生.....”

（萧汝霖的这篇文章《大力士霍元甲传》，出自陈独秀所编的《新青年》第1卷第5号刊。）萧汝霖的说法，总结如下：

1. 霍元甲患病，在日本人的秋野医院治疗。

2. 秋野拉霍元甲去日本武馆和日本人比武。

3. 比武回来之后的第二天，霍元甲病死。

4.我（萧汝霖）认识霍元甲的好友农劲荪，这是农劲荪告诉我的。可见，萧汝霖在这篇《大力士霍元甲传》中，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死霍元甲。

至此，我们不妨对以上五个人的说法，作出以下的总结：

说法一，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怀疑是日本人毒死了霍元甲，但不敢肯定。出处是《大刀王五、霍元甲侠义英雄传》，性质是小说，不足为据。

说法二，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但是，“烂肺药”在医药界并不存在，因此，陈铁生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

说法三，霍元甲的曾孙霍自正：日本医生“秋野”给霍元甲吃了“烂肺药”，直接毒死了霍元甲。说法依据：**1.**陈铁生所著《精武本纪》；**2.**霍元甲的遗骨呈黑色，是日本人下毒的“铁证”。但是，依据医学常识，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色。因此，霍自正的证词，也缺乏科学依据。

说法四，霍元甲生前同事陈公哲的回忆录《精武会五十年》，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

了霍元甲。

说法五，萧汝霖所著《大力士霍元甲传》，也并未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了霍元甲。

综上所述，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明确指控日本人毒杀霍元甲的，

似乎只有两个人：指控人一：陈铁生。理据：烂肺药。但是，此药在医药界不存在。指控人二：霍自正。理据：霍元甲遗骨变黑。但是，中毒并不能导致骨头变黑。本指控，也缺乏科学依据。

也就是说，本案至今唯一的两位指控人，他们的指控理由，首先在科学上，就是很难成立的。

上述是史料分析。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日本人（医生）的作案动机：

第一，从清日关系背景看，霍元甲死亡的当年——**1910**年，是大清国与日本的友好时期，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好处？

第二，从政治角色看。霍元甲既不是政治要人，也不是军事要人，而仅仅是一个民间拳术家。日本军政界暗杀霍元甲，有什么必要？

除非这个日本医生与霍元甲有私人冤仇，因此下的毒手——倘若是如此，那么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间刑事案件，则和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看案发地点。

霍元甲的死亡地点是在**1910**年的上海，当

时的上海，并没有日本驻军。在司法方面，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领导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天下，换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英国人的天下，而不是日本人的天下，霍元甲案发之后，霍家人如果怀疑是日本人下的毒，为什么不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报案？而且，为什么不开膛验尸？

以上，就是我的分析。当然，正如我一贯的求学态度，我始终认为，就命案而言，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在案发之后，及时报案，及时验尸，及时开展侦查，才有可能得出最准确的结论。而霍元甲死亡之后，霍家人一不报案，二不验尸，才造成了今天众说纷纭以及研究的困难。事到如今，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证人证言入手，从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分析等方面入手，去作个大概的判断，而准确的定论，就不太好说了。

但是，不得不重复一次：“烂肺药”以及“中

毒导致骨头变黑”这两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也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

话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也应该心里有谱了，霍元甲之死，八成以上与日本人无关。因此，“日本医生毒死霍元甲”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中国民间仇日思维所造成的一种猜想，而至今，仍然查无实据。

日本侵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的确杀了许多中国人。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断定，所有的中国精英人物，都是日本人杀的。仇恨归仇恨，但历史却丝毫不能含糊。

而在清日两国关系良好的**1910**年，暗杀中国一位人微言轻的民间武术家，对于日本而言，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恐怕也并不符合日本当年的国家利益。

光绪帝死亡之谜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也许是一个巧合，但是更像是一起处心积虑的谋害……到底是谁用砒霜毒死了他，是慈禧太后还是隆裕太后？或许都不是……

1908年11月14日，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骤然驾崩，次日，即**11月15日**，慈禧太后也紧接着病死。

从那时候开始，“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的说法开始流传。至今流传了一百多年。这个说法一直被国人无条件地相信。

我读法律出身，有“证据癖”，现以本文，尝试从现代科学尸检报告入手，和大家谈谈。

让我们来看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课题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在北京崇陵提取、检测了光绪皇帝遗骨以及头发的砷含量之后，所写的一篇《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

这个研究课题组的成员，不但含有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的专家王珂、张永保、邹淑芸、夏普、李义国，还包含有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的法医张新威、张大明、宋朝锦、潘冠民。

但是，这份报告不但冗长，而且内含技术性语言，十分枯燥，不适合大众读者阅读。我已经对其进行抽丝剥茧，将该报告简化了，直接指出报告的要点如下。

医学告诉我们，砒霜中毒后会导致体内砷含量升高，于是课题组从光绪皇帝遗体的“砷含量”入手。课题组在化验了光绪皇帝的头

发，并且对比性地化验了其他人的头发之后，得出了以下的一组“发砷含量”对比数据（单位：微克 / 克）：

可见，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正常人的几百倍到一万倍以上。这样的典型症状，直接指向了“砷中毒”——也就是俗话说的砒霜中毒。读者可能会说，光绪皇帝的头发，经过一百年，水分都蒸发了，上述的百分比数据不准确！应该承认这样的怀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我认为：

1.光绪皇帝的头发水分的确会蒸发，但是，同时“砷”也会挥发。也就是说，在这个百分比除法算式里，分子、分母同时都变小了。因此，对“发砷含量”百分比的影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互相抵消。

2.课题组同时还对隆裕皇后遗体的头发和一具清末干尸的头发进行了对比检测，数据显

示：光绪皇帝的头发砷含量，即便是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较，仍然压倒性地、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须知隆裕皇后、清末干尸的头发，水分也蒸发了。

所以说，上述这份“发砷含量”对比报告，仍然有着强大的证明力，我们可以认为光绪皇帝砷中毒——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服用了大量的砒霜。

出于谨慎，课题组考虑到了棺木对光绪皇帝头发进行污染的可能性，于是，课题组对棺木内的碎屑、香料、粉末等残渣，也进行了采样，分析其砷含量，并和光绪皇帝的头发进行了对比，得出了以下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克）：

由此可见，棺木内各物体的砷含量，远远低于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也就是说，光绪皇帝头发里的砷，并非来自于棺木的污染。可

是，由于史料记载，光绪皇帝久病，长期服用中药，因此，不排除有慢性砷中毒的可能。

课题组为了进一步排除慢性砷中毒的可能，又参考了《中国医药报》**2004年12月29日**第**7**版报道的慢性砷中毒病例（该患者长期超量服用牛黄解毒丸），二者对比之后，发现光绪皇帝的发砷含量是慢性砷中毒病患发砷含量的**66**倍。

换言之，光绪皇帝也不应该是慢性砷中毒，光绪皇帝由于长期服用中药而可能产生的发砷含量过高，可以排除，因为数据对不上。那么，光绪皇帝头发内那么高的“发砷含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课题组紧接着，化验了光绪皇帝的骨骼碎片和残留衣物，得出了以下一组对比数据（单位：微克 / 克）：

很明显，光绪皇帝头发的砷含量，与他的头皮、脊椎骨、内衣残片等物体的砷含量，基

本上处在同一个水平。由此可见，光绪皇帝头发的高砷含量，是来自于他的身体。进而，课题组经过反复研讨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读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质疑：既然光绪皇帝的身体砒霜中毒，那么，为什么不是他内衣的胃部位置砷含量最高，而是右袖部位的砷含量较高呢？这个问题很刁钻，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不容回避。我认为，存在以下的各种可能：

1. 光绪皇帝右手抚胸而死，并且死后甚至下葬后仍保持了这个姿势。

2. 光绪皇帝内衣穿着欠整齐，右袖直接接触胸部。

3. 光绪皇帝内衣的胃部位置衣片，已经腐烂、灭失。

4. 光绪皇帝的陵墓——崇陵，之前曾经被

盗，尸体被摆弄过。

5. 光绪皇帝死后一百年以来，北京城乡一带发生过好几次强地震，棺木内部所有东西位置都随着地面震动而发生过位移…… 读者还可以推测更多的可能版本。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内衣残片、头发上面的砷，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中生有，而必然是有客观的来源的。既然棺木的内部四周，都没有高含量的砷，而高含量的砷却偏偏存在于光绪皇帝的脊椎骨、头发、内衣……对于这一点，最合理的解释，甚至是几乎可以断定的解释，就是：光绪皇帝在死亡之前，砒霜中毒了。

因此，课题组得出“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结论，从该份尸检报告的出台过程和检测数据来看，其依据和理由，是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的。

这份报告，全名叫作《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是一份公开材料，各位读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其进行查阅。

目前学界有多名学者否认“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的观点，但是其争鸣观点却纷纷回避这份尸检报告而另觅途径，从清代的宫廷医疗记录、宫内人士的回忆录、逻辑推理等方面入手，我认为，这是有待商榷的，因为，无论推论得多么合理，最终仍然无法忽视这份尸检报告，因为，这是科学的数据，这是白纸黑字的，是用现代科学化验的手段而得出的，其效力以及证明力，自然远远超过那些宫廷诊脉笔记、耳闻、回忆和逻辑推理。

也就是说，反对者无论怎样研究其他文字史料，最终都必须合理合理解释这份《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因为这些数字，都是无法回避的，是必须直面的科学数据。

那么，是谁下砒霜毒死了光绪皇帝呢？是慈禧太后吗？

那也不一定。不少读者也许会认为，在堂堂紫禁城里面，除了慈禧太后之外，根本没有人敢对光绪皇帝下手。

我认为，这种“想当然”、“有罪推定”的猜测，无论从刑事侦查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可取的。

在中国历史上，胆敢谋害极权统治者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我随手举例如下：

例一，**1803**年，北京市民陈德，一个人持刀闯进紫禁城，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接谋刺嘉庆皇帝。

例二，**1813**年，北京市民林清，率“天理教”教民，持刀剑弓箭，直接杀进紫禁城，刀锋直指嘉庆皇帝。

例三，**1898**年，身在北京的康有为、谭嗣同，合伙谋刺当时的极权统治者——慈禧太后。

.....

这些，还远远不是仅有的例子，读者有心要找的话，还有许多。

一切皆有可能。“除慈禧太后之外没人敢杀光绪皇帝”这种猜测，乍一看貌似合理，其实是坐井观天式的主观臆测，而这种主观的态度，是一个严谨的读书人所应努力戒除的学风。

也就是说“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并不能直接推断出“慈禧太后毒杀光绪皇帝”的结论。

无论任何人，指控慈禧太后毒死光绪皇帝，都必须举出充分的、能够形成基本证据链

条的人证、物证、书证或者其他确凿的证据，否则，那就只能算是猜测，或者充其量，也只能叫作“合理推测”，而不能叫作“定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

1. 光绪皇帝死于砒霜中毒，是至今相对而言最为靠谱的说法。

2. 至于慈禧太后是不是凶手，定论为时尚早，仍然有待商榷。

宋教仁血案从严再探

1913年 3月 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3月 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本案至今扑朔迷离，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一个刺客开枪击中，**3月22日**，宋教仁术后不治身亡。是谁谋杀了宋教仁？本案至今有两个说法一说袁世凯，二说陈其美。我拟从案发当年上海各界媒体对案件侦查和审判的报道入手，尝试重读本案，并提出严谨、稳妥的看法，也借此抛砖引玉，向各位请教。我们先来看看本案侦查和审判的关键过程和细节：宋教仁被刺之后，国民党人带了一个名叫“王阿法”的人到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并继而协助巡捕房抓捕了刺杀宋教仁案的指使人应夔丞。

由于当时庭审是公开的，记者记录下来了以下的庭审记录，收录在邵力子、杨千里、叶楚傖、朱宗良、徐血儿所编著，由民立报馆于**1913年**出版发行的《宋渔父》第一集：

“.....前晚，由国民党某君偕售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法，向（上海公共捕房）卜总巡

报称：一星期前因售字画至小西门外应桂馨（应夔丞）处，应出一照片，云谋办照上之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因无此能力，未曾允许，当即照片交还……卜总巡乃亲率五十号西探……至迎春坊李妓处，

将应拘获，带回收押……佩克律师复诘称尔既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抑或第二次？王阿法称是第二次……（应夔丞）又向王阿法诘称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阿法答称：第二次至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向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伊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此种供词应请堂上注意……”

依据这份庭审记录，王阿法说一个名叫“应夔丞”的人，曾经指使他刺杀宋教仁，未果。

王阿法的上述证言，虽然有一定的自相矛盾之处，但是不排除口误或者记忆错误。王阿法到国民党处报案，也并非一定不合理。国民党当时也对社会开出了悬赏价格，而且赏金颇高。

抓捕了血案指使人应夔丞之后，巡捕房又带队去了应夔丞的家中，将本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抓捕归案。

对此，《宋渔父》这本史料，是这样记录的：

“.....应夔丞既获，随即抄其家屋，凡来访者皆被拘.....见有一短身着新服者.....果为行刺先生之凶手，乃捕之，此凶手姓武名士英.....武就捕后，一一供认不讳，亲自签字.....”

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捕之后，留下了初审口

供。

《中华民报》3月 29日对案件的调查跟进报道如下：

“.....29日中华民报载，上海公共捕房总巡卜罗斯君，查得该凶犯武士英前堂供涉之陈姓及另有一人同至车站者，陈姓即系陈玉生，除已侦获，另有二人，一系吴乃文，一系张汉彪，兹又研诘凶犯武士英，供出有一冯岳君者，亦是应夔丞指使行刺同谋之人，现因该三犯均系案中要犯，未便任令远飏，故由卜总巡前日致函公廨关献员，请速出票协同缉拿吴乃文、张汉彪、冯岳君三犯，务获解讯等因，昨经关献员准即照办云.....”

《中华民报》的这份报道显示：武士英很明确地供出了以下的行刺指使

人——应夔丞（应桂馨）、吴乃文、张汉

彪、冯岳君（又名冯玉山）。我们再看《民立报》于**1913年3月26日**的报道：

“.....**26日下午 5时**，法捕房解凶犯武士英至法公堂由李副领事聂献员与英界会审员关炯之及城内审判庭王庆瑜列坐会审。闻凶犯武士英供自称吴福铭，山西人，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行刺前一日（**19日**）有姓陈的来约我入共进会，姓陈的在五六日前茶店中认识的，当时陈对我说：‘现在我们要办一人，这人与中国前途有非当关系，这人是无政府党，吾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我因听陈说这人于中国有害，所以毅然决然答应了，这日同陈去吃茶，晚上同陈到六野旅馆，开一间房，到行刺的那日（**20日**），我与陈在三马路半斋吃夜饭，酒已吃的半醉，陈就告诉我这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故今天就好行事了，说毕，将手枪交给我，这时另有二人，一名 xxx，一名xxx，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有一人不

买票，在外面看风，票遂买好，已见宋至，姓陈的就指点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客厅中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来，当即扑地而后放了一枪，而逃到门外坐黄包车。到应桂馨家去，及进门，则陈已先至，陈尚对我言：‘如今好了，我们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又初入共进会，时即见应桂馨一面，行刺后又见应桂馨，应甚称赞我做得好，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去读书，至于手枪，于行刺后，已经交回姓陈的了。至此间，官询问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答云：‘没有，当时曾许我一千块，但是我只得三十元云云……’”

可见，在这份庭审记录中，武士英对其作案过程，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

3月 27日，《民立报》进一步报道：

“……武士英被捕之时，已经供认应桂馨所

指使：我白天尚不晓得要干这事……”

再后续的审讯当中，武士英进而对公众宣称“我是上了应夔丞的当”。

应夔丞是谁？此人曾经是国民党人陈其美的部下，当时是北洋政府属下的江苏巡查总长，同时也兼任一个名叫“共进会”组织的头目。

史料《渔父先生被害后十日记》章节《凶徒丑迹记》，对应夔丞的背景，有如下的描述：

“……应桂馨，字夔丞，年四十九岁，浙江宁波人，住上海法租界徐家汇路 20号，其人向不安分，昔年底护著名流氓范高头者，即此人，光复之际，沪军都督府曾利用之为间谍科科长，以为羁縻之计，寻至南京总统府充庶务员，因滥用公款被逐，南北统一后，入京运动

总统府，任之为长江侦探科长……后陈君（陈其美）致函中山谓此人不可靠，遂令至下关兵站……”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应夔丞，原本是革命党的人，但是后来暗地里被北洋政府招安了，成为了北洋政府的人，并且陈其美暗中对此人不满，不愿意重用他。

应夔丞还不是本案的最高指使人。还有更高的指使人——北洋政府内务秘书洪述祖。

我们来看看应夔丞和洪述祖之间关于谋害宋教仁的秘密电报，是怎样被截获的。以下是史料《宋渔父》的记载：

“……程都督本预约于 **26**日会同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报局保存，乃 **26**日下午，英总巡卜罗斯君及陈英

士（陈其美）诸君均到电报局照办……应桂馨家中所得证据甚多，而最关紧要者则暗杀案发现之电信是也，其关于此案之电报各信，无非应夔丞与洪述记（洪述祖）之件，故洪述记送为此案之要犯……其人凶恶阴险……”

由此可知，应夔丞事前和洪述祖的来往电报，事后被陈其美和巡捕房查获了。

我们来看看被截获的一些关键电报，它们被刊于《民立报》**1913年 4月27日**版，《民立报》那时向公众公开了这些电报：

“3月 14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寒电）：‘梁山匪魁（宋教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3月 18日**，洪述祖回电应夔丞：‘川密。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荫。’（**3月 20日**，宋教仁被刺。）**3月 21日**，应夔丞电洪述祖：‘北京椿树胡同洪荫芝君鉴，

川密，号电谅悉， 匪魁（宋教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夔。”

这些电报很清楚地显示是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洪述祖，指使应夔丞安排谋杀了宋教仁。那么，洪述祖为什么要谋杀宋教仁呢？对此，史料《宋渔父》收录的《凶手丑迹记》的推测是，洪述祖是为了讨好他的上司——赵秉钧、袁世凯：

“.....（洪）此次挟资南来，系为解散欢迎国会权，杀机遂起，而我宋先生首当其冲，伤我良弼，按洪之心理，实欲借是以媚其主耳.....”

综合上述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以下的故事版本，也许是至今而言比较稳妥的一个版本：

1.应夔丞是陈其美的人，但是暗地里接受了北洋政府秘书洪述祖的招募。

2.应夔丞得知洪述祖有心谋杀宋教仁，于是，应夔丞主动向洪述祖提出刺杀宋教仁的提议，目的为获取丰厚的报酬。

3.征得洪述祖首肯之后，应夔丞派出陈玉生等属下，指使武士英杀死了宋教仁。

4.案发后，国民党人偕同报案人王阿法，到巡捕房举报，及时抓捕了应夔丞、武士英。

5.陈其美一行人搜出应夔丞和洪述祖的电报，列为呈堂证供，由于洪述祖为北洋政府的内务秘书，因此本案的嫌疑人直接指向了北洋政府的第一首脑袁世凯。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案发之后，陈其美为何很快知道应夔丞是指使人？

果真是出自王阿法的举报吗？不一定。不

能排除有以下可能：王阿法是个虚假线人。陈其美不但对本案一直知情，而且直接牵涉在内。但是，这仅仅是猜想，也有一些间接的相关线索，可是至今仍然没有确凿和直接的证据。

当然，也正是因此，陈其美也逃不掉嫌疑——宋教仁虽然是国民党的人，但是宋教仁和孙中山、陈其美一伙，长期以来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也就是说陈其美出于内斗暗杀了宋教仁，这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至此，我出于十分严谨的角度，尝试对案件各个涉案当事人作出暂时的定性如下：

1. 袁世凯：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
2. 赵秉钧：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

3. 洪述祖：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主凶。
4. 应夔丞：已确定，是谋杀宋教仁的同谋。
5. 武士英：受应夔丞、陈玉生指派，充当直接杀手。
6. 陈其美：有嫌疑，但至今没有确凿证据。

也就是说，从目前所能查到的确凿证据看来，我只能得出以下确定的结论：是应夔丞为讨好洪述祖而谋杀了宋教仁。**1919**年，洪述祖被北洋政府逮捕并且执行死刑，这个处理，应该说是妥当的。

而至于洪述祖是不是袁世凯、陈其美的替

罪羊，则都是在间接证据基础上所作出的推论，虽然其推论也不乏合理之处，但是，毕竟那只是推论，仍然算不上是铁案一桩。

这是我对宋案的严格定性，这也是一个权宜的定性。我认为，在缺乏确凿证据的当下，目前的这个定性，暂时而言是比较稳妥的。当然，我也只是依据可靠史料进行的推理，本文也绝非一份判决书。我也希望借本文以抛砖引玉。

希望这起罗生门，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是谁炸死了张作霖

关于张作霖之死，近来出现了一种所谓“新说法”，即张作霖被炸死与日本人无关，

而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那么皇姑屯事件，果真是苏联特工嫁祸日本人的阴谋吗.....

时间穿越到**1928年6月4日**清晨。此前，素有“东北王”之称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躲避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的进攻，乘坐火车专列，从北京赶回沈阳。此刻，清晨 **5点 30分**，列车行驶到沈阳郊区的皇姑屯，车厢突然遭到炸药爆破，瞬时，列车车厢被颠覆，张作霖被炸成重伤，并于当日死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皇姑屯事件”。是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炸死了张作霖？关于谋杀张作霖的凶手，民间有传统的“河本大作说”，也有新奇的“苏联特工说”。

其中，“苏联特工说”出自于脱启明所著的一本《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系远方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书中转引了据说是来自于苏联特务机关的人事档案资料。该书似乎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但是，我通过挖掘日本方面的史料，又发现，传统的“河本大作说”，证据仍然相当充分、相当扎实，其可信性仍然是压倒性的。在这一方面，证据十分充足，为免繁冗，我在此，只列举其中几条关键的史料如下：

谋杀张作霖的第一号嫌疑人——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本人，在 **1953** 年 **4** 月 **11** 日于中国山西太原战犯管理所内所写的一份笔供，很清楚地承认了自己谋害张作霖的事实。

河本大作的供词，收录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文译文，是这样的：

“.....当时，（张作霖）东北军败退出关，（日本）关东军依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准备对东北军进行缴械，但是，依照当时的规定，关东军在南满铁路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开展军事行动，必须要首相田中义一的一种特殊背书令，

而田中义一由于受贿（收了张作霖的钱）的关系，和张作霖是一伙的人，所以，他迟迟不肯签字，于是，关东军就这样错过了对东北军缴械的最佳时机。因此，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感到极度的不安，并对关东军表示了非常的不满。如果晚一点儿再缴械，就可能要与东北军发生直接的火拼了，而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暗杀掉张作霖，并以此打乱东北军的指挥系统。暗杀张作霖的决定，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所作出的。皇姑屯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答应（我）承担实际爆破的任务，并最终是由东宫铁男操纵爆炸装置，将张作霖给炸死的……”

熟悉中日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河本大作的自供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和行为逻辑的。

不但如此，河本大作在（暗杀张作霖之后）回日本期间，私底下对他的好友小矶国昭

承认过自己就是谋杀张作霖的真凶。

这一条史料，相当的关键。

据日本军人小矶国昭在其《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记载，**1928年6月16日**，河本大作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东京，小矶国昭在东京车站接他，河本大佐当时对小矶国昭私下吐露自己是杀死张作霖的凶手。

《小矶国昭回忆录》的这个证言，转引自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写的资料《满洲事变》。

还没完，还陆续有证人。

当年身在东北与河本大作打过不少交道的日本侨民菅原宪亮的证言也表明张作霖是河本大作策划谋杀的。

菅原宪亮在回忆文章《奉天特务机关长》

里面，有一份这样的证言，收录在史料《土肥原秘录》中：

“.....我在奉天（沈阳）一家日本商业公司当经理.....当时，日本侨民在满洲的权利受到（中国人）日益严重的侵害，几乎已经陷入绝境。我向关东军的河本大佐参谋诉苦，请其设法帮助（日本侨民）解脱困境。河本大佐苦思焦虑、研究对策，终于拟定了一个计划（即炸死张作霖）。我从一个买卖人的角度，极力支持这一计划。土肥原贤二也深知此情，并预祝这一计划的成功.....计划逐步实现，皇姑屯车站终于响起了震天的爆炸声。我赶赴现场，只见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奉军（东北军）士兵.....”

其实这还不算，还有更多的证人。

依据曾经担任日本驻华公使、亲历了中日战争的重量级战犯重光葵回忆：张作霖的确是

被河本大作谋杀的。而且案发之后，日本陆军省反对公布本案的真相，是为了不影响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陆军省当时认为：与其公开本案的真相并公开处罚责任人，还不如让本案永远留在云里雾中，日本可以糊弄国际舆论，逃脱道义的谴责。

重光葵的这份证言，出自重光葵所著的《日本侵华内幕》（又名：《昭和之动乱》）。

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相当日本战时的军部）编写的正史《大本营陆军部》，也是这样记录的——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

中国对《大本营陆军部》这本日本史料进行了摘译，出版了《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一书，分上、下两册。书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因为（首相）田中义一拒绝批准对（张作霖）东北军进行缴械，关东军私自策划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该案不但主谋人是河本大佐，而且，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村冈长太郎也参与了策划.....”

换言之，日本政府官方，对于“河本大作谋杀张作霖”的说法，是予以了正式承认的。

不但如此，还有日本战犯城野宏、伪满洲国汉奸臧式毅、日本军人仪我诚也也都留下了文字，共同指出同一个事实：是河本大作，暗杀了张作霖。这些人的证言，大同小异，在此不赘述。

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案，不但有凶手河本大佐的自供状，还有相当多的人证：菅原宪亮、小矶国昭、重光葵。此外，还有更多的证人：城野宏、臧式毅、仪我诚也.....相当多的证人证言，共同指向河本大作本人。

可是，我们毕竟又无法忽视脱启明所著的《皇姑屯事件真相：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一书，该书所主张的“苏联特工暗杀说”，毕竟列出了据说是摘抄自苏联特务机关人事档案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当年的张作霖，的确是狠狠地得罪过苏联。首先，苏联立国之后，苏联国内的反叛残余——效忠沙皇的白俄军队逃亡到东北被张作霖收留，苏联抗议多次，无果而终，怀恨在心。其次，张作霖派人搜查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逮捕并杀害了以李大钊为首的一群共产党人。对于此，苏联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也就是说，苏联的确存在报复张作霖的充分理由。

可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任何谋杀案件的认定，都需要举证。

既有日本人自称是凶手，也有苏联人自称是凶手，张作霖这个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综合苏联、日本两方面的现有材料，进行综合的分析，认为本案不能排除有如下的可能：

1. 河本大作和苏联特工，都有暗杀张作霖的计划。

2. 河本大作抢先成功实施了暗杀，苏联特工晚了一步。

3. 苏联特工获悉张作霖死讯，回国谎称是自己所为来冒领功勋。

当然，这也只是一个假设。可是，这样的假设，就目前而言，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日本、

苏联双方都有人“争当杀死张作霖的凶手”这样的怪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苏联间谍机关“克格勃”的档案里面，会留下苏联特工自述杀死张作霖的记录。

大家也一起来琢磨琢磨？

吴佩孚暴毙内幕

关于吴佩孚的死，其贴身心腹汪崇屏，在台湾的史料里，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日本医生，是吴佩孚的铁杆哥们齐燮元请来的，而日本医生在给吴佩孚动手术之前，实际上吴佩孚已经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了……

1939年秋，吴佩孚因吃饭时被鸡骨卡住，而患上牙病，经过中、日、德多个国家的医生

治疗无效，进入高危状态，**1939年 12月 4日**，吴佩孚的部下齐燮元请来一个日本医生，给吴佩孚动手术，手术之后，吴佩孚当场身亡。

吴佩孚的命案是民国知名命案之一，也是最扑朔迷离的命案之一。此案牵涉牙科手术，是故意杀人还是医疗事故？由于当时没有及时进行司法鉴定，如今要回头将本案的事实真相彻底还原，恐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似乎只能回头检证吴佩孚身边人的说法，借以参考。

首先，我们看看吴佩孚的孙子吴运乾、吴运坤在《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一文中的说法：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齐燮元说：‘大

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吴道时）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水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本医生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母亲从屋中出来时，痛哭失声，告诉我们：‘天塌了！’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本医生，日本医生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当时的情景，给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还历历在目……”

显然，吴佩孚的孙子们一口咬定：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吴运乾、吴运坤二人，当年的年龄分别为8岁、10岁。他们的证言，只有参考价值，恐怕不能单独成立事实。

我们再来看吴佩孚生前的随员、英文翻译陈文会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这册资料中的说法：

“.....当吴氏（吴佩孚）患牙疾恶化之时.....大汉奸齐燮元主张请日本牙科大夫伊东丰作及外科医生寺田幸夫，皆未得家人同意，后由川本、冈野等带至吴宅，或谓其带至之时，即有意不利于吴氏。伊东旅京甚久，治牙系其专业，兼有时名，何致拔牙之后，复经消毒反形增剧，甚至大汗淋漓不止，音带已哑致不能发音，此诚令人大惑不解，吴左颊红肿，医谓脓血填溢为害，议请寺田稍动手术，俾脓血向外溃流，但颊之与喉，部位悬隔，何以一经开刀及喉部，奇离如此，索解莫由，吴氏病卧在床，妻子未离左右，儿媳扶头，齐燮元在

场，寺田开刀，致哎哟一声，立与世辞，伊东等借去取强心剂为词溜出吴宅，伊东未溜之时，宅中随从人等，势与伊东、寺田拼命，经吴夫人含悲忍痛拦阻方平息，当伊东在楼上治牙之时，吴之旧部（我在场）约百余人在楼下静候消息，一闻逝世，莫不失声痛哭，如丧考妣，吴氏死后，物议朋兴，集矢于日本军部，为平息众怒，爰请吴之秘书长陈廷杰与参谋长张佐民至电台，讲吴氏逝世经过。陈、张无仪秦之舌，亦无法代为辩护……”

可见，作为吴佩孚随身翻译人员的陈文会也认为：日本医生是故意杀死吴佩孚的。

在吴佩孚死亡的现场，还有一个部下叫李炳之，也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写下了如下的证言：

“……吴佩孚几天之前吃饭，被鸡骨头卡在了金牙里，嗓子肿了，吃不下东西，曾经找日

本大夫伊东来拔牙，将牙拔去之后，肿也没消，仍然饮食不进，今天又由齐燮元介绍另外一个日本大夫前来诊治，在场的只有（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和齐燮元二人，据大夫说：‘非动手术不可，但不上医院、不用麻药，就动手术。’连张佩兰也认为不妥，但齐燮元坚持说：‘不要紧，没问题。’于是就由日本大夫动了手术，一刀子进去，只听见哎呀一声，吴佩孚就断气了，现在日本大夫还没走，已经过了三个钟头，大家都在等待吴佩孚缓过这口气呢……不久，请来了一个德国大夫，上楼匆匆一看，急忙下楼来，用中国话说：‘不行了，没有脉息了……’”

李炳之的言辞比较中立，他既没有认定日本医生故意杀人，也没有为日本医生开脱。

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此人叫张绍程，是吴佩孚儿媳妇的叔父。张绍程的说法，也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原文照录如下：

“.....吴佩孚.....患了牙症，本来病并不严重，初请中医郭某敷石膏药.....拖延了时间，口腔发炎，家人改请德国医生史蒂夫斯诊视，经化验说是白细胞多、红细胞少，恐转入败血症，最好住院开刀动手术，家人劝吴佩孚住院，但吴佩孚坚持不进德国医院，只是想请德国医生到家中来开刀。德国医生认为吴佩孚家中卫生环境及设备条件不适宜动手术，于是不来。齐燮元看德国医生不来，则改请日本医生。吴佩孚的家人不同意，但是吴佩孚并不反对日本医生来。齐燮元说：‘（吴）大帅是中国的重要人物，德国医生不来，就该请日本医生，如果你们不同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担负得起责任？’吴的家人于是只好听从齐燮元，请日本医生伊东来开刀.....动手术时，张佩兰执吴的左手，（儿子）吴道时执右手，（儿媳）张义先扶吴佩孚的头部，日本医生伊东的手术器械简单，而且没用麻药.....在刀割处一勾，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医生说身体

太弱，没有办法挽救，勉强打了一支强心剂，当时吴的卫队有几人，一直吵闹，责问伊东，齐燮元急忙阻止，不让卫士们吵嚷……”

张绍程作为吴佩孚的亲戚，他也没有就本案的性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我们再来找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吴佩孚晚年的贴身幕僚，名叫汪崇屏。汪崇屏写了一篇《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注：吴子玉即吴佩孚），收录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出版的《汪崇屏先生访问纪录》当中。

在这本访问纪录中，汪崇屏所讲述的吴佩孚死亡的全过程如下：

“……（碎骨头嵌进牙缝）饭后，找了一个日本人叫伊藤的给他治疗，伊藤没有什么政治作用，我们大家都找他镶过牙，认为很满意，

他不是牙医，只是个镶牙的，他将吴佩孚的牙拔掉了，但是没有消毒，因而进入了病菌.....晚上牙床就肿了.....吴佩孚的家人将姓曹的中医找来，此人是有名的庸医.....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晚上 **10点**吃的药，刚过 **12点**病情就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到了（**12月 4日**）凌晨 **2点钟**，人已经差不多要完了，将他的儿子找来准备后事.....结果又吃了（曹中医）的一服药，进而发烧.....吴于 **12月 4日**逝世，逝世前两天，病已严重，即使日本医生不开刀，他也绝无痊愈的希望.....请了德国医生史蒂夫斯来诊治，发现吴的白细胞太少，非常危险，需要手术.....至 **12月 3日**深夜，吴佩孚知道自己不行了，将孙丹林找来吩咐后事.....**12月 4日**晨，德国医生要求入院开刀，吴不肯去.....这时齐燮元、符定一、川本带了一位日本医生（姓石田）来，吴佩孚坚决不肯让日本医生治，齐燮元又气又急，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让日本人给

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燮元说罢，带了川本、石田等人上楼，强行给吴佩孚施行手术，我当时对齐燮元说：‘（吴）大帅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让日本医生担此恶名？让他（吴）安静离去吧。’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日本医生点点头，说：‘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燮元哭着下楼，顿时大家一片哭声。一些年轻将士在楼下闹，说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不敢动。我当时对他们（年轻人）说：‘（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日本医生）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十分狼狈……”

可见，作为吴佩孚贴身心腹的汪崇屏，他的说法则截然相反：吴佩孚并非死于日本医生故意杀人。（注意：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

那么，侵华日军那边的人，对于吴佩孚的

死，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当事人、侵华日军高层人员今井武夫，在《今井武夫回忆录》中的说法：

“.....组成对华特别委员会.....决定以土肥原贤二为目前的负责人.....（建立傀儡中央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提出的出马条件与日本军不一致.....我（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是旧军阀，不得人心，期待其出马无益.....土肥原贤二采纳了我的意见，打消了推举吴佩孚的意图.....后来随着汪精卫南京中央政府工作有了起色，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设想自然也就不积极了.....因此，促成吴佩孚出马的工作至此中断，重新改为以开封为起点，利用吴佩孚的声望致力怀柔杂牌军.....但是，吴佩孚在当年**12月4日**因治疗牙病引发了败血症，突然死亡，这项工作也就结束了.....吴佩孚死后，重庆政府对其大加赞

扬.....而他们对吴佩孚本人的真实（亲日）想法却无从知道.....”

显然，今井武夫认为：吴佩孚仍然对日军有利用价值，他的死亡是突发事件，与日军无关。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日本军人——陆军省人事局额田坦的证言，收录在《土肥原秘录》里面：

“.....我只见过（土肥原贤二）仅有的一次大惊失色，那是在 **1939年 12月**他对华北工作告一段落，从参谋本部来到畑俊六大臣官邸汇报，正当他在会客室等候之际，我因向大臣请示人事问题也同时在座，这时，参谋本部电报班的军官仓皇赶来，交给大将（土肥原贤二）一封电报，顿时见他（土肥原贤二）惊慌失措，慌忙进入大臣办公室，我当时也感到震惊，事后才知道，是因为经他苦心谋略且成功

在望的吴佩孚突然死去，使他大失所望……”

额田坦的证言，说明了土肥原贤二在得知吴佩孚死亡的消息的那一刹那，感觉相当的意外和震惊。

注意，土肥原贤二当时是日本“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全力负责策反吴佩孚的工作，换言之，日军如果要暗杀吴佩孚，按理应该事先征得土肥原贤二的首肯，除非日军下层将士擅自为之。

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外务省给日本内阁的报告。有一份名叫《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的报告，收录在《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中，是这样写的：

“……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士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

佩孚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吴佩孚）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吴佩孚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佩孚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佩孚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佩孚的去世而夭折……”

很清晰，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显示：吴佩孚至少是有和日本合作的希望的，吴佩孚对于日本是有利用价值的。日本人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本的利益。

我们仔细研读、对比以上九位“证人”的证言（吴运乾、吴运坤、陈文会、李炳之、汪崇屏、张绍程、今井武夫、额田坦、日本外务省），似乎可以梳理出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

1. 吴佩孚吃饭时，鸡骨刺入牙缝，请日本

医生拔牙。

2. 拔牙之后，吴佩孚感染，得了败血症。

3. 吴佩孚服用中医的中药，延误了治疗，病情恶化。

4. 吴佩孚拒绝入住德国医院动手术。

5. 吴佩孚进入病危状态。

6. 吴佩孚的老部下齐燮元带了日本医生伊东来给吴佩孚动手术。

7. 吴的家属及随从阻拦，但齐燮元强硬地说服了吴家接受手术。

8. 动手术时，吴佩孚的妻子、儿子都在现场帮忙。

9. 动手术过程中，吴佩孚当场身亡。

10.吴佩孚的家人和不少部下怀疑日本医生，并要动粗，被劝阻。

而侵华日军人员今井武夫、额田坦以及外务省的证言，则似乎说明了以下事实：

1. 吴佩孚是个亲日人士，至少在表面上是。

2. 吴佩孚并不拒绝出任伪职，只是条件没谈拢。

3. 到了后期，吴佩孚对日军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4. 但是，吴佩孚对日军还有“招抚杂牌军”的利用价值。

5. 负责“吴佩孚工作”的首脑土肥原贤二对吴佩孚的死亡感到意外。

本案的研究难点在于，研究者需要同时具备以下的专业知识：

1. 牙科临床手术知识，分析日本医生的动作。

2. 对比证人证言，理清基本事实。

3. 根据当时的军事、政治、历史背景，分析日军动机。我显然不具备牙科手术知识，因此只能在分析证言、分析作案动机等方面入手。

依据上述的各种证言，我认为，日本医生故意杀死吴佩孚的指控如果要成立，则需要合理解释以下的疑点：

1. 尽管合作条件谈不拢，但是吴佩孚对日军仍有利用价值，暗杀吴佩孚，似乎并不符合日军的利益。

2. 北平当时是日军占领的地盘，要杀吴佩孚似乎并非难事，似乎不必请医生当着吴佩孚妻儿的面公然动手。

3. 吴佩孚当时已经进入病危状态，暗杀垂死之人，似乎没有必要。

4. 日本医生胆敢进入警卫森严的吴佩孚住宅公然行凶，似乎不合常理。

5. 日本医生不是日军派来的，而是吴佩孚的心腹部下齐燮元请来的。

6. 土肥原贤二得知吴佩孚死讯时的意外和震惊，也需要合理的解释。

7. 吴佩孚的心腹汪崇屏晚年生活在台湾，似乎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

综上所述，我认为，吴佩孚一案，医疗事故的可能性，大于蓄意谋杀的可能性。但是，

我也必须坦言，司法实践告诉我们，医疗死亡案件，必须及时开展医疗事故的司法鉴定，才能及时得出肯定的结案判词，而一旦错过了时机，相隔几十年再回头，单凭证人证言去对比分析，则恐怕只能判断个大概，而不太可能做到准确断案。

这就是我的看法。诸位读者也不妨来琢磨琢磨。

川岛芳子死亡之谜

电影里面川岛芳子的故事，其实还远远不如现实中的真实故事精彩，川岛芳子找替身代死，真人还活在人间的说法，靠谱吗……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日

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此人原名金壁辉，为肃亲王善耆的女儿。**1912**年，年仅六岁的川岛芳子被父亲（肃亲王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收养，并于同年赴日本居住、求学。

长大之后，川岛芳子成为了侵华日军的一员间谍。于**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和日本军官田中隆吉一起，策划了打死日本僧人事件，并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战事，以转移国际视线，掩护伪满洲国在中国东北的“建国”活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川岛芳子旋即在北平被捕。**1948**年**3月25**日，川岛芳子以汉奸罪，被中华民国政府在北平处决。一了百了。这件事本来也就这样完了。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冒出了一条惊天新闻：川岛芳子当年并未被国府枪毙，而是花钱买通了替死鬼，川岛芳子被秘密释放了，从此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叫“新立城”的农村，一直到**1978**年**2**月

21日，安然终老。事实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关于川岛芳子（金壁辉）到底是被国府枪毙了，还是被私下释放了，我依据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证人证言，在本文中，也来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看看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

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是被国府处决了。

爱新觉罗·宪均的证言，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原文摘录如下：

“河北省高等法院于 1948年 3月 25日凌晨，将金壁辉枪决了，她的尸体由她在北平的十姐爱新觉罗·显狮和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并且火化了。金壁辉的尸体被火化之后，她的骨灰一半送去了日本，一半则留在了中国。”

很清楚，作为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认为：川岛芳子的确被国府枪决了。

当然，也许读者会说：爱新觉罗·宪均是川岛芳子的哥哥，当哥哥的，当然要保护妹妹，不可能诚实地告诉你“我妹妹还活在人世”吧？

应当承认：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

于是，我们再来看看台湾那边的国民政府狱政档案。

1948年 3月时任北平第一监狱典狱长的吴峙沅，在台湾当局法务部编纂完成的《百年狱政档案》中，留下了这样的证言：川岛芳子确系被民国政府处决了。

吴峙沅的证言，原文是这样的：

“（川岛芳子）执行死刑并经何承斌检察官验明正身，讯留遗书后，命令法警执行一枪

毙命，事后经检察官率同检验员三次覆验，确已死亡，始将尸体交由本监移出非常门外停放，以备各新闻记者参观暨拍照，同日午后并准由日僧古川大航具领掩埋。”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狱政档案，和大陆这边的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哥哥）的证言，是相互吻合的。即川岛芳子不但的确被枪决了，而且尸体是由日本僧人古川大航领走了。

说到这里，毋庸讳言，证据仍然不是十分充分。

我们再来看看川岛芳子的亲妹妹、肃亲王善耆的第 **38** 个孩子金默玉的证言。

2008年 11月 19日，在东北调查“川岛芳子没死”传闻的记者，电话采访了身在廊坊的金默玉，当时，金默玉是这样对记者说的：川岛

芳子在**1948**年，的的确确是被国民政府枪毙了。

金默玉的证言，是这样的：

“当年她（川岛芳子）被枪决时，也有被替身赎出的传言，我们看了行刑后的照片，确信是她本人，没有假的，你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谣言。”

于是我们进一步知道，不但川岛芳子的哥哥爱新觉罗·宪均深信川岛芳子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金默玉，也坚信川岛芳子的确已经被国民政府枪决。

当然，前面所引用的川岛芳子的兄弟姐妹以及当年的典狱长，也许都与川岛芳子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从理论上而言，这些人的证言，都不是绝对可信的。

以下，我们来看一个利益不相关的第三

者，看看第三者又是怎么说的。

大家跟我来看看声称当年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毙的国民党老兵——谭良泽老先生的证言。

谭良泽老先生是原国民党宪兵 19团驻西区宪兵队少校军官，当年负责枪毙川岛芳子的刑场警戒任务。

2004年，谭良泽老先生在四川自贡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说的：

“川岛芳子被处决是铁的事实，之所以传出未死的谣言，是因为此次处决的开枪过程没有允许记者公开目击，所以引起了记者不满所致。”

谭良泽老先生作为刑场目击者，他的这篇证言采访文章，名叫《帝国谍报之花的末日：处决川岛芳子的全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找来一读。

但是，尽管谭良泽声称亲眼目睹川岛芳子被枪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谭良泽此前从未见过川岛芳子，他所见到那个被枪毙的“川岛芳子”，只不过是一个替身。实事求是地讲，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庆祥所编著的新书《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出版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这一本书中，历史学者王庆祥，在调查了“川岛芳子逃脱死刑”传闻的相关人士之后，挖掘出了以下两条最为关键的证据：

关键证据一：长春市居民段连祥，在生前告诉过他的女儿段续擎和外孙女张钰，川岛芳子在**1948**年并未被枪毙，而是花钱买通狱卒，并逃脱了，此后一直隐居在长春郊外一个名

叫“新立城”的村子，直至 **1978**年去世。段续擎和张钰长期接触的“方姥”，正是川岛芳子本人。

但是，这则证据的瑕疵在于，段连祥早已去世，死无对证。原话是不是他所说的？不能十分确定。

关键证据二：清廷贵族后裔爱新觉罗·德崇，于**1955**年或**1956**年的冬天，在沈阳市皇姑屯三义栈胡同的一个大院里，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后若干天，爱新觉罗·德崇的姐姐额温对他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那天来家的壁辉有学问，有能耐，能文能武，多才多艺……连死都有人替。”

注意这里的“壁辉”，有可能就是指的“金壁辉”——川岛芳子的汉文名字。

这件事，是爱新觉罗·德崇亲口告诉历史学

者王庆祥的——但是，这一条证据也是有瑕疵的：这句话毕竟是额温说的，而额温又不在人世了，死无对证，其真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

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王庆祥在《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一书当中，还分析了所谓“川岛芳子”的一些遗物，例如一架刻着“HK”两个英文字母的望远镜、一张写着“小方阁下”的纸条……但是，由于这些遗物，并不能证明遗物的主人就是川岛芳子，也就是说：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些证据缺乏足够的关联性——因此，我在此恕不一一列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一下《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这本书。

分析到这里，毋庸讳言，《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所考证到的两条关键证言如下：

1.段续擎、张钰的证言。

2.德崇的证言。

就在世人而言，目前只有这三个人，声称自己在 **1948**年之后，亲眼见过川岛芳子本人——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声称川岛芳子并未受死，而是一直活在了世上，直至**1978**年老死。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将本案中的各个证人的说法，总结如下：

1.川岛芳子兄长爱新觉罗·宪均：川岛芳子的确于**1948**年被枪决了。

2.川岛芳子的妹妹金默玉：川岛芳子的确在 **1948**年被枪决了。

3.典狱长的吴峙沅：川岛芳子的确在**1948**年被枪决了。

4.刑场警戒兵谭良泽：我亲眼目睹川岛芳子在1948年被枪决了。

5.段续擎、张钰：川岛芳子脱逃，此后在长春一直活到1978年。

6.德崇：我在1955~1956年间，亲眼见过川岛芳子。因此，这件事到了现在，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罗生门”事件，证明川岛芳子被枪决的证据有，证明川岛芳子逃脱死刑的证据也有。但是，正反两方的证据，似乎也都并不十分充分。说到这里，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当年国民党的狱政，的确是比较腐败的，

一个有钱的犯人，愿意花足够多的钱，买下自己的一条命，这并非是鲜见的事情。川岛芳子这个“罗生门”案件，也许要等待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才能开展进一步的探讨了。

疑点重重的“冯玉祥之死”

冯玉祥的一生，叱咤风云，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参与其中。**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访美归国的轮船上，由于轮船意外失火而去世，死因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在黑海海域，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在船舱内被烟火窒息而死。冯玉祥的命案，是众多民国命案中最难破解的案件之一。此前，国内传言最广的说法是“国民党暗杀之说”。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通过本文我带领读者们，去重新审视这个案件。当时在案发现场，有一个关键证人——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因此，首先我们来听听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对事发经过是怎样说的。**1965年**，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在山东青岛亲口对冯玉祥的老部下张宣武

说了以下一番话，收录在《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史料中：

“.....冯玉祥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是，在乘坐苏联“胜利号”轮船抵达埃及开罗时，冯玉祥已经下船，特务也跟着下了船，启碇时，冯玉祥悄悄上了船，但那帮（国民党）特务却没有赴苏联的船票和签证，他们上不去，于是，才把特务甩开了.....”

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认为有一群疑似“国民党特务”的人在跟踪冯玉祥一家人，但是，这群被她和冯玉祥怀疑是“国民党特务”的人，在火灾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被冯玉祥成功地甩下了船。在这里，读者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1. 冯玉祥怀疑人家是国民党特工，但不代表人家一定是。

2. 跟踪的目的可以有多种（例如监视），跟踪不等于蓄谋暗杀。

另外，读者也许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特工已经跟踪冯玉祥很久了，为什么不直接开枪射杀冯玉祥？国民党对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就是直接开枪射杀的，后来国民党派特工到美国暗杀作家江南，也是这样干的。

冯玉祥的太太李德全的说法还没完，我们继续往下读：李德全接着对张宣武说：

“.....（1948年）8月31日，船抵达黑海，晚餐后，冯玉祥一家和部分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玉祥在船上的电影室亲手放自己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电影胶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落，快速旋转摩擦生电导致起火，由于室内胶片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故而起火，刹那间

满室内都是火，冯玉祥和其他观众一起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被烟雾遮蔽视线，看不到出口，脱逃不及，窒息死亡，李德全也被烧伤，同时遇难者七十多人……”

注意细节，本场火灾似乎不仅仅是烧死了冯玉祥，而是一共烧死了七十多名国际乘客——因为这是一艘国际客轮。

我们再来听听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说法。

为什么要听周海婴的说法？因为周海婴和冯玉祥一家的后人有关。周海婴在其《鲁迅与我七十年》的《李德全谈冯玉祥之死》一章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住的沈阳铁路宾馆，隔几天就有一次当地首长出面举行的‘接风’宴，欢迎又一批民主人士抵达。他们之中有蔡廷锴、李济深、王昆仑、章伯钧、章乃器、朱学范、彭泽民、

谭平山、邓初民、孙起孟、阎宝航、吴茂荪、洪深、朱明生等知名人士。还有一位仅比我年长1岁的王金陵，是王昆仑的女儿。有关方面介绍说，他们有从哈尔滨过来，也有绕远道从苏联和法国过来的，各有不同的途径，但大家都只顾听，至于路上的过程细节谁也不打听。因为这‘通道’也许仍有使用价值，万一不慎透露出去，将对‘通道’环节的人员不利。

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到达后，向大家详细叙述了冯将军死难的经过，使众人听了很感悲痛和疑惑。她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所以大家听了也都不便表示什么。

我至今记得的是，冯夫人当时回忆说，冯将军是应邀回国来参加新政协大会的，他们夫妇带两个女儿和儿子、女婿，还有秘书赖亚力，一起从美国搭乘苏联客轮‘胜利号’借道埃

及去苏联。客轮先到高加索的港口城市巴统，放下 **1500**名欧洲归国的苏侨（白俄），然后横渡黑海，开往奥德萨（据他的次女冯弗伐说，此船是德国军用船改装的，并非正规的商用客轮）。船上的文娱生活很丰富，每天除了有音乐会和交谊舞会，还放映电影，因此电影胶片积聚有成百卷之多。抵埠前的一天，即是 **8月22日**，放映员在回倒电影胶卷过程中，不慎拷贝起火，并很快从放映室蔓延到客房。由于风大火势凶猛，浓烟冲腾而起，正与两个女儿在舱内谈话的冯将军立即带着夫人、女儿向出口处冲去，不料离房间最近的那扇门竟被从外面锁死，怎么呼唤也无法打开，为寻找出口，小女儿冯晓达冲向走廊的另一端，竟被烈火所吞噬。他们三人被困在胶片燃烧的化学气体充溢的走廊里，直到儿子洪达和四女婿、赖亚力先生几人把他们一一抢救到了甲板，冯将军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在冯夫人叙述的全过程中，她没有提到曾有苏联船员前来救援，只说到救

生艇是由船员带领的。

冯玉祥另一女儿当时受了轻伤。赖亚力的脸部被烧伤，在苏联的医院住院治疗。直到过了 3 个多月之后，我们还看得出他脸上皮肤的颜色明显有异。这件不应发生的灾难屈指算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且已时势大变，应当也可以解密，见个分晓了吧？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是，在全国政协一起开会期间，冯弗伐曾向前国民党军统头目沈醉提出过她对父亲遇难的疑问。沈醉的答复甚可回味。他说：‘蒋介石对于冯玉祥在美国演讲反对援蒋反对内战是恨之入骨的，可惜他的手没有那么长。’我想，这也可算作解密的一部分吧。”

周海婴的说法，总结起来是以下几点：

1.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说：这是一起由电影胶片起火导致的事故，但是，有人反锁了其中一扇门（反锁原因不详）。可是，她又担心

影响中苏关系，因而不敢深入追究。

2.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问过（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沈醉否定了“国民党暗杀冯玉祥”的可能性。

我们根据周海婴的说法，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女士以下这一句话，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本人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为怕影响中苏关系，只得忍着丧夫之痛，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

这段话是否暗示着苏联人也有放火暗杀冯玉祥的嫌疑？冯玉祥的次女冯弗伐，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缅怀先父冯玉祥将军》，在这篇文章中，冯弗伐是这样说的：

“.....关于父亲（冯玉祥）在黑海遇难，60年来，很多人都心存疑问。记得在 20世纪 90年代，我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就父亲

遇害事询问沈醉先生。沈先生说：‘冯到美国以后，发表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演讲，蒋十分怨恨，但国内形势吃紧，他的手没那么长了，顾不上了！’**2001**年，周海婴先生在电话中向我谈起此事，说他在 **1949**年随母亲许广平夫人到东北时，曾听到李德全夫人向民主人士叙说我父亲遇难经过，大家听后都感到悲痛又觉疑惑。她（李德全）对这件灾祸虽有疑问，但忍着丧夫之痛，没有明确地提出详细调查的要求……父亲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在晚年曾对我的弟弟洪达说过：‘据苏方的调查，大火是烈性炸药爆炸引起的……’”

冯弗伐的说法，总结如下：

1.（前国民党军统高层）沈醉否认“国民党暗杀说”。

2.李德全对火灾有疑问，但是没有提出过调查的要求。

3.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说：苏联调查结果是烈性炸药引起的火灾（谁调查的？哪个报告？没有交代）。

我们再来听听冯玉祥四女儿冯理达的说法。冯理达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是这样说的：

“.....谁也不知道那火是怎么着起来的。我两个妹妹正在头等舱听父亲讲故事，舱门开着。最招人怜爱的小妹晓达，突然看见外面起烟了，说可能出事了，去看看，就再没回来.....我们从窗口逃出去，然后飞奔过去救父母和妹妹，母亲被救了出来，发现父亲时，他已经昏迷不醒，晓达也失踪了，最终留给我们的仅有一片衣襟.....当时父亲的身体还有余温，可是周围没有任何急救药物，医务室也早已是大火熊熊.....你想想，电影胶片起火，肯

定是小范围的，应该能控制。但这次船上的电报、无线电、医务室和驾驶舱事先都遭到了破坏……”

冯理达的证言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舱门是开着的，也就是说，这个空间似乎并非是封闭的。

除此之外，冯理达在《文学报》总第 1325 期中提供的说法如下：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就借‘考察水利’之名，派我父亲到美国。到美国后，父亲看到国内战乱愈演愈烈，就在美国发表了《告同胞书》，痛斥蒋介石的独裁，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恨我父亲，就开除了他的党籍，吊销了我们的护照，迫使我一家人流亡海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党邀请父亲回国参加新政协，父亲立即决定回来。为了安全，我们乘坐了苏联在二战

中缴获德国的轮船‘胜利号’，这是我党为迎接我父亲拨专款给苏联的。7月 31日，我们秘密离开纽约，8月中旬抵达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时，这里停留的一艘国民党军舰引起了父亲的警惕。到了 9月 1日，我们在黑海上航行时，轮船突然起火，浓烟冲进我父亲的特等舱，但由于医务室也提前被破坏，父亲在烟火中窒息死亡，妹妹晓达也不幸遇难。后来查明，轮船起火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造成的，但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知道，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且双方都指责是对方所为。然而，真正的凶手是谁，也许永远无法知道了……”

冯理达的说法，总结要点如下：

1.冯玉祥是在烟火中窒息死亡的。

2.轮船起火看似是由于电影胶片起火，但是冯理达存疑。

3.冯理达认为有人蓄意放火暗杀冯玉祥，但是不知道谁是凶手。我们继续听冯玉祥其他子女的说法。冯玉祥的三子冯洪达，描述其父冯玉祥死亡一案是这样说的：

“.....（轮船）行至黑海时，突然起火，来势凶猛，顷刻之间，大火吞噬了父亲（冯玉祥）和姐姐晓达的生命，亲爱的父亲，就这样骤然与世长辞了.....”

冯洪达采取了“中性说”，没有指控任何人。（冯洪达的说法，出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冯玉祥》第 269页。）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官方的说法。

1948年 9月 8日，冯玉祥遇难的一个礼拜之后，（中共）新华社在陕北公布了以下的死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

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

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说：

“……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今忽遭此意外，实在国家民族之损失……”

同时，朱德、毛泽东致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

“……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

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

“……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

忱.....”

同时，中共发布了冯玉祥的官方略历如下：

“.....8月 31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

上述的这些电报，也出自《我所知道的冯玉祥》这册资料。我们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得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认为：冯玉祥是死于失火事故，并非死于谋杀。至少在公开场合，中共官方是这样说的。

这里请读者注意一点：**1948**年正是国共两党的内战年，此前闻一多、李公朴等公共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势力暗杀，共产党迅速将之公之于众，借此攻击国民党独裁专制，争取民心。假如中共认为冯玉祥被国民党谋杀，中共不应该放过这个攻击国民党争取民心的绝佳机会。

这艘船是苏联的船，因此，我们来看看苏联的说法：冯玉祥逝世之后，苏联“塔斯社”于1948年9月4日发电称：

“.....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

可见，当时苏联公开的说法也是“意外事故”一说。我们对冯玉祥之死一事的各种说法，作一个总结如下：

1. 遗孀李德全：怀疑有内幕，但害怕“影响中苏关系”，不敢追究。

2. 前国民党特务机关高层人物沈醉：不可能是国民党所为。

3. 次女冯弗伐：一直在追问，但是不知道真相。

4. 秘书赖亚力：苏联调查说是爆炸物起火

（调查报告出处未交代）。

5. 四女冯理达：怀疑“胶片起火说”，认为是暗杀，但凶手不明。

6. 三子冯洪达：没有明确指控任何人。

7. 中共：轮船“失火”，属于意外事故。

8. 苏联：“影片起火”，属于意外事故。

至此，我们综合各方的说法，似乎可以大致确定以下两点关键事实：

1. 轮船起火，涌出浓烟。

2. 冯玉祥受浓烟窒息而死。显然，本案破案的关键在于是失火，还是蓄意放火？如果是蓄意放火，

那么是谁放的火？

我们不妨逐个分析：嫌疑人一：“中共”。但是，冯玉祥亲共，冯玉祥死亡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作案动机很难成立。嫌疑人二：美国人。但是，美国没有帮助国民党暗杀亲共人士的记录。嫌疑人三：苏联特工。但是，冯玉祥亲苏，冯玉祥死亡似乎也不太符合苏联的利益，作案动机似乎不明。再者，火灾中一共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作案代价明显过高。嫌疑人四：国民党特工。但是，李德全说“国民党特工”已经在岸上被甩掉了。再者，国民党特工放一把火烧死七十多名国际乘客，是否玩得太大？当然，毋庸讳言，我依据现有的史料，不足以作出肯定的结论。冯玉祥的命案，是一起典型的“罗生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李德全“为了不影晌中苏关系”，而不敢追问冯玉祥之死的具体内幕。我想，这一条信息，是相当耐人寻味的。可是毕竟目前的史料又不足。恐怕这个案件，要等到“克格勃”相关档案公开之时，才能进一步探讨了。

杀人魔王戴笠的死因

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军统”头子戴笠，在**1946**年坠机身亡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不是一起意外的事故。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不是，那么，谁是谋杀戴笠的幕后主使？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到底是飞机失事？还是一场阴险的政治谋杀呢……

1946年 **3**月**17**日，戴笠的飞机在江苏省江宁县的一座小山上坠毁，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当场身亡。对于戴笠的死，民间传闻颇多，一般猜想是红色特工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比较不靠谱的猜想是蒋介石派人在飞机上做了手脚。我认为：这是一场意外事故的可能性最大。而戴笠所乘坐的第 **222**号飞机之所以失

事，除了天气恶劣的因素以外，还有国民党空军腐败的因素。请听我细细说来。首先，请各位跟我来听听戴笠生前的心腹沈醉，他是怎么说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里，写下了这样的证言：

“.....戴笠乘坐的，是 **222**号专机，是由美国运输机改装的，他于 **1946**年 **3**月 **16**日从北平飞往天津，当晚在天津住宿，第二天（**3**月 **17**日），戴笠乘坐这架飞机从天津飞往上海，当天起飞之前，戴笠就接到了通知，说天气不好，不宜飞行，但戴笠仍然坚持飞上海，因为他要去上海接他的情妇胡蝶。戴笠叫人多备了汽油，说如果上海天气恶劣不能降落，则转飞南京，再不行，就去青岛或济南。飞行员知道戴笠的脾气，不敢抗命，便于当日（**3**月 **17**日）上午从天津起飞，到达上海的时候，大雨滂沱，上海机场不同意飞机降落，于是依照预备计划飞往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大雨，南京

的机场勉强同意降落，但是，由于云层很低，而且又有雷雨，飞机和地面联络非常困难，在穿过云层下降时，飞机竟然越过机场飞到江宁县去了，到 12点联络突然停止，飞机撞上了山……”

这份证言所传达的意思很明显，作为戴笠的心腹，沈醉认为：戴笠死于意外失事，也就是说，戴笠不是死于暗杀。

值得注意的是，沈醉说戴笠坚持当天要飞上海，是为了去接他的情妇——电影明星胡蝶。这叫什么？这叫“官场腐败”。一个高官，为了见情妇，置天气恶劣于不顾，说好听点是痴情，说难听点是腐败，腐败到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真是“死了都要爱”。

那么，蒋介石对于戴笠的死，是什么反应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是怎么说的：

“.....蒋介石听到戴笠飞机失踪的消息，非常着急，立即亲自打电话到航空委员会查询**222**号飞机的下落，然后火速派了几架飞机沿途搜寻，蒋介石对毛人凤说：‘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去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

可见，依据沈醉的回忆，蒋介石对于戴笠飞机的失事，不但感到很意外，而且是方寸大乱，十分着急。

大家注意蒋介石在上面说的这句话：

“我想戴笠可能是迫降到解放区（蒋称匪区）了，所以暂时失去了联络。”

蒋介石的这话说明：蒋介石当时，根本还没有料到戴笠已经死亡，而仅仅猜想戴笠是被八路军抓走了。

这句话值得注意，如果蒋介石有心暗杀戴笠的话，他应该早就知道结果了。

当然，读者可能会说：你这是孤证，难道蒋介石不会装蒜吗？

别急，听沈醉继续往下讲：

“.....蒋介石叫毛人凤赶紧准备一个特工人员携带无线电台、报务员、外科医生和药品，到一些可能降落的解放区上空去，一旦发现这架飞机，如果没有机场不能降落的话，则跳伞下去。蒋介石再三叮嘱毛人凤，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蒋介石接见了我们，用极为关怀的口吻对我们说：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戴笠找到。蒋介石还写了个手令：无论何人，不准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各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保护，此令！.....几天之后，戴笠失事的飞机找到了，蒋介石立即操心起来：今后由谁接任戴笠的工作呢？此时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了郑介民代理戴笠的工作，蒋介石同意了.....”

沈醉的这段话，仍然出自他的著作《我所知道的戴笠》。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蒋介石不但很担心戴笠的安全，而且蒋介石事先根本就没有做好找人替代戴笠工作的准备，多亏了毛人凤向蒋介石推荐郑介民临时接替戴笠的工作。

鸡飞狗跳，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的迹象和“蒋介石暗杀说”，显然是相互矛盾的。

这里还有一点需要各位读者特别注意的是，沈醉的回忆和证言，是在**1949**年之后撰写的，当时他作为一个国民党战犯，写文章原则上是要讨好拘押方的，事实上，他有相当多的文字是在讨好拘押方，因此，哪怕蒋介石有那么一丁点儿暗杀戴笠的嫌疑，依照沈醉在 **1949**年之后所处的环境和他一向的文风，沈醉必然会借题发挥，指控蒋介石暗杀下属的“丑行”，而不会像本文这样，将蒋介石写成一个对于戴

笠之死事先毫不知情的人。

从这点而言，沈醉这份关于蒋介石没有谋杀戴笠的描述，应该讲是有相当的可信度。

事实上，戴笠是国民党军统的头号人物，他死了之后，全国各地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纷纷与军统失去联系，而这批单线联系的高级特工，手下又各自有大批中低级特工，因此国民党整个情报网络遭受了重大损失。

自从戴笠身死，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工作一落千丈，蒋介石“失势”，和戴笠之死，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暗杀戴笠，根本就不符合蒋介石的利益。

可见，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暗杀戴笠的利益动机——蒋介石的嫌疑，应该是可以排除的。

也许诸位会说：你就单凭沈醉一个人的证言？

当然不止。诸位再跟我来，听听当年的亲历者——国民党资深飞行员赵新，对本案的证言。

依照飞行员赵新的说法，戴笠之死，不但与暗杀毫无关系，反而与国民党空军的腐败有一定的关系。

赵新是这样说的：

“.....1946年 3月 15日下午，我照例去队部值班室看任务派遣牌，看到上面写着：**222号**专机，起飞时间：**3月 16日上午 8时**，航线：北平—天津—南京—上海，飞行员：赵新、冯俊忠，要求**3月16日早上 7时前**做完飞行准备.....翌晨，我乘吉普车驰往西郊机场，立即仔细地检查 **222号**飞机，在每个关键部位检查完两遍后，确认飞机完全良好，就在飞行纪录簿上签字交给了机务员。时已 **7时 45分**，随即登机做起飞前准备。当我一踏进机舱，看见舱

内已坐好了 7个人，其中一人，好像见过面，后来才想起在庆王府参加蒋介石 50寿辰，聆听训话时，就是他站在蒋介石身后，当时我询问旁人，说是叫戴笠，是军统局的头头……”

赵新的这段证言，出自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74～276页，是赵新自己所写的回忆文章《戴笠摔死前后》。

读者可以从赵新的上述证言了解到：3月16日早晨，在戴笠的飞机起飞之前，赵新已经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而且还将每一个关键部位都仔细检查了，而且还都检查了两遍，发现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言之，没有发现被人做过手脚的迹象。

应该讲，依据赵新的这个证词，我们似乎可以排除“飞机被做过手脚”一说了。我们继续往下读赵新的证言：

“.....时钟已指到 **7点 55分**，我正要按下启动按钮，启动飞机时，忽见机头左侧下方滑运行跑道上，飞驰来一辆吉普车，车上的人急忙向我挥手示意，并迅速停在我机头下方，我探头问：‘怎么回事？’同时看出挥手人是张远仁

（绰号小黑子，四川人，航校第 **18期**毕业生），他大声嚷着：‘不要开机！有急事！队长让我来替你！’我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他说：‘快下来！队长叫你去，你见到队长就知道了！’我说：‘我机上的行李怎么办？’他说：‘拿下来，你不去了。’我见时针已指 **8点**，再说也来不及了，就带着行李坐他的吉普车进城

了.....次日，即 **3月 17日中午 12点 5分**，地面接到飞报：南京明故宫机场云高**300**，有雷阵雨，能见度极差，着陆困难。队部立即回电：**222号**专机，请你速告明故宫机场打开导航台，进行穿云迫降，如果不行，改飞上海或济南。但是，上海、济南的天气也不好，于是，**222号**专机只好硬着头皮，在南京做穿云迫

降。不久，接南京明故宫机场报告：**222**号专机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与地面联系困难，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雷雨中，先后三次尝试下降，都越过了机场，无法着陆，在最后一次下降中飞偏了，飞往江宁县去了。下午 1点 6分，**222**号专机电讯联络突然中断，地面多次呼叫，可是已经听不到 **222**号飞机的讯号了。戴笠的飞机撞山了……”

赵新在这一段里，透露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航空大队的队长，临时指派张远仁替代赵新去驾驶戴笠的飞机。

那么，这个航空大队的队长，为什么要临时让张远仁去替代赵新驾驶戴笠的飞机呢？

对于这一点，赵新在同一份证词里，是这样解释的：

“……**222**号失事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

仁听说有去上海的任务，因赚钱心切，立即向队长送礼，一再要求派他去上海做黄金美钞生意，平时张远仁与队长同住一院，关系也好，在队长考虑张的技术水平不高，可否派他去正犹豫不定时，张就说：‘主要替队长赚钱，请队长也出些本钱，一定能赚回大钱。’把队长说动了心，于是，他两人在 **222**号起飞前夕，连夜准备妥当，决定由张于翌晨赶到机场，并以队长的命令，将我撤换下来……”

可见，赵新说，原来张远仁要借这次飞行任务的便利去上海从事金融投机活动，获利后和航空队长二人分享，航空队长财迷心窍，于是临时起意并指派了张远仁去替代赵新。

张远仁的驾驶技术比不上赵新，按照道理，对于戴笠这样级别的高官，应该指派赵新去执行飞行任务的，但是，队长却临时改派了张远仁，这仅仅是为了捞外快，可见国民党空军的腐败。

赵新的这段证言，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的：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政界兴起了一股到上海炒卖黄金、美钞、汽油等生意的歪风，国民党空军也未能免俗，航空大队的这位队长，明明知道飞行员张远仁技术不过关，也要临时决定改派他去接替赵新给戴笠开飞机，不为别的，只为了张远仁会给他（队长）分红。

这还不算，国民党空军在事后还专门作了调查。对此，赵新是这样说的：

“.....事后调查得知：**222**号专机因为看不见地面，先后几次穿云，都越过了机场，飞行员掌握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都与穿云图上的航线偏差很大。失事的原因，主要是飞行员张远仁飞行技术差，张远仁和冯俊忠接受的是旧式飞行训练，缺乏科学头脑和先进技术的训练，尤其对无线电波，单凭听觉的盲目飞行和利用无线电罗盘的定向飞行，他们全都没有学过，张远仁只是学过一些初步的穿云迫降理

论，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冯俊忠对仪表、电波、无线电等设备也不熟悉，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美国空军训练中心的严格训练，盲目穿云，一遇到恶劣天气，就缺乏应变能力，这就是这次事故的必然性所在。戴笠失事一案，在国民党空军史上是一件丑闻，以前是不能披露的，现在我觉得应当将真相公之于众……”

很明显，赵新所提供的材料显示，戴笠的飞机失事，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 1.天气恶劣。
- 2.飞行员技术不够好。

而之所以派了一个技术不过关的飞行员（张远仁）执行这次飞行任务，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航空队长和出事的飞行员狼狈为奸、假公济私，他们借出差上海的机会炒卖黄金、美

钞挣钱。航空队长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是不会派张远仁去飞上海的，因为张远仁技术不好，不应该让他飞这一趟，戴笠是高官，飞行安全马虎不得。

总之就是两个字：腐败。依据以上的各种证言，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本案发生的全部经过如下：

1.1946年 3月 15日白天，航空队接到戴笠的飞行任务，航空队长指派飞行技术较好的飞行员赵新、冯俊忠执行此次飞行任务。

2.1946年 3月 15日夜，技术较差的飞行员张远仁连夜说服航空队长，让他接替赵新驾驶飞机，张远仁要借此机会到上海炒卖黄金或美钞并和队长分红。

3.1946年 3月 15日夜，航空队长经不起经济利益的诱惑，违背良心，甘冒风险，决定临

时改派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去执行任务。

4.1946年 3月 16日7时，飞行员赵新仔细检查了戴笠的飞机两遍，发现飞机安好无恙。

5.1946年 3月 16日 7时 55分，飞行技术较差的张远仁临时赶到机场，接替赵新驾驶飞机，赵新无奈，只好退出。

1946年3月16日晚上，张远仁驾驶戴笠的飞机抵达天津，在天津过夜。

3月 17日早上，戴笠的飞机从天津飞上海，遇雨，转南京。

3月 17日中午 12时零 5分，南京上空暴雨，飞机冒险迫降。

1946年3月17日中午13时零6分，飞机在南京（江宁区）迫降过程中，撞山失事。讲到这里，我想各位读者应该心里都基本有谱了：戴

笠所乘坐的这架**222**号飞机之所以失事，主要的原因在于遭遇了恶劣的天气，而除此之外，国民党空军的腐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恐怕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命案最接近事实真相的分析。

后记

通过可靠的史料，对这些近代史疑案进行探讨，借助这个，我算是和读者一起，乘坐时光机器，穿越到中国近代走了一遭。读者也许会意犹未尽，又也许会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很多的情况下，不是非黑即白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好人”和“坏人”两个定义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一个历史事件在“必然”与“偶然”之间，有时候也存在着可供争议的空间。无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评价一个历史事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事件前前后后的基本历史事实，必须要先理清楚，而理清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是要耕读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而且是可靠的史料，才有可能。愿以这本小书，给诸位带来一点点营

养，则不枉费我长期伏案的努力。

冯学荣**2014年 10月 28日**

目录

中国历史的侧面.3，历史的缝隙与灰烬

第一章 人物观察

“终结者”李斯

拜别师门

士途还是仕途

王道还是霸道

韩非之死

“釜底抽薪”焚书令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

祥瑞

贤主

创新

范仲淹临危受命

改革未成身先殆

庆历新政为何失败

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

教案

交困

“一生三变”

无力回天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

三眼花翎

破灭的外援

绝望贤良寺

[“和尚”已死](#)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

[在公理的迷梦中启航](#)

[亲历议会民主](#)

[“正义人道的好梦”](#)

[“科学万能主义”的破灭](#)

[论战社会主义](#)

[被抛弃的青年楷模](#)

[“流氓”忠臣洋家将](#)

[募兵](#)

[风波](#)

[国籍](#)

[逃走](#)

[美国内战蔓延到大清](#)

[中外军事合作](#)

[宋教仁呼吸政治文明的新空气](#)

[第二章 疑案迷踪](#)

[岳飞之死的政治解读](#)

[岳飞为何遇害？](#)

[岳飞死于政治交易？](#)

[挺击案：晚明政局的一个标本](#)

[顺治皇帝出家迷雾](#)

[“顺治出家”因由之——热衷佛教借此解压](#)

[“顺治出家”因由之——董鄂妃最后一根稻草](#)

[顺治死因](#)

[雍正暴崩之谜](#)

[被吕四娘刺杀](#)

[死于丹药中毒](#)

[其他死因说](#)

[乾隆身世之谜](#)

[千里追《遗诏》](#)

[“草房诞子说”](#)

[“海宁换子说”](#)

[最接近于真相的说法](#)

[嘉庆遇刺之谜](#)

[厨役行刺嘉庆](#)

[“癸酉之变”](#)

[两次刺杀的关联](#)

[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

[第三章 戒石鉴镜](#)

[明代的肃贪反腐与清官廉吏](#)

[戴着枷锁的王朝](#)

[出淤泥而不染](#)

[最有名的清官](#)

[“三字经知县”徐九思](#)

[清朝奇案：贪官谋害清官](#)

[晚清海关廉政启示录](#)

[民国反腐“肌无力”（上）](#)

[法制悄然起步](#)

[人治仍是主导](#)

[腐败玩到极致](#)

[贿选不得人心](#)

[民国反腐“肌无力”（下）](#)

[反贪机制看上去很美](#)

[大发国难财的丑恶](#)

[登峰造极的“五子登科”](#)

[介石与戒石](#)

[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

[群情](#)

[栽赃](#)

[还是栽赃](#)

[两个替死鬼](#)

[调查团](#)

[审判秀](#)

[崩溃](#)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距离](#)

[第四章 旧闻新说](#)

[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章太炎：不懂用钱，却能挣钱](#)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亦真亦幻“大槐树”](#)

[“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族谱里的“大槐树”](#)

[“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

[“偶然”的历史](#)

[穷京官混世之法](#)

[国土无双](#)

[土木堡之变：明王朝的转折](#)

[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复仇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国土遇我，我故国土报之”](#)

[中国人的隐逸史](#)

[第五章 重回现场](#)

[开元，全盛之日](#)

[市舶使：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

[从西域到南海](#)

[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

[失去的机会？](#)

[仁宣之治与仁宣之死](#)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宗、宣宗死亡疑案](#)

[一个县令的1635](#)

[备战](#)

[守城](#)

[迎官军](#)

[抓土贼](#)

[尾声](#)

[袁宏道：一个晚明士人的生活转轨](#)

[一个苦闷的县令](#)

[随性交游](#)

[寄情声色](#)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老鼠‘消灭’了明朝”](#)

[战争与病菌](#)

[人与鼠：战争与和平](#)

[一场关于鲸吞的谈判](#)

[交换敕书](#)

[停战条件](#)

[刺杀](#)

[停战](#)

[议和](#)

[通牒](#)

[签约](#)

[1912年2月12日：辞位日](#)

[1911年10月30日 动摇](#)

[1911年12月6日 瓦解](#)

[1912年2月12日 辞位](#)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历史的侧面.3，历史的缝隙与灰烬

作者：《看历史》杂志

出版方：群言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0月1日

ISBN：978780256904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历史的侧面**.3**，历史的縫隙与 灰烬

第一章 人物观察

“终结者”李斯

李斯师从于儒学大师荀子，却一步一步走向了法家的道路；他亲手杀害了同门师兄韩非，却又成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信徒；而他提出的“焚书”之议，则直接终结了儒家乃至诸子百家生存的土壤。

拜别师门

公元前247年，已经而立之年的李斯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离开老师到秦国去。

临走那天，老师荀子问李斯：“你为什么要到秦国去呢？”李斯回答说：“现在各国都在争雄，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

李斯的回答很干脆，毫不掩饰自己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对于秦国，荀子并不陌生。十九年前，同样是经不住强秦的吸引，荀子一扫“儒者不入秦”的传统，主动跑到秦国游学。在秦国，荀子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上了。当他提出以儒家之“王道”补秦国“霸道”之不足时，秦昭王嘴上连连称善，却始终不肯用荀子。

与19年前不同的是，儒生西入咸阳不再是偶然，而各种饱学之士更是争相入秦。他们或入朝为官，或投身显贵门下，继续游学。与秦国的门庭若市相反，东方各国的人才流失相当严重。

时移则事易，面对学生西入咸阳，荀子倒也不觉唐突。他甚至为此感到高兴，说不定李斯真能在秦国实现自己未竟之愿呢！然而，高兴之余，荀子又不免忧虑。一方面，秦国有不修儒道的传统，倘若李斯不善变通，难免会遭遇自己同样的命运。而另一方面，他更担心李斯太过灵

活，毫无原则地曲意迎合秦国的传统。

见李斯心意已决，荀子也不强留。只是再三叮嘱，勿违为师之道。李斯遂拜别师恩，一路向西直奔咸阳。

士途还是仕途

荀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初入秦国的李斯再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

李斯风尘仆仆赶到咸阳，正逢秦庄襄王新丧，新即位的秦王嬴政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真正掌权的是太后赵姬和相国吕不韦。

吕不韦原是商人，对治理国家并没有太多经验。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他效仿战国四公子，不惜重金广揽人才。极盛时期，其门客多达三千余人。秦王年幼，尚未亲政，想在政治上大有作

为的李斯只能投靠吕不韦，成为其门下的舍人。

吕不韦的相国府俨然一座稷下学宫，各种流派的学者文人汇聚一堂，或著述，或辩论，好不热闹。吕不韦倒也礼贤下士，经常光临辩论会场，聆听学者们的思想交锋。后来，吕不韦将门客们精彩的言论编撰结集成为著名的《吕氏春秋》，这是后话。李斯初入相国府，虽然只是一个身份不高的舍人，但衣食无忧，既可以参与学者间的辩论，又可以埋头做自己的学问，像老师在稷下学宫那样“不治而议论”，同样可以影响秦国的政治，实现自己的理想。

但是，李斯并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舍人，他选择了一条直接介入政治的道路——入仕。尽管相国府食客三千，但真正具备大师级水准的人却少得可怜。李斯受教于儒学大师荀子，其思想之深邃，论辩之宏富，远非其他门客所能比肩。不久后，吕不韦就发现了李斯，任命他为郎官，名义上是保卫秦王嬴政的安全，实则吕不韦安插

于秦王身边的眼线。

李斯对这个安排欣然受之。在士途和仕途之间，李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从这一刻开始，它将告别过去的士人生活。

王道还是霸道

李斯的入仕并不违背老师的儒道，荀子自己就当着兰陵县令。但是，从孔子开始，儒家始终坚持君臣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的关系。荀子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臣之道“从道不从君”，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想。

尽管荀子一再告诫“勿违为师之道”，但身陷仕途的李斯很快做出了违背师门的选择。李斯仔细地考察着尚未成年的秦王，发现秦王嬴政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一心要实现伟大抱负。于是李斯很快做出了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投靠秦王。

李斯不愧为荀子的得意门生，其游说之术堪称绝伦。他深知，在崇尚霸道的秦国，引导秦王以儒术治天下，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他决定投其所好，以霸道取悦秦王。

李斯对秦王说：“从前秦穆公虽称霸天下，但最终没有东进吞并山东六国，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诸侯的人数还多，周朝的德望也没有衰落，因此五霸交替兴起，相继推尊周朝。自从秦孝公以来，周朝卑弱衰微，诸侯之间互相兼并，函谷关以东地区化为六国，秦国乘胜奴役诸侯已经六代。现如今诸侯服从秦国就如同郡县服从朝廷一样。以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贤明，就像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足以扫平诸侯，成就帝业，这是万世难逢的一个最好时机。”

寥寥数语，直指嬴政胸怀，纵论古今，不离秦国霸业，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秦王心里，遂任命李斯为长史。李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本可以按照老师的思路，趁着嬴政年幼，多教

他一些儒家的王道，弥补其霸道之不足。但是，在李斯看来，王道虽好，苦于见效太慢。孔子做过一项保守的估计：用王道（即道德教化）治国，至少要三十年才可以让天下归仁。三十年太久，秦王不肯等，李斯也就等不得。因此，李斯在自己的仕途生涯中，彻底放弃了荀子的王道，选择了立竿见影的霸道。

李斯上任之后立即给秦王上了一个瓦解六国的计谋，暗中派遣谋士带着金玉珍宝去各国游说。对各国的重要人物能收买的，就多送礼物加以收买；不能收买的，就想尽办法把他们杀掉。等诸侯国君臣关系被离间后，再派良将去攻打。

如此阴毒的斗争手段，完全背离了儒家的道德，完全滑向了法家的权术。

韩非之死

无独有偶，同为荀子学生的韩非也从儒家出发，最终走向了法家，甚至成为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是韩国公子，李斯的同窗师兄。与李斯的平步青云截然相反，韩非回到韩国后，因为韩王的猜忌，一直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写下了许多探讨治国之术的文章。

韩非子接受了老师“人性恶”的观念，但他完全否定了儒家的道德教化，认为只有严刑峻法才能治国平天下。他甚至认为，对老百姓只能实行“愚民政策”，主张除了法以外不许有任何书籍存在，而历史记载尤在禁绝之列。老百姓唯一需要学习的文化就是法律，各级官吏便是他们的老师。韩非尤其反感知识分子，指责“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应该连同侠客一起彻底消灭。

韩非的思想非常符合秦国的政治传统，当秦

王嬴政读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时，不禁感叹道：“如果哪天得见此人，并与之交往，虽死而无憾矣！”李斯听到这话，立即禀告秦王说，这些文章都是自己的同学韩国公子韩非所写。于是，秦王不惜发动了一场针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国派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到了秦国，与秦王相谈甚欢，但还没有马上信任他。这时，李斯和姚贾在秦王面前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要帮助韩国而不帮助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说的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叫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又不能见到。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韩非之死的记载

过于简略。司马迁认定李斯是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理由很简单：妒贤嫉能。不过，司马迁的说法其实经不起推敲。事实上，秦王灭韩的计划早已提上日程，根本不可能因为欣赏韩非而彻底放弃。如果韩非离间秦国君臣的事情属实，则主张杀死韩非的就不再是李斯和姚贾，而是秦王嬴政了。

不管怎样，李斯都是杀害韩非的实际执行者。区别仅仅在于，他是主谋还是从犯。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即使韩非按律当诛，李斯也应该念在同门之谊而选择回避。以他在秦国之地位，申请回避应该不会影响其仕途。韩非之死，让李斯在秦王面前赚得了公而忘私的好评，但他也再次背离了荀子谆谆教诲的王道。

“釜底抽薪”焚书令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被秦王和李斯所奉行。

此后的秦国完全按照韩非的轨道高速的运行着。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8年，秦破赵；前226年，秦破燕；前225年，秦灭魏；前224年，秦灭楚；前222年，燕赵残余俱亡；前221年，秦灭齐，天下归一。

秦统一之后，按照韩非的思路，构建起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秦王嬴政改帝号为“皇帝”，自称秦始皇。废除谥号制度，禁止百官议论皇帝的是非。在李斯的坚持下，秦始皇选择了郡县制，统一了法律、度量衡、文字和车轨，开中国两千年封建大一统之先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任命李斯为丞相，走到了仕途的最高峰，同时也走到了他反儒道路的最高峰。

这一年，在咸阳宫的酒宴上，博士们借着酒兴发生了一场争论。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非常反感儒生们“借古非今”“横议朝政”，便授意丞相李斯，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

李斯再一次扮演了韩非思想最忠实的执行者。在廷议的讨论中，李斯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很显然，焚书令是完全针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批评法家路线而起草的。喜欢借古讽今的儒家当然首当其冲。后世史家常常拘泥于焚书令毁掉了多少先秦文化典籍，其实不然。由于秦朝官府做好了图书备份，只焚毁民间藏书，因此，焚书令对文化典籍的破坏远不是论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事实上，焚书令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它借焚书完全禁绝了自由思想，彻底毁灭了“不治而议论”的士阶层，使整个先秦诸子思想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

秦亡以后，极个别尊随孔子的汉儒试图恢复儒生议政的传统，但是，无一例外都招来了杀身之祸。七十多年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然而，董仲舒所谓的儒学早已不是独立自由的先秦儒学，而是杂糅法家、阴阳家纲常名教。

客观上讲，李斯之后无真正之儒家，两千年的反孔斗争说到底与孔子无甚关系矣！

唐玄宗：创新与守旧

祥瑞

开元二年二月初一日，长安城内主管天文事务的官员向唐玄宗奏报，预计在当日发生的日食没有出现。重大天象的误报无疑是一场因历法讹误而发生的严重事故。

然而在公元714年的长安城，没有官员因为一次“未遂”的日食受到处罚。相反，宰相姚崇用一份语气热烈的奏章向皇帝表示祝贺，并建议将此事载入史册。玄宗皇帝答应了这个要求，此时距他正式登基不足二十个月。

回顾唐玄宗的即位，也与一场不期而遇的天文事件有关。公元712年秋天，一颗彗星划过夜空中据说是象征皇帝的星座，促使睿宗皇帝决定

以退居二线的方式攘除一场可能不利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灾难。睿宗的突然退位，使自己踌躇满志的儿子与野心勃勃的妹妹之间久已存在的矛盾骤然激化。新即位的唐玄宗率先出手，发动了长安城近七年内的第三起宫廷政变，太平公主被迫自杀，由此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由女强人左右中枢政局的状况。

然而唐玄宗很快发现，帝国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自武则天时代结束后，帝国的政治走势并不明朗。奢靡荒淫之风弥漫宫廷内外，朝堂上下充斥着野心家与投机分子。经济固然没有崩溃，但自然灾害频发，因土地兼并造成的农民逃亡逐渐增多。西边的吐蕃、北面的突厥乃至东北方面的契丹不时骚扰边境，有时甚至发动大的进攻，而帝国的军队并没有战之能胜的把握。

现实的混沌与不安往往会促使人们回忆历史，强盛开明的“贞观之治”在8世纪初引发了普遍的追慕，希望朝廷恢复“贞观故事”的呼声不绝

于耳。史官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就是此种时代氛围的集中体现。这部以对话为主的著名史书采用分门别类的方式，将太宗君臣的主要政治观点编排为一本极便翻阅的手册，被后世统治者奉为圭臬。作为全书纲领的首章《君道》，开篇文字是一段太宗的独白，核心思想是君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以避免骄奢。此时《贞观政要》还没有面世，玄宗却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向太宗皇帝看齐之决心，符合了多数臣民对他的期待。

仔细观察唐玄宗君臣的施政风格，我们确能发现“开元”与“贞观”的某种相似性。唐太宗不是事必躬亲型的统治者，他认为帝王的励精图治应体现在对于总体政治秩序的哲理化反思与把握之上，而不应过多干涉本应由各级职能部门负责的具体事务。唐玄宗也不愿介入具体事务，当宰相向他汇报关于一批中低级官员的任命问题时，他以默然不应表示不满。太宗朝的政治决策过程比较透明，史官对君臣的讨论过程据实记录，谏官

等得以随时提出意见。高宗朝的密谋政治兴起后，决策活动日益神秘化。及至开元年间，著名宰相宋璟立主恢复贞观旧制，使得史官与谏官的地位再度得到重视。

玄宗君臣的努力，让权力表现出对政治程序的一定尊重；而皇帝远离具体事务，使其日常行政得依律令而行。武后、中宗时期，当政者为一己之私而进行的短期操作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权力运行蛮横且没有章法，其结果是政治秩序日渐紊乱。玄宗则采取一种比较克制的态度，使得一种能让大多数官员感到稳定与安全的政治气氛重新回归朝廷。

唐玄宗还从太宗那里继承了重视经典与学术的传统。太宗经常与臣子一起举行文学化的宴会，君臣如诗友一般共相唱和，并由此构成一种仪式化的君臣交际形式。武后、中宗时代的宫廷文学活动更为兴盛，但风格却大相径庭。一批工于诗文的文人以倡优形象进入宫廷，皇帝、皇后

甚至妃嫔喜欢以裁判者的身份凌驾其上，更乐于看到他们为争宠而争风吃醋。

玄宗同样喜欢有才华的臣子，但对他们比较尊重，“翰林学士”这个一度沦为吹鼓手的文士群体在唐玄宗时代开始发挥智囊作用；当他们在宫中连夜起草诏书时，玄宗有时会如朋友一样去看望他们并赐予饮食。这个传统为唐朝后期的帝王所继承，翰林学士也从皇家的高级文化侍从变为帝国中枢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当七岁的神童李泌因为才思敏捷而被送入皇宫时，玄宗对其才华大为叹赏；但他没有把这个孩子当做宫廷中的玩偶，而是将其送出长安这片是非之地并保障他专心读书。很多年后，已成长为一位传奇政治家的李泌回到御座之旁，先后辅佐三位皇帝平定了两次危及帝国生存的巨大叛乱，并通过建立包括大食、回鹘、南诏在内的国际联盟有效遏制了吐蕃政权咄咄逼人的攻势。玄宗的知遇与培养，成为李泌报效其子孙的巨大动力。

在恢复“贞观故事”的号召下，唐玄宗以拨乱反正的姿态，使得帝国的政治空气从之前的紧张乖戾迅速走向宽松平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玄宗重新确立了以儒为主的治国理念，不仅自己撰写了《孝经》，还通过各种手段宣示皇帝与诸亲王间“兄友弟恭”的和睦状态。不过，他并没有清算给予武则天统治巨大帮助的佛教，对作为李唐皇室祖先的老子也同样尊崇有加。出入皇宫的，既有来自印度、深通密法的高僧，也有隐居深山、修炼长生之术的张果老一类人物。唐玄宗对于宗教保持了浓厚的兴趣，但将某种宗教兴趣推向极端却不是他的本性，这一点与太宗颇为相类。

然而，“开元”绝不是对“贞观”的简单克隆。对于各种自然界的“祥瑞”，太宗明确表示厌恶并明令禁止上报，玄宗却不惜借用日食预报的失败来证明君主的德行已经感动上苍。从高宗时代开始，在唐初一度低落的谶纬意识重新发酵。渐渐地，人们对皇权中的神秘性因素又津津乐道。面

对这样的社会心理，玄宗君臣并不能免俗，其实他们对自然现象与政治更替的联系并不真正相信。玄宗与姚崇在开元初年围绕“祥瑞”与“符命”不止一次的“合作”，实在是一种刻意的政治表演。我们由此能够观察到玄宗施政风格迥异太宗之处：为达目的而进行的变通较之对价值理念的坚持更占上风。

贤主

作为中国历史上贤明君主的代表，唐太宗身上表现出的理想主义气质深合儒家的标准，他一生都在致力的事业似乎在于把来自实践的政治智慧凝练成一种道德性的规范，并试图为政治手段赋予超越性的价值含义，在保障君主行为有效性的同时去除虚伪性。唐太宗推崇以仁德信义治国，统治技术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最倚重的宰相房玄龄执政十余年，一方面使海内晏然，另一

方面却没有突出的政绩可资纪念，被史家认为是达到了宰辅的最高境界。

相形之下，唐玄宗对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高宗朝以来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比玄武门之变更为漫长险恶，使玄宗对政治的残酷有着更为真切的意识。唐玄宗对确保统治牢固与帝国繁荣充满强烈的欲望，他认定这些目标只有通过精密有效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手段不仅表现为更为灵活但却不那么合乎理想形式的政治策略，更集中体现为一系列高效的制度安排。这注定了玄宗朝的一系列施政举措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唐玄宗统治时期，财政经济事务始终得到高度重视。当时私铸钱币之风非常兴盛，很多商人在江中锚泊的大船上开炉鼓铸，惊涛烈焰，蔚为壮观。玄宗向劣币开战，强令对市面流行的劣币收缴重铸，结果引起交易者的恐慌，反复几次后终觉难以推行。不过，帝国的财政基础还是通过

另外两项措施得到了强化。第一项措施被称为“括户”，即由政府清查那些因各种原因隐匿逃亡的人口，用既往不咎的宽宥政策与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他们重新登记户口，恢复为国家纳税。第二项措施为改良运输方式，以保障来自南方的赋税与粮食能以较低的成本安全运到帝国的政治核心区关中与洛阳，具体办法是把以运河为主体的运输线分为数段，每段设置中转储备仓库，根据各段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运输工具，化长途运输为短途运输，人称“节级转运”。

这两个措施在宇文融、裴耀卿等一批财政精英的主导下得到顺利实施，但因为其中一些人操守不佳，又因为他们的政策初衷是增加政府税收而非减轻民众负担，因此长期被后世冠以“聚敛之臣”的恶名。但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朝廷才足以支持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长安城日益庞大的支出，玄宗也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不是“君子”，因为现实的考量决定了皇帝必须倚重他们。

开元时代的另一项重大突破是完善了官员的选拔任用机制。唐朝虽然实行了科举考试，但通过考试的人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是否能真正获得一官半职还要经过另一轮选拔，即铨选。有资格参加铨选的还有另外三类人，即高级官僚的子弟、表现优秀的低级公务人员以及原任期已满等待新职务的前任官员。随着有资格做官的人越来越多，僧多粥少的情况愈发突出。

开元十八年，侍中兼吏部尚书裴光庭在此前各项改革的基础上借鉴北魏的历史经验改进选拔办法，规定中下级官员任满后不论政绩如何必须立即停职，间隔数年后方能再参加选拔；如无犯罪等重大问题，一律向上升迁，并根据此前的考课结果决定升迁幅度。这个名为“铨资格”的铨选制度在不增加职位数量的情况下使得国家机器在事实上迅速“扩容”，从而把更多的官员预备队稳定在体制内。此外，国家还根据需要创设一些特种考试科目，为那些不甘心论资排辈的才能优异

者提供了快速上升的绿色通道。唐玄宗还命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交流任职，从而锻炼他们更为全面的政治能力，并对俸禄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元以前，各级政府都有一笔名为“公廩本钱”的款项，政府以之为本金发放高利贷，以利息支付官员俸禄。唐玄宗下令将官员俸禄改从国家税收划拨，使得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行更加合理化。

如果说以上的变化都发生于具体领域，那么一项涉及政府运行方式的根本变革则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分职设官”是中国古老的政治传统，每一项具体的事务都由专门的行政部门负责，国人熟悉的“六部”制度就是如此。官员进入了某一岗位，他的职权边界是具体而明晰的，在此之外的事务不需他负责。此种制度可以说做到了“人人有事干”，但却无法保证“事事有人干”。制度规定的事务处理体系必须保持稳定，但社会和政治形势千变万化，很多新出现的行政事务往

往不能迅速找到一个对应的职责部门，必须由多部门共同负责。一旦多个平行部门介入，配合就成为问题，难免出现推诿扯皮、职责不清的状况，效率很难得到保证。

唐玄宗是一个务求实效的君主，他不能容忍官僚体系因自身结构的制约而影响效率，一种名为“使职差遣”的制度被推广开来。为了完成一项确定的任务，皇帝指定一名官员作为自己的代表全权处置，于是一大批名为“××使”的官员由此成为王朝统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这类官员称为“使职”，他们官阶可能很低，原本负责的事务可能与临时承担的任务没有任何关系；一旦“使”字加身，立即具有凌驾于体制之上的巨大权力，所有与之相关的官员都要服从他的调遣，这使得办事效率空前提高。最重要的“使职”集中在经济与军事事务方面，唐玄宗正是依靠这个制度完成了诸如“括户”与建立“节级转运”之类的非常规任务，而驻守边境的“节度使”则能更有效地

调动各种战略资源，由此取得边境战争的一系列胜利。

“使职”本来是临时性的，任务完成即行解职，后来逐渐固定化，并成为官僚机构的主体，甚至连宰相也使职化了。唐初规定，宰相由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集体担任，但至玄宗时代，三省长官未经过皇帝特别授权已不能行使实际的宰相职能，而获得授权者则可能是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使职差遣”标志着中国古代行政体系的编制原则从以职能分工为中心走向以事务统筹为中心的新时代，这一点基本上为以后的宋代完全继承。

如果说“贞观之治”的出现更多的得益于唐太宗对其卓越政治才能的哲理化发展，那么“开元盛世”的繁荣则根植于唐玄宗在治理手段方面的不断创新。唐玄宗政治的现实主义底色也使得他总是对那些圆熟干练、富于行政才能的官员抱有特殊好感。“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虽然声名狼

藉，但很多人忽略了他是一个能干的政府领导者，在处理复杂事务方面具有旁人难以揣测的老辣与周到，致使素怀不臣之心的安禄山对他也十分忌惮。正统历史学家喜欢将唐玄宗的成功与一系列“贤相”的辅佐联系起来，但这些“贤相”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符合儒家意识形态的期待，精明的政客与富于手段的实干家才是他们的主要形象。玄宗正是和他们一起，开创了开元时期的繁荣局面。

创新

唐玄宗对于创新治理手段的热情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还导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这为后世学者认识唐帝国的运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献。但学者们发现，有些典章中记载的制度显得过于完美，以致令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执行。通过对敦煌文书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统研

究，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这种怀疑。以均田制为例，历史上最为完备的均田制度成文于开元末期。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一个自耕农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岁后予以收回并重新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但在事实上，当时政府已没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分给农民，均田制已趋于崩溃。唐玄宗时代制度文本与现实的差距究竟反映出什么信息呢？

帝制中国的各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发展已到一个十分完备的阶段。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复杂的历史进程催生出一批更为实用、更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来自游牧部落的习惯引入其中。但是秦汉制度并未废除。久而久之，新、旧、胡、汉制度相互叠加，形成一种特别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官名为例，南北朝后期就形成了职事官、散官、勋官、将军号等几套互不统属的系统，其渊源各异，内涵不同。

从西魏北周时代开始，中国西北部的政治家

们开始率先对制度进行整合；及至隋朝统一全国，此种整合已初具规模。唐代继续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运作得十分有效，职事官、散官、勋官等官名体系被集合在官阶制度下，成为标志职权、资历、功劳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号系统。但唐玄宗对此似乎并不满足，他下令由宰相领衔编写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书。这部书将玄宗时期的所有体制内官名囊括其中，详细考证了每个官名的历史演变，并标明其现在的职权、品级等各种内容。史学家对《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书，但又对它的编制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大唐帝国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认为《唐六典》是一部“礼书”、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的唐代版本。

《周礼》一书据说是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职官制度，现代学者多数相信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记录。这部书把诸多官职分为天、

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为每个官职赋予了一种超越实际政治功能的神圣意义。唐玄宗显然是要把这种神圣性引入到唐代的职官制度之中，但却使编纂者们感到万分为难。唐代官制在结构上与西周的六官系统没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组织原则是经过现实政务运作的无数淬炼后形成的最优结构，本来就不是为了体现某种先验的政治理想。在更换了几任主编者后，《唐六典》由李林甫领衔完成，最终采用了以尚书省六部附会周礼六官的折中做法。但我们在这部书中，却很难看到开元时代新出现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变化；作为其论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与帝国政务的实际运行状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百年后，《唐六典》勾画出的政治理念打动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皇帝，使他决心以这部唐玄宗时代的政治经典来整顿北宋的政治秩序。不过有趣的是，当时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功效的，恰好是自唐玄宗时代发达起来

的“使职差遣”系统。

唐玄宗的编纂典章的用意由此清晰起来。虽然唐玄宗对于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但不妨碍他通过制度建设去追求一种富于秩序感的超越性政治理念。这种秩序感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与玄宗皇帝作为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息息相关。他还下令编纂了《大唐开元礼》，儒家的礼经从此不再直接指导大唐臣民的礼仪活动，一切都要以《开元礼》的规定为主。唐玄宗晚年益发喜欢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释放这种秩序感，例如改“年”为“载”，改“州”为“郡”，背后都有一套烦琐而精致的说辞。但无论如何，唐玄宗庞大的典章编纂计划成为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来源，许多后来人正是通过这些纸面上的精致文字来想象一个也许并不那么绚烂的盛唐。

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他营造的政治秩序感中，这使他对待实际政务的现实主义态度逐渐失去理性的指导。玄宗从未像唐太宗那样把“节

俭”内化为君主的行为规范而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这导致他在局面稳定后迅速走向奢靡。对宰相的信任变成了皇帝怠政的借口，导致了李林甫、杨国忠的长期专权。“使职差遣”的推广虽增加了政府的效率与收益，但并未建立起相应的监督与制衡体制，其恶果之一就是节度使职权的迅速膨胀并逐渐军阀化，这为其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与藩镇割据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巨大的繁荣与一夕而至的巨大灾难，这是唐玄宗时代留给后人的巨大感慨与疑惑。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至更为广阔的时段之中，玄宗时代不仅在唐王朝的历史中具有转折意味，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整体进程同样如此。在他之前，中国古代文明在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分裂与战乱之后浴火重生，秦汉时代质朴有效但也冷酷森严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已经远去；在他身后，印刷术开始普及，能够识字读书的人益发增多，科举制的不断完善扩大了社会的流动，国家

对民众的直接控制开始放松，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总而言之，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事物在唐代不断涌现，统治者仅仅靠总结过去的经验已难于应付。唐王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劫难后还能存在近一百五十年时间，玄宗时代治理手段的创新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再考虑到北宋与中晚唐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些重要连续性，这种创新的超前性就更为突出。然而，唐玄宗对理想秩序的追求没有促使他在新创造的治理手段寻找一套精致的意识形态解释，而是使他执着于对既有制度进行诠释与提升，并展现出相当的复古主义倾向，其结果是使唐代制度成为后代政治人物的楷模之一，其后果则显得益发复杂了。

唐玄宗是一个拥有巨大人格张力的帝王。在他的时代，君主个人的意志、情感乃至风格仍可对整个国家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开元之治的绚烂中便同时浸润着艺术家的浪漫与现实主义者的精

明，而这两种色彩并不总是那么的协调与融洽，甚至也会晕染出巨大的阴影。身处历史的变动时期，唐玄宗的人格张力已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深深嵌入了历史的进程，并在他身后更为长久的岁月里以一种制度甚至文化的形态发挥着巨大作用。玄宗之为玄宗，庶几在此。

范仲淹临危受命

文 | 赵健

庆历年间，北宋已经立国八十多年，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范仲淹总结当时的情势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敌人骄盛，寇盗横炽。”

首当其冲的，是冗官问题。所谓冗，一是人数众多；二是能力庸劣。

宋代科举考试录取规模空前扩大，通过科举就可出仕为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给了宋代读书人出人头地、扬名立万的美梦。但是，这也造成官僚队伍的繁冗丛沓。此外，天水一朝对官僚特别是高级官僚格外优待。恩荫制度，即贵族和高、中级官员子弟可以免试做官，也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据学者推算，宋代平均每年以各种名目恩荫补官者，恐不下

500人，而平均每年科举取士的人数，也不过约360人，恩荫补官的人数竟超过了科举取士的人数。每年有如此多的人进入仕途，远远超过了当时官僚系统的自我更新速度与容纳能力。

与官员众多并存的是官吏素质堪虞，这其实是历朝的通病。立国既久，官僚升迁制度已经严密与程式化，升迁与否，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与政绩关系不大。于是因循苟安的思潮在官场中弥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占据主流。真正忧国爱民者想有一番作为，反而会招致同僚非难，甚至排挤。一些重要的管理职位，如刺史、县令之类，也可以靠熬年头、凭资历获得。这种情况导致“不肖混淆，请托侥幸，迁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废堕”。欧阳修曾举出两个极端的例子。郢州（今湖北钟祥）知州王昌运，年纪大了，且身体有病，腿脚不利索，连走路都很困难，每天去办公得靠两个人扶着，就这样颤巍巍地还坚持了三年。“三年之内，州政

大坏”。继任郢州知州的刘依，也是七十多岁了，“昏昧不堪”。欧阳修任滑州通判时，寄居在滑州的刘依几次来看望他。每次都问：“中书有一个姓王的参知政事，叫什么名字？”一个知州，连副宰相的名字都搞不清，这也算了，三四次问过就忘，其为政情况，简直可以不问自知了。

官吏尸位素餐不作为，还贪污腐化。北宋政府自从开国以来，直到庆历年间，官吏的俸禄一直没有增加。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中下级官僚的生活日渐窘乏。同时，随着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中下级官僚一任结束，通常并不能立即得到新的任命，而需要等着腾出职位来，即所谓“守选”“待阙”，做官也是断断续续。没有职位就没有俸禄。本来俸禄就鲜薄，难有积蓄，又不能持续供应，使得很多“守选”“待阙”的官员“衣食不足，贷债以苟朝夕”。一旦等到上任，就千方百计捞钱还债。贪污腐化就是意料中事了。

人民的苦难还不止于此。宝元二年

（1039），宋夏战争爆发，延至庆历二年

（1042），北宋政府损兵折将，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耗去大量的兵力物力。而作战对物资的要求，最终都得转嫁到人民身上，都是由人民负担。在如此局面之下，农民、士兵起义风起云涌。庆历三年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一百多名士卒在王伦领导下起义。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郡(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内忧外困，版图震荡，大宋朝廷已经到了必须改弦更张、变法图强的时候了。

庆历三年（1043），当西北的狼烟已经暂时熄灭，北宋与西夏正在讨价还价，准备媾和之际，仁宗把目光投向在宋夏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范仲淹、富弼、韩琦一班人，把他们调到中央，出

任宰执，主持改革。范仲淹久负人望，早年任职开封府期间，就因为“明敏通照，决事如神”，被京师老百姓称颂：“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一时间，宇内瞩目，希望这群君子能够刷新政治，兴致太平。

但范仲淹是被贬谪后提拔的官员。范仲淹被贬谪，当然不是因为贪污腐化、为非作歹，据当时的一些官僚说，是因为“朋党”。翻译成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搞宗派主义。

范仲淹能获得这顶大帽子，是与他的大胆与人望分不开的。八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曾上书指责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而吕夷简反依仗权势，指斥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党也”。结果，范仲淹被贬出京。曾为范仲淹鸣不平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也遭贬逐。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赞扬不当遭贬的诸位为君子，痛斥谏官高若讷不能秉公力争。这篇文章影响相当大，“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

者市之，得厚利”。恰好契丹使者在首都开封，买了带回现在的北京，还造成了较大影响。就是景祐三年的这次斗争，挑起了北宋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

但是，范仲淹从政以来在中央，在地方，特别是在西北战争前线的耀目政绩，已经将“朋党”的指摘遮蔽，仁宗皇帝已经暂时把这个事情抛到脑后去了。

改革未成身先殆

庆历三年九月，临危受命的范仲淹应仁宗的要求，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点改革主张。上书虽是出自范仲淹之笔，但其中的改革思想与措施却是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的共识。所以《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的施政纲领。这些措施的绝大部分经过仁宗皇帝的首肯，

以诏令的形式次第颁布施行。

这十条措施分别是：（一）明黜陟。改变只重资历、不问实绩的官员晋升机制，以“约滥进，责实效”，以期政事修举。（二）抑侥幸。对恩荫加以时间等条件限制，不允许官僚为子弟“陈乞馆阁职事”。“馆阁”主要是藏书机构，并不是位高权重的机要位置，但时人认为是储才之地，“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不可轻授。通过抑制恩荫数量与职位，“革滥赏，省冗官”。

（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的局面，“先取履行，次取艺业”。即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兴办学校，注重教育。

（四）择官长。通过层层荐举的方式，选择有能力的人出任地方官。“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五）均公田。在外为官者，给予“职田”，弥补俸禄之寡，使其生活“丰足”有保障，然后可以“责士大夫之廉节”。（六）厚农桑。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抵御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

产。（七）修武备。面对边防紧张、重兵戍边的形势，面对冗兵耗费国家大量钱谷的事实，发展民兵，平时生产，冬闲训练，寓兵于农。（八）减徭役。精简合并机构，减少百姓“义务劳动”的时间。“并合县邑，以省徭役，庶宽民力”。

（九）覃恩信。赦书内宣布的恩泽，即政府的各项惠民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

（十）重命令。改变过去政令朝令夕改的弊端，理顺各类规章捍格抵牾的关系，对有法不依的官吏给予严惩。

钱穆先生总结说：“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为澄清吏治，范仲淹亲自审察地方官吏才干，尤其重视对负有监察州县之权的“监司”长官的沙汰。范仲淹还派出按察使到各地进行按举，他任命的提点江东刑狱王鼎、转运使杨紘、转运判官王綽就因为竞相揭发官吏的“至微隐罪无所

贷”，惹得当地官员怨恨不已，将三人“目为三虎”。事情传到汴京，皇帝也有些不高兴了。

从整顿吏治下手，无疑是啃硬骨头，阻力不可避免。新政的组织者对此应是了然于胸的。在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的次月，欧阳修曾对仁宗上书讲了这样一番话：“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而这担忧，却一语成谶，不幸言中。

与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众口呶呶，声言“某法害民、某法不便”迥异，彼时改革的反对者直接指责庆历新政具体措施的言论并不多。这其实不难理解，新政是拿官吏开刀，利益受损的，首当其冲的是各级官吏。他们的内心，肯定是以为新法“不便”的。但是，上述措施，不论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还是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视角

观察，都是无可指摘的，是正确的。除反映个别措施（如均公田）在施行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扰民问题外，利益受损的官吏无法也不能公开表达不满。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小官僚们既不能公开反对，便另辟蹊径，从人事下手，步步为营地对新政组织者与支持者进行打击。封建社会依靠人治，“人亡政息”，只要范仲淹等人下台，推翻新法便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于是，接连发生了几次针对范仲淹一派成员的人事斗争。

就在范仲淹上书改革的同一个月，发生了滕宗谅事件。滕宗谅与范仲淹同年考中进士，在当时，称为“同年”。这本已是时人很看重的一种社会关系，而韩、滕两人又志趣相投，滕宗谅得以在西北前线任地方官“知庆州”，就是范仲淹推荐的结果。偏偏在范仲淹改革伊始，有人揭发滕宗

谅先前在泾州任职时，“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在中央，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仁宗觉得负责纪检的人员有些小题大做，便说：“边帅以财利啖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所谓李牧故事，是战国时赵国守边良将李牧不惜钱财，厚遇战士，“以结其心”的典故。但仁宗皇帝还是派人调查此事。

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滕宗谅怕连累他人，把相关记录文件给烧毁了，这下就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了。围绕这件事，范仲淹与负责监察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互不相让。最终，在庆历四年正月，滕宗谅还是受到了处罚，被降级知虢州，很快，又改知偏远的岳州。于是就有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子京正是滕宗谅的字。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好友与同党，在范仲淹整顿吏治之初，就有人对其发难，翻出莫须有的陈

年旧账，居心昭然若揭。阴谋者认定，以范仲淹之秉性，必然会对此事施以援手，而如果范仲淹维护一名出任地方知州的好友，又会与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的人事整顿形成鲜明对比，最终隐隐地指向一个“党同伐异”的罪名。

庆历四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鄙的手段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栽赃。

夏竦被罢免最高军事长官之职，心中当然不无失落。而著名的理学家石介却拍手称快。夏竦的发难就从这位石介先生开始了。

石介曾写信给富弼，勉励他们一班改革派“行伊周之事”。“伊周”指的是殷商的大臣伊尹和西周的大臣周公旦，两人是千古并称的贤臣良相。夏竦出于对石介的怨恨和扳倒富弼等人的目的，乃指使女奴暗地里模仿石介的笔迹，把“行

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伊霍”指的是伊尹与西汉的霍光。伊尹看到商汤的孙子太甲开始荒淫，就把太甲关在宫里让他反省，自己处理政事。后来看到太甲改悔，才将政权交给他。而霍光在无子的汉昭帝驾崩之后，迎立汉武帝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但27天之后就以淫乱无道的理由报请上官太后废除了他。霍光同群臣商议后决定从民间迎接武帝曾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是为汉宣帝。伊尹、霍光二人，都曾行废立天子之事，后人将他们合称为“伊霍”。这简直是劝说富弼等人废掉皇帝，另立明君了。为了将罪名坐实，夏竦还指使女奴伪造了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然后散布消息，把谣言传到仁宗耳朵里。

皇帝赵祯向来耳根子软，面对流言蜚语，面对一班元老重臣的凿凿之言怎能无动于衷？更为重要的是，“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范仲淹一伙在波诡云谲的斗争形

势面前，退缩了。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陆续离开中央，标志着改革派的下台，预示着整顿吏治、惩治腐败的庆历新政的全面失败。

这年年底，之前不遗余力弹劾滕子京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发动了对革新派的最后一击。农历十一月，进奏院的刘巽、苏舜钦拿卖废纸的钱办酒会，邀集了一些文人朋友寻欢作乐。一位叫王益柔的官员，借着酒劲，写了《傲歌》，对读书人的神明——圣人周公与孔子不敬。王拱辰抓住不放，最终与会者被贬。苏舜钦是改革的支持者，王益柔是范仲淹推荐的人，这次“奏邸之狱”，使改革派在人事上、声誉上遭到很大打击。事后，王拱辰洋洋得意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

庆历新政为何失败

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很多，最明显的一

条，是仁宗的动摇。我们对比一下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发动的那场“熙丰变法”，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差距。王安石变法推行后，“新法议起，举朝攻之者愈众，而神宗信任之益坚”。王安石甚至提出了惊骇时人耳目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说来说服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时人都承认，王介甫得君之专，无与伦比。

相较之下，仁宗皇帝就懦弱得多了，一有“朋党”之议甚嚣尘上，就疑神疑鬼地终止了改革。这固然有两位皇帝性格上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两位帝王在两场不同目的的改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庆历新政的领导者是范仲淹，熙丰变法的领导者是宋神宗。神宗不仅是“大有为”的实际发起人，更是改革的中流砥柱。两场改革面临的阻力也不同：熙丰变法中，反对者所指摘的多是改变政策法令带来的问题，矛头所指是法令，而不是王安石等改革派人物；而庆历新

政中的反对派，矛头所指主要不是新政的具体内容，而是范仲淹等人的“朋党”问题。

人治条件下，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非但制度规则是由人制定的，即便有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执行，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所以范仲淹的改革从吏治下手，可以说是切中肯綮，揪住要害。

但恰恰是在人治条件下，不可能依靠制度法律来保障，也不可能发动群众进行监督，改革派就只能把宝压在人的身上。这人，一是下边的官吏；二是最大的官吏——宋仁宗。范仲淹主持改革之初，仁宗出于对改革派人品与名望的信任，面对负面反馈，尚能容忍。但随着改革的展开，特别是人事调整大刀阔斧地进行，宣称范仲淹等人“朋党”的声音不绝于耳，整个官僚集团骚动不安，这不能不让仁宗心生疑忌。要知道，赵宋政权是靠军事政变得来的，对臣子的防范远大于对外敌的担忧。宋太宗就赤裸裸地说：“国家若无

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主用心，常须谨此。”作为太宗的贤孙，宋仁宗赵祯是不会忘记这个教导的。

此外，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在策略上也存在问题。

一是涉嫌“朋党之争”。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被任命为执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并为谏官，过去所谓的“范党”皆在朝廷。此外，作为同盟者的杜衍、晏殊也立于朝。而范党的政敌吕夷简、夏竦则被先后罢免宰相、枢密使之职。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积极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沿着蔡襄之前的思路，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其中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句。范仲淹对石介的作为，恼火不已。

坏事的不仅是石介，欧阳修也因为自己的疏

略付人以口实。面对朝廷中“朋党”的指摘，面对皇帝对朋党的深深警惕与不安，庆历四年四月，欧阳修企图重新定义朋党的概念，以解开皇帝的心结，以堵悠悠众口。在上呈给宋仁宗的那篇《朋党论》中，欧阳修指出，朋党自古有之，只不过有君子之党，有小人之党。仁宗皇帝观此奇文后，满腹狐疑地问：“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答说：“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

这无异于全盘接受了反对者的指责，承认了朋党的存在。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当仁不让地以君子自居的，那显然，任何不与之党附的人，都不得不属于小人。这种高擎起两杆截然相反的道德大旗，变相地将所有人群分类归的做法，客观上显然鼓励了士大夫的结党。所以，范仲淹及其同道，被冠以“朋党”的标签，也未必不是空穴来风。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的第二个失策，恐怕是改革“推行太猛”。这种猛烈，既表现在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也反映在推行的过程中。

从减少阻力，以便推行的角度，南宋人叶适说“惟明黜陟、抑侥幸，最为庸人重害而仲淹先行之”，他觉得范仲淹等人的改革应该先易后难，“若仲淹先国家之常行，后庸人之重害，庶几谗间不大作而基本亦可立矣”。

曾国藩1870，烈士暮年

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也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

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

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事无巨细，一一道来。然而，与他晚年的大部分文字一样，在这份遗嘱里，后人看不到他对天下大势、对国家前途的任何评价。恰恰相反，“勤”“俭”“孝友”“祥瑞”“不忤”“不求”……所有这一切，无不让人想起一个老年的农夫，一种寻常的乡绅形象。似乎，在组建湘军、平定叛乱、出将入相、一生功业已达极致之后，这个青年时曾以“内圣外王之业”“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自期的传统士大夫，这个师法孔孟、兼取百家的“最后一个圣贤”，已经回到了他最初的来路。他苍老的目光，似乎仅限于自身、子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

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教案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

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

藩在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并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

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

事情还没完呢！将这个一向颠预、对洋大人们小心翼翼的满人大员吓得半死后，丰大业不顾“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的境况，来到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在这里，他遭遇了疏导民众刚刚回来的知县刘杰；一通咆哮之后，丰大业又掏出枪来，重伤了刘杰的家丁高升……

天津教案就这样爆发了。当天傍晚，天津城锣声大作、“万民聚集”；在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后，以“水火会”成员为骨干，绅民们又先后烧毁了河楼教堂、法国领事馆和收养中国幼童的“仁慈堂”。在这场大骚乱中，英俄各国也遭遇池鱼之殃，除13名法国人丧生之外，另有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和1名爱尔兰人死去。英国讲书堂和美国讲书堂也在大火中化为一片灰烬……在几十万天津绅民、所有与闻此事的中国人看来，倘若没有丰大业事件，教案是不会发生的；而对此，曾国藩只是轻描淡写地谈

到，“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猝成剧变”……

激怒全国舆论的，又何止是这些？在这份奏折的末尾，曾国藩拿出了教案处置意见：不仅主张以命抵命，他也像天津绅民盼望的那样，打算调兵入津；不过这些军队不是来“备兵以抗法”，而是来威慑、弹压不肯息事宁人的天津绅民的……

难怪乎，几天以后，当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征求意见时，声讨曾国藩的舆论浪潮，在瞬间卷起了：不仅举国汹汹、“责问之书日数至”，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也视之为奇耻大辱。时人记载，在北京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即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个举子撰写了这么一副对联，刻薄地挖苦他的这个人生转折，“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

早死三年是完人”；而与他几经分合、不久前刚刚重归于好的密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致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魏氏为例，她进入河楼教堂，原本为了治病，但信教之后，坚持不肯回家，“因谓有药迷丧本心”；以施洗仪式为例，教民初死，神甫“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对习惯哭丧表达悲伤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显得异常诡异、鬼祟……

更要命的是，当年晚春，天津谣言四起、各处檄文揭帖层出不穷之际，河楼教堂又遭遇了一场空前瘟疫。几十个死去的幼年教民，大多在夜间掩埋，“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这些棺木尸身，埋葬极浅，经觅食的野狗发掘后，“胸腹皆烂，肠肚外露”，这就难怪天津绅民对谣言信以为真、“各怀恚恨”了……

如果说，即使不删去这五个“致疑点”、奏折完整面世，曾国藩也难逃其咎的话，那么，这些分析至少使教案显得合乎情理，曾国藩“持平办

案”的心迹，也不会被一边倒地被认为是“卖国”。问题在于，对这个“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对这个被认为是“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輿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輿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訢、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

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

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画蛇添足之举，这么做，只会会有一个结果：一方面，让洋人看到曾国藩办事之难、态度之毫无保留，从而见好就收；另一方面，对远道而来、旨在通商和传教的洋人来说，被彻底激怒的民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而并不“持平”、没有只言片语辩护的奏折，正适以火上浇油……

甚至，在她深不可测的心中，她还有着进一步削弱曾国藩，使他在丧失湘军势力之后、“清望”和影响力也大打折扣的打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是个长袖善舞、让人一言难尽的女人。自从执掌这个国家，她就不间断地感受着种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不仅是“理”和“势”的对立、“战”与“和”的两难，还有“内轻”和“外重”的失衡、“中体”和“西用”的纠缠，以及作为少数部族却统辖这个国家的先天不足，身为女人却“牡鸡司晨”的名不正言不顺之处……所谓“三千年未

有之大变局”，不仅包含了“天朝”和“夷狄”的主客易位，还包括着人心、社会、民族、深宫、权力格局与文明演替的种种紧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了此牵彼制、翻云覆雨的权术生涯：1861年前后，几乎上台之初，她就在曾国藩的湘军嫡系之外，制造了左宗棠、刘长佑两个旁支，以及李鸿章的淮军势力，以制衡曾氏兄弟；1864年，刚刚克定天京，她就以旁敲侧击、恩威并施的手笔，逼迫曾国藩尽裁湘军；次年，她以“祖宗家法”的名目，削弱了与她分庭抗礼的洋务派领袖奕訢，而伴随着“师夷长技”之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们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在十年的历练之后，她的这些手法如此娴熟，如此得心应手，不仅表现于天津教案，而且表现为洋务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节奏。她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考虑曾国藩的处境；在她

四十八年的执政生涯里，她处处是赢家，唯独输掉了这个国家。在新旧交替、百废待举的年月，这个帝国原本应当昭示它鲜明的国策，无论外交、内政还是文化的“体用”，一如东邻的日本。但在她超然事外、左右逢源的种种手笔中，它不可避免地彻底沉沦了……

在长达四十八年的岁月，在与她共事的众多大臣中，很少有人能够瞥见她的深处内心。或许，不久后自甘沉沦、余生碌碌的奕訢，是一个；而二十多年以后，在甲午战败的阴影下，面对俾斯麦婉转地抱怨“麻烦来自女人”的李鸿章，是另一个。

或许，还有一个。那就是曾国藩。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

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赤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颞顼、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

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单影只，“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破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楨、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契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

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

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

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

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起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

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

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九世之仇，亦欲稍蓄三年之艾”。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是一条渐行渐远、无法再回头的长路：为了造船制炮，他必须引进“制器之器”；上海机器局落成后，“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换言之，伴随西方物器滚滚而来的，是声光电化、“制器之所以然”；以洋枪装备淮军后，他曾

经赞叹，“余平生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然而，这样的军队却必须“纯用洋人规矩”操演；在几艘轮船下水前夕，他已经意识到，“船成之后，仍需酌改营制，略仿西洋之法”……

从船炮、“制器之器”到操演规矩、营制，西方文明就这样水银泻地般渗透着。又何止于此？不仅船炮、“器具”从来不是孤立的，它背后的人心与社会也如此。“中体西用”从来是个模糊不清、近乎臆想的概念，因为它回避了“体”与“用”的互为联系、“道”和“术”的彼此作用。而这种联系与作用一经展开，它必将裹挟一切：正如后来中国人所亲历的那样，在器具变迁之后，是观念之变、社会之变、政体之变和“道体”之变。在这个意义上，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倭仁，无疑更有先见之明，他一开始就反对同文馆的开办；而几十年以后，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或许，曾国藩也隐约感觉到了这一点？史料

记载：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很少再触及洋务，“而日从事于经史”。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

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在接近生命的终点之时，这位垂暮老者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895年初夏的一天，77岁高龄的京剧名角刘赶三在北京一家戏园登台献艺。刘赶三是有名的丑角，除插科打诨的功夫了得之外，还以敢于嘲讽权贵，抨击时弊，广为人推崇。就在刘赶三在戏台上表演时，突然想到时下的国耻，便即兴来了一句台词：“拔去三眼花翎。”

这明显是一句嘲骂当朝重臣李鸿章的话，当时，割让台湾、辽东，赔款2万万两的消息传来，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一下子成了全

国的公敌，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挤满了他的照片，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则雪片般飞向光绪皇帝的案头，而更有许多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在不断地经历战败求和的屈辱之后，整个民族很容易感染上这种急切“雪耻”的情绪。

这一句即兴发挥的台词里，“三眼花翎”成了无尽的羞辱。而在此背后，不仅仅是晚清一代重臣盛极而衰的个人命运，也是整个国家改革努力的失败。

三眼花翎

李鸿章的“三眼花翎”得来时间并不长。1894年，慈禧要过六十岁大寿，刚过正月初一，慈禧便“殊恩特配”，将一班大臣都加官进爵一番，以

示普天同庆，于是，李鸿章被破格授予“三眼花翎”的荣誉。“三眼花翎”，对汉人来说几乎是至高无上的尊荣，之前只有满族贝子或以上贵族独有，即便是他的恩师曾国藩也只是获授过双眼花翎而已。这一刻，李鸿章达到了一生功业的顶峰。

而为了这一刻，李鸿章几乎付出了50年的努力。早在1843年，年仅20岁的李鸿章离开家乡奔赴京城准备参加来年顺天府乡试的路上，李鸿章写下了10首《入都》诗，后来广为传颂。他怀着报效天下的强烈愿望写道：“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尽管李鸿章第一次科举并未考中，但在这些诗句里，一种气宇轩昂、纵横捭阖的气概已是喷薄而出。

曾国藩见到少年李鸿章时，这样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正如此，步入仕途后，不管是在曾国藩幕下出谋划策，还是独当一面平发平

捻，李鸿章的才能、谋略都显露无疑。为官之路上，李鸿章左右伸张、如鱼得水。正如他晚年所言：“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建，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像传统儒学所要求的官员的样子，李鸿章在仕途上青云直上的同时，也常常肩负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当时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已给这个民族带来了深彻的耻辱与灾难，而国内又逢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作乱、匪盗四起，一时这个危机四伏的大清朝更加岌岌可危。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当时李鸿章在给朋友的信中感慨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何以自立！”

所以，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李鸿章等一批官员的努力下，一场旨在自强国家的洋务运动开展起来。而从李鸿章办洋务的实践来看，无论如何他交出了一份可称得上出色的成绩单：1865

年，筹办当时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1870年，建天津机器局；1872年，挑选一批聪颖子弟派往赴美留学；同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1875年，督办北洋海防事宜……在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矿、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行业的早期发展，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他更是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对空谈理论的排斥，希望通过踏踏实实地做事，来一点点地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对洋务自强，他充满着信心；对残破的国家，他也从未丧失重整乾坤的自负。

但1894年，注定是李鸿章一生命运的转折。甲午战败，消息传到朝廷，翁同龢将失败归结为李鸿章消极应战以至贻误战机，于是恼羞成怒的光绪皇帝听从了老师的建议，有些负气般地颁布谕令：“著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去黄马

褂。”并削去了其直隶总督的头衔。

这小小的“花翎”之后，凝聚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一个国家耗费数十载，历经几代人，以洋务诉求的改革努力。而这一刻，一切都烟消云散。

破灭的外援

1895年初春，北国的天气依然有些凄寒，李鸿章踏上了赴日求和的路程。为了激励这位备受倚重“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光绪再次赏戴李鸿章“三眼花翎”，并将之前褫去的黄马褂一并赐还。

但这一切为时已晚了。“三眼花翎”可以发还，但一个国家错过的机遇则不会再来。光绪皇帝希望李鸿章能够通过外交努力来为战败的中国稍稍挽回些利益。他也明白，讲到外交，除了李

鸿章也确实再找不出第二人。

正如梁启超所言：“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届外交之生涯也。”李鸿章的时代，正是这个国家从传统的纳贡体系走出，迈向到近代外交的过程，其间充满着清官员们陌生、迷茫、惊慌与不知所措的种种表情。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无疑是最大胆，也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积极地熟悉着国际惯例、学习国际公约，并以一种长期在中国官场中练就的炉火纯青的手段在各国之间周旋，使之相互制约。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尽管很多条约也给他带来不断的非议，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家，他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些“外行”的无知，就在甲午战争之前，“外交”也一直是李鸿章颇为自诩的事情。

在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一味“求和”的态度，他主张“外须和戎，内须变

法。”每遇到有战争的端倪，他总是约束下属克制，强调“衅不必自我开”。对外交往，他主张遵守《万国公法》，信守条约，因为他相信，只要中国以诚对待西方国家，他们也能以诚对待中国，以此就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局面，赢得发展洋务的空间和时间。即便是偶然产生冲突，他也寄希望于各国的调停。

这番惨淡经营，自然容易引起清流派的攻击。委婉者说他“隐忍”，激愤者直接就骂其“误国”。但李鸿章依然置之不理。直到中日临战，李鸿章依然相信只要中国遵守条约，就能避免战事的发生，他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韩贼已平，我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乙酉伊藤与我订约，事定撤回。又倭韩条约，认韩自主，由无干涉内政之权，均难于约外另商办法。”

面对日本毫无顾忌的挑衅，他冀望俄使喀西尼能够调停。俄使开始也信誓旦旦地答应帮忙，但是经过一番利益盘算之后，又电告李鸿章，俄

国只能用友谊相劝，不便武力强迫。如果说，国内清流派的批评犹可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李鸿章赖以纵横开阖的国际条约体系的破灭则是对其致命的一击。

“以夷制夷”的办法，李鸿章在国际外交场合已经运用了二十年，屡试不爽。但这一次，却丝毫没有用处了，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情，都无法阻止外交的失败。李鸿章可谓沮丧之至。其实并不是李鸿章变得无用了，而是他所凭依的大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如果说早二十年，李鸿章与之打交道的，还只是一个致力于商品输出，信奉自由贸易，维护国际市场秩序的西方世界的话。那么，此时的西方各国，则已经演进为一个弱肉强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强力为唯一抉择的世界。

绝望贤良寺

1895年4月，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便称病不出。当年8月，他进京向光绪帝汇报。光绪帝慰问李鸿章一番后，话锋一转，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李鸿章无法回答，只得“引咎唯唯”，临行前赏赐的“三眼花翎”，又一次被摘去。

不久光绪皇帝下旨诏令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而当时伦敦的《特报》曾这样评说：“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钦差头等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那段时间，他寄居在贤良寺，仿佛朝廷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而外面不绝于耳的则是要求严惩“卖国贼”的声音。

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少

有的一段悠闲时光。他很少出门访友，来谒见的，十有八九也都被挡驾不见。从繁重的公务中解脱出来，李鸿章也第一次有了时间来反思他的人生。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尚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在这里，我们已很难见到他早年那种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转而换作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同时，突然的孤寂生活，也让他更加冷静地观察外面的这个繁杂纷乱的世道，自己有没有补天之才已不再重要，他发现整个天下已到了无法

可补的地步。

其实，这种无奈，早在中日开战之前，他就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主战的翁同龢责问李鸿章北洋海军为何不出战。李鸿章半晌无语，反问翁同龢平日掌管财政，每到北洋要求拨款，总是左右刁难，现在才问北洋海军，“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又以做大臣的应该尽忠职守，不该推脱责任诘问。李鸿章再也无法忍耐，悲愤地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这才语塞。

到了日本，他又一次被老对手伊藤博文羞辱。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当时会议的英文记录这样记载李鸿章的回答：“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照我希望的方法去做，……我希望的过份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如果说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认为可以在旧的体制内闯出新局，他建厂、修路、开矿、派遣留学生，相信落后的局面可以通过奋起直追的努力来扭转颓势，然而这一时刻他也不得不承认旧政体对自己的束缚了。

也许这时，他也明白了之前自己惨败的原因。他的洋务、海军，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抱着一种从器物可以引发制度渐变的侥幸。而这种做法，到底是治标不治本的，况且当时的国家又是怎样一个病入沉疴的机体。正如历史学家谈到：“他们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是一种技术性之事务。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能够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和尚”已死

就在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时，康有为、梁启超们已经日夜奔走，召集公车上书，呼吁维新变法了。消息传到贤良寺中，李鸿章向强学会捐款2000两白银，要求入会，但却被新党们拒绝了。因甲午战败而立上潮头的一代新人，自然不愿意和这个过气的“卖国者”发生什么纠葛。

未几，“维新”刚刚百日，就嘎然而止。事败后，众多朝廷要员纷纷退出强学会，唯恐与维新派扯上关系，而此时李鸿章亦被当作康党受到弹劾。慈禧太后拿着奏折，对李鸿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就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太后听后默然。

李鸿章甚至托人致信给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对自己这一代人，已经

没有任何祈求了。此时，李鸿章已经76岁，接近生命的终点，垂暮之年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900年，北方因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事陷入混乱。此时执掌两广的李鸿章，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有资料记载，也正在此时，流亡在外的梁启超来到广州，拜会了李鸿章。梁启超献上三策：上策拥两广自立，恢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权……类似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在广东期间，其幕僚刘学询曾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同流亡在外的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以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而李鸿章最终的回答则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人向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问及国是，他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失声流涕。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

旁听英国议会，坚定了他国民教育的信念；巴黎和会的诡诈，击碎了他心中的公理梦；而欧战的残酷，更让他深刻反思起了西方文化的缺失。但正当他自省之时，这位“立在阵头最前一排的勇士”，骤然发现，自己已经全然落伍了。

1919年10月11日，在欧洲各国游历大半年后，梁启超回到了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公寓。虽然离巴黎城不过二十分钟火车的距离，梁启超和同游们却已无心去那里凑热闹，终日埋头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把一年来欧游的见闻与感想诉诸笔端，这便是日后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欧游心影录》。

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隔窗望去几片顽强的枯叶“还赖在那

里挣他残命”。满眼萧条的风景恰如梁启超凄冷沉郁的心情，回想去国赴欧时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同样的季节却是冰火两重天地。

在公理的迷梦中启航

梁启超启程前往欧洲时，整个中国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

1918年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先是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的14条建议，让中国人开始期待其宣扬的“世界公理”；随后是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胜利而结束，更让身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群情振奋。

威尔逊在14条建议中，为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列国平等，共享大同的良辰美景——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饱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无疑

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于是，中国人欢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威尔逊14条已然如此，当协约国战胜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更是兴奋莫名，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附近，游人更是拥挤不堪。

狂欢的不仅仅是北京市民，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演讲”。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拉着北大的一班教授上天安门发表演说，而且强令北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参与者“均不记旷课”，不参与则“以旷课论”。

与蔡元培的狂热不同，一手促成中国对德宣

战的梁启超对战后的时局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事实上，中国所谓“参战”无非是输出数万劳工，军队根本没有出动。他在《对德宣战回顾谈》提醒国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虽然英美等国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世界公理”，但梁启超依然担心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到底能否在和平谈判中分得一杯羹。

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同样担心中国在巴黎和谈中缺少必要的“本钱”。于是，他找到了梁启超，希望梁能率知名人士前往欧洲，通过民间外交协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尽管对巴黎和会的谈判深自忧虑，梁启超还是对列强们宣扬的世界公理抱以希望。

1918年12月28日，在一片狂欢声中，梁启超率领张君勱、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轮“横滨丸”号，一路西行驶向了不寻常的1919年。

亲历议会民主

经香港，过南海，横渡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再由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泛舟大西洋，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已是1919年2月11日。英国是代议制民主的发源地，其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自然成了一向鼓吹民主政治的梁启超心驰神往的地方。趁着游览的机会，梁启超在下议院听了双方两个多小时的辩论，亲眼目睹论辩双方对各自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清末立宪，到民初国会，中国已经和议会制度打了十来年的交道。然而，宪政失败，袁世凯复辟，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国会在各种势力的摆布下形同虚设。而议员们非但不倾听民生疾苦，反而结党营私、趋附权贵，本该神圣的国

会完全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回想中国几年来的国会闹剧，曾经厕身其中的梁启超不禁悲从中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般的天壤之别？

短短几天时间，英国国民的绅士风度、法制意识以及坚毅执着的精神，已经让梁启超印象深刻。梁启超突然意识到，英国的国民素质恰恰是英国议会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于是，他幡然醒悟——“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因此，他认为目前中国最要紧的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培养具备法治精神“新民”。

正当梁启超亲历英国议会，连连发出“高山仰止”的赞叹时，国内知识界却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尽管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然视西方为榜样，但军阀操纵国会的现状使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议会制度丧失了信心，他们目光投向了刚刚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转而研究和宣传

起马克思主义。

梁启超旁听英国议会时，新文化运动干将之一的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主编，随即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原本团结一致，与封建文化并肩战斗，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逐渐分化，走向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这一切，远在欧洲的梁启超自然无从察觉。

“正义人道的好梦”

2月18日，梁启超抵达巴黎。此时，巴黎和会已经举行了整整一个月。然而，不巧的是“第二日，克列曼梭（今译克里孟梭，法国总理）被刺了，正在养病。威尔逊（美国总统）回美国去，尚未再来。劳特佐治（今译劳合?乔治，英国首相）亦回家了。”梁启超无法展开外交活动，于是抽个空去法德比边境游历战地，亲眼看

看一战的惨状。

3月17日，梁启超返回巴黎，旋即投入到争取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外交活动。他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首倡世界公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得到其从旁相助的承诺。随后，梁启超又先后会见英法等国和谈代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梁启超的民间外交，让会场内外的中国人都感到很振奋，以为和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事实上，自威尔逊提出14条建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公开表达同样的观点，梁启超就已经对所谓的“世界公理”便开始了期待。威尔逊的承诺，巴黎各界的支持，更让梁启超做起了“正义人道的好梦”。

然而，梁启超的努力终究是徒劳，当日本代表在会谈中拿出和北洋政府签署的秘密协定时，早有默契的英法两国站到了日本一边，就连承诺为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积极奔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在日本代表的一再威胁下，选择了妥协。

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一直梦想着“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得知这一消息，梁启超连忙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同日，蔡元培将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两天后，北京的大学生们便走上了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然而，“五四运动”的群情激愤仍然无法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北京政府于5月31日和6月9日两次密电巴黎同意陆征祥签字。林长民急忙密电梁启超，请他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学生，并阻止签字。6月28日签字那天，巴黎留学生、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在巴黎和会的阴谋宣告破产。

当梁启超梦碎巴黎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引发的“五四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愿望，由一场外交性质的政治运动迅速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精英积极投身政治斗争，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最热衷的救亡之道。

“科学万能主义”的破灭

除了巴黎和会，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目的便是了解战后情形，“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事实上，当梁启超第一脚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已经感受到了战后的“惨淡凄凉”。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上等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纸烟的梁启超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于是“只好强迫戒掉了”。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旅馆的茶座。梁启超见隔座一位贵妇人十分珍重地从项圈下取出一个金盒子来，正猜测是什么宝贝东西呢！结果一看，竟是一小方块白糖。更有意思的是，“她连（同饮的）客人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另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

梁启超不曾想到，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回想近代中国，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又一次砸烂中国的大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拜倒

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脚下。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然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欧洲列强，没有让科学进步继续造福人民，反而把全部的智慧用于研发杀人的武器，最终酿成这死伤3000多万人的空前惨剧。

一年多的游历，战争留下的创伤令梁启超目不暇接，他眼中的欧洲不再是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天堂，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血腥角逐的战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梁启超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在欧洲的游历中，梁启超不断听到西方学者悲观的论调。几位社会党名士听梁启超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竟然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于是，梁启超不禁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

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继而又想到东方自古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正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概念。这便是日后深受国内思想界诟病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与梁启超亲历战后欧洲不同，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创的中国知识界还感受不到“科学万能”思想的危害。新文化运动竖起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依然引领着青年一代。

论战社会主义

1920年3月5日，去国一年有余的梁启超终于回到了祖国。

去国日久的梁启超或许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了。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让梁启超的“公理梦”瞬间破灭，更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威

胁。

当梁启超把殚精竭虑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公开发表时，满以为它可以匡正时弊，引导中国走上一条中西调剂的道路。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他的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向梁启超发难的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主张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梁启超而言并不陌生，早在1902年他就通过《新民丛报》向国人介绍过马克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强调其“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赞赏其精神，却不赞同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

1920年9月，梁启超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

华讲学。罗素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

罗素的看法立即得到了张东荪的响应。他先后在《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撰写文章，赞同且发挥了罗素的观点。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立即引来了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这便是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梁启超坚决支持张东荪，断定今日之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搞实业救国。他甚至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但在救亡呼声日盛一日的中国，梁启超外科

手术般的改良主义恰恰是“不合时宜”的。陈独秀反驳梁启超：“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

诚如陈独秀所言，在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下，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保障，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确难以实现。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再度重演，四年后，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爆发，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去了验证的机会。

被抛弃的青年楷模

批判梁启超的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梁启超宣称“科学万能”破产时，崇尚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同样对他发起了强烈的批判。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一方面，他认为欧洲人“科学万能”的观念已经宣告破产，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化并未破产，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尽管梁启超一再声明自己并不反对科学，但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环境下，梁启超的论断仍不免“一石激起千层浪”。主张“全盘西化”的钱玄同指责他反对科学，甚为“荒谬”；就连向以“雅量”著称的胡适也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

断章取义的批评着实冤枉了原本重视科学的梁启超，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接受他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三年之后，

在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被视为复辟封建传统的“玄学鬼”，成为胡适、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的众矢之的。

而在这场论战中，批判梁启超的青年一代，无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都曾以梁启超为时代之楷模，并从他那里汲取过思想的营养。

自“公车上书”到“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直走在中国思想界的最前沿。尽管由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由反袁到挺袁再到讨袁，梁启超多变的政治态度曾经饱受非议，但他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却始终未曾动摇。

而欧游归来，梁启超所坚持的思想基点发生了变化，“民主公理”破产了，“科学万能”破产了，他开始转而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尽管如此，他并不是要抛弃信奉已久的西方民主和科学，而是希望通过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

和调和。他依然坚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去改造中国。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20年之后，暴力革命论已经完全主宰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梁启超和他那温情的改良主义道路被革命浪潮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1922年，梁启超在回顾晚清至民国的著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不无自省又略带自嘲地为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写下了注脚——曾经“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五四以后，“许多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流氓”忠臣洋家将

建立了洋枪队的美国人华尔，不仅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还加入中国国籍，做了中国女婿，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在美国，他被视为大英雄：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的伟大人物，一个为中国而献身的国际主义者。而在中国，他曾被推崇备至，后又被彻底妖魔化。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进占上海重镇松江。

一位名叫伯克（William B Burke）的美国老人站在松江的城门洞迎接了日军，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拜托这群新的占领者：在这座古老的县城里，有一座墓和一座祭庙，请日军务必给予保护。这就是洋枪队首领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安葬和受祭之

处。

带队的日军大佐很痛快地答应了老人的要求，并且表示：“华尔是个大英雄，我们日本人也崇敬他。”逃难的看坟人和庙祝很快地回到了岗位。但半个月不到，他们就被日本人杀害。日军在华尔的墓地和祭庙里，到处都刷上了“大东亚共荣”，以及反抗英美、号召将白种人赶出亚洲的标语，引起了美国外交官的强烈抗议。

三年后（1940年），一位正在中国收集资料撰写华尔传记的美国记者阿本德（Hallett Abend），在上海受到了日军殴打，所有采访手稿被毁。这位记者事后愤怒地写道：“如果华尔晚生几十年，他一定会在蒋介石将军的麾下，率领部队狠狠地教训这些日本鬼子！”

被日本人切齿痛恨的华尔，在中国史学界中，似乎也不是一个光彩的人物。他头上安得最多的头衔是：美国流氓、刽子手和殖民主义者。

但在美国，这个“流氓”却被普遍视为大英雄：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的伟大人物，一个为中国而献身的国际主义者。美国记者阿本德为他所写的传记，题目就是《西方来的战神》（The God from the West），极尽推崇。

如果从词义上推敲，“流氓”（无业游民）一词显然是适用不到华尔头上的。他有着严格意义上的技能和职业——水手，从小就在船上四海漂泊，成年后就到处参加各地的战争。当他因缘际会地来到了中国后，正赶上太平天国战争，受苏松太道（俗称的“上海道台”）吴煦的委派，组建洋枪队，保卫上海。

有关华尔的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故事，早已汗牛充栋。但我们似乎很少注意到，为了参加这场“中国内战”，华尔甚至不惜与英国人兵戎相见，并最终加入了中国国籍，展现了罕见的对中国的“忠诚”。

募兵

上海滩是个藏龙卧虎的人才库。1861年，当华尔要组建一个由专业水手和军人组成的团队时，也没怎么发广告，就应者云集，连英国舰队的现役官兵，也成批地开小差跳槽前往。

华尔的这个新团队，就是“洋枪队”，股东是苏松太道吴煦及以杨坊为首的当地富商们，其业务主营范围是保卫上海、抵抗太平军。

组建这个新团队，其实是上海的官绅们想拉着洋人抱团取暖、一起“过冬”。太平军打过来了，官军却望风披靡，偌大的花花世界，只能指望洋人们的雇佣军了。建立洋枪队，幕后并没有什么“阴谋”，西方国家那时并不想与太平军为难，纷纷宣布中立，指望着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左右逢源。英国的海军将领们甚至率领军舰访

问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向天王洪秀全猛抛媚眼。洪天王尽管沉溺于肉林酒池，但并没有丧失其作为一个造反领袖的直觉，他明智地宣称，只要洋人们保持中立，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将不侵犯上海。英美法等国领事馆向自己的公民们发出了严格的训令，要求他们务必严守中立，违者将受到法律严惩。

可上海富商们鼎力支撑下的洋枪队，资金充沛，银子的力量显然超过了对法令的禁忌。高薪之下，全上海但凡扛过枪的老外，纷纷投奔而来。更有意思的是，大清国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打败过英国人，此时却用银子差点瓦解了英国舰队，大量英国逃兵集结到了保卫大清国的旗帜下。华尔的猎头工作实在太成功了，英语世界中还因此诞生了一个新词“Shanghaied”。

风波

英兵大量跳槽，英国海军司令何伯(James Hope)很生气。何伯此前已经多次访问了南京，拜会了洪秀全。在英国人看来，维持上海的稳定是最重要的，他们如愿获得了太平天国不主动攻击上海的承诺。但华尔这支洋枪队，由一大帮子英美军官和菲律宾战士组成，不断地攻击太平军。英国军方当然要担心，这会激怒太平军。

显然，大英军官并没能阻止洋枪队的行动，逃兵们也不甘心放弃洋枪队的高薪。1861年5月19日，何伯本人干脆亲自带队，驾驶了四艘登陆艇，满载着英国海军陆战队员，全副武装地前往洋枪队的基地松江，准备武力抓捕跳槽者。

洋枪队的士兵们多是一群兵油子，如今手里端着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兜里揣着硬邦邦的中国银子，根本就不把何伯放在心上。双方举枪架炮，一场英国正规军和大清国英美雇佣军的冲突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华尔站出来消弭了冲突，令部下们放下武器，打开松江城门，迎接英军进城。同时，他也下令洋枪队中所有英国和美国籍的士兵列队，接受何伯的亲自鉴定。

何伯毫不客气，指挥英军顺利地逮捕了29名英国逃兵，顺手也帮美国政府抓了2名美国逃兵。华尔虽非军人，但也算是教唆犯，也被一同捆绑而去。英军满载而归，俘虏们都被扭送到黄浦江畔的英国军舰上，关进了禁闭室，等待审讯。而群龙无首的洋枪队群情汹汹，一片混乱，兵变随时可能爆发。

国籍

包括华尔在内的美国人，交给了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审理。

5月21日，在英国水兵的武装押送下，华尔

被捆绑着押下英军旗舰CHESAPEAKE号，步行穿过外滩前往美国领事馆，一路上观者如潮。在审判中，英国军方的一名海军上尉充当了公诉人，控告华尔非法卷入战争，破坏中立，并且非法“猎头”，诱惑和煽动军事人员擅离职守。

这些指控显然证据确凿，但令英美官方大跌眼镜的是，华尔全盘否认了该法庭的管辖权——因为，他并非美国公民，而是大清帝国的臣民。英国公诉人立即对这一拙劣的谎言表示嘲讽，美国领事也表示难以相信。

参加旁听的中国代表，此时微笑离座，向法庭呈交了一份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文件，上面盖满了各种公章，明确无误地表明，华尔已经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在文件的最后，赫然还有大清皇帝的批示：“准奏”！

这自然是华尔的中国朋友的杰作。毕竟，中国官方和商人们已经在洋枪队身上倾注了大量的

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如果华尔被判有罪，就有可能转到美国国内服刑，洋枪队将被迫解散，上海除了区区900人的英军和1000人的法军外，将无兵防守。

面对这个只会说英语的大清臣民，美国领事只好宣布当场释放。但英国人窝了一肚子的火，华尔一走出美国领事馆，英军就将他再次逮捕，再度招摇地穿过热闹的外滩大街，押回英国旗舰。

逃走

何伯和华尔私下谈判，要求华尔停止军事冒险、解散队伍并永不再招募英军逃兵，只要答应，就能立即释放他。但华尔只保证不再招募英军逃兵。两人大吵一架，华尔被继续监禁。

何伯有个绰号，叫“好斗的吉米”（Fighting

Jimmie），但这次，他的处境并不妙。如果中国政府出面要人，他毫无办法，只有放人。他唯一的选择是，在中国政府开口前，派遣英军立即占领松江，遣散洋枪队，甚至不惜武力镇压，以免洋枪队的冒险家们再度跳槽投奔太平军，酿出更大的麻烦（洋枪队后来果然集体跳槽“投敌”）。

杨坊通过谍报得悉了何伯的计划，立即向松江发出了警报。洋枪队将城防移交给清军，全部人马则扼守到城外一个战略据点，抢修碉堡，拓宽护城河，增设拒马等防守工具，还架起了大炮，严阵以待。

两天后，800名英军在离据点两英里处登陆，发现洋枪队已经准备鱼死网破，英军不敢造次，没放一枪一弹，撤回了上海。

华尔其实并没有被关押在军舰的禁闭室里，而是被软禁在一个相当舒适的舱室内，每天还有一个小时的会客时间。吴煦和杨坊派了两个美国

人天天来探他，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用手势、记号、点头和少量耳语一点点沟通，华尔终于恍然大悟：随后的三天都将是月黑之夜，涨潮时分，将有条小舢板划经华尔舱房一侧，只要华尔能跳下水，舢板上的人就能将他救出。

这对华尔并不难：他的囚室窗户相当宽敞，而且没有任何窗条，加上已经初夏，天气闷热，平时都开着窗。

第二天晚上，当军舰上的钟敲四响时，一个身影跃入了水中。接应的舢板上闪了两下手电光，华尔这位优秀的游泳者，在涨潮的帮助下，很快就上了舢板。英国军舰立即乱成了一锅粥，“有人跳海”和“犯人逃跑”的呼喊声四起，英军还向水中胡乱地开了几枪。营救者是十分细心的，他们足足动用了30多条舢板，在军舰边上团团转，掩护着华尔迅速地脱险，在浦东上岸躲藏。

何伯派出了大队人马沿江搜索。华尔在杨坊一个朋友家猫了一天一夜，待风声过后，躲在一艘满载白菜的小帆船里悄悄回到了松江。

回到松江后，华尔立即给何伯送了封信，并非是挑衅，而是希望两人能在英军旗舰上举行一次平等的“男人对男人”的会谈。

一场差点酿成军事冲突的“猎头”风波，总算平息了。英军曾经是上海滩掌握枪杆子的唯一老大，现在也只好接受洋枪队这一竞争者的出现。

美国内战蔓延到大清

1860年代，东西方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都在上演着血腥的内战：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和美国南北内战（1861-1865）。

在中国内战中指挥着洋枪队的华尔，此时不

得不分神考虑祖国的召唤。因为英国方面支持美国南方邦联，英美两国持续紧张，第二次英美战争一触即发，而华尔是在远东地区唯一能抗衡英军的美国人。

这期间，一艘名为特伦特号(Trent)的英国邮轮，差点点燃了英美之间的战火。1861年11月7日，特伦特号驶离哈瓦那，船上载着两名特殊客人：美国南方邦联的代表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和约翰·斯利德尔(John Slidell)，他们计划前往欧洲订购武器和战舰。这时，北方军队正在战场上连连失利。

第二天，北军军舰圣亚辛托号(San Jacinto)拦截了特伦特号，逮捕了南方使节，并将其带往波士顿拘禁。消息传到英国，伦敦为之群情激愤，议员和将军们纷纷要求政府向美国施加压力：一是必须立即释放南方使节，二是必须向英国政府道歉和赔偿，否则，将对美国宣战。此时，英国政府掌舵者正是激进的扩张主义者巴麦尊勋爵

（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同时期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英国立即进行了战争准备，一支满载8000人的庞大舰队进驻加拿大，同时对美国实行严格的军事禁运，硝石、火药和其他所有军用品都在禁运之列。

英美之间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而在远东，美国并无任何军事力量，因此将希望寄托于华尔身上。

华尔自然是一诺无言。美国人进行了精心的布置，一旦英美战争爆发，在中国和日本的美国人，将在华尔的统一指挥下，以洋枪队为主要武装力量，向上海、长崎等地的英国舰队发动袭击。

华尔的洋枪队，因为有中国政府的强大支持，无论在粮饷弹药还是人员补充方面，都尽得

主场优势，令英国人相当忌惮。当时的上海，不仅笼罩在太平军战争的恐惧中，还时刻担心英美在这个东方大都会大打出手。

英美的史料对这一冲突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而在中国的史料里却很难找到其痕迹。以吴煦、杨坊与华尔关系之密切，应当不可能不知道华尔暗中计划对英作战，或许，大清国面对这英、美这两个谁都惹不起的主儿，明智地保持了“中立”。何况，英国人伙同法国人在华北大打出手，把咸丰皇帝逼出了京城，有美国牛仔能出面教训下傲慢的英国人，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但是，面对英国的挑衅，林肯总统选择了退让。他顶住了巨大压力，命令美国驻英大使亚当斯向英国政府道歉，表示“圣亚辛托号”是自行其是，并没有得到政府训令。同时，他下令无条件释放了两位南方使节，完全满足了英国人的要求。

一场足以改变美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危机，被林肯总统的柔软身段化解。远在中国的华尔也松了一口气，他的洋枪队终于避免了挑战英国远东舰队的艰难一战。

1862年9月，华尔在浙江慈溪阵亡后，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专程向林肯总统作了报告。报告中，蒲安臣还向林肯转交了一笔巨额捐款：华尔这位大清国的“洋家将”在弥留之际，请求公使向林肯总统转交1万两白银，供讨伐叛逆的南军之用。

这应该是美国政府在内战中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

中外军事合作

华尔是少数正式加入中国国籍的洋人，并且还娶了杨坊的女儿，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

做中国女婿，他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

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华尔都得到了大清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奖赏。一方面，大清政府需要树立这样一个洋典型，另一方面，并不懂中文的华尔也展现了协调中国官场的卓越能力。华尔之后，其继任者白齐文（Burgervine）、戈登（Gordon），以及更晚时候在北洋舰队和中国其他军政机构服务的众多洋干部，除了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四十多年的赫德（Robert Hart）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再达到华尔那样与中国官场琴瑟和谐的地步。这样的协调能力，加上在战场显赫的胜利记录，令华尔在美国和中国都赢得了相当的声誉。但美国方面因为内战正酣，这一在远东彰显美国精神的英雄，长期都被忽视了，颇令后世的美国史家们愤愤不平。

华尔创立的洋枪队开创了中外军事合作的先河（有关晚清在1860年的对外军事合作，请参阅

本刊2008年10月刊《龙旗下的英国舰队》），最终成为大清国的一支“特种兵”和“开放部队”，而洋枪队雇佣和训练的中国士兵，也令西方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中国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军人。

在对华尔的洋枪队的管理之中，清王朝也体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态度。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太平天国纵横大半个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清王朝能够仅仅依靠给政策，就不费朝廷一两军饷、一粒军米而建立其这样一支先进的“洋团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其还有着相当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

梁启超曾经评价说：“李鸿章平吴大业，固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盖本朝绝而复续，英法人有大功矣。”华尔对延续清朝政权功劳卓著，或许这正是他在清代被捧上神坛而后再被后世彻底妖魔化的真正原因？

宋教仁呼吸政治文明的新空气

1913年初春，就在宋教仁遭暗杀前不久，上海《民立报》发表一篇署名“崇拜英雄”的浙江读者来稿，比较国民党三大领袖：“听孙（中山）先生演说，理想高远，是一大哲学家；听黄（兴）先生演说，诚坦动人，是一大实行家；听宋（教仁）先生演说，条分缕析，是一大政治家。”

《民立报》记者徐血儿曾发表《当今之政治家》一文，直言宋教仁有沉毅的魄力，运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统的政纲，而且能坚持政见，不屈不挠，属于“当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无有可以企及者也”。

冬天还没有结束，宋教仁告别故乡湖南桃源，抵达长沙，然后由武汉顺江东下，在安徽、

上海、浙江、江苏等地一路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长江中下游刮起了一股“宋教仁旋风”。此时国会选举即将揭晓，他领导的国民党已胜券在握，各路捷报频传。按《临时约法》的规定，一旦国民党占有多数议席，身为党魁的他就将出任国务总理，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这是他一贯的政治理想，他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在湖南时他就考虑过新内阁人选，曾和当地国民党人讨论，由谭延闿担任内务总长兼湖南都督。他想利用谭和袁世凯的世谊（其父亲和袁的叔祖父袁甲三是拜把兄弟），在未来府、院之间起协调作用。此计划曾电告北京的国民党总部，袁世凯密探也得到了这一消息。

他到杭州西湖正值雪后初晴，登南高峰，他还写下一首踌躇满志的《登南高峰》诗，其中有“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等诗句。

3月份揭幕的国会选举结果毫无悬念，国民

党以绝对优势获胜，如果不考虑跨党因素，国民党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269人，占了45.1%，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相加仍不及国民党的2/3，当选议员平均年龄仅36岁，其中2/3以上在国内或国外受过新式教育。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的国会选举，虽有选举资格的一些限制（受教育程度和财产等），全国确认具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只有400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10（真正参加投票的人数更少，有些研究说只有400万人左右，占全国总人口的1%），而且有贿选等不正常的现象，但大体上仍不失公平。国民党的获胜与当时的时势有紧密的关系，但离不开这位年轻而成熟的政治家在后面运筹帷幄，在前台奔走演讲。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当时享有“革命文豪”声誉的章太炎发表宣言，说孙中山长于议论，是元老之才，“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说他“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

直到1920年他为宋教仁日记作序，仍一口咬定他有宰相之望。

当时舆论认为宋教仁有当总理的私心，所以才主张内阁制，结果在组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提名他为内务总长也遭到许多人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长，但他看得很淡。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他在新内阁中虽只是农林总长，却隐然是整个内阁的中心，因为政策的内动力在他身上。在这个位置上，他洞察了混合内阁不可为，虚有其名的挂名式政党内阁同样不可为，一心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所以才着力推动同盟会与其他政党、政团组成国民党。

他在上海的一次演说讲得很清楚，革命党与政党虽然都是过政治生活，牺牲进取的精神也始终一贯，但从事政治的方式毕竟大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号，今日能在国内活动，昔日专用激烈手段谋破坏，今日则用和平手段谋建设。”他解释说，建设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恶习惯，吸收文

明的新空气，最终达到真正共和的目的。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他的政治生涯不过十年，但作为同盟会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中部同盟总会核心人物和国民党实际领袖，他在辛亥革命前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3月，短短一年半时间，他如同流星划过中国的天空。在我心中，他和蔡锷占有同样的地位。他们不是闪电，不是雷霆，他们是阳光，透明而温暖，短暂而永远，一部中国近代史因为有他们而有了新的质地，尽管他们的生命过早地凋谢，但他们毫无争议都是中国史上的阳光人物，他们呼吸到了政治文明的新空气。

第二章 疑案迷踪

岳飞之死的政治解读

岳飞为什么会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惨死风波亭？这似乎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古往今来，且不说专业历史学者们对此已经多有论说，就是市井小童，也早已从评书故事里、口口相传中略知一二。简言之，岳武穆之死，完全是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一手操办的，高宗怕篡权，秦桧害忠臣。然而这样的解释又难免过于笼统与符号化，不经意间就容易落入忠奸善恶二元两分的思维窠臼。

岳飞出身农家，在靖康之变纷纭扰攘之际，几次三番毅然从戎，投身于保家卫国、进而一雪国耻的战斗中，不但剿灭了威胁南宋社会稳定的内乱——流寇与农民起义，还在抗金前线奋勇杀敌，令敌人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从

一个基层的小校，历经十多年即成为当时守护一方的类似大军区司令级别的人物，最终官至枢密副使，是鼎鼎有名的“中兴四将”之一。他心系民瘼，治军严厉，在当时兵匪一家，多数南宋军队在烧杀掳掠、戕害人民方面与匪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岳飞培育出一支“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纪律森严的部队，使他的士兵成为深受当时人民爱戴的子弟兵。

然而，“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的武功赫赫的“精忠岳飞”，最终非但没能在民族战争的疆场上大展身手，实现“直捣黄龙”的夙愿，反而在年富力强之际身陷囹圄，最终含恨遇害，令人扼腕叹息。于是千百年来，岳飞被害的因由，一直为大众所关注，所探究。特别是，到底是秦桧还是高宗痛下杀手，长久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没有秦桧的苦心经营，栽赃陷害，高宗很难抓到缢杀岳飞的口实；而没有高宗的首肯，秦桧

绝不可能有机会除掉一员大将。从这一点看，君臣二人互相利用，责任难分伯仲。但出于为尊者讳的传统，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神圣形象，当时与后来的许多记载，都把秦桧视为杀害岳飞的元凶。这个，国人应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到底是高宗先动的杀机，还是秦桧先有心思，欲必置之于死地，凭借当时和后来被屡次篡改、又历经近九百年而残存下来的有限文献，凭借对世俗人心的揣度，想厘清真相绝对是件异常困难的事情。

岳飞为何遇害？

近九百年来，岳飞之死一直引发了人们浓厚的兴趣，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都有所论说。概而言之，无外乎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高宗对武将的猜忌与岳飞的质直、强项

宋代开国以来对武将的提防，已经内化为赵宋皇帝的遗传病，世代相传。宋之前的五代，不过短短53年，却有“六姓十三君”，军事政变接连不断地上演。及至太祖赵匡胤开国，所谓“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传奇，也不过是武将政变夺权的再一次重现。既有前车之鉴，宋朝历代皇帝对有威望的将领的猜忌与有意压制极其常见。此外，在两宋之交、版图震荡之际，高宗赵构一方面必须依仗军事将领为其赢得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却一直对武将“不尊朝廷”心怀疑惧，深恐养成“尾大不掉”之势。特别是“苗刘之变”，给高宗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在这种情势下，赵构特别忌讳武将的难以控驭，特别忌讳武将的结纳民心。他曾对张俊说起郭子仪的故事，勉励告诫他“若知尊朝如子仪，则非特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而岳飞恰恰是一个“质直、坚定、强项”的人物，或者往严重点说，有些桀骜不驯，甚至有赌

气使性的时候。

岳飞桀骜不驯的性格，早在建炎初年就曾表现出来。当时，身为高宗大元帅府下属低级官吏的岳飞因越级上书，反对京师南迁，被革职归田。回乡途中，他又投奔河北招抚司，在那里，岳飞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伯乐张所。招抚使张所赏识岳飞的军事才能，破格将其提拔为统制官。但不久岳飞却因与上级意见不合，不顾军纪，带领部属分裂出去，擅自行动。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如果说，这次违背上级命令，岳飞年方25岁，年轻气盛，是为抗金的急迫心情所激，尚且情有可原，而在十年之后的绍兴七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是南宋极重要的大将。这一年，高宗起初答应岳飞要将大将刘光世的部队并入其麾下，后来却出尔反尔，让岳飞壮大队伍、措置北伐的计划遭挫。倔强的岳飞，竟向高宗上了乞罢帅职的奏

疏，且不等答复，就怒上庐山给过世多时的亡母守丧去了。高宗派岳飞的部将上山请岳飞回来，岳飞拒不接受诏命，僵持了六天，最后部下无可奈何地质问他：“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托，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毫无疑问，岳飞赌气使性，连部下都认为是欲“与朝廷相抗”，那么，比岳飞还小四岁的高宗岂能不怒火中烧？但高宗竟然容忍了，当面说了些“朕实不怒卿”的话宽慰岳飞。

绍兴十年，岳飞终于有了在抗金战场上大展身手的机会，他挥师中原，前锋所驻扎的朱仙镇，距离旧都开封仅有45里。正当形势大好，岳飞希望得到友军的配合，一举恢复旧都的时候，高宗不但命令其他部队先行后退，造成岳飞一军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并且急用十二道金牌将其从北伐前线召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飞心中的愤懑是可想而知的，他又一次故态复萌，撂挑子不干了，返回途中他又到庐山，到母亲墓

地守丧去了。岳飞与高宗原本就不深厚的情感，经过这些事件，愈发淡薄。

此外，相对于当时官场的苞苴公行，相对于众大将的热衷经营产业，岳飞却是一个不经商、不置田、不造豪邸的人，过着淡薄清廉的生活。这本是难得的宝贵品质，但统治者却未必这样看。范增就曾提醒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也就是说，不贪图物质生活享受，非常可能被统治者认为是赚取人望，包藏觊觎社稷之心的作秀。待到刘邦做了皇帝，萧何就不得不“自污”以图自保。而当名望如日中天的岳飞有“邀誉”之嫌时，赵构就不能不大动肝火了。

置岳飞于死地的“罪证”中，有一条就是高宗亲自定性的：“比遣张俊、岳飞往彼措置战守，二人登城行视，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

附下以要誉。”岳飞到底曾否说过这样的话，还是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是大有疑问的。但不论如何，上述高宗的话，足以见其对属下“附下以要誉”的警惕和极端反感，高宗唯恐岳飞深得百姓将士之心，重走太祖兵不血刃而取天下的老路。

观点二：高宗担心抗金成功，迎回父兄，皇位不保

岳飞直捣黄龙，迎归徽宗、钦宗的雄心，在政治上既正确，又不正确。正确的是，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确曾响彻朝野，起到了鼓舞民众对金斗争的作用；不正确的是，在高宗的内心，是绝不愿徽、钦二帝在有生之年平安回到宋廷的。一旦父兄归来，其帝位便岌岌可危。早在高宗于商丘即位之初，就有太学生上书反对，他们认为高宗不该即位，待到钦宗有朝一日南返，如何处置？由于说到高宗痛处，惨遭杀害。

徽宗其实早在绍兴五年的六月，就死在了白山黑水间的五国城。此后能对高宗皇位构成威胁的，只有其哥哥钦宗。绍兴十二年，宋金协议达成之次年，在高宗生母韦氏南归之际，“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哥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赵桓的这番表白，是明白无误地告诉赵构：我是不可能与你争夺帝位的，念在骨肉之情上，给我一个闲职就感激不尽了。不愧是一奶同胞的兄弟，钦宗所讲，正是高宗心中所想。但赵构还是不愿一时心软，答应这个简单的要求，免得养虎为患。从高宗的一己私利出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颇为英明的决定。

后来的明朝“夺门之变”，就足以证明废帝还是有号召力的，不可不提防。可怜的钦宗只能在北国边陲，望断南飞雁，郁郁中客死他乡。不过但凡钦宗明智一点，也能料想到这个结局。钦宗在位时，金人包围开封，提出以亲王为质，以表

达求和诚意，那时不正是钦宗指派赵构去干这个苦差事（当然，后来赵构因祸得福，那是始料不及的）？投桃报李，这回赵构算是出了一口气了。

岳飞根本没见过徽钦二帝，他念念不忘地“迎归二圣”，也不可能是不忠于高宗的表现。但是，岳飞念兹在兹，矢志不渝地坚持抗金复国，反对退让苟合的夙愿，是与高宗那个偏安一隅的总体愿景相左的。少年天子赵构，首先要考虑的，是稳定有限领土内的统治秩序，考虑江山社稷不致易姓。

南宋初年，外有金人侵逼，内有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游勇打家劫舍，还有不甘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待至将领们陆续平定了内乱，宋高宗又觉得将领们势重难制，担心尾大不掉。于是长久以来，结束战争状态，巩固对内统治，就成为高宗的首要目标。说宋高宗被金人吓破了胆，只知妥协求和，未免太小瞧了

这位中兴之主。宋高宗再昏聩，也不可能在统治牢固的基础上嫌地盘太大。此外，“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意味着必须提供大量的物资供应，兵燹之余，生产遭到破坏，社会凋敝，对民众的过量诛求，已经造成了动荡不安的局面。这必然使得高宗感到组织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力不从心。于是一旦条件允许，他是决计于不惜代价求和的。

说到底，岳飞与高宗的矛盾，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宋金矛盾激化，高宗求和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仰仗岳飞等大将保卫江南一隅之地，保卫南宋小朝廷。而当金人伸出和平的橄榄枝，矢志抗金，恢复故土，反对苟合的岳飞，就不能不被赵构等一班人所厌恶，所嫉恨，所抛弃。正是与这种大政方针的相左，令高宗与秦桧施展手段，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

观点三：岳飞对选立太子表现得过于热心

岳飞本人政治上幼稚，不知忌讳，对权力交接说三道四。绍兴七年秋冬之间，岳飞得到情报说金人想要扶植钦宗之子在开封做傀儡皇帝，以给南宋制造分裂。岳飞于是在面见赵构时，建议尽快立赵构的养子之一赵昶为太子，以阻敌人之计。在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岳飞明确支持立赵昶为太子，将来入继大统，说是建言，其实已经是倾向坚定的政治表态，对于手握重兵的大将来说，愈发会引起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岳飞积极主动地支持立赵昶为太子，是不是已经结成了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利益小集团？果真如此，那将来会不会急于抢班夺权？会不会以拥立新君为借口，再次逼迫高宗退位，苗刘之变会不会重新上演？就算是憨直的岳飞完全出于忠心吧，如果将来赵昶果真做了皇帝，现在这种支持算不算是一种献媚和“要君”的资本？如果将来继位者与岳飞支持者不符，新君与旧臣之间势必难以相处，而君臣相疑，定非国家之福。所以，岳飞的建言在赵构看来，显然是“越职”了。

宋代历史上，聪明的臣子在谁应当继位这类问题上，心中不是没有想法，但在关于权力交接的议论上，向来讳莫如深。就连那位极有个性，以敢批逆鳞闻名的寇准，在太宗主动向他征求立储建议时，也是唯唯诺诺，不置可否。

时人张戒曾评论岳飞此举说：“越职及此，取死宜哉！”把此事件的后果看得非常严重。虽然后来高宗貌似并未深究此事，反而让人安慰岳飞，但很多人都同意，这是导致了赵构与岳飞离心离德的重要事件。

岳飞死于政治交易？

以上，就是关于岳飞被害的常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四月下旬解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兵权，到八月初罢免岳飞枢密副使的官职，再到十月将岳飞从

庐山上诓骗回临安投入诏狱，中间历经了数月之久，上述理由似乎还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陈年旧事，往日恩怨，直到此时才被拿出来重提，并促使高宗痛下决心杀害岳飞呢？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高宗与秦桧一伙，慑于岳飞的崇高威望与军心民心所向，不敢贸然处死民族英雄。这数月间，正是忙于栽赃陷害，制造口实。但是，不正是高宗、秦桧一伙，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莫须有”的罪名，赶在除夕匆匆杀害了岳武穆吗？

这几个月间的惊天变故，其实并不是上述诸因素导致的必然，而是另有隐情。岳飞的宠辱存亡，都被这一隐情所决定。其实也算不得隐情，因为在元修的《宋史》上就清清楚楚地写着，金人提出了“必杀飞，而后和可成”的要求，而此一要求，竟被赵构秦桧这一班昏庸的君臣所接受。在双方信使频繁往来，忙于议和之际，即将岳飞投入死牢，而待和议达成之后，和平似乎已经降

临，于是他们匆忙履行之前的承诺，将壮志难酬的英雄杀害了。

应当指出，舍弃臣子性命，罔顾国体尊严，奴颜婢膝求和，在两宋的历史上，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北宋末年，原辽朝的官员张觉先是在金灭辽的过程中降金，后来又叛金降宋，宋人只看到眼前的有利可图，欣然“纳之”。而后来在金人的要挟下，又不得已砍掉张觉的脑袋奉上，致使郭药师等辽朝降将心灰意冷，二心渐萌。南宋中叶，开禧北伐失败后，和平谈判中宋廷迫于金人的要求，又决定将早已在宫廷政变中遇害的韩侂胄梟首，将人头装在盒子里送给金国。时人作诗写到“未闻函首可安边”，对这一屈辱的行为予以辛辣讽刺。为了换取和平，宋廷的一班君臣是什么齷齪事都干得出来的。

当然，岳飞因为念念不忘抗金大业，反对和议，也曾得罪秦桧，被秦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是秦桧积极谋害岳飞

的重要原因。官修《宋史》即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但这只能是非决定因素，对位高权重的岳飞的生杀予夺，不是秦桧所能决定的。

综上，岳飞的悲剧其实可以划分为前后互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高宗对武将的猜忌，由于秦桧对异议者的憎恨，更重要的，是由于岳飞性格上的弱点与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了君臣之间关系的貌合神离。加之岳飞坚持抗金立场，反对妥协议和的决绝态度，与高宗的既定路线相违背，为清除议和道路上的障碍，高宗用阴谋剥夺了三大将的兵权。但这还不是导致岳飞之死的决定因素。待至绍兴十一年，宋金双方紧锣密鼓准备媾和的时候，岳飞的悲剧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金方提出“必杀岳，始可和”的条件，又因为高宗君臣担心岳飞作为反对议和、坚持抗金的一面旗帜，终究会威胁议和，终于下了杀害岳飞的决心。

梃击案：晚明政局的一个标本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五月初四的黄昏，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刑事案。《明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五月，己酉酉刻，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使朱雄等收系。”

这样一件案子没有任何危害后果，发生在今天，顶多是由治安警察来处理。但慈庆宫居住的是当朝太子、后来的泰昌帝朱常洛，事关帝国继承人的安危，那就是惊天大案了。史称“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是观察、剖析晚明政局的一个绝好标本，它既是万历朝君臣否隔、门户争斗的一种表象，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万历崩驾

后明朝政治的走向，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斗争，魏忠贤陷害东林党人士即以此案为张目；崇祯登基，给东林党人士大平反，亦以这个历史问题做切入口；满清入关，弘光朝偏安南京后，此案依然成为朝内诸臣争斗的题目。“梃击案”所起风波，直到明朝覆亡才平息。

为什么这样一个未遂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首先结合当时明朝的政局分析。万历帝已登基四十三年，暮气沉沉，常年隐居深宫不见群臣，朝廷和各地官员缺员，不能及时补充，民间的矛盾一点点积累，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君臣之间势若水火，群臣之间也各立门户。这种局面的造成固然是由王朝政治体制僵化的大趋势所致，但直接的原因是“国本之争”导致的。万历帝春风一度，临幸了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没想这位宫女中了大奖，怀孕并生出皇帝的长子朱常洛；皇帝的次子夭折，几年后他和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他想把皇位传给自己钟爱的朱

常洵，但这样违背了明朝嫡长继承的祖制——皇位继承法可算明帝国最重要的法律，若被破坏后果是灾难性的。群臣看透了皇帝的心思，通过二十余年的君臣过招，一些文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使万历帝不情愿地册立朱常洛为太子。“国本之争”中，文官集团用祖制——即习惯法来制约皇帝，是明朝中后期常见的政治生态。因为从法理上讲皇帝具有至高的权威，对臣下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为所欲为。文官集团制约皇权最后的法宝是法律解释权。因此无论在嘉靖朝“大礼议”，还是万历朝“争国本”中，文臣前赴后继，在对礼法的维护上丝毫不让步。

朱常洛虽然已有太子的名分，但地位不稳。一旦他意外身亡，皇三子朱常洵继位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此案发生后，朝廷许多大臣怀疑是一起由郑贵妃和其兄弟郑国泰策划的谋杀案——因为太子身亡，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是最大的

获利者，自然也就成为许多人心中最大的嫌疑人。至今警察破案还是循此思路。可刑部初审，拿出的结论是：这个叫张差的凶犯是疯癫者，因为在老家受到了刺激，来京上访，闯入慈庆宫。

但刑部主事王之寀等一些文臣认为这是替背后指使者开脱，力主要查个水落石出。他先通过预审掌握一些证据；再在一些大臣的力主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共十三个司局近二十名官员一起公审案犯。据张差交代，在朝阳门外刘成家的大宅院里，太监庞保、刘成养了他三年，送了他金壶、银壶各一只，并让他打上宫门，打了小爷便有吃有穿——小爷，是宫内太监对皇太子的称呼。

此时真相开始显露了，如果顺藤摸瓜查下去，证实郑贵妃伙同外戚要谋害太子，万历帝再宠爱郑贵妃，恐怕也不好偏袒。此时，最害怕真相的是皇帝。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案子牵扯到太子、贵妃和皇帝，这将太子和皇帝、贵妃

的矛盾摆到天下人面前，这将带来多大的危机！大明最高当局可能会发生地震，以当时大明文臣党派林立、攻讦为常的习气来看，不知有多少人会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大明朝廷从此永无宁日。而万历帝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皇帝，来日无多，他可不想在混乱中交班。

可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他才不考虑这个层面的问题，他们只想索真相、求公道，尤其是言官，就是靠这个博得声名的。于是皇帝只能亲自出面，召见太子，并让内阁大臣方从哲以及其他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见证——万历久居深宫多年，此番走到台前，说明他是何等的重视。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不就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同时，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孙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然后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心里有什么话当着群臣全说出

来。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太子心领神会，马上表态说，那个疯疯癫癫的案犯要马上处决，不能再拖了。并对众大臣讲，我们父子十分亲爱，你们外臣议论纷纷，如此只能使他们成为无君之臣，使我成为不孝之子。

当事人都这么说了，这案子哪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必要。皇帝谕示刑部，明确给案子的处理定调，说张差是个疯疯癫癫的奸徒，闯入东宫伤人，罪在不赦，立即处决。太监庞保、刘成严加提审，明确定罪，不许牵连他人。

梃击案和妖书案一样，真相让位于政治稳定。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任何一个政治问题，最后会演变成司法问题。而在明朝的中国，司法问题往往如此演变成政治问题，最终的解决方式遵循的不是司法模式而是中国式的政治手段。但这种换来的稳定只能是暂时的，万历帝利用皇权

强行平息下来，可在他死后，果然这案子一再被翻出来，引发政局动荡。牺牲真相得来的政治稳定从来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稳定。

顺治皇帝出家迷雾

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顺治皇帝，于1661年驾崩时，还不满24周岁。

正当盛年的顺治皇帝突然驾崩，不免令人生疑。很快，另一种说法就在民间流传开来——顺治皇帝实际上并没有“驾崩”，在他的清东陵孝陵中，只有一副空棺，而真正的顺治帝，却是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了。

关于“顺治出家”的传闻，从一开始就甚为流行，后来又不断地被“添加”新的“内容”和“证据”。

一、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的《清凉山赞佛诗》有“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相传就

是隐喻董鄂妃去世后顺治皇帝因过度伤心而看破红尘、“西行”到清凉山（五台山）出家的故事。

二、据说顺治皇帝的儿子玄烨也就是康熙皇帝后来六次西巡，其中有五次都去了五台山，其目的就是为了去寻找和探望父亲。

三、“庚子之变”时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狩”（逃难）至五台山，五台山和尚找出了许多贵重的器皿来招待他们，而这些器皿都是宫廷的御用之物。由此有人猜测，这些御用之物可能就是顺治出家时带到五台山来的。

四、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在北京西山见到的一首题板诗，此诗出语真率，不事雕琢，口吻很像传说中念断凡尘、弃江山社稷于不顾的顺治皇帝，例如“我本西方一衲子，因何流落帝王家。十八年来不自由，江山坐到我时休。我今撒手归山去，管他千秋与万秋”等（《翁同龢日记》）。

要说以上这些证据，仔细考究起来似乎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而，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就是在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中流传到现在，还不断地被写入小说、剧本，搬上电视。其实，谜之所以会成为“谜”，主要还在于事情本身的扑朔迷离。如果考察顺治帝的生平，他的确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强烈的想要出家的愿望。

“顺治出家”因由之——热衷佛教借此解压

顺治帝接触佛教大约是从他亲政之后开始的。顺治帝登基时只有5岁，国家大事由其叔父摄政王多尔袞管理。1650年，多尔袞去世，12岁的顺治帝开始管理朝廷大政。亲政后的第二年，顺治帝认识了禅宗高僧别山法师。

据河北遵化景忠山的许多碑文记载，这一年，顺治皇帝因围猎来到此山，得知山上“知止

洞”内有一位别山法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9年，非常敬佩，便上山探望。别山法师出知止洞迎驾，“对诏称旨”，顺治帝龙颜大悦。顺治帝回宫后即在西苑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园，供其修身参禅。但别山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园后，就拒绝了顺治皇帝的好意，依然回景忠山修炼。

虽然没有将别山法师留下来，这件事却给顺治帝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惊喜地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出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家人，并且对他们清心寡欲、不被俗务缠身的生活方式心生羡慕。此后，顺治皇帝对佛教的兴趣日益浓厚，一批又一批的佛教高僧被请入万善殿，比较重要的有：

憨璞性聪。其长于辞令，对答如流。比如，顺治皇帝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憨璞性聪答：“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

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姓，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顺治皇帝听后龙心大悦。

玉林通琇。传说中顺治帝的法号“行痴”就是他起的。

木陈道忞。据说顺治皇帝曾对他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窗明几净，辄低回不能去。”又说：“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帝对佛教越来越认同，他开始相信，自己的九五之尊，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将在何处立命尚未可知，只有虔诚地参禅悟法，才能脱离生死轮回、苦海无边的命运。

顺治帝之所以会对佛教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甚至多次表示要出家，和他对自己的现世生

活状态不满有着很大的关系。

顺治帝的童年并不幸福。先是过早地失去父爱，“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接着，在还不懂得权力为何物时他就成了天子，除了要遵守种种宫廷规矩不得自由，更重要的是整个童年时期都生活在叔父多尔袞的阴影之下，这些阴影的影响之深，从他亲政之后追论多尔袞的十大罪状、籍没家产、掘墓鞭尸等行为可见一斑。

亲政后的顺治帝仍然说不上幸福。皇帝要管理庞大的帝国，即使对成年人也堪称重荷，更何况顺治当时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朝政方面，顺治帝想要有所作为却总是阻力重重，他雄心勃勃地打算纠正清军入关之初因过度杀戮引起的满汉仇恨，比如在一定范围内重用汉臣、停止圈地，还为崇祯皇帝修建了陵墓等。可惜，大多数满洲贵族，特别是他的长辈们并不买这个账。往往为了推行一点点“新政”，顺治帝就要和他们

进行长时间的纠缠，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而他的家庭生活也称不上愉快。从政治需要出发，顺治帝先后娶了两位来自孝庄太后娘家的博尔济吉特氏皇后，第一位皇后生性骄纵善妒，顺治帝忍无可忍废了她，第二位皇后庸碌无才，也与顺治帝无法匹配。后宫其他妃嫔，也少有出色的。

在家庭不幸、政务繁杂等多重压力下，这位少年天子产生避开凡尘、遁入空门的想法也就成了容易理解的事情。而接下来的这个打击，使顺治皇帝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避开凡尘、遁入空门的念头更加强烈，那就是他的爱子以及这个爱子的生母——宠妃董鄂妃的相继去世。

“顺治出家”因由之——董鄂妃最后一根稻草

关于这位顺治帝挚爱的女子，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董鄂妃是秦淮八艳之一的董小宛，曾经是名士冒辟疆之妾，清军南下时被掳进入宫廷，被顺治帝宠爱。但此说早被公认为是错误的——有多个证据表明，董小宛与董鄂妃，根本就是两个人。董小宛比顺治帝大13岁，当她在28岁去世时，距离史书记载的顺治帝迎董鄂妃入宫的时间，还相差很多年。“二董”之所以会被讹传为一个人，主要是因为她们名字的开头都有一个“董”字，而实际上，董小宛的董是能被拆成“千里草”的汉字，而董鄂妃姓“董鄂”，是满语的译音。

董鄂妃虽不是董小宛，但她来到顺治帝身边，也是充满了传奇。当时与顺治帝交往甚密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回忆说：“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

光。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

顺治帝从“满籍军人”那里夺来的、并封之为贵妃的这个女子就是董鄂氏，而这位“满籍军人”，有专家考证是顺治帝的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也就是说，董鄂氏一开始是顺治帝的弟媳妇。那么董鄂氏又是怎样成了顺治帝的妃子呢？正史里当然不会详细记载，不过其经过可能和汤若望的叙述差不多：由于清初有命妇轮番入宫侍奉后妃的制度，董鄂氏有机会常常出入后宫。婚姻不幸的顺治帝很快与这位弟媳妇擦出了火花，双双坠入情网。接下来，就发生了顺治帝为董鄂氏出气打襄亲王耳光的事。不久，襄亲王忧愤而死（疑为自杀）。襄亲王死后两个月，顺治帝便正式封董鄂氏为贤妃。

顺治帝夺弟媳为妃，今人看来有悖道德，但是入关之初的满人还保留着不少游牧民族的旧

俗，兄纳弟媳在他们看来算不得一件多么大的事。而顺治帝，多年在家庭中郁郁寡欢，终于得一意中人在身边，可说是喜不自胜。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被册立为贤妃后不到四个月，就越级被册立为皇贵妃，可算是坐火箭升天的速度了。更出格的是，顺治帝还特地为册立皇贵妃一事大赦天下，除十恶不赦死罪及贪官污吏外，俱减一等（《清实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不久，董鄂妃为顺治帝生下一位皇子，虽然是第四个儿子，顺治帝却为此再次大赦天下，并且在诏书中称他为“第一子”，大有想要将来传位于此子之意。凡此种种，可见顺治皇帝对董鄂氏是多么的钟情了。

在现存的清宫画像中，找不到一张董鄂妃的画像，因此，她是否有着倾国倾城之容，就只能由人们去自由想象了。不过，顺治帝如此倾心于她，似乎不仅仅因为容貌。董鄂妃死后，顺治帝

曾亲自撰写洋洋洒洒几千言的《端敬皇后行状》。在顺治帝对董鄂妃的描述中，他说得更多的是她的善解人意、贤达善良。对顺治帝的衣食住行、生活小事，她无不留心、嘘寒问暖，还和顺治帝讨论佛法经义、适度地规劝顺治帝在处理朝政时不要急躁；对孝庄太后、对第二位被“晾”在一边的孝惠章皇后，她都曾经在她们生病的时候衣不解带、几天几夜地侍奉；对比她地位低的嫔妃甚至奴仆，她也从不曾疾言厉色，而是处处为他们着想……

可以想象，对朝政充满烦恼、家庭充满苦闷的顺治帝来说，董鄂妃不仅仅是个红颜知己、可意人儿，更有着类似于精神支柱的意味。然而红颜天妒，不但董鄂妃所生的儿子不满百日就夭折了，两年后，董鄂妃也在22岁的妙龄之际香消玉殒，给顺治帝留下了无穷的哀思。而朝廷传出顺治帝驾崩的时间离董鄂妃去世仅四个多月，不由得使人相信，顺治皇帝因为爱妃的去世而万念俱

灰、遁入空门。

然而，从常识上说，有出家的动机，不等于有出家的事实。顺治是否真的出家，还得用史实说话。

我们首先来分析民间传说中顺治出家的“证据”。

（一）关于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的问题。这首诗虽然是暗写顺治帝与董鄂妃之间生离死别的，但其中的一些句子所指尚不明确，不能成为顺治出家五台山的证据。更何况吴诗“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一句反而是顺治未曾出家的一个佐证。房星，就是二十八宿中的房宿，“亦曰天驷，为天马，主车驾”，“房星未动”，应该是指天子的车驾还没有出发，而这两句的大概意思就是，顺治帝还来不及离宫出家，就死去了。

（二）关于康熙帝五台山寻父及御用之物的问题。康熙皇帝第一次巡幸五台山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也就是宫中传出顺治帝去世后的第二十二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康熙皇帝巡幸五台山并不是为了去寻找父亲的，否则何不早去，而要等到二十二年之后呢？至于五台山上的御用器物，很可能是康熙帝为了生活方便而从皇宫带去的。

（三）关于翁同龢日记里记载的那首题板诗，其口气的确酷似顺治帝，似出自顺治本人的手笔。但该诗为何等到顺治皇帝已经去世二百多年的清末才被发现，这一点大有疑问，因此，不能轻易断定为顺治帝所作，反而有可能是出于好事者的伪托。即使今后有证据证明诗是真的，也只能说明顺治帝有出家之心，不能说明他有出家之实。

实际上，根据可靠的史料，顺治帝确实有出家之心，但出家未遂。朝廷当然对此讳莫如深，

但是在与顺治帝关系非常密切的僧人著作、年谱里都有详细的记载，虽出于几本不同的著作年谱，但提及此事的时间、地点等尽皆吻合。

董鄂妃去世后，顺治帝痛不欲生，本来是决意要披缁山林的。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月，也就是董鄂妃去世一个多月后，顺治帝在西苑万善殿让茆溪森禅师为他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兹事体大，孝庄太后急忙派人将茆溪森的师傅玉林通琇召到京城，请求他规劝顺治帝不要出家。玉林通琇能言善辩，却劝不转顺治帝。据说，最终玉林通琇想出一招杀手锏，命人取来干柴，要当众烧死自己的弟子茆溪森，顺治帝不忍，才不得不放弃出家的念头，蓄发还俗，也就是说，出家未遂。

顺治死因

如前所述，顺治帝最终没能完成出家为僧的愿望，正史中关于他宾天的记载是可信的。至于他的死因，根据一些比较可靠的私人记载，很可能是死于天花。

顺治帝病危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奉命起草《遗诏》。王熙在《自撰年谱》中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其中提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子夜，顺治帝召王熙至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五内崩摧，泪不能止，奏对不成语”，强忍住悲痛草拟了一份《遗诏》，三次进览，三蒙钦定，至初七日傍晚才最终定稿。当夜，顺治帝就宾天了。

另外，曾为顺治帝撰拟董鄂妃祭文的兵部督捕主事张宸在《青瑀集·杂记》中也有类似的记录：初五日，见宫殿各门所悬的门神、对联已经全部撤去，又见皇帝贴身太监向各大臣耳语，神

色仓皇。初七日，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勿炒豆，勿燃灯，勿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也可以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

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的传记中也记载：“如同一切满洲人一般，顺治对于痘症有一种极大的恐惧，因为这在成人差不多也总是要伤命的……或许是因他对于这种病症的恐惧，而竟使他真正染上了这种病症……顺治病倒三日之后，于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间崩驾。”（魏特《汤若望传》）

还有一条旁证。顺治帝去世后，在考虑继位者时，在汤若望的建议下，孝庄太后最终选定了玄烨，理由之一是玄烨已经出过天花。（魏特《汤若望传》）可见，顺治帝因患天花而英年早逝，是如此震动着最高统治者的心扉，影响着他们的决策。

顺治帝最终没有实现想要出家为僧的愿望，而是不幸地死于天花恶疾。幸运的是，两年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将顺治帝与董鄂妃合葬在了孝陵（一起合葬的还有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对于顺治帝这位多情天子来说，能同心爱的人“死而同穴”，大概也可以安息了。

雍正暴崩之谜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圆明园的九州清晏突然死亡，时年58岁。据官方记载，雍正去世前几天，八月十八日在圆明园与大臣议事；八月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都属于正常办公；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发病（“上不豫”），但仍然照常办公，接见一些官员；八月二十二日突然病重，急忙召见宝亲王弘历（皇四子）、亲王弘昼（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等，宣布传位于弘历；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子时）之间死亡。

当时著名文人袁枚为雍正临终之顾命大臣鄂尔泰写的行状，则与官方的说法有所不同。鄂尔泰为雍正最倚信的大臣之一，常奉令值宿宫中，

随时听令。根据袁枚记录，八月二十三日雍正临终时，身边的顾命大臣仅有鄂尔泰一人，其他人，不管是皇子、宗亲、重臣，当时都不在圆明园。雍正驾崩后，鄂尔泰连夜携带遗诏从圆明园奔还城内的紫禁城。因深夜里仓促间找不到马，他只好骑上一头运煤的骡子奔回，拥弘历即位。之后他又留于宫中帮助新皇帝处理大事，七天以后才得以出宫。出宫时人们惊异地发现，鄂尔泰裤子上染有一片血迹。根据鄂尔泰自己的解释，这些血迹是那天骑骡子时不小心磨破大腿而留下的，他自己竟不知道。

雍正虽然“暴亡”，但是皇位的传承倒没有出现问题。依雍正遗诏，弘历顺利继位，就是乾隆皇帝。因为雍正吸取康熙时“九子夺位”的教训，事先已经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将自己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后面。为了便于对证，还在圆明园内“拷贝”了一份同样内容的遗嘱，密封起来，雍正去

世后也找了出来。然而，负责宣读遗诏的鄂尔泰却如此狼狈，不得不亲自骑着骡子从圆明园奔回紫禁城，慌得连裤子染血都不知道，让人怀疑其中必有隐情。

鄂尔泰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宫中七天七夜？他裤子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野史传言，雍正是被刺杀的，鄂尔泰看到了被人割去脑袋的雍正；他留在宫中七天七夜是为了处理无头（或身首异处）的雍正这样棘手的事情；裤子上的血迹未必是骑骡受伤留下的，沾的可能就是雍正的血。

被吕四娘刺杀

雍正之死的真正原因，始终是被层层神秘浓雾掩盖的历史之谜，历来猜测颇多。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被人刺杀之说，而刺杀雍正的人，竟然是

一位武艺高强的奇女子——吕四娘。这要从雍正朝的一起案件说起。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有个叫曾静的读书人，让他的学生张熙给当时的川陕总督、清军名将岳钟琪送了一封信。曾静在信中说岳钟琪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而清朝则是“金人”的后代，劝岳钟琪起兵反清，恢复汉族王朝。岳钟琪向雍正告发了曾静、张熙。雍正大怒，将二人逮捕至京，追查幕后主使及消息来源。据曾静交代，他的反清思想是读了吕留良的著作而产生的。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学者，“曾静事件”发生时已去世四十多年，但他的门生故旧不少，子孙尚在，而且他的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吕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十分强烈，并用传统的“华夷之辨”来论证满族统治的不合理，认为满族是夷狄，非我族类，因而搞清华夷区别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雍正认为曾静、张熙是误信邪说，认罪态度较好，特予释放（雍正死后，二人均为乾隆所杀）。雍正对曾、张二人网开一面，但是对吕留良一家及其门生则处理得很重。当时，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都已经去世，雍正还令人开棺戮尸、梟首示众。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还要戮尸梟示。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则被处斩。其他的吕氏门生以及刊刻、贩卖、私藏吕氏著作的人，或斩首，或充军，或杖责。吕氏及严、沈三族妇女及幼丁发给功臣家和关外披甲人为奴。

曾静、吕留良之案是雍正朝的一桩著名大案，影响极大。在雍正还活着的时候，“吕氏孤儿”的传言就在流行。至于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至少有三个版本。

一说当年诛杀吕氏家族时，吕留良之子吕葆中的女儿，即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乳母的帮助

下漏网逃生，只身北上京城，决心刺杀雍正，报全家惨遭屠戮之仇。由于连日奔波，年少体弱，吕四娘昏倒在河南洛阳白马寺山下，被一高僧救下。高僧乃江湖豪杰甘凤池，因遭到雍正的通缉才隐匿出家当了和尚。四娘于是拜甘凤池为师。四年后，四娘告别师父，来到京城，摸清了雍正寝宫的路径，翻越宫墙，混进宫内。入夜时分用蒙汗药麻翻了雍正，割下首级，离宫而去。在第二个版本里，吕四娘的“师父”变成了一位抗清志士虬髯客（《十叶野闻》）。第三个版本，吕四娘则是和一位道士学的剑术（《清季野史》）。

这些传说越传越奇，情节也愈来愈曲折，见诸于稗官野史，还被写成了小说，拍成了电影电视，渲染得有声有色。

迄今为止，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则是，吕四娘刺杀雍正纯属子虚乌有。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此事，其观点主要是：第一，吕留良案发后，吕氏一门

不大可能有漏网者。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曾就“吕氏孤儿”一事，询问负责此案的浙江总督李卫。当年七月，李卫就此奏复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均已严行看管，连吕家的墓地也被严密监视起来。李卫是雍正的亲信，而且向以善于侦缉闻名，不至于对雍正敷衍塞责，因此，吕氏后人恐无漏网的可能。第二，雍正死于圆明园，这里虽然是一座离宫，但因为雍正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此居住，所以护卫森严，绝不可能像小说、电影中所描绘的，一个女子能飞檐走壁轻易潜入寝宫，砍去皇帝的头。

“雍正被刺”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流行，也算事出有因：清廷以满人统治，始终难以泯灭汉人的反抗之心，所以对满洲皇室，不免掺杂某些民族情绪。而在清代皇帝中，雍正的名声最差，在位期间社会上就广泛流传着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项大罪”，因此，将他作为攻击满清统治的典型，是很合适的。在清初五大谜

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雍正暴崩”“乾隆身世”中，后三个都与雍正有关。人们出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心理，希望雍正不得好死。因此，也就有了这么多不同版本的刺杀雍正的故事。

雍正死于“他杀”的说法均可以排除。那么，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史学工作者通过对清宫档案的深入广泛研究，普遍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最大。

死于丹药中毒

最早提到雍正之死与修炼丹药有关的，是金梁的《清帝外纪》：“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美国学者恒慕义在20世纪40年代即指出：“胤禛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

物，导致他的死亡。”杨启樵也推断雍正“死于丹药，也许不算武断。”冯尔康也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情理处。”杨乃济则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论述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的说法是客观、可信的。李国荣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撰写了《雍正与丹道》一文，详细地论述了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极大。一些医学工作者也认为，雍正死于“过度养生”——企图以炼丹修道来恢复健康，却反受其害。

中国道教的长生不老术，可谓源远流长。汉武帝、唐太宗、唐德宗等多位皇帝都曾有过访求“长生不死药”的故事。

雍正早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对修道感兴趣。在康熙诸皇子的“夺位大战”中，迷信天命的胤禛曾嘱咐前往福建任知府的谋士戴铎寻访高明的道人。戴铎果然在武夷山找到了一位“语言甚奇”的

道人，并请他为主子胤禔算命。道人算出了一个“万”字，让胤禔振奋不已，从此对道士更有好感，经常与道士参修论道。他还自称“圆明居士”，作《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将自己的名字排列在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大师之后。

雍正即位后的最初几年，可能因为要忙的事实太多，所以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六年的这段时间，从史料中很少发现雍正炼丹修道的痕迹。

雍正七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好几个月，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甚至将自己在圆明园秘藏传位诏书的事情悄悄告诉了张廷玉和鄂尔泰，似乎对后事都作了安排，幸好在御医的调治下闯过了鬼门关。

雍正八年二月，雍正又生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保命，他开始大规模地向各地征访名医术士。雍正的心腹、浙江总督李卫推荐了一位有“神仙”之称的道士贾士芳。贾士芳入宫后手到

病除，颇见奇效。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多月后雍正突然下令将贾士芳下狱治罪，最终“斩立决”。据说是因为经贾士芳调治之后，雍正的病情还有所反复，时好时坏，后来雍正感到自己被这个“异人”耍弄了，“伊（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

但杀了一个贾道士，不等于雍正就从此不信道士了。不久，又召江西龙虎山的高道娄近垣入京。娄近垣在御花园内设坛礼斗，以符水治疗，雍正果然病愈，还于雍正十一年喜得儿子弘瞻。娄近垣自然备受恩宠，被雍正赐以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主持之职。龙虎山道观也沾了娄近垣的光，得库银一万余两，大兴土木，焕然一新。

雍正十二年，娄近垣奉命回龙虎山督造道观。宫苑内的修道之事由张太虚、王定乾主持。张、王二人与娄近垣不同，更注重于“炉火修炼”，以金丹大药来给雍正治病，企图达到延年

益寿的效果（姜近垣可能也用丹药，但比较谨慎）。可能就是这两个人炼的丹药，最终让雍正送了命。

为皇帝炼丹当然是绝密事件，在官书正史上没有记载。但研究人员仍通过清宫秘档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据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活计档》记载，在雍正八年冬天，运入圆明园4000余斤木柴煤炭和矿银等物，开始在园东南角的秀清村为雍正开炉炼丹。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熄灭。从雍正九年到十三年，雍正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个月两三次。累计动用黑煤192吨，木炭42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炼丹必备的矿产品以及其他相关物件。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由此炼成。雍正服后，感觉良好，还拿出少许丹药赏赐给出征将士。

就在雍正死前的12天，又有200斤黑铅运入圆明园。黑铅是炼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致人死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常年服用丹药，毒素早已渗入到五脏六腑，但很可能就是这200斤黑铅，最终让雍正毒发而亡。

雍正暴崩后的第三天，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便发布一道上谕，下令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在宫苑中炼丹的道士全部驱逐，令其各归本籍，告诫他们对宫中及先帝的一言一行，不准在外谈起，如有违反，绝不宽贷。并特意强调，先皇雍正喜好“炉火修炼”，仅是作为“游戏消闲之具”，对炼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作为新天子，万机待理，为何要这么急迫地专门发布上谕将这些道士赶走？且还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作一番辩解？合理的解释是，正因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乾隆恨不得将怂恿父亲吃丹的道士碎尸万段，只是热丧期间不宜杀人，且要顾及皇家体

面，不便公开将他们公开处死，只好一赶了之。

其他死因说

关于雍正之死，除了“丹药中毒说”外，还有若干种其他说法。

1.“累死”说

雍正虽然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了帝位，但从他上台后的政绩来看，他还算是中国历史上政绩最为突出的君王之一。作为“康乾盛世”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举凡国家政制、吏治人事、财政赋役、军事战略、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无巨细，雍正都躬身规划，建树颇多。要处理这么多的政务，雍正的“勤奋”的确非常人可比，经常白天亲政、议政，夜晚批览奏章。所作批语，少则数十字，多达一千多字，且“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

侧。”后来，雍正挑选自己朱笔批阅的奏章7000多件，陆续编成360卷的《朱批谕旨》。而实际上，雍正亲笔朱批的奏折远不止这些，总数有数万件之多。经常熬夜和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可能是导致雍正患病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

2.“春药致死”说

雍正曾说自己“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大义觉迷录》）这种自我表白未必可信。雍正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事情太多，政敌无数，还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称职的皇帝，所以才做出不好色欲、自我节制的样子来。可雍正七年之后，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政敌也摆平了，制度也理顺了，相对于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与之有关的病症也随之暴露了出来。有史料可考，雍正的后宫从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有二十几人，可能还有一些隐

在后面“没名分”的。考虑到雍正在位的时间才十三年，实在不能算是“甚少”。为了应付这么多妻妾，使用“春药”一定必不可少，不排除雍正因过度服用“春药”而被“色杀”的可能。朝鲜有一本书叫《承政院日记》，是朝鲜使者写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书里记载“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当可作为雍正死于女色的一条重要佐证。

3.“人参补死”说

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宫廷医疗档案，其中医案《人参底簿》的记载，反映了清宫中大量食用人参的习俗。雍正十年五月雍正移居圆明园，至年底的7个多月时间里，皇家内廷共使用人参800多斤；雍正十三年《太医院用人参药档》载，宫廷用掉的人参达230斤。按照惯例，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是专门供皇帝、太后和皇后三人食用或是配制御药之用的（清宫所用的四等参如今已十分少见，五、六等参相当于今天的

一等野山参）。雍正本人到底食用了其中的多少好参，无可稽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食用人参的数量一定是很惊人的（雍正的父親康熙特別謹慎，一般不用人參補身，但雍正嗜好人參）。這是不是造成雍正死亡的主要因素？也值得懷疑。

4.“中風或其他不明病症致死”說

著名清史學者鄭天挺在《清史簡述》中曾提到雍正中風而死，但沒有詳述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這個論斷還需用史料來作進一步證明。但從現代醫學的角度講，一個表面上健康的人，因心臟病、腦溢血、中風等疾病瞬間喪命是完全可能的。雍正之所以暴崩，有可能得了這几种病的一種或多種。

此外，從史料上看，雍正一向患有嚴重的“畏暑病”。在朱批中，常因天氣太熱而自嘲“字畫潦草”“可笑之極”等字樣。為了不影响正事，他

还让人制作了许多机械台扇，以便在盛暑时使用。雍正后来得病，很可能与他酷暑贪凉有关。另一方面，雍正同他的祖上不同，不爱运动，深居简出，很少参与骑射狩猎活动。从故宫所藏的雍正画像上看，他年轻时尖嘴猴腮，但晚年时明显发福，可能也与他不爱锻炼、缺乏正确的养生之道有关。这就使他体质虚弱、难以抵挡病魔的侵袭而毙命。

5.“综合死因”说

雍正之死，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他多年勤政，体力透支，且因惧怕报应而长期心神不宁、夜不能寐；二是常年服用丹药、体内大量积毒；三是过度的人参进补，反受其害；四是性生活没有节制，淘空了身体，靠春药支撑而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伤害；五是不爱运动，抵抗力差……可能还患其他疾病，这些综合因素造成了雍正的猝死。

乾隆身世之谜

乾隆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福气的皇帝之一，当了60年皇帝，活到了89岁。他在位期间，大清帝国经过其祖、父辈近百年的努力，根基稳固、欣欣向荣，正处于中国古代史上少有的持续的“盛世”时代。在他的治下，清朝取得了文治武功的成就，终其一生，鲜有不顺心之处，所以晚年自诩“十全老人”。但是，二百多年来乾隆的身世一直没有个明确清晰的说法，他出生在哪里，他的亲生母亲到底又是谁？

这还要从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说起。

千里追《遗诏》

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农历七月二十五

日，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外出打猎时在承德避暑山庄猝然崩逝。随扈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匆匆忙忙拟写了一份《遗诏》，经刚继位的道光皇帝过目后，誊抄多份发往全国各地以及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然而没多久，朝廷又下令追回所有《遗诏》，并且特别指示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将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错诏”截留封存。很快，修改过的“新诏”又重新发出，而“错诏”的草拟者托津、戴均元等人则被开除了军机处。

让道光帝如此兴师动众、大费周章的两版《遗诏》，区别主要在一句话，它在“第一版”中是：“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溱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皇考（乾隆）即降生避暑山庄，予复何憾？”而在“第二版”中，这句话改成了“古天子终于狩所，盖有之矣，况溱阳行宫为每岁临幸之地，我祖（雍正）、考（乾隆）神御（画像）在焉，予复何憾？”两版《遗诏》相

比，“第一版”提到避暑山庄是乾隆的出生地，而“第二版”则“删除”了这种说法，修改为避暑山庄里有乾隆和雍正的画像。

如果时间往回推十几年，我们会发现道光帝的父亲嘉庆帝也曾为同一件事“纠结”过。1807年（嘉庆十二年），嘉庆帝在审阅朝臣编修的记载乾隆帝言行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时发现，这两部重要的文献典籍都把乾隆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雍和宫原为乾隆的父亲雍正为雍亲王时的王府，雍正继位后将王府赐给了藏教喇嘛当作寺院，改称雍和宫），当即命令编修大臣就此进行核查。负责这两部典籍编纂工作的刘风诰提供了此说的依据——乾隆自己做的诗，而且不止一首。其中一首是乾隆在瞻仰祭拜雍和宫后做的，其中有一句“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人日”指的是正月初七，这句诗的意思是：我（乾隆自称）正月初七这天到雍和宫祭拜，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在另外几首诗

里，乾隆也一再说自己诞生在雍和宫，甚至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雍和宫的东厢房。

乾隆亲自写下的诗，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写下的很多首，“当然”是证明编纂人员并没有搞错的最佳证据，嘉庆最终也认可了。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清高宗实录》和《清高宗圣训》中关于乾隆帝的出生地是这么写的：“……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乾隆）于雍和宫邸。”

这件事虽然以嘉庆认可“雍和宫说”而结束，但是总透着奇怪。先说乾隆，按说一个人关于自己的出生地，是不太会去大肆宣扬的，因为这不过是一个与生俱来的事实而已。可乾隆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自己出生在雍和宫，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或者说生怕别人搞错。而嘉庆呢，一开始却是对“雍和宫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呢，是他一向认定乾隆是出生于避暑山庄的，而且也是有诗为证——嘉庆自己写的诗。

乾隆在登基满60年的时候“退休”，把皇位让给第十五子琰，也就是嘉庆皇帝，自己则当起了太上皇。嘉庆刚登基的前两年，“太上皇”两次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都陪着去了，并且写诗祝寿。这两首诗后面的注解里都记录了同一个信息——嘉庆的曾祖父康熙在辛卯那年肇建了避暑山庄，而他的皇父乾隆也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也就是说，早在嘉庆帝让大臣们核查乾隆出生地之前十多年，他就已经对“避暑山庄说”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只是后来发现“皇父”乾隆一再强调自己出生在雍和宫，才不得不“改口”。不过，就仿佛一个人一直在努力严守一个秘密，却在最后的时刻说漏了嘴似的，嘉庆在弥留之际终于没坚持住，冒出一句：“我皇考即降生避暑山庄”。

嘉庆帝说漏嘴的地方，由他的儿子道光帝“千里追遗诏”及时弥补上了，这似乎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一件本来不算事儿的事儿，被

这祖孙三代一再地强化，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好奇，从而催生了有关乾隆身世的各种民间传说。

“草房诞子说”

早在乾隆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写诗说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而且地点非常具体：狮子园。

狮子园是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小园林，因背靠一座形状像狮子一样的山峰而得名。康熙去避暑山庄时常有皇子随行，不过皇子们不住在山庄里面，而是住在山庄边上的临时性园林里，狮子园就是康熙第四子雍亲王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随驾期间的临时住处。狮子园中有一处不起眼的房屋，名为“草房”，匾额上的“草房”二字为雍正御题。乾隆继位后，曾多次“驾临”“草房”，写下数十首以“草房”为题的诗作。一个地位尊贵的帝王，为什么对一间毫不起眼的“草房”情有独钟？

难道仅仅是为了“缀景”和“示俭”？于是有人猜测，乾隆可能就出生在这里！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么一个不体面的地方，又和雍正的一段传闻有关。

传说雍正还是亲王的时候，一年冬初在木兰围场打猎，射倒了一只梅花鹿，他当即叫人把鹿宰杀，大口喝起鹿血。鹿血有很强的壮阳功能，雍亲王喝后难以自持，就随便拉住避暑山庄行宫里一位很丑的李姓汉女发泄了一番。事后，雍亲王把这段露水姻缘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秋中再来，李姓汉女已经大腹便便。康熙偶见此女，大为震怒，经过追问，才知道是四阿哥雍亲王干的。康熙正在大骂雍亲王“下流种子”的时候，那位李女马上就要临产了。为了不让她污褻行宫，康熙就指着一座马厩让她入内分娩。这个马厩是用干草搭的，倾斜不堪，而“临御中国六十年、为上皇者又四年之十全功德大皇帝（乾隆），竟诞生于此焉”。

最早将这一“秘闻”落在文字上的，是1944年5月在《古今文史》（半月刊）上刊登的《清乾隆帝的出生》一文，作者叫周黎庵，是根据晚清遗老、曾做过热河都统幕僚的冒鹤亭的口述写成的。台湾学者庄练（苏同炳）的《乾隆出生之谜》和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清朝的皇帝》，都采用了这一说法，甚至指出李姓女子的名字叫李金桂，因为她“出身微贱”，所以康熙下旨让胤禩府里的格格（低级侍妾）钮祜禄氏收养这个男孩。庄练还提出了三条史料，作为旁证。

一是《清圣祖（康熙）实录》第二百四十七卷载，康熙五十年（1711）七月，雍亲王专程赶赴热河向皇父康熙请安。根据时间推断，这正是那个李姓女子临产之前。康熙之所以要把雍亲王召到热河，是为了当面确定雍亲王就是那个“种玉”之人。

二是乾隆朝一位官至御史的管世铭有一首《扈蹕秋狝纪事诗》，诗后小注说：“狮子园为

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日临驻”，管世铭是乾隆秋猕时的随行人员，他留下的文字应该是可靠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避暑山庄说”在朝臣、亲贵的小范围内应该是公开的秘密。

三是清代官修《热河志》中专门将“草房”记入“狮子园”条目中。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为什么要将这一处不登大雅之堂的“草房”记入其中呢？

关于“草房诞子说”的“女主人公”，除了李氏女子一说外，还有“傻大姐”说、“承德贫女”说等多种说法。不论是哪一个版本，要说明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乾隆的母亲是一个汉女，乾隆有一半是汉人血统。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雍正继位前后的种种劣迹，使他树敌太多，这段“鹿血”传闻，让他的“公众形象”又降低了一层。第二，乾隆“半个汉人”的身份，则反映了当时具有“反清复明”情怀的人的一种愿

望。当然，相比“半个汉人”的说法，还有一种更彻底的、更符合汉人口味的说法——乾隆的父母都是汉人，所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汉人。

“海宁换子说”

所谓“海宁换子”，说的是乾隆本是海宁陈阁老（陈世倌）之子，他出生的时候，正好雍亲王胤禛也生了个女儿。结果胤禛“偷龙转凤”，偷偷地把女儿换给了陈阁老，而把陈阁老的儿子——即后来的乾隆留在了府里，当作自己的儿子。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晚清天嘏所著的《满清外史》中的《弘历非满洲种》，后来蔡东帆(藩)的《清史通俗演义》、钱塘九钟主人《清宫词》、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等都将“海宁换子说”大加演绎，而影响更大的，则是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书剑恩仇录》。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他从小听的就是有关乾隆的种种传说，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而展开的。书中，反清帮会——红花会的总舵主于万亭秘密入宫，将乾隆生母陈世倌夫人的一封信交给乾隆，信中详述当年经过，还说乾隆左股有胎记。金庸还虚拟了乾隆的亲弟弟陈家洛这一人物，陈家洛继于万亭之后成为红花会总舵主，在得知自己与乾隆的身世后，曾试图劝说乾隆与红花会结盟，恢复汉人朝廷，但最终失败。

金庸的武侠小说精彩纷呈，在华人世界流传极广，“海宁换子”的故事因小说的流传而广播海内外，让一般没有历史常识的读者信以为真，但事实并非如此。

野史、小说里都说当乾隆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陈世倌后，对陈优礼有加，官拜内阁大学士。乾隆朝确实有个内阁大学士叫陈世倌，但此人并没有得到乾隆帝的“优礼”，却因一次无关紧

要的出错而被乾隆帝训斥了一番，革掉了官职，一点情面都不留。如果陈世倌是乾隆帝的亲生父亲，何至于如此无情？！

更重要的是，乾隆降生时，胤禛的长子、次子虽然已夭折，但第三个儿子已经8岁，且有一个王妃已经有孕，而此时胤禛才34岁，正当壮年，生儿子的机会有的，哪有必要偷偷摸摸地用女儿去换个儿子进来。所以，乾隆是“纯种汉人”的说法荒诞不经。不过，近年来发现的一则史料，使乾隆是半个汉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最接近于真相的说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年公布了一则雍正元年初册封妃嫔的原始档案，全文如下：

雍正元年二月十四日奉上谕：尊太后圣母谕旨：侧福金（晋）年氏封为贵妃，侧福金（晋）

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裕嫔，格格耿氏封为懋嫔。该部知道。

这件档案是未经任何篡改的原始资料，其可信性和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而根据这份原始档案而修纂的《清世宗（雍正）实录》则这样记载：

（雍正元年二月）甲子（十四日），谕礼部：奉皇太后懿旨：侧妃年氏封为贵妃，侧妃李氏封为齐妃，格格钮祜鲁（禄）氏封为熹妃，格格宋氏封为懋嫔，格格耿氏封为裕嫔。尔部察例具奏。

上述两份资料有不少不同点，比如，裕嫔、懋嫔的姓氏对应错了，不过最大的不同点是：被封为熹妃的，在原始资料中是“格格钱氏”，到了《清世宗实录》变成了“格格钮祜鲁（禄）氏”。册封“熹妃”是同一天发生的同一件事，被封为熹妃的钱氏和钮祜禄氏应该就是一个人，那为什么她们在不同的记录里有着不同的姓氏呢？其实，

姓氏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钱是汉族的姓氏，清朝特别是清初，汉族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汉女哪怕入了宫入了王府，也很少有机会当上高等级的皇家嫔妃或者王爷妻妾。钮祜禄这个姓呢，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它是满洲八大姓氏之一，而且是出皇后的姓氏：前有康熙帝的孝昭仁皇后（顾命大臣遏必隆之女），后有道光帝的孝全皇后，还有实际上比西太后慈禧地位更高的东太后慈安——这些钮祜禄氏，可都是她们的皇帝丈夫在位时封的货真价实的皇后，至于清史上的钮祜禄皇妃等，那就更多了……两相比较，“格格钱氏”变为“格格钮祜禄氏”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要抬高这个女子的身份。也就是说，作为雍正第四子弘历（后来的乾隆帝）母亲的那个女人，应该是一个汉族女子，后来为了要抬高身份而改了一个满姓。

联系传说中的“草房诞子说”，至少可以做出以下几种推测：

第一，正史档案中的汉女“钱氏”，可能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汉女“李氏”，她在承德狮子园的“草房”里生下了乾隆后，被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到北京的雍亲王府里来，成了雍亲王的低级侍妾“格格钱氏”。

第二，在“草房”里生下了乾隆的确是汉女“李氏”（或其他传说中的汉女），但由于地位太低，或者像传说中说的，李氏因为长相丑陋，胤禔只想要儿子不想要她，所以在雍亲王府里给小弘历另找了一位养母——“格格钱氏”。

第三，乾隆的确是“格格钱氏”所生，而且就出生在雍亲王府。

第四，“格格钱氏”可能在康熙四十九年“木兰秋狝”时陪胤禔住在狮子园，发现怀了孕，不便带回北京，所以就留下来一直待到第二年把孩子生下来。

不论是以上哪种说法，有一点是肯定的，生下弘历的这个女人，产子时最高的身份，可能就是汉女“格格钱氏”。如果钱氏只是乾隆的养母，而其生母另有其人，那么这位女子的地位也只会比“格格钱氏”更低，有可能就是做粗活的宫女甚至宫外女子。至于“避暑山庄说”，其实是附会在“半个汉人”说法上的一个小细节，不过这个细节非常“敏感”，因为它关系到一位大清皇帝的血统是否纯正高贵的问题，所以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才会对这个说法“前赴后继”地“敏感”不已。

比较接近真实的推测是：因为汉女的身份，或者再加上本人姿色平庸，“格格钱氏”在“雍亲王时期”即使有了个儿子（不管是亲子还是养子），却也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她的儿子“子以母贱”，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也一直没有得到父亲雍亲王的多少关注。至于当雍亲王变成了雍正皇帝后，“格格钱氏”突然时来运转，一下子

从“格格”变成了“熹妃”，还改了一个高贵的姓，其主要原因应该是“母以子贵”。因为在当亲王的时候，胤禛春秋鼎盛，总觉得自己有的是生儿子的机会，所以对这个身份低下的儿子并不重视。可没想到等到他继位时，存活下来、已经长到十多岁的儿子，只有三阿哥弘时、四阿哥弘历

（即“格格钱氏”生的这一位）、五阿哥弘昼三个，即使是按照排行来算，弘历也是第二位可能的继承人。更何況，长大的弘历在兄弟辈中逐渐显示出了非凡的聪慧和优秀，越来越为雍正所看中。这么一个优秀的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皇帝的儿子，如果有一个汉族血统的母亲，说出去不太好听。于是，“熬”了20年的“格格钱氏”，终于沾了好儿子的光，改了满洲大姓、封了妃子。再后来，年贵妃和皇后相继去世，熹妃一时成为后宫地位最高的人，统摄六宫。雍正暴崩后，弘历成了乾隆皇帝，熹妃成了皇太后。皇太后高寿、健康，享尽了人生的荣华富贵，被称为“历史上最幸福的皇太后”。

引人注目的是，这位皇太后多次被“皇帝儿子”侍奉着出游，三上泰山，四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登泰山是为了皇帝“封禅”；去避暑山庄是从康熙开始的皇家传统（当然也可能和“草房诞子说”有关）；至于下江南呢，据说是为了巡视“海塘”，也就是为防钱塘江大潮成灾而修建的堤坝，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民间广为流传的“海宁换子说”。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想：乾隆四次陪太后南巡，其实是陪母亲“回家看看”。钱氏是江南大姓，皇太后的老家有可能就是海宁，也有可能是嘉兴、绍兴、苏州、杭州、南京……或是南运河岸边、钱塘江江边的某个小村镇，是不是凡南巡幸过的地方都有可能呢？这一切，都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嘉庆遇刺之谜

在清代宫廷史上，有一位皇帝差点在宫廷里遇刺，他就是嘉庆皇帝（爱新觉罗·旻，1760-1820），而且是两次遇刺，两次未遂。

第一次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自圆明园还宫（紫禁城），将入顺贞门时，突然有一个叫陈德的人持刃向他扑来，几乎遭遇不测。事过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突然有一伙天理教徒，分两队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突入宫内，其中一队一直攻到隆宗门外，被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等组织的侍卫击退。因这一年为农历癸酉年，所以史称“癸酉之变”。这次嘉庆本人不在现场，有惊无险，但“变生肘腋，祸起萧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其震撼

力是前一次所无法比拟的。

厨役行刺嘉庆

关于嘉庆第一次遇刺，《清史稿》和《清实录》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好在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的《掌故丛编》中有一套《嘉庆八年仁宗遇刺案》资料，详细记载了此案的始末。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这一天，一个叫陈德的中年男子，带着自己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从东华门混入紫禁城，然后绕到皇宫的北门神武门一带，潜伏在顺贞门外西厢房山墙的后面，看着嘉庆坐着轿子即将进入顺贞门时，突然窜出，手持尖刃，直奔嘉庆冲去。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守卫神武门、顺贞门之间的上百名侍卫，他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有

嘉庆的侄子、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駙喀尔喀亲王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蒙古喀喇沁公丹巴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6个人，还算镇定，紧急关头挺身而出，一边护卫嘉庆的轿子，一边奋力捉拿陈德。嘉庆被救至顺贞门内，但距离搏斗的地方不远，已经听到了搏斗之声，大概吓得不轻。经过一番搏斗，绵恩的褂袖被刺破，丹巴多尔济的身上也被扎伤三处。陈德寡不敌众，力竭被捉，并在陈德身上搜出讖语等物。陈德的儿子陈禄儿乘乱溜出皇宫，跑回自己家里，也很快被逮捕。

陈德被捕后，嘉庆当即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第二天又增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后又命九卿科道一同会审。经过“反复诘问，并加开导”，陈德开口招供，供词中有以下一些信息：

陈德，年四十七岁，父亲一直做男仆、跟班一类的工作，幼时跟随父亲到山东，长大后也以

做男仆为业。后因父亲去世，在山东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北京来投靠堂姐，在外甥的帮助下又找了一份厨子的工作。但后来因妻子去世，家庭负担太重被辞退。失业后的陈德求告无门，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转念一想，无声无息地自杀太不值，想死得“一鸣惊人”，于是自己“策划”了刺杀皇帝的计划——“我就同大儿子进东华门，出东西牌楼门，从西夹道走到神武门，混在人群之内，看见皇上到来，我就手持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惊驾的罪，当下必定奉旨叫侍卫大臣们把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

对于如此简单的作案动机和过程的交代，“殊出情理之外”，审案大员们当然很不满意，又将陈德“拧耳跪炼”，但陈德“矢口不移”。嘉庆得到初步的审讯报告后，当然也不满意。他认为一个失业的厨子，仅因要自寻死路就要行刺皇帝，既无主使也无同谋及帮凶，殊不可解。而

且，他又是从何得知皇帝入宫时间，又是怎样混入宫中的呢？于是，审案大臣逐一传讯或逮捕了所有与陈德有关的人，并加紧刑讯陈德，但是所获信息依然很少。

通过讯问陈德的儿子陈禄儿和他的房东黄五福，官员们得知案发之前陈德已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但仅凭这一点进展，还是难以交差。当晚，他们又派人轮番对陈德进行“彻夜熬审”，至二十二日晨，陈德已经“神气消沮”。再问他受何人指使，他的口供仍大略如前，而且说：“我实在无人主使，实在供不出来。我总是求死，所以被拿时逢人乱扎。”

至二十三日，军机处再报审案情形，似乎又有了一些进展。经反复刑问，陈德回忆说自己这几年曾做过两次梦：“嘉庆二年曾梦见有人引自己到过东宫。嘉庆三年又梦见自己躺在无水桥下，被人拉起上桥，到桥上一看，像是在一座知府大堂后头，我身上穿着程乡茧蟒袍，我就醒

了。后来读了《文昌书钞》，突然开悟，想这两梦，东宫是守阙的意思，桥底睡是个蛟龙，知府是个黄堂，程乡茧蟒袍是个黄龙袍，我将来必定有朝廷福分。又想起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二年在正阳门内抽过五支签，都有好话。我近因穷苦不过，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梦兆、签语，必有什么好处，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知道皇上于二十日进宫，我就定了主意，见皇上随从官员都带腰刀，原想用小刀割取腰刀，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由我，可得好处。”

这一口供中，陈德进一步交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是为梦兆、签语所惑，以为自己有“朝廷福分”，想入非非，想通过劫持皇上获得好处。这种口供，或是实情，或是因经不住刑讯逼供而不得不乱说一通，但仍没有说出审案官员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幕后指使是谁？

当天，又传讯了陈德的旧主人僧格布、孟启基及有关人员黄二、蒋兴国等人，均称对陈德行

刺之事并不知情。孟启基供词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陈德在孟家服役五年，“素常原是安静”的。嘉庆六年二月间死了妻子，七年十二月间又死了堂姊姜陈氏。陈德带着瘫痪的岳母和两个孩子，家境艰难。如果他堂姊尚在，似乎还有依靠，因为这个堂姊之子姜六格任内务府正白旗护军，多少会给他一些照顾。如陈德前供词所说他来北京，主要就是来投靠这个堂姊。现在这个堂姊也死了，他谋生更加困难，精神上也受到了一定刺激，“时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

他人的证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验证”陈德的口供，但是如此大案，仅为一失业厨役独自所为，仍不免令人生疑。所以嘉庆又谕令添派九卿、科道会同审办。

从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会审诸臣共同审讯，并对陈德加重用刑，“将该犯掌嘴二十，板责三十，并加刑夹，收至四分。该犯供词与前几日无异。复再三推鞫，坚供实无同谋、主使之

人。”会审诸臣一筹莫展。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他们突然于二十四日接到了嘉庆的谕旨，命令就此停止审讯，立即结案：

“诸臣见此等逆犯，义愤自不容己，必欲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反复究诘，悉心讯问，忠君为国之忧，必应如是……然朕为天下共主，以诚心御下，毫无猜忌，此中外所共知共见者。八年以来，虽无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诛戮。既不妄杀，有何仇怨？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子侄至亲骨肉，朕又何忍令凶犯扳扯？况实无疑忌之人乎？总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譬如猢猻噬人，原无主使，鸱枭食母，岂有同谋？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是疑团，所损者大矣。朕所惭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

当天，诸臣拟定将陈德凌迟处死，二子一并绞决，其岳母年已八十，免议。房主黄五福杖一

百，徒三年。

至此，这场轰动朝野的行刺皇帝案，在审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宣告结案。但陈德真的没人指使吗？嘉庆为什么不深究而草草结案？最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有两件事：一是嘉庆初年扳倒了在乾隆朝权倾朝野的和珅，白绫赐死，但和珅党羽众多，陈德是否是和珅党羽派来的刺客？二是嘉庆元年到九年，清廷几乎动用了全国所能动用的兵力，耗费了二万万两白银的代价才将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陈德是否是前来报复的白莲教余党？

第一种可能，野史曾言，自嘉庆赐死和珅后，宫中发生了多次嘉庆险遭暗算的事。一次，近侍奉茶，嘉庆帝未及饮用，因故离去，一名小内侍将茶撤下喝了，立刻毙命。陈德案件发生以前，社会上已经有和珅党羽欲谋害皇帝的传说。现在，行刺皇帝的事件真的发生了，那些与和珅有关系、但已经被嘉庆网开一面、“悉不深究”的

官员肯定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嘉庆借助此案“秋后算账”。从陈德的口供中我们知道，他曾在不少富豪、官宦人家当差，甚至和宫里也有一些关联。严刑逼供之下，如果陈德随意说出几个人名来，很可能再引发一场政治风波。所以，嘉庆在要求结案的谕旨中特别点明“实无疑忌之人”，也是为了稳定人心，表明自己实无“秋后算账”的打算。

第二种可能，如野史所言，陈德是位武艺超群的武林中人，一腿能扫断深埋于地的十二根木桩，有可能是民间秘密会社（尤其是白莲教）派来的刺客。从陈德在刺杀嘉庆时以一敌六，尚能伤及大内侍卫的情形推测，应当是有一定武功的，甚至可算是武功高强，似乎不像是个谋生无门、贫困潦倒的穷汉。野史所言并非毫无根据，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嘉庆九年才被全部镇压下去，到陈德案件发生的嘉庆八年，朝廷为镇压起义所耗费的财力、物力甚巨，已经为此疲惫不

堪，哪怕是白莲教行刺圣驾的事，嘉庆也想息事宁人，不加深究。

“癸酉之变”

陈德事件后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紫禁城内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两股乔装改扮的天理教徒武装分别从东华门和西华门攻入紫禁城，一直打到离乾清门不远的隆宗门外，甚至有几个天理教徒已经翻上了宫墙，几乎要进入内廷。天理教徒的这次行动，最终虽然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嘉庆本人当时也不在现场，但对他的心理打击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早上，约一百个天理教徒伪装成向宫内送东西的商贩挑夫，三三两两地靠近戒备森严的东华门。人还没有聚齐，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有几个教徒与往宫中送煤的人

因争道发生了争执，推推搡搡的时候，有一个教徒不小心露出了藏掖在身上的利刃，被守门军士看见，急忙关上宫门。说时迟那时快，为首的教徒陈爽立即抽出藏刀，率众向门内冲去。但已经太迟了，成功冲入门内的只有陈爽等十几数人，其他大部分则被挡在了门外，四处逃散。这十几个冲进宫内的教徒在内应太监刘得财、刘金的引导下，直奔协和门而来。由于人数太少，他们在与护军进行一番激烈的战斗后，大部分被杀，幸存的被迫藏匿在宫内的各个角落。

几乎与此同时，聚集在西华门外的以陈文魁为首的五六十个教徒在内应太监杨进忠等人的接应下，全部进入宫内，反闭宫门。他们打着“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小白旗，由太监高广福等引路，在杀死一些护卫后，一直冲到离内廷不远的隆宗门外。此时隆宗门已关闭，有几个教徒由矮房翻上宫墙，窥视内廷，并沿墙头向养心殿方向移动。正在养心殿读书的皇次子绵宁（即后来的

道光皇帝）闻讯后迅速取出撒袋、鸟枪和腰刀迎战。他用鸟枪击毙了两名爬上宫墙的教徒，吓阻了教徒们的攻势。礼亲王昭槤、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理闻变后，也率禁兵自神武门入卫。随后，临时调来的千余名火器营官兵也赶至隆宗门下，与教徒们展开了激战。教徒们虽然拼死抵御，但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被打散。除了个别跳墙逃出宫去外，其他的也藏匿于宫内各处。

九月十六、十七两日，清军搜出藏匿在宫内的30多个天理教徒。又于十七日逮捕了坐镇大兴黄村指挥的天理教首领林清。

事件发生的当天，紫禁城的主人嘉庆皇帝刚好不在宫中，而是正在从避暑山庄回京的途中，本打算拜谒一下清东陵。九月十六日，驻蹕京东远郊白涧行宫的嘉庆收到了皇子绵宁发来的第一份“六百里加急”，得知紫禁城正在发生变乱，但具体情况不明。正在犹豫是否回京的时候，又收

到了第二份“六百里加急”，得知大事已定，才松了一口气，决定取消谒陵计划，马上回京。九月十七日，嘉庆在行宫下了一道沉重的《罪己诏》，十九日回到紫禁城。二十三日，嘉庆亲至中南海丰泽园，当堂审讯了林清等人。

林清，京南大兴县宋家庄（今北京大兴区黄村镇宋庄村）人。年轻时当过药铺学徒、官衙佣役和运粮船夫。大约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加入流行于京畿地区的白洋（阳）教，后又加入八卦教中的“坎”卦教。起初，他参加坎卦教只是“希图敛钱”，后因“会说话”，被教众们推举为掌卦教首。经过几年努力，他吸收了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红阳教和大乘教，初步统一了各教，实力大增，胃口也越来越大。他认为“八卦总该归一”，进一步把视线转向了教徒众多的河南、山东等地，试图实现八卦教的统一。他与河南滑县的“震”卦头目李文成和山东德州“离”卦头目冯克善取得了联系，并多次至滑县与他们举行秘密会

谈。三人结成了“刎颈之交”，并达成了“八卦归一”的协议：林清主“坎”卦，总领八卦，称“天皇”；李文成主“震”卦，并管领“坎”卦以外的七卦，称“地皇”；冯克善为“人皇”（一说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他们还约分土地，“（林）清取直隶，李（文成）得河南，冯（克善）割山东”。林清、李文成、冯克善三股势力联合后，改名为“天理教”，约定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闰八月中秋节）以“奉天开道”为旗号、以“得胜”为暗号，同时发动反清起义。

嘉庆十八年八月，由于河南天理教徒动静太大，起义机密泄漏，李文成等首领相继被捕下狱。滑县教徒为营救李文成，聚集3000人，于九月七日提前发动了起义。他们杀死知县，救出李文成，占领了滑县县城。李文成在滑县“开帅府、设羽帐”，树起了“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远在北京大兴的林清可能

对此一无所知，也可能迷信九月十五日（闰八月十五日）这个“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是个好日子，依然决定按预定计划于那一天起事，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所述的那一场惊变。

事后，林清被凌迟处死。300多名天理教徒及其家属也被分别处以死刑、流徙和发配为奴的刑罚。河南李文成的起义军也于十一月初被镇压下去，李文成自焚而死。冯克善于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河北献县被捕，押至京师磔死。

两次刺杀的关联

与陈德的孤立事件不同，“癸酉之变”是天理教首领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反清起义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事变中，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紫禁城居然被几十名手持大刀短刃的天理教徒一拥而进，搅得不得安宁，真

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可能是自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以来最可怕的一场变乱。从清代全史的视角来看，这场变乱是嘉庆初年到嘉庆九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和嘉庆十年陈德事件的延续，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正如后人所指出的：“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之关键。”（铁庵《林清之变》）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天理教的余众依然分散、潜伏在各个地方，这些余众及其后人与清末的义和拳乃至辛亥革命期间的秘密会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终将清朝送上了灭亡的道路。

剩下的问题是，陈德行刺事件发生在前，林清发动“癸酉之变”在后，中间相隔十年，二者是否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种说法，陈德在山东生活过较长时间，

是有可能与曾在山东活动的林清发生过联系，甚至可能就是林清的党徒，是林清派来刺杀嘉庆皇帝的。不过如前所述，林清大约是由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也就是发生陈德事件3年后才加入秘密会社的，而且也不可能一入社就当头目，所以说陈德是林清党徒的可能性不大。天理教是由八卦教中的几个分支和青阳教、红阳教等组合而成，大约创建于“癸酉之变”发生前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年），而陈德事件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所以陈德更不可能是天理教徒。据现有资料，陈德和林清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关民间秘密会社的历史资料极缺，即使有一点零星的资料，也往往是模糊的、不准确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二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可能永远是个谜。

张文祥刺马案的破案思路

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长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新贻的手下为将，而马新贻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

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后文称马案）。

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貽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马新貽系回族），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投名状》。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逼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

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马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长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兼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

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掺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为朝廷平叛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自己独立，割土裂疆，乃至推翻朝廷。作

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既没有心思夺了朝廷的鸟位，也不想朝廷猜忌他另有所图，所以，选择了一股脑把二十几万湘军解散掉。此举，他把自己洗干净了，可是，几十万跟着他的大兵可倒了血霉。在那个时代，出来当兵吃粮，是一辈子的事，不图升官发财，也图个养老送终，那时候没有军转干部安置这回事，凡是当兵的，只要不死，就要在军队里吃一辈子。少数人固然可能升上去，做地方官，还有人抢东西抢多了，回乡做土财主。但是多数人，包括大量有军功，而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之辈（湘军里，挣得头品顶戴而还做哨官，有二品功牌当士兵的，比比皆是），却还指望着自己的部队呢。因此，这些人从此进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帮会的骨干，一点都不奇怪。这些人搞起帮会，要干件大事扬名立万，选择非湘淮系的马新贻下手，干了之后，再制造一点有关马新贻如何不仗义的绯闻，非常有可能。事实上，从此以后，青红帮在长江流域，就成了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朝廷，也未尝对此没有觉察。案发之后，马上派曾国藩回任，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对丁日昌一点追究之意也无。看来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此事固然“甚奇”（西太后见曾国藩时语），但不宜深究，还要卖给湘淮系一个面子，此时，此事，大概只有曾国藩，才能镇得住局面。

第三章 戒石鉴镜

明代的肃贪反腐与清官廉吏

黄袍加身之后，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没有忘记他的贫苦出身。十七岁时，还被人叫着朱重八的他便失去了父母和兄长，过着乞讨为生的叫花子生活。正是这样“接地气”的经历，使他对平民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朱元璋深知，曾经叱咤天下的前朝大元，之所以那么快土崩瓦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吏普遍贪污腐化。因此，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特别重视廉政建设。

戴着枷锁的王朝

明初的官场，充分贯彻了“治乱世，用重刑”这个基本原则。对于犯下贪污罪行的官员，

朱元璋严厉惩处绝不手软。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特别将有关赃罪条文单独列出，并且明确规定，官员受赃数目达到八十贯（一贯相当于银一两），就要处以绞刑。他还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开创了一些从重惩治贪污官员的典型案例，让大小官员以此为戒。

完善且行之有效的监察体制对约束官吏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在中央，有都察院负责纠劾“坏官纪者”，还有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以稽查百官之失。地方上，既有提刑按察使司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又派出巡按御史考察府州县官。此外，国家还赋予地方士民直接进京陈事或将危害地方的贪官污吏拿送至京师的权力，并规定地方不许阻拦。

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明朝在开国年间吏治较为整肃廉明。然而，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逐步恢复发展，商品经济日趋繁

荣，人们不再满足于糊口度日，开始追求现实的享乐，并向往奢侈安逸的生活，整个社会攀比之风盛行，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与此相应，官场中的风气也每况愈下。为保住官位和谋求升迁，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送礼行贿，公然行之。在平时，官员特别是京官，盛行将叶子金夹在书册中贿送，美其名曰“书帖”“书帕”，往往于相见揖让时，“口叙寒暄，两手授受”，人称“世风日偷，如江河日下，不可止矣”。另也有学者指出，明代官员的俸禄标准较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禄只有1044石，正七品知县的年俸禄只有90石，为官员贪婪腐化提供了借口。

渐渐地，朱元璋悲哀地发现，他一向推崇的酷吏重刑法宝不再有效，血雨腥风中，十五万颗贪官的人头落地，却依然挡不住他的官员“前腐后继”。杀到后来，京官上朝前，皆像赴死一样和妻儿诀别，嘱托后事。下班回家，庆幸又多活了一天。最盛时，官员戴枷坐堂，面刺金印，堂

外剥皮槿草，前任贪官的皮囊在风中摇曳。

这样戴着枷锁的王朝岂能长久？郁闷的朱元璋，瓦刀脸上挂满了问号。

出淤泥而不染

到了明中后期，官场已彻底成为贪污的渊薮，腐败的巢穴。此外，由于法网日弛、监察失效、考课舞弊等原因，使得明初严密的监察体系逐渐失去了效果，贪污腐化的趋势愈发不可逆转。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富有朝气、蓬勃向上的壮年时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保持着一身清廉之气，希望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拯大厦之将倾。

路迎就是这样一位清官。路迎是山东汶上

人，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他在湖广襄阳知府任上，严格约束衙门中的胥吏，并坚决打击地方上对小民作威作福的豪强，治绩为当时人所称道。后来，路迎又先后出任松江知府和淮安知府。淮安地处南北要冲，南北往来官员的接待费用以及运输北上物资所需的各项杂费，都向当地的民众摊派，而这些款项的很大一部分，都落入了衙门书役以及驿站官员的腰包。小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路迎裁革各项浮费，节省了许多有名无实的开支，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淮安人民感其功德，专门建立祠堂为他祈福。

由于治绩突出，路迎被升为浙江按察使。嘉靖十三年（1534年），路迎到嘉兴府视察，知府照例向他馈送银两。路迎不但将馈赠原封不动地退回，还在嘉兴知府的礼单后写道：“此物奚从来，奈何污我？”该知府随后也因为考绩为“不谨”而被罢免。同年，路迎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边境重镇宣府。当地军士骄横，往往虚

列名籍，冒领、侵吞边镇钱粮。路迎仔细核对军士名单，严厉打击将领克扣士兵钱粮以及冒领、贪污军饷的行为，不到两年的时间，边政肃清。

最有名的清官

要论明代的清官，最有名的当然是海瑞。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他幼年生活困苦，深悉民间疾苦。在担任浙江淳安知县时，海瑞只吃粗米，且命老仆在官署空地自种蔬菜以供日常食用，为母亲过寿，他特意买了两斤肉，以至成为传遍街头巷尾的“重大新闻”。万历初，首辅张居正特意派巡按御史查察当时赋闲在家的海瑞，御史只见粗茶淡饭，居舍萧然，不由得叹息而去。

海瑞驭下甚严。他严令下属不许以任何形式贪污受贿。在淳安任知县时，就曾立下规矩，如

果有人用钱物到衙门打点关节，无论数额多少，行贿者和受贿者都要被处以枷号两个月的处罚。超标招待过境的官员和使节是当时危害甚大的一种行贿方式，海瑞则力图整治这一风气。还在他担任淳安知县时，巡盐都御史鄢懋卿出巡，此人表面上要求地方一切从简，其实所到之地，极尽搜刮之能事。在即将经过淳安时，海瑞特地上一禀帖说：“传闻所至与宪牌异，欲从宪牌则惧招尤，欲从传闻则恐违宪。下邑疲敝，未知所从。”鄢懋卿见到禀帖，一笑置之，最终绕道而过。

他还将嘉靖朝以后官场贪污盛行、民生凋敝归因于惩处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为此他上疏恳请万历皇帝恢复太祖时枉法八十贯论绞的祖制，甚至认为应该对贪赃枉法之徒重新使用剥皮植草（明初酷刑，剥下人皮，用草填充之）的酷刑。

海瑞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贪污、奢侈盛行的风气，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隆庆三年

（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因为忌惮海瑞的威严，当地有贪腐劣迹的属吏大多自行辞职离开。在当地监督织造的中官甚至因为海瑞的到来而减少了自己出行时的仆从，平时生活讲究排场奢华的豪强将朱红大门临时涂成黑色。

最为人称道的是海瑞卒于官署后，遗物只有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靠朋友们凑钱才为他入殓发丧。目睹这一切的时人朱良感慨道：“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三字经知县”徐九思

《明史·循吏传》记载了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和传颂的地方官代表，他就是句容县知县徐

九思。

徐知县是江西贵溪人，虽官位不高，但刚正廉洁，爱民如子。在徐九思刚出任应天府句容县知县时，有一个狡猾的县吏，拿一份空白文书来偷盖县印，徐九思发现后，要依法对其予以重惩，衙门里的众官员为其求情，但他秉公执法，不为所动。从此，句容官场风气为之一变。

徐九思到句容不久，同僚及当地百姓就逐渐了解到他的“爱民三字经”，即“勤、俭、忍”。“勤”，就是勤于公务，为避免县吏在征税催赋、金派徭役时营私舞弊，徐九思先是了解乡民的贫富状况，然后再依据实情分配徭役，平衡赋税的轻重，查实豪强隐占的赋额，不再转嫁到贫困户头上。

“俭”，就是节俭裕民。徐九思要求自己“不嗜肉，惟啖菜，佐脱粟”，他在县衙的园圃里种上蔬菜瓜果，饲养了家禽，还把园中的水池改建为

鱼池。园中的收获不仅改善了县吏的生活，而且节省了县衙的招待费。目睹当时贪腐盛行、奢靡成风的情形，食不甘味的他苦思冥想，居然想出了这样一个创意——命人在县署前的石屏上刻画了一棵青菜，居中题词：“为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为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两边配上一副对联：“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以此自勉也警示他人。这块被称作“菜铭碑”的石屏与立于衙署大堂前的戒石碑，赫然成为句容县衙独特的风景线。

“忍”，就是忍让不争。徐九思告诫自己安于清贫，不争名利，不与贪官同流合污。但是他的忍是有原则的，他对自身的名利可以“忍而不争”，对于百姓的利益，则丝毫不忍不让。句容曾遭大旱，官府开仓发粮赈灾。按照旧例，应当将救济粮全部平价出售，粮款上缴。徐九思认为，灾年中真正受难的灾民早已无钱，平价之粮对于他们犹如市价，而有钱的豪民富户却乘机抢

购囤积。为此他向上官据理力争，并根据实际情形进行改革，将拨下的救济粮，一小部分以市价出售，以归还官仓；其余大部分粮食，他亲自监督，在县衙前施粥，救助饥民，使有钱者无空子可钻，无钱者却能真正受惠。

荣膺“三字经知县”称号的徐九思，在句容知县任上整整九年。离任时，每天都有大批民众前来与他道别，致使其行程延迟了一个多月。全县民众自发为他建立生祠，将他当作神灵来供奉崇祀。“方丈石墙为户屏，一丝画菜为官箴”这副对联也流传至今，成为清正廉洁的格言。

大明历经276年，不乏这样清正廉洁的官员，虽然受时代和政治体制的限制，他们无法也不可能改变其时政治腐化、吏治败坏的大局，然而，他们与腐化风气相抗衡的铮铮傲骨以及对当时和后世社会的警醒却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的传统时代，法令制度发挥效用的空间相比于今天要大大压缩，而且已有的法令制度又受制于皇帝

的主观意志，并依其需要随意变更。这样，就给社会治理带来了随意性、主观性和不稳定性。官员个人的人格品质、能力和意志等，就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政治和地方管理的好坏。因此，清官们在社会治理、社会稳定以及为百姓谋利方面功不可没，仅以封建制度的卫道士来评价他们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清官绝不仅仅意味着不贪污、不爱钱，这只能称为廉吏。察吏安民，兴利除弊，谋求百姓的利益，推动社会的进步，才是官员的基本职责。那些历史上流芳百世的“清官廉吏”，在自身奉公守法、安贫乐道的同时，更为人看重的是为官一任，有所作为。

清朝奇案：贪官谋害清官

清嘉庆时期，吏治已出现很多积弊和腐败现象。从结构上来看，腐败最厉害之处，一是漕运；二是赈济。很多官员中的蠹虫不顾百姓死活，侵贪公帑，胆大包天。其实，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乏清官廉吏，但在当时，即便这些官员想有所作为，也不容易，“苟有切求民瘼者，转不得安于位。”

嘉庆十四年（1809年）就发生了一起贪腐官员合伙谋害反贪巡视官员的案件，令嘉庆皇帝龙颜大怒。

嘉庆十三年淮安水灾，官府向该地发放了赈灾款。按照清朝惯例，下发了赈灾款后，朝廷都要派官员去巡视、检查赈灾情况。嘉庆十四年，两江总督铁保派遣新来的知县李毓昌去淮安山阳

县核查赈灾情况。

李毓昌到任后，“亲行乡曲，钩稽户口，廉得山阳知县王伸汉冒赈状，具清册，将上揭”。这一来，慌了山阳王知县，按照清朝官场潜规则，他试图用重金贿赂李毓昌，但李毓昌不吃他这一套。事急生计，知县王伸汉叫自己的仆人包祥收买了李毓昌的三个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谋划盗取李毓昌证明王伸汉贪污的证据。但是，已有警惕意识的李毓昌把证据收藏得非常好，一干恶仆无法得手。

狗急跳墙。眼看着李毓昌就要离开山阳县，王伸汉一伙“遂设计死之”。他们如何残害李毓昌？这在《清史稿》中有十分详细的描述：

（李）毓昌饮于伸汉所，夜归而渴，李祥以药置汤中进。毓昌寝，苦腹痛而起，包祥从后持其头，叱曰：“若何为？”李祥曰：“仆等不能事君矣。”马连升解己所系带缢之。

谋害了李毓昌后，王伸汉向淮安知府汇报：李毓昌自缢而死。早就心领神会的知府王穀例行公事，“遣验视之”。当验尸回来的仵作汇报“尸口有血”——非正常死亡时，王知府大怒，“杖验者，遂以自缢状上”。两江总督府收到王知府的汇报，并不详查，即认定李毓昌系自缢而死。

既然是“自缢而死”，总督衙门通知李毓昌家人来迎丧。李毓昌的族叔李太清与另一个朋友沈某来到山阳县，在检视李毓昌的书籍信件时，他们发现了夹匿在书中的半张残稿，赫然写着：“山阳知县冒赈，以利陷毓昌，毓昌不敢受，恐上负天子。”原来这是李毓昌未写完的禀报总督的书稿。李太清顿时觉得，侄儿死得蹊跷！

李太清迎丧回山东老家后，即同李毓昌的妻子开棺验尸。“启棺视，面如生。以银针刺之，针黑”，就当时的医学经验来说，这就意味着死者是中毒而死。

李毓昌是家族的荣耀，才当官没几天，就被不明不白地害死了，李家人极其忿恨，“李太清走京师诉都察院”。一个派去核查赈灾款的官员竟然被毒死了！嘉庆皇帝大为光火，“命逮王穀、王伸汉及诸仆，至刑部会讯”。同时，嘉庆皇帝派遣李毓昌家乡的山东按察使朱锡爵再去检验李毓昌的尸身。经过认真查验，发现李毓昌先中毒，后被勒死。

嘉庆皇帝震怒，下旨“斩包祥，置顾祥、马连升极刑，剖李祥心祭（李）毓昌墓。穀、伸汉各论如律，总督以下贬谪有差”。嘉庆皇帝还写了首《悯忠诗三十韵》指斥贪官、表彰李毓昌，其中最痛彻肺腑的两句是：“毒矣王伸汉，哀哉李毓昌。”

晚清海关廉政启示录

英人赫德（Robert Hart）在北京的总税务司官邸是一座四合院。

其实他完全可以像那些驻京的英国外交官员一样，住在一幢舒适的英式洋房里。但赫德不，他牢记自己的身份，时刻提醒自己是清政府的雇员。

当时的中国海关，明明是大清国的行政机关，却在金发碧眼的洋人管理之下。这一由外籍税务司系统所控制的特殊机构，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洋关”。

这是晚清政府的无奈之举。考虑到外国人比大清官员更了解国际法，也较清政府官员清廉，便拟定海关总税务司一职由外国人担任。赫德就

是管理“洋关”的最高首长。

言出必行，为做好表率，赫德以为，作为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他就应该住在中国政府提供的官邸里，所以只能是一所中国式房子。

但这座四合院恐怕在全北京都独一无二，因为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给赫德订购了一个洋玩意儿——抽水马桶。

不知是否有意安排，四合院所在的勾栏胡同和恭亲王王府所在的柳荫街相距不远。所以，除了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干，王府也是赫德经常登门拜访的所在。每次离开，他都忘不了亲王眼神里的期许。无疑，对到处弥漫着腐朽气息的晚清政府来说，新型海关就像从外部世界吹来的一阵清风，令人耳目一新。在亲王看来，那些贪腐成癖的“自己人”实在不靠谱，把海关交给“虽系外国人，尚属驯顺”的赫德打理，放心。

赫德更加忘不了的，还有那次人数不多、规格很高的饭局，就在那道山西名菜糖醋鲤鱼端上桌时，亲王意味深长地说起了一个典故。

话说东汉南阳太守羊续，为官清廉，在拒腐方面很有一套。一天，羊续的属下府丞焦俭见羊太守过于清苦，便给他送了条活鲤鱼。面对这条鱼，羊续左右为难，无奈之余，只好暂且收下，等焦俭一走，便叫人把鲤鱼挂在府邸屋檐下，没过几天，风吹日晒就成了一条枯鱼干。直到有一天，焦俭又笑嘻嘻地拎着一条更大更鲜活的鲤鱼来拜访羊续。羊续不说话，只是笑着指指那条悬挂着的枯鱼干。领悟到长官的一片苦心，焦俭红着脸，收起鱼退了出去。从此，风干之鱼便成为活生生的教材，瞪着苍白的死鱼眼，警示后人别再行贿进贡。这件事传出去后，府吏们被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以后再也没人来礼贿他了，“羊续悬鱼”的典故也就流传了下来。

来华十年，赫德虽说对史籍旧章多有涉猎，

可中国历史实在太悠久，戒石他见过，也知道来历，羊太守的拒腐传奇，他还是第一次听说，但聪敏的赫德马上就明白了亲王的深意。1700年来，有几个熟读典籍的官员不知道这个出自《后汉书》的典故？他们却依然陷入贪渎的怪圈。

不能说大清的统治者们无所作为。前清时代，对官员的考察、监察、惩罚，沿袭了历代王朝的一整套制度，比如设立专职御史官，其职责就是弹劾贪渎官员，但这套监察制度是为专制君主量身定做的，人治色彩很浓，其效用受皇帝的性格和能力影响较大。御史制度通过以官纠官的形式来进行反腐，其调控官场的意味应该更浓。在统治集团日益腐化，政治腐败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例外地会不断腐化，“专徇赃私，骄恣跋扈”，成为内部政争的工具。

或许，这个“几无一处衙署干净”的庞大帝国，就像未经处理的鲜鱼一样，早已糜烂腐败了。

为报答亲王的知遇之恩，赫德曾不止一次许下诺言，要在林林总总的衙门中，保证“海关税司一枝独清”。现在，亲王借鱼说事，敲打自己，一定情非得已。要知道，海关税收可是亲王最后的依靠。

赫德的表现没有让亲王失望。不和别的衙门比，就拿海关自身来说，由他管理的“洋关”（“新关”）比清政府官员主管的“常关”（“旧关”）要好太多。前者负责外轮货物的稽查征税，工作效率高，不论是“洋员”或“华员”，都能清廉自守；后者管理国内民船贸易，则懒散草率，贪腐连连。

早在“新关”设立前的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中国就建立了四大海关：粤海关（广东）、江海关（江苏）、闽海关（福建）、浙海关（浙江）。它们都是由清朝官员管理。由于管理散漫松弛，受贿纵私成风，走私漏税一直十分严重，清政府应入的关税被层层私吞。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

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一千五六百万斤。梁绍南说：“近年以来绝少呈报（进口的白糖冰糖），其为偷漏，更属显然。此外如进口之洋参，出口之绸缎，皆属大帮货物，近年税册，俱觉寥寥。广东如此，外省各关口均同此弊，概可想见。”

用人唯亲则是公开的事实。以粤海关为例，作为当时全国四大海关中最重要的海关，据旧《粤海关志》记载，嘉庆二十三年，钦派粤海关的一位监督，就将他的24位家人和41位手下巡役安插到粤海关下面的总巡口、黄埔口、江门口等各总口和小口担任各式要职。他们的薪水，由监督署办公费开支。这并不是个案，当时粤海关的监督都是这样做的。

当时，清政府征收的关税其实并不多，主要有两项：船钞和货税，而货税的税率极低。但是，粤海关的官员们巧立名目私设的各种税费却

多得惊人。例如，黄埔口就向过往船舶货物私收进港费、离港费、停泊费、粮道捐、分头、火耗、验舱、贴写、领牌等近70项，所得统统被上下官吏私分。1763年，两广总督苏昌上奏称，粤海关各项陋规银两，“每年不下六七万两，从前原系丁役私收入己”。对于这些陋规银两的征收，外国商人强烈不满，屡次要求清政府减免，但往往旧的规费被上级明令缴公，新的规费名目又现，至于其他私相授受的贿赂，更无法统计，总归是“瞒上不瞒下”。

于是海关就成为清廷最著名的肥缺，被中外商人指责为清代官员腐败的典型代表，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贪腐案件层出不穷，俨然是腐败的重灾区。为什么赫德一到任，就能“刷新关政”，杜绝舞弊，而常关却还是吃拿卡要，涛声依旧？赫德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点金之术，化腐朽为神奇？

还是让那条鲜鱼来告诉你答案。同样是送鱼，看看在赫德铁腕治下的洋关，有着怎样的遭

际。那时闽海关的一位外班关员，午夜交班后提着一條鮮魚兴冲冲地回家，被查岗的外籍副监察长半路撞见。洋监察可没有羊太守那样的慢功夫，他立即询问鮮魚的来历，最后查实，这条魚来自报关人员的馈赠，于是在逐级呈报后，根据规制将这个可怜人儿清理出海关，永不录用。

在清代，官员的俸禄一直是相对偏低的。早在康熙年间，御史赵璟就曾上奏：“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这导致清代公务人员的薪水只能是点缀，加上送礼之风日盛，除了“三节两寿”（“三节”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更是创造出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不胜枚举，营私舞弊贪污受贿便成了潜规则。有一位叫李慈铭的低级京官的日记表明，“从1863年到1888年，他的全部收入有将近

一半来自馈赠。”

这一切，赫德都了然于胸。他实行了与清政府完全不同的高薪养廉制。海关内外班职员的薪酬十分丰厚，比起朝廷官员，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就以那个外班关员为例，尽管外班相对内班地位较低，但在这个系统里最低一等的铃子手（验货员），每年薪俸也有600两，而做到最高层级的超等验估，每年的薪俸高达2400两。什么概念？一位当朝六品官员的年薪也不过500两左右。而且，海关工作稳定，待遇优渥，只要遵守制度不出岔子，就可定期升级加薪。关员告老还乡时，还可一次性领取相当于十年薪俸的退休金，这也是其他衙门没有的福利。

这就是赫德在海关推行的退休制度及养老储金制度。平时待遇优厚，退休了还有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作为养老保障，海关关员在岗时便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工作、死心塌地服务。而且，服务年限越长，养老储金积累越大，越到后来越舍

不得放弃。如此，养老储金实际上成了促使海关关员保持操守、廉洁行政的保证金，无形中增加了对关员的管理效力。海关关员们在权衡利弊后，大都不想为贪污冒风险。

大清也有明白人，顾炎武就说过：“人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贪致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但洋海关的种种优越待遇，却是当时其他机构所不能及的，也无力提供的。

若有人敢贪污，就会受到连坐处分，使敢于试法者望而却步。洋海关有着严密的税款完纳和呈报制度，每个业务流程和环节都不可能集于一两个人完成，使报关商人与海关关员相识相熟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即使有贪念的职员都无机可乘，想贪而贪不到。

赫德既然敢对亲王许诺，要保证洋海关的纯洁性，必然要彻底整治贪腐行为。他在《局外旁

观论》中写道：“（我中国）制度本极精详，而日久尽为虚器。”因此，监督从他本人做起，这样就没有人可以不受监督，也没有事可以暗箱操作。此外，他多次强调制度的执行力，如果发现哪个职员不检点，一旦上报税务司，必然一查到底，绝不手软。端的是反腐倡廉严抓不懈，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所以，洋海关各级人员无人敢越雷池，那个悲催的关员可以说一不小心，便生生将金饭碗给打碎了。

再来看看洋关是怎样用人的。与常关一向的任人唯亲不同，赫德统治下的海关，在全球范围内公开选拔招考。每一个新人的录用都慎之又慎，并按考试成绩和有无发展前途的次序录用。赫德多次发话：“不够格的一个也不要，就是总税务司的儿子也不例外。”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他的广州牧师朋友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

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小俾士到海关伦敦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寄给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同时他也捎去了一张字条。不过，字条上面赫然写着——“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在伦敦大学深造过的毕业生不幸落榜了。可是，更多的出自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高材生却被赫德罗致麾下。

赫德也清楚，他之所以这么清正廉洁，除了个人修养，更有外在因素，一是前任的前车之鉴提醒他，清廷是绝不允许他犯错的；二是英国政府视海关为对华关系的基石，他的任何贪腐行为都会有损祖国利益；三是俄、法、德等国对海关总税务司宝座虎视眈眈，就等着他出丑闻，“便可取而代之”。于是，赫德不得不模范地遵守他自己亲手制定的一项项规定，一个带头奉公守法的海关首长，就这样在制度的藩篱下成长起来，以至于恭亲王奕訢禁不住感叹，“要是我们有一百

个赫德就好了”。

杰出的人物无法复制，有一个赫德已然足够。因为，他的确没有辜负恭亲王的殷切希望。1899年，海关税收达到了惊人的三千万两白银，比他入主海关时的六百万两，翻了五倍。赫德管理下的海关创造了一个神话，几乎占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在这漫长的36年中，整个海关所发生的贪腐弊案，只有区区五起。

可是，一花独放不是春，再多的银两也无法填补这个帝国的千疮百孔。就在1898年，恭亲王怅然离世，他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洋务新政”（洋务运动），随着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黯然收场。

这样的结局，赫德始料未及。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他曾经无比看好全力辅弼的变革，会被后世的学者揶揄为“跛足运动”。不过，相较晚清衙门的腐败成风，无官不贪，洋海关却能做到

廉洁高效，赫德也算对得起恭亲王与大清了。

民国反腐“肌无力”（上）

法制悄然起步

民国鼎革，共和肇建，作为创建者，孙中山痛恨贪腐，决心肃清之。他从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那一刻起，就开始致力于构建反贪腐的机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表示，南京临时政府将以“诚挚纯洁之精神”，施行廉洁、统一、合理之财政政策和措施，“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革命初成，新政肇始，领导人抱有清明吏治、振兴政权的决心和信心。依据三权分立原则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减少因没有制约而滥用权力的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较好地体现了民主、权力的制衡

及廉洁、反贪的精神。无奈新政苦短，革命党人的一腔抱负未及实施，也无法检验其是否适合中国，短短的三个月后，孙中山被迫让位，一切反腐条文皆成故纸堆。

1912年3月，北方大地乍暖还寒，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史称“民国北京政府”或“北洋政府”。这个政府的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就监察制度而言，其力量就显得十分薄弱。各级官吏违法渎职的情况日益增多，利用职权卖官鬻爵、贪赃枉法的各种丑行屡见不鲜。深谙封建官场旧习的袁世凯这样形容当时的大小官吏，“或偷懒旷官，或瞻循误事，或奢靡害俗，或嬉游耗时”，如不及时整治，危害甚烈。

《临时约法》规定，国会对行政权力享有监察权，迁都北京后，袁世凯效仿清政府的都察院，专门开设了平政院作为监察纠弹机构，直接隶属于大总统。设立平政院，将中国传统御史制度与

西方行政法院制度糅合在一起，利用比较公开的方式监察行政官吏，为“民告官”提供了制度保证，对于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起到了推动作用。平政院处理的案件对象，从书吏到县知事、道尹、省长、都督、部长乃至国务总理皆有，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可谓开天辟地。

接着，袁世凯着手完善北洋政府检察系统，效仿御史制度，成立了肃政厅，负责纠举违法渎职官员，而纠弹处理权则掌握在他的手中。厅长官为都肃政史一人，设肃政史16人。时人称都肃政史和肃政史为“都老爷”，即是沿用对前清左都御史和给事中御史的称谓。这个针对官员腐败的监察机构直接对袁大总统负责，按照《官吏犯赃治罪条例》，对赃官的处罚很重，其中第二条规定：贪赃500元或1000元以上，即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肃政厅存在时间不长，1914年3月成立，1916年6月裁撤。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肃政厅雷

厉风行地执行职务,全方位介入国家事务，查办了400多个省级官员的案子，在整肃官纪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14年6月代理都肃政史夏寿康等纠弹京兆尹王治馨纳贿贪赃案，王治馨最后被判处了死刑。民国初的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属于正部级官员，其职位之高，在当时的腐败弹劾案中实为罕见。该案办理速度之快，涉及关系之广，成为奇案大案，却也依稀可辨幕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人治仍是主导

王治馨在前清时就曾因贪污被袁世凯下令斩首，经多方说情方幸免于死。其后，王攀附上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追随其投身警界，一路官运亨通。

王治馨原本就有的贪赃受贿的恶习，并没有

因为民国来了就有所改观。在京畿最高长官——京兆府尹任上，他越发肆无忌惮了。京兆府当时所辖24县，除一个县令因有强大后台未向王行贿，其余23个县的县官每人都向其“孝敬”，其赃款共达五万以上。如此大规模的受贿，即使在清朝200余年间也是鲜有所闻。此外他又买卖官职，明码定价，第一等县为五千，二等三千，三等两千，影响恶劣。王治馨贪得无厌，且生性狂妄，在一次宴会上，他和一名肃政史官员聊天，谈兴所至，竟然逞一时之快谈及自己贪赃纳贿的各种情由，丝毫没有顾虑对方的身份。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肃政史官员随即展开调查，并对王进行弹劾。王治馨闻其恶行败露，迅速将有关证据毁灭殆尽，导致此案久悬不结。后来经肃政史调查簿记，又查出王治馨委托一家商号代办税款等违法事实，于是又提出纠弹，此案后交司法部，终于水落石出，王无从解释，锒铛入狱。

由于王治馨在警界的广泛人脉以及与赵秉钧的密切关系，在他被捕之后，许多人为之求情，请求袁世凯“念旧部之谊，贷其一死”。贪赃纳贿，本是晚清和北洋官场上司空见惯的事，但对于惩办王治馨一案，袁世凯却很有决心。在外界看来，他是要拿王治馨开刀，祭奠其为整饬吏治而打出的反腐大旗，其实内幕真相远不止如此，中间还掺杂了私人恩怨和政治因素。

王治馨和袁世凯是有过节的。那是1913年3月20日，国会中反对党领袖宋教仁倒在上海火车站月台的血泊中，一时舆论哗然，指斥袁世凯、赵秉钧为幕后元凶。袁世凯自然加以撇清，真假莫辨之际，王治馨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谈话，声称宋教仁之死，赵秉钧不应该负责，应另有其人。此言一出，好像是为赵辩解，但实质却是将嫌疑指向了袁。王治馨竟敢出卖袁大总统，他也真是活腻了。

于是，袁世凯收到肃政史呈上的王治馨贪渎

报告后，如获至宝。马上批复，由大理院开庭判决，处以死刑。从判决到执行，没超过24小时，办理之迅速，前所未有。

此外，虽然平政院和肃政厅都有监察职能，大总统对其裁判却有最后的决定权，因此，它们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御用机关。袁世凯暴死后，1916年6月13日，“辫子军”统帅张勋闹复辟，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肃政厅也同时被裁撤了。

腐败玩到极致

肃政厅裁撤后，北洋政府机构的监察职能明显弱化，加上大总统独裁权力日益加强，历届军阀政府走马灯似地更迭。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曹锟等各届总统，都曾公开地进行各种贿赂和贪污。国会多次被解散，贪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上梁不正下梁歪，各级政府机构和普通官吏

的贪污腐败行为也不可计数。其中，最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行贿和贪污受贿案，当属曹锟贿选总统。

曹锟是在袁世凯死后被拥为直系军阀首领的。为赶走黎元洪，登上大总统宝座，直系军阀纷纷发出要进行总统选举的呼声。

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召开，当时的国会议员共有870名，也就是说，总统选举会的法定出席人数至少应有580名。而为了抵制曹锟发起的总统选举，孙中山派人到北京活动，欢迎议员们南下广州；军阀卢永祥也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以每月300元薪金的待遇动员议员南下上海；东三省议员也随张作霖回到了东北。这样，总统选举终因人数不足而无法举行。

1923年6月上旬，曹锟见无法利用正常政治秩序达到自己当总统的企图，于是就招募流氓组

成“公民团”，天天组织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又唆使冯玉祥等中级军官300人到黎元洪家索要军饷，逼迫威胁，动摇其意志。6月13日，黎元洪在纷扰之中被迫出走天津。

同时，为了把出走的议员们拉回北京，曹锟决定用金钱来收买选票，他在甘石桥成立了“议员俱乐部”，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一手包办，掀开了贿选大幕。

为了筹措贿选经费，曹锟手下到处搜刮。如曹锟四弟曹锐借口筹款，株连到很多无辜的人，大名商会副会长冯化远被诬告为“制毒贩”，逼罚10万元，最后被吓出精神病而死；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也被他以筹措军费为名肆意提取资金，交易所最终不支倒闭；曹锟另以借军饷为名，通令所属170个县份，分大中小3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搜刮民脂膏血，以供其贿选支用。诸如此种，敛财手段多不胜数，共计筹措到1350多万元。金钱的“魅力”确实吸引了许多议

员，他们陆续返回北京。

凑足法定大选出席议员的人数是必须的，当局临时决定：即使不给曹锟投票，但出席会议者也发给5000元支票一张。10月5日总统选举当天，北京全城军警宪一齐出动，在会场外荷枪实弹监视议员。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

曹锟以金钱钞票为阶梯，终于爬上了梦寐以求的总统宝座。他的上位，实在是民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贪腐闹剧。

贿选不得人心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进。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顺应世界大势走向共和，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倒行逆施和张勋复辟的丑剧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而到了后袁世凯时代，向来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北洋军阀们，居然也“臣服”在共和体制的法律秩序面前，对施行暴力和专制感到心怯而“低头”，因此不惜大量动用金钱制造舆论，百般讨好议员。贿选是选举的大敌，在选举人被购买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公平的选举。

曹锟贿选的丑恶行径激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孙中山指出，曹锟的贿选，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者也”。民众舆论咒骂曹锟为“贿选总统”，受贿议员为“猪仔议员”，国会为“猪仔国会”。终于，在人民的唾骂声中，曹锟只当了短短一年总统，就被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赶下了台。

北洋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在反贪腐的制度建设、政治措施和实际行动中，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在这个社会大转型时期，民国总统的独裁权力却不断增强。虽有国会的存在，但自袁世凯起，面对历任军阀总统刻意构架的体制

所形成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够对其有所约束。越是独裁专断，权力越是集中，越是注定了民国时期的反贪污腐败患上了“重症肌无力”——一种慢性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开始还重拳出击，气势磅礴，接下来也还有那么一些力度，直到渐渐疲软，任由中西腐败手段相融合而无能为力。

民国反腐“肌无力”（下）

蒋介石于1928年5月率百万大军进行二次北伐。6月，在皇姑屯的升腾烈焰中，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伤重不治。两天后，北伐军占领北京城，统治中国16年的北洋政府，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早在一年前，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了长治久安，这个自诩继承了孙中山衣钵的中年人，信誓旦旦地号称要将反腐进行到底。那么，这个打着“国民”旗号的新政权，果真是像它自我标榜的那样清廉，还是继续民国反腐“重症肌无力”的梦魇？

反贪机制看上去很美

1928年3月17日，一个春和景明的周末。这一天，蒋介石“五时半起床，往军官团及军官学校巡查，散漫腐败情形不胜悲愤！”直到晚饭后“薄暮游乡，携三妹同行，兴焉”。他的心情如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起伏。临睡前，蒋介石在日记结尾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如何能作育人材，激励士风，使其热心勇敢，廉洁奉公也”？

这是蒋介石执掌党国大权并不太久的時候写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对腐败散漫的愤慨与失望，欲寻良方加以整治。事实上，此时国民政府的贪腐情形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

蒋介石命令手下大小“文胆”，抓紧制定各项反贪腐制度。从《中华民国刑法》《国民政府组织法》，到《国民政府监察院组织法》《惩治贪污条例》，不仅对反贪污腐化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还拟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审计监察机构，而行政监察反贪部

门的设置更是完备得出奇，诸多惩戒委员会分类之明细也令人咋舌。反贪机制则逐步发展为弹劾权、调查权、纠举权、建议权、纠正权、同意权和监视权。监察、反贪、惩戒职权齐备，蒋介石不可谓不用心。

然而，制度层面的条文规定和相关机构的全面设置并不是反贪腐的保险箱。南京国民政府的反贪制度建设，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强力建设、趋于完备到作用日渐减弱直至名存实亡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从上到下对反贪的执行力度由强转弱，反贪机构的设置最后只能流于形式，反被当局者、执权者践踏、破坏，位高名赫的监察官、检察官沦为只抓“小鱼虾”的“病猫”。

大发国难财的丑恶

抗日军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

抗战的重要性得到美英等国的肯定，重庆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得以提高，国际援华物资开始不断地运往中国。然而，抗战物资的不断集中，却点燃了贪财者的欲望。从政府官员到部队将领，看到缺少监管的财物从手中经过，心底难填的欲壑张开了大口，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次次地把这些本该用来挽救民族危亡和同胞生命的财富占为己有，大发国难财。蒋介石对这些大大小小的贪腐案心知肚明，在不同场合痛斥这是国家纲纪的败坏，是道德良心的泯灭。尽管他施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也无济于事。

当时，大发国难财的渠道除了物资、黄金和外汇，还有发行公债。官僚豪门及政府高官往往借派售公债、发行储蓄券及举借外债之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手笔地贪污。仅1942年一年，国民政府就发行了4种内债，一笔储蓄券，还争取了大量的外国贷款，最大的两笔是美国提供的5亿美元和英国提供的5000万英镑贷款，这也引

发了抗战时期著名的美金公债案。

1942年，中国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美国向中国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试图以此提振中国军队的士气，牵制日军，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财政部长孔祥熙制定了使用计划，以3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于美国，以1亿美元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1亿美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

公债在这年的春天发行，因其收益高，慢慢打开了市场，趋于热销。到次年春，公债尚余5000万美元，孔祥熙等贪利逐财，遂打算据为己有。他命令中央银行以发行额满为由停止出售，并在内部瓜分完毕。消息传出后，引起外界极大不满。适逢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黄炎培、傅斯年、陈赓雅等联名提出质问案，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对孔祥熙提出弹劾案。此时孔祥熙正好赴美开会，蒋介石无法对参政员交代，遂密令财政部代部长俞鸿钧密查，断定孔“授意中央

银行职员朋分公债券事”，并查得他们此次共鲸吞国币20多亿元，且有证据无法抵赖。蒋介石大怒，经不住宋美龄再三求情，最终处理结果只是“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及国库局长吕咸，辞职获准”。

与处理美金公债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蒋介石不顾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亲自布置，从重、从严办理了林世良贪腐案，赢得了短暂的喝彩。林是孔的亲信，因贪污150万元而被处以极刑，震动政坛。或许，蒋介石试图以此立威，整饬纲纪，严惩贪污，修明政治。1943年6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以增强对贪赃枉法者的震慑力，加强战时非常时期的统治。同时，为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在监察院内创立了纠举权和建议权。还设立了税务督察专员制度，分区督察，加强对地方的监视与震慑。而作为战时“民主窗口”的国民参政会，尽管没有实际制裁权，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震慑作用。

到了抗战后期，又有了新花样。那就是国民党部队经商和军队将领“吃空饷”“营走私”。蒋介石对此异常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在他授意下，战区巡察团四下逡巡，及时惩戒各战区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尤其对抗战不力或贻误战机的军政机关人员，随时予以建议或纠正。但这种威慑力是有限的，军队里的贪腐行为依旧盛行，“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抗战的进程。

登峰造极的“五子登科”

1945年8月，抗战苦熬八年，胜利一朝到来。对于经历了长期动荡生活的国民政府大小官

员来说，首先想到的是个人利益。接收沦陷区后，大量的财富呈现在内地飞来的“胜利者”面前，房子、条子（金条）、票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无一不刺激着这些道德缺失者们的贪欲。“在财富面前，很多持重的人也失去了自制，补偿心理掩盖了廉耻心，甚至不要白不要的心理和从众的心理，也一再麻痹着他们的神经”。接收时，事先并未做周密的安排，没有制定一个管理有效的计划，加之缺乏必要的监督，导致腐败横行。

在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操纵下，“接收”变成了“劫收”，这是抗战胜利而国民党政权丧失民心的起点。国内外许多人愈发认识到，体制腐败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迅速败亡的根本原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很有代表性：“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经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

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部队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即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权，和一个丧失了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承认“党的病状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提出“反对个人利己主义，抨击升官发财观念”，要求“随时淘汰投机分子、动摇分子、腐化分子及恶化分子，以保持党员成分之纯一”，同时提出“加紧监察工作”。六届四中全会甚至规定党员及政府机关干部皆需登记财产，不登记者开除党籍。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规定最终未能见到天日。

以“五子登科”的“劫收”为标志，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形势丝毫没有恢复好转。随即解放战争开始，投机者借机操纵图利，导致通货膨胀、物价暴涨。1948年的上海，一包米6月

售价法币670万元，8月就涨到法币6300万元，人们用麻袋装满纸币，却只能兑换一点点大米。

蒋介石痛心疾首，他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言及战后接收中的贪腐乱象时，捶胸顿足地呵斥：“你们这样乱来，不想想党国，不想想自己的前途，也要想想你们的家人啊！”

面对愈演愈烈的态势，蒋介石也曾想办法来进行制止，但一旦牵涉统治集团的高层，涉及家族利益、豪门利益，最终往往就是不了了之。时人对此曾评论说：“目前的法律，我不敢说保障不了人们，却确确实实地做了贪污大吏们的护身符。法律既失效用，贪官气焰，更一发不可收拾。清查‘豪门资产’的呼声于是应运而生，甚嚣尘上……但事实上，呼者自呼，听者还不是当作耳边风。”

介石与戒石

蒋中正，字介石，与“戒石”谐音，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何尝不知道“戒石”寓意着戒贪？但他这个“介石”，在执掌国民政府的岁月里，是否真正把“戒石”精神贯彻到底呢？

除了戎装，蒋介石日常生活总是一袭粗布长袍，一杯白开水，简单低调。不论时人还是后人，在评价他时，大多都认为他本人是不贪腐的，他和宋美龄也少有贪腐的传闻和行为表现。但是，蒋介石本身不贪不占，就能跟国民政府糜烂透顶的贪腐现象撇清关系吗？作为最高统治者，自然脱不开干系。

蒋介石最大的责任就在于嗜权与独裁，“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据说蒋在考虑军政领导岗位的人选时，更多是注重

其“忠诚”，而不是能力。“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对他就更加唯命是从了。”(朱汉国《1949：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一个腐败且不被惩治的官员，往往是颗有毒的种子，最终被那些有贼心没贼胆的权贵者效仿，慢慢地，有样学样，贪腐无孔不入，荼毒整个官场，再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而当官僚习气日重，贪腐糜烂遍地之时，蒋介石后悔也来不及了。

1948年，蒋介石越发感到贪污问题的严重和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威胁，但只能将他的全部愤慨与忧虑，倾吐在日记中了。

1月16日：“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

6月8日：“每念中央军队高级将领之贪污富有、淫佚无度以致忠勇之气荡然，廉耻之心扫地，是以不能整军。”“忍痛断臂与除毒，祛除情感，惩治贪污。提倡民主法则，加强群众监督力量，涤荡官僚恶习，与铲除豪门资本。建立组织与制度之基础。建立干部政策，慎选核心干部与新陈代谢法令之树立。”

1949年8月13日，蒋介石翻读旧日记，对国民党“干部无人，贪污怯弱”的情况，感到“悲愤之至”！这时的蒋介石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又是出台法规，又是成立机构，但最终收效甚微。

蒋介石到底也没能为国民政府立好那块“戒石”，他所有的反贪努力都走向了死胡同，这也成为他和他的政权最终覆灭、败退台湾的主因。在那悬于海外的孤岛上，他痛定思痛，训斥那帮恨铁不成钢的败军之将：“今天，我痛心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蒋介石结束训话的手势依然坚定。不过，倘若真是实至名归的“革命军队”，又何至于此？！

闻一多案：民国司法之死

“闻一多案”后，政治的贪婪彻底左右了司法。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

闻一多被暗杀时，梅贻琦正在埋头处理西南联大的复员事务，傍晚五点多，潘光旦夫人忽然急急地跑来了，说闻一多在回家的路上被当场枪杀，“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

这一天是1946年7月15日，听闻这一消息，身为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当场呆住了，立即派人前往闻家照料。在离家门仅十余步的地方，闻一多的鲜血淌了满地；闻一多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枪，被送往医院

抢救；闻一多的夫人高孝贞受此巨大的刺激，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

同时，梅贻琦急电国民政府教育部：“加急！南京教育部朱部长钧鉴：今日下午五时，在西仓坡宿舍门外，本校教授闻一多为暴徒枪击立毙，其余重伤。同人极度惶恐，谨先电闻。”这一天的晚上，梅贻琦在日记里写道：“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也很快接到了消息，这个突发事件让正志得意满的蒋迅速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昆明李闻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无智无识，徒增政府情势之险恶，领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

不仅仅是梅贻琦和蒋介石，还有更多的人在闻一多事件发生之后，都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曾倾倒在南京国民政府一侧的政治天平，此刻又

在发生新的微妙的逆转。

群情

闻一多是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即席做了他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后被暗杀的。在此之前，中国政局刚刚走过了一段“过山车”般的急剧转变；闻一多之死，对于众多关注政治走向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次更大的刺激。

1946年1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共产党、民盟、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的代表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几经周折后，通过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改组政府等决议。这是自国民党一党训政以来，第一次由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平等、公开地决定国家大事。

眼看中国即将踏上宪政之路，人人都为此兴奋不已，马叙伦用生动的语言写道：“风雨如

晦，鸡鸣不已，现在是被鸡唱出了曙光，怎样不叫人们对这个曙光发生欣慰，希望它不要被阴霾来笼罩了。”

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却让他们吃惊连连，长期占据一党独尊地位的国民党，既无与其他政治团体分享政权的心理准备，其军政官员更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殊利益，政协会议闭幕未几，即遭到国民党内部激进势力的强力反弹，在重庆较场口还有西安、南通和南京下关等地制造了一系列流血事件。李、闻被暗杀更是发生在“一城之内，五日之间”。

在闻一多被刺次日，消息传至重庆，正候机北上的西南联大教授非常震惊。17日清晨，汤用彤、金岳霖、叶企荪、周炳琳、黄子卿、汤佩松、姚从吾等34位教授联名致函教育部转国民政府：“一代通才，竟遭毒手！正义何在？纪纲何存？同人等不胜悲愤惊愕！”7月17日，在南京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也发表了李、闻惨案抗

议书，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撤换昆明警备司令，限拿凶手，交法院认罪，并由政协委员派员陪审。

栽赃

身为国民政府的首脑，蒋介石也被闻一多案深深震动，“本周几乎全为此事增加烦恼之苦痛也”，7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三天后他又写下：“总之昆明之案无论对内对外皆增加政府与余个人之地位艰难百倍。”

整日“忧闷”的蒋介石百般琢磨，考虑着如何化解这个公共危机，让他和国民政府渡过难关。

担负“调处”国共纷争之重任的马歇尔也因闻一多案而压力大增。7月17日，在见过周恩来后，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即刻从南京飞赴庐山去找蒋介石。马歇尔对蒋介石说，这次暗杀针对了闻一多这样的留美知识分子，所以美国的舆论肯定

对蒋不利；司徒雷登坦率相告，蒋介石应采取三项措施：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解除新闻管制；建立宪政政府。

不能无视公愤的蒋介石，于7月17日当天，匆匆责令行政院发出一纸保障公民安全的命令。命令声称：“该管各级机关人员防范不周，遂致有此惨案，实为我政府莫大之耻辱……尤应在此时期，对于政治党派人士特加保护。”在发出这项命令的同时，蒋介石下令让刚刚上任全国警察署署长的唐纵前往昆明办案。

此时，舆论已把怀疑对象投向了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7月17日，闻一多的次子闻立雕撰写了《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将矛头直指昆明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次日该文在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和《新华日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新民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等报纸刊出，随后又被多家报刊转载。

唐纵在动身前往昆明前也怀疑李、闻案都为陈诚系的霍揆彰所为。因在当年5月份，霍揆彰就令稽查处处长王子明制定了五十多人的黑名单。6月28日，霍带着这个名单到了南京，向国防部长陈诚汇报，准备带给蒋介石圈定，但当时蒋正和马歇尔会谈，没来得及接见霍，霍只好把名单和行动方案留在国防部返昆待命。7月5日，霍揆彰接到了国防部密电：“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7月17日晚，唐纵与吴铁城、陈诚商议李、闻案，陈首先而坚决地表示，“此事件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唐纵日记》）

唐纵将行，友人嘱托他办案要“控制舆论，计划周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为他担心，“莫不认为此事难办也。”（《唐纵日记》）心思重重的唐纵没有直接赶赴昆明，而是先和毛人凤商议办法，又飞到重庆去找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

此时各界正对唐纵的调查拭目以待。重重压力之下的唐纵和沈醉商议，想“将计就计”制定一套栽赃中共的计划来息事宁人。沈醉在回忆录里说到这个“好办法”：“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党。”

就在沈醉挑选“人犯”的时候，毛人凤突然有电话来，说军统云南站已找到线索。23日，唐纵、沈醉等飞抵昆明，军统云南站站长王巍当天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沈醉《军统内幕》）

军统特工程一鸣此时也被蒋介石派至昆明协助唐纵查案。根据云南省警务处和昆明市警察局有关闻一多案的材料，程一鸣亲自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的现场观察，搜集现场

遗留下的各种痕迹和证据。经过各方人士的指证，在现场找到子弹壳和弹头，吉普车车轮的痕迹及目击者讲出的军用吉普车牌照的号码。经过综合调查研究，“各种证据都指向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他是闻一多谋杀案的指使人。”（《程一鸣回忆录》）

程一鸣把调查结果告诉唐纵，唐纵非常为难，因为他和霍揆彰既是黄埔同学，又是湖南同乡，这可如何是好？

还是栽赃

7月24日，唐纵和霍揆彰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整个上午霍揆彰都在说他对李、闻案毫不知情，还要唐纵帮助破案。唐纵就接着霍揆彰的话头说，他此行带来了军统的几名老练特工，可以帮助霍揆彰做侦查。

同时，唐纵把军统调查到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并说霍企图抵赖，因此他处理起来很棘手。沈醉没唐纵那么多顾虑，建议把军统查获的材料展示给霍揆彰，唐纵不赞成，怕和霍揆彰闹僵了不好收场。（沈醉《军统内幕》）

霍揆彰此时也在抓紧“破案”。他一面以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悬赏缉凶启事，一面散布谣言说龙云集团乘云南省主席卢汉赴东北前线视察滇军，以“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并于7月20日拘捕了龙云任昆明行营主任时的副官处长杨立德。（《闻一多年谱长编》）

霍揆彰对杨立德刑讯逼供，但杨死不承认，霍揆彰没有办法。7月24日，蒋介石决定召见霍揆彰，霍揆彰飞到庐山，次日即在庐山被蒋介石大骂。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情况：“彼（霍揆彰）犹呈其假造人证与口供，幼稚荒谬极矣，乃面加斥责并明告其所部之所为，且出具行

刺之人名，即令彼自想此案之办法而退。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临睡时已十二时矣。”

但外间沸沸扬扬的传言已把怀疑指向了龙云。龙云一气之下于7月29日发表公开谈话，怒斥：“近日京沪少数报纸，对该案多作不负责任之报道，涉及私人之信义，不知其消息来源有何根据？”复声明：“无论为外人所投或自行采访，而一涉私人，即应负法律责任。甚望各报在政府未正式公布调查结果之前，对于此案勿再轻率发表不负责任之报道。”30日，马歇尔到南京，次日龙云便登门拜访，两人谈了近一小时。

唐纵也觉得霍揆彰的做法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劝他不要这么干了，另想他法。

两个替死鬼

一直密切关注李、闻案的民盟，不满政府的动作，7月20日，民盟主席张澜表示：“同人等对此事件，万难再忍。”要求组织“公民调查团”。同日，民盟政协代表张君勱等向国民政府提出，民盟参加调查惨案真相及审判主凶之要求，并再次提出立即取消特务制度。（《闻一多年谱长编》）

马歇尔在与蒋介石会谈中，也把民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了此事：“其（马歇尔）意中欲余允民主同盟之请求，准彼党共同侦查也，余婉却之。”此时的蒋介石仍然期望政府的运作可以平息闻一多案带来的风波，“此事自当由政府负责调查，如调查结果公布后仍有怀疑之点，自可组织有关团体参加研究。”

7月27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宪兵总司令张镇等被蒋介石派到昆明，全权处理李、闻案。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公馆里，顾祝同、张

镇、唐纵等人商议此案该如何解决。张镇认为，如果直接宣布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是暗杀闻一多的主谋，将对政府和“老先生（蒋介石）”都不利。建议由宪兵司令部负责，捏造一个事实，就说是驻昆明宪兵团派了两名宪兵去侦查李公朴暗杀案时，混进了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会场，又一次听到闻一多辱骂蒋委员长，因此才跟踪闻一多到西仓坡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门口，拔枪射杀了闻一多。两个宪兵这样做乃是“激情杀人”，是激于义愤，和政府毫无关系。这样一来，只需要惩办这两名宪兵，案件即可了结。（《程一鸣回忆录》）

顾祝同赞成张镇的建议，派人到庐山向蒋报告，由蒋作出最后决定，蒋决定照办，由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共同编造一个“激情杀人”的假案。

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再次召见霍揆彰，将之又一次“痛骂”，并决定拉两个小特务“挺胸做烈

士”。霍回昆明后，即以升职和奖励五百万元，并保证生命安全为条件，鼓励手下参与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出来“自首”。汤世良、李明山两名特务被“特别开导，晓之利害，动之以感情”，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愿意“自首”。两人编造了一套假口供，并改名为汤时亮、李文山，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明还抓了两个从四川流落到昆明的人，用麻醉药麻醉后，关在西站营房，准备在刑场上替换汤、李。（《闻一多年谱长编》《唐纵日记》）

调查团

唐纵、顾祝同等国民党大员一拨拨地到昆明调查，但真相仍是不明，司法仍是缺席，这让密切关注闻一多案的民盟方面非常不安，不断催促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民盟的“调查团”成行，但是一直“拖到8月初，只同意由民盟自己派人去调查，

政府给予交通的便利和调查时的便利，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一名秘书‘协调工作’。”（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3日，民盟派出的梁漱溟、与民盟副秘书长周新民会同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的秘书张寿贤由南京先飞重庆，因换乘飞机延误，6日才到昆明，开始工作。

对于蒋介石加派顾祝同到昆明调查，梁漱溟认为这是别有用意，“国民党为了做出‘重视’此案的姿态，也为对我们的调查进行阻挠，此时也派了一批军警宪大员飞去昆明‘查办’。”（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梁漱溟、周新民到昆明后，立即约见顾祝同等，但后者故意拖延，屡次推脱，改动会见日期，到了8月9日，梁漱溟、周新民才见到顾祝同等人。“我们见他们主要是说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要求将此案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这个

要求我们在南京时即向国民党提过，现在重提自然也是无结果的，但这是一原则问题，我们不能不表明。”（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8月13日，顾祝同和卢汉出面宴请民盟调查团，冷欣和张镇等作陪。顾祝同对梁漱溟说，暗杀李的凶犯未捉获，闻案的凶犯已捕到，后日即可开庭审判。当晚，梁漱溟等收到省法院通知，说15日“公审”，邀他们去“观审”。“我们当即回信说不同意这种‘公审’，但既经邀请，我为借此机会作调查，准备参加，并提出增加民盟云南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一人参加‘观审’。”（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顾祝同通知梁漱溟的乃是军法审判，依照当局制定的军法审判规则，受讯人不得委托律师出庭辩护并禁止旁听，这自然有利于顾祝同等人把事先的“安排”在法庭上全盘表演出来，但对梁漱溟等人而言，这根本算不上“法庭”。

约见政府人员没有多少收获，梁漱溟等人在民间的调查也多受阻扰。梁漱溟等人在昆明住在商务酒店，许多“客人”也前前后后住了进来，把民盟调查团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有一天梁漱溟在酒店餐厅吃早点，偶然遇见作家孙伏园的兄弟孙福熙，两人就寒暄了几句，在他们二人谈话后，特务立刻将孙找去盘问。

事事都被掣肘的梁漱溟只能感叹：“像这样的处境，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通过种种途径，通过美国领事馆，搜集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情况，足以说明这是国民党特务谋杀了李、闻两位。”（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审判秀

8月1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云

南省保安司令部，驻昆明宪兵十三团合组军事会议审判法庭，对刺杀李公朴与闻一多的特务汤时亮、李文山进行“公审”。这次审判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各大学教授、省县参议员、市商会理事长代表等二十多人参加，记者只允许中央社两人采访。梁漱溟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被陆军参谋次长冷欣以“伤势未好”为由拒绝。

（《闻一多年谱长编》）

梁漱溟对这种安排出来的军法审判很不满意，“审理中只有法官与被告之间的一问一答，问答完了即算审理完了。在被告回答法官的提问时，他们在公堂上做了一番演说，说‘闻一多是卖国贼’，说他在李公朴追悼会‘骂了军人’，他们二人出于一时‘气愤’，故刺杀之，此事与他人无关，云云。闻案就这样审理了一番，草草了事。结束时也未说明是否审理完毕。李公朴一案，则因为凶手根本不曾‘捉拿归案’，更是不了了之。”（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

等这场“审判秀”结束，中央社当天便发出电讯，表可以结案之意。但是，民盟方面坚持将凶手“移京公开审判，由各方参加”，反对“草率在云南解决”。梁漱溟、周新民等更认为，出现在审判席上的不过是假凶手。

梁漱溟还在“观审”后致函顾祝同，说明民盟调查团在旁听后认为疑窦颇多，请不要急于定案，并索取一份审讯记录的抄件，但顾祝同始终不曾出示抄件。

19日，顾祝同再次宴请民盟调查团。饭罢谈话，梁漱溟问：15日“公审”一天，好像是已经审完，可是为何又不宣判？如果不算审完，是不是将再审？顾迟迟答不上来，末后低声说：“我也还做不得主。”（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涯》）梁漱溟等人只得于8月22日返回南京。

8月25日，梁漱溟等在上海举办了新闻发布会，报告李、闻惨案调查经过与结果，用“吞吞

吐吐”四字说明当局态度。民盟认为案件未了，坚决主张把凶手移至南京审判，但当局对此无动于衷。同一日，顾祝同也在昆明金碧别墅招待记者，称霍揆彰之云南警备司令职已被革除。

在舆论的质疑中，李、闻案第二次审判也于8月25日在翠湖云南省警备司令部举行，判决汤、李二人死刑。随后顾祝同签署陆军总司令部法审布字第元号布告，宣判汤、李在昆明枪决。本来汤、李二人要按原计划用两名替身在行刑前换下，但是顾祝同不想再弄巧成拙。第二天早晨，汤、李二人被灌醉，拉至东门外执行枪决。汤、李二人知己受骗，但为时已晚。行刑人员把他们枪决后随即掩埋。

而王子民等参与暗杀的其他十几名特务则被送大理，名为关押，实则保护，并进行特务训练。1947年春，蔡云祈等人被“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但很快即获得释放。（《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重要凶手落网记》）

这次审判后，中央社立刻发出《顾祝同在昆发表闻案审判经过》《陆军总部昨发表闻一多案判决书》的专电。

崩溃

一个多月来，蒋介石一直在为闻一多案大伤脑筋，在日记里数次写下为处理该案“甚费心力”，待到最后的处理方案确定，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如此将闻案解决告一段落，再观舆论之变化也。”

舆论就闻一多案对政府的质疑并没有随着两次“公审”而止息。8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社论《闻案感言》，认为此案并未了结。30日，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宣判事致函政府代表，称民盟对审判结果不能完全接受。9月28日，民盟政协代表再次致函政府代表和蒋介石，

要求对闻案逃犯限期缉获，到南京公审。（《闻一多年谱长编》）

这些，都没能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回应，闻一多案就这样在司法缺席与暗箱操作中不了了之。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国共内战去了。虽然司徒雷登曾经在闻一多案审判前就告诫过蒋介石：“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国民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但是从蒋介石随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司徒雷登的这句告诫特加留意。

彻底丧失自由知识分子支持和民心的后果是国民党政权的加速崩溃。台湾学者朱文长教授曾撰文指出：“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重要性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主编，恰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在按语中写道：“闻一多之死，其影响绝不在平津等重要

城镇的沦陷之下。”

知识分子与政治的距离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只知道一门“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所以“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这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职业，也是他们的乐趣。传统士大夫从来就以谈论天下国事为己任和使命，因此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到了近代，随着政治专业化，特别是随着传统士大夫向专业知识分子转型，政治成了专门的职业，学术也日趋职业化，学术语言成了专业语言，政治家或许能够从中读出一点意思，但很难完全理解。然而，近代中国从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之路却并不顺畅，知识分子总是和政治发生种种纠葛，以至于历史的轨迹因此而屡屡

更改。例如洪宪帝制与筹安会，历史一再指责是杨度一班人误导了袁世凯，弃共和改帝制，而杨度则在洪宪帝制结束后坦然面对，以为“兄弟没错，错的还是大总统”。

杨度对洪宪帝制倒行逆施没有丝毫忏悔，他并不认为是自己的探讨有问题，反而指责是袁世凯这样的政治强人和他身边的宵小曲解了他们筹安会的真意。按照杨度的说法，君主立宪才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真正追求，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才是当时中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辛亥年间，中国在仓促匆忙中选择了民主共和，经过几年实践，国内外有识之士无不认为这样的民主共和有问题，如果不适度调整，就会将国家引向灾难，导致毁灭。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杨度的这些假设性前提毕竟没有实践的机会，因而也就无法验证。不过，杨度这些辩解中确实涉及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

系。

为洪宪帝制“临门一脚”的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也有同样抱怨。古德诺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宪法顾问，接受政府“委托课题”，研究何种政治架构更合乎中国国情，他的结论是：最适宜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并不是民主共和，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培育出一个足以支撑这个政治架构的新生阶级。然而，中国是否应该从“名义上”的民主共和政治架构向君主立宪政治架构转换，古德诺提出了几个限制性条件。然而，袁世凯对于古德诺的限制性条件不感兴趣，或者无意中选择了漠视。而对于古德诺的研究结论，则欣喜若狂，原本不太自信的帝制复辟思想因这“临门一脚”而坚定。看，连外国专家都这样说了，而且这个专家既是世界一流，又来自民主共和体制的美国。

结果等到帝制复辟失败，追究“帝制罪魁”的呼声日高一日时，古德诺也坦然面对，他表示，我是说过现在这种虚假的民主共和并不合乎中国

国情，但中国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重建君主立宪体制，我并没有说，我只是表示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国政府和民众公开辩论。现在走到这一步，我能有多大责任呢？类似的情形还有严复。严复在理论上也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君主立宪，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洪宪帝制之前的那些问题，都被严复不幸言中。但是严复并没有主动介入筹安会，他只是在杨度拿着“上峰”旨意说事时，半推半就地上了贼船。所以，等到洪宪帝制终结，严复也是有口难辩。他在公开场合选择了沉默，听之任之，相信政界的那些朋友一定会帮忙，一定不会把他当作“帝制罪魁”收监关押。

所有参与筹安会的人，都有各自缘因，不能说他们都是投机分子。但他们确实没有弄明白学理研究与政治实践永远隔着一道鸿沟，即便政治家非常尊重读书人，他也不可能忠实地将读书人的意思转化为政治实践。政治有政治的规律，学术有学术的门道。政治家按照需求选择读书人提

供的方案，但决不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那一种，因而读书人不能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厢情愿地为政治家出谋划策，可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政治家只要你的结论，而不要你的前提。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在为政治出谋划策，而在对政治保持适度张力，保持适度警惕。

第四章 旧闻新说

民初国学大师的生意经

章太炎：不懂用钱，却能挣钱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慕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民国建立后，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为伉俪，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齐了“四色”。

革命成功，章总算有了“家室”。但他不仅“家”是租的，连家具都是借来的。全部财产，

就是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老友送的贺仪，大约7000元。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朋友对他说钱多了不好携带，不如存入银行。章太炎觉得有道理，就委托其去办理。那人拿回一张存单给章，几天后，汤国梨发现只有3500元。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烂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10万。梁不同意，说最多1万。章太炎骂了

一通，才拿钱走人。

胡适以羡慕的笔调叙述：“章太炎一下发达了。”不过，章此举实在荒谬，一时被传为笑柄。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以为一件东西就是一个价，一张钞票用一次。买东西也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5元；女儿要做大衣，给5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5元；看中了一本书，给5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5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章太炎的好日子没过多久，二次革命的时候，他被袁世凯骗到了北京，被软禁了2年多。不过在软禁期间，袁世凯还给他发了“工资”，每月500银元。

民国初期，章太炎手上虽然没存款，但也不怎么缺钱，没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凯、黎元洪等人都当他是“国师”、“顾问”级别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贴或者补助。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章夫人汤国梨常出门张罗钱财，有时甚至去当铺典质。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困难，章夫人汤国梨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

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金，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子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写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对章太炎的行径，许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陈独秀就批评：“晚年的章太炎，给军阀官僚写墓志、寿序一类的东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万银元的润资，变得庸俗了。”连鲁迅对恩师这种举动也颇有微词。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有过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钱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梁启超：最重要的是投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遭到通缉，流亡海外。当时在海外华侨中，保皇党依旧有很大的实力，两人便以“保皇会”的名义，用股份制方式，向港澳地区、北美和大洋洲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位于上海外滩租界）和“新民丛报社”。

梁启超没钱，但能写东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为“技术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丛报》初创，主要文章几乎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对中国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丛报》在清末年轻人心中的地位。毛泽东曾回忆：“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

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周作人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文章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他。

报纸畅销，报社的回报自然丰厚，在1902年到1903年间，梁启超分得“新民丛报社”红利上万银元，当时1银元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多一点。也就是说，梁启超随便干一年，就成了百万富翁。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半月刊《庸言》，当月他在家信中说，《庸言》第一号印了一万份，没多久就卖完了，还有续定数千，形势喜人。明年二三月间，销售额估计能达到二万份，要是真这样的话，“则家计粗足自给矣”。如果每期的实销都能达到二万份的话，“年余五六万金耳”。

梁任公一年赚五六万，居然说“家计粗足自给”，这气魄估计让不少人羡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两卷30期。

北洋时代，梁启超曾两次担任政府总长，一是1913年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二是1917年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时间都不长，以梁公之人格和赚钱能力，实在没必要贪墨。1918年底，梁启超退出政界赴欧游学，宣称以教育文化为业，走教育救国之路——此次游学，梁公基本是自费，换一般人肯定开销不起。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兼课，后应聘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月薪大约四五百银元。

无论是当政府总长还是清华导师，梁公的工资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税就不得了。民国初年，版税给的最高的地方，当然是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多火呢？据学者陈明远考证，“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

约为1000万银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蔡元培、梁启超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梁启超在商务印书馆拿的版税虽然比不上林纾和蔡元培，但为数也不少。仅仅举一个例子：1922年10月，梁启超给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写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版税照旧，为40%；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20元。张元济则回信说：“千字20元的事情，请别跟其他人说，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个像您这样的高手都这么要，咱支付不起……”

梁启超颇有经济眼光，将不少钱拿来投资，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东，也曾往北洋其他实业里投资。1928年他给女儿的信中透露：“有二万内外资本去营业。”

也就是说，无论在政界、文化界，还是金融界，梁启超都游刃有余。不过梁公平时作风简朴，除了喜欢发表政论，干点“通电全国”的事儿，个人倒是没多大开支。顺便提一句，清末民初发电报可是相当烧钱。对政府的行为有所不满，给全国有影响的几百家报纸都发一通电报的话，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银元——梁启超每年都要以个人名义干几次，足见其豪奢。

讲了这么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况。

两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养亲戚家的几个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这么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个人养活，压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仅维系着大家的日常生活，还同时供应两三个子女前往美国、加拿大留学。另外，老友林长民去世后，梁启超又帮忙照顾着林的两个妻子和几个孩子——当时梁先生的儿子梁思成

和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已经订了婚，正在国外留学。倘若不是梁启超，林徽因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学业。

梁启超还很注意投资房产，从1912年归国之后，十余年时间在北京买下来了几处住房，都是气派的四合院，无论租与卖，都是大资产。让他最满意的房子还是建在天津的“饮冰室”，由东西并立的两座现代化三层小洋楼组成。他晚年的许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里写成，后辟为梁启超纪念馆。1925年8月，梁启超还出资1万元买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别墅，这座两层小洋楼作为梁家人休闲避暑所在。

无论梁启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钱来得都很干净，所以他不赞成章太炎晚年对权贵的态度。但若说梁启超是文人中“理财大师”，另外一个人肯定会冷笑几声——没错，此人就是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

康有为：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即便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丝毫影响不了其张扬着发大财。如果说康有为是民国文人中最有钱的，没有之一——估计没人反对。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益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

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地价上扬好几倍，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一批保皇党成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55岁的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康有为多精明

的人，自然不依，联名广东缙绅十几个，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了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闻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十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比。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元，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都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

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

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儿概括：豪奢。

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两只孔雀、一只麋鹿、一只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为除了在张勋复辟时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几乎没做什么大事儿。他有两大爱好：一是投资房地产，二是四处游玩结交朋友，有时候两者结合起来，在游玩中投资赚钱。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三处别墅

——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三十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四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国书法史上也能占有

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书润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元。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几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十余人，多则三十余人，全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拜门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约160斤。仆役每天采购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于1万2千银元。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70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对其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其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

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人的终结。

亦真亦幻“大槐树”

从明嘉靖年开始，“大槐树”开始出现在关于移民的传说中，成为北方人群对祖先历史的集体记忆，并经过清初的修谱牒、碑文逐渐凝结为一个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树”已经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书出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

对此，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作为一个致力“大槐树”研究将近三十年的地方学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论断：“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无论

从时间上，从地域范围上，从组织规模上来说，无疑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顶峰，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根据张青的统计，从在明初洪武至永乐的50年间，从洪洞大槐树下出发的移民运动达18次，有汉、蒙、回、满四大民族参与，大槐树的移民始祖姓氏为1230个，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陕西、安徽、江苏、甘肃、宁夏、广西、湖北、山西等18个省（市），600多个县份。而后经过历代转迁，大槐树的移民又遍及全国乃至海外，“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代”，总人数超过两亿人。

然而，在“大槐树”成为中国移民史上最为闪耀的关键词的同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无数的大槐树后裔，都在一次次发出疑问，为何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广泛的移民运动，却不见诸于正史的记载？大槐树移民到底是一场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一部被建构的历史？为何数以亿计的

人，都把“洪洞大槐树”作为遥远的故乡？

至今，这些问题仍然是未能完全解开的“历史之谜”。

“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张青认为大槐树移民的规模为中国移民史之最，依据是其“有志可稽，有谱可查，有函可依”。事实的确如此，各地数不清的家谱记载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几百年来，更有众多的大槐树后裔不断地前往洪洞寻根问祖。

然而，当人们开始探究大槐树的背后时，所遇到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为何只有在家谱里，才能见到这场移民运动的无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会会员赵戴文在为《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做序时，就曾为大槐树的影响之大甚为感慨：“吾晋洪洞县大槐树，声噪于直、鲁、

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鲁、燕、豫之人，历其地者，无不以为先祖之古迹，肃然生敬焉。”但是让他遗憾的是，这样的一场移民运动“但不见诸史，唯详于谱牒。”

不仅仅是正史没有记载这一事件，就连移民的发生地洪洞，在从明至清所修的6个版本的县志中，也都对大槐树只字未提。

研究者只能以各地的家谱作为进入“洪洞大槐树”的主要依据，当寻根者前往洪洞寻找故土时，他们的依据也是手中泛黄的家谱记载。然而，目前可见的最早提及大槐树、老鸛窝的家谱是修于公元1586年（万历十四年）的江苏丰县刘家营刘氏族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县野鸛窝，世远代更，未易追数。元末大乱，我始祖考讳顺，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丰壤，见其土沃俗美，于城北三十里许，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刘家营’。”是时，距离明初的山西移民运动，已经过去了两百多

年。

在之前的族谱和碑文中，虽有关于山西的记载，但并没有“大槐树”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阳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三月的《细城岗任氏先陇记》载：“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东南细城村”；随后，“洪洞”开始在家谱中出现，如修于明嘉靖七年(1528年)的河南长垣县西了墙村《王氏家谱》载：“我始祖讳实，晋之洪洞县大王庄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讳义，迁居长垣县合阳里西了墙村。”

大槐树、老鸛窝在明末的家谱中开始屡屡出现。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间以后，拥有类似记载的家谱数量急剧增加。在张青等人搜集的谱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树后裔的家谱绝大多数创修于清朝中后期，其中关于洪洞大槐树、老鸛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郑氏族谱载：“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阳西山岭头李氏家谱载：“后人欲知木本

与水源，山西平阳洪洞县。大槐树镇户千家，洪武诏下迁。山西洪洞县内迁万户，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间修的临清张氏族谱载：“张氏系出于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郑州郭氏族谱载：“吾姓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郑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温县王氏族谱载：“由山西洪洞县携四子迁巩之南河。”光绪十三年修的菏泽王氏族谱载：“始祖原籍山西洪洞县老鸛窝木查村。”

到了民国时期，甚至出现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经洪洞迁徙的记载。如民国四年（1914年）清源北营村王氏族谱抄本载，其始祖于明代由陕西红庙迁到洪洞大槐树，经官分拨到清源北营村；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长头村孟氏族谱也写道：“其系山东孟轲后裔，先祖迁陕西，后迁山西洪洞，元时因均赋均丁，始祖孟和奉遂迁至现址。”

1926年，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选定河北定县为“华北实验区”后，在当地进行了社会调查，并于1933年由李景汉编成《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出版，书中记载，在接受调查的62个村庄中，共有10445户，分为110姓，除了极少部分例外，村民大都认为先祖是在明初从山西洪洞迁来定县的。

如今谱牒中所载的大槐树后裔密布于广阔的华北区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最为集中，在这三个省份里，各有七十多个县（市、区），其居民多自认为是洪洞大槐树移民后裔。在河北，邯郸县地名办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在全县12个乡镇250个村庄里，有一半以上村庄自认是从洪洞迁来，理由便是“有家谱、碑文可稽查”。在山东，据嘉祥县地名办的调查，全县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认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迁来山东。

与这些家谱一起广为流传的，是众多有关明初山西迁民的传说。“燕王扫北”说的是朱棣起兵

靖难，造成中原、江北地区“千里无人烟”。战后，登基称帝的朱棣不得不从洪洞大槐树移民到空虚之地。“三洗怀庆府”讲的也是类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乱，朱元璋与元朝的精锐部队在怀庆府一带反复攻战，当地居民反复无常，元军来支持元军，朱元璋来支持朱元璋。眼见着战事毫无进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军把怀庆府百姓斩尽杀绝。领命的常遇春带兵在怀庆府杀了三个来回，直到此地鸡犬不留。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烟密集的洪洞向怀庆府移民。

“打锅牛”“脚趾甲复形”“背手”“解手”的来历等，则描述了大槐树下迁民的过程：移民们留恋自己的家乡，官府就贴出告示说：“不愿迁徙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内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乡民纷纷扶老携幼，汇合到洪洞大槐树下，官府却突然“变卦”，众多的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

的百姓，强迫他们立刻迁徙，不忍离别家园的人们痛哭失声。官兵强迫人们登记，领取凭照，并用刀子在每个人的小脚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将一口铁锅打破，各执一块，作为后代的认亲标志。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于长时间被捆绑而变得麻木，但是时间一长，大家也习惯了，到了新家园也习惯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要解手”，于是到后来，“解手”就成为大槐树移民后裔所说的上厕所的代名词（在对“湖广填四川”的民间记忆中也有，类似“解手”的传说）。

在一个又一个村落中，人们伴随着“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鸛窝”的民谣出生、老去。在不断发酵和成长的“大槐树”族谱和传说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认知，扎根在无数人的内心深处。

族谱里的“大槐树”

与无数“大槐树族谱”的产生和急剧增长相应的是家谱体例的完备。明成化七年（1471年），黄岩谢氏重修族谱，“参用欧、苏家法”，“篇有序，序有义”，把族谱分为七项内容；金坛段氏做族谱，则“先之图，次以家传，又以先世遗文与凡儒硕诗文为段氏作者”，再加上谱序，共有四项内容；江西丰城游氏做族谱也是先列本族世系图，以表世系，次之谱，以记其行实，而后列历朝诰赦及名儒的词章，再加上谱序，共有五项内容。至此，明代宗谱的体系大致定型。明万历以后，各地编撰的族谱更多，体例也更加完整。

在体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对修谱的时间间隔也更为注意，短则十年一修，长则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补充新材料，使族谱充实、完整。

根据长期关注并搜集大槐树移民资料的研究

者黄泽岭的观察：“在嘉靖年间以后，宗谱的编修已经相当正规化和经常化了，这是嘉靖中后期宗族发展的结果。”

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这种现象，是在以往的中国所鲜见的。从先秦到魏晋，编撰族谱曾是王公和士族的专利，一直到南北朝时期，一般人等还是不被允许修家谱。唐朝建立后，随着意在抑制山东旧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录》《姓族系录》《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谱》《皇唐玉牒》等一系列巨制官谱的问世，私修家谱之风开始出现，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华门寒族”也“百代无闻，而骅角挺生，一朝暴贵，封锁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兴起后，私修家谱现象更多，编撰者们相信：“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宗法》）。欧阳修与苏洵则首开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谱先河。至和年间，欧阳

修“以其家之旧谱问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诸本”，编成欧阳氏新族谱；大约同一时期，苏洵也有感于自己宗族间“喜不庆，忧不吊”“相视如涂人”的状况，编成苏氏族谱。欧、苏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们编撰族谱的体例，遂为之后的族谱编撰之典范。

明朝建立后，面对“崖山之后无中国”的局面，首务之一就是重塑汉文化的正统。1279年，广东崖山，宋朝在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中惨败于元军，陆秀夫负帝蹈海，而在此之前，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已在金朝的统治下度过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在历来讲求“华夷之辨”的传统中国，异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后果无疑是极为严重的——兵燹战乱、颠沛动荡导致礼俗隳坏流失、文脉断绝。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亲自撰写《资世通训》一书训诫天下：“今朕统一寰宇，昼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复古治道，乃著是

书。”接下来，毕其一生，朱元璋都在尽力扭转“胡俗”，以“复先王之旧”。

在兴学校、行科举，以程朱理学为基础，广兴推行教化的同时，明朝也对仍存在的对平民祭祖的限制进行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变革宗族制，“乞诏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这条建言随之引起巨大反响。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着只能追祭三代的限制，此外还有“庶民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等诸多限制。

在夏言提出建议的当年十一月，明世宗“诏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制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为普遍现象，私家修谱之风更盛。

清朝的建立并没有打断这一过程，相反的

是，身入关后没过多久，康熙就颁发了《圣谕十六条》，要求天下臣民“笃宗族以昭雍穆”，此后乡约与宗族结合，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更为普遍化。

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清朝中后期，传统社会在重重冲击之下开始崩塌，但是编修家谱之风却达到了顶点，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当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始祖时，很快遇到了“我从哪里来”这个难解的问题。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县刘氏族谱编成，自认是一个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县，不知其几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为县，古河阳郡也，遂家焉，传六世矣。”刘氏乃是士绅之家，其族谱纂修者刘章之兄刘文是天顺六年举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学熏陶。如果说他们寻找始祖尚不为难的话，那么其他人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从“致仕县丞德州宋谏”为

刘氏族谱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来：“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躯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众口相传的“大槐树”就这样开始进入无数的族谱之中。在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河南济源卫沟卫氏于雍正十三年创修了《卫氏家谱》，家谱称：“祖籍山西晋阳人也，迁于河南怀庆府济源县西阳里无恨村，又移西轵城小十字后居下泥沟。”这同相距两三公里的轵城卫氏始祖来历的说法是相似的，轵城卫氏“本山西省阳城县人，洪武年间避乱迁居于垣曲县之西南峪子村”，而轵城卫氏是远近闻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间曾经出过卫肃、卫诒、卫谋三位进士，很有势力。卫沟卫氏也许是附和了让他们羡慕的轵城卫氏，不过到后来，卫沟卫氏干脆“变革”了他们的始祖籍贯，此后每次续修族谱，卫沟卫氏的说法就有一次新变化：嘉庆六年卫沟卫氏族谱的序言为“余族由太原而迁济居住无恨而移轵，源远

流长”，咸丰二年家谱则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迁无恨继迁轵镇，更迁泥沟。”从阳城到太原再到洪洞，卫沟卫氏终于成了洪洞移民。

还有人干脆把对“身之所自出”的怀疑写进了族谱，如创修于顺治十一年的河南济源东留养村《任氏族谱》写道：“余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济源县轵城里一甲当差至今，相传已三百余岁矣。或曰：其先盖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来曲沃至济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则是毫不迟疑地把“洪洞”写进了族谱，并谆谆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昼出负贩”“弗事诗书”的河南孟县东田丈村花廷宝创修了花氏祠堂，并“尝谓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迁移以来，世代变更，子孙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遗也。’”

“传说进入族谱，便成为可信的史料，族谱所说再被采择进入正史或者学术性著作，历史就

这样被亦真亦幻地建构起来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对于这段谜一样的历史，还有人给出了这样的解答：“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户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迁自洪洞，绝少称旧日土著及明初军士。盖自魏晋以来，取士竞尚门户，谱牒繁兴，不惜互相攀附，故虽徙居南方，其风未泯。而中原大地，则以异类逼处，华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窜流离，族谱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叶，户口渐繁，人始讲敬宗收族之谊，而传世已远，祖宗渊源名字多已湮没，独有洪洞迁民之说，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无论为土著，为军籍，概曰迁自洪洞焉。”（邹古愚修，邹鹄纂；民国(1934)《获嘉县志》卷8《氏族》）

“民族主义”下的大槐树

清末民初，洪洞贾村人景大启在山东观城、茌平等县任典史，他所见到的已是处处皆为大槐树后裔的局面，经行之处，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听闻他来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谱拿给他看，都说是从“洪洞大槐树老鸛窝”迁来。

这些经历让景大启甚为感慨。当时还有一名洪洞人刘子林也在山东为官，景、刘二人相商后，遂起创修古大槐树遗迹之意。二人在山东募得纹银390两，寄回洪洞托人维修广济寺残存之塔基，并修建古大槐树纪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银两耗完，创修大槐树遗迹之事只好停顿。恰好此时曾在河南确山、登封等县任知事的洪洞人贺柏寿致仕还乡，又募得钱300余吊，使得创修大槐树遗迹建设继续进行。民国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树、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内的遗迹创建，从此“洪洞大槐树”开始有迹可寻。而在此之前，自认是大槐树移民后裔的他

乡客来到洪洞，虽有“不胜故乡之感”，但无处可觅先祖出发处，只能站在汾河边上“抚景流连”。

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景大启在确定地点时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传闻”，他在《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古大槐树子在敝庄广济寺之西，即世所谓迁民处也。”

就在洪洞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对大槐树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派卢永祥进攻山西民军，卢部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在与洪洞比邻的赵城（后并入洪洞县），“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如此抢掠三日后，卢部南下洪洞，“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留下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然而到了洪洞后，卢部却秋毫不犯，途径古大槐树处，士卒还纷纷下马罗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为祖宗里居所在地，弗扰也”，贺柏寿等人由

此也感到，大槐树实有“御灾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绅创修大槐树遗迹的同时，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也正在快速向现代转型，民族国家的概念开始出现在上层知识分子的头脑中，包容儒学、诸子与黄帝的“国学”迅速形成。在“反满救汉”的旗帜下，“尊黄”思潮风行一时，革命党人把西方的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夷夏观”结合，推崇黄帝为汉民族始祖，大量关于黄帝的论述和专著随之出现，如刘师培的《黄帝纪年论》《攘书》，黄节的《黄史》，陶成章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此外还有革命性很强的《黄帝魂》等专著。同时，《国粹学报》《新世纪》《民报》《浙江潮》《警世钟》《新湖南》等报刊上也都发表了许多关于“黄帝”的言论，黄帝这个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在民族主义的萌发下，被革命党人塑造成了一个民族国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对于这一现象，孙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义

与黄帝崇拜之发明》中分析说，“尊黄”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国人为了民族国家的建构而新发明的一种“崇拜”，黄帝崇拜的叙事由古代、现代、本土、外来的因素编织而成，虽然表面上首尾一贯，其实是一个混合语，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在这样的潮流中，众口相传的“洪洞大槐树”迅速被纳入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来。洪洞地方的知识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进行再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象征，改造成为一个国族的象征。

民国三年（1914年），贺柏寿在其撰写的《重修大槐树古迹碑记》中说道：“方今民国肇造，社会主义播腾寰区。凡有关民族发达之源者，宜及时表彰，藉识人群进化之由，俾免数典忘祖之诮。然则吾邑大槐树处之待于揭诸者，顾不重哉。”

民国六年（1917年），大槐树第一次出现在了洪洞县志中，在其卷7《輿地志?古迹》中，“大槐树”等条记为“新增”，即：“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会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给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民国二年邑人景大启等募费竖碑，以志遗迹。”

民国十年（1921年），景大启又编撰了《洪洞古槐树志》百余本行世。十年后，洪洞人柴汝楨在旧志基础上重新编撰，汇为《增广洪洞古大槐树志》一书，时任洪洞知县的柳蓉为之撰写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树与蒸蒸日上的民族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无数的人都心系大槐树，“何以故，种族观念使然也……现值大同世界，一本散为万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奋斗，异族罔感侵略，同种日跻富强，遐迩交称曰：古大槐树关系种族，杨国争光，晋乘生

色。”

至此，“大槐树已经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园象征，而成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的意义被提升到团结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为现代民族主义话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

“偶然”的历史

“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咏史诗，也许只是发一点诗人特有的感慨，但却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经常会有的某种困惑。历史的演进，偶然性的因素实在太强了，很多事如果不那么赶巧，历史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战时英法残军困守敦刻尔克，如果希特勒不轻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继续猛攻，恐怕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几十万英军小命休矣。德军地面部队的停顿，给了英国人喘息之机，为英国保存了几十万生力军。否则，下一步如果德军进攻英伦三岛，恐怕英国连守卫的都没有。法国已经完了，英国再失败，美国人也未必会参战，那么，反纳粹同盟，自然就无从谈起。二战的历史

将会怎样？天知道。

同样，清朝最后一年，其实朝野上下也没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虽然革命党人拼命革命，精心设计的广州起义，动员了全党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结果，广州起义一败涂地。亲自领军奋战的副领袖黄兴负伤，领袖孙中山远避美国。可是，群龙无首的武昌新军，在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起哄一闹，居然大获成功。这个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义爆发前几日，起义者在汉口租界试验炸弹失败，他们的据点不会暴露。那么，新军中革命党的领袖，就不会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划成了起义，也跟此前多个起义一样，属于密谋家的密谋，参与者严重动员不足，劲头自然不会很大，一举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如果不是传说据点暴露，革命党人花名册落到朝廷手里，那么，新军上下的恐慌，不会如此厉害。道理很简单，谁也没见过花名册，谁知道那

里有谁。于是，凡是平时跟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或者看过过激宣传品的新军士兵（人数众多），难免不人心惶惶。从战争心理学角度，这种恐慌，实际上等于是一场最好的战争动员——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决心。当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个人心浮动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军官，不去多事，出头训斥躁动的士兵，这层窗户纸兴许也不会有人马上给捅破，拖上两天，士兵发现没事，也许恐慌就平息了。革命党人再想鼓动造反，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士兵们鼓噪起来，如果此时的湖广总督，是个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带上来的瑞澂，不急于逃跑，稳住阵脚，坚持两天，起义也难以成功。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于是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时历史好像密闭容器里的粒子，胡乱撞一气，谁碰上谁都没准，但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虽然未必像某些历史学家讲的那样，必然有规律可循。但有些大的方向，还是

有的。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当时不犯错误，就算纳粹席卷了全球，最终也维持不下去，因为这样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违背人性，迟早还是会垮掉，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时间跟现在我们已知的不一样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根上说是因为满清新贵的收权行为，得罪了大多数的汉人士绅，人家不再帮忙。闹事者总会有，有人帮忙，则闹不成事，没人帮，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国响应。毁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穷京官混世之法

京官穷，是古代官场的一个永恒主题，大家说也说不完。其实，京官穷，大官不在此列，权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难。穷的，只是那些小京官。所谓京曹，即中央政府各个衙门里的属员，无权无勇，人数众多，一般来说很闲，但却没钱，他们甚至比不上那些经手琐事的胥吏，由于有公务经手，在手续上就可以卡点油水出来。这种状况，在官吏分途而官员的俸禄又出奇低的明清两代，尤其明显。

京官之穷，是因为没机会直接刮地皮。同样一个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县，平常年景，说不上贪酷，一年几万两雪花银总是会有有的。但是在京里，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两银子，再加上一点禄米。京师米贵，居大不

易，这点钱粮，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么多半是要饿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欢哭穷，做了京官，则一塌糊涂，活脱脱一个个怨妇。最有名的是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里，在骂人之余，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困窘。还有人填了曲子诉苦：“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京官哭起穷来，好像每日等米下锅，忍饥挨饿，日子都没法过了似的，其实大抵属于“家兄江南没，舍弟塞北亡”的诗人作诗，当不得真。没错，这些小京官，的确房租经常拖着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赊”，动不动就跑当铺，经常随份子送礼，欠债也属于家常便饭。但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活不下去，事实上，他们往往出有车，

食有鱼，家里有哑巴牲口，还雇有拿工钱的家仆。李慈铭一边说自家没米下锅，一边却记录自己赴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鱼翅海参没完没了。当然，很有可能，这边主人在赴宴，饭店门口，仆人找来嚷嚷：“大奶奶说了，当的那个镯子到期了，赶快去赎！”晚清有嘲京官诗云，“天乐看完看庆丰(看戏)，惠丰吃罢吃同丰(吃席)。头衔强半郎员主(即各部的郎中、员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级属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签个字，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虽说有点夸张，但也八九不离十。其实，当年吃瓦片的租房户，即便承租的官员拖欠房租，也断没有把人赶走的，因为租户里有个官员，对外好说话。而平时的商家，从来都是赊账的，按年节一总收账，因此，拖欠和赊欠，对于官员不算什么大事。

总而言之，京官虽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穷，但日子并不真的像京里穷民那样难过。鲁迅先生的

祖父周福清，以见习翰林(庶吉士)大考未过，外放老虎班知县，因过于骄横丢了乌纱，马上就捐一个内阁中书进京，虽说没有钱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还过得不错，时不时可以捎点特产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来钱的道儿。

京官第一种来钱的道儿，是打地方官的秋风，即揩油。当然这种揩油，属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地方官总是要进京办事的，一进京，消息马上传开。同年(科举同届)、同事、同乡，一拥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开筵席同时撒钱。作为地方官，进京办事，有关部门自然需要打点。主管长官得重点关照，但是，自家的关系，也必须面面俱到，同年、前同事、同乡、大小菩萨，每个面前一炷香，一个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紧的是关系网，如果这种在大家眼里天然合法的关系，都照顾不到，丢下一个半个，马上名声就坏了。官场上，关系复杂，说不准谁和谁有点什么瓜葛，得罪一个，往

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时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却不能落个薄情寡义的名声，破坏官场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的撒钱，广积人缘，就是这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按这个规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没有政绩也不用怕，只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别倒霉，赶上战乱，进了官场，大抵都可以无灾无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种来钱的道儿，是吃来往京师的同乡商人。明清之际，官商之间往来的平台是同乡会馆。说起来商人们弄会馆，是便于同乡之间互助的，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玩意儿就成了周济进京赶考举子和穷京官的场所。举子进京赶考，可以在会馆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会照顾同乡商人，这属于商人的期货投资。对于现任京官，凭借会馆，时不时地给点补助，实在困难的，还可以在会馆下榻，不收房钱，这属于现钱交易。

京官的第三种来钱道儿，则属于职务额外收

入，这一点，古今一理，就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后，这种职务额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级官员机会更多。

所以，穷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只要有个官衔，即使在北京这种消费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脑满肠肥。

国士无双

汉元年四月，驻在灞上的刘邦军拔营启程，经由杜县(今西安长安)南部，进入子午道赴汉中而去。

前往汉中的刘邦军，不过三万余人。这支三万人的部队，是刘邦担任楚国砀郡长时期的本部兵马，他们自沛县起兵以来一直随同刘邦转战南北，最终从武关攻入关中。秦王子婴统领秦政府投降以后，刘邦接收了驻守关中的秦军，拥军号称十万。鸿门宴议和，刘邦接受了项羽的讲和条件，将投降的秦军全部交与项羽处置，只留下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这支三万人的军队，将士们都出生于关东地区，以泗水郡和砀郡出生的人最多，他们是刘邦军团的核心和中坚，史称砀泗楚人集团，未来汉帝国的功臣宿将，基本上都在其

中。

在这支三万人的老部队之外，还有一批数量不少的人私下跟随刘邦前往汉中。这些人，都出生于关东各诸侯国，他们或者随同刘邦由武关，或者随同项羽由函谷关进入关中，在项羽分封天下为十九国以后，按照各归故国的命令，都应当回到自己出生的国度去。然而，这些人对于现状不满意，不满足，他们不安心，不安分，不愿意马上回到故乡去，去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凡生活，他们还想趁乱拼一把，博得功名利禄。他们仰慕刘邦，觉得跟随刘邦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先吃些苦头也在所不惜。这批人的数量有数万人，史称诸侯子，他们加入了刘邦军，坚持下来的人，后来也成了西汉建国的中坚，革命成功以后，终身享受汉朝政府特殊的优待，这已经是后话了。

出生于楚国东海郡的韩信，正是属于跟随刘邦前往汉中的数万诸侯子中的一员。不过，在所

有的诸侯子中，韩信的野心最大，瞄准的目标最高，他是冲着指挥汉军的最高军职——大将而来的。

进入汉中以后，韩信被编入汉军，出任连敖。连敖是楚国的官名，大概是军中的中级武官。刘邦自起兵以来，一直是楚军的一部分，服从楚王，采用楚国的官制，他对于主动归属于汉军的他国将士，大体采用官制对等接受的原则，特别是归属过来的别部楚军，与旧部一视同仁。韩信在项羽军中最后的军职是郎中，相当于侍从武官，他在刘邦被左迁，在刘邦军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前来投奔，自然受到欢迎和优待，连敖的级别应当不低于郎中。

脱楚归汉的韩信，他的心愿，不是在军中积功步步升迁，逐级得到爵禄官职的封赏。韩信是自比姜太公和孙武子的人，他希望刘邦是周武王，是吴王阖闾。他认定刘邦有帝王之才，看准刘邦军缺少一位统军的大将，他希望以自己的才

干得到刘邦的赏识，成为汉军的统帅，领军击败项羽，成就如同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灭商，孙武子指挥吴军败楚的伟业。然而，离开项羽投靠刘邦，辞去郎中而任连敖，从级别上来说，或许算是有所升迁，从职务上看，反而离开君王更远，几乎没有直接进入汉王视野的机会。韩信大感失望，郁郁不得志的埋没感与日俱增，他跌入了人生的低谷。

据史书记载，韩信在连敖任上，犯法被定了死罪。韩信究竟犯了什么罪，由于史书失载，我们已经无法考究。以韩信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论，或许是集体逃亡？刑场上，同被判处死刑的人，前面已有十三人被斩首，轮到韩信的时候，他抬起头来，仰望刑场的监斩官大声喊道：“汉王难道不是想要夺取天下吗，为什么反而要处死壮士？”

当时的监斩官是夏侯婴，韩信的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见韩信身材高大，相貌伟岸，在即将

被处死的时候毫不恐惧失态，反而是冷静豪迈，堂堂能言，当即心生好感，下令刀下留人。夏侯婴释放了韩信以后，开始询问交谈，一席话下来，他心中暗暗称奇，感到韩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马上推荐给刘邦。

夏侯婴是刘邦的同乡，泗水亭长任上的铁杆哥们儿，沛县起兵以来的心腹大臣。夏侯婴的推荐，刘邦是买账的，他当即下达指令，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出任汉军治粟都尉的韩信，相当于刘邦军的后勤部长，官职地位，已经远远高于连敖，相当于别部将军一类了。

得到夏侯婴的赏识，被推荐出任治粟都尉，是韩信在刘邦军中出头的第一步。治粟都尉任上的韩信，因为后勤工作的关系，与当时担任丞相、负责整个汉王国行政事务的萧何有了接触。经过几次接触，萧何感到夏侯婴眼力不凡，韩信确是人才。

萧何是有识人慧眼的人。当年，刘邦还在泗水亭长任上厮混的时候，身为顶头上司的萧何早早地察觉到刘邦是内慧有肚量的人，敢担当能承头，对他另眼相看。后来的事实证明，萧何的眼光一点不错，刘邦确实是独步天下的帝王型人才。如今的萧何，识人的慧眼再一次开启，他预感韩信是独步天下的统帅型人才。更让萧何兴奋的是，韩信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汉中，可谓是上天特意赐予的瑰宝，来填补刘邦军的缺陷，引领刘邦军脱出当前困境的希望应当就在韩信的身上！

在萧何看来，刘邦的才能，政治长于军事。以政治才能而论，当今天下，无人能出刘邦之上。如果以军事才能而论的话，排名第一的，无疑是项羽，项羽之后，当数章邯。钜鹿之战，王离兵败，章邯抗衡项羽半年之久，正是在两雄难分高下的空隙间，刘邦才能够所向披靡，一举攻入关中。所以，以排名而论的话，刘邦当在第三。

进入汉中以后，刘邦所要面对的敌人，是章邯加上项羽，单纯地看，第一联合第二对第三，这已经远远超出刘邦的能力了。放眼刘邦军中，如同樊哙、周勃、灌婴这样的勇将是有人在，能够统领大军独当一面，可以与章邯和项羽对抗的人物，却一个也找不出来。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的缺乏，眼下正是困扰刘邦军的难题之一。萧何预感到，韩信正是这样一位可以填补空白的人才，如果有韩信的加入，眼前这场第一加第二对第三的不利博弈，将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刘邦军进入汉中以来，陷入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困境。汉中北有秦岭，南有大巴山，为一狭小的山间盆地，只有几条漫长而险峻的山间小道连接巴蜀和关中。在范增的精心安排下，以章邯为首的三秦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围堵刘邦，他们已经严密地封锁了汉中进入关中的所有通道。如何能够返回关中，进而东去，是进入汉中的刘邦军所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又一难题。雪上加霜的是，

足智多谋的张良，已经在项羽的命令下随韩王成东去，失去了军师的刘邦及其部下，至今想不出脱出困境的办法，正陷于焦虑和困苦之中。

在萧何与韩信的密切接触中，击败章邯，脱出汉中的事情，自然是必须涉及的话题。让萧何震动的是，韩信对此已经胸有成竹，他对萧何详细地分析形势，明确地提出了“明出子午，暗度陈仓”的反攻关中的计划。这个计划，让萧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在迷途中被指明了通路。当萧何进一步听取了韩信对于项羽的看法，对于楚汉间强弱形势可以转化的分析以后，他益发坚信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他断定，韩信，唯有韩信，是能够引领刘邦军走出困境的统帅人才。

国士无双，就是萧何在这个时候对于韩信所作的评价，他允诺韩信说，定将请准刘邦亲自召见。

土木堡之变：明王朝的转折

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450年8月30日），大明朝北部军事重镇宣府以东的怀来县土木堡，此地离京师西北咽喉要地居庸关一百来里地，而东距怀来县城只有二十五里。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和他亲率的数十万大军在此扎营，计划第二天天明启程，顺利的话当晚能越过居庸关，将蒙古铁骑甩在关外。

然而，骁勇而有谋略的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抓住了大明皇帝这个致命的错误，早已弯弓勒马等候时机的蒙古骑兵第二天将英宗及其扈从围困得如铁桶一般。怀来以西一百五十里的宣府，驻有重兵，但难以及时驰援。经过一天一夜的鏖战，蒙古兵突破皇帝行在外一道道防线——由于驻地水源被切断，明朝军队士气低落，国公、驸

马、尚书、侍郎等数十位高级官员战死，撮弄御驾亲征的大太监王振，被痛恨小人误国的护卫将军樊忠一锤锤死。八月十五日（公元9月1日）——正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中秋节，身边只剩下一个太监的英宗束手就擒。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次事件被公认为是明王朝从强到衰的转折点。从此，明朝对北部游牧民族采取守势，用重兵守住九镇等据点，修筑长城，企图御敌于外，舍弃了成祖的国防方针——最好的防守就是出击。后世修史者又一一如既往地为尊者讳，以阿Q精神书写皇帝被俘乃“北狩”。

这场巨变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于谦顶住了要求迁都南京的压力，力主英宗弟弟朱祁钰先监国，后称帝，是为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绝了瓦剌“奇货可居”的念头。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回京后过了一段囚禁生活，最后趁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掌握国柄，于谦受到了清

算，被杀。

“土木堡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多数人归罪于王振惑主，而英宗过于轻率地亲征——所谓的“浪战”。英宗原本可以避免这场浪战，皇帝亲征，多数是象征性的，固然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如果皇帝本人不是合格的军事统帅，往往弊大于利。英宗既不是也先这种马背上长大的首领，冒箭矢、逆锋镝习以为常，也不同于高祖朱元璋起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不同于成祖这样的雄才之主，带兵“靖难”而登九五。英宗八岁登基，长于深宫之中、妇人之手，连纸上谈兵的赵括都不如。

而专制最大的毛病是：没有谁能纠正最高统治者的错误。一种专制僵化的体制内，决策的正确与否，系于最高领导者的个人素质。若最高统治者昏庸，体制内储备再多的英才，也是枉然。

以英宗决定草率亲征为例，这不是个北征季

节，因为历朝历代中原王朝向北征伐，多半是春季开拔，秋季班师。原因是这个季节天气暖和，既利于粮草的储运，也利于南方士兵的作战。而北方游牧民族正相反，他们一般是秋高草黄马肥的季节，向中原王朝发起进攻，此时以农耕为主的中原王朝秋收结束，有了粮食，便于骑兵的剽掠。然而因为十四年七月，也先侵扰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天朝的威严受到了挑战，所以英宗仓促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吏部尚书王直的苦谏，英宗根本听不进去。

大军浩浩荡荡一直走到大同，早就摸清明军底细的瓦剌部避实就虚，不与锐气方盛的明军交战，而是等待其师老兵疲，在撤军途中伺机伏击。而撤军时英宗又听信了王振的话，不从大同南下蔚州，再经紫荆关回京师——这个路线可避开瓦剌骑兵的活动区域。王振这样的馊主意是出自私心，他是蔚州人，不愿意大军践踏他家乡正在收割的庄稼。而大军在十三日晚野营时，选择

的是水源容易被人切断的死地。可以说，英宗从决定亲征到被俘，可谓每一步走的都是最臭的那一招。英宗手下那么多军事人才干吗去了？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执拗起来，再合理的建议也不会被采纳，那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公允地评价，英宗实在不算一个坏皇帝。他最大的特点是待人真诚仁厚，特别有亲和力。如果是个普通人，这些是优点，若当皇帝则是不足，那些成功的皇帝往往高深莫测、刻薄寡恩。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比，在“职业化”方面，普遍逊色，因为明朝不少皇帝太有性格了，也就是说太像普通人，性格中有那么一点“痴”。比如英宗到死都怀念闯下大祸连累他被俘的王振，以及后来总想带兵打仗的武宗和喜欢木匠活的熹宗。

英宗为什么偏偏相信一个王振的话，而轻率地亲征了？当然有他年少气盛以及过于信任王振的原因。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就是成祖朱棣篡位以来，几代皇帝还没有完全解决的“合法性”焦虑。

刘基的儿子刘璟对攻下南京的朱棣说过，殿下百世都逃不过一个“篡”字。得位不正的质疑，是朱棣心中最大的伤口。既然程序不合法，那么只能希望用业绩来弥补。皇帝最大的业绩是什么？是开疆拓土，消除外部隐患。

朱棣迁都北京，从国土安全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如果首都远在南京，要抵御北部蒙古部落的侵扰，只能让北部边疆的将帅或亲王有专断之权，能便宜从事，如此就必然有藩镇割据之忧。当初朱元璋允许北部的宁王、燕王等藩王掌握武装，固然可以防蒙古骑兵，但终有萧墙之祸。所以朱棣把首都迁到北京，形成“天子守边”之局，固然有增强当政者忧患意识的作用，但首都的防务实在太艰巨了，蒙古骑兵一旦攻破大同至宣府的防线，一夜之间就能出现在京畿。朱棣在世时，数次亲征漠北，就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蒙古

骑兵的威胁，最后驾崩在军旅之中。朱棣死后，蒙古骑兵的威胁依然存在，还不断加剧。

经过朱棣二十余年的苦心经营，再经过仁宗、宣宗十一年的休养生息、宽厚为政，等到英宗即位后，如《明史》所言：“英宗承仁、宣之业，海内富庶，朝野清晏。”经济上、文化上以及人才储备上都是空前的强盛，等到八岁登基的皇帝长成二十二的青年，如果他能完成曾祖父未竟的事业，将瓦剌等蒙古部落远远地赶到漠北，彻底解决首都以及北部边疆的安全威胁。那么，这一帝系的合法性，谁还能质疑？这样的前景太有诱惑力了。

于是，皇帝浪战，其结局彻底改变了大明朝和北部游牧民族的攻守之势。从那以后，明朝再无力主动对外，军事力量主要用来对付域内的百姓。

中国刺客文化：士为知己者死

刺客是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行业之一。他们的活动一般非常隐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图在最短时间内，让目标人物及其相关事物遭受致命打击。

中国职业刺客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常由于政治原因，负责对目标人物进行刺杀。其行刺动机较为单纯，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带有一些侠的气息。秦以后的刺客，行刺动机多为金钱、名声、仇恨、政治等各类原因。

生活在游侠之风颇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过诗歌《侠客行》，对中国古代刺客这一群体，进行过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要

知道，李白也曾仗剑走天涯。

在各种史料记载中，中国早期的刺客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它也并不是一种不光鲜的角色，而是赋予了各种浪漫和高贵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为还被尊为“义士”，那刺客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刻画了一拨中国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轻人挂在嘴上、喜欢当玩笑话来开的那句“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始自于那个年代，而且在各种史料记载中，曾经真实地发生过。

持这种信念的刺客们，往往被尊为“义士”，它不仅成为刺客们行走江湖的一种执业信条，也是古代义士们最为崇信的一种气节。

本文从这句千年古语出发，探寻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们的举动，是特殊年代文

化熏陶下的真实触动，还是源自于道德绑架，都能让我们对当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窥一二，最终不得不承认，“死”真的是古代刺客们崇尚的最高气节。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要说中国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豫让。如今广为流传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就出自这位古代义士。他也被称为“春秋战国四大刺客”之一。

根据西汉刘向《战国策·赵策一》中记载，豫让姓姬，是晋国侠客毕阳的孙子。他先为范氏做事，后又给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让他觉得很是失败。

郁郁不得志之际，豫让遇到智伯，成为对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间关系很密切，智伯对他很

尊重。在他看来，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转，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际，豫让的人生事业却再次出现转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为晋国执政，因卿大夫赵氏拒绝献出封地，于是他联合魏氏、韩氏两家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

没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当时还是晋国卿大夫之一的赵襄子派人向魏、韩两家陈说利害，魏氏、韩氏竟然临阵反戈，联合赵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赵襄子擒杀。消灭智伯以后，三家分割了他的属地，并将晋国完全瓜分了。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三家分晋”。其中赵襄子最痛恨智伯，还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作饮器。

赵襄子就是赵毋恤，嬴姓，赵氏，名毋恤（亦作无恤）。公元前475年，执晋国国政二十年的赵简子按照自然规律死掉了，其子赵无恤嗣立。后来成为了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

所谓树倒猢猻散。主子没了，门客豫让无处可去，只好逃到山里。对智伯，豫让奉其为知己，却未能尽忠，空留一身遗憾，“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对赵襄子，他暗下决心，“吾其报知氏之仇矣”。

在那个年代，“报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当刺客，干掉赵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传诵的誓言后，他的内心种下一粒顽强的种子：以后什么事都不干了，只为主公复仇。

但是行刺并不是豫让所擅长的事情，他被后世奉为四大刺客，也不在于他武艺有多么高强，而是因为他对自己誓言的坚守，对忠诚的执着。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以后所干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会觉得此人太过偏执，崇敬的人会觉得这是一种信条和气节。这种气节要是放在现世，已是一种稀缺品，只能从古书中慢慢品味。

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要杀人，首先就得改头换面。豫让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伪装成一个受过刑的人，干的也是最低等下贱的活路：打扫厕所。凭借这身临时学来的手艺，他成功进入赵襄子的宫中修整厕所。

豫让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厕所的时候杀死他。这个算盘倒是打得好，但说实话，豫让真不适合做刺客。第一次来杀人，他就穿帮了。

虽然他如期等到赵襄子来上厕所，但赵襄子始终感觉厕所气氛可疑，这个修整厕所的人也从未见过，心一悸动，于是抓来一问，才发现眼前这人是豫让，衣服里面还藏着一把刀子。赵襄子马上把他逮捕了。

豫让也没有屈服。被审问时，他毫不掩饰自

己的动机：“欲为智伯报仇！”侍卫们都吆喝着要杀掉他，没想到，赵襄子倒格外开恩。

他无比感慨地说，“他是义士，我以后谨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是天下的贤士啊。”在侍卫们的一片反对声中，最后还是把他放走了。那可是一个有着义士之风的年代。

不得不说一下赵襄子，此人生于五霸称雄的春秋末代，卒于诸侯兼并的战国早期。《史记》中所列赵国的襄子纪年，在位为33年（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性格沉稳，颇有远略，见识不同常人。

要知道，在赵简子（赵鞅）的一干儿子中，最初赵襄子一点优势都没有，母亲是从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诸子中名分最低，处于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时候，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而是赵伯鲁。但赵襄子从

小机敏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般纨绔，乃至多年后他赢得父亲赵鞅的青睐，赵伯鲁被废掉，而他被破例立为太子。

前文提到的“智伯之怨”，实际上由来已久。赵鞅死后，晋国正卿由智伯瑤取而代之。智伯与赵襄子曾有过多次合作，比如一同率兵包围郑国京师，他很瞧不起赵襄子，曾骂他“相貌丑陋，懦弱胆怯”。四年之后，再次一同讨伐郑国时，智伯还借酒醉将酒杯扔到襄子脸上。

面对这些屈辱，就连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主动请缨要求杀掉智伯，以洗刷耻辱。但襄子的回答是：“主君之所以让我做储君，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我能忍辱负重。”

现在看来，他能容忍智伯，还不能容忍一个“义士”吗？哪怕，这是一个要杀自己的义士。

复仇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按理说，豫让被逮个现行，又被宽厚仁慈的赵襄子给放掉，证明自己就不是杀人的料，理应就该收手了，心怀感恩才是。但是豫让根本不会，他心里还揣着那句誓言：士为知己者死。

他干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开始全面改造自己的外形：不惜把漆涂满全身，使皮肤烂得像癞疮。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把自己彻底毁容，然后假扮乞丐乞讨。

令人感慨的是，他现在这副样子，走在大街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认得他了。不过，妻子说的一句话，又让他觉得对自己的毁灭还有待升级。妻子说，“这个人长像并不像我的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豫让转而就活活吞下火炭，为的是烧坏声带，改变自己的声音。这种事得要多大的

勇气，才能干得了。

就连朋友们也看不下去了，对豫让又是可怜又是惋惜，并且还泼起了冷水：“你这种办法很难成功，如果说你是一个志士还可以，但说你是一个明智之士就错了。”

他们为豫让支招说，凭你的才干，如果竭尽忠诚去侍奉赵襄子，那他必然重视你和信赖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赖以后，你再实现你的复仇计划也不迟，而且你一定能成功。

但豫让听了这话后，不以为然地笑了。他认为，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为旧君主而去杀新君主，这很不齿很不道德，也是一种极端败坏君臣大义的做法。

“今天我所以要这样做，就是为了阐明君臣大义，并不在于是否顺利报仇。”豫让和朋友的这句对话，得以窥见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复仇的

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复仇本身。

他说，“况且我已经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却又在暗中阴谋计划刺杀人家，这就等于是对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为却要为之，也就是为了羞愧天下后世怀有二心的人臣。”

在那个年代，这种理论确实很有市场，足以被天下义士奉为经典。

“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尽管提前做了各种计划，把自己也弄得面目全非，最终豫让的算盘还是落空了。

毁容之后的豫让提前摸清了赵襄子某天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在他要外出的那天，提前埋伏于一座桥下。值得一提的是，这座桥如今已成名胜

古迹，古典中还有记载，名曰豫让桥，并被解释为豫让行刺赵襄子之处。

豫让桥国内据传有两座：一座为邢台豫让桥，如今在河北邢台市区内，在明朝《顺德府志》中还有记载；另一处为赤桥，原名豫让桥，在太原市西南24公里的赤桥村，现存完好，桥为砂石砌筑，桥上勾栏围护，桥下晋水长流，赤桥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为赤桥村。

这天，赵襄子的人马果然行至此处。没想到还没到桥上，马儿突然受惊。赵襄子立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让。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让再次被拿下。两人有一番经典对话。

显得有些生气的赵襄子，跟豫让理论起来：“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消灭了，而您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托身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经死了，您为什么单单如

此急切地为他报仇呢？”

豫让解释了自己的初衷：“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

这句话的大意是，我侍奉范氏、中行氏，他们都把我当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样报答他们。至于智伯，他把我当作国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国士那样报答他。

赵襄子很受感动。在那个年代，“义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赵襄子也很服这种人。但他又觉得不能再把豫让放掉，就下令让兵士把豫让团团围住。正犹豫怎么处置他，没想到豫让首先开口了。

豫让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还无望，无法完成刺杀赵襄子的誓愿了。令人惊讶的是，他随后向赵襄子提出一个荒唐的请求：请他脱下一件衣

服，让自己象征性地刺杀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无法知道赵襄子当时的想法。根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最终襄子还是满足了豫让这个有点过分的要求，派人拿着自己的衣裳给豫让。

“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据说，他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中国人的隐逸史

最近一段时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封只有十个字的辞职信所引发的共鸣和调侃，又一次将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于现实的无奈展露无遗。

为理想一搏，还是留下来上班挣钱供房子，这种困惑和选择，如同规矩的人内心里偶有的促狭，总会借着机会冒芽。它最大的意义，是在自由隐逸的话题周期性沉寂后，借着热点的名义，把无数浑浑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拨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传疯的一篇名为《借山而居》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画家花4000元租下终南山小院准备过20年山居生活的过程。还有一篇《三五知己，一处小院，择邻而居》的文章，推

崇一种美式田园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痒难耐。再往前，是美国作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引发的隐士热。“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对这两篇文章和这一本书的高度浓缩。

但是，不管辞职信、文章和书多么撩拨，除了少数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选择继续沿着既定的现实生活轨道向前走。

每个人内心都住着一个隐士，即使只是偶然闪现，生命，也足够有寄托。

往历史的深处追溯，陶渊明所践行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和《归去来兮辞》所描述的意境，该是隐逸理想的最好范式。

陶渊明之前，严子陵是公认的隐士标榜。作为汉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屡次拒召，终老林泉，被时人及后世颂为不慕权贵追求自适的榜

样。浙江桐庐县的富春山麓，现在还有严子陵钓台。

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声名最显著的隐士了，他们以“巢许”并称，开启了中国经久不衰的隐逸传统。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也并非都单纯如上述陶、严、许、巢。钱钟书先生说，一些隐士“待贾俟时，非枯槁于岩穴者，苟相荐引，不耻小官。”不过是以营名为手段、以退为进、有迹无实的假隐者，这就是中国文学与历史上有名的“终南捷径”。

还有一部分隐士，是由于“为政者亦识隐士装点山林，其作用每胜于趋跄廊庙”，是有益于政教的。陈眉公先生的诗“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说的正是此类隐士。

鲁迅先生说：“真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

隐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按此推论，陶潜也好，严子陵也罢，都不能算真的隐士。至于《借山而居》中的画家，不过是一个懂得利用网络手段来为自己营名的假隐者，和真的隐士无关。

真隐也好，假隐也罢，中国几千年传承有序的隐逸传统，其实已经深深刻进了国人的精神根基，且每因时局、环境和风尚的变化而推陈出新。现实世界越迫急、生存环境越严酷，隐逸的理想就会越强烈。冲撞、反击、安顿，如此因循反复，从未两两相安。

只是忙碌的世界，见不得一个闲人。这个“见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个隐者，在大多数国人的实践里，不外乎是一种攀比心理。由是我们看到，旧的隐逸传统已经消亡，新的隐逸传统正在崛起，这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的认识维度。它应成为当下突破传统的隐逸宣言，并开启一种新

的隐逸模式：随时保有的“出走心”和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关于“出走心”，《借山而居》的画家应是此类；而“静持心”，在成都有这样的例子。

赖高翔这个人，很多成都人已然知道了。赖先生国学造诣异常深阔，对于先秦儒道以及诸子之学，造诣尤为精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也多有创获。1950年，赖先生辞去成都蜀华中学校长职务，便归田务农于成都东郊董家山，不久移居沙河桥东，躬耕自养长达三十五年。期间虽累有征召，先生皆不为所动，被誉为当代隐士。他总结这段隐士生活为“不失掉自己”。这正是“是处可隐”的“静持心”。

归结而言，做当代隐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样的“出走”和“不失掉自己”的“静持”，当是不另有三的方便法门。看看自己，二选其一，其实也不难吧！

第五章 重回现场

开元，全盛之日

公元713年阴历十二月一日，唐玄宗发布了改元文书，在这份被称为《改元开元之年大赦天下制》的文书里，大唐皇帝昭告天下，从此日起，年号改“先天”，第二年为“开元”元年。改元赦制以恩为主，同时加以惩罚、警告，意欲收拢各种政治、军事势力。

就在这年七月初三，玄宗先发制人，肃清太平公主集团成功。他的父亲、太上皇睿宗亦于同日归政玄宗，搬出了大明宫太极殿，搬进了百福殿。妹妹和儿子的火拼，把他推向了穷途末路。次日，他在隐退诏书中说自己放弃剩下的权力，从此“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至此，二十八岁的玄宗成为名实相副的帝国君主。自从710年反对中宗韦后的政变以来，他

在和阴险的政治阴谋不断斗争中，成长为一位有经验的统治者。

玄宗登上承天门，向百官公卿、大唐庶民们宣布制书，大赦天下，分封王亲，奖掖功臣。年轻的皇帝表示将“当与亿兆，同此唯新”。

从武后、中宗、睿宗以来的政局变乱归于平静，一个辉煌的时代开始了。

武后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众多人才，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僚为玄宗服务。同州刺史姚崇，提出十条改革纲领作为出任宰相的条件。这十条建议，要求皇帝个人仁爱、节俭，树立个人权威，司法上追求公平，政治上则开明有效，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寒族出身的左拾遗张九龄也给姚崇提出忠告“远谄躁，近纯厚”。这六个字堪称开元中以前的政治气象。

由此唐朝开始了一段和平繁荣的顶峰时期。

开元天宝经济之盛以海内富实载入史册，是时国家粮仓储满，陈腐不可较量，私仓亦然，家家粮储“皆及数月”。整个社会物价低廉，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人们可以便利地周游各地，南到荆、襄，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到处都有客店，商旅行人远行千里不需要携带武器。

玄宗则是唐朝在世界主义时代最荣耀的君主，他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在他统治的早期和中期，堪称是历史上最为出类拔萃的皇帝。在这个黄金时代，大唐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吸纳外部文化的精粹，形成一种开放、融合、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据《唐六典》记载，是时与唐通使的国家多达三百个。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使节，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佛教的高僧大德居住在长安的佛寺中，景教、摩尼教、祆教，在长安都有自己的寺庙。而大唐则把木版印刷术、城市规划、

服装样式和诗歌传给它的邻人——中世纪的远东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吐蕃和安南（今越南）。

奇珍异宝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波斯（今伊朗）的商邸珠宝，大食（今阿拉伯）的宝石瑟瑟，西域的胡姬酒肆，在长安城随处可见。西方的宝刀良马、香料药材每天都在运往长安，长安的丝绸瓷器、技术和茶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奇货云集、人文荟萃。《唐新语》中说，长安城里，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着胡人的衣衫，谁是胡谁是汉，连官府也无法分辨。外国人可以谋求官职，亦可以长期居住，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亚的舞女和琴师受到热情欢迎。一位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质地的杯子斟满名贵的美酒，再佐以迷人的舞蹈，招徕四方来客。许多未成名的诗人，或者等待科举的少年文人，

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慰藉。“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美如花，当垆笑春风”，透过李白留存后世的诗歌，依然可见她们绰约曼妙的身影。

外来食品甚至深入到长安城里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太平广记》卷452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清晨从情人家里返回，他所居住的里坊尚未开门，他便在一个胡饼店里歇息：

（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

译文：一个情欲得到释放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坐于帘下，看金发碧眼的胡人制作胡饼，可能是芝麻饼，也可能是油煎饼，静静等候大唐的黎明。

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光芒万丈的时代。

在大唐的疆域范围内，每乡都会设置学校一所，国家图书馆整理的藏书多达53915卷。史书记载，开元之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玄宗指令御医编辑《开元广济方》，分发各州医药学校。

这亦是一个奔放热烈的时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五万盏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没有间断。这是古代中国非常罕见的集体狂欢。整个开元年间，帝国的官员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

唐帝国空前强大，礼仪文化隆盛，艺术家创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跃。此时，宽容和昂扬，是大唐内在的精神气质。大唐成为整个东亚的制度、文化输出国。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制定的

官制、田制和税制、学制都是拷贝大唐，首都奈良则是长安的翻版。新罗同样全面接收了大唐的制度与儒学文化。长安则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写道：“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那是如20世纪的“美国梦”一般的“中国梦”时代。而这个“中国梦”的关键词就是：富裕、自由、宽容、浪漫和昂扬。

直到8世纪中期，玄宗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

市舶使：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海内安宁。春天在北方边境击败了突厥入寇，盛夏季节西天竺国又遣使来献方物。在遥远的南方海滨，安南市舶使周庆立和波斯僧广造奇巧，想进献给皇帝以赞颂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当时即位才三年、正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却拒绝接受。

这一看起来平静的一年，却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移：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逐渐转向海洋。周庆立就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在他之后，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外来文化（尤其佛教）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与之相比，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受国力和技术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注重放眼内陆亚洲；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仅经商，由他们带来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所谓“中古三夷

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过他们而传入大唐。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这里说的“昆仑”，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到天宝九年（750年）鉴真途经广州时，已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

因此，开元四年（716年）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以充分利用岭南

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虽然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语气，但此路辟通为“坦坦而方五轨，阡阡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重塑了岭南的商路，由此北江开始日渐繁忙，而以前通往广西的商路逐渐废弃（叶显恩等《广东航运史》），这又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文献中最早可见的中国海关官员，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开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庆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虽然著作的时代略晚，但也可见安南和广州长期是南海边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乱（755-763年）加速了这一从西域到南海的转移过程。说来讽刺，安史之乱的两个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统，但正

是他们不成功的叛乱终结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在长期动荡之下，驻守西域的唐军内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鹘和吐蕃势力之手，中原势力从此绝迹于中亚长达一千年之久；而没有了帝国维护陆路交通的安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渐不复当年盛况，更不必说由于叛乱者的种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汉人的敌视和歧视。

江淮以南的南方当时并未受战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越发依靠南方在财力和人力上的供给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广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征收外贸商税、检查来往船只、收购专卖品。之所以设在广州，原因也很简单：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远比现在开阔，广州是一座海

滨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唐朝继续以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态度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收并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宝石、白鹦鹉等陆续从海路输入，甚至奴隶的来源也出现了转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贩子转运的胡人妇女，而现在则出现了南洋来的皮肤黝黑且熟识水性的昆仑奴，他们成为唐传奇中新的角色。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南方化”的过程，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如饮茶习俗）开始扩散和弥漫到全国，而南方的闽粤航海传统自此得以全面兴盛，逐渐取代西域通道而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和文化取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

市舶提举司在763年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这本身也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已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唐代广州的海路贸易，分东西两道，东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则是向西南到东南亚、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阿拉伯帝国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原先承担驮运各种珍奇贩运到长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鹘等中亚的胡商，而8世纪中叶以后到广州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商则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据说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曼苏尔（745-775年在位）曾说：“这是底格里斯河，从这里到中国没有任何障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海上运来。”当时曾有大量来自西亚的穆斯林人生活在广州，建造起怀圣寺、光塔（早先被称为“蕃塔”），每年五六月间西南季风到广州时即有人登顶宣礼，并在夜间点灯（塔高达615尺），可以作为航道灯塔来导航，此后在几个世纪里都是

海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城时最高和最容易辨识的航标。

到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广州参与海外贸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发十余艇”，且“周以岁时，循环不绝”（《旧唐书·王锷传》）地加入到商贸活动中去。当时经“广州通海夷道”来贸易的国家据说不下一百个——柳宗元曾记载：抵达广州的商人“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厦（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岭南节度飡军堂记》）。

晚唐时聚居在广州蕃坊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黄巢破广州时，“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被他杀害了”，当时广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为中国商货与阿拉伯商货荟萃的地方”。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调敝，原本依靠转运贸易致富的中亚城市开始慢慢走向衰败。与之相反，在盛唐时还被视为蛮荒异域的东南亚一带，接过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的贸易中转，许多港口因此而发展了起来。广州远离任何一个统一政权都城的独立位置使它可以在任何时代都保持开放而不影响国家根本政策。这又使得南方的经济愈加繁荣，因为自唐宋时代起，这些面向南洋的港口主要都集中在南方；直至清代中期，长江口以北的北方唯一兴盛的大港天津也是以国内贸易为主。

在这个海外贸易网络中，中国人逐渐占据上风并成为主要的承担者。这与此前的陆路外贸截然不同：陆路贸易的承担者通常是粟特、突厥、回鹘等胡商，因为从长安到中亚、拜占庭、欧洲的道路极为漫长，许多路段地形复杂且盗匪出没，是一种不断在中间商之间分段转运的贸易，不善控制骆驼及熟习多种语言的汉人很难从事这

一贸易，因此往往是游牧民族居中联系并控制相关的商路。海上贸易却对造船、驾驶技巧等技术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且海路相对安全——它只需要一系列和平开放的港口。在早先的陆路对外贸易中几乎没什么知名的中国商人，更别说移民国外了，而海路贸易最终却使中国人深深介入东南亚的经济结构，以及数百万中国人“下南洋”。

商队在陆地行走速度较慢，骆驼所能驮的货物重量也远不及一艘大船，而遭遇抢劫的风险却远高于海上被海盗抢劫，因此在火车发明之前，陆路商队运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只有非常贵重的物品才能负担得起远程陆路运输的成本。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昂贵的外国商品通常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消费，将之视为一种身份象征，其经济意义微不足道。但海路则不同，负载重的船只反而不易沉没，空船还需要用大量石头或瓷器等压舱，因此海洋使大量笨重的大宗散货（兼有压舱和出售两重用途）也得以进行贸易交换，而这些也是

平民可以消费的。中唐以后闽粤商人将大量中国货物（瓷器、茶叶、丝绸等）运载到海外，并使东南亚等地的经济活动也为供应中国市场而组织起来，最终推动了区域性工业布局的形成。此外，海外运输还对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各方面提出了技术革命的要求，催生了相关科技进步。

西方学者曾用“早期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古时期这一交流网络的形成，异域货物、思想观念、文化力量等逐渐出现一个横跨各洲的联系。那是一个多中心的全球化，中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中心——唐朝中国不仅是这个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还是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全球史学者Jerry Bentley认为，在全球性互动中，三种主要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的建立和远程贸易）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区域疆界的重大意义”，不难看出，这三者在海洋中国的时代同时在进行。

失去的机会？

现在提起唐朝，人们常常将它视为中国古代文明曾达到过的一个巅峰，而与之相连的则是一个外向、自信、开放、文化多元的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唐朝在对外交流中的行为，塑造了今天人们所感知到的“盛唐气象”。但“巅峰”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到达那个顶点之后，发现很难在那里长期停留，事实上唐朝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国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见证了辉煌、见证了变迁，也预示了此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败。人们或许会遗憾：为何中国未能在一个国力强盛的时代，趁着转向南海的历史机遇，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但事实上，如果说那是一个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必然会失去的机会。

唐代海路贸易确实催生了一个颇有希望的“海洋中国”，然而这种繁荣，与西欧海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仅具有表面上的相似，而其背后运

作机制则大异其趣。

长距离的海洋贸易，在技术条件简陋的时代，是风险极高的行业。一旦有一批货物在海上沉没，普通商人大多就此破产，因此古代诸文明中，无论是埃及、苏美尔、中国，最初都是神庙或宫廷垄断海外贸易——也只有这样财力雄厚的机构才能消费这些特殊商品。在中国，自秦汉以来，皇帝一直竭力垄断对海外的贸易，早在西汉就有宦官代表皇帝去海外采购珠宝异物，所获利润也归皇帝的个人财库少府，而不列入国家税收。

现代人出于一种观念的回溯，常把唐代设立的提举市舶司视为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但必须记住的是：它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海关。唐代向海外贸易征收的市舶税，实际上均由宦官主管；也就是说，海外贸易的繁荣，最终获得好处的仅是皇帝个人。中国第一任海关官员周庆立之所以出现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就是因为他和波

斯人“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换言之，搜罗各种海外珍奇，想献给皇帝博取其欢心，以至于这种蛊惑皇帝的行为引起正直大臣的不满。

研究海洋中国及东南亚贸易的史学家王赓武在《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指出：“市舶使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往往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并由宦官控制”。这一内廷宦官主导海外贸易的传统一直沿袭到郑和时代都没有变化过。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贸易和政治合法性和皇帝私人财库密切相关，却不能增加国家财政层面的财富。这并不是一种企业行为和商品经济，从中是绝无可能萌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更别说使整个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型了。

如果当时能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那必须有一个高度活跃的民间海外贸易为基础，并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贸易公司来经营（正如威尼斯、荷兰之所为），但这在唐代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的官方海外贸易毫无意义，

它至少提高了远程贸易量，而这本身也标志着跨文化互动规模的增长。但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唐代的“开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它和历代一样严格限制内部居民流动，行旅往来于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验官府签发的通行证，更不许居民私自出国（所以玄奘和鉴真两位大师按唐代法律都属于非法出境）；它也屡次禁止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只是闽粤一带天高皇帝远，这一禁令收效甚微。

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能得以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们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使得当地社会能打破官方垄断的企图，灵活地自我调整以加入到海洋贸易的活动中去，但代价则是他们的活动常常无法得到官方的支持。这有点类似《东南亚贸易时代》中所提到的东南亚在17世纪的悲剧：由于权力和贸易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大臣不允许一个拥有自己声音的、独立于宫廷之外的大商人阶层存在，加上西方列强的

竞争和打击，遂使当地无法向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转型。

应该说，中国并不曾失去那个机会，因为它并不曾有过——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这一历史，则不失为中国人一个反思的契机。

仁宣之治与仁宣之死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很多个盛世，有名的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明朝有两个可归入“盛世”的时期：一个是“仁宣之治”，一个是“弘治中兴”。明末清初时，有人也把万历时期也说成一个盛世，但后来又有言论称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此后少有人再把万历朝称为盛世了。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宣，指的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仁宣之治与其他盛世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它的延续时间特别短，两朝加起来不过11年。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康乾盛世

持续时间超过了100年，占了整个清王朝约近一半的时间。

康、雍、乾分别是清代入关后的第二、三、四位皇帝，与明朝仁、宣二帝一样，符合一个朝代开国之后，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国势逐渐上扬，遂进入升平之世的发展特点。但盛世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准备期和巩固期，相比之下，仁、宣两代的11年，就显得太短促了。

怎样才算得上盛世？一般来说有两个标准：首先得物阜民丰、政治稳定、社会安宁、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其次，国力强大，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能记得住的文治武功。

然而，若仅论国力之强大，仁、宣时期无疑要输给它前面的永乐朝。明代历史上著名的下洋入番、五伐漠北、营建北京、经略安南、编纂永乐大典等都发生在永乐朝；仁、宣时期，几乎没

什么宏大政绩可以称述，甚至在宣德朝，还接连发生藩王造反、交趾行省独立等一系列重大事变。

如果说永乐朝是夏日江水暴涨时的壮阔场面，那么仁、宣时期则像立秋之后江水逐渐退时后呈现出的和睦、升平景象。实际上，仁、宣朝在国力上呈现出的“颓势”，正是仁宗和宣宗对永乐朝好大喜功政策进行刻意调整的结果。

永乐时期大兴事功，国力消耗非常大，好比郑和下西洋，花费无数金钱和人力，却只宣扬了“国威”；朱棣数次北征，耗费巨大钱粮，给国家财政和人民带来了异常沉重的负担。仁宗即位后，立刻通过大赦天下的诏书，停止了这些劳民伤财的举措。

孔子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可是仁宗刚上台即下令解散下西洋的船队、召回各地的买办钦使，甚至试图放弃新都北京、回都南

京等这些举动不啻承认，永乐时期的一些政策是加在人民头上的枷锁，而仁宗的新政就是要为国家、百姓卸下这些重担。

宣宗在位期间，虽然处处模仿祖父朱棣，也曾试图出塞、下洋，但受限于永乐朝巨大消耗之后衰落的国力，已无法承受庞大开支；同时，由于长期的动乱与镇压，交趾行省也成为明朝沉重的负担，宣宗最后被迫放弃朱棣时期的经略，将数十万军民撤回国内。总体上讲，宣德年间为民减负的政策使用、较为清明的吏治使得国内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仁宣时期，不仅与前面的永乐朝形成强烈的对比，与继之而起的明英宗正统朝也有很大不同。正统十四年间，朝政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出现了宦官干政。大太监王振被认为是明朝第一个“权阉”。当时，蒙古瓦剌部在漠北兴起，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北边，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王振怂恿英宗朱祁镇亲征，天子王师在

土木堡全军覆没，明英宗被俘……这意味着，大明王朝的辉煌岁月已为往事。无论是向前比，还是往后比，仁、宣年间，总体上都呈现出稳定、宽松的局面，对于百姓来说，是难得的黄金十年。

所谓盛世或治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概念的定义标准是有矛盾的。在专制时代，无论是要新建宏大的土木工程，还是要发动大规模的战争等，都不可避免要加大对地方及百姓的盘剥，换言之，证明国家强大的事例愈多，百姓身上的负担愈加沉重。即便是所谓“圣君”在位，如明朝的洪武、永乐时期，国内矛盾也非常突出，经常发生民变和动乱，只是这些都被掩盖在“盛世”的荣光之下。

可见，在一番丰功伟绩之外，真正的国盛民强，还需要“与民休息”。仁、宣二帝在历史上立名，不称盛世，而称“治世”；威武张扬的永乐朝，却没人称之为“盛”，其要义皆在于此。

仁宗、宣宗死亡疑案

明仁宗在称帝之前，已经作为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多年。但他只负责处理日常的朝政，对于征伐、人事等大政，并没有什么权力。要命的是，他的父亲不喜欢他，起初都没想让他入居储位，最后还是一个相士，给他父子相了一面，得出佳兆，才一锤定音。

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相面大师，就包括元末明初的袁珙，人称袁柳庄，又称柳庄神相。想当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之前，犹豫不决，于是军师姚广孝把袁珙请来，给燕王相了一面。袁珙是这么说的：

“（王）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须过脐，即登大宝矣。”

朱棣生于1360年，1402年登基，正好年过四

十。此判语准确，袁珙得到了朱棣的信任。

那么当朱棣为继承人的选择而迟疑不决时，袁大师的相语就非常关键了。史云：

“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万岁天子。’储位乃定。”

仁宗从永乐二年被册立为皇太子，到永乐二十二年即位，在储君的位置上一坐便是20年，过得相当辛苦。他父亲经常寻借口打磨他，使他做人战战兢兢，做事束手束脚；他两个弟弟又不服气，不断向他的地位发起挑战。幸运的是，稳健的仁宗最后仍然顺利继位。但奇怪的是，仁宗即位还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然去世了。他是怎么死的呢？

从明朝官修国史《明仁宗实录》的记载来看，仁宗属于暴亡。他死在洪熙元年的五月，而就在一月之前他还下敕给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

命其修理南京宫殿，以备明年春天还都南京。同时，他派皇太子朱瞻基亲自到南京坐镇，太子于四月十三日离开北京。如果仁宗身罹痼疾，有性命之忧，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把皇位继承人打发到几千里外的地方去。

五月十日，仁宗照旧处理政事，还因为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罗汝敬言事不中听，发了脾气，将两人降了官。十一日，忽然就“不豫”了，而且是病来如山倒，仁宗马上预感到可能不行了，当即下令急召太子回京，次日即告“大渐”（临终之意），仁宗在病榻上口授遗诏，并于当日驾崩于钦安殿。

仁宗从忽然发病到死亡，仅仅两天时间。其死亡之速，与清代雍正皇帝近似。据张廷玉记载，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但到二十二日晚间，忽然就“大渐”了，众臣“惊骇欲绝”，纷纷赶到圆明园寝宫请安，没过多久，到次日凌晨子时，雍正帝即“龙

驭上宾”了。现有学者研究指出，雍正帝是长期服食丹药致身体中毒，才突然死亡的。对于仁宗的死，民间议论纷纷，流传着其死因之谜的诸多传说。仁宗朱高炽之死也是明朝十六帝死亡鉴定中最大的疑案。

明成化时人陆鉉《病逸漫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指出当时社会上有两种猜测：被雷震死，被宫人误杀。

明代中期以后流布较广的《明记略》一书则指出：“仁宗或云死于雷，或云为宫人所毒，或云为内官击杀。”可见后来传言又增一种：为宦官所弑杀。

仁宗是被雷劈死的吗？嘉靖时人张合说，雷只是个幌子，仁宗其实是被宦官击杀的。他在《宙载》一书中说：一个阴雨天，仁宗上罢朝，退回后宫，突然就报“崩”了——有传闻称，仁宗

回宫后被宦官刺杀，刚好那天打雷，宦官就伪称仁宗是被雷震死的。至于宦官为什么要弑君，张合解释道：“仁宗即位后，恶宦官，每欲诛戮”，结果被宦官先下手为强杀死。

仁宗到底是怎么死的？陆鈇曾好奇地向一位雷姓太监求证，这位太监给出的答案是“盖阴症”至于阴症是什么，陆鈇没有详说。笔者也不敢乱解，但另有一个大胆揣测，为仁宗之死补上另一种可能：仁宗或与雍正帝一样，是服食丹药中毒而亡。

据史书记载，为人温文尔雅的仁宗，在生前的最后时光，一反常态，脾气异常暴躁，很容易被激怒，而一旦发作，几乎难以遏制自己的行为。比如大理寺少卿弋谦，响应皇上初登基时求言的号召，多次上疏言事，仁宗就怪他“逾分”“卖直沽名”，每当临朝之际，恶感“数形于词气”，话不好听，脸不好看，大概事也难办吧，搞得“朝臣皆悚仄，相与以言为戒”。

还有一次，他差点把明初的名臣、任过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明朝最高学府的校长）的李时勉当朝打死。李时勉是个好言敢谏之人，为此在永乐年间吃过不少苦头。洪熙元年五月的一天，李时勉又出来讲话了，当着百官的面，他直言皇帝守孝之期还未结束就派宦官远至福建选取侍女的丑事，遂深深激怒了仁宗，当朝爆发，命侍卫打断了他三根肋骨，并降了官。不料李时勉也是个暴脾气，性格亢傲得很，他三天内连上三份奏章，提了更多的意见。仁宗认为李时勉是故意挑衅，干脆将他抓起来，施以严刑。亏得诏狱掌刑的锦衣卫千户曾受过李时勉的恩，秘密请来医生，为他疗伤，才侥幸不死。不过仁宗真是气着了，直到“大渐”那一天，犹有余恨，切齿对大臣夏原吉说：“李时勉当廷辱我！”一念此事，还是忍不住勃然暴怒，当晚就死了。

脾气暴躁、动辄发怒是服食丹药者的共性之一。仁宗生前炼丹，且为丹药毙命，从他的死亡

的地点也可看出端倪。仁宗没有死在“天子正寝”乾清宫，而是死在位于紫禁城中轴线北端的钦安殿。这座宫殿至今还保留了明代的建筑风格，它始建于永乐年间，供奉的是永乐皇帝的保护神真武大帝，是明宫进行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虽然没有直接材料记述仁宗晚年都在钦安殿里干什么，但显然想必除了烧符炼丹，也别无其他事可做。仁宗身体底子本来就弱，兼之炼丹服食操之过切，内火旺盛，所以脾气也变得暴躁。对此，曾在翰林院供职的罗汝敬后来说：“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憊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谓直接证据。

仁宗之父明成祖朱棣死在北征回师的路上，也属于“暴崩”。朱棣笃信道教，大约永乐十五年后就很少出朝理政了，而是在宫中建立玄坛、斋醮扶鸾。他晚年患病，却不好生吃药，只吃灵济宫道士给他进的金丹。吃了丹药之后是什么情

况？神相袁珙之子袁忠彻说：朱棣服药后，“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谏”。他实在痛心，便大胆谏了一句说：“此痰火虚逆之症，实灵济宫符药所致。”不料朱棣听了发怒道：“仙药不服，服凡药耶？”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朱棣率师出塞，出兵时身体还无恙，中途还多次宴饮群臣，不想突然发病，没几天就死了，他甚至没能撑到大军入塞。这种突发而骤亡的情形，与仁宗之死非常相似。

仁宗作为不讨朱棣喜欢的儿子，为了投其所好，也学他钻研道教，大搞修合烧炼那一套，是再自然不过之事。对于仁宗服毒，外臣多不知，或知而不敢言，但在内廷行走的近臣多有所了解。好比那位袁忠彻，还有一位名叫盛启东的御医，这两人都是入了《明史·方技传》的人物，但都不讨仁宗喜欢。为此盛启东非常忧虑，有一次袁忠彻偷偷对盛启东说：“你不要过于忧虑，我观仁宗之相，非永寿之人，他不会在宝位上坐

太久的。”袁忠彻的话后来果然应验，仁宗只做了8个月天子就去世了。这难道是袁忠彻相术高明，判人生死如寄？笔者推测应该是他深知仁宗与他父亲一样，中毒已深，不是医药所能挽救，故此才敢如此放言。

其实朱棣祖孙三代都是服食丹药的爱好者，过去人们对宣宗本人的情况注意不多，我们通过一些史料片段也能发现一些端倪。宣宗与他父亲仁宗一样，也是“骤崩”的。他从宣德九年十二月底发病，到次年正月驾崩，时间非常的短，且殁年仅38岁。据太监阮安留目击，宣宗死时“肌肤燥裂犹燔鱼”，身上的皮肤就像烧烤架上的烤鱼一般。阮太监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以烈剂故”。烈剂应该就是炼丹炉里的产品。只是不知道它的功效是壮阳还是修合长生不死之术的。

宣宗好色，是众人皆知的。在这方面，他与其祖父朱棣有同好。宣宗在他父亲仁宗三年的丧期还没出，就急不可待地派人去某藩属国选美。

该国国王大为诧异：“（仁宗）初丧，（宣宗）使人求女，意实急急。”在国丧期间选女，显然与传统的“君德”是大相违戾的。

据明英宗天顺朝阁臣李贤提供的可信材料，宣宗很喜欢修炼这一套把戏。宣德年间时有个叫常中孚的，做了一个巡检的小官。传言说此人身怀奇术——能“煮白金”（煮非煮酒之煮，乃指煮炼，是一种化学工艺，煮白金就是烧炼白银的意思），谁家宝玉之器损坏了，他能修补如初。宣宗听说他的大名，便把他找来，要试他本事。后来宣宗一高兴，授他正五品的吏部郎中之职，并经常召他进宫，还专门为他在宫里造了一处场子，方便他行其密术。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外人自然是“闲人不许入内”，就是宣宗非常亲信的太监也不得一窥究竟。

身为天子的宣宗，当然不在乎江湖烧炼的那几两银子，恐怕主要还是炼丹。丹药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汞也就是水银，是剧毒之物。人长期

服食硫、汞这些毒物，对内脏及神经系统将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损伤。据祝允明《野记》记载：宣宗曾乘一时之怒杀了两名小太监。怒气消后，方觉死者无辜，死得可怜，但悔之无及矣。一日在宫中游幸，突然瞪大眼，指一处大叫：“那厮又在此！”即命取弹丸乱射。左右不知何故，奇怪地问：“那是什么？”宣宗惊魂未定，喘着粗气道：“就是被我杀死的两个太监，他们见朕来了，伏在那里，一言不发。”但左右什么都没有看到。以后这样的怪事愈发频密，直到宣宗晏驾。这恐怕就是宣宗在中毒之后出现的幻觉。

仁、宣二帝，一位活了48岁，一位活了38岁，都是猝死。《明史》本纪对仁宗的评价是：“用人行政，善不胜数。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意思是仁宗如果能多活一些年，他一定能实现明代的文景之治。其实仁宗在位虽然未及一年，人们已将“仁宣之治”的美冠加冕于他。

对于宣宗，《明史》的评价更为具体，说他“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羨，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称赞宣宗“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说宣宗是能继述祖宗美德和事业的好皇帝。故后世将宣宗与仁宗联在一起，合称仁宣之治，是较为公允的评价。

那么仁、宣二帝服食丹药的内幕，是否要颠覆对他们的历史评价呢？并非如此。史书中的皇帝多不像“人”，只是一具被包裹在圣君金纸之下的、没有内心世界的偶像。正史当然不会记载仁宗死亡的真相，但我们却从关于他死亡之谜的种种猜测中，看到这位皇帝生活的不幸——20多年唯谨唯危、险象环生的太子生涯，严苛暴虐的父亲、强势的妻子、不友的弟弟、争宠的妃嫔和他本人软弱的性格，这都驱使他去“仙药”中寻找片刻的安宁。而我们透过宣宗“英姿睿略”的形象背

后，看到的是一个富有情趣、性灵而多欲的纨绔形象。这些与躺在帝王宗庙里的那幅画像综合起来，才构成一个立体的“人”，使我们得以全面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真实帝王。

一个县令的1635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县县令吴世济像往常一样早起，打算在县衙内用完早餐后，就去城内巡查。属下的一个紧急报告，让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来袭的传言终于成为现实。为此，他已经在惴惴不安中准备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县做了六年“教谕”（明清时期县一级政府负责教育工作的官员）的吴世济，被任命为凤阳府颍州太和县新一任县令。能够获得升迁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吴世

济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这个月，在五省军务总督陈奇瑜的指挥下，官军一度将李自成、张献忠等逼得走投无路，但最后时刻，陈却中了李、张的诈降之计。自七月开始，缓过劲儿来的农民军重新迅速发展，河南的形势越发严峻。太和县在凤阳府的最西端，一旦农民军由河南东进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为进攻的对象。

刚一上任，就要考虑如何抵御“流寇”，显然非常棘手。而作为一个新到的“外来户”，吴世济也很清楚，像抵御“流寇”这种事情，他必须先征询一下当地士绅的意见。

所谓“士绅”，在明清两代，主要是指享有科举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识群体。这些人，要么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要么是考取了科举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国广袤的疆域内，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常只能到县一级政权，而县以

下大大小小的村庄，社会秩序实际上是由士绅阶层来维持的。长期混迹于基层的吴世济，当然清楚这些人的分量。

按吴世济最初的打算，抵御“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请官军驻防太和县。不过出乎预料的是，他请来的“地方精英”们都不认可这个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明确：明军军纪太差，“兵之祸甚于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见，吴世济只好放弃请官军驻防的计划。

其实以吴世济的经历，又何尝不知官军军纪涣散、为害地方？只是连正规官军应对“流寇”都很吃力，在没有官军驻防的条件下，太和能守住么？

备战

自崇祯七年八月开始，昔日平静的太和县一

下子忙碌起来了，巩固城防、编练民兵、修造武器，在知县吴世济的领导下，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不过正式揭开太和县备战大幕的，却是一篇关于太和县境内“西人”的告示。

吴世济所谓的“西人”，是指在太和县境内侨居的山西、陕西商人。自十六世纪起，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大明朝的商人们也活跃起来了，晋商、陕商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团。凤阳府地跨江淮、毗邻楚豫，是当时商品由东向西运输的主要通道，因此凤阳府境内落脚的外来商人颇有一些规模。而当同样起于山、陕的农民军大军压境时，侨居在凤阳府的山、陕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来了。

“西人”处置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太和县民心的稳定，因而吴世济把其作为备战之初的首要问题。在这篇名为“查编流寓”的简短告示里，吴世济首先安慰了下太和县境内的“西人”：“尔等侨寓已久，应无不肖之心”。不过，这位知县很快就

露出了发告示的真实目的：在太和境内落脚的山、陕商人，须将自己“作何经营生业，寓何集镇处所，系何原籍姓名，详注一册，送县严查”。当然，吴世济也没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许趁机作乱，迫害西人。

备战工作，千头万绪，最重要、也是最让吴世济头痛的是：没钱。

这个时候缺钱的，可不仅仅是太和县。明末内忧外患不断，各类开销剧增，于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税，基层政权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向上“输血”：除了向农民征税，像太和县这样基层政权还要尽可能地削减各项开支。吴世济刚一上任，就发现县衙账上可用的银两，连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祯七年，太和县应上缴的各类赋税，总额已超过白银一万两。

“此民穷财尽，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祯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吴世

济向上级提出“申请截留”，因为在太和县应上缴的赋税里，此时还有最后一小批尚未运走。

申请发出后，吴世济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给太和县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守城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吴世济心情颇为烦乱：申请截留的公文已经发出去七天了，却仍未有回复；紧接着又有流言称：一支八万余人的农民军正向颍州、太和方向进发；昨夜，他又接到报告：与太和相邻颍州方向硝烟滚滚、火光一片，颍州城怕是已经失守了。

不过吴世济没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饭的时候，进军神速的农民军已经进入了太和县境内。

吴世济接到报告，立刻率人赶到城头督战。从城楼上望去，只见尘土飞扬之中，一支穿红骑马的农民军直奔城下而来，“衣饰华整，皆挟强弓劲矢，兵刃森列”，这是吴世济对这支农民军的第一印象。不过这位县令很快就发现，眼前的这支部队总共也就二千人左右，远非之前所称的八万。“贼不过张其数以虚声恐吓我耳，”看到“流寇”数量远比预想的少，吴世济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些许。

就算区区两千人，应对起来也不容易。守卫太和县乡兵义勇，都是从普通百姓中临时挑选出来的，这些人既没受过多少正规军事训练，更无实战经验。仗尚未开打，很多乡勇义兵就被农民军的阵势给吓住了。

关键时刻，以生员（秀才）、举人为主的士绅阶层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北门，负责守城门的生员侯功鸿，见手下人被“流寇”攻势吓得手足无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壮军威；

在东门，生员关寓卷见有奸细准备从水道中入城，不顾城上飞如雨下的矢石，亲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将奸细擒杀。士绅阶层身先士卒，民兵们自然士气大振。在生员赵志鸿负责守卫的南门西角楼，马夫孙学诗见登云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来像是头目，立刻举磨盘向其奋力一砸，将其击毙于城下。

没过多久，吴世济就接获下属报告：太和县马夫孙学诗在守城过程中，用磨盘击毙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陕西绥德(一作宜川)人。崇祯元年，王自用与“混天王”等起义，号“紫金梁”，为王嘉胤部属。崇祯四年，王嘉胤战死，王自用率残部东山再起，并凭借自己强劲的实力，被当时的三十六营义军推为盟主。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被击毙于太和县城下，吴世济在接到报告时也不大敢相信，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把“毙紫金梁于城下”做为重要战果向上汇报。

凭借着官、绅、民齐心协力，太和县顶住了农民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后，农民军遂于十七日从太和县城下撤离。“流寇”撤出了太和县，吴世济稍微缓了口气。

但吴世济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流寇”刚刚退去，新一年的税收任务又下来了。在这样一个敏感时刻征收赋税，显然让吴世济左右为难，这位知县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军

随着“流寇”退去，太和县紧张的气氛缓解了不少。经过一番与农民军打交道，吴世济发现，农民军远没有传说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吴世济就称农民军“语言装束，直同儿戏”。作为帝国官僚体系最低端的官员，吴世济此时是以一种蔑视的心态看待“流寇”。

同是在这个时候，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崇祯皇帝，看待“流寇”却完全是另一种心情。

在凤阳府下辖的五州十三县里，地位最重要的当属凤阳县。凤阳县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龙兴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迹，被明王朝统治者视为“龙脉”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五这天，却被张献忠用半天时间就攻陷了。

张献忠本来就是个性格偏激的人，此番攻占了大明王朝“龙兴之地”，更是杀心大起。据彭孙贻《平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凤阳的三天时间里，“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槩，焚公私庐舍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余间”，而被明朝统治者视为“万世根本之地”的凤阳皇陵，也被张献忠付之一炬。

二月初，凤阳祖陵被焚的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大骇。崇祯皇帝闻报后惊惶不已，孝服理

政。兵部尚书张凤翼、凤阳巡抚杨一鹏等一批相关官员随即被问罪，锦衣卫指挥使王世盛甚至因为杨一鹏的案子结得慢了点，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祯皇帝免了职。紧接着，崇祯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畴统兵出潼关，并限期“六月灭贼”。此后大批官军陆续从各地向凤阳、庐州一线开进。

二月中旬，太和县接到官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吴世济，当然不清楚近一个月来政局的变动。二月二十日，“不识时务”的吴世济洋洋洒洒近千言，向上级陈述了“请免派防”的各种理由。不过他这个公文刚发出去没几天，接洽驻防事宜的先遣部队已经到太和县城下了。吴世济只好做官军进驻太和县的准备。

此时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派往太和的部队刚到了太和县，就因为战事紧急给调走了，驻防太和的任务将另派其他部队。

三月末，一张“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现了太和

县的街头。有了上次跟官军打交道的经验，吴世济这次特意强调：“所用银钱粮料，官兵若不还钱，俱做本县正项支销”。

几天后，明军将领杨武烈率领的一支官军正式进驻太和县。

抓土贼

尽管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西人”问题，可这一块还是出问题了。二三月间，太和县境内连续发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则是横行颍州、太和一带二十余年的“土贼”王本仁。

与“流寇”相对，所谓“土贼”，是指长期盘踞在某一地方的贼寇。与动辄规模上万的“流寇”相比，“土贼”规模要小很多。作为太和一带数一数二的“土贼”，王本仁手下党羽也不过百余人。大

明朝的高级官员们当然不屑理会王本仁这样的“小人物”，可明代州县通常都是没有驻军的，单凭衙役、捕快这些小吏，也对付不了成规模的“土贼”。“流寇”来犯之际，各地的“土贼”更是凭借对地方情况的熟悉，趁机大肆杀掠。

面对“流寇未平，土贼四起”的局面，吴世济一度颇为无奈。吴世济当然清楚“西人”命案的重要性，可本地的捕快早被王本仁吓破了胆，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三月初，吴世济见乡人侯养德有勇有谋、胆略过人，特地将其请入县衙，希望其出面为民除害。性格豪爽的侯养德当即领命。

可五天后，两手空空的侯养德回来复命：王本仁党羽众多，“缓之或可图，一急之，即反矣”。

杨武烈的官军入驻，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意义不在于防御“流寇”，而在于他有了一支强大的力量去对付“土贼”。

四月二十日半夜，经过仔细筹划，杨武烈亲率一支精锐部队直奔城外王本仁的老巢而去。不料“神通广大”的王本仁提前接到信报，抢在杨武烈到达之前跑掉了。堂堂官军竟然连个小“土贼”都抓不到，杨武烈不免有点丧气，不过吴世济却已有胜算：王本仁虽然走脱，但此次行动足以打掉这位“土霸王”的霸气。王本仁在颍州、太和一带民愤极大，根本无法藏匿。吴世济断言：“本仁怨家多，旦晚可成擒”。

果然，几天后，王本仁藏匿之所被人发现，杨武烈闻讯后立刻派人抓捕。“土贼”王本仁就此落网。

四月里，吴世济的心情显然不错。“土贼”王本仁就擒，免去了一个心头大患。更重要的是，吴世济一直期盼的减免赋税，这个时候也有了实质进展。出于缓和社会矛盾的考虑，崇祯皇帝下旨：凤阳府遭兵荒的州县，崇祯六、七、八年应征的各类新旧赋税一律停征。此前一月份下达的

赋税任务，吴世济拖到三月份才完成，这笔钱自然被吴世济顺理成章地截留下来了。

不过对于吴世济来讲，最大的惊喜是官军首领杨武烈。杨武烈本系儒生，因见社稷将倾，毅然投笔从戎。作为儒将，杨武烈律己律下，甚为严格。因而吴世济和太和县士绅一直担心的“兵祸甚于寇”的局面并未出现。

尾声

1635年，以帝号纪年则为崇祯八年。这一年，无论对崇祯皇帝还是对吴世济而言，都是颇为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里，凤阳皇陵被焚，作为朱元璋的子孙，崇祯皇帝朱由检当然清楚朱家“祖坟”被毁的意义。十月初，一贯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第一次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错误。

可这个举动根本无法挽救局势。正如凤阳皇陵被焚背后暗示的政治寓意一样，明王朝此后内忧外患愈演愈烈，最终走向灭亡。

对吴世济而言，这也是颇为不平凡的一年。在任太和县令之前，吴世济未做过县令，更没有任何军事指挥经验。在“流寇”压境之际，一介书生的吴世济全力协调官、绅、民、兵之间的关系，为太和县构筑起了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顶住了“土贼”与“流寇”进攻与骚扰。四年之后，吴世济任满离任。太和县士绅百姓立碑以记其功德。

袁宏道：一个晚明士人的生活转轨

袁宏道放荡不羁，雅致闲适的表象之下，是一个挣扎彷徨的内心，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笔给自己的舅父龚惟长写下一封书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列出了世间最值得留恋的“快活”事：看遍世间的美色，听遍世上的乐曲，尝遍世间的美味，每日大宴宾客，男女混杂，相互嬉闹，千金买舟，带上鼓乐妓妾，浮游湖海……

这个万历年间最知名的才子，并不知道，这封短短只有数百字的书信注定超越一封家书的意义，成为那个时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书。如果说，在此之前，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每个读书人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逻辑的话，那么此时，纵情游

乐，狂宴欢舞，也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组成。而这不仅仅是袁宏道个人的价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转轨的写照。

一个苦闷的县令

袁宏道写这封著名的家信的时候，正在明帝国最富庶的苏州吴县担任县令，时年28岁。自1573年开始的万历时代虽在政治上日趋保守，但在经济上正日华灿灿。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刚刚入仕之时就执掌一个如此富庶的区域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颇为得意，在他给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无夸张地写到，“弟已令吴中矣！吴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长，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这个出身于湖北公安名门望族的才子二十一岁乡试中举，四年之后就进士及第。此时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就厌倦了这样的官场生涯，他甚至把做县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加之不堪负重的繁文缛节，让他连连向最亲近的好友们诉苦，“苦哉、苦哉！难矣，难矣！”

在吴县大堂之上，这位县令留下最多的并不是治理县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发给朋友的诉苦信。他给沈存肃说，“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给湘潭知县何起升说，“若夫吴令，直若吞熊胆，通身是苦矣。”他给安福知县杨适筠说，“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

这不仅仅是一个年轻县令的公务劳顿之苦，更是一种精神压抑的折射。自明中叶以来的制度崩溃之态已经愈演愈烈，皇帝怠政、内侍擅权，加之文官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政治派系林立，相互倾轧，导致大小官员动辄挂冠而去，以至于政

坛一度罕见地出现了缺官的怪状。

早在1580年，云南姚安知府李贽已经用弃官而走的行为诠释了这种苦闷。那时候，李贽53岁，正是官运亨通之时。但这位晚明最知名的思想家不甘于被这种世俗的功名所束缚，他希望摆脱，这并非出于传统的江湖与庙堂的对立情绪，而是一种心性伸张的突破。

传统的政治体系已经凝固，而新生的个体自由又无从展开，于是这位思想家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这反而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望。显然，他的行为和言论在士大夫当中引起了广泛的精神共鸣。这一点从其后来越来越高的声望，以及落发为僧后的境遇就可知，在他辗转官场之时，曾经一贫如洗，而如今以著书立说为业，则得到上至尚书、侍郎、下到总督、巡抚的资助。

当1588年，袁宏道第一次去拜见这位名士之时，他已经落发为僧，寄居在湖北麻城一个叫做

芝佛院的寺庙之中。袁宏道对他崇拜有加，视他为精神导师。尽管长久以来，李贽一直被道学家们咒骂为疯子，袁宏道对李贽过于放浪形骸的作为也曾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影响这个年轻人与之交往，并将这种崇敬之情维持一生。

刚刚入职一年多，袁宏道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老师曾体会到的那种束缚，但他没有像自己的老师那样张扬，只是一遍一遍地向上司苦苦哀求辞职，一会是以家有丧事为借口，一会又声称自己身体完全无法承受公务的要求，但都未得应允。直到真正一场大病来临，卧床数月不起，他的辞职请求才获得了批准。

随性交游

袁宏道于1597年辞官之后，将妻眷寄托在无锡，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个人漫游。先赴杭州，

游历西湖，继而去会稽、绍兴、禹穴、兰亭，又溯新安江游览黄山。他欢快的提到，自己“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他一路交游文友，诗酒唱和。他与陶周望、虞长孺等人谈文，与江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等人谈诗，与云栖、戒山、湛然、立玉等僧侣谈禅，精神上的放松让他连呼，“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写信给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不解地提到，中国的士人似乎从来不愿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工作，而只是乐于把时间浪费在彼此交游，“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图在浪费金钱，彼此拜访，相互宴请，饮酒作乐，这对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们都很爱好吃喝声色之乐，且有专门书籍记载弹琴的姿势，整年有舞蹈和音乐，还有作乐的处所、钓鱼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处所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所描述的风潮在士大夫当中非但没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一

个崇尚艰苦工作带来精神升华的传教士，一定无法理解中国士人们将交游宴乐视为解脱苦闷的另一种替代。

政治压抑既然无从排解，只有投身于世俗的狂欢。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将士人们最后一丝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卸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性情的放纵，生活的纵乐，以及品行的狂狷。种种怪诞举止，不仅不会遭到责难，反而会在士林之中赢得赞誉。

评判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不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交游的广泛，以及文化上的独特建树。也正是在这种思想宽松、相互鼓荡的环境下，迸发出罕见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无眷恋的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万历年间的这种盛况，在他眼里，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海瑞的道德风节，袁黄、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书画，徐光启、利玛窦的历法，汤显祖的词曲，李时珍的本草，赵宦光的字学，都是可以与

古代先贤媲美的，而这些人同时涌现在万历时代，堪称“文治响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这些的万历年间的精英们，不少都与袁宏道有过密切的交往。

寄情声色

1596年，袁宏道还是在吴县任上之时，他给朋友董其昌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一本书，称它“云霞满纸”，甚至强过西汉辞赋名家枚乘的《七发》，遗憾的是，这本书，他只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问董其昌能到哪里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后，在给另一个朋友谢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这本书，他揶揄借书不还的谢肇淛说，“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让袁宏道念念不忘的这部书，就是《金瓶梅》。这部署名兰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说至今无法确定其作者到底是

谁，而袁宏道的这两封书信竟成为证明其最早在世间流传的物证。

在袁宏道生活的万历时代，在士人的圈子里传看情色文学，几乎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风尚。世俗商业的繁华激发了人欲的膨胀，士大夫们早已不再把洁身自好，引领道德的责任扛在肩上，与其说是世俗的繁华诱引士人们追求一种纵乐的生活，不如说，是士人们的精神解禁引领了整个社会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谢肇淛描绘当时的士大夫已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统绮，通晓歌舞之场，半画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张岱更是直言不讳的声称自己，“极爱繁华，好精舍，好养蟀，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鸟气……”

摆在在士人们案头的，除了《金瓶梅》，还

有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书籍，那些一时技痒的文人更是亲自操刀上阵，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都备受推崇。

即便是流传于街头巷尾的笑话，也寓情色于笑谑，万历版的《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而市面上公开售卖，流行的春宫图更是有二十多种，其中万历版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还是其中精品，《风流绝畅图》还以彩色套印而成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图书。

如此丰富，充满声色的晚明世界，让不少海外汉学家们惊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时代为“淫荡的世纪末”。这些汉学家似乎没有错，士人们不仅仅留恋纸上风月，更贪恋于现实中的风月场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风流浪荡，耗尽资财，尽管一身狼狈，但仍然可以“托

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乐得逍遥快活。

那些徘徊在苏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华声色场所的士人们，忘却科场失意，仕途暗淡的苦闷，醉心于欢歌燕舞之中，以至于无妓不成欢。“金陵十二钗”“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艳”在士人们杯酒言欢之际品评而出，狎妓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癖好，而上升成一种文化，在晚明香艳的笙歌中，家国理想不知不觉中演变为人欲的放纵。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过足了闲居的生活后，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来到京城担任了一个闲职。看上去，他对这个职务颇为满意，“若真看作隐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养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贋，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

他养花，为此专门写了一本《瓶史》，论述瓶花供养和插花艺术，书中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些养花的技巧和细节，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会冻裂铜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锡瓶。他品茶，为此走遍京城，品评水质的好坏，他提到水以西山碧云寺水、裂帛湖水、龙王堂水为佳，高粱桥一带的水混浊而不宜用。他饮酒，虽然酒量只有“一蕉叶”，但仍写了一部《觴政》，他把下酒物分为五类，悉数优劣。这样的论述，用闲适、精致的散文写就，无处不透露出一一种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摆脱官场，隐居故土。在湖北公安县城南的柳浪湖边，他倾尽全部积蓄修筑了一所柳浪馆。四周枫柳环绕，盛夏时，浓树遮枢，入秋则枫叶如锦。在柳浪馆中，袁宏道与一些高僧整日座谈禅理。

1930年代，当林语堂在时隔300多年后再

次“发现”袁宏道时，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种精致的闲情所打动。此时，正值林语堂大力推动“闲适”和“幽默”的文学，袁宏道那种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处处透露出的文人闲适，无不让林语堂惊叹：“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这种看似闲适的雅致生活当中，则无从判断。从他后来的一些行为来看，他应该是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心态当中，既希望从此远离官场，彻底醉心在自己营造的精致小世界当中，同时又不甘完全忘却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树上的猴子，在树上时，想着树下的饭，在树下时，思量树头的果子。“寂寞之时，既想热闹；喧嚣之场，亦思闲静。”

这在他去世前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家闲居六年之后，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担任了礼部主事，后又担任吏部主事，此时的袁宏道表现出难得的积极有为的姿态，力排众议，法办了贪赃

枉法的都吏朱国梁。吏部尚书杨时乔正在病中，听闻此事，“惊厥而叹”，称赞袁宏道是“国家之福也”。只是这并未持续很久，一年后，袁宏道去陕西担任主考官，而后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长些，不知道是否会彻底改写之前留给世人那个放荡不羁，闲适雅致的形象，这一点，鲁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说袁宏道“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

也许，在纵乐的表象下，每一个看到晚明悲剧结局的士人，都依然怀有着这种未曾表露的内心吧。

老鼠：压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

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历史舞台上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顺军到昌平。昌平的巡抚何谦逃走，总兵李守自缢。大顺军乘势焚毁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们已经到达了阜成门外，将北京城包围。

这时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监杜勋入城，要与崇祯皇帝朱由检谈判。在17日

的夜里，杜勋向北京城头用箭射了一封信，说明他要见皇帝，太监王承恩将他用绳子系了上来。杜勋告诉崇祯帝，李自成开出的条件是：割西北疆土给他，他另立为王，此后他将不奉诏，不入觐。另外，再给银两100万两犒军，他就可以暂退河南。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仓皇出逃，在故宫后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

历史在此留下了疑团：以李自成的实力，打败眼前的明朝军队已经根本不是问题，又何必开出“西北王”的谈判条件？如果朱由检真的答应了他的条件，他还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路上，二月里，他曾在宁武关与明朝军队有过一场激战。那一仗，明朝守军不过几千人，李自成的人马有几十万，但明军守将周遇吉拼死抵抗，大顺军还曾经中了明

军的计，一下子折损几千人。最后李自成用人海战术，前仆后继以数万人的代价，才拿下宁武。

惨胜之后，李自成心有余悸，前面的关隘还有很多，都这样打还受得了？不如先班师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们想退之时，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总兵的降表，于是又改变计划，决定继续向北京进发。

所以，或许也可以这样推论，连李自成自己都没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轻易。他在宁武关遇到的只是一员总兵官的部队，那么防守京城的，岂不是明朝最精锐的御林军？

“老鼠‘消灭’了明朝”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

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曹树基教授在他的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中，提出了明末华北地区流行的大疫实际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与李玉尚合写的《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又对此观点进行完善补充，明确提出：“老鼠‘消灭’了明朝”。

曹树基的史料根据，大部分来自华北一带清朝末年的地方志。根据他的勾勒，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杀食”的记载。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曹树基查到的地方志记载和明人当时的笔记，人们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疸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有一个叫吴彦升的官员，刚准备去温州赴任，他的一个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买棺材，久久不见回来，竟然死在棺材店里。有一对新婚夫妇，婚礼之后，夫妇坐于帐中很久没有出来，打开帐子一看，夫妇两人死于床的两头。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强烈威力。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于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对北京的这场大鼠疫有更详细的描述。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

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些什么？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軫念孑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当时有位叫张真人的法师来北京，刚出宫不

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诵经来驱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见少。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邱仲麟写道，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他引的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过，明朝的军队向来腐败，驻京城部队吃空额的现象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原来到了军队发饷的时候，还可以叫许多百姓来顶替领饷，比如，叫来许多小商贩或衙门班役来充场面，但现在百姓死得人太多，连顶替点名的人手也找不齐了！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

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在这里也同意曹树基的看法：崇祯十六年的大疫，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战争与病菌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首先就是，李自成的

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清军呢？李自成仅仅在北京待了42天，接着是另一拨改朝换代，清朝人进来在北京建都，他们不会感染上大疫？

曹树基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时刻恰逢其时。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类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树基说。

在这个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进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后，从曹树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继续流行鼠疫。疫区一直伸延到了苏州、杭州。从症状的描述来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今天，人们可以在网上看到关于鼠疫与明末清初历史变局的各种假说。有人说，李自成的部队后来与吴三桂及清军的决战之所以大败，就是因为在北京已经感染了鼠疫，丧失了战斗力。到后来，李自成屡战屡败一溃千里，就是这个原因。而清军，占领北京后又迟迟不南下，听凭南明建立流亡政府抵抗，也是这个原因。

对此，曹树基并不敢认同。“李自成进北京后，应该说鼠疫对战争是没有直接的影响了，后来发生的那些都属于政治史了。至少从史料上来说，没有李自成及其部将士兵染病的记载。”

“这一点确实比较诡异。从历史记载上看，李自成的部队经过的地方，都变成了疫区，发生了大疫，但是确实没有李自成部队本身受感染的记录。”

关于战争与疾病的因果关系，曹树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写过一篇论文，讲述太平天国战争时，霍乱的流行怎样对这场战争发生影响。

在同治元年七月，太平天国战争已经到了决战时刻。清军一方，曾国藩的部队本来已经形势大好，满以为可以一举拿下南京。不想，一场凶猛霍乱使得“士卒十丧四五”，死去的人数以万计，有时军中病人连侍候服药的人都没有了。

“这个时候，正是太平天国一方大举反攻的好时候。可是，霍乱同样也袭击了他们的军营，使得他们也无力进攻。这样，战争进入了僵持。本来预计马上会结束的战争，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说。

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响战争的事例。而李玉尚的论文和结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曾国藩的书信。

在以往，人们只关注明末清初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战争，在正史中，关于这段历史时期的疫病记载不但少而且相当模糊。曹树基说，他做这段研究时，看了大量地方志，而邱仲麟的研究，大量历史资料是来自明人的笔记。

如果我们仔细去对应战争的轨迹与疾病的轨迹，仍会发现许多对不上的地方。或许，疾病流行本身的规律我们还没有悟透；或许，是因为当时的记录者也好，后世的阅读者也好，目光早已

被那改朝换代的大事变所遮蔽，已经无暇关注到在翻天覆地的狂飙之中，那藏在人间角落里的小小老鼠。

人与鼠：战争与和平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鼠疫最初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末的几场大鼠疫，都是从山西开始的？曹树基开始注意到，自明清以来，山西长城口外地区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有大量的汉人迁入，大片原来的牧场被开垦成农田，这里的生态环境变了。

历史记载，大批汉人进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间（1533-1534），大同边卫发生变乱，许多汉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他们还大肆招徕汉族逃民在那里耕田。也有记载说蒙古俺答也从内地虏掠汉人过去，从事农活。

本来在草原上生活着大量的老鼠。它们中也会有携带鼠疫杆菌的病鼠，“但是只要带菌老鼠的种群小到不足以传染流行，就没关系。在草原上一般就是这个情况。”曹树基说。但是，如果大量的人过去，改变了这种关系，情况就不同了。这时，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就大大增加，特别是在发生旱灾的情况下。

据鼠类专家的研究，一旦发生旱灾，老鼠会到处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窜到了人类的集中居住地。而因为它们吃不饱，会导致体质变弱，这时它们身上带的跳蚤会格外多，干旱使鼠洞内温度相对升高，又促进了鼠疫杆菌在跳蚤体内的繁殖。

这时的老鼠对人就相当危险了。可是恰恰这时，人们——受了旱灾的饥民们，偏偏要到处找老鼠。他们需要刨鼠洞里的粮食充饥。可以想见，这时人们带回家的，不仅仅是老鼠们存下的粮食，更有老鼠们身上的跳蚤、和跳蚤们所带的

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历史记录，关于灾荒特别是旱灾的记录触目惊心：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1644年，一年中中国出现了三个皇帝，北京人有四分之一被鼠疫夺去生命。而据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一场关于鲸吞的谈判

清政府1895年初在与日本的甲午之战中落败，被追求和。双方谈判地点定在日本马关（现称“下关”）。这个位于日本本州岛最西端的小镇由此闻名，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3月14日，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携其子李经方，二品顶戴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美国顾问科士达以及随从医生、武弁、厨师、茶房、轿班、理发匠等共计135人的庞大使团，乘坐德国商船“公义”号、“礼裕”号，从天津港起航，19日上午8点到达马关港。日方外务书记官井上胜之助等人到港口迎接，并照会清政府代表团：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为日方议和全权代表。双方约定，次日下午3点在春帆楼举行第一次会议。当天，使团按预定方

案暂住在船上。

马关港口除了有接待的日方工作人员，还挤满了看热闹的日本人。其中夹杂着不少玄洋社、神刀馆等当时日本黑社会的暴徒们。这些人挥舞着太阳旗和日本军旗，狂呼“打到北京去，占领全清国！”“杀死李鸿章，反对媾和”等口号。此情此景，让李鸿章原本欠佳的心情越发沉重。

交换敕书

李鸿章：“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

3月20日下午2时30分，李鸿章等乘坐汽艇“小野田”号抵达阿弥陀寺街镇守神社前的临时

栈桥，上岸后坐轿进入谈判地点春帆楼。随员有李经方、罗丰禄、伍廷芳等9人。罗丰禄携带用丝织品包裹的卷轴国书。据日方当日报纸报道：李鸿章脸色壮实，穿黑色上衣、褐色缎裤子，脚着薄底快靴，戴金边白玉眼镜，身高五尺六寸左右，高于他人。出船舱与登石阶时，由两名侍者搀扶。出船移步至栈桥时，见观者人山人海，似乎流露出担心人多势众的表情，但又立即端正严肃地进入轿内。相比之下，李经方则面色明显衰老，因其曾在日本任职两年，故登陆后表现比其父亲要镇静许多。他面露笑容，频繁向围观人群挥手致意。

3时，中日双方第一次议和会议在春帆楼开始。中方出席人员为：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参议官李经方，参赞官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日文翻译官卢永铭、罗庚龄。日方出席人员为：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内阁书记馆长伊东已代治，外务省书记官井上胜之助，外务

大臣秘书官中田敬义，外务省翻译官陆奥广吉、
榎原陈政。

会场陈设简单，一张长方形大桌，上罩淡黄色桌布，桌子周围摆着十多把靠背椅。考虑到李鸿章已年逾七旬，日方在李的座位旁摆了一个精美的陶瓷痰盂。

谈判之前，伊藤博文宣布了四条规定：一是除谈判人员外，无论何人有何事，一概不得进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警卫人员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各旅馆的旅客出入，均须接受官厅检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国议和专使的密码电报均可拍发，公私函牒概不检查。由于清政府的密码之前已经被日本人破译，李鸿章与清廷在之后的往来电文，日方一览无余。这也直接导致清政府在谈判桌上处处被动。而这一点，清政府直到谈判结束也没有意识到。

双方首先寒暄了一些诸如旅途辛苦、接待是否满意等无关紧要的话，然后互相审阅对方的全权资格。李鸿章将随身所带的黄绸包袱解开，从绘有黄龙的筒中取出全权证书正文本，连同英译本亲手交给伊藤博文。伊藤也将天皇的委任证书正文及英译本交给李鸿章。双方在翻译的帮助下互相审阅。随后，李鸿章拿出了一份用汉、英两种文字写成的要求停战的备忘录，由罗丰禄宣读，提出：停战一事，是议和的“第一要义”。

伊藤听后略思片刻，说：“明天答复。”接着，双方又闲扯了一会。双方列席的工作人员商洽了迎送礼仪等，并商定：清政府使团21日移驻岸上日方准备的下榻地——引接寺，21日下午开始第二次会谈。

下午4时15分，第一次会谈结束，时长75分钟。

当晚，李鸿章回船后，向国内电告了首次会

谈情况，表示日方在停战问题上“意似游移”。

停战条件

李鸿章：“只有听从阁下意见。但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办。”

伊藤博文：“阁下认为苛刻，是因为我们各自意见不同，那我只有表示遗憾了。”

3月21日上午10时，中方使团登岸，住到引接寺内。

下午2时30分，第二次谈判举行。双方围绕停战问题展开辩论。

日方首先提出了停战条件，由伊藤博文亲自宣读：1.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上述三

地的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需品交给日本军队；2.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交由日军支配；3.停战期限内中国负担日本军事费用。

李鸿章听后大惊失色，连呼“太苛刻了，太苛刻了”。大沽、天津等乃京畿要地，如让日本人占领，那北京将岌岌可危。他勉强稳住情绪，问：“大沽、天津我国驻有很多军队，日军占领此地，我们的军队驻到哪儿去？”

伊藤答：“那还用说，当然送往贵国认为合适的地方。”

李鸿章又问：“天津除有驻军外，还有众多官署。如果你们占领了，各官署能否照原样保护？”

伊藤不耐烦地回答：“这些细节，可另行商议。”

李鸿章：“这件事关系重大，请允许我方作

充分考虑后再答复。”

伊藤：“多少天？”

李鸿章：“一个礼拜后？”

伊藤：“太久。”

李鸿章：“4天后答复如何？”

伊藤：“越快越好，我的意思是限3天内答复。”

李鸿章：“只有听从阁下意见。但条件如此苛刻，实在难办。”

伊藤：“阁下认为苛刻，是因为我们各自意见不同，那我只有表示遗憾了。”

下午4时20分，会谈结束。双方各自离席。

当晚，李鸿章向总理衙门电告了日本的停战

条件。同时，他也给在天津的家眷发了封密电，告知：“不允停战，家眷速行。”

李鸿章的电文送达北京。光绪见了大惊失色，立即求见慈禧太后。慈禧以生病为由，没有面见。于是光绪只好命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前往各国驻华使馆商议办法。各方使馆一致认为应先了解日方的议和条款，再作打算。清政府也怕再僵持下去影响和谈，便电告李鸿章将日方停战条件“暂置勿论，向日索和议之条款”。

这份电报于23日下午6时35分发到马关电报局，但却被日方扣押至24日中午才送到李鸿章手中。此时，距第三轮谈判开始仅剩不到3个小时了。

刺杀

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他嘱咐随员将换下的

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浣洗。面对袍服上的斑斑血迹，他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3月24日下午3时，第三轮谈判在春帆楼继续进行。

李鸿章首先表达了先议和后停战的意思，正中伊藤下怀。伊藤看了日方的复文后，用日语与陆奥宗光商量了很长时间，又再次对复文的英文本、汉文本看了一遍，然后问李鸿章：“停战谈判，中堂是否打算搁起不提？”

李鸿章答道：“暂且搁起，我来时专为议和起见。”

谈判快结束时，伊藤有意无意地突然提起了台湾问题：“我军已向台湾前进……台湾究竟住有何等人民？”

李鸿章听后面露惊愕。他深知日本素有侵占台湾的想法，便想用英国向日方施压，“贵国若占领台湾，英国将不能置之不理”。

不料伊藤不为所动：“英国现局外中立，没有任何干涉的理由。”

李鸿章：“英国虽然中立，但台湾与它自身利害攸关。”

伊藤边笑边说：“利害攸关的不是英国，而是你们吧。”

李鸿章：“不是，因为台湾接近香港。”

伊藤不耐烦地答道：“不只是台湾，你们国家版图内任何部分要想割让，其他国家都无权干涉。”

下午4时15分，谈判结束。双方约定次日上午10时会晤，开始讲和谈判。李鸿章神情疲惫地

走出春帆楼，坐上蓝色“驾笼”小轿，返回驿馆迎接寺。其他代表团成员乘坐人力车在后跟随。

从春帆楼经阿弥陀寺至外滨町的道路两旁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看赫赫有名的李鸿章。日本警察沿途设岗，严密警戒。当小轿转过外滨町，距引接寺所在地的山坡脚下不足60米时，忽然从胡同中冲出一人，在距李鸿章的轿子不足2米时，他举手枪向轿中射击，李应声倒于轿内。随员们急忙上前探视李的受伤情况。李受枪击时，戴着眼镜，眼镜稍低。子弹穿过左边镜片，击中李鸿章左面颊，血流不止。破碎的镜片落在李的衣襟和轿子内。

轿子抬至驿馆时，李鸿章因流血过多已昏厥过去。众人急忙将他抬进卧室，两名随行医官当即赶来，为李鸿章止血裹伤。不多时，日本医生也闻讯赶到，与中国医官共商抢救之策。

众随员有的茫然无措地肃立于李鸿章卧榻

前，有的向医生探问李鸿章有无性命之忧，有的为抢救李鸿章里外张罗，忙个不停。一时间，驿馆内的气氛十分紧张。

良久，李鸿章渐渐苏醒过来，他嘱咐随员将换下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浣洗。面对袍服上的斑斑血迹，他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当晚，他向国内报告了自己被刺杀的经过，并表示谈判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刺杀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丰太郎，又名小山六之助，1869年生，是日本浪人社团神刀馆的会员，刺杀当日就被日本警察捉住。

小山的刺杀行为，反映的是当时日本国内狂热的国民情绪。据小山丰太郎供述，他认为李鸿章是日清两国战争的罪魁祸首，只有杀掉李，日本才能获胜。3月，他听说李鸿章要来日本马关，便购买了短枪一支和多发子弹，12日午后从东京动身，经陆路于24日抵达马关。4时30分左

右，他见李鸿章乘轿从此处经过，便冲出人群举枪向李射击。他原准备射击李的胸部，以便一枪毙命。但由于紧张，加上是隔着轿子的玻璃射击，因此误中左下眼窝。

实际上，小山丰太郎的行为，并非如他所说是自发的，而是一场有策划有预谋的刺杀行动。

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海陆两路战场上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军界和政界一些狂人和野心家。以日本大本营首席参谋官、“征清都督府”总参谋长川上操六，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等为代表的人，都希望战争继续，反对本国政府与中国议和。

中日议和谈判开始后，川上操六秘密会见了日本秘密社团玄洋社头目之一平冈浩太郎，向他表明了反对停战的态度，希望借助黑社会的力量破坏谈判，使议和失败。平冈浩太郎认为要使两国谈判破产，必须干掉李鸿章。这个主意马上得

到了川上操六的高度认同。平冈于是便派人物色了小山丰太郎，让他充当杀手，伺机刺杀李鸿章。

停战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向伊藤博文提出：“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李鸿章）所一再恳求之休战，较为得计。”

李鸿章面露喜悦神情：“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

李鸿章被刺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在国际上引发强烈谴责。3月25日，德国、美国、英国公使先后前往日本外务省表明各自立场。德国公使认为：“关于李鸿章之事件，无疑已在欧洲惹起对

日本的恶感。”英国公使称：“此次事件甚为可叹，给欧洲恶感甚大。”美国公使也认为：“欧美对此抱有甚大恶感。”26日晨，日本驻德国青木公使给陆奥宗光发电报称：“整个欧洲对这一野蛮暴行感到愤慨，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我们表面的文明。”

鉴于李鸿章被刺在国际上引起了各国对中国的普遍同情，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当夜往见伊藤博文，提出：“此时，由我无条件允许他所一再恳求之休战，较为得计。”伊藤对此完全赞同。他立即致电在广岛的内阁成员，征询意见。

在广岛的多数阁员联名电说：“目下实行休战，对我国不利，请再加考虑。”26日，伊藤博文来到广岛，召开有内阁重要成员及军政界元老参加的重臣会议。会上，伊藤强调指出了如果不停战将会造成的危害性。经过讨论，就停战取得一致意见，并报明治天皇裁决。27日夜，他将停战决定及主要条件电告在马关的陆奥宗光。

3月28日，陆奥宗光受伊藤博文全权委托，来到中国使团驻地，向还在养伤中的李鸿章陈述日本政府应允无条件停战之意。李鸿章的半边脸还缠着绷带，仅露一眼在外。他听此消息后露出喜悦的神情：“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当日下午，他派李经方前赴会议厅进行协商。李鸿章本人躺在床上，与日本外务书记官井上围绕具体停战条款，进行商讨。双方经过多次修正，最后折中达成协议。3月30日，中日双方缔结了停战协定：1.中日两国所有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水陆军，均遵照停战条款；2.中日两国军队各自驻守现在屯扎地方，停战期间不得互为前进；3.所有两国前敌军队，无论攻守，各部增加前进，并不添派援兵；4.停战期限到4月20日。

在此期间，日军于3月26日攻占澎湖马公城，并在城内设澎湖行政厅，实现了对澎湖的实际占领，为日本政府在谈判桌上增加了砝码。

议和

伊藤博文对李经方进行恫吓：“若谈判破裂，我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大军开赴战地，北京安危就难说了。”

总理衙门复电“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

4月1日上午10时，第四次会谈在春帆楼举行。双方主要围绕“是日方提一条、商讨一条还是日方提出全部议和条款再商定”进行争论。

陆奥宗光表示，可以先行提出全部条款，但要求中方必须在三日内答复。李经方表示，必须先提出全部条款主张，但对三日答复的意见则不置可否。日方最后同意在限期答复的前提下，将

条约内容全部提出后，再逐条逐项依次议定。11时45分，会谈结束。

李经方回到住地后，立即向父亲汇报了会谈情况。李鸿章立即照会陆奥宗光：同意日方条件。日方收到李鸿章的照会后，当日下午2时，派外务大臣书记官、秘书官前往引接寺，将日方拟讲和条约稿本日文、中文、英文各一份，面交李鸿章，并声明限4日内答复。李鸿章戴上眼镜，坐在病床上读了数行，感觉力不从心，就让李经方代读。条约底稿主要内容是：1.承认朝鲜独立；2.割让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3.赔款3亿两白银；4.开放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

李鸿章听后，吓出一身冷汗，立即请美国顾问科士达来商量。按照科士达的建议，当日晚分两次将合约底稿内容电告总理衙门。

4月3日晚，电文到达北京。军机处次日上奏

光绪帝。朝中大臣翁同龢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对割台不以为然，双方争论不休。军机大臣们于是一同到当时卧病在床、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訢府中商讨对策。奕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会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几乎就在军机大臣们一筹莫展的同时，陆奥宗光向驻俄公使、驻美公使、驻英公使、驻法公使等发出将媾和条件秘密提示给各国政府的训令。

同日，日本外务次官林董先后约见英、俄、法、美等国驻该国公使，向他们通报了日本的媾和条件。次日，又秘密地通知了德国公使。显然，日本在防止中国争取列强支持方面，又走在了前面。

4月5日，日方规定的最后期限已到，但清政府却依旧没有商讨出任何结果。不得已，李鸿章派伍廷芳向中田秘书官送交对日方和约底稿的答

复说帖。说帖内容分朝鲜自主、让地、军费、通商权利四部分。除了承认朝鲜独立外，对其他三部分都提出了长篇驳辩。

由于中方的驳辩有理有据，陆奥宗光阅后认为说帖“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详尽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文章”。伊藤主张彻底反驳。陆奥则认为：“论驳之端不可开，与其空论，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

4月6日，伊藤派秘书官中田向李鸿章面交了日方对中方说帖的反驳照会：“或全案、或按条，是否应诺，予以明确答复。”8日下午，伊藤派人请李经方到其住处梅坊谈话，当面质问李经方：“我们一周前就提出约案，为什么中方至今还没有明确答复？”并对李进行恫吓，“若谈判破裂，我一声令下，六七十艘运输船搭载大军开赴战地，北京安危就难说了。”

李鸿章再次向总理衙门发电请示，提议允许

割让辽南四厅州县及澎湖列岛，赔款一万万两。总理衙门复电：“让北地以海城为止，赔款以一万万为止。”以此为依据，李鸿章草拟了和约修正案并送交日方。

通牒

伊藤博文：“阁下对此备忘录，只有答应与不答应两个选择。”

李鸿章：“是否对此备忘录不许再进行讨论分辩？”

伊藤博文：“尽管分辩，但不能减少。”

4月10日下午4时15分，中日在春帆楼举行第五次谈判。

李鸿章伤愈，亲自参加了会议。当日，他身着白色服装，配戴眼镜，受伤处贴着一小片膏药。日本方面，陆奥宗光因病缺席。

日方首先将有关条约修正案的再修正案交给中方。较之前款，割地方面有所缩小，到海城为止；赔款改成2亿两，分7年付清；取消了北京、湘潭、梧州三地的开放。

伊藤一上来就提出赤裸裸的威胁：“阁下对此备忘录，只有答应与不答应两个选择。”

李鸿章：“是否对此备忘录不许再进行讨论分辩？”

伊藤：“尽管分辩，但不能减少。”

6时30分，谈判结束。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握手告别时，再次请求将赔款大减。

伊藤笑着摇头：“不能再减了。”

当晚10时，李鸿章将日方再修正案和谈判情形电告总理衙门，请旨定夺。

次日，伊藤博文致函李鸿章，声明昨日递交的日方再修正案为最终条款，中国或允或否，请于4日内答复。

4月12日，李鸿章复函伊藤，请求再进行一次会晤。13日，伊藤拒绝了中方请求，再次威逼中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明确答复。李鸿章将伊藤博文复函全文转电总理衙门，认为割台一事已经无可商量。此电发出后，他又派伍廷芳到伊藤处探听情况。伊藤吓唬伍廷芳：“若再改约款，故意迟延，即照停战款内和议决裂，此约中止。”

14日，李鸿章再次紧急致电总理衙门，认为如再不定约，战争又将爆发。清政府接电后，经过商量，遂电复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

签约

李鸿章自言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

伊藤则洋洋得意地说：“大功告成。”

4月15日下午2时30分，中日在春帆楼举行第六会谈。由于清政府已经允诺可以“遵前旨与之定约”，所以李鸿章心态比较轻松。双方会谈时，仅在一些细节上做了些改动，很快就达成最后协议。会谈中，李鸿章遵照“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旨意，几乎是哀求着能不能减少一点赔款，但伊藤博文根本不为所动。

李说：“恳请阁下多少给以让步。如不能应允五千万两，至少希望减少两千万两。”

伊藤：“我方已充分降低条件，今日些许之

减少亦不可能。”

李：“赔款既不肯减，但希对土地割让能多少有所让步。”

伊藤：“两件皆不能减，屡次言明，此为我方最后条件，丝毫不能让步。”

最后，双方在商议割让台湾具体事宜时，日方提出“一个月内办理完毕台湾的交接”。李鸿章说：“一个月太过仓促。贵国何必着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哄笑一番后说：“还没有咽下去，现在饿得很。”这次谈判于当日晚7时30分才结束。

4月17日上午10时，中日双方在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

双方寒暄一番后，随员将有关条约之文件摆在桌上。因为之前日方伊东书记官与中国参赞官会见时，已经仔细查阅了文件。现场没有再读，

双方直接在文件上盖印。上午11时40分，签订仪式结束。伊藤博文打开准备多时的香槟，祝李鸿章健康。李鸿章举杯答礼，自言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伊藤则洋洋得意地说：“大功告成。”

4月18日，李鸿章等人从马关登船回国。

1912年2月12日：辞位日

“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

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为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日，南方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已经两月有余，距武昌起义亦已逾百天。自保路运动、武昌起义以来的浪翻波连，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这天，大清隆裕太后携六岁皇帝在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朝见仪式，颁发逊位诏书。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等一班国务大臣、内阁成员向皇太后和皇上行三鞠躬新礼。隆裕太后将三道退位诏书交给外务大臣胡惟德，颁行天下。

至此，帝制中国2132年的历史打上了一个句

号。于是，我们可以说，此日堪称中国历史上至关紧要的一天。它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后，帝王由人主、天子、君父变成了人民的公敌。（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这天下午，恽毓鼎前去拜访民政大臣赵秉钧。当赵对他诉说辞位情状，这位忠心耿耿的史官不禁垂泪，在日记中，他沉痛地说：“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在上海的郑孝胥，这天的日记则只有十数字，“骤暖，甚有春气。风起”，还有两个访客的名字，直至五天后的除夕，他全文照录了逊位诏书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的优待条件，慨叹方今之世，一如孟子所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夜，闻爆竹声甚繁，于是乎大清二百六十八年至此夕而毕”。他伤感地结束了这篇日记和这一年。

1911年10月30日 动摇

2月12日的朝见仪式充满悲情。赵秉钧告诉恽毓鼎，太后满面戚容，向大臣们倾诉作为失国太后的内心忧愤：三年来她深居宫中，并不曾干预政事，孰料一般亲贵“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恽毓鼎：《澄斋日记》）说到伤心之处，隆裕不禁失声痛哭。

三年前，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去世。太后临终遗命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由载沣摄政。隆裕对此颇为不悦，因为她很想效仿慈禧“垂帘听政”。于是，皇太后以后常与摄政王因事发生齟齬。（《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在皇族们后来的回忆中，隆裕为人，庸碌无识，远远比不上她那位精明强干的姑妈。在“国服”期间，她便听从宠监张兰德怂恿，在宫中兴建水晶宫，作为休闲之所。在帝制时代，这属极严重的问题。何况，当时朝廷正筹备海、陆两军，费用不足，然而隆裕照旧命令度支部拨款来修建宫

殿。

隆裕不曾料到，自己是酣歌于漏舟之中。从1644年大清入主中原起，经历18世纪康雍乾三朝——中国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乾纲独断，君权臻于极致；进入19世纪，是暗淡、内忧外患交迫的一个世纪，上一世纪蕴集着的种种社会矛盾纷纷呈现。大清被强迫拉入近代，这是一个漫长的衰败期。它表现出一种传统适应能力的顽强韧性，同光两朝，不时出现复苏迹象，自强运动、维新变法，富有生气和活力的最后十年新政。直至武昌兵变，人心动摇，几次小规模事件迅速发展成新形式的大运动。

于是，太后、疆吏、党人、民众都卷入了连串的历史漩涡之中，皆被时势推着走，同时也推着时势走。投身其中的张謇曾说：“各省决心独立，蓄根在怨苦政府三年内之反对立宪，授柄在官收商办铁道之不合方法；而发机在荫昌汉口之战，恣行杀略，凡识时务者皆能知之，既由极高

之热度酿成一般之舆论，潮流万派，毕趋共和。”（《致袁世凯函》，见《张謇存稿》）新军武昌兵变之后，各省闻风响应，纷纷独立，朝廷急于消弭祸乱，稳定大局，可以说是步步退让。

在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朝廷以皇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书中言及当下“区夏沸腾，人心动摇”。在1911年10月末，疆吏、名士和党人们，以漫长岁月构筑而成的君父世界在人心和世界动荡中碎裂了，那曾是国人两千年安身立命和血肉相连的地方。

清廷希望用这老法子唤起人民内心深处的感情。神灵不安于飨祀，生民有涂炭危险，“此皆朕一人之咎也”。诏书中比张謇更深刻地检点三年来政治上的失败。一是用人多用亲贵，施政寡术；二是新政促行新治成官绅渔利的名目，更改旧制，权豪们敷衍了事；三是新政经费多取民财，却无利于人民。此番对新政的检讨，不可谓

不深刻，湖南一位三品官员李颐对此有形象描述，“杂税日增，民心不安；科举全废，士心不安；新学多偏，众心不安；官制屡变，官心不安；洋货争衡，商心不安”。（《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十年来除旧布新，把一代人拖进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动。然而，舶来的西法改造了中国社会，两千年来历史沉淀而成的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舶来的西法。这种交互改造使西法和中法都失去了本来面目，四万万人遂身在新旧之间，两头不到岸。（杨国强：《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坍塌》）

为了重获人心，朝廷的对策是更快地滑向全变速变。罪己诏中既宽赦了变乱的新军，也彻底解除满汉畛域。最关键的一着是“维新更始，实行宪政”。11月1日，摄政王立准皇族内阁集体辞职，紧接着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他部署湖北军务之后，迅速来京组阁。在此之前，摄政王迫于形势，已经三次下谕旨起用袁世凯。11

月2日，资政院拟就《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称作“十九信条”。这个制宪原则深得英国宪法精神，皇权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决策由国会作出，皇室的经费都需经过国会决议。立宪党人追求多年的东西，终于在空前的危机之下实现了。

依据十九信条，资政院提出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违宪，政府便收回成命。资政院在11月8日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袁世凯得票最多，于是，朝廷方以皇帝名义再次发表任命上谕。此外，摄政王还代替尚在冲龄的皇帝，到太庙宣誓，表示皇室将遵守信条。

1911年12月6日 瓦解

多年之后，当日在养心殿辞位的溥仪，抱怨父亲起用袁世凯，让自己“糊里糊涂地做了三年

皇帝，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我的前半生》）他认定袁世凯到北京后，通过奕劻在隆裕面前玩了个把戏，把摄政王挤掉，返归藩邸。载沣之弟载涛亦说，载沣本不愿请这个大对头出山，以威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素性懦弱，没有独作主张的能力，亦没有对抗他们（指奕劻，徐世昌和那桐等）的勇气，只有听任摆布，忍泪屈从。（载涛：《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

载沣监国之初，朝廷曾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予摄政王无上的权限。举凡赏罚升迁、军国政事，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裁定，以谕旨宣示施行，若有须请皇太后懿旨之处，必须摄政王当面请行，他人不能擅传。然而载沣从小因兄长是皇帝，和他的父亲奕一样，活得谦卑谨慎，锐气早消。溥仪长大后，曾经看过父亲监国三年的日记，想了解一些情况。他没找到多少材料，只发现有两类很有趣的记载。一类是属于例行事项的，如每逢立夏，必“依例剪平头”，每逢立

秋，则“依例因分发”；此外还有依例换什么衣服，吃什么时鲜，等等。另一类，是关于天象观察的详细记载，报上登载的这类消息的摘要，有时还有很用心画下的示意图。他因此判断父亲的生活可谓贫乏至极，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对天文的热烈爱好。显然，载沣是个放错了位置的人。

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仍以醇亲王退归藩邸，不再预政。溥仪、载涛等认定这是摄政王在与袁世凯、隆裕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汇报中，记录当时的舆论反应，“人们以为它真正表明太后至一对摄政王一派的胜利”，（《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还猜测隆裕企图效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在载润的回忆中，则有另外一种说法：载沣个人无良策应付时局，惟不欲以自己名义下逊位诏书，故而辞去监国之职。

溥仪等皇室成员，和一般舆论，大概都没有真正把十九信条当回事。遵守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袁内阁已经主理政事，摄政王完成了他的使命。此时，皇室力量实质上已经退出了政治决策中枢，懿旨中亦有要诸王公“恪遵家法，束身自爱，罔越范围”这样的约束之语。

隆裕懿旨中用“人心瓦解，国势土崩”形容当前形势。人心从“摇动”到“瓦解”何止于数日数月数年。从1840年以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动人心目，尽管缓慢，尽管芜杂，却也在推演既强韧又脆弱的人心。最后十年，一场迟来的、急速的变革让清廷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局，新政粉碎了专制君权的基石。在摄政王归藩的懿旨中，对载沣的指责可谓严厉，“以一人措施失当，而令全国生灵横罹惨祸”。公正地说，一人之力，何至于此？可以说，是一种对进步权利和生命尊严的追求，最终掏空了千年皇权的内在精神、剥夺其正当性，使

其变成一个虚弱的空壳。摄政王所代表的君权，已成为了孤独无依的空架。

就在武昌起义之后，朝廷发布了“国歌”，歌词出自严复之手，乐曲是宗室溥侗选自康乾时的皇家颂歌。大清国歌虚浮华丽，粉饰太平。祈祷皇权永固：“巩金瓯，承天帟，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高蹈昂扬：“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两种旋律，两种胸怀。自不难窥见，水样的人心，会聚集如潮，去载哪一艘船只。

1912年2月12日 辞位

由于年龄太小，溥仪不曾参与达成退位妥协过程中的博弈。在种种利益考量中，也没有领略妥协、隐忍、平衡以及包容的政治艺术。最后那段日子，在他记忆里浓缩成极富象征意味的一幕。有一天在养心殿东暖阁里，隆裕太后坐在靠南窗的炕上，用手绢擦着眼。她面前地上的红毡子垫上，跪着一个粗胖的老头子，也是满脸泪痕。那时候，他坐在太后的右边，非常纳闷，不明白两个大人为什么哭。殿里别无他人，安静得很。胖老头一边抽缩着鼻子，声响很大，一边说着话。后来溥仪才知道，胖老头就是袁世凯。这是他唯一一次见到袁世凯，也是袁世凯最后一次见太后。

从12月3日到12月31日，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进行了四次停战谈判，事实上已进入议和阶段。袁世凯不仅有了军政大权，还有了比这更为难得的东西，这就是洋人方面对他也发生了兴趣，而革命党方面也有了他的朋友。1910年4月

因刺杀摄政王未遂被囚禁的汪精卫，已于11月开释，汪精卫每晚饭后与袁世凯夜谈，袁渐渐倾向共和，不做“曾国藩第二”，要做“汉族的华盛顿”。

溥仪记忆中那次会面是在1月16日。那天袁世凯与内阁成员奏请朝廷，要求召开皇族会议，“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溥仪认为，密奏中最令太后感到恐怖的，莫过于这几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东西友邦，有从事调停者，以我只政治改革而已，若等久事争持，则难免无不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輿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大清成了“三无”朝廷：无兵可用，无地可容，无友可助。还有那外国的历史教训，法兰西皇族便因不顺民意而至子孙无存。

隆裕是否如溥仪所说“给吓昏了”，如今无法

考究。毫无疑问，太后的心理防堤在那一天碎了。袁世凯离宫回府途中，在东安市场外遭遇革命党人的炸弹，乘机称病，不再入朝。接着便在几天内连开数次御前会议。此时的满清皇族们，载沣、载涛，奕劻、善耆等各有党羽，外界风传有“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葺鬬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胡思敬：《国闻备乘》）。如此混乱的朝局，每个人都与君权相关，却无人真正把君权放在眼里。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因此断定，“即使后来的袁世凯，还想做曾国藩，恐也未必能挽救清朝的颠覆”。（《清末贵族之明争暗斗》，见《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17日御前会议上，溥伦提出清帝自行逊位，由袁世凯做总统，奕劻附议。恭王溥伟、载泽等强烈反对，隆裕唯有伏案啜泣。19日御前会议，胡惟德、赵秉钧、梁士诒诸人提出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与会王公们自然一致反对。20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

优待条件。22日隆裕召开御前会议，载泽、溥伟等亲贵竭力反对共和，提出太后用宫中金银作犒赏，任用冯国璋破敌。太后说，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溥伟要求皇上赏兵杀敌报国。太后便问主管陆军的载涛兵力如何。载涛回说“奴才没有打过仗，不知道”。（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

后来在皇族们的回忆中，隆裕没有什么政治才干，庸碌无识，但不得不说她此刻表现出理性和自知之明。她明白这些亲贵猖狂少年靠不住。26日，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当天，强硬派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王公官员们纷纷转移财产，存放到外国银行。隆裕此时真的是胆战心惊，她哭着对赵秉钧等三人说：“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

此后，亲贵们或请假，或出走。在2月12

日，太后再次挥泪，面对着往昔的臣工们，她抱怨危局之下，亲贵们没有什么对策，只知保存性命财产，置孤儿寡母于不顾。后来溥仪在自传里补充说，当时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

事实上，直至12日早晨，仍有人想阻止退位上谕发布。隆裕对内阁全体说：“我们先办了这事，我再见他们，免得又有耽搁。”（叶遐菴：《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于是将逊位诏书盖印发出。难怪两日后，《顺天时报》发表评论，赞美逊位之举犹如“三代之治，尧舜禅让，公天下之心也”；太后“力排二三王公之反对共和论，独使皇上让政，以泯南北官民两军之战祸。其识能洞见世界之趋势，其公足与唐虞媲美”。这位叫孙佩珩的作者还设想到和议不成的可怕后果：“倘使皇太后极端反对共和，虽至社稷为墟而不悔，势必兵连祸结，葬吾中国生民大多数于枪烟炮雨中。”皇帝和共和派彼此做出妥

协和让步，最终和平而不失体面地下台。此中所蕴藏的政治智慧曾令不少西方人惊诧，他们称之为“体面的逊位”。无疑，隆裕太后自有一份历史功业。

张謇起草的这份逊位诏书中，再次提到人心，“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失败亡国的恐惧，太监张兰德的危言耸听，都在隆裕的考量之中，除此之外，隆裕决然共和，或许她真的感受到了“天命”的力量。从前新旧王朝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两千年来皇权与天命相连，他们将之神秘化。然而说穿了，天命便是人心；得失在于人心，决非一句空言。

这一次，跳出了王朝轮替。人心如水，几十年间催生出急迫的奔涛和吹卷的浮沫，终于冲垮了帝制的牢笼。在《逊位诏书》这份有宪法意义的文件里，清帝是逊位给一个立宪共和政体。以后，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张勋，搞复辟都没有出

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成为一种时代意识。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

著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
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
- 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

著

6、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自行下载

备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

